2011
[总第326期]
ISSN 0511-4721
5

# 文史哲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专刊

# 守先待后，斯文在兹

## ——序“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专刊”

徐显明

今年，历史悠久的山东大学已经走过了整整110个春秋了。抚今追昔，我们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其中最值得纪念和追忆的，无疑当是山东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闪光足迹和辉煌成就。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山东大学是以“文史见长”闻名于世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东大学所享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盛誉是人文学科所铸就的。20世纪30年代，以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老舍、沈从文、游国恩、王统照、洪深等为代表的著名作家、学者在这里曾谱写过华美的篇章。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殷孟伦、殷焕先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和汉语言文字学，以丁山、郑鹤声、黄云眉、张维华、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为代表的中国古史研究，使山东大学成为当时海内外瞩目的文史研究重镇。以这些学者为依托的《文史哲》杂志，将山东大学的人文学术地位推向巅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受惠于昔日文史研究带来的学术声望。

山东大学的人文研究能够蜚声学坛，辐射海内外，首先是山东大学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域优势使然。此即古人所谓地利。作为孔孟故里，山东素称人文渊薮。地处齐鲁大地的山东大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源头，被泽儒风墨雨，吟传稷下齐学余韵，又为汉代经学（郑玄）、魏晋玄学（王弼）、龙学（《文心雕龙》）、农学（《齐民要术》）等灿烂遗产所熏染，可以说是中国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悠久学术渊源的大学。在这方面，山东大学堪称得天独厚。这一地缘优势，是国内任何一所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除却地理方面的先天因素之外，山东大学能够成为人文学研究的重镇，更与它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特色和学术传统密不可分。回顾总结近百年间山东大学人文学科走过的辉煌路程，有以下三点特色或遗产，值得在此略加申述：

高度重视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是山东大学的优势和特色所在。这里的所谓古典学术研究主要指的就是古文、古史、古哲等传统学术。山东大学在这些领域的开拓和耕耘，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古典学术可以说是山东大学人文研究的根据地、大本营和出发点。在文学方面，冯沅君、陆侃如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是《中国诗史》等；萧涤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杜甫研究；在史学方面，王仲荦主攻魏晋南北朝史，是点校二十四史的功臣之一；杨向奎是以古代思想史、童书业是以先秦史研究著称于学界的。其他学科对史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古史。如吴大琨的经济史研究，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考察古史分期问题，其主要关怀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在哲学方面，高亨的《周易》研究、先秦经籍研究就更不用说了。在法学方面，乔伟的《中国法制史》也主要探讨刑罚制度在历史上的不同形态。我们虽然也有关于近世学术的探研，如华岗的近现代革命史研究、郑鹤声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但山东大学人文研究的骨干和重心无疑在于古典学术。

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是山东大学文科发展的宝贵传统。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

培为北京大学开创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但我以为，山东大学雅量高致，在兼容统合各种学统、学派方面可比肩于北京大学。山大在文科学统上的多元共生优势是国内其他高校所难以比拟的，这里有北京大学的学统，如冯沅君、陆侃如；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统，如高亨、萧涤非；有章黄派的学统，如王仲荦、殷孟伦、殷焕先；有“古史辨”派的学统，如杨向奎、童书业；有“中研院”史语所的学统，如丁山；有南高的学统，如黄云眉、郑鹤声；有教会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学统，如张维华；有马克思主义的学统，如华岗、赵俪生、吴大琨。开放性是山东大学学统谱系的显著特点，也就是说，民国年间所有的主要流派在山大都能据有一席之地，拥有各自的生存空间，这一点远比其他大学要开放得多，比如有的大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容纳南高派的存在。各种学源竞争共存、和而不同、激荡互动，焕发出无穷的学术活力。百家云集、学派林立使得山东大学的人文研究能够一时独步学林，傲视宇内，就此而言，这一时期的山东大学堪称是当年稷下学宫的再现。

朴实厚重、精勤严谨、执著专注的学风，是今日山东大学文科最值得继承的遗产。受齐鲁文化朴实古风的影响，山大学者秉承前辈先贤那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深谙为学须耐得住寂寞的真理，不为名利权位种种诱惑所牵引，不为功利浮躁的世风所裹挟，甘于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他们视学术如生命，一心只为往圣继绝学，笔耕不辍，终生不渝。山大学者尤其注重厚积薄发，瞄准尖端前沿，精心锻造传世之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历史学家王仲荦在研究工作中，恪守“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古训，始终坚持高规格、高标准、高质量。其《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书，在出版前四十多年就已草成，后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陆续面世。文献目录学家王绍曾的学术青春，是从60岁后才开始的。他倾注十年心血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清人著述54880种，学界称赞该书“既为目录学上大盛事，亦有清一代文献括存之大业”，“堪称20世纪古典目录学领域中有关清代文献著录的压卷之作”。萧涤非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杜甫研究也体现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专注精神。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萧涤非就胸怀杜甫研究的长远规划，从杜甫诗选注到对杜甫研究，再到“杜甫全集校注”，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终于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高度。高亨的金石甲骨文字著作《金石甲骨文字通笺》也是积十数年之功而完成的巨制。正是在这种扎实严谨的学风浸润下，山东大学的人文研究、特别是文史哲诸科的研究，引领风骚，一时无双。

当下，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剧烈变革，与国内其他重点高校一样，山东大学的文史研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重塑辉煌，是山东大学面临的重大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尝试，目前我们已选定人文研究新的突破口，寻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这就是儒学研究。山东大学将以儒学研究为依托，提振和整合人文研究资源，努力打造成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平台。“山大特色，世界水平”的目标将有望在儒学研究这里率先实现。

人文研究曾是山东大学的骄傲和亮点，我们不能忘却这段辉煌的历史。值此110周年校庆之际，《文史哲》编辑部特邀请相关专家，对已故的为山大文科的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33位名流大师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集中盘点和展示。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创意，也是为110周年校庆贡献的一份厚礼！我希望，今日之年轻学子们在追慕和重温先贤业绩的同时，尤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巨大的动力，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升，以迎来山东大学人文研究的再度辉煌！

（作者为山东大学校长）



高　亨(1900–1986)



冯沅君(1900–1974)



黄孝纾(1900–1964)



陆侃如(1903–1978)



萧涤非(1907–1991)



殷孟伦(1908–1988)



高　兰(1909–1987)



王绍曾(1910–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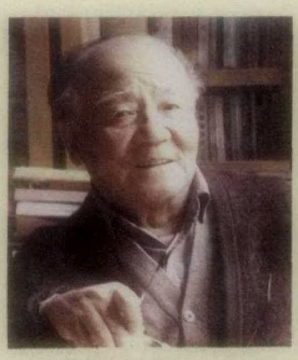
殷焕先(1913–1994)



孙昌熙(1914–1998)



蒋维崧(1915–2006)



关德栋(1920–2005)



牟世金(1928–1989)



周来祥(1929–2011)



狄其骢(1933–1997)

# 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专刊



黄云眉(1898–1977)



陈同燮(1898–1970)



郑鹤声(1901–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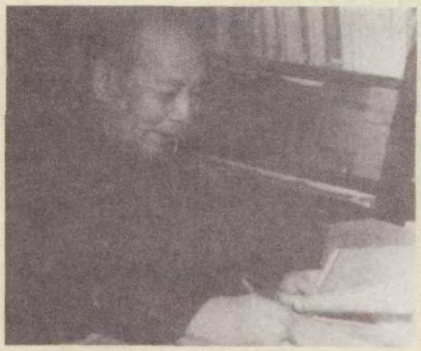
张维华(1902–1987)



华　岗(1903–1972)



童书业(1908–1968)



韩连琪(1909–1990)



杨向奎(1910–2000)



王仲荦(1913–1986)



孙思白(1913–2002)



赵俪生(1917–2007)



刘敦愿(1918–1997)



田昌五(1925–2001)



葛懋春(1926–1996)



乔　伟(1932–1997)

# 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专刊



黄云眉(1898–1977)



陈同燮(1898–1970)



郑鹤声(1901–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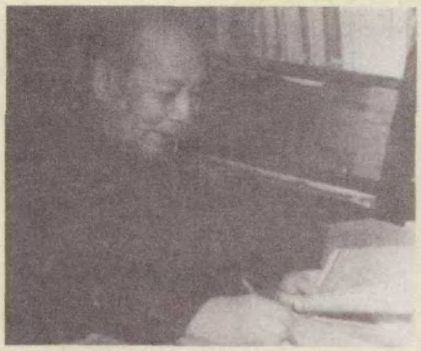
张维华(1902–1987)



华　岗(1903–1972)



童书业(1908–1968)



韩连琪(1909–1990)



杨向奎(1910–2000)



王仲荦(1913–1986)



孙思白(1913–2002)



赵俪生(1917–2007)



刘敦愿(1918–1997)



田昌五(1925–2001)



葛懋春(1926–1996)



乔　伟(1932–1997)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教育部“名刊工程”首批入选期刊
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 文史哲

双
月
刊

1951年5月创刊

2011年第5期
(总第326期)

2011年9月5日出版

**顾　问**(排名不分先后)

饶宗颐　邢贲思　汝　信
袁行霈　庞　朴　叶　朗
黄楠森　方克立　厉以宁
杨牧之　傅璇琮　方立天
冯天瑜　奚广庆　戴　逸
楼宇烈　张立文　钱中文
李希凡　刘蔚华　李庆臻

**海外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成中英(美)　杜维明(美)
李福清(俄)　顾　彬(德)
康达维(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璜　刘京希

**封面设计**

蔡立国

文史哲 2011年第5期(总第326期)

## □汉语言文学

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代大家
——简述高亨先生的学术成就 …… 董治安(5)
文学史学大师冯沅君先生 …… 袁世硕(12)
黄孝纾先生的诗文创作和治学特点 …… 刘怀荣(17)
史料、史识和美学的融通:陆侃如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 …… 张可礼(26)
真理之勇气
——萧涤非先生的学术境界 …… 林继中(35)
殷孟伦先生的学术成就 …… 刘晓东(42)
高兰先生朗诵诗与教学研究及其人格精神 …… 吴开晋(47)
王绍曾先生与目录版本学研究 …… 杜泽逊(55)
反切、破读与方言音韵
——殷焕先先生在音韵学领域的贡献 …… 张树铮(60)
孙昌熙先生研治鲁迅和现代文学的成就 …… 张学军(66)
文德翰彩　光及北辰
——略论蒋维崧先生的学术贡献与书法篆刻艺术 …… 傅合远(74)
俗文学、满学与敦煌学家关德栋先生 …… 叶　涛(82)
“龙学”里程碑
——牟世金先生与20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 …… 戚良德(88)
周来祥和谐美学思想的理论贡献与历史价值 …… 周纪文　戴孝军(95)
狄其骢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学术意识 …… 谭好哲(102)

〔期刊基本参数〕CN37-1101/C*1951*b*A4*168*zh*P*￥12.00*7000*33*2011-09

昌明传统学术
锻铸人文新知
植根汉语世界
融入全球文明

## □历史学


自学成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 潘　群(110)
陈同燮先生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 解玉军(118)
全球化与民族性:郑鹤声史学精神探析 …… 陈尚胜(128)
重视学问　更重人品
——记业师张维华先生…… 晁中辰(136)
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 …… 王学典　黄广友(144)
童书业先生与先秦史研究
——任教山东大学期间历史观的转变和学术创新…… 胡新生(157)
韩连琪先生与先秦秦汉史研究…… 胡新生(166)
杨向奎先生在山大十年的科研成就…… 李尚英(172)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王仲荦先生的学术与学问…… 齐　涛(180)
孙思白先生与民国史研究…… 韩凌轩(189)
而今诸神皆粪土,犹有深山问道人
——赵俪生先生的思想与学问…… 秦　晖(198)
创建考古专业　引导学术发展
——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奠基人刘敦愿先生…… 栾丰实(211)
究历史规律　通古今之变
——田昌五先生学述…… 臧知非(215)
葛懋春先生的学术向路与领域…… 李红岩(227)
立基于史　不囿于史
——乔伟先生法史研究的学术底蕴与现实关怀…… 徐显明　马建红(236)


## □哲学、外国文学


在东西互参中体认中国文化真谛
——许思园先生有关学术思想述评…… 何中华(246)
黄嘉德先生与萧伯纳研究…… 李乃坤(254)
中国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吴富恒先生 …… 郭继德(259)



特约校对/王春霖　　英文审订/刘天路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20 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代大家

## ——简述高亨先生的学术成就

董 治 安

**摘 要**:高亨先生是我国 20 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代大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遵循朴学方法,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研治先秦典籍,抒录个人心得,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取得了以《诸子新笺》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他对于先秦诸子文献的整理研究,数量既多,方面亦广,其中尤以《老子正诂》、《墨经校诠》等著作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高先生对于《诗经》、《周易》的注释研究,影响远及海外。《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诗经今注》等名著,从一个方面体现了 20 世纪《易》学、《诗》学的应时发展。

**关键词**:高亨;《诸子新笺》;《老子正诂》;《诗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

在我国过去不久的 20 世纪的学术史上,高亨先生(1900－1986)称得上是一代大家。他生于 1900 年,即 20 世纪开始的那一年。他的学术生涯,如果从 1926 年《韩非子集解补正》的写作算起,迄于 1986 年辞世,差不多经历了六十个春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悠长岁月中,他在学术道路上的锐意追求、勤奋耕耘,为社会奉献了一批重要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一、朴学的追求

1957 年 8 月,高亨先生在《诸子新笺·自序》中说:

> 我写此书,乃承受前儒的启发,遵循朴学的方法,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来研读先秦诸子的遗著,从而抒录个人的心得。虽然是"以管窥天",所见极小,但是自信没有"无根之谈"。①

《诸子新笺》,是高先生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之一。他这里所说的"朴学",指的是清代以乾嘉学者为代表的古籍训诂考据之学。所说的"前儒",指的是有重要朴学成就的王念孙(著有《读书杂志》)、王引之(著有《经义述闻》)、俞樾(著有《诸子平议》)、孙诒让(著有《札迻》)等。清人承袭汉儒治经的方法校释古籍字句,言必有据,论必取证,又注意融通古典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的积极成果,取得了超乎前人的重要成绩。高先生刻意追踪前儒,自觉以朴学承继者自砺,是他在治学道路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学术取向的确立,可以追溯到高亨先生的青少年时代。

1900 年,高亨先生(字晋生)出生在吉林省双阳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然而,青少年时代的高先生却在这里获得了两次重要的知识启蒙:一是 1910 年春入当地私塾读书,历时八载而通读了全部"四书五经";二是五年中学读书期间,得到地方名士张文澍老师的课余指导,学习了我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阅读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等。以上经历,为他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促使他对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门径有了初步的了解。

1925 年,高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翌年秋毕业离校。前后虽不过一年,受到导师梁启

---

**作者简介**:董治安,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高亨:《诸子新笺·自序》,《高亨著作集林》第 6 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 页。

超、王国维的影响却至为巨大。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正》以《说文》为工具，对《韩非子》的真伪问题和疑难字句作出了新的考释，征引广博，勘订有据，深得梁启超嘉许。梁启超说："陈兰甫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开始把《说文》带到东北。"毕业时，梁启超有一联为赠："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可同俗人。"半个多世纪以后，高先生在一篇《自传》中说："自青年起，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读书、教书、写书）。"①由此可见，正是清华研究院研读的宝贵经历，确立了高先生终生治学的坚定目标，而以《韩非子集解补正》的写作为标志，他在朴学道路上开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抗日战争期间，高先生飘无定居，辗转于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了先秦古籍的训诂考证工作。他说："国丁艰难之运，人存忧患之心，惟有沉浸旧篇，以遣郁怀，而销假日。"②先后完成了《吕氏春秋新笺》（写于1931年）、《庄子新笺》（写于1932年）、《荀子新笺》（写于1932年）、《墨子新笺》（写于1936年）。建国以后，从1953年起，执教于山东大学，有了相对安稳的学术环境，始将上述旧作加以整理汇编，1961年3月出版了《诸子新笺》一书。1980年8月《诸子新笺》的增补本问世，增收《墨子新笺》（写于1961年）与《商君书新笺》（写于1963年）各一种。

《诸子新笺》是高先生几经加工、精意完成的朴学力作。清华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正》，固然是几经修改后才得面世；脱稿于20世纪30年代的《墨子新笺》、《荀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等，在发表之前也都几作增删。他说："《吕氏春秋新笺》于1931年写成，未曾刊布……后来削去大半，及读到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谭介（戒）甫的《校吕遗谊》、于省吾的《诸子新证》，又把管见与别人偶同者削去。现在这个定稿不达原稿四分之一了。"③他又说：注《荀子》时，与梁启雄同客沈阳，"旬日必相见，相见必论荀子，如是者三载"。注释《庄子·至乐》篇时，"翻书特多"，"有时通夜不眠而兴致淋漓，不感困惑"④，都可见用力之勤，付出心血之多。通观全书，所收笺文六百三十条，虽不能说条条尽为不易之论，然其绝大部分，确乎称得上是沉精覃思、有补前人之作。《诸子新笺》是20世纪迄今具有代表性的朴学著作之一。高先生还有一部《古字通假会典》，不及详论，此处从略。

应该指出，运用札记的方法书写古籍研读的成果，如果说表明了高先生对传统朴学刻意取法、有意仿效的一面，那么，朴学的精神、朴学的追求，同样也鲜明地体现在高先生其他多种著作中。这些著作，重视字句的考订，避免"无根之谈"，注意"抒录个人心得"，形成朴实、厚重而多有新见的治学风格，成为高先生著作中极具个性的学术特色之一。

## 二、先秦诸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被汉人称为"九流十家"的晚周诸子著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地位特殊、影响深远。进入20世纪，由于社会的变革与文化的演进，儒术独尊的局面被根本改变，为子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与机遇。高亨先生顺应了历史的进步与学术的转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先秦子书整理研究的一系列学术开拓。几十年间先后出版的专书，除《诸子新笺》外，计有《老子正诂》、《老子注译》、《庄子今笺》、《墨经校诠》、《商君书注译》等，还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成为这个领域屈指可数的著名专家之一。

高先生对先秦子书的研治，不专守一家，而涉及战国时期的多个学派。诸如儒家的《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墨家的《墨子》，名家的《邓析子》、《惠子》、《公孙龙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都一一成为高先生审视与研究的重要对象。这表现了高先生治学视野的

① 《高亨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0－291页。
② 高亨：《老子正诂·自序》，《高亨著作集林》第5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③ 高亨：《诸子新笺·自序》，《高亨著作集林》第6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④ 高亨：《诸子新笺·自序》，《高亨著作集林》第6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开阔，也显示出他对先秦诸子著作整体的重视。其所获成绩方面既多，不及备列，酌举三点以见一斑：

其一，关于老子其人的考订与《老子》一书的整理研究。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秦文化史上的巨星，同时，又是身世茫昧、年代无考的一位"隐君子"。老聃到底是谁？其与《老子》一书的关系究竟如何？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分歧的理解。清代朴学大兴，而《老子》的整理却成绩有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老子的真伪问题一度成为学术界论争的热点之一。

高亨先生积极参与了有关老子其人的论争，于1936年发表了论文《史记老子传笺证》。学界否定老子者不乏其人，而高先生则独取信于太史公司马迁。他以《史记》所载老聃生平的几个主要节点，逐次发掘大量先秦两汉文献为证，深入考定了老子的历史存在，并且胪列六项证明，以论断《道德经》决为老聃本人所著。在当时有关战国子学展开的学术辨伪工作中，他态度分明地反对疑古、坚持了释古，引人注目。还值得注意的是，高先生对于老子其人的肯定，历久而弥加坚持。事过四十多年，1979年他再次发表了《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①]，分别就"老聃与老阳子"、"孔丘问礼于老聃"、"老聃去官与东周王朝的南迁"、"老聃与《老子》一书的关系"、"老聃时代的周王朝"等几个关键性问题进一步作出深入的考辨。尤为难得的是，他还制作了一份难度极高的老聃生平活动的年表。这篇论文，坚持并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以前论老的基本态度，而论题又有所扩展，论据又有了很多开拓。高先生时年已届八十，论文却思路清晰，新见迭出，极具创意，为《老》学研究中一篇难得之作。

高先生《老子》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老子正诂》一书。此书始撰于20世纪20年代，1929年曾用作教学讲义。1940年编为初定本，1943年由开明书店出排印本。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重订老子正诂》，其后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一个新版的重印本。《老子》研究，历来言人人殊，难以究诘。本书中，高先生十分重视《老子》传本的查考与原文的校理，他在排比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老子》传本周秦两汉之间代有异同"的重要判断，从而证明了战国秦汉间《道德经》已有多个传本的事实，为《老》学史的研究作出了有突破性的贡献。高先生有感于《老子》用语玄虚、文约义丰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朴释玄"、"以老释老"的注释原则，为这部古老文献字句的训解作出了新的思考、新的尝试。"道"、"德"二字是《老子》书中的关键性用语，高先生特撰《老子所谓道》与《老子所谓德》各一篇。他细心绎绎《道德经》原文，归纳"道"的主要性质有十点，据此概括其定义为"宇宙之母力"；又引《庄》释《老》，核以《道德经》原文，得出"德"的定义为"道之本性与人之本性"。这些见解，都深有见地，值得重视。半个世纪以来，《老子正诂》事实上已成为《老》学研治者不可不备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其二，关于先秦名家文献的整理研究。

名家是"九流十家"中重要的一派。春秋战国时期，邓析、公孙龙、惠施以及其他"辩者"的政治实践与学术活动，推动了名辩思潮的发展，书写了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奇光异彩的一页。然而年代悠远，文献散失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先秦名家的重要著作，大都久已亡佚；散见的一鳞半爪，又多诡辞怪说，苛察缴绕，难于理解。近代以来，陆续有人对邓析、公孙龙、惠施之学给予考辨，使纷然杂陈的名家学说略有端绪可寻，然而进一步厘清事实、给名家以准确的评价，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讨的重要课题。

高亨先生早年在《庄子新笺》中已经涉及到对名家学说的钩沉与整理。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庄子天下篇笺证》，对见载于《庄子》中的"惠子之说"、"辩者之说"共三十一则，给予了系统的笺证。高先生旁征远引，着力阐述，既遵循名家之大旨，博采各家成说，又细心揣摩，抉微发隐，把对名家学说的阐释与个人的具体理解结合起来，获得了超出前人的学术成果。

---

① 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高亨著作集林》第10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1－333页。

1963年，高亨先生发表了专论《试论晚周名家的逻辑》。全文长达3万余字，是深入论析名家思想、全面梳理名家学说的一篇精洽之作。高先生根据《庄子》、《荀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并高诱注等先秦两汉可靠文献资料，爬罗疏证，考定辩者遗说共四十二条，《公孙龙子》残文六篇；进而创造性地总结出先秦名家的七个逻辑法则和公孙龙的五个逻辑法则，共十二项，对晚周名家的基本理论作出了空前全面的考论与说明，为名家学说的进一步研究建构了新的平台。高先生指出：名家逻辑思想的出现，体现了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那种无视名家学说逻辑上的根据，笼统视之为"诡辩"、"唯心论"，是不可取的，所论深有见地。他又说：名家学说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对于客观事物通过细密的观察，敏锐的思考，深刻的剖析，提出不少反传统观念的、异于一般常识的判断，从而创造了自成一派的逻辑学"①。他还认为，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名家的逻辑思维和法则曾经给予当时思想家、尤其是墨家很多启示，直接推动了墨家形式逻辑的发展。以上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发人思考。

其三，关于《墨经》的整理与研究。

《墨经》是先秦墨家的重要著作，包括《经上》、《经下》与《经说上》、《经说下》四篇②。战国时代，百家蜂起，墨子师徒基于现实的需要，创立了墨家学说，也建立了"墨经"的理论。墨家与名家有过激烈的论辩，也对名家学说多有汲取，可以说"墨经"是在名家学说的启示与影响下产生的。《墨经》内容较为丰富，大部分是墨家的逻辑学，有少量的政治观点与论理观点，尤为珍贵的，还涉及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包括几何学、力学、光学等，在思想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弥足珍贵。但《墨经》文辞简古，不易研读，自汉以来又长期不受重视，很少有人整理，衍、窜、脱、误十分严重。清代朴学家开始注意《墨经》文字的整理。近代以来，除孙诒让就《墨子》研究作出整体性贡献以外，还出现一批专治《墨经》的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谭戒甫、栾调甫、伍非百等。

高亨先生的《墨经校诠》是专就《墨经》四篇作出的整理与校注。初稿完成于1944年，1956年加以修改，成为定稿，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墨经校诠》的学术开拓，首先在于重新梳理了《经》与《经说》的相互对应关系。《经上》、《经下》初本当系墨翟自作，而《经说》两篇则出于墨子门徒或后学之手，是"经"的注解。自汉以来，《墨经》残乱严重，《经》与《经说》失去关联，含义难以通晓。高先生积数年之力，融通旧说，提供新解，对于约一百八十条《墨经》与《经说》的相互对应关系，给予了全面的考订与合理的调整，精意编成了一份《墨子经说表》。这是自汉以来前人没有做过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墨学研究获得重要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高先生自称："此表有四善：'经'文初本，复其旧观，其善一也。'说'系'经'下，若网在纲，其善二也。以读今本，脉络贯达，其善三也。今本窜文，灼然具见，其善四也。"③所言极是。杨向奎先生称《墨经校诠》"为研究《墨经》者必读书"④，并非过誉之辞。

其次，高先生对于《墨经》所作的文字校诠，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一方面，他对前人的学术成果，充分重视，积极利用；另一方面，他凭借深厚的训诂学功力，对于先辈的缺漏或失误之处，力求有所补充，有所是正。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高先生注意揭示墨家的政治观点与伦理观点，如论功、罪、赏、罚、仁、义、忠、孝的内容等，以及注意对少量自然科学命题的申释，如涉及几何学、力学、光学的内容等，往往言前人所未言，并为"校诠"注入了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对传统墨学多有超越。

复次，高先生着眼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强调墨家同其他各家论辩的针对性，力图从墨家反驳对方的论说中寻绎各家的具体主张，广泛涉及名家以及邹衍、告子、少连、庄子、老子、慎子

① 高亨：《试谈晚周名家的逻辑》，《高亨著作集林》第10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② 另有《大取》、《小取》两篇与《墨经》性质相近，六篇总称为"墨辩"。

③ 高亨：《墨经校诠》，《高亨著作集林》第7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④ 杨向奎：《谈墨经的研究》，张知寒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等诸多学者的思想理论，发掘出一批久已湮没不彰的学术史资料，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开拓。

## 三、《诗经》、《周易》的整理与研究

高亨先生在1980年写的一份《自传》中谈到自己的研究重点时说："最初致力于先秦诸子，以后则研究《周易》、《诗经》、《尚书》三部古经，以对《周易》所下功夫最多。"[①]其三部古经的主要研究成果，已经出版《诗》学类著作两种、《易》学类四种；发表的论文，计有《诗》学类11篇、《易》学类8篇。凡此表明，在高先生全部学术活动中，《诗经》、《周易》的整理与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

《诗》与《易》，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献，又是传统文化史上备受推重的经学元典。20世纪《诗》学与《易》学的发展，离不开对既有传统的合理继承，同时也面临社会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学术转型的巨大冲击。高先生治学的可贵，就在于很好地把张扬传统与顺应学术转型的实践结合了起来，在《诗经》、《周易》的整理与研究方面，贡献了一批有较高品位或者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著作。

（一）关于《诗》学研究方面。

《诗经选注》是新中国建国以后较早出现的一个三百篇的选注本。高先生1953年受聘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1955年开设"诗经研究"一课，翌年，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诗经选注》一书。该书选诗七十篇，坚持取其精华的标准，注释力求严谨、扼要，附以必要的考证，译文强调直译，都体现了高先生的学术个性与经意追求。书前有长篇《自序》与《引言》，概述对《诗》三百的基本认识，包括《诗经》的来历，《诗经》的风、雅、颂分类，《诗》三百篇的地域和时代等。《诗经选注》出版后，书中部分篇义的诠释，曾引起过一些论争，高先生约于1957年前后对此书作过修订，对译文也作了全面的加工。

1980年出版的《诗经今注》是一个《诗经》的全注本，也是时隔二十五年后高先生贡献的又一部《诗》注。与《选注》相比，《今注》扩大了诗篇注释的范围，体现了对三百篇的整体观照与全面训解，也进一步凸显了作者不迷信古人、不盲从旧说而力求出言有据、敢于创立新义的学术追求。赵沛霖先生在《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一书中有评论道："本书（按，指《诗经今注》——引者）是高氏一生研究《诗经》的总结，是以一家之学对《诗经》之学全面系统的研究，注释和分析深入浅出，要言不烦，于诗义和文字训释多有创获，在方法上通过字音求字义为其重要特色。"[②]李泉先生在《力创新义求真谛》一文中也认为：高亨先生能"道人之未道，使读者耳目一新，深受启迪"[③]。《诗经今注》是近三十多年来深受推重、流传甚广的《诗经》全注本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先生陆续发表过一组论文，显示了他的《诗》学成就的另一个方面。略选几篇如下：

1.《周代大武乐考释》。《大武》是创作于周初的一个古代的歌舞剧，散见于先秦典籍，而其歌辞则保存于《诗经·周颂》。已往学者，包括王国维，曾对《大武》歌辞的章名与章次等问题有所考证，有成绩也存在失误。高先生根据对重要文献的精细考察，发现了《周颂·大武》六章的次序零乱而多错误的基本事实，第一次厘定了《我将》、《武》、《赉》、《般》、《酌》、《桓》六章的位置排序，重新译释了歌辞，并对《大武》的作者与用途、舞容与音调等，作出了富有创见的考论。本文对三千多年前《周颂大武乐》所作的考释，为中国古代文化史、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2.《周颂考释》上、中、下。《周颂》三十一篇，大体是周初至昭王、穆王时期的诗歌。年代悠远，

① 《高亨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1页。

② 赵沛霖：《现代〈诗经〉学的学科建设》，《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总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65页。

③ 李泉：《力创新义求真谛》，《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文献散乱，不易研读。高先生说："历代学者之注释与考证诚有精确之处，然曲解谬说亦多有之，有待探索之问题未可一二数之也。"[①]他所作考释，包括各篇主题的论证，各篇乐歌的分合与篇次的调整，字句的训诂与篇义的解说，以及相关礼乐制度乃至观念、习俗的探究等。其中，有关"《大武》六章"的考订，关于《臣工》与《噫嘻》内容的寻绎，以及关于《闵予小子》等四篇实为一诗的证明等，多有自己的见解。

3.《〈诗经·邶风〉新解》(上)、《〈诗经·邶风〉新解》(下)。20世纪60年代初，高先生曾有编写大型《〈诗经〉新解》的打算(以后由于种种干扰而作罢)，连续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2、3两期的《〈诗经·邶风〉新解》(上)、《〈诗经·邺风〉新解》(下)，就是这一设想的初步成果。"新解"说诗，解题比较详细，考订比较充分，一些疑点难点的考释往往广列异说，为《邶风》的深入研读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

4.《诗经引论》(一)、(二)。《诗经引论》(一)写定于1958年，所论问题包括《诗经》的来历与王官采诗，《诗经》的篇数与孔子删《诗》，以及《诗经》的风、雅、颂分类等问题。《诗经引论》(二)发表于1956年，主要讨论的是《诗》三百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诗》三百篇的阶级性与思想性的问题。20世纪的《诗》学研究，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改变了"只知有经不知有诗"的陈旧观念。两篇《诗经引论》顺应时代的需求，立足于文学研究、坚持唯物史观，对三百篇几个基本问题给予了系统的探讨，于现代《诗》学的发展有推助之功。论文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综观全文，仍不失为是一篇简明切实、不乏新见的论《诗》之作。高先生厚积薄发，所论能探源得要，在上述两组论文中得到显明的体现。

(二)关于《易》学研究方面。

高亨先生是20世纪《易》学较早的研治者。自20世纪30年代，他执教于数所高校，就开始了《周易》的教学和研究。1941年7月12日，他在写给杨树达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近两年来专研《周易》，作《周易古经今注》六卷，都约十万言，大扫前儒象数之说。"[②]翌年2月25日，又在为屈万里先生《先秦汉魏易例述评》所撰《叙》语中说："余近数年来，潜心治《易》，不揣椠昧，撰为《周易古经今注》六卷。象数旧说，既皆排斥。义理陈谭，亦罕采撷。所致力者，仅在筮辞。"[③]可以看出，其一，高先生大约此前不久已经完成《周易古经今注》一书的写作。其二，在这部《今注》中，高先生既排斥"象数旧说"，也不采"义理陈谭"，走的是一条与前儒不同的解《易》之路。

然而为条件所限，直到1944年，高先生才正式出版了第一部《易》学专著《周易古经通说》。所论除包括《周易》名称的由来与意义、《周易》卦名的来历及传写脱误、《周易》筮辞的分类、《周易》筮法的考释等问题以外，还就《易经》中常见的十个基本用辞("元"、"亨"、"利"、"贞"、"吉"、"吝"、"厉"、"悔"、"咎"、"凶")作出通解。高先生确信，《易经》原本是古代的一部筮书，非一时写定，亦非出自一人之手，最终成书当在西周初年。此一论断，大别于经学家的说辞，成为贯串高先生论《易》的基本观点之一。

1945年《周易古经今注》正式问世。1946年上海开明书局出版排印本，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1984年中华书局把"通说"与"今注"合为一编，重加修订出版，仍定名《周易古经今注》。此书以《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辞以及每卦各爻的爻辞为训解对象，全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重视《周易》古经的历史文献价值。高先生在参酌古今大量既有《易》注的基础上，凭借文献学、训诂学的深厚功力，对《周易》古经所反映的社会事件与文化现象，作出了全面的整理与开掘，获得许多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第二，坚持解经不守《易传》。《易传》一称"周易大传"，即"十翼"，是出现于战国时

① 高亨：《周颂考释》(上)，《高亨著作集林》第10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② 杨树达：《积微居友朋书札》，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5页。

③ 高亨：《〈先秦汉魏易例述评〉叙》，《高亨著作集林》第10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期的一组《易经》的注解。历代经学家视经传分别为“先圣所制、后圣所续”，二者之间存在神秘意味与必然联系，因此主张以传解经、引经说传，不惜曲言附会，把《周易》研究引向误区。高先生主张离传解经，坚持立足经文本身以阐释经义，以经观经，实事求是，而不有意追求复杂化与神秘化。这就一反传统《易》学的陈规，抛弃了旧说中的许多牵缠纠葛，为揭示《易经》的本来面目创造了基本条件。

20世纪60年代前期，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有关《周易》学术评价问题的讨论，高亨先生踊跃参加了这场讨论，陆续发表了《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周易卦爻辞的哲学思想》、《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四篇论文。1962年，高先生将这四篇论文加以编纂，又收入未曾发表过的《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一篇，汇为一册，定名《周易杂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着力于文献的整理，到注重《周易》思想意义与文化价值的论析，体现了高先生认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制《易》学的自觉努力；而有关“周易卦象”、“周易大传”与“左国周易说”的经意探索，也反映出高先生的治《易》实践，正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易传》的方面。

1964年，高先生着手于《周易大传今注》的撰作，六年后完成初稿，197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是他晚年付出大量心血、奋力完成的一部长达四十万言的《易》学巨著。本书上继“古经今注”之后，专以《易传》七种十篇（包括《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为研究对象，以传观传，凸显了“讲《易传》不以《易经》为归宿”的学术追求。高先生一扫后人强加于《易传》的诸多曲解与迷雾，于本书卷首撰写了《〈周易大传〉概述》一文，对《易传》的名称、篇数与篇次，各篇解题，以及作者与时代，给予正面和全面的说明，原原本本、实实在在，综观博取而能浅明得要，为《易传》的深入探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点。

本书在《古经今注》的基础上，对于《易传》的象数说给予了独到的阐释。《易传》作者多用象数以释《易经》的卦名、卦义与卦辞、爻辞，来抒写对万象万物、社会人生的种种观感。但高先生认为，《易传》解经并非尽用象数说，不用象数说的地方也不少。因此，他主张研读《易传》须讲明其固有的象数说，而不可多走一步，增涂象数说的色彩。他于本书各卦之下，首列“经意”、次列“传解”，两相对照，综合而分析之，使读者对何者为象数说、何者无象数说一目了然。象数说的难治，往往在于其复杂、琐碎而缺乏贯通全书的义例。自汉以后，诸家附会《易传》，画蛇添足，滥加花样，巫术伎俩也就越加泛滥。有鉴于此，本书中专设《〈易传〉象数说释例》一篇，分别就卦象与卦位、爻象与爻数作综合分析说明。高先生以朴释玄，能于貌似无序的象数说中觅得其要领，掌握其义例，不仅大有助于古《易》文献的整理，而且对于破除《易》学研究中的巫术迷信观念，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高先生是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像他的其他多种著作一样，《周易大传今注》也带有浓重的朴学色彩。本书对传文的注解，追求言之有据而力避凿空之论。对字句的考订，往往为寻一字的确解不惜旁征博引，广作求证。本书于各卦注文之后还专设“附考”一项，借以更充分地展示立论的文献根据，也显示出这本“今注”特色之一。高先生对于《周易》经传疑难字句的许多独到的训释，往往能言人所未言，甚至能发千古之覆[①]，这已经愈来愈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了。

[责任编辑　渭　卿]

① 参见董治安：《高亨先生及其〈周易〉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1期。

# 文学史学大师冯沅君先生

袁世硕

**摘 要**:冯沅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人物。她和陆侃如先生喜结伉俪,学术相携,合著《中国诗史》是文坛的佳话,也是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既是我国学林仰重的女学者,桃李满天下的女教授,又是一位蜚声 20 世纪 20 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建国后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顶梁柱。纵观冯先生的一生,其在中国诗歌史的编写和戏剧史的编写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上具有开拓之举,冯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史学大师,她的贡献是不可低估和磨灭的。

**关键词**:冯沅君;文学;学术

冯沅君先生(1900－1974)是我国学林仰重的女学者,桃李满天下的女教授,也是一位蜚声 20 世纪 20 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建国后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顶梁柱。

## 一

冯沅君,原名冯淑兰,河南省唐河县人。1900 年 9 月 4 日诞生在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父亲冯台异先生,字树侯,曾任湖北省崇阳、武昌县知县。他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认为语文、算术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必须从小把基础打好,所以聘请教书先生,给三个孩子上语文、算术课。不久,树侯先生病逝,吴夫人挈带子女扶柩返回唐河。吴夫人思想开通,在独持家政的艰辛日子里,仍给儿子们请了先生教授四书五经,小淑兰便在哥哥们的课余时间跟着读读写写。不久,两位兄长先后离家赴京、沪进大中学堂,她只能在母亲的指点下读点诗书。

有一年的夏天,长兄冯友兰从北平回来度暑假,小妹缠着大哥教她读书。大哥便选了些文章供她抄读。淑兰求学心切,天赋又高,仅用了一个暑假,不单能读懂所选文章,且能摹拟作文。兄长们假期回唐河探亲,也常常给她谈点外头的新鲜事,留下些他们读过的书刊供她自学。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陶冶,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点诗文了,向往外地的大千世界,渴望像哥哥们那样去京都学校念书,接受新文化的洗礼。

正巧,原来的北平女子师范,1917 年改为高等师范学校,设有国文专修科,暑假后招生,冯沅君闻讯执意要报考。在兄长们的赞助下,她便随同去了北平。入学考试只考作文,她居然考中了。冯沅君的国学底子比较扎实,再加上名师指点,学业上进展神速。女高师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员队伍堪称人才荟萃,她的两届级主任——陈钟凡、胡小石先生都是国学基础丰实、且又忠于职守的教师楷模。中共早期活动家李大钊先生曾给她们开过"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伦理学"等课程;胡适之曾讲授过"中国哲学史"。名师出高徒,广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潜移默化,点点滴滴注入到学生的心田。她喜欢骈文、诗词,也爱钻研探讨学术问题,在当时女高师的刊物《文艺会刊》、《文艺观摩录》上常常见到冯淑兰的名字。其中有诗词创作,如《中秋对月》、《吊新战场文》、

**作者简介**:袁世硕,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终身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杨柳枝》等；也有专题学术论文，如《历代骈文散文的变迁》、《读〈汉书·艺文志〉随笔》、《释贝》等；还曾在《晨报附刊》上发表了她的《明陵八达岭游记》。她求知欲强，兴趣极广，对政治哲学也感兴趣，曾发表过《今后吾国女子之道德问题》的文章，也曾把胡适之的讲演《哲学方法论》记录下来，刊载在《文艺会刊》第三期上。

冯沅君在女高师的五年，适值五四运动前后，女高师也不是世外桃源。冯沅君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主自由的新思想，和两年前拖着长辫子、扎着红头绳的腼腆河南姑娘判若两人。此后，她更加关注社会，投身进步活动，她参加过北京大学组织的卢梭思想讨论会，也参加了女高师学生反对封建婚姻而改编的话剧《孔雀东南飞》的演出。

1922年夏，冯沅君以优异成绩从女高师毕业，旋即考上了北京大学国学门的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她一如既往，刻苦学习，悉心研究，在《国学门周刊》上发表了《祝英台之歌》、《老子韵例初探》等学术论文；还和大哥冯友兰共同校勘标点了《歧路灯》前二十六回。有意思的是在新文学新思想的冲击下，这位女研究生心中泛起了难以遏制的创作激情，从1923年秋开始，陆续写出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四个短篇，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这组异军突起的爱情主题小说刊出后，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淦女士成了当时文坛耀眼的新星。后来鲁迅先生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就选入了《旅行》、《慈母》两篇，并且在序言中作了肯定性的评语："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北平创办了《语丝》，该刊聘请了十六位长期撰稿人，淦女士便是其中之一。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冯沅君就发表了十多篇不同内容、不同文体的作品，其中有三个短篇——《劫灰》、《贞妇》、《缘法》。还发表了一组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小论文：《对于文学应有的理解》、《无病呻吟》、《不著名的文人的作品》、《愁》、《闲暇与文艺》，其中有的是对评论工作中的偏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的则是阐明自己的艺术观点。

1925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毕业，经陈钟凡先生介绍，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师生涯。次年，她又返回北平，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在北京大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这一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月刊上发表了冯沅君累累的研究成果：《楚词的祖祢与后裔》、《易韵例初探》、《南宋词人小记二则》、《读〈笔生花〉杂记》等，文章功底坚实，思路清晰，笔头流畅，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新秀。

## 二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相恋，大约是在1926年的秋冬开始的。陆侃如是江苏海门人，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当时，陆侃如正在清华当研究生，志趣相投，业务相近，彼此的才华和相互爱慕成了缔结婚姻的基石。他俩从"爱苗初长"到"定情"这段爱情生活的历程，约略地烙印在冯沅君1927年写成、陆侃如编定的由五十封信联成的书信体小说《春痕》中。

1928年，陈钟凡先生又把冯沅君介绍到陆侃如任教的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当时陆侃如是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主任，兼着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的课程。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行、同事，从此便开始了学术事业上的合作。当时陆正在撰写《中国诗史》，已写成了《导论》和《古代诗史》，正准备写《中古诗史》。那时冯沅君正在讲授词曲，陆先生遂将《近代诗史》的撰写任务托付给了她。一时的分工，却定下了两位先生终身治学的方向。1930年，他们分别写完了《中古诗史》和《近代诗史》。历时五年的《中国诗史》撰写工作终于在这对贤伉俪的合作下完成了。《中国诗史》是第一部中国诗歌史，也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中国文学的专史。

《中国诗史》评述了中国二千多年间诗歌发展的概貌，突出地展示了由《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到元明清散曲中国诗歌体裁的递变；对历代重要诗人进行了评论，并能扼要地点示出

他们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近代诗史》里论词之三篇，分期分类评述唐五代和两宋词人，突出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家，附以风格相似的数人，乃至十数人，论及的词人相当周全。对重要词人的评述，大都是联系其身世，分类解析其词作之内蕴、风格特征，细致、深切，超越了传统的感悟式的品评和以点评名句替代解析的方法，具有现代文学批评的性质，从而更加客观、公允，纠正了王国维、胡适评论中的偏颇，对五代的温庭筠，北宋的柳永、贺铸，南宋的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作出了具体、贴切的评论，后来之词史研究大体不出其基本格局。

这年秋天，冯沅君只身回到北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年仅三十的她竟以教材内容翔实，教学态度谨严，站稳了北大讲坛。此时，她和陆侃如再度合作，撰写《中国文学史简编》，速度极快，1932年便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

1932年，夫妇双双从上海乘邮船去法国留学。到巴黎后，两人都考入了巴黎第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在留学期间，除了攻读博士学位应修的课程外，他们还参加了法国著名作家巴比赛领导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这个“同盟”下设“中国留学生支部”，参加者，除了他俩外，还有戴望舒、李健吾等。

经过三年学习，冯、陆双双取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于1935年夏绕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沿途所见一派生机，他们惊叹之余，深感自己祖国的落后、贫困。

回国以后，陆侃如到燕京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应聘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两年，夫妇合作又完成了一件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一书，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于1936年10月2日出版，这是继赵景深、钱南扬之后又一本辑录宋元南戏佚曲的著作。他们依据当时新发现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共得出南戏新目72种，辑录了43种南戏的佚曲，大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对宋元南戏的认识。此后，冯沅君的研究兴趣由词和散曲转移到了古代戏剧方面，开始了对古剧的研究，接连写出了《古剧四考》、《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几种称谓》等学术论文。

在为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冯沅君、陆侃如流徙奔波，生活极不安定。1938年初，他们离开北平后，经过上海，取道香港、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在昆明，陆侃如应聘去中山大学任教，冯沅君也跟着去广州，不久广州失守，他们又随校迁到粤西罗定。次年初，冯沅君应武汉大学之聘，独自经昆明、成都，来到峨眉山下的嘉定县。不久，中山大学又迁往云南澂江，那时，日本飞机正在向大西南狂轰滥炸，嘉定也未能幸免，武汉大学难于在废墟上继续上课了，冯沅君便应聘留在了中山大学。1940年秋，中山大学又迁回粤西坪石。人届中年的这对夫妇随校在西南漂泊，1942年夏，两位先生再度入川，到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这才较为安定地住了几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段生活在她的《四余诗稿》、《四余词稿》，《四余续稿》（载《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有具体的描述。除了用诗文表达对国事的忧虑，在三台期间，他们夫妇俩也投入到了爱国的社会活动中。他们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组织在三台的文化人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赵纪彬、冯沅君担任正副主席，会址便设在她的家中。“川北分会”工作活跃，对川北的抗日宣传工作颇有补益。1943年“三八”节，冯沅君曾在三台妇女大会上作了题为《妇女与文学》的演讲，用中国历代爱国女诗人的事迹和文学创作，激发与会青年妇女的爱国热情。“分会”还出版了一期十六开本的《文学期刊》。但很可惜，仅此一期。第二期的要目虽已登了广告，但因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而流产了。

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在图书资料异常匮缺的情况下，她利用漂泊间隙和课余之暇，继续进行古代戏曲史的研究，陆续完成了两组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其一是后来收进《古剧说汇》中的若干篇文章。《古剧四考》（1936年写成）及《古剧四考跋》，包括《勾栏考》、《路歧考》、《才人考》、《做场考》，考证、探讨了宋元剧场、演员、剧作者及其团体，及戏曲演出等诸方面的实际情况，还对元代重要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钟嗣成等人的生卒年代，作了推定。《说赚词》及《说赚词跋》，《〈天宝遗事〉辑本题记》及《〈天宝遗事〉辑本题记跋》，《金院本补说》及《金院本补说跋》，考证、探讨了对元杂剧的形成有直接关系的赚词、诸宫调、金院本的曲词、体制演变，以及作品、演唱等方面的情况。《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则就近世发现的《脉

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考证了元剧上演的各种脚色的"穿关"、"题目正名"的功用，以及元剧联套程式，其他还有《南戏拾遗补》、《〈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都有新的探索和发现。《古剧说汇》对所考证、探讨的现象和问题，大体上理出了眉目，作出了贴近事实的诠释和说明，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补充，对研究宋、金、元、明戏曲和中国戏曲发展史，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二是论古优的三篇文章：《古优解》、《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从广义的角度看，这有点超出文学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是一种古代的社会现象，揭示了"优"这类人物的地位、职能、特点。冯沅君正是从探索戏剧起源的意义上，对"古优"发生了兴趣，认真地作了一番考察。这反映了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变化。她不仅详细地占有材料，且能联系社会历史现象来研究分析文艺现象，结合社会阶级状况来考察阐明文学问题，这就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了。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不仅限于文字的注疏和材料的排比，而是采用了与西方古代同类现象相联系、相比照的方法，从而得出中国"古优"是一种供君王贵人们娱乐、消遣的特殊奴隶的结论，对探索戏剧起源，弄清宋元戏曲的形成、演出和创作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极有价值。这两组文章是冯沅君独自的研究成果。

## 三

抗战胜利后，冯沅君、陆侃如夫妇随东北大学复校到沈阳。由于他们夫妇一贯倾向进步，受到排挤，1947 年秋离开了东北大学，来到了设在海滨城市青岛的山东大学。当时山大文史系力量雄厚，杨向奎任主任，教授有丁山、王统照、赵纪彬，加上冯、陆两位，不久王仲荦先生也来到了山大，济济一堂，十分兴旺。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总崩溃前夕，山东大学的学运和全国学运配合，也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两位先生旗帜鲜明，援救被捕学生。解放前夕，部分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转移去胶东解放区或投奔晋察冀解放区，他们也都解囊相助。1948 年，在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两位先生和山大的进步师生们收听解放区的广播，阅读进步书籍，期待着新生活的到来。

这一年多，冯沅君精神昂扬，文思活跃。她继续研究古代戏剧，发表了一组内容多样的考论文章：《元杂剧中的〈东墙记〉》、《从李煜词论"个"字》、《记侯正卿》、《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等，其中有考证，也有分析语言艺术的，考证和论述结合紧密，都有新见。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批法国文学的译文、译诗。冯沅君离开法国已十多年了，为什么对法国文学又突然有了兴趣？读了她译出的《人民颂》后面的附言，透露出她译诗的心迹："法国以革命后的崭新姿态出现于十九世纪，所以这首歌曲的风度也极明快、矫健、坚定，虽与《马赛曲》不全同（时间也略晚些），实可说是一家眷属。读这类作品，我们会看到一个前途光明的新兴人群，且不免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之感。"此时此地，冯沅君的心已经倾向为建立新中国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建立后，冯先生以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业绩，受到尊重，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文联副主席。她仍然一丝不苟地教书，踏踏实实地搞科研。她年年给本科生上大班课，讲授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为了扩展本科生的知识面，她又陆续开出了《历代散文选》、《陆游研究》、《中国戏曲研究》等专题课，用她自己的科研成果来丰富学生的知识。

她仍然潜心学术研究，陆续写出了《元曲家杂考三则》，《季布骂阵词文补校》，《谈刘姥姥》、《王实甫生平探讨》等学术论文。冯沅君还曾受教育部委托，同游国恩、王起教授等共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教学提纲》，给全国文科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供了依据。几乎在同时，她和陆侃如共同修订的《中国诗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 1955 年开始，他们对 30 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进行了逐章逐节的审阅修改，作了大幅度的剪裁、增补、改写。修改稿曾以《中国文学史稿》的题目在《文史哲》上连载了十八期，后又整理成《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稿，1957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尝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系统阐述中国文学发展的面貌，结合历史背景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著作，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当时，两位先生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此书曾由国家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向国外发行。这对教授

夫妇，躬逢治世，生活安定，学术成果累累。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也扩大到了陆侃如，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撤职降级，冯沅君在政治上自然也受到了牵连。接着又是整风补课、拔白旗运动，冯沅君在不解、苦闷、徬徨中，努力让自己的主观世界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写出了《〈中国诗史〉的初步批判》、《我在学术思想上的严重错误》等检查性文章，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此后在并不顺畅的境遇中，冯沅君还是排除干扰，继续她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陆游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怎样看待〈一捧雪〉》、《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吴伟业〈圆圆曲〉与〈楚两生行〉的作期》等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这些论文与以前的文章相比有较明显的变化：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整理文学遗产，评论古代作家作品；也本着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有分析地给予作品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肯定其中积极健康的内容，指出并摒弃其消极、落后的东西，褒贬分明，实事求是。这个阶段，冯沅君又接受了教育部下达的一个重点项目，和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负责上册（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沅君负责下编（宋元明清诗歌，"文革"后才正式出版）。《中国历代诗歌选》按历史顺序选注了各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选目全面恰当，注释简要精确，出版后深受各界读者的欢迎，曾一版、再版、三版，至今仍是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辅助教材。这部诗歌选凝聚了冯沅君教授数年的心血，是她给人民奉献上的最后一份厚礼，遗憾的是，她未能亲眼见到这部书的出版。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冯先生被教育部评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工作重点转到了培养研究生和辅导青年教师。她重言传身教，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既传授知识，又教治学方法；既教书，又育人。她按时批改学生作业，从观点、材料，乃至逻辑语言上的毛病，都一一认真校阅，改动处，必附有小条说明原因，指明材料出处，一板一眼，从不含糊。她曾语重心长地嘱咐学生，做学问"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所谓"功夫要死"就是要肯下功夫，博览穷搜，精严审慎，不能有半点马虎"，对知识的掌握要做到博、深、透、熟。所谓"心眼要活"，就是要肯动脑筋，善于思考，有所创见，不能因袭成说，对知识的运用要做到活、新，真、准。冯沅君导师对后辈的培养可谓竭尽心血，对此，她的研究生们至今尚众口皆碑。有人说冯先生是"抱着孩子走路"，她也颇有风趣地回敬："该抱着走的时候就该抱着走么，难道放鸭子似的就好吗？"为此，《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她《指导研究生体会》的长篇文章。

在"文革"中，冯沅君是山东大学第一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这种境遇，对于一个秉性好强、年近古稀的老学者，实在是难以承受得了的，然而，她却默默地忍受着，挺过来了。是因为未做亏心事，不怕受审查，还是要勇于经风雨见世面，经受群众运动的考验，抑或是认命了，她的心态，我们无法知道。但从她的思想汇报中可以看到，她坚信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的。

1973年春天，冯先生腹部时有不适，去了几次曲阜县医院也未见好转。后来县医院的大夫看出了病情不轻，让她转院诊治，但冯沅君不忍丢下手头的工作，就这样，拖到了暑假。陆侃如陪同冯沅君到了济南山东省省立医院，检查结果：直肠癌。1973年的秋天，知识分子的境遇稍有好转，省委对这位全国人民代表、知名女学者的疾病十分重视，让省立医院组织了手术护理小组，几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大夫都上了手术台。但可惜晚了，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病情一度似有缓解，能在搀扶下慢慢走动了，但神志恍惚，往事和现实交叉。一个下午，冯先生穿戴停当，让护士扶着去医房隔壁的护士办公室，说要给研究生上课。坐下后，便哇拉哇拉拉起长腔讲开了课。这位老教授潜意识的流动正反映出她内心的渴求——渴望重新走上讲坛。转年春，冯沅君病情加重，6月17日，与世长辞了。

冯沅君先生对山东大学贡献良多，厥功至伟。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教学与研究上，倾注了全部精力，率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为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在全国高校第一流的局面，为全国高校提供了富有典范性的教材，发起参与了全国重大的学术活动。她为山东大学赢得了声誉，也为文史学人树立了治学严谨、学风淳良、富于创新精神的典范。

[责任编辑 刘 培]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黄孝纾先生的诗文创作和治学特点

刘 怀 荣

**摘 要**:黄孝纾先生在诗、词、书、画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骈文尤为时人称道。由于生活阅历相对简单,其诗文多模山范水、寄赠酬唱和感时伤世之作,但在艺术方面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学术研究,也因其作家的身份和视角而别具特色。然而像那个时代许多旧式文人一样,黄孝纾在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为历史潮流所湮没,加之"文革"中又受到冲击,因而其作品和论著流传不广,知者甚少。在国学复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历史,关注这位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从教 20 年的诗人教授。

**关键词**:黄孝纾;骈文;匊厂文稿;劳山集;碧虑商歌

黄孝纾(1900－1964),字公渚,号匊庵、匊厂,别号霜腴、辅唐山民等,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曾于 1934 至 1936 年及 1946 至 1964 年,两度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古典诗文。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卓然名家,尤擅骈文[①],也长于丹青,有声画界。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和不幸的个人遭遇,黄先生学术研究方面的著述,或有计划却未能完成,或已完成或部分完成,却在"文革"中被毁于一炬。但是就他现存的相关论著来看,其学术特点仍可窥见一斑[②]。本文拟就黄先生现存著作,简述他在创作与治学两方面的特点,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教正。

## 一、黄孝纾诗文集的创作内容

黄孝纾存世的作品,主要见于《匊厂文稿》、《碧虑商歌》、《劳山集》[③]、《霜腴诗稿》及他与两位弟弟的合集《左海黄氏三先生俪体文》等。其中,后两书多方访求,至今未见。故本文所述主要以前三种为主。这三部诗文集,共收录黄孝纾文、赋、诗、词 417 篇(首),这些作品虽然文体不同,其内容却颇多共性,模山范水、寄赠酬唱和感时伤世是其最为集中的几个方面,兹简述如下:

其一,模山范水。黄孝纾的一生,经历较简单,游赏的地域范围并不是很广。他早期的山水之作作于随父寓居青州时期[④],主要有收录于《匊厂文稿》卷五的《青州侨寓记》、《益都胭脂井记》、《清明日

---

**作者简介**:刘怀荣,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青岛 266071)。

① 钱基博曰:"冯煦论近世能为汉魏六朝文者,于李祥、孙德谦外,尤称闽县黄孝纾警炼俶诡,后出居上。"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傅道彬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9 页。笔者按:该书由世界书局(上海)初版于 1932 年,初版时书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其中以刘师培、李祥、孙德谦为民国骈文三大家。后改为今名,1936 年由上海书局出版的增订四版,骈文部分补入黄孝纾,且以为黄孝纾骈文在李祥、孙德谦之上,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傅道彬点校,第 124 页。

② 黄孝纾著述请参见拙文《黄孝纾先生生平、创作与学术成就述略》,《文史哲》2008 年第 4 期。此外,尚有抄本《霜腴诗稿》、《左海黄氏三先生俪体文》,另有《延嬉室书画经眼录》一卷,收入黄虹宾、邓实编辑:《美术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

③ 原书"崂山"均作"劳山",故本文引用黄孝纾原文用"劳山",其余部分依现在习惯作"崂山"。

④ 黄家在 1912 年迁居青岛,1914 年 9 月,青岛发生了日德之乱,黄孝纾一家为避乱于 1915 年迁到青州,在那里大约住了十年。作者在《青州侨寓记》中说:"卫街之居,岁在乙卯(1915),为吾家自胶澳迁青之始。"又《清明日游范公祠记》作于"壬戌年二月",即 1922 年,同游者多兄弟子侄;《怡园游记》作于甲子春日,即 1924 年。可知至晚在 1924 年春季,黄家仍住在青州。又据《青州侨寓记》刘廷琛评语曰:"叙述甲寅(1914)避乱情景,历历如绘十年影事。"则在青州寓居确有十年之久。

游范公祠记》、《怡园游记》、《重游青州四松园记》等五篇骈文，除第一篇可能为后来追记，其余四篇均为寓居青州时的游记，是作者24岁移居上海前的少作。

中期的山水之作多作于校书嘉业堂、鬻画沪上时期，包括部分骈文体杂记，如《匊厂文稿》卷五的《坚匏别墅记》，及《碧虑商歌》中的一部分词作，如《醉吟商小品·浔溪道中和白石韵》、《踏莎行·夜宿西泠坚匏别墅》、《一丛花》(白鹇兜外鹧鸪溪)[①]等。还有少部分作品，写于从上海回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的初期，如《乌夜啼》(飞仙谩与遨游)、《八声甘州》(破鸿濛)等[②]。

后期作品除少部分外，主要作于任教山大期间，分诗、词、游记三种体裁，全部收录于《劳山集》。其中标明写作时间的，最早的是列于卷首的《青房并蒂莲·甲子夏日偕依隐、罢弟登劳山绝顶巨峰》，作于1924年。写作时间最晚的为《兰陵王》(乱蝉寂，雨过凉飔习习)，小序曰："华严寺建自明季，藏经楼风景最胜，丁酉夏日与丛碧同游。"丁酉为1957年，这是本年作者与张伯驹同游崂山华严寺时所作。故《劳山集》实为黄孝纾1924至1957年三十三年间多次游览崂山的纪游集。从创作内容来看，作者三十余年中足迹所至，踏遍了崂山的山山水水，许多著名景点都是多次光顾。如仅就作品中所见，太清宫就有七次游历的记录；明霞洞、华严寺、华楼宫、白云洞、上清宫等佛道宫观，北九水、外九水、内九水、鱼鳞峡、龙潭瀑、南九水、崂顶等自然景观，也都曾多次游览。另外，如太平宫、神清宫、大劳观、蔚竹庵等景点，甚至像杏花庵、佛耳崖、沙子口、环翠谷、雕龙嘴、王子涧等很多不太知名的景点，都成为作者笔下歌咏的对象。其中不少景点，在以往文人的笔下从未提及。可以说，黄孝纾不仅饱览了崂山美景，对所游历的山水也几乎做到了歌咏殆遍，无所遗漏。像这样以一人之力遍咏一山之美，不仅在历代文人歌咏崂山的众多作品中空前绝后，在中国山水文学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上述山水之作，在《匊厂文稿》中约占十分之一，在《碧虑商歌》中约占四分之一，《劳山集》则为山水文学专集。因此，模山范水之作在黄孝纾全部作品中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也奠定了他作为山水文学家的地位。

二是寄赠酬唱。黄孝纾虽经历简单，但交游却颇为广泛，集中所录颇多寄赠酬唱之作。《碧虑商歌》61首中，这类词作近30首，约占50%。所与唱和者，大多是当时名流。《匊厂文稿》68篇中，卷二、卷三所收序跋22篇，卷五除《重修法庆寺碑》一篇外，其余传、墓志铭、诔文10篇，及卷六的3篇书，皆可从另一侧面见出其交游。也占到文稿的50%[③]，总体上仅次于模山范水之作。

黄孝纾与作品中寄赠酬唱的文人，大多订交于1924年到1934年间往来南浔、上海时期。这些人多精通诗、文、书、画，以围绕在陈三立(1853－1937)、朱祖谋(1857－1931)、况周颐(1859－1926)等大师周围的故知或后学为主。

其中老一辈的名士，如陈夔龙(1857－1948)，又名陈夔鳞，字筱石，号庸庵、庸叟、花近楼主，室名花近楼，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同治以来，先后任顺天府尹、河南布政使、江苏巡抚、四川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匊厂文稿》卷二有《陈庸庵尚书花近楼诗续篇序》，可见二人之交情。又如陈曾寿(1878－1949)，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人，字仁先，号焦庵，因家藏元代吴镇所画《苍虬图》，因以名阁，自称苍虬居士。他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状元陈沆的曾孙，官至都察院广东监察御史。工书画，其诗与陈三立、陈衍齐名，时称"海内三陈"。陈曾寿对黄孝纾极为赏识[④]，曾为黄孝纾《碧虑商歌》题签。黄孝纾《千秋岁引》(雁水初程)、《风入松》(枯桑覆瓦易黄昏)等词作，也述及二人深厚的交情[⑤]。

他如余尧衢(字倦知，生卒年不详，为陈三立同年，二人唱和颇多)、孙德谦(1869－1935)，黄孝纾

① 据《一丛花》小序，该词作于"乙亥(1935)冬"，当为作者任教于山东大学后，回嘉业堂小住时所作。

② 据《乌夜啼》小序，词为丙子秋游泰山所作，丙子为1936年，后一首当作于同时。

③ 《劳山集》中有一部分山水诗词其实也属于酬唱之作。

④ 《匊厂文稿·蒋国榜序》曰："苍虬先生早岁语，闽侯黄君匊厂，英年高文，友不可失。"

⑤ 《千秋岁引》小序曰："秋晚信宿焦山归来阁，忆丁卯年(1927)与焦厂曾此小住，相隔又五年矣，感念前尘，不能无词。"《风入松》小序也说："苍虬书来，慨然增久别之感，书此代柬。"

集中有专门为他们写的诔文。王乃徵(字聘三,又字病山,1861－1933)、周庆云(号梦坡,1864－1933)、高振霄(字云麓,1878－1956)、徐珂(1869－1928)等名家,黄孝纾词作或骈文中,多有为他们写的寄赠、序文或悼念之作。

与黄孝纾交往最为密切的,当推夏敬观(字鉴臣、剑臣、剑丞等,晚号映盦,又作"映庵"、"映厂",1875－1953)、叶恭绰(字裕甫,又字玉甫、玉父、玉虎、誉虎,号遐庵,1881－1968)、冒广生(字鹤亭,号疚斋,1873－1959)、梁鸿志(字仲毅,后改字众异,1882－1946)、刘福姚(生卒年不详,原名福尧,字伯棠,一字伯崇,号忍庵)、龙沐勋(字榆生,1902－1966)、卢前(字冀野,1905－1951)、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1898－1982)诸人。仅以《碧虑商歌》而论,集中寄赠以上诸家的词作就有很多,如《石州慢》(霜鬓飘髯),小序曰:"映厂丐湖帆作《填词图》,索赋,十年海上,觞咏过从,抚时怀旧,声为此词。映厂览之,其亦怃然同喟乎?"《浣溪沙慢》(槛角旧树石),小序曰:"甲戌春日招同众异、映厂、榆生、冀野真茹张氏园看花,劫后重来,非复当年裙屐之盛矣。映厂约填此解,并邀诸子同作。"《法曲献仙音》(谋野吟情),小序曰:"春晴连日与鹤亭、剑丞、遐厂、子有赵园讨春,并索诸公同作。"《八六子·寄榆生广州》,《蕙兰芳引》(湖海倦游),小序曰:"归自青岛,忽忽深秋,忧生念乱,怅触余怀,和歌谨叔,并柬榆生广州。"《望月波罗门引》(抱山心事),小序曰:"忍庵逭暑青岛,有结邻之约,词以坚之。"

上述文人有不少对黄孝纾诗文作品作过点评,点评文字一般以小字双行的格式,著录于每篇作品的末尾,有少数则列于题下开头位置①。其中,龙榆生为朱祖谋弟子,卢前为吴梅弟子。二人与黄孝纾年龄最为相近,在这个群体中都属于晚辈。张伯驹则精于诗词、书画、京剧、鉴赏,黄孝纾与他的交往稍晚,他们的诗词酬唱更多地见于《劳山集》。

黄孝纾的寄赠酬唱之作中,还有一部分是写给前清遗老和民国政要的。如《匊厂文稿》卷六的三封书信:《与冯梦华中丞书》、《寄刘潜楼侍郎书》、《致孙慕韩丈书》,其主人公,在晚清或民国都曾身居要职。冯梦华,即冯煦(1842－1927),字梦华,号蒿庵。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刘廷琛(1867－1932),字幼云,晚号潜楼老人。曾任陕西提学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北京大学校长)、学部副大臣。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曾任驻法公使、驻德公使、山东巡抚等。辛亥革命后,历任徐世昌内阁外交总长,曹锟内阁总理。又《暗香》(海程云邈)小序曰:"江南小别,荏苒春深,辽海倦游,寄怀翰怡诸公,并留别夜起翁。""夜起翁"即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号海藏、苏庵,又号夜起庵主。福建闽侯县(今福州)人,与黄孝纾为同乡。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

大约由于黄孝纾所交游的前辈文人有不少是晚清遗老,而他既以擅长古典诗词、骈文与书画,得到这些前辈的赏识,在文化价值观念和情趣方面,也与他们更为接近②。

三是感时伤世。由于受家庭及周围朋辈的影响,又身处乱世,黄孝纾作品,尤其是前期作品中,有非常深重的感时伤世之忧。其中既有对世事无常的哀悼叹惋,也不乏对自我身世的伤感。如《金缕曲·花近楼席上闻红豆馆主〈弹词〉》(凤首黄金拨)就很典型。红豆馆主(1871－1952),即清代宗室爱新觉罗溥侗,字后斋(一作"厚斋"),号西园。溥侗从小酷爱昆曲与京剧,多方求教,刻苦钻研,在戏曲表演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弹词》为《长生殿》第三十八出,是他拿手的曲目之一。1934 年,溥侗曾在上海庚春曲社演唱过《长生殿·弹词》。黄孝纾这首词中所写,地点在陈夔龙的花近楼,属于小范围的表演。词中未标明时间,估计也当在 1934 年间。当时清亡已有二十余年,作为皇室宗亲的溥侗已年过五十,在经历了世事变幻之后,再来饰演剧中的李龟年,自然比一般艺人感慨尤深。黄

① 本文所引诸家对黄孝纾作品的点评,全部出自黄孝纾诗文集相关篇章的末尾和开头,为行文简洁,不再另标注出处。

② 《匊厂文稿》卷四的《乙丑二月花朝日集周氏学圃记》文末列出了包括黄孝纾在内,参与集会的吴昌硕、徐乃昌、孙德谦、张尔田等 22 人,《丁卯九日集华安高楼记》文末也列出了包括黄孝纾在内,参与集会的陈三立、朱祖谋、陈曾寿等 47 人,及"期而未至者"徐乃昌、张元济、冒广生、李宣龚、诸宗元等 17 人。从两文亦可窥见黄孝纾交游的圈子和他在其中的地位。

孝纾词中有"歌断处,泪盈睫",又有"故国一身无长物,抚腰间,宝剑珊瑚玦。今古恨,那堪说",可见溥侗的表演感人至深,其中也有作者对时事的感慨。

像这样感时伤世的情怀,在黄氏其他作品中也多有流露。如《小重山·壬申岁朝》云:"劫外有涯生,当筵拼一醉,更愁醒。"《浣溪沙慢》(槛角旧树石)云:"问讯水滨,年事笋争长。一醉欢无量,怎奈万般愁,酒醒时,依然怅惘。"《声声慢》(沧江投老)上片云:"沧江投老,故国平居,斜阳心事年年。烟画寒林冷吟,且乃荒寒。空山倘容孤往,怕西风吹老啼鹃。身世证,闲云天际,去住随缘。"《忆秦娥·后湖》下片曰:"画船归去烟如织,残荷败苇无人惜。无人惜,一片江山,旧时月色。"《风入松》:"虚堂睡起日三竿,小极得偷闲。了知除酒无忙事,春风驻、镜里朱颜。四壁萧然,长物半生,渺尔中年。　　向人不乞卖碑钱,一角马家山。废吟谁识无声苦,伤心处、点笔都难。海峤几回,梦断天涯,且住心安。"皆忧生念乱,感时伤世,寄寓着明显的身世之痛与对乱世的悲悯伤悼。

## 二、黄孝纾诗文的几个特点——以骈文与山水词为中心

黄孝纾的诗文,在当时即深受诸家好评,其骈文更是得到一批名家的高度赞扬。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仅以《匊厂文稿》和《劳山集》为主,对其骈文骈散双绝、潜气内转,及山水词强化词的表现功能、突破词与文的疆界等几个特点,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黄孝纾骈文的特点

有清一代,汉学、宋学之争颇为激烈。汉学的兴盛客观上促进了骈文的发展,遂有所谓骈文中兴,而骈散之争在清代也几乎贯穿始终。虽然汉学大师阮元以骈文为正宗的观点,有不少的响应者,但如果抛开当时的门户之见,清人关于骈文的思考和探索,对我们认识骈文独特魅力最有意义的,当是骈散合一的主张与骈文"潜气内转"特点的发现。黄孝纾骈文在这两方面均有其特色。

骈散双绝,富于诗意,是黄孝纾骈文的特点之一。骈散合一其实是清代很多学者的共识[①],黄孝纾的骈文没有明确的师承,大抵得之于家学和自悟者为多,然从理论到创作,都体现了骈散合一的特点。其《与冯梦华中丞书》有云:

> 尝以六朝人士,祖尚玄学。吐属清拔,高在神镜。譬夫车子转喉,有声外不言之悟;湘灵鼓瑟,得曲终无人之妙。以才雄者,类物赋形;以情胜者,言哀已叹。潘陆联镳于典午,江鲍骖靳于萧齐。道元经注,山水方滋;蔚宗史才,论赞独绝。曹思王之诔碑,吴季重之笺奏。庾信多萧瑟之思,刘峻得隽上之致。各颛一体,并有千秋。求之昭代,容甫北江,雅称复古。平生证向,略罄斯言。

这是黄孝纾自论文章师法不可多得的一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其骈文并未如晚清、民国其他各家一样,受桐城、扬州二派之牢笼,而是由六朝江淹、鲍照、郦道元、范晔、庾信等,上溯魏晋曹植、吴质、潘岳、陆机,同时出入清代汪中(容甫)、洪亮吉(北江)诸名家。取径宽广,不拘一格。这种兼取骈散之长的骈文观,表现在创作中,即是骈散双绝。如《两先生传》曰:

> 茂才遭际坎壈,穷老无欢。陈侯蔡出,槐绵牒于宗华;魏舒宁甥,作外家之宅相。蓼莪废于幼学,菟童凄其寄生。曾王母于内外诸孙中,最爱先生。年若干,与家君同就外傅。佐公孤露,抗手而厕阳元;安仁读书,改颜而亲千里。两人情好,觉友于不能过也。

这段话,既用到了陈侯、魏舒的典故,也不乏口语式的叙述。骈句与散句间杂,转换自然,颇具灵动之美。冯煦评曰:"委婉深至,辞事相称。较诸桦湖一文,允称骈散双绝。"[②]桦湖,此指吴敏树(1805－1873),字本深,巴陵铜桦湖(今湖北省岳阳县友爱乡)人,是清代桦湖文派的创始人。他曾写过《业师

① 如骈文家孙梅(?－1790)、李兆洛(1769－1841)、谭献(1832—1901)、孙德谦(1869－1935),古文家刘开(1784－1824)、曾国藩(1811－1872)等均主张骈散合一。

② 《匊厂文稿》卷五《两先生传》,第206页。

两先生传》，故冯煦将黄孝纾的《两先生传》与之相比，而特重其“骈散双绝”的特点。又如《青州侨寓记》有云：

> 北则问影轩、延嬉室，余兄弟读书所也。庭有桃树一，更益以槐、桧、梧桐之属。画地为畦，种花其间。程力不辍，岁事益勤。自是宅东隙地，以次稍辟。紫茄白苋，瓟蠡豆荻，随时铺菜，自足生意。每当春夏之交，风和景明，把卷行吟，巡檐索笑。姜花嘒雨，黄出墙坳；庭莎凝烟，翠泼衣袂。幽蝉一噪，众阴始满。万卷横几，一榻当窗。清风徐来，梦境亦古。其或商声在树，朔吹入帷。酒波滟于黄花，诗境清于冰雪。朝晖夕朓，雨榻风廉。景物所需，取供悉办。

所叙为日常琐事，然娓娓道来，写景如在目前，言情沁人心脾。在写法上也完全突破了骈散的疆界，自由挥洒，充满了诗情画意。对此文，诸家多有高评。刘潜楼称：“情至之文，故不觉其为散为骈也。”陈郁庐说：“取径《卷葹阁》以上，窥《水经注》复古之机，其在兹乎？”洪亮吉书斋名“卷葹阁”，《卷施阁诗文集》是其诗文集之一。洪氏是与汪中齐名的清代骈文大家，而郦道元《水经注》，则是以散句见长。故陈郁庐的评语也是说此文能融合洪亮吉、郦道元之所长，在骈散双绝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与刘潜楼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潜气内转，低回无尽，是黄孝纾骈文的又一特点。在骈散之争中，探讨骈文有别于古文的艺术特点，逐渐成为骈文理论家关注的问题。自谭献(1830－1901)、朱一新(1846－1894)拈出“潜气内转”的批评术语，晚清以来的骈文批评家多把“潜气内转”看作是骈文特有的艺术表现形态，并用这一术语来品评具体的骈文作品。而是否具备这一特点，也成为衡量骈文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已有学者指出：

> 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潜气内转”一语的批评价值，它是清代骈文批评经历了二百年之久而结出的一个硕果。……一般来说，骈文重视藻饰的表层特征是较容易被发现的，而“潜气内转”则是深层特征，它在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经过长期的发展后才获得明确的论述。①

这一二百年结出的“硕果”，到了民国年间，受到了李祥、孙德谦、刘师培等人的普遍重视。孙德谦更是这一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六朝丽指》中说他三十岁时喜读李兆洛《骈体文钞》，后逐渐发现了六朝文之“隽妙”，但“心能喻之而口不能道”。及读到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以“上抗下坠，潜气内转”②论六朝骈文，始悟“六朝真诀”，他说：

> 盖余初读六朝文，往往见其上下文气似不相接，而又若作转，不解其故。得此说，乃恍然也。……读六朝文者，此种行文秘诀安可略诸？③

又说：

> 文章承转，上下必有虚字。六朝则不然，往往不加虚字，而其文气已转入后者。……故读六朝人文，须识得潜气内转妙诀，乃能承转处迎刃而解，否则上下语气，将不知其若何衔接矣。④

孙德谦对朱一新提出的“潜气内转”作了更为明确的解说，他把骈文上下文之间不用虚词而文气暗转的行文方式，称为“潜气内转”，不仅将之看作是骈文创作的妙诀，也以此来进行骈文批评。而他极为欣赏的黄孝纾的骈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妙诀”，如《重刊苍梧词序》云：

> 然而舜民生值昌时，名传狂社。江山文藻，世睹华勋；门第衣冠，人为养炬。探梅邓尉，招香海之胜流；击节漳台，盛高尘之嘉会。标榜缘达，同閈有白云逸人；嘤鸣所求，投分则金风亭长。赢缩有数，荣悴何嗟！沉泉可作，舒蹇产于回风；异代相知，企灵芬而如昨。

---

① 奚彤云：《清嘉庆至光绪时期沟通骈散的骈文理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此外，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中的风格论》(《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陈鹏《论六朝骈文的行文之气》(《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也对“潜气内转”的相关理论问题有所探讨，读者可以参考。

② 笔者按：朱一新原文“潜气内转”一句在“上抗下坠”之前，孙氏当为误记。

③ 孙德谦：《六朝丽指》，四益宧1923年刻本，第8－9页。

④ 孙德谦：《六朝丽指》，四益宧1923年刻本，第35－36页。

又如《丁卯九日集华安高楼记》云：

江关秋老，何处寻家？生死海中，当离言合。骁駼[①]尊俎，祓瓜硎之劫尘；谈笑沙虫，拟槐柯之酣梦。东南竹箭，并萃一时；西北高楼，嗣有千古。抚膺滋幸，触绪斯哀。江湖多矰缴之惊，城郭有人民之异。囊萸作佩，灾岂能消；把酒看天，杵真可倚？

皆能完全省却虚词接续，于读者不觉中"陈仓暗渡"，深合骈文"妙诀"。故孙德谦评前一首曰："潜气内转，丽辞绮合，用笔极抗坠控纵之妙。"秦子质论后一首亦称："辐思郁抱，低回无尽。后幅尤极潜气内转之致。"从艺术表达及艺术效果而言，"潜气内转"其实又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用虚词的问题。它还应指作者有意对情感的表达进行了"欲露还藏"式的处理，因而虽然才气纵横，情感深挚慷慨，但却有意不让情感的表达一泻无余，故能够达到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如章一山评《哀时命赋》曰："低回家国盛衰之故，惊心动魄，不忍卒读，可与玉樊堂《大哀赋》比美。"孙益庵评《汉短箫铙歌注序》曰："气往轹古，辞来切今，后幅尤低回无尽。"王病山评《陈庸庵尚书花近楼诗续篇序》曰："通体谨严遒练，末幅尤有远神。"刘潜楼评《僵村校词图序》曰："纳慨叹于蕴藉，余味盎然。"其中所谓"低回"、"低回无尽"、"有远神"、"余味盎然"，都是就骈文有余不尽的艺术效果而言，看似与"潜气内转"没有关系，实际上却是互为表里的。

当然，上述两点还不足以说明黄孝纾骈文的全部特点。应该说，作为一位骈文大家，优秀骈文的基本特点，黄孝纾骈文也是具备的。钱基博先生曾综合诸家之论，对黄孝纾骈文有一短评曰："大抵融情于景，而抒以警炼之辞，效鲍照以参郦道元；夹议于叙，而发以纵横之气，由庾信以窥范蔚宗。辞来切今，气往轹古，以视李祥之好雕藻而乏韵致，孙德谦又尚气韵而或缓懦，其于孝纾，当有后贤之畏焉。"其概括性更强，既可为本文未尝论及者之补充，也可见黄孝纾骈文确能融诸家之长，合孙、李之胜，而有所超越，故说他是文学史上最后一位骈文大家，似不为过。

（二）黄孝纾山水词的特点

中国山水文学历史悠久，佳作林立，但词本艳科，山水词的创作与山水诗、山水文向来难以等量齐观。黄孝纾山水诗词，几乎全是对崂山山水的歌咏。这在文学史上原本就是很奇特的现象。就山水词而言，黄孝纾山水词最为突出的是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以山水入词，强化了词的表现功能。从中国词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很少有人对一座名山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写下如此集中的词作。因此，黄孝纾对崂山美景所作的细致、全面的描摹，具有明显的突破意义。正如龙元亮《劳山集》题辞所说："以唐宋歌儿传唱之杂曲，写万壑千岩之胜地，千年来，无若兹集之富艳精工者。名山馨业，传后无疑。"对此，叶公绰讲得更为透彻：

综读全卷，以一人之词，遍咏一山之胜，至百十阕，昔人无是也。抑模山范水，幽奇巉削，光奇陆离，拟之正则、相如、灵运、明远、郦亭、杜陵、辋川、昌谷、柳州、介甫、皋羽、铁厓、友夏、石巢之文与诗[②]，殆一炉而冶之，词中亦无是也。余诵古人之词至万余首，不得不推此为苍头异军，不但于沤社拔戟自成一队而已。山水有灵，定惊知己。（叶公绰《劳山集》题辞）

这一评价虽不无友朋间的推重与偏爱，但还是比较公允的。历代热爱山水的文人，可谓数不胜数。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真正能成为山水之知己者却并不多。对此黄孝纾是用"力逮"说来加以说明的，其《劳山集自序》曰：

自古佳山水、名文章获显于世，恒视乎力之所至。济胜有具，力足以胜山水，而后其游始快；纪游有作，力足以称景物，而后其文乃工。造物殚全力缔构，而有名山大川。名山大川负全力，

① "骁駼"疑为"駿駼"之误。

② 笔者按：郦道元（？－527），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郦亭人，这里是以籍贯代指作家。谢翱（1249－1295），南宋爱国诗人，字皋羽。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字廉夫，号铁崖，著有《铁崖先生古乐府》。谭元春（1586－1637），明代文学家，字友夏，与钟惺同为"竟陵派"创始人，有《谭友夏合集》。阮大铖（1587－1646），明末戏曲家，字集之，号圆海、石巢。其传奇《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合称"石巢四种"。

极宇宙嵚崎浩洌瑰玮之观，以待人领取，游者各就力之所得，而有丰啬浅深不同。游焉不能穷其胜，与习焉不能阐诸心声，皆力有未逮耳。

黄孝纾所谓的“力逮”，包含了“力足以胜山水”、“力足以称景物”两个方面。前者是“其游始快”的必备条件，后者为“其文乃工”的个人素养，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文人，也许数量不算少。但是在黄孝纾看来，仅仅有着这两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因为“造物殚全力缔构”的名山大川，同样“负全力”展示其“极宇宙嵚崎浩洌瑰玮之观，以待人领取”，因此，游览者除了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外，还需“全力”地投入，达到独与山水精神往来的境地，才能“尽山之秘”与“尽耳目之奇”。黄孝纾虽自谦“文质无所底，力之所限，不可勉强”，但从《劳山集》来看，作为崂山之知己，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从山水词的发展来说，也正因为他是作为崂山之知己，倾全副心力来创作，故不仅能“穷极幽隐”，“且证此道尚有可辟之境界耳”（叶公绰题辞），他的创作无疑为词体开辟了新的境界，并强化和提升了词的表现功能。

其二，以组词方式突破词与文的疆界。组诗、组词的表现方式，在前人作品中并不少见。在山水词中使用组词，虽不是很普遍，但早在北宋就已经有词人作过尝试，如潘阆《酒泉子》十阕，写钱塘和西湖之美；欧阳修《采桑子》十三阕，其中十阕写颍州西湖之美。但在词中大量使用组词描写山水，却并不多见。

黄孝纾的崂山山水词，可能是为了更好地集中描写某些景点，较多地采用了组词的形式。如《桂殿秋·劳山近区纪游二十阕》，就分别写到了崂山附近丹山、少山、李村、月子口、法海寺等二十多个景点，与王维《辋川集》颇为相似。又如《春去也》小序曰：“胶东人呼峰为崮，崮读若个。山中峰以崮命名者，不可一二数。口占得二十二解。”这二十二阕歌咏了麾子崮、金刚崮等 22 个山峰。又如《闲中好·劳山四时歌四阕》，总写崂山四时之美；《十六字令·劳山八忆》，总写崂山的晴、阴、朝、昏、风、花、雪、月之美；《渔歌子·黄山棹歌十阕》，总写崂山中黄山、青山一带的秀丽风光和渔家生活；《梦江南·北九水樵歌九阕》则分咏九水景致。

这些组词固然与表现就近景点的写作需求有关，也因突破了词体篇幅的限制，有了更大的容量。同时，作者不仅在骈文创作中善于吸收《水经注》等描摹山水的长处，热爱山水的天性也使他格外留意游记，如《劳山集》中的《鱼鳞峡记》，夏映厂评曰：“景既幽异，文亦足以副之，似《水经注》。”《外九水游记》，谭瓶垒评曰：“模山范水，笔具化工，步迻《水经注》而少变其体。”从中可见他对《水经注》的借鉴。这种由游记得来的创作技巧，也被他使用于组词的创作中。瞿蜕园评《桂殿秋·劳山近区纪游二十阕》曰：“以明人游记中之奇秀语，入花间雅调，岂古人所及见？”龙榆生评《梦江南·北九水樵歌九阕》也说：“九歌随步换形，珠玑满眼。”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种将游记笔法用于词作山水描写的尝试。因而这些组词，在表现形式的探索之外，又具备了突破文体疆界的审美追求。这无论对于词体、游记，还是山水文学来说，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 三、黄孝纾的治学特点

在学术研究方面，黄孝纾先生存世的多为选注类的普及性著作，主要有《周礼》、《周秦金石文》、《两汉金石文》、《玉台新咏》、《欧阳永叔文》、《三苏文》、《黄山谷诗》、《司马光文》、《钱谦益文》、《晋书》[①]等多种选注类著作，另有《楚辞》[②]、《欧阳修词选译》[③]等，他的《天问达诂》亦有写印本行世。据黄先生弟子——青岛大学的宫庆山老师回忆，黄先生还完成了《广说文古籀补》，他们师生二人还一

① 均收入王云五、朱经农主编的《学生国学丛书》，该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上海）于 1926 年到 1948 年陆续出版，其中黄孝纾先生的著作竟有十种之多。

② 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楚辞》，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

③ 黄孝纾：《欧阳修词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年。

起完成了《蒲松龄诗文选注》，可惜都毁于“文革”。

这些选注类著作，多是为学生学习国学之便而作，力求简洁通俗是其基本宗旨。但据《学生国学丛书编例》，一则曰：“诸书选辑各篇，以足以表见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者为准。其无关宏旨者，概从删削。所选之篇类不省节，以免割裂之病。”再则曰：“诸书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之生平、本书之概要，凡所以示学生研究门径者，不厌其详。”因此，这类著作一来从选篇可见作者之眼光；二来从序言可见作者之见识。黄孝纾的这些著作，在这两方面都非常精彩，尤其是其序言，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仍启发良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里拟以部分古籍选注的序言为中心，简述其独到的学术观点，以见其学术造诣和见识之一斑。

**1. 独特的古文观** 如前所述，黄孝纾作为骈文大家，却不受清人骈散之争的影响，能以更广阔的心胸吸收借鉴骈文和古文的长处。与此相应，他对秦汉古文的看法，也显得与众不同。他认为历代的金石考据家，只重视文字训释，而不注意文章工拙，而历代选集中，又不选金石文，致使金石文的价值无人知晓。而事实上，金石文的文法比其他古文更为“谨严慎密”，“故欲研求文法者，舍金石文字外，无他道也”①。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秦汉古文多取法于金石：

> 文之有法度者，《史》、《汉》尚已。其《书》、《志》、《帝纪》、《列传》非司马、班、范诸儒所凭空杜撰者也。泰半取材于金石，可断言也。……故以文论，金石之文，实为《史》、《汉》之祖；司马班范之作，并皆取法于金石者也。②

自唐代古文运动以来，秦汉古文就受到推崇，发展至明代前后七子，至有“文必秦汉”的主张。黄孝纾的这一看法，对于上千年的传统观点，显然是一个挑战。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两汉金石，多古文假借。因此要读懂金石文，必须精通小学，“要之金石之学，非有十年小学考据之功者不能道。不明六书叚（假）借而道金石者，皆门外汉也。是故金石之学，必自妍求古籀始”③。这正是他撰写《广说文古籀补》的初衷，由此也透露出他在小学方面深厚的造诣。

**2. 对欧阳修词的洞幽烛微** 《欧阳修词选译》是一本仅有5.5万字的小册子，但其序言就约1.2万字，占了全书正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实为欧阳修词的一篇专论。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欧阳修“集中存有‘渔家傲’数十阕，是应注意的。‘渔家傲’是北宋民间流行的新腔，在‘六一词’中特别多，‘琴趣’中二十五阕，‘乐府’中有二十四阕。其中两套，是咏十二月的节气”④。这两组《渔家傲》，词牌下注明为“鼓子词”。而鼓子词本是说唱文学，“宋代‘鼓子词’，是采用当时流行的词调，开始伶工为了供应的需要，配合节令，应时出演，这便形成联章格式，发展到后来，文人便应伶工的请求，替他们把历史传说一些故事，联系成为套曲，……欧阳修的‘渔家傲’，咏十二月节令，虽属初期形式，但也看出这类民歌的优越性和当时流行的情况”。黄孝纾对欧阳修以《渔家傲》新腔的联章体改造民间鼓子词的做法，是给予肯定的，认为“欧阳修注意民间歌谣，把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上升为士大夫阶层的宴乐，是有进步性的”⑤。大约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欧阳修词选译》共选欧词21阕72首，《渔家傲》一阕居然选了21首，约占全部选词的三分之一。这一观点，后来在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中得到了回应⑥，追溯其源头，黄孝纾大约是较早的发现者。

黄孝纾还通过对欧词的考察，发现了他在慢词创作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

> 北宋是慢词成长时期，这种民间新腔，吸取到文人乐府，扩大词的领域，一般都归功到柳永、周邦彦身上，其实欧阳修慢词的尝试，早于周邦彦五十余年，与柳永同时，而名位尤高，以一个主

① 黄孝纾：《两汉金石文选评注·绪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页。
② 黄孝纾：《两汉金石文选评注·绪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页。
③ 黄孝纾：《两汉金石文选评注·绪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页。
④ 黄孝纾：《欧阳修词选译·前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⑤ 黄孝纾：《欧阳修词选译·前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2页。
⑥ 参见杨海明：《唐宋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7－208页。

> 持坛坫的文章巨公，和当时所谓浪子文人的柳永，互通声气，这无疑使北宋词坛发生了巨大影响。①

又说：

> 欧阳修以文章巨公，更能从事于民歌的仿效，这便起了提倡作用。柳永实受其影响，我们认为他在词坛的功绩，也不下于他的古文运动。②

这一认识是接近文学史实际的，但与前者相比，直至今日的文学史著作，对于欧阳修在开拓慢词方面的功绩，仍然认识不够③。更少有人将此与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的功绩相提并论。作为词人的黄孝纾在词学方面的卓见，由上述两点可见一斑。

**3. 对山谷诗的独到认识** 黄孝纾的《黄山谷诗》选注，在选篇和注释方面均不乏特点，这在该书的《导言》中有最为集中的体现。黄庭坚诗歌学习杜甫，这在当代学术界几乎已是常识，对此黄孝纾也没有异议。但他却能站在诗人的立场，对黄庭坚诗歌的艺术特点有更细微的体会：

> 虽然，山谷诗大体固以学杜为本，但其谋篇用韵，实兼韩愈孟郊之长，融会贯通。故于杜甫则得其骨格，其立意立言，力求沉着，有“一唱三叹”之音。于韩愈则得其恣肆博大，有“匠石斲垩，运斤成风”之妙。于孟郊则得其奇险，炼字妥帖排奡，而不流于怪癖。④

指出黄庭坚诗能融会贯通，博采众家之长。并分别列举《登快阁》、《送王郎》等17首，《汴岸置酒赠黄十七》、《留王郎》、《次韵张询斋中春晚》、《寄黄几复》等23首，《戏答俞清老道人寒夜》、《过家》、《以小团龙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等21首，以说明这些诗歌为学杜、学韩与学孟“而得其神似者”⑤。这些诗歌也是列入选本的主要诗篇，这一方面说明了诗篇入选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对读者把握诗歌的艺术特点和风格有着指点门径的作用。《导言》与诗选可谓结合紧密，相得益彰。这两点，即对黄庭坚诗歌艺术师承与特点的分析，及《导言》与诗选之间的相互配合，同样与作者深谙创作甘苦的文学敏感分不开，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而言，也仍然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

以上三个方面，分别与黄孝纾创作所涉及的文、词与诗三个领域相对应，而都能体现出黄孝纾因其作家身份而在学术研究中所具备的独特视角。具体而言，他对相关作家、作品及文学史现象的认识，不仅显示出其知识的渊博和见解的独到，也明显体现出深谙创作甘苦的、诗人型学者的特点。其中的某些观点，直至今日仍不乏启示意义⑥。

黄孝纾生当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却究心于古典之学，凭借其过人的才气，在诗、文、词、赋，乃至书、画方面，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骈文与山水诗词，尤具特色，在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其学术研究，虽主要以通俗性的作品选注为主，但特色鲜明，见解独到。虽然因与时代潮流相左，在其生前不免曲高和寡，赏音者少；身后亦知者寥寥，几被遗忘。但令我们欣慰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学的复兴，关注像黄孝纾一样被长期冷落的学者文人，考证其生平，整理其文集，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重新评价，已成学界的新动向。这是黄孝纾先生之幸，也昭示着理性的回归与学术的昌明。

[责任编辑 渭 卿]

① 黄孝纾：《欧阳修词选译·前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4页。

② 黄孝纾：《欧阳修词选译·前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7页。

③ 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36页。

④ 黄孝纾：《黄山谷诗·导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页。

⑤ 黄孝纾：《黄山谷诗·导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5页。

⑥ 黄孝纾在楚辞研究方面也很有特点，读者可参考王培源：《一份尘封的〈楚辞研究〉——简说黄孝纾先生的〈楚辞研究〉》，《中国楚辞学》第十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

# 史料、史识和美学的融通：陆侃如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

张 可 礼

**摘 要**：陆侃如和冯沅君先生合著有《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三部重要的文学史。三部文学史，在当时受到青睐，对后来有积极的影响。三部文学史以史料为基础，体现了史料、史识和美学的融通。在史料上，尽力搜集，追求真实，注意选择。在史识上，由进化论到历史唯物论，不断探索和实践。在美学上，重视文学蕴涵的审美情操和艺术表现特点。

**关键词**：陆侃如；文学史；史料；史识；美学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陆侃如先生(1903 － 1978)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这两方面。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陆先生虽然在史料的考证、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的撰写和古代文学的普及等方面，都有探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综观比较，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的成就更为突出。本文仅就陆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试作探讨。

## 一、三部重要史著

陆先生早在 1926 年 7 月至 1927 年 6 月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就开始研究和撰写中国文学史。他的毕业论文《中国诗史》获得了优秀论文奖。1927 年，他和冯沅君先生结婚后，相继联手完成了《中国诗史》(以下简称《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和《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三部重要史著。《诗史》、《简编》出版以后，都作了修改，有的还不止修改一次。同时，陆先生一直关注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他先后发表过《给研究文学史的同志们》、《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①]、《文学史工作中的三个问题——从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想起》。他在去世的前两年，还撰写了一篇有关文学史的论文：《与刘大杰论杜甫信》[②]。上面列举的事实说明，陆先生在他的治学生涯中，一直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撰写和探索。

关于《诗史》，陆先生在 1930 年夏所写《诗史·序例》中说："此书是我和沅君合写的。起初我打算一个人写，在北平读书时，便写成《导论》及《古代诗史》。后来在上海教书，即以此稿作讲义，并续写《中代诗史》。时沅君在上海讲词曲，故以《近代诗史》托付她。我自己又写一篇附论，全书就此完

---

**作者简介**：张可礼，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以上两篇论文是与冯沅君先生合写的。

② 此文是陆先生看到了刘大杰先生新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 2 册大字本的校样中，把杜甫列为法家后迅疾开始写作的。陆先生在"对杜集再读一遍"之后，详细引证分析了有关杜诗，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杜甫并非法家。此"信"寄给了刘先生。刘先生很快复信，表示同意陆先生的观点，次年在《文史哲》第 4 期发表。此文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较早地批判和否定"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一篇重要论文。

成了。”[①]《诗史》于1931年出版。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或推荐，或参考，或评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鲁迅在1933年12月20日《致曹靖华》的信中，推荐“可看”的文学史共五种，其中有《诗史》。《诗史》问世之后，相继出版的不少文学史的写作，许多都参考了《诗史》。1934年龙沐勋出版的《中国韵文史》，附录列中国韵文简要书目，选“时人论著”四种，其中之一是《诗史》。1935年刘经庵出版《中国纯文学史纲》，此书“曾参考关于中国文学论著的版本数十种”，其中有《诗史》。1936年赵景深出版《中国文学史新编》，分古代、宋元和明清三编，各编均列《诗史》作参考书。1938年杨荫深出版《中国文学史大纲》，除《楚辞》部分吸取陆先生的成果外，关于乐府部分，也多取资于《诗史》。在1940年代，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认为《诗史》“颇称详备，为此类书的创作”。到1950年代，林庚于19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书后附“一般参考书目”，书目中关于文学史列有四种，《诗史》是其中之一。《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发表了谷典的以《诗史》为题的书评，从多方面肯定了这部著作。认为它是第一部“有系统的诗歌史”，“二十多年来这部著作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是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诗史》中的许多重要观点，至今仍为不少学者所首肯和称引。如，关于中国“史诗”问题。在《诗史》出版之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史诗。而陆先生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中国古代有史诗。他在《诗史》中论述《诗经·大雅》时，特别标举“周之史诗”。关于这一点，特别受到前几年研究史诗的林岗的关注。林岗指出：“陆、冯国学基础深厚，在学界颇有声望，而他们的意见，也确实回应了‘史诗问题’造成的紧张，成为学界与主流的否定性意见相对峙的意见。”“近者如汪涌豪、骆玉明主编《中国诗学》第1卷论到《诗经》时，还有小标题‘雄浑昂扬的周族史诗’，显然是承继陆、冯的看法。”[②]

就《诗史》的出版情况来看，自1931年初版到今天，据初步统计，经由不同的出版社至少再版过13次(包括修订本)。《诗史》问世后的七十多年，不断再版，这是罕见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它有长久的生命力。

《简编》是应大江百科全书之约撰写的。此书是陆、冯两位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大学等学校所用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后，于1932年10月出版。全书用约十万字的篇幅，述评了自文学起源至现代的文学革命的历史。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讲由陆先生撰写。董乃斌、陈伯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一书中评论《简编》时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史逐渐凝固成一种“模式”，《简编》“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叙事模式的基本形态”。特别提出，《简编》最后的目标指向一点：“就是五四新文学。‘文学史’的预见性在这最后又一次显现出来。五四新文学，它是一个时代文学结束的地方，也是另一个时代文学史叙述开头的地方。”[③]《简编》问世以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相当畅销。截止到1949年，先后至少再版过五次。《简编》之所以受到青睐，正像作家、藏书家翁长松所指出的，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它是“一本时间跨度最长的中国文学史。全书从中国有记载的商代说起，一直讲到中国现代的‘文学与革命’，上下五千年，展现出中国文学发展轨迹。……一册在手，就可明了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概况”。二是“文字简洁流畅，通俗易懂”。三是“富有学术开创性和进步的文学观。此书对中国诗歌、散文的起源作了探索和研究，形成了颇具个性化的见解，尤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见解”。书中体现的文学观“对当年的民主人士、文学青年、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这也是该书畅销的思想基础”[④]。

对于《简编》，陆、冯两位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了较大的修改。修改稿，用《中国文学史稿》

① 陆、冯两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史，大体分工是：陆先生撰写先秦至唐代部分，冯先生撰写唐代以后部分。本文论陆先生的史著基本上限于陆先生所撰写的先秦至唐代部分。

② 参阅林岗：《二十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探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③ 董乃斌、陈伯海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73页。

④ 参阅翁长松：《漫步旧书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第77－79页。

之名，先在《文史哲》月刊上连载了18期，倾听专家、朋友和读者的意见，后又两次修改，于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简编》修改本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用新观点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简编》在叙事模式和体量上，又比较适合当时的教学，被许多高等学校选作教材。后来经教育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和游国恩等五位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大体上参用了《简编》的体例。

两位先生在修改《简编》的同时，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在《简编》20万字的基础上，压缩篇幅，编写了《简史》，于1957年出版。《简史》是为具有中学水平的读者编写的。全书约六万字，着重叙述了各个时期文学的特征，说明文学的流派，述评重要作家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对重要作品作扼要的分析。对所引的作品有简明注释，每章后还有习题。陆先生在撰写此书时，曾征求过一些中学教师和中学水平的青年的意见，以便使《简史》适合读者的要求。由此可见，陆先生对普及古代文学史知识是满怀热忱的，是他主张把"过去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的（古典文学）宝藏交到广大人民手里"的体现。次年，此书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和罗马尼亚文版。出版外文版时，由于陆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署名只有冯先生一人。中国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译成外文，"送出去"，介绍给国外的读者，《简史》当是最早的一本。

## 二、以史料为基础

陆先生从进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终其一生，一直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阅读陆先生的著述，常常可以见到他深厚的考证功力和突出的成绩。他做史料工作，既是为某些专题研究作准备，也是为了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史。他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一直注意把史料作为基础，重视史料的考证。他早在1926年为游国恩《楚辞概论》所写的序中，分析"近来""中国无好的文学史"的原因时，就指出了史料考证的重要，"若不注重考证，取材必不可靠"。1931年，陆先生在《诗史》的《导言》中说明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中国诗史的材料"。1932年，他在初版的《简编·序例》中明确表示："为初学明瞭计，对各问题只说个较可靠的结论，而不去详加考证（讲授时可另加说明）。"陆先生特别提示：《简编》限于篇幅，不能对史料进行考证，但在讲授时，要加上。陆先生又在《简编》的第一讲《中国文学的起源》中一开始就说："中国文学的起源是不容易讲的。一因真的材料太少，二因伪的材料太多。我们现在先把伪的材料加以辨明，其次再从真的材料中试探一下中国原始作品的情状。"从上面引用的陆先生的言论来看，陆先生一直是把重视史料和史料的考证作为编写文学史的基础。

陆先生撰写文学史所用的史料，有些是经过辨析借助于他人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由自己搜集、整理和考证过的。这突出地表现在重要作品和作家生平的考证上。

在作品方面，陆先生用力较多的是对《诗经》、《楚辞》和乐府诗的考证。

关于《诗经》，从1926年到1944年，陆先生先后发表了《〈诗经〉参考书提要》、《〈二南〉研究》、《就〈周南〉、〈召南〉寄胡适之书》、《大小雅研究》、《中国古代的无韵诗》、《〈风〉〈雅〉韵例》、《三百篇的年代》、《〈采薇〉、〈出车〉、〈六月〉三诗的年代》等著述。撰写《提要》，表明陆先生对以前研究《诗经》的史料，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二南〉研究》等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陆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是从《楚辞》开始的。他从1922年、19岁时发表《〈大招〉、〈招魂〉、〈远游〉的著者问题》之后，仅在20年代就相继发表了《屈原生年考证》、《屈原》（其中包括《楚辞地图》、《屈赋校勘记》、《屈赋古音录》、《著者可疑的作品》）、《宋玉》（其中包括《宋玉的生平》、《宋玉的作品》、《宋玉赋校勘记》、《宋玉赋古音录》、《著者可疑的作品》）、《楚辞的旁支》等。陆先生关于《楚辞》研究的成果问世以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赵景深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小史》中，论屈原说："他的作品，最近据陆侃如考证，凡三篇，即《离骚》、《九章》、《天问》。"论宋玉说："据陆侃如的考证，他的作品只有《九辩》和《招魂》，真是他自己的。"1932年出版的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都明说根据陆先生的研究成果而论述屈原和宋玉。杨荫深

1933年出版的《先秦文学大纲》，书末列有42种参考书，其中近人著作五种，有四种是陆先生的。四种中有《屈原》和《宋玉》。杨荫深评价说：《屈原》"为最近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屈原生涯及其作品的一部好书"。《宋玉》"对于研究宋玉的作品也有新的见解"。从上面列举的史实，可以看到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在楚辞研究领域里的突出贡献。

陆先生对乐府诗的考证，主要论著有《孔雀东南飞考证》、《答黄晦闻书》和《乐府古辞考》三种。这三种论著发表以后，受到了学林的重视，直到今天常常被作为研究乐府诗的重要参考。《乐府古辞考》于1926年初版后，至1977年，在大陆和台湾至少再版七次。今人王运熙先生《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中著录此书，说："此书写作时间较早（序例写于民国十四年），系近人专治乐府著作之前驱者。"

陆先生在古代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从今存陆先生的著述来看，他对作家的考证，除了上面所说的有关《诗经》、《楚辞》、乐府诗中有关作者的考证和陶渊明外，重点是对于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重要作家的考证。综观陆先生这方面的论文和著述，东汉、三国和西晋这一时期的作家，他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考证。这方面考证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古文学系年》一书中。《中古文学系年》是陆先生早在抗战前就酝酿的一个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抗战之前，就想写一部《中古文学史》。为了写成这部文学史，他在《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中，认为应该有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即对作者的生平、作品写作时间的考订和对作品的校勘、训诂等。基于上述的认识，他想用十年左右的时间，首先编纂《中古文学系年》一书。由于条件的限制，此书只写到西晋末年。先生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先生的手稿，出版了此书。此书共80多万字，按年系人，把汉晋间的150多位作家的有关事迹，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订和清理。《中古文学系年》出版以后，成了研究中古文学的学者案几必备的书籍。在诸多的中古文学史著作所列的参考书中，无不将此书列为重要的一种。

陆先生重视古代文学史料的考证，是对清代朴学的继承，同时也是受到了五四运动开始的"整理国故"风气的影响。1943年，陆先生在为傅庚生所写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中说："'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五四运动开始的"整理国故"，重视继承清代的朴学，但又不为清儒所囿，而有很大的超越，已经具有明显的现代色彩。这在陆先生的著述中也有所体现，主要有三点：1. 清儒的考证，常常显得烦琐。而陆先生的考证，选取的都是一些重要的问题，考证时，重点在列举可靠的证据，提出自己的见解，而舍弃烦琐。2. 清儒的考证，重点在经书。考证经书又多限于校正文字、注释词义的"小学"方面。陆先生的考证除了校正文字和注释词义外，还拓展到文学现象发生的背景方面。他在《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中认识到，写文学史除了"对作者的生平、作品写作时间的考订和对作品的校勘、训诂"外，还应当做"史学的工作，即对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特别是对当时经济状况的考察等"。要考察背景，自然要由清儒重在"小学"扩展至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陆先生正是这样作的。3. 清儒的考证，或是为考证而考证，或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都王功"[①]。而陆先生不是孤立地为考证而考证。他重视考证而又不止于考证，是把考证作为治史的基础，作为治史的第一步，作为治史的一种科学方法。上述的三点，陆先生经历了一个由不太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他在《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中坦言："文学史的目的，在鉴古以知今。要达到这目的，我们不仅要明白文学史上的'然'，更要知道'所以然'。……我自己很早就想研究文学史，可是经过若干年的摸索之后，深深感到过去走的路都不十分对。朴学的工作既不精确，史学的工作完全没做。因此，对于'然'既仅一知半解，对于'所以然'更茫然无知。于是我立下志愿，打算对中古一段好好地探索一下。"陆先生的这种自觉意识，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对《诗史》、《简编》的修改中和《简史》的撰写

① 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编。

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陆先生对史料的重视，在史料考证方面取得的成就，使《诗史》和《简编》等史著都能够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他在《诗史》的《导论》中说："我们认为一般文学史的失败，多半因为材料的取弃不能适当。"鉴于上述情况，对于史料，他采取了"人取我弃"和"人弃我取"的做法。表面上看，先生的做法太绝对。实际上，先生的意思是对以前文学史所使用的史料，不能盲从，要使用真实的史料，对史料要有所选择。就"人取我弃"来说，他认为过去一些文学史所使用的某些史料属于伪作，并不可信。因此，他在《诗史》中，用了不少篇幅做辨伪的工作。今天看来，这样做，似乎没有必要。但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关于"人弃我取"，陆先生的意思是，编撰文学史不能限于一般文学史家所使用的史料，要扩大史料，突出重点。基于上述思想，在《诗史》中，把诗扩大到包括"一切韵文"，突出了在古代诗歌演进史上能够代表时代和能够反映诗歌演进大势的史料。《诗史》中，宋前部分，分别以"诗经时代"、"楚辞时代"、"乐府时代"、"曹植时代"、"陶潜时代"、"李白时代"、"杜甫时代"为题，就是上述思想的具体体现。《简编》尽管限于篇幅，不能像《诗史》那样有较多的史料考证，但仍有不少简明的考证。如第三讲《古民族的文学》(中)讲到《诗经》的《二南》时说："关于它的时代与地点，旧说亦误，其中时代可考者，如《汝坟》述东迁，《甘棠》颂召虎，《何彼秾矣》称平王，都在前八世纪；而诗中所有地名，都在江、汉之间，其属楚不属周可知。……《诗经》中除《二南》外，还有《陈风》也可属于楚民族。不但陈是灭于楚的，而且其官制方言服饰也多与楚同。"随着学术的进步，陆先生所作的具体的考证的结论，有的不一定正确，对史料的取舍，也是一家之说，把诗扩大到包括"一切韵文"的观点，也值得讨论，但他强调编撰文学史在使用史料时不能盲从，对史料应当考证，"以传信自勉"，必须选择，这些都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古代史料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大量的地下文物的出土。地下文物属于实物史料。它的出土，使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不再限于文献史料，而是把文献记载同实物史料结合起来，相互补正。在这方面，陆先生是相当敏锐的。他通过阅读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研究成果，知道甲骨上"商人的贞卜文辞，实为言古史者之无上材料"①。基于上述认识，陆先生早在20年代后期开始撰写《诗史》时，到后来撰写《简编》，都能自觉地使用甲骨卜辞、金文和石刻文等方面的史料来论述文学。在《诗史》篇一《萌芽时代》中明确说明："我们可以根据卜辞述一述当时社会的，文化的，及艺术的一般状况。……卜辞证明商民族尚在氏族制度的阶段是很显然的。……在上层构造的艺术方面，我们知道有舞蹈和音乐。"论《商铭》说："此诗见《国语》，以为是商末的鼎铭。"但"'嗛嗛之德，不足就矣'等句，与见存商末金文的文体(如《觯尊》、《般甗》等)相距太远，其不可信可知"。在《简编》第一讲论述中国文学的起源时，先辨明了"伪的材料"，然后"据真的材料来推测文学的起源"，说："推测的根据有二：一是卜辞，二是金文。"在辨析《尚书·虞书·尧典》时说："《尧典》疑点尤多，其重要者为：一、卜辞只有'十三月'而无'韵'字，此篇何得有'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之句(马衡说)？二、近代考古学者证明商代器具尚多石制，尧时何得有'金作赎刑'之事(梁启超说)？……故我们决不能据它们来讲古代散文。"在篇五《附论》中，用了较多的文字，论述了《石鼓文》的时代、内容。

在陆先生之前撰写的文学史，不太注意使用甲骨文之类的实物史料。在这方面，陆先生有开创之功。此后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卜辞文学的论著。如1936年清华大学印行了唐兰的《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陆先生使用甲骨文等史料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是否恰切，可以讨论，但他能把甲骨文等与文学史相关的实物史料用于文学史的撰写中，把它们同文献史料结合起来，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① 《中国诗史》卷上，上海：大江书铺，1931年，第28页。

## 三、在史识上的探索与实践

撰写文学史，一是要以史料为基础，二是要有史识。所谓史识，源于史料，又超越史料，主要指的是研究和撰写文学史的系统观点和方法。史料和史识，两相比较，在某种意义上史识更重要。评价文学史质量的高低，史识是重要的标准。如果把撰写文学史比作建筑一座大厦的话，史料只是一些建筑材料，至于建筑什么样的大厦，如何选取和使用材料，这就取决于建筑师的设计了。史识在编撰文学史中的作用，近似于建筑师在建筑中的设计。从文学史撰写的实践来看，各种文学史都离不开史识。其区别在于自觉的程度，在于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是否正确，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以及史识能不能与时俱进，是否注意追求当代意义。以作品为核心的文学史料是客观的，有限的，不变的，而史识属于人的主观意识，是无限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有主观调适与更新的弹性。人们对史识一直在探索，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探索。综观陆先生有关文学史的著述，大体上也是这样。

陆先生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史识上，他以青年人富有的敏锐，很快地接受了现代的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这主要是进化论、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美学”。这在《诗史》和《简编》中有明显的体现。

1917 年，胡适在《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他主张“以历史进化之眼光”来看文学。陆先生接受胡适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渐渐进化而成的，不是一二天才所能凭空创造的。”[①]基于上述认识，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于文学的变迁的大势，对多种主要文体的产生和变化，大多能从产生和流变的角度，作动态的描述。在《简编》中，论先秦时期的楚文学时，认为“楚民族文学的起源，当远溯之于《诗经》中的《二南》”。“楚民族的文学，经数百年的酝酿，到《九歌》便成立了。及屈、宋出世，便是全盛时期了。”[②]关于《诗史》，陆先生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述评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产生和变迁的大势，认为：“中国诗歌变迁的第一关键在汉，第二关键在唐。”根据上面的认识，把古代诗歌的演进分为古代、中代和近代三个时期。古诗从起源到汉代，“可以说是‘自由诗’，而《古代诗史》也可以说是‘诗的自由史’”。中代自汉末到唐代。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是于天然的美以外，更加以人工的美。……加一种人工，便多一种束缚，我们既称古代为自由史，也不妨称《中代诗史》为‘诗的束缚史’”。近代自唐末到清代，诗歌沿着两个方向变化：“一个方向是拿乐律代诗律”，“还有一个方向是文字日渐解放。”陆先生把近代的诗称为“诗的变化史”[③]。戏剧和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编》用了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讲戏剧和小说，为了使读者了解戏剧和小说演进的历史，在第十讲特设《戏剧和小说的雏形》一讲，指出：“中国的戏剧与小说，都是到了宋以后才完成的，在唐以前只是个‘雏形’罢了。”

文学，不管是从整体来看，还是从各种文体来看，都有其客观的源流演进的历程。探求文学的源流演进历程，是研究撰写文学史的应有之义。陆先生受进化论的影响所作的探求，有助于人们认识文学自身的历史，进而总结某些规律，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不过，用进化论来研究和编写文学史，虽然有科学的进步的意义，但是把生物界的进化论应用于文学史的研究，并不是完全的科学的方法。韦勒克认为：“并不存在同生物学上的物种相当的文学类型，而进化论正是以物种为基础的。”[④]文学有自身的特点，有自己演进的历程。阐释文学的演进离不开文学演进的背景。因此研究

① 《中国诗史》篇三《楚辞时代》。

② 《中国文学史简编》第三讲《古民族的文学》(中)，上海：开明书店，1932 年。

③ 《中国诗史·导论》。

④ [美]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年，第 57 页。

文学的演进，如果局限于用进化论的方法，是难以科学地揭示文学演进的历程的。幸运的是，陆先生在接受进化论之后不久的1928年前后，又开始接触了历史唯物论，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书籍，开始尝试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文学史。陆先生对历史唯物论的接触，使他的史识有所变化。这在《诗史》当中有明显的体现。陆先生在《诗史》卷一篇一《萌芽时代》，根据考古发现的卜辞，假定我国古代诗歌的萌芽是从盘庚即位之年到传说的纣自杀之时。接着联系当时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以及语言的一般状况说：劳动产生了舞蹈、音乐和诗歌。这一见解，显然是基于历史唯物论的一种观点。从1932年至1935年，陆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读过伊可维支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并翻译了其中的第二部第二章第三节《小仲马戏剧之唯物史观之研究》，对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学有了新的体会。当然，由于陆先生刚刚接触部分历史唯物论著，热情有余，消化不够，基本上是处于"一知半解的浏览"状态①，对长时间流行的进化论不可能有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所以，从初版的《诗史》和《简编》来看，陆先生当时的史识基本上是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混合。两相比较，进化论的影响更为明显。

陆先生对历史唯物论比较全面的学习和接受，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陆先生和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肃清资产阶级唯心论毒害"的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认识的提高，使他感到对过去写的《诗史》和《简编》应作些必要的修改。于是，从1954年开始，陆先生和冯先生一起先后对《诗史》和《简编》加以修改。《诗史》的修改，由于出版时间的限制，主要是尽量去掉"发现的比较严重的错误的地方"②。而《简编》则作了很大的修改。不仅字数由初版的9万多字扩大到24万，更为重要的想"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严重错误，完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文学遗产上的问题"③。出自上述思考，在《简编》修订本中，特别突出了文学背景部分，注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在《诗史》和《简编》的初版中，如上所述，陆先生在论述某些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已经开始注意从背景上加以探讨，但就整体而言，是个别的，还没有把文学赖以产生的背景看成是贯彻历史唯物论的重要内容。到了修订《简编》时，在这方面，就非常自觉了。陆先生在《简编》的《引言》中谈"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时说："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对于文学史应该当作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所间接形成的现象来考察。文学的发展必然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巨的影响，同时文学也有本身发展的独自的规律。"在第三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的《概说》中叙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之后，总括说："这些情况对于文学的关系比较密切，对于作品的影响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弄清楚。"陆先生基于对上述历史唯物论观点的认可，因而在《简编》中，从第二篇《周代的文学》至第六篇《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文学》，在《概说》中，都有《历史的背景》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陆先生立足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来叙写背景，注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时也涉及到自然条件。在叙写背景时，注意突出同文学关系密切的历史。如论周代的文学，重点叙写了"士"这一阶层的作用，论西汉以后的文学，在思想意识方面，主要强调了儒学在汉代的统治地位，强调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陆先生对背景的重视，也体现在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上。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中论司马迁的《史记》说："《史记》是贯穿许多朝代的第一部通史，是在先秦许多优秀历史著作的基础上，在秦汉统一以后宏伟局面的启发下产生的。"

文学史应当述评文学演进的历程，但演进的历程只是一种表象，因此我们不能止于这一层面上，而应当进一步探讨是哪些东西在影响文学史的演进。古代的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都是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历史条件，可以概括为历史背景。研究文学史

①② 参阅《中国诗史·自序》(修订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③ 《中国文学史简编·自序》(修订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必须顾及历史背景。这符合历史真实，也是历史唯物论所要求的。综观建国以后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都重视背景，把背景作为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陆先生是较早的实践者。背景虽然重要，但由于背景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文学史不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历史状况的简单反映，背景和文学之间存在着许多不易探明的中介，作家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背景。不能把社会、经济等历史状况简单地移置到文学史里，也要避免叙述的公式化。今天看来，陆先生虽然认识到背景的重要，在《简编》中特别述及了背景，有些论述比较恰切，但他对背景的理解并不全面，择取的有关的背景的内容，有的显得泛化。陆先生研究和撰写文学史，在背景问题上的探索和实践，虽然不全面，有的不一定恰当，但他是立足于历史唯物论，是他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论的体现。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历史唯物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和阶级斗争往往会通过一些不同的方式反映在一些文学活动中。新中国建立以后，许多学者在学习历史唯物论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古代文学的一些现象。陆先生也是这样。这比较明显地体现在《简编》的修订本中。其主要表现是：1. 给作家定出身、划成分。如说“刘邦可能是中小农”①，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可是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有时就离开了自己的阶级”②。2. 把某些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变化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如讲唐代古文运动和传奇说：“古文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提倡切合实用的散文，反对骈文，而骈文是和世族地主有些关系的；所以古文和骈文的论争，可以看作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在文学上的反映。……同时，由于新兴地主的壮大，科举制度的产生，在小说方面便助长了传奇的数量。”③3. 用两分法，把文学分为为统治阶级服务和为人民服务两种，如说：汉大赋的“作者们大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④；论王充说：“从《论衡》看来，王充基本上是一位替人民说话的思想家”⑤。这样的分析，表面上看，是基于历史唯物论，事实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要求。历史唯物论要求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当时的历史实际，对当时的历史实际作深入的细致的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从《简编》的修订本来看，由于陆先生初步接触阶级分析方法，还没来得及用阶级观点对古代文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匆忙地套用当时强调的阶级斗争观点来修改文学史，出现了诸如上面所列举的一些认识。这些认识，缺乏史料作基础。这样的认识，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了，绝对化了，遮蔽了许多文学现象所蕴涵的丰富的、复杂的内涵。

在上一个世纪，像陆先生那样真诚地学习和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很多。这反映了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文学时不断探索的精神。他们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成就，但确实也出现了明显的简单化等问题。对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阶级分析是基于阶级社会存在阶级而提出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是研究古代阶级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不断地探索。许多学者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时间很短，不可能对其有较深的理解。另外，从理解到正确应用，有一个过程。即使有较深的理解，也不一定能正确地贯彻到古代文学的研究当中。因此，对于他们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时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应当给予历史的解释，更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面对前辈学者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现在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如何结合古代文学的实际和特点来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同其他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思考，这样做，是否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 《中国文学史简编》，第58页。
② 《中国文学史简编》，第88页。
③ 《中国文学史简编》，第109页。
④ 《中国文学史简编》，第64页。
⑤ 《中国文学史简编》，第71页。

## 四、美学意识

文学史作为史的一种，同其他的史有共同之处，都离不开史料和史识，但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是审美的。因此，编撰文学史仅掌握史料和具有史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美学意识，把美学意识同史料和史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陆先生有自己的认识，注意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并且能够付诸实践。

陆先生早在编撰《简编》时，就重视“文学的意味”之说和“文学的观点”。他说的“文学的意味”和“文学的观点”，应当说是属于美学意识。后来他在编纂《中古文学系年》的“序例”中，回顾自己多年研究文学史的“摸索之后”，进而总结说：“文学史的工作应当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第二是史学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陆先生所说的“美学工作”，指的是“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一点，贯穿在他的文学史著中。

陆先生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如上所述，往往能从大的方面，区分为“天然的美”和“人工的美”。他说：《古代诗史》可以说是“自由诗”，属于“天然的美”，而自汉末到唐代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是于天然的美以外，更加以人工的美。”

在具体论述作家和作品时，陆先生注意从美学的视角，揭示作家和作品蕴涵的审美情操和艺术特点。他在《简编》中论屈原的《离骚》说：“全篇表现出作者人格的高洁，感情的浓挚，想象力的丰富，表现力的伟大。其所以传诵千载者，实非偶然。”评汉乐府《鼓吹曲》中的颂诗、情诗，写战争的、写田猎的、写饮宴的，“其特点在设色浓艳，表情热烈，用韵又极自由”。在修订本中述评杜甫说：他的诗“不但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也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例如他的《石壕吏》所表现的真实，是从同类中许多事实提炼出来的精华，它是典型化了的。……他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严肃，常常要‘新诗改罢自长吟’。他长吟不仅推敲字句，更重要的是充实内容，这就使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达到高峰，而获得不朽的荣誉”。

文学史著，不应当是单纯地复述史料和阐释史料，还应当“有我”，有美学意识，提倡艺术化、文学化的表述。在这方面，陆先生是相当自觉的。综观他的文学史著，表述带感情，无理障，无文字障，语言行云流水，简洁利落，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如《简编》中说王维的作品有三种特点：一是“诗的形式以五言为主”；二是“诗的内容以写自然美为主”；三是“诗的风格取静不取动，重澹远而屏雄放。王维是个‘静观自然’的人，诗中尤喜用‘静’字，因此便影响到作风”。像这样能用精辟简明的语言，从审美的角度概括揭示作家作品的特点的例证，在陆先生的史著中，俯拾即是。

在文学史著述中，如何贯注和体现美学意识，既有时代性，也与著述者的个性有关。今天看来，上述陆先生的认识和做法，不一定完全可取，我们要注意分析。但陆先生在研究和撰写文学史时，十分重视美学意识。这一原则和方法，应当说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继续探讨。

[责任编辑 刘 培]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 (Serial No. 326)

# 真理之勇气

## ——萧涤非先生的学术境界

林 继 中

**摘 要**:萧涤非先生是名闻遐迩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注重从历史的基本事实中认识真理,其平生的治学实践充分体现了他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前期开放式本体研究的成果,《杜甫研究》是后期综合应用鲁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果。从其核心观点"人民性"的阐释中,可感受到其社会良心与巨大的历史责任感。萧先生一生的治学实践表明,他是注重从历史的基本事实中认识真理的,这是一个前后相承没有止境的进程。回顾萧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风范,对此作深刻的反思,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真理之勇气;萧涤非;人民性;历史责任感

世之学者,大抵可分为两类:一是立身与文章异,文不必如其人;一是将其人格力量与社会良心直贯到治学中去,道德文章一索子贯。萧涤非先生(1907 - 1991)即属后者,他在世时被誉为"现代杜甫",便是明证[①]。问题还在于,如何将人格力量与社会良心直贯到治学中去?在"物质消费主义"、"市场至上主义"猖獗之今日,回顾萧先生的学术风范,对此作深刻的反思,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一

钱钟书先生论道德与文章之关系有云:

> 求道为学,都须有"德"。《荀子·正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人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即哲人著书立说之德操也。……黑格尔教生徒屡曰:"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der Mut der wahrheit)";每叹兹言,堪笺"文德"。[②]

黑格尔言简意赅,明乎探索真理之勇,乃文德之首;而荀子"三以"明乎"真理"之所从来,"四不"又强调坚持真理乃学术尊严之所在。真理不辩不明,且易引人坠入盲从;真理而不敢坚持,又如何能"贯"到治学中去?中西两相发明,则道德文章贯通矣!以此观萧,不难明瞭先生之道,就在于有此真理之勇!其平生治学之实践,便清晰地画出探索、坚持真理的轨迹。其中杜甫研究从选题到方法,无不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动态过程。

萧先生对此是自觉的。在一次谈话中,他说:"我为什么'特爱少陵诗'呢?这和我的身世有关。"孤穷的身世使他早早就在感情上亲近那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从他学生时代创作的《人力车行》一诗中,我们直接地感受到他与风诗、乐府之间的亲缘关系[③]。在身世、五四精神与进步诗人黄节先

---

**作者简介**:林继中,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福建漳州 363000)。

① 关于萧涤非先生的文如其人,许多学人已作了生动的记述,可参看萧光乾等编《二十世纪的杜甫——萧涤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中所收廖仲安、任孚先等人文章,北京:华艺出版社,2006 年。

② 钱钟书:《管锥编》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506 页。

③ 萧涤非:《有是斋诗草》,见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7 页。

生三者的综合影响下，他的大学毕业论文选定《历代风诗选》，从此走上批判现实的道路。该课题从《诗经》一直选到清末黄遵宪。先生自己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这番调查，使我看到在中国古典诗人中，反映民生疾苦的，要算杜甫最为突出。"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的现实又不断加深了先生这一情感上的共鸣，"是生活使我接近了杜甫，产生了研究杜甫的念头"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杜甫的重要性到产生研究杜甫的念头，这十六七年间，萧先生并未真正着手对杜甫作系统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尚未找到治杜诗的系统方法。萧先生是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他解读王国维《人间词话》关于做学问的三种境界说：

> 第一种境界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博观群书，确定研究方向的阶段。而当研究方向确定之后，就要真心实意地热爱它，倾注全力地深入钻研，这就是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搞学问，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不行的。而当你下了苦功，对所研究的对象透彻理解、真正把握之后，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取得学术上的成就，这就是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②

研究方向确定以后，还要下大苦功深入钻研，目的就在于对所研究的对象透彻理解、真正把握，进入学术上的最高境界。而要真正透彻理解、把握研究对象，没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是不行的，所以萧先生又说：

> 我不敢说什么治杜诗的方法。如果谈得上研究杜诗的话，那还是解放后的事情。主要是在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特别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之后，才算找到了正确的方法。③

方法论的建立使萧先生的治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国维《人间词话》）。萧先生的《杜甫研究》无疑是其学术上的一座丰碑。许总《〈杜甫研究〉得失探》称："自建国初期迄今，在杜诗研究界事实上还没有一部在观点、方法或规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现"④，当是学界的公论。因此，萧先生是如何以其真理的勇气，通过漫长的实践，"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进入治学的全新境界，便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上引荀子云"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是明乎"真理"之所从来。这是坚持真理的重要前提，使"真理之勇"免乎固执盲从。萧先生一生的治学实践表明，他是注重从中认识真理的，这是一个前后相承没有止境的进程。比之于荀子云云，自然是一种进步。笔者曾在《"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升华——〈杜甫研究〉学习札记》（《文史哲》1992年第2期）一文中，总结萧先生以毛、鲁文艺思想为指导治杜诗的两大重点：一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强调文艺对人民的态度；一是鲁迅主张论文要顾及全篇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然而二者之所从来，都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扬弃、升华与改造。也就是说，萧先生并非将毛、鲁的文艺思想当成"公式"，而是基于他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所认识的历史的基本事实，与之认同。从《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与《杜甫研究》的比照中，不难发现这一事实。

首先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鲁迅的文艺思想是有所区别的。鲁迅更多地代表了"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而毛泽东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五四"虽然打着"反传统"的旗帜，但由于那批倡导者大多数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其教养、知识结构、所处环境等，都使他们与传统文化藕

---

① 以上所引，系萧涤非先生与《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的谈话内容，曾经记录整理发表于《文苑纵横谈》第一期，本文转引自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代前言"，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② 以上所引，系萧涤非先生与《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的谈话内容，曾经记录整理发表于《文苑纵横谈》第一期，本文转引自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代前言"，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③ 以上所引，系萧涤非先生与《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的谈话内容，曾经记录整理发表于《文苑纵横谈》第一期，本文转引自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代前言"，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④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238页。

断丝连。尤其是在治学上，无论胡适、傅斯年，还是鲁迅、周作人，乃至朱自清、闻一多辈，对传统的“考据、义理、辞章”，无不重视。事实上，他们是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参照系，对传统进行甄别、批判，是积极的逆接式继承。因此，我们不妨将萧先生对鲁迅治学方法的继承与对“五四”传统的继承结合起来看。下面即从这一视角，从两个方面阐述《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①]与《杜甫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

## 二

(1)关于“乐府本体研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黄节序指出：“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是从乐府本体研究得来”。又举证说：“抒情一类，谓南朝乐府多男女相思及刻画女性，而汉乐府则描写夫妇之情爱，盖由儒家思想之一尊时期，其男女之间，多能以礼义为情感之节文，引《公无渡河》、《东门行》、《艳歌何尝行》、《艳歌行》、《白头吟》、《陌上桑》诸篇以为证。因此并证明《孔雀东南飞》一篇，必产生于儒家思想一尊之世，决不能作于六朝，此论真从乐府中窥见大义者也。”对“乐府本体研究”的肯定贯穿整篇审查报告。从举证中，我们不难明瞭这种本体研究并非西方“新批评派”那种排除“非文学因素”的“本体论批评”，而是以作品为中心，开放式的批评方法。这只要看黄节所激赏的论南朝乐府一篇(即该书第五编)，的确是“从史事上证出诗歌，从诗歌证出地理，从地理上考见政治，从政治上窥及制度与当时人民之风尚及思想”，环环相扣，其本体性、开放性不证自明。虽然此法源自传统的知人论世、以史证诗及考据、义理、辞章，但由于治学观念的更新，传统方法在萧先生手中获得新生，走向整体研究。即以训诂一项言之，该书第二编第四章关于《孔雀东南飞》产生年代之论述一节，首先以本序为依据，并置诸文学史，“以大观小”云：

> 《孔雀东南飞》之产生，其必具之条件有二：一为文人乐府之盛行，一为五言诗体之成熟，序云“建安中”，盖适当其时。此本绝作，如谓建安时代不能产生，则纵推而下之以至于六朝、隋、唐、明、清，亦无能产生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 116 页)

是为大判断。此后即以训诂为主要手段剖析毫芒而证成之。兹举二例，以明其余。如“足下蹑丝履”一句，或以为丝履乃六朝时物。萧先生则引曹操《内诫令》：“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证成丝履于建安时已自有之(《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 117 页)，一锤定音。或曰“进退无颜仪”，“仪”字非用古韵，“仪”字由歌入支，始于魏文帝曹丕。萧先生引东汉李尤《良弓铭》：“弓矢之作，爰自曩时。不争之美，亦以辨仪。”又引东汉蔡邕《济北崔君夫人诔》：“世丧母仪，宗殒宽师。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则“仪”字由歌入支不始于魏文明矣(《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 117 页)。将一字一词置于同时代之语境中，注重语言的时代统一性，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如是考据训诂，如板上钉钉，不可移易。

以上本体研究的方法，《杜甫研究》乃嗣其响。《杜甫研究》开篇就引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②]在上文所引萧先生的谈话中，先生认为：“至于注解杜诗的具体方法，我认为最好是‘以杜解杜’。”这些都表明先生对其本体研究至是更为自觉、系统。也举二例以为典型：一是“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一句，竟至三论。就因为这个小问题“已牵涉到全诗”，“因为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杜甫的全人”(《杜甫研究》第 233、240 页)。二是对杜甫之死多处的反复考辨，原因同样是“因为这关涉到杜甫的全人，关涉到杜甫的整个精神面貌”(《杜甫研究》第 36 页)。而考据训诂仍然是先生论证之利器，如“畏我复却去”一句中的“却”字，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列举八种讲法，萧先生仍以为不完全，并且张相把这一句的“却”解作“仍”、“还”，欠准确，萧先生经考证后认为“这和他所根据的

①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下引此书，只于文中标注页码，不另出注。

② 萧涤非：《杜甫研究》(修订本)，济南：齐鲁书社，1980 年，第 4 页。下引此书，只于文中标注页码，不另出注。

错误版本有关”，进而指出：

> 我以为这里的“却”，当作“即”字讲，也就是“就”的意思。“复却去”等于说“复即去”。“却”字可作“即”讲的例子，杜诗中便有，如《新安吏》“眼枯即见骨”，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草堂诗笺》都作“眼枯却见骨”。可见“即”与“却”，意本相通。唐传奇《霍小玉传》：“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相迎，相见非远。”所谓“却”到华州，等于说即到华州。又唐代变文《难陀出家缘起》：“有事谘闻娘子，请筹暂起却回。”筹是一种厕筹，意思是说等我解过手即回来告诉你。这些也都可以为证。（《杜甫研究》第237页）

可见，开放的本体研究是《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与《杜甫研究》一脉相通的治学方法。

(2)关于“知变迁”与“平民文学”。萧先生于乐府研究知变迁、洞悉源流，为黄节所首肯。据刘文忠回忆：“萧先生在1982年济南南郊宾馆《文心雕龙》研讨会上，做过一次即兴的发言，他说他特别推崇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的两句话：‘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说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自始至终地体现了这两句话的精神。”[①]可见《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颇得力于传统的文学史观。然而先生于1983年为该书再版所写的后记中又引用鲁迅《门外文谈》云：“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②]事实上该时代无论鲁迅还是胡适，都各有其“平民文学”的文学史观，应是学界的思潮。萧先生正是以此改造、重构了传统文论中“通变”的内涵，突出了“平民文学”在通变中推手的作用[③]。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还郑重指出：“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要不得的。”(《鲁迅全集》第6册，第102页)鲁迅这一“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使之超越了同时代的“平民文学”论。萧先生以其深沉的历史与社会的责任感，于此颇有会心。兹以《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五编《南朝乐府》为例，略作分析。

刘文忠曾指出，萧先生使用《诗大序》所提出的“风雅正变”的观点说乐府之变迁[④]。然而，这种“使用”的过程，更是改造、重构其内涵的过程。该编第一章《论南朝新声乐府发达之原因》，开篇即对郭茂倩《乐府诗集》论南朝乐府哀淫靡曼、流而不返之原由乃“不能制雅乐以相变”云云，表示不同的意见，认为“原因尚不如是之简单也”，而应当“从当时社会各方面，一究此种艳曲发达之根源”。随后又从地理、政治、风尚、思想、制度五个方面进行考察、论析，归纳出“此种恋歌过剩之产生，实出于一不健全不景气之社会”的结论。其中论析，实得力于新学，如其论“因于地理者”，不但论天然环境，更论经济条件，引李延寿《南史》云其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萧先生进一步推论道：

> 况南朝民间乐府本不如两汉之采于穷乡僻壤，而乃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者。如《吴歌》盛行之建业，《西曲》发源之荆、襄、樊、邓，前者既系当日首都，后者亦为重镇。今观其歌词，《吴歌》无论矣，若《西曲》，则其中有《襄阳乐》焉，有《石城乐》焉，有《寻阳乐》焉，有《江陵乐》焉，皆以城名为曲调之标志，其为出于城市，实至显而易见。（前引《南齐书·王僧虔传》“民间竞造新声杂曲”，其所谓“民间”，实即城市。）
>
> 城市生活，本近声色，而当南朝时，因官吏之贪聚，世家之挥霍，与夫伽蓝之建设，城市经济，益形膨胀。是以四方虽穷，而城市恒富，百姓虽流离痛苦，而城市居留者则正不妨于“桃花绿水

① 刘文忠：《萧涤非先生在乐府文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为纪念萧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而作》，萧光乾等编：《二十世纪的杜甫——萧涤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② 《鲁迅全集》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95页。下引此书，只于文中标注页码，不另出注。

③ 参看赵睿才：《平民灵魂历史的提炼与浓缩——读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该文收入萧光乾等编《二十世纪的杜甫——萧涤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一书，对民间文学在该书中的核心地位有评论。

④ 刘文忠：《萧涤非先生在乐府文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为纪念萧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而作》，萧光乾等编：《二十世纪的杜甫——萧涤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第122页。

之间，春风秋月之下”，度其爱恋生活。其发为情词艳曲，盖亦理所固然。则初不必如《南史》所称，有待于宋、齐之盛世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198、199页）

从策源地与经济的根本，言两汉与南朝民间乐府之区别，其深刻性自然为古人乃至时辈所不能及，也是日后先生能认同、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可见萧先生对南朝民间乐府的认识是从历史的基本事实的清理中得来，是从乐府本体研究，尤其是与两汉民间乐府的比较中得来，所以其评价是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多有发明，兹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其中体现的学者良心。诚如鲁迅所告诫：“由历史所指正，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子，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他利导，却并非迎合”，这才是对大众及大众文学真正的关爱，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责任感。萧先生对南朝民间乐府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推手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同时沉痛地向读者指出：“此种恋歌过剩之产生，实出于一不健全不景气之社会。”（《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204页）该编第二章结尾又感慨言之：

> 则南朝亦为乐府史上最浪漫与最空虚之时期。唐人《新乐府》之发生，其机兆盖伏于此。又自是而后，乐府始完全与政治，社会脱离关系，仅为一般赏心悦耳之具而为情歌艳曲所占领，大有非此不足以被诸管弦之势。唐人之律绝，五代宋人之词，元明之曲，皆是也。其有歌咏民间疾苦之作如汉乐府者，非惟无入乐之机会，（唐人《新乐府》，实皆未入乐之诗耳。）并其入乐之资格而亦丧失之。每忆欧阳修嘲范希文为“穷塞主”之言，辄不禁怃然。凡此，皆乐府变迁之迹，亦吾国诗歌升降之所由，而南朝乐府实有以为之关键者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242页）

细味之，萧先生对文学史上汉乐府歌咏民间疾苦精神的边缘化忧虑之情可掬。正是这种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促成萧先生从“吾国诗歌之升降”的大义出发，开始其《杜甫研究》。这是《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之后继以正面倡导吾国诗歌优秀传统，“发大汉之先声”的力著。

## 三

如果说，“五四”是知识分子精英接受外来的科学、民主的价值观，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那么，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是直接对知识分子本身进行改造，从而打造一个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全新的文化。与之相应，文学遗产也必须“古为今用”，古代作家也要看其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其作品是否“源于生活”。这不止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事实上，它是重建整个文艺与意识形态把握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萧先生与同代一批跨越新旧社会的前辈学者为之付出心血，有得也有失，并为之付出难以言说的沉重代价。今天回顾这一艰难历程，设身处地，不能不为之动容。

萧先生于1951年冬曾写下一首诗：

> 起死回生手，翻天覆地人。二年刚解放，万事尽鲜新。
>
> 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永为民！

首二联已表明他的认识是从历史的基本事实中得来，不可移易。所以他将此诗置于1959年出版的《解放集》卷首，二十六年后又置于《乐府诗词论薮》前言之结尾。这便是先生自觉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深厚的情感基础。再者，如上文所叙，此前先生已具备认同、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基础，二者相洽，便使其以新方法治杜颇能得心应手，融会贯通。然而，正因其对真理的认识是从历史的基本事实中得来，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不能不有自己的理解。容下文从“人民诗人杜甫”这一核心观点切入试作分析。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个神圣的词，似乎只有“工农兵”才够格称为“人民”。但长期以来，一般

地说,“人民”只不过是指大众、百姓、庶民,是一个与官僚贵族相对而言的概念,是多种社会阶层的混成体。对古代诗人而言,只要肯为广大的老百姓说公道话,为民请命,就具有“人民性”,就有资格称之为“人民诗人”,它与现当代意义上的“人民性”有所区别,与“人民代表”、“为人民服务”更不是一回事。如果一个民族的知识阶层,几千年来连一个人民诗人也未曾出现过,这只能是一种民族的悲哀。“反传统”最力的鲁迅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为民请命就是替老百姓说话,就是他对人民的态度。萧先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杜甫研究》“再版前言”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欠劳动人民的血汗债最少、而为劳动人民说的话却最多的诗人,不能不推杜甫。正是基于这一客观事实,一九六二年我曾为《诗刊》撰写了一篇以《人民诗人杜甫》为题的纪念性文章。”(《杜甫研究》“再版前言”第2页)因其基于客观事实,故能持之弥坚。无可讳言,在那形式主义猖獗的年代,“人民性”曾经被许多人当作一种标签,用以掩盖其识见的浅陋。随着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深化,“人民性”又与“阶级性”重合,与“阶级斗争”挂钩,乃至成为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批判的利器。然而就在这种不堪回首的艰难环境下,萧先生仍能以其真理之勇气,坚持着“论从史出”,尽量依据历史的基本事实去发掘杜甫的人民性,取得正面的效果②。

萧先生发掘杜甫人民性的一大特点是:其一端与“生活源泉”相连系,另一端与“人道主义”相连系,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评价古代作家的坐标。在《杜甫研究》的《杜甫作品的人民性》一小节中,他明确指出:“由于杜甫的生活,是一种艰难的也是接近人民的生活,由于杜甫的思想,是一种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其核心的思想,当然,也由于杜甫接受了文学遗产的优良传统,这就自然而必然的形成了杜甫作品中丰富而明显的人民性。”(《杜甫研究》第68页,重点号为笔者所加)生活、思想、传统三者是构建杜甫作品人民性的要素,从而超越前期“平民文学”的论述。

关于杜甫的思想,萧先生在《杜甫研究》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一小节开首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杜甫的基本思想。”(《杜甫研究》第49页)先生这一观点历经批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沙暴式的“批判”,却持之弥坚,并在再版前言中对此作了更为明晰的阐释:

> 人道主义是个新名词、舶来品,它的出身、来历等我也是知道的。但我根本不是从这些出发,不是从它的特定的身份出发,而是从它的一般涵义,从它的带有普遍性的尊重人、爱护人的总的精神出发来借用它的。……而且我以为这种精神,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就早已有了,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杜甫研究》“再版前言”第3-4页,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请注意“尊重人、爱护人”的释义,它既与俄国民粹主义的“人民性”有区别,也与当年“人民性即阶级性”的观点有距离。它是从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与文化传统中概括得来,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但孔、孟的“仁学”、墨子的“兼爱”、宋儒的“民胞物与”具有这种品格,而且司马迁、陶渊明也具有这种品格,而“表现得最充分、最突出的还是杜甫”(《杜甫研究》“再版前言”第4页)。正是依据这一观点,萧先生重新诠释杜诗,充分地利用千年以来无比丰富的杜诗学资源,以新观点刮垢磨光,逐一显露出杜甫的真性情,总体地形成杜诗的主旋律。谨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为例,以见一斑。

最早揭橥该诗崇高感的是王安石,其《杜甫画像》称:“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青衫老更

---

① 鲁迅:《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② 关于萧先生在当年所承受的压力及其抗争,任孚先《二十世纪的杜甫》一文追忆道:“记得一九五九年,学校中掀起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萧涤非先生自然也是被批判的重点之一,集中对他的代表作《杜甫研究》进行了批判,说他‘美化’杜甫……为此,萧涤非先生郁闷在胸,终日默不作声。有一天,他实在忍耐不住了……就在给我们讲古代文学时,在黑板上大笔书写:‘唐代最伟大的诗人黄巢’,然后便大讲黄巢的‘革命业绩’,讲黄巢的代表作《菊花诗》如何伟大,思想性如何深刻,艺术性如何高超。整整讲了45分钟,在下课时说:‘这首诗是不是黄巢的呢?尚待考证。’便愤愤然拂袖而去。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山大老校六号楼的走廊里,贴满了质问萧涤非教授的大字报。”(载《济南日报》1991年5月14日)《菊花诗》是不是黄巢作的?这才是基本事实。而要坚持这样的基本事实在当时可能招来灾难,对今天的人们也许匪夷所思。

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王氏从烂熟于胸的千百首杜诗中独赫然标举此诗者，是从其儒学理想出发，以"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去认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重点在"济世"。此后历代论杜，大都滥觞于此①。萧先生肯定了王安石的看法，但他进一步指出："他(指杜甫——引者)常'自比稷与契'，他也要治国平天下，但他却不像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出现。"并举《凤凰台》诗为佐证，指出："一部杜诗，便是杜甫'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的实践。"(《杜甫研究》第50、51页)他认为杜甫已超越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在《又呈吴郎》的精彩分析中真切地体现了杜甫这种"己饥己溺"、"庶往共饥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精神(《杜甫研究》第248、206－208页)，并指出白居易《新制布裘》"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是从杜诗得到启发，但深度却不如杜，"白只是推己及人，杜甫则是舍己为人"(《杜甫研究》第50－51页)。"在'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他还是'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并宁愿以'冻死'来换取广大饥寒无告者的温暖。"(《杜甫研究》第250页)这便是杜甫人民性中的真挚性。而这种己饥己溺的"真性情"并非从"克己复礼"中来，"只有通过这种生活实践(指杜甫与百姓共患难的生活——引者)，杜甫才可能和人民发生血缘关系"(《杜甫研究》第84页)。杜甫与白居易于此见高下，杜之"人道主义"与儒之"济世"理想亦于此见分别。萧先生从生活、思想、传统多视角全方位地考察杜之人民性的方法，是鲁迅顾及全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与毛泽东注重作家对人民的态度及其作品是否源于生活的文艺思想的综合应用。像这样成功的辩证，在《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中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具体分析使其人民性论述有血有肉。顺便提及，《杜甫研究》初版是将选注纳入下卷的，如果只看上卷则易误以"概括"为"割裂"。如果将今本二书合读，就会大大减少这种误解。须知《杜甫诗选注》乃熔笺注、年谱、分期、评点于一炉，是《杜甫研究》上卷的"互文"。即以夔州诗为例，所选61首，占全部选诗五分之一强，其中对《秋兴八首》组诗钩深研幾之剖析，有力地印证了上卷《杜甫作品的艺术性》一节所提出"杜甫是一个有意识的大力追求艺术技巧的诗人"的论点。其中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之关系，自然形神一贯、骨肉停匀，岂有"割裂"之弊！而萧先生对夔州诗之真赏识亦自见矣。

事实证明，将"人民性"用诸杜甫这样杰出的古代优秀作家身上，是合适的，其探索是宝贵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领会所倡"人民性"背后透出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与历史责任感，是从"吾国诗歌之升降"(上引)的大义出发为吾国文学优秀传统树一正面形象的苦心。先生并无意以"人民性"甄别一切古代作家，只要平心静气细读其参与编写并执笔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四编②，就得承认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出版的最接近历史基本事实的撰述了③。从"文革"后《杜甫研究》再版前言中，我们已看到先生深刻的反思；从先生以耄耋之年犹发大愿要完成《杜甫全集校注》，并创循杜甫行踪考察杜诗的杜诗学新方法上看，如果天假以年，坚信先生的杜甫研究必定会有一个新的进境。

吾爱吾师，更爱其真理之勇气。

[责任编辑　渭　卿]

① 当然，也有些论者认为"济世"还有个"资格"的问题，如明代李沂辑《唐诗援》，引申鸟盟语认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发此大愿力，便是措大想头。"作为村野匹夫的杜甫，如何比得"稷与契"？而朱熹、王夫之则直接认为杜甫只是叹老嗟卑。他们的意见与王安石相左。请参看拙文《星宿之海：杜诗中的道德情感》第二节，《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4期。

② 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③ 黄炽《刚正耿直的杜甫专家萧涤非教授》一文中有关于萧先生在极左时代面对学生的责疑，对李后主苦心"回护"的记述，读之可以帮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才不至于"站着说话不腰疼"。黄文原载《山东大学报》2005年8月31日，收入萧光乾等编：《二十世纪的杜甫——萧涤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6年，第214－217页。

# 殷孟伦先生的学术成就

刘 晓 东

**摘 要**:殷孟伦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古代文学专家。他学承章(太炎)黄(侃),治学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由经学、史学而兼词章之学,形成层次分明、诸科有序、浑然一体的系统。先生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有《果赢转语记疏证》、《〈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简释》、《尔雅郭氏纂疏》等著述;古代文学方面,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等成绩;考据方面,有《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等代表作。

**关键词**:殷孟伦;语言文字学;古代文学;考据

殷孟伦先生(1908－1988),字石臞,四川郫县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古代文学专家。先生学承章(太炎)黄(侃),博纳新知,卓然为一代学人。"文革"结束后,笔者有幸考入先生门下做研究生,对于先生精深博大之学,虽未能瞻其涯涘,不过聆诲受教,自然也有点"如是所闻",近承《文史哲》杂志之邀,命写一篇绍介先生的文章,因此不揣椷昧,谨撰小文。自知识既窥管,述多隔搔,也只好如此罢。

## 一、生平经历

殷孟伦先生早年在成都读书,当时四川学风颇盛,廖平之后,若林思进(山腴)、龚道耕(向农)、向楚(仙乔)、赵世忠(少咸)、蒙文通(尔达)、庞俊(石帚)、向承周(宗鲁)、刘咸炘(鉴泉)、祝同曾(屺怀),诸学者竞爽于蜀中(刘师培于民初也曾一度在蜀授教),其中赵少咸先生为当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学家,对殷先生格外赏识,关系最密,影响也最大。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殷先生周游于这些学者之间,或直接奉手,或间接熏陶,于是打上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色,确立了一生治学的起点定位。此后,殷先生力求深造,慕明趋光,遂考入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正式向黄侃先生拜门称弟子。此时学中更是名师云集,群星交辉,先生又问学于汪东(旭初)、汪国垣(辟疆)、吴梅(瞿庵)诸先生,复请益于章太炎先生,于是学术视野愈益开阔,学术趋向愈益明确,学术思想也逐渐成熟。毕业后,为进一步汲纳新知,于是在 1935 年又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做盐谷温教授的研究生。在此期间,先生翻译了 L·R·Palmer 的《现代语言学导论》和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①。1937 年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兼职于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3 年调入山东大学,直至 1988 年去世。在此期间,先生一直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语言学会理事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等职。当时山东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之所以在全国高校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与殷先生的贡献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作者简介**:刘晓东,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此书有上海正中书局 1942 年版。

## 二、知识结构与治学特点

晚清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在所附《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中论及治学次第，云："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以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①]这是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总结，也是对此后研究国学者所开示的取径法门。殷孟伦先生作为在当时国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又受学于章黄一系，自然是循此而行，形成了他知识结构中的层次性与浑然性。殷先生一生服膺于顾炎武、王念孙、段玉裁诸清儒之言，顾氏云："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②]王氏云："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③]段氏云："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④]所以殷先生早期从赵先生学时就对"小学"尤其是音韵学有了很专精的研究。继从黄先生学时除了精读《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尔雅义疏》进一步接受音韵训诂学外，开始对群经下大功夫。先生自述他从黄先生求学时的情况时，说："先生让我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裁成，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先生于是告我，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⑤]这是殷先生知识内在结构与层次。先生又自言："三十年代初，我侧重于诗歌文辞之学，四十年代起，致力于语言文字学。"[⑥]则是由于个人兴趣及客观需求形成的次序，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这样，先生治学，先立核心，再将知识层层积累，范围一步步拓展开去，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诸科有序、浑然一体的系统。先生曾对我讲：现在学科愈分愈细，自然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趋势，而且易于出成果，可是也造成了一些弊病。搞语言的不通文学，搞文学的不通历史，甚至搞唐宋文学的不通六朝，稍微越出一点自己的方向范围便出错误甚至笑话。这种严重的知识缺项使整体知识不到位，是需要补偏救正的。先生常讲"颛守与兼揽"（即精与博）的关系。先生说：能颛守而不能兼揽，则失之于"陋"，就会成为庄子所说的"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能兼揽而不能颛守，则失之于"杂"，又会成为荀子所说的"闻见杂博，而倜然无所归宿"。先生治学，能将各科知识相互贯通，思路相互启悟，资料交互运用，方法相互借鉴，就是因为将精与博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得当。记得有一次先生见我拿着一本某书的"索隐"，就对我说："索引只能够为做学问提供方便，但绝不能拿它来做学问。有的人写文章，看起来旁征博引、头头是道，似乎很渊博，但一经深究，却肤浅之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资料大都是从各种索引或辞书中转引来的，有的把意思都弄错了，原来他根本就没从头到尾读过那部书。"又说："做学问，自己肚子里总要有那么几部不需要索引的书才行。"现在都使用电脑了，连"索隐"都有些过时了，先生这些话，更值得铭记。

## 三、学术成就

殷先生作为一代博雅的通人，成就是多方面的，大致归纳一下，从语言文字学、古代文学与考据三方面谈一谈，而且只能从其代表性的著作略作一下述评。

---

① 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1页。

②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音学五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③ 王念孙：《说文段注序》，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④ 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05页。

⑤ 殷孟伦：《忆量守师》，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39页。

⑥ 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序》，《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

(一)语言文字学方面

孟伦先生早年,曾编有音韵学讲义,多承黄(侃)、赵(少咸)之说,取材丰富,条理分明,对汉语音韵学的传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3年,《安徽丛书》第二期收录了清代学者程瑶田的《果蠃转语记》,先生于1943年《四川大学集刊》上发表了《果蠃转语记疏证》的长文(1985年出版《子云乡人类稿》时,只收录了该文的《叙说》部分),以精湛的音韵学知识和丰富的文献例证,严谨地把握着音转的规律,对程瑶田之文作了详尽深入的阐发。按清儒以音转贯通义训求得名之源的专文,以王念孙《释大》最有代表性,但王氏仅取单名,而程氏之作则专取谜语,"华夏之语,单复兼行。单以立名,复以广用"①,单复双究,始为全面,故二氏之文,相得益彰。殷先生发现,程氏之作,其音转理论本于戴震《声类表》,于是以戴释程,以程证戴,"举戴表以律程论,依程记而张戴表"②。这样,一方面证明了程氏之说皆符合戴氏的音转理论,同时另一方面也就证明了戴氏理论在具体运用中的科学性。从而把以双声叠韵为主要形式的复音词之间所隐藏的音义关系发露无遗。我们现在常用的工具书如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往往从音转上联系解释字面不同的联绵词,但多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研读一下殷先生此文,那么对古代联绵词自然会有更深入的认识、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广泛的拓及。

1957年,先生在《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简释》一文。这图乍看起来确实复杂费解,尤其是当等韵学发展得愈来愈成熟,愈来愈精密之后,人们也就更少去关注它了。清代戴震写了《书玉篇卷末声论反纽图后》③,不过他的目的只在于说明"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按:指孙炎),并非出自神珙,并没有对此图本身作任何研究性说明。及至江有诰,在他的《等韵丛说》中对此图才作了分析和解释。虽说要言不繁,可是确实过于简略了,没有进行全面的阐明。先生撰此文,对图式的结构、概念的内涵、方法的原理、目的的确认,一一作了极为深入细微的阐发,破千载之迷雾,指明此图是"根据双声叠韵取音的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的产物"④,"是一种简易的熟练反音的方式"⑤,在汉语音韵学发展过程中给予了一个准确而又合理的价值定位,填补了汉语音韵学史中的一个空白。

先生晚年,尤多致力于训诂学,撰写了一系列这一方面的论文,比如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等作了专书研讨。清代"段王之学"已形成了一个有理论、有方法、有效验的学科,将汉字形、音、义三元素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十分透彻。他们的成就已经为"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奠定了实绩性的基础,已使"小学"从"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可能和必然。清末章太炎先生之所以正式将"小学"改称"语言文字学"⑥,主要就是因为有以段、王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的实际成就。因此对他们的著作抽绎其理论和方法,归纳其原则和条例,这对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传统语言文字学是极为必要的。先生在这些论文中,发覆表微、钩深启蕴,不是简单地作价值评判,而是致力于探求他们的研治理念与研治方法,从中发掘出了具有启悟性的、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语言文字有指导意义的元素。同时,先生还撰写了《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等文章,对"训诂"这一古老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承"故"融"新",在对前人成就的总结和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构想,为"训诂学"今后的发展取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尔雅》一书,更是先生专精研治的典籍。《尔雅》一书的价值人所共知,这里不必费辞,需要说明

① 殷孟伦:《〈果蠃转语记〉疏证叙说》,《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64页。

② 殷孟伦:《〈果蠃转语记〉疏证叙说》,《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71页。

③ 此文见戴氏《声韵考》卷四,又收入《戴震文集》卷四中。

④ 殷孟伦:《〈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简释》,《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09页。

⑤ 殷孟伦:《〈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简释》,《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23页。

⑥ 1906年章氏曾撰《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作为《国学讲习会略说》之一部分,发表于《国粹学报》上,后删定为《语言缘起说》收入《国故论衡》卷上,故不见此语。

的是，先生精切地认识到《尔雅》的性质，一方面“《尔雅》之书，实依他起，必附诸经籍，其用始显，反之则无用”①，另一方面“它又总结了曾经行用过的古汉语的词语，加以类聚群分，勒成专书，这便为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勾画出了一个大的轮廓。惟其如此，这就使《尔雅》由主要以服务于古代文献的阅读为目的的著作，进而成为独立研究词汇这一学科的开端的著作”②。明确提出，《尔雅》既有它的附属性又有它的独立性。这样，对《尔雅》的研究必然要一方面以群籍证明其义训，另一方面又要以其义训来解读群籍，进行双向求证，彼此互验。同时又要以音贯义，通过音同、音近、音转的途径来探求义训的相关与文字的相假。实际上，乾嘉以降研究《尔雅》的学者已都遵循这种法则，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已不能惬意。以最通行而影响最大的郝懿行《尔雅义疏》来说，郝氏对《尔雅》中文字的声韵部类的归属和转变的规则都欠精当，或失于疏误，或失于拘挛，以至于王念孙、黄侃都对其书大加删订，这是其一。其二是取证材料也不甚完备，后继研究者无论是对文字的校勘还是对佚说的辑存，都有新的成就，取证材料愈益广博，精见卓识层出不穷。然而都散见于各家著作，未能汇采以全面疏释本书。先生则全面搜集了郝氏之后直至近代各家之说，博系其通，细别其异，取精用宏，撰写了《尔雅郭氏纂疏》一书。这不同于“汇纂”、“诂林”之类的编辑类著作，而是理法具备、断制精确、有伦有脊、自成系统的一部义疏式的典籍，可以说是研究《尔雅》集大成的巨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后几卷尚未写定，稿存于家，尚待整理，只以“举例”的方式发表并收入在《子云乡人类稿》中。

（二）古代文学方面

殷先生在古代文学方法的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这是先生早期（1935年）的著作。明代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在所收的每一家文集之前，均撰写了该家《题辞》，采摭故实，阐发特色，对各家的文章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述评。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文学观点，而且文风洒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只是因为散列于全书，不便于给读者一个整体观。先生将各篇“题辞”聚置别录，成一专书，为之作了极为详备的注释，引证了大量史料，语语核其指归，事事发其根据。张氏重在“评”，先生重在“证”，以文献辅证文学，两者俱彰。资料繁富得当，有人称为“碎金遍地”，成为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必读之书。

先生又曾撰《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一文，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切入，探讨了萧统之所以不选经、史、子部类文章的原因，重要之处在于指出“文章”与“文学”概念的不同，确认《文选》是“文章”选本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得出了“《文选》是一部在当时有先进文学观点的存留到现在的文章选本”的准确结论③。这对于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中注意避免不对应概念，是有普遍意义的。

（三）考据方面

这里仅举先生在专书考据和专题考据的两个典型例子。

在对专书考据方面，先生在1963年发表了《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一文，对近代在语言学界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署名莫友芝的《韵学源流》一书作了深入全面的考查。先生揭示出此书68处取材的来源，结合莫氏的学养，明确指出莫友芝当不是此书的作者。其实，《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已对此书作出过质疑性的述评，认为像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钱大昕等人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友芝概不援引，未明其意”④，云“莫氏声韵之学本不精深，如欲撰述此书，但当搜辑旧说排比有序，稍加按语，其功已大，不必自作聪明擅定取舍也”⑤，不过认为此书应是莫氏《声韵考略》的初稿。先生

① 殷孟伦：《论治中国语言文字之要籍》，《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43－44页。

② 殷孟伦：《从〈尔雅〉看古汉语词汇研究》，《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61－62页。

③ 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88页。

④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51页。

⑤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51页。

此文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编者知道莫氏著作有过《声韵考略》这样名称，所以嫁名莫氏，以图为世所重”[①]。我们说，此书作者是否是莫氏已不是十分重要了，先生通过内证法，由精确的文献事实判断而自然得出的对学术价值判断的重新认定，这才是重要的。

在专题考据方面，先生在1974年发表了《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文史哲》1974年第4期)一文。此时尚在“文革”期间，这篇文章的产生是由于读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所涉及李白出生于碎叶城而诱发的，问题的发现却是通过分析欧阳修撰《志》的文例而对《新唐书·地理志》中一个句读的正确认知。先生说，对于一个字的“理解属上或属下，不仅是文义问题，关系到历史的客观实际不容颠倒错乱，关系至为重大”[②]。句读一准确，文意便讲通了，文意一讲通，问题也就显示出来了。先生征引了大量文献资料，驳正了历史上各种误解，揭示出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唐有两碎叶城”、“碎叶镇即焉耆”说的错误，得出“碎叶在中亚，焉耆无碎叶”的结论[③]，从而解决了一个历史地理领域中的大问题。而历史地理学本不是先生的主研方向，但是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论文，足见先生学问的渊博了。

以上只是对先生学术成就极粗疏肤浅的概述，如果要全面深入地评述先生学术思想、方法和价值，那就应当分别针对各个方面作专题式的探讨和阐发，断不是像这样一篇戋戋小文所能完成的了，所以，就让它勉强承担一下作为纪念的任务罢。

[责任编辑 李 梅]

① 殷孟伦：《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441页。

② 殷孟伦：《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460页。

③ 殷孟伦：《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子云乡人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469页。

# 高兰先生朗诵诗与教学研究及其人格精神

吴 开 晋

**摘 要**:高兰先生是著名的朗诵诗人和现代文学史家。在抗日战争中,他的朗诵诗号召人们起来保卫国土,赶走侵略者,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因而他被人们尊称为"钢铁的喉咙",是抗战诗歌史上的代表性诗人。他的名作《哭亡女苏菲》是其代表作。他对朗诵诗和如何进行诗朗诵,具有系统完备的理论。他所推动的诗朗诵运动被茅盾先生称为诗歌的再解放运动。此外,他在李后主研究和现代诗歌的研究与教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展示了独特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高兰;朗诵诗;教学研究;人格

在纪念山东大学 110 周年华诞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忘记,在那抗日烽火中,高声呐喊,激励中国人民投入抗日战争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朗诵诗人高兰;同样,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为山东大学贡献了三十八个春秋,呕心沥血培育新中国建设人才的教授高兰;当然,人们更不应忘记,一生坎坷,在充满荆棘的崎岖道路上蹒跚前行而对理想追求至死不渝的悲剧性人物高兰。

## 一、震撼神州的诗朗诵及完备的朗诵诗理论

1. 对朗诵诗的卓越贡献

高兰(1909－1987),本名郭德浩,原籍黑龙江省瑷珲县,出生地是辽宁省锦州市一个叫虹螺岘的山村。三岁丧父,继而丧母(母为达斡尔族人),后在齐齐哈尔一个族叔家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中学毕业后,考取燕京大学国文系。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感受到国破家亡之痛的他,开始在他所主编的《京报》副刊《金乐》上发表诗文,痛斥黑暗的旧中国,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妥协不抵抗政策,号召人们投入抗日斗争,他还参加了北平青年学生卧轨南下向政府请愿要求抗战的爱国运动,从此,便把自己年轻的身躯投入到空前壮烈的抗日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中去了。

1932 年,高兰从燕京大学毕业,但找不到工作。不过,更让他忧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于是他毅然参加了当时设在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的工作。在这儿,他了解了许多东北抗日军民,为保护家乡、保卫国土,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他后来所写的报告文学:记中国的夏伯阳式的人物"天照应"牺牲的报告文学《记天照应》和受到广泛好评的朗诵诗《吊天照应》,即是这段生活的记录,这也是先生以朗诵诗为武器投入抗战的原因。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枪声,更激起了青年高兰满腔的悲愤和抗日的激情,在全面抗战的情势下,他携妇将雏,历经艰辛,长途跋涉到了当时的抗战大本营武汉,从此开始了他作为朗诵诗人的战斗生涯。1937 年的 10 月,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由著名演员王莹女士朗诵了高兰先生创作的朗诵诗《我们的祭礼》,诗人高呼:"我们献上了这祭礼——抗战! /这里有血、有泪、有火、也有光/这里有生、有死、也有光荣的创伤,/这里有战斗者钢铁般的誓言,/这里也有永恒不

**作者简介**:吴开晋,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减求生的烈焰。”[①]当时会场群情激昂，万头攒动，有不少人激动得流下热泪。据臧克家先生回忆：“这首诗是作为代祭文在大会上朗诵的，反响很大，当时高兰先生被誉为钢铁的喉咙啊！”[②]著名诗人穆木天在读了这首诗后说：这是一首很好的诗，它解决了诗歌朗诵问题之谜，“更使我特别高兴的，就是使我认识到一位前途远大的新的诗人”[③]。此时，高兰在武汉发表了报告文学《记天照应》，第一次用了“高兰”的笔名，这是因看到墙上悬挂着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合影受启发，而各取其名字中的一字而定。接着又发表了朗诵诗《吊天照应》，影响更大。穆木天又称赞这两首是“很好的抗战诗歌”，它标志着“八·一三的文学是长了新芽了”。又说高兰是“新时代黎明期的诗人”[④]。

高兰的朗诵诗，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在汉口《大公报》的副刊《战线》和《时调》，以及《五月》诗刊上发表了《向八百壮士致敬礼》、《武汉，你祖国的心脏》、《我的家在黑龙江》等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朗诵诗，不但受到文艺界的高度评价，而且深受广大读者和听众的欢迎。1938年2月，汉口大路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高兰朗诵诗集》。同年夏，上海杂志公司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高兰朗诵诗》。同年，成都越新书店也出版了《高兰朗诵诗集》。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后来香港、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建中出版社也先后于1940年和1943年，出版过高兰的朗诵诗集。从这些诗集中，可看出高兰对朗诵诗的探索，已逐渐进入佳境，在表达感情、艺术探索上更为成熟。因此，为高兰的朗诵诗集作过序的《战线》主编陈纪滢先生说：“我原是一个顶不喜欢读诗的人，当然谈不到对诗有什么研究，可是现在觉着对诗已经很亲切了。高兰的诗大部分除了他自己以外，我是读他的诗的第二个人，我非常引为荣幸，同时我也相信，他这本诗有一读的价值。我更盼望他这本诗集，能赶快拿到他的家乡——瑷珲去朗诵，早早把这颗坚实的果木，移植在黑龙江上。那时候我们的朗诵诗歌运动也可以大开庆祝会了。民族解放战争是真的胜利了。”[⑤]由此可见，在武汉时期，高兰的朗诵诗所受欢迎的程度。

武汉失守后，高兰全家迁移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是国统区大后方的中心，但普通百姓却没有自由民主，没有光明，更没有生活保障。尤其对一心要为抗战出力、投入救国斗争的诗人来说，更是度日艰难，他虽也曾应聘在几所中学任教，但时常遭到解聘，就在此时，由于贫病交加，高兰先生的长女苏菲因患疟疾无钱无药医治，不幸去世，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还没享受到人间的欢乐就离开父母而去，这对诗人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打击。于是，他在1942年3月，含着血泪，以万分悲痛之情创作出了他的代表作《哭亡女苏菲》。对此诗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朗诵，皆摧肝裂肺，催人泪下。据诗人自己记述：“被朗诵次数较多的是《哭亡女苏菲》，在我自己被邀请的许多次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中央大学的一次。那次我应中央大学学生公社之请，在报告诗歌创作漫谈之后，当场对群众朗诵，朗诵中许多人为之泣下，有的竟痛哭失声，朗诵完之后，许多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不肯离去，那种群情悲愤的情景使我至今难以忘怀。”[⑥]他还说到，济南的李士钊先生向他介绍，有一位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抗日爱国人士赵国柱，在1942年冬，因在集中营读不到报章杂志，竟向难友朗诵了《哭亡女苏菲》，并能全部背诵下来，使难友的悲愤之情达到了高潮[⑦]。另据高兰的好友、诗人臧云远回忆：抗战时，“还有一次全国文协召开的会上，文艺界人士济济一堂。有一个节目，是由张瑞芳同志朗诵高兰的一首控诉旧社会的力作《哭亡女苏菲》。一开始朗诵，她就动了感情，音调真挚幽美，泪花欲坠。

① 高兰：《高兰朗诵诗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页。

② 贺立华：《岁月诗情与人格精神》，《山东文艺评论丛书·诗歌评论卷》，济南：明天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③ 穆木天：《诗歌朗诵和高兰先生的两首尝试》，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④ 穆木天：《诗歌朗诵和高兰先生的两首尝试》，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第36页。

⑤ 陈纪滢：《序高兰朗诵诗集》，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第33页。

⑥ 高兰：《高兰朗诵诗选·前言》，《高兰朗诵诗选》，第16页。

⑦ 高兰：《高兰朗诵诗选·前言》，《高兰朗诵诗选》，第16页。

台下听的人引起了共鸣，受了感染，落下了眼泪，这是一首感人的诗作，一次成功的朗诵。"[①]可见它的感人力量，多么深入人心。正因为这是对反动政府强烈的控诉，是对贫苦人民的巨大同情，因而这首用血泪写成的诗篇，直到抗战胜利后，仍然受到反动政府的压制。又据诗人回忆："1946 年即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5 月 5 日的晚上，在北平师范大学的风雨操场上，我向全校同学朗诵这首诗，朗诵了还不到一半，特务故意捣乱，熄灭了电灯，企图使我终止朗诵，同学们抑制不住悲愤的感情，两位同学高擎明烛，在烛光照耀下，我终于朗诵到底。"[②]诗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使人民激愤，使敌人惶恐，高兰朗诵诗的强烈感染力由此可见。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诗人多次在广场、在客厅、在礼堂、在电台、在舞台上朗诵这首诗，以及《我的家在黑龙江》和后写的《我的生活，好！好！好！》等新旧作品，每次朗诵都激起巨大反响。

2. 朗诵诗的思想艺术成就

对于抗战诗歌，茅盾曾说过："如果'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是对于旧体诗的解放运动，那么，抗战时期中的诗歌运动便可说是对于白话诗的再解放，而这一解放运动，尽管是瑕瑜互见，但就其最主要的项目而言，都是紧紧抓住了大众化的方向的。"[③]而诗坛公认，茅盾所说的抗战中的诗歌运动，在解放区，是以田间为代表的街头诗及艾青等人的抗战诗歌，而在国统区，则是以高兰等人为代表的朗诵诗。高兰的朗诵诗，诞生于那血与火的特殊年代，今天仔细审视仍有其不朽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

从思想价值看，它可以称之为唤醒人们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和战鼓，是痛斥侵略者滔天罪行的宣言，也是为迷途青年人指明前进方向的一盏明灯，同时，也是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专制的形象的犀文。

抗战胜利后，诗人没再写朗诵诗，忙于找工作和养家糊口。但诗朗诵却一直未停。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新生活带来的喜悦，又使诗人拿起笔写了《我的生活，好！好！好！》及一些配合时事政治的诗。这类诗，口号性的语句较多，缺乏感人力量。《我的生活，好！好！好！》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人真诚地歌唱新生活，以发自内心的激情朗诵道："我怎能不笑呢？/我要放声地笑啊！/旧社会二十年的教师生活，/我像蜷伏在寒夜屋檐下，/一只想飞而飞不起来的鸟！"[④]这首诗在山东大学、在省电台、在舞台上曾多次朗诵，受到了好评。

高兰的朗诵诗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不但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而且也和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分不开。现在诗界有一种误解，认为凡是拿来朗诵的诗，必然多半是标语口号式的。其实，只要作为诗，朗诵诗也必须在艺术上遵循诗要形象思维的创作原则，它必须借助于生动活泼的语言，创造出鲜明多彩的艺术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诗人艾青说："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一面又借助于形象向人解说世界；诗人理解世界的深度，就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形象的明确度上。"[⑤]高兰的朗诵诗，其代表作是完全符合这一创作原则的，就是以饱满的感情、生动的口语，去创造多种多色的感人形象。我们再看一段《哭亡女苏菲》中的感人诗句："告诉我！孩子！在那个世界里，/你是否还是把手指头放在口里，/呆望着别人的孩子吃着花生米？/望着别人的花衣服，/你忧郁地低下头去？/我知道你已漂泊无依，/漫漫的长夜呀！你都在哪里？//夜已深，/露更寒，/旷野将卷起狂飚！/雷雨闪电将摇撼着千万重山！/我要走向风暴，/我已无所系恋，/孩子！/假如你听见有声音轻叩你的墓穴，/那就是我最后的泪，滴入了黄泉！"[⑥]诗的第一段，以看着别人吃花生米手指头伸到嘴里，看着别人的孩子穿花衣服忧郁地低下头，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穷苦女孩真切的形象；后一段则以

① 臧云远：《雾重庆诗朗诵小记》，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第 260 页。
② 高兰：《高兰朗诵诗选·前言》，《高兰朗诵诗选》，第 10 页。
③ 茅盾：《为诗人打气》，《茅盾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第 167 页。
④ 高兰：《我的生活，好！好！好！》，《高兰朗诵诗选》，第 112 页。
⑤ 艾青：《诗论·形象》，《诗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第 198 页。
⑥ 高兰：《哭亡女苏菲》，《高兰朗诵诗选》，第 105 页。

狂风雷电摇撼着万千重山作比，表示自己要决心投入斗争的风暴，即便泪洒黄泉，也在所不惜。诗人借助大自然中的巨大意象展现了自己誓死不屈的斗争决心。

3. 对朗诵诗理论的建树

高兰不仅以他的诗朗诵和创作的朗诵诗享誉诗坛，而且对朗诵诗理论的探索也有很大贡献，可以说从"五四"至今，他是进行系统论述朗诵诗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位朗诵诗论家。其他人虽也有对朗诵诗的评述，但只是偶尔为之。而高兰在他1943年写的长文《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及为自己的朗诵诗集写的序言中，对如何进行诗朗诵和如何创作朗诵诗，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无疑，这对今天的诗坛来说，也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在如何进行诗朗诵的论述中，他不仅探索了从古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的诵诗与唱诗，而且对西方各国及苏联的诗歌朗诵活动也作了全面的介绍，给人们增添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诗歌为什么要进行朗诵呢？他认为，诗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朗诵又是一种综合艺术，还有戏剧音乐的成分。但只有通过吟咏讽诵才能得到更多更深切的理解和领会。他还借鲁迅的话说，"诗歌也有看的和读的两种，但终以后者为佳"①。至于如何进行朗诵，他认为在舞台上和在客厅里的要求是不同的，在舞台上不仅要有布景灯光和音乐的配合（要根据诗的内容和朗诵者的表演而定），而且还要有合适的表情和动作（这也要视诗的内容而定）。此外，还应有合适的服装姿态和适当的道具。而在客厅朗诵，则就比较简便了，灯光布景、服装道具就可减免了，不过声音、表情，则一定要适合诗的内容。此外，还有街头朗诵、广场朗诵，因为是露天，地方大，人又多，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能掉以轻心。而其中的关键，就要选择适合朗诵的好诗。对表情、声音的要求，和在客厅、舞台上都大不同，可以适度夸张，但又不要做作和表演过分，总之，一定要能吸引住听众才行。这些，都是作为朗诵诗人高兰的经验之谈。

对于朗诵诗的创作，高兰根据自己的创作体会，又提出了几条重要的原则。第一，是文字通俗化。他说："我们以为诗的能否朗诵，第一就在这文字上的是否通俗化上，既然是利用听觉了，当然以能够听懂为起码的条件。""不过，这里所谓通俗化，口语化，决不是完全去屈就大众，是要从初步的屈就里，逐渐予以教育，藉此而逐渐提高大众文化水准……所以通俗化更不是庸俗化，乃是深入浅出的，用艺术的语言，形象的文字，表达深邃的感情，和深切的道理。"②通俗而不庸俗，屈就中又去提高，这种富有辩证色彩的论证，正是创作朗诵诗的首要条件。第二，要有韵律。高兰认为，诗要有韵律，并不在诗的脚韵上，"所谓韵律，通俗点来说，就是字音的轻重疾徐的节拍。自然也有所谓内在的韵律，那是指感情的起伏而言，由于感情的起伏，也就是使文字语言有起伏波动的"③。这里指的是诗的"内节奏"，这和郭沫若早年主张的诗要有"内在律"是一致的。郭沫若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④诗，特别是朗诵诗，当然应有外在的节奏和韵律，但最关键的还是"内在律"，就是感情的起伏，情绪的消涨。这是诗人在写朗诵诗时特别应该注意的。第三，热烈与现实的情感。高兰说："诗既是高度的情感的声音，那么诗的灵魂应该是那火热炽烈的情感。无论诗的文字和音韵多么优美，如果没有情感，那将是个木雕的美人，而且由于他的缺乏情感，也一定失去韵律的。不能成为一首完美的诗。""所谓情感，也是与大众有血肉关系的现实的情感。"⑤如果说，语言的通俗化和韵律，还只是朗诵诗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热烈与现实的情感"，则是朗诵诗内在的核心，不然，就不会感动人，高兰

① 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第9页。
② 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第22页。
③ 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第23页。
④ 郭沫若：《论诗三札》，《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33页。
⑤ 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第25页。

自己创作的那些感人的朗诵诗，关键之处，正是具有热烈的感情。

## 二、包容古今、学贯中西的学术研究与教学

1. 对李煜词的开拓性研究

“九·一八”一声炮响，惊醒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青年高兰的梦。他本来想在宋词研究上下功夫，已着手对晏殊、晏几道“二晏”词的研究撰结，可此刻，他感受到了国破家亡之痛，李煜的一些伤怀故国的名句，时时袭上他心头，于是丢下了“二晏”，开始写作《李后主评传》。他说：“意欲借李煜的亡国之痛以激励国人愤起抗日。”[①]他很快写成，并发表在1932年燕京大学《文学年报》创刊号上。可惜由于要出版本书单行本的天津人文出版社被专制的国民党当局查封，而未能广泛发行。现在看来，它的成就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这是国内最早也是最系统的研究李煜的词、诗、文、绘画、音乐及其人生经历的一本专著，具有开创性。孟祥鲁指出：“夏承焘先生的《南唐二主年谱》写成于一九三五年，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成书于一九三六年，王仲闻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校订》，詹安泰先生的《李璟李煜词》则到五十年代末才出。”[②]上述诸书除一本年谱外，都只限于对李煜词的校订笺注。而高兰的“评传”，不但汇集了李煜的词、诗、文等全部作品加以评述，而且对李煜的生平、政绩，以及在音乐、绘画上的成就也有较完备的评价。这对一名大学学生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比如，在李煜的韵文作品中，除了词而外，还有许多诗和赋，像悼念昭惠后的《挽词》、《梅花诗》，特别是那篇《昭惠周后诔》，作者称：“异常感哀的，当首推那篇《昭惠周后诔》。全文数千言，真是一字一血泪。”[③]这在其他研究校释李煜作品的著作中，尚未见到。

其次，给了李煜恰当的历史定位，并对其艺术成就作了独到的评述。关于对李煜其人的评价，高先生称：“李后主确乎是一个特别的君主：由他的一生事迹来看，他既没有尧舜之德，也没有桀纣之虐，偏偏又不若那些既不德又不虐的一个平凡的君主。”[④]而对他的艺术成就，高先生则称：“李后主是位杰出的诗人和真诚的艺术家。他爱好艺术甚于爱他的生命，无论是处于强邦的重压之下，或身为降臣、日以眼泪洗面的屈辱与痛苦中，他对于艺术的培养和创造，是无时或已的。艺术属于他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的艺术都是有生命的原素。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他用他的泪和血构成了他绝世伟大的诗词。”[⑤]高兰认为，李煜虽是个平凡的君王，甚至是屈辱的亡国的君王，但他用血和泪，用整个生命写成的诗词则是伟大的绝世的。这是一独到的见解。此书还查阅了大量古人的各类笔记、诗话、词话，对诗文中的每个典故都作了精确的考证，令人信服。该书在20世纪80年代经孟祥鲁先生补充了作品和注解，重新出版，无疑，这是对诗词研究界的宝贵贡献。

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诗歌教学研究上的特色

高兰虽以朗诵诗出名，但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即开始对现代文学史展开研究。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家玮博士介绍：2008年三、四月间他为了穆木天研究查找资料，却意外地在北大图书馆查找到了高兰（署名郭德浩）1932年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计45000字，172页，全文用毛笔楷体书写，学号是“二八零六零”，日期为1932年5月。国家玮博士为这部论文作了笺注，并写了介绍性文章。国博士认为：“这份史料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以毕业论文的形态撰写新文学史的尝试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即已经开始，并且表现出不同于一般新文学研究著作的崭新

① 高兰、孟祥鲁：《李后主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1页。
② 孟祥鲁：《〈李后主评传〉赘言》，高兰、孟祥鲁：《李后主评传》，第4页。
③ 高兰、孟祥鲁：《李后主评传》，第69页。
④ 高兰、孟祥鲁：《李后主评传》，第13页。
⑤ 高兰、孟祥鲁：《李后主评传》，第13页。

姿态。不过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笔者细读了这部文稿，觉得高兰当时有年轻学者的锐气，有许多在现在看来仍然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文学离不开时代，它是时代意识的表现；二、文学作品应追求真善美，但真善美也应和时代相呼应；三、推翻旧文学易，但建立革命的新文学难，因革命文学阵营内人们的互相争斗太激烈，这对发展革命文学有利也有弊；四、真正的文学革命，是工具的改革（指写作手段），同时，应把时代意识加入在内。这部文稿基本上以唯物史观为标尺，评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十余年间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主张的得失。有的评述虽然简单一些，但都是较早地对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潮的有益评价。这不但是高兰早期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贡献，也为他后半生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高先生这部论文复印件连同国家玮博士笺注文等，现收藏在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图书资料室。

1950年，高兰结束了颠沛流离、生活不安定的状况，到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兼任了系主任的行政工作。此时，虽还常在师生间及市文艺界参加朗诵活动，但写诗很少，学术著作也未撰写，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诗歌专题的教学中。据当年在中文系学习的同学回忆：“高兰先生颇有典型的学者、诗人风度。然而，他和蔼可亲，毫无教授、学者架子，有时他还深入到我们宿舍，和学生促膝谈心，这又给了我们格外亲切的感觉。高先生教我们现代文学史课程，他的课教得好，不仅观点新颖，史料丰富，而且语言朴实生动，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上他的课。”[①]高兰既讲现代文学史，也给部分同学开设了《诗歌专题研究》一课，对文学史的教学，由于他亲身经历了许多抗战以来的文学界的活动，并和许多作家诗人熟悉，讲起来自然真切、生动，时常还穿插许多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和典故，颇受欢迎。他的诗歌专题研究的教学，独辟蹊径，按诗与时代、诗与生活、诗的意境创造、诗的语言、诗的格律分别来讲，也有对“五四”以来一些新诗人的评介，常以他们的创作为例证，打破古今中外的限制，给同学们一些丰富的知识，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在1950年代的课堂上还是少见的。粉碎“四人帮”后，笔者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又在高兰先生的提议下，在全国最先招收了现代诗歌研究的硕士生，高先生负责讲授现代诗歌部分，笔者负责讲授当代诗歌部分。高兰先生在授课时，仍贯串了他古今融会、中西贯通的教学方法，给人印象深刻。比如，他在讲授现代诗人戴望舒的名篇《雨巷》时，提到其中有“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的句子，下面又有“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②]这样的句子，高兰问学生：“戴望舒在诗中为什么不断用丁香来形容雨巷中的女孩子呢？因为他认为‘丁香’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儿，清香、高雅、又与众不同。其实，这和南唐李璟的《浣溪纱》词有关，李词中就有‘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看来，丁香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和愁怨有关，所以戴望舒才选用了它。”这一解说，给学生印象很深。接着，高先生又讲述了叶圣陶如何发现这首诗，推荐这首诗，称它具有音律美，并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同时，又讲述了戴望舒如何去法国留学，受现代派影响，回国后写了一些具有现代派意味的诗。可见，高兰讲述一位诗人或一首诗时，绝不局限在对眼前的作品的简单分析上，而是引证许多有关材料，给学生更多的知识，真正做到了在教学上的融会古今、学贯中西。

此外，高兰在教学上还特别重视课堂内外的教学实践活动。他讲朗诵诗时，必定给同学当场朗诵自己的诗或是一些中外名诗。有时还辅导同学学一些戏剧知识，为此他曾带同学去看“茂腔戏”。当著名京剧演员到青岛演出时，他曾带领三十多名1952级的同学去看过奚啸伯的演出，这激发了同学们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在此期间，他还培养了一些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生。1957年前，他是把全副精力放在现代文学史和诗歌专题研究的教学和系主任的行政工作上了。但他绝没想到，一场黑色的风暴正在等着他。

---

① 孙庭华：《忆高兰先生及其〈哭亡女苏菲〉》，《山东大学报》2010年9月28日。

② 戴望舒：《雨巷》，《戴望舒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 三、坎坷的悲剧命运与至死不渝的理想追求

高兰先生一生的命运是悲苦的。在重庆的七八年，本来满怀希望，盼望抗战早日胜利，但国土沦丧却越来越多，又使他倍感痛苦。特别是大后方的贫富差距悬殊，自己的生活毫无保障，那种悲愤之情更是与日俱增。据好友臧克家回忆这段生活说："我与高兰同志相交，已将近五十年了。1938 年初识于武汉，四年后重聚于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生活在少见太阳多见雾的这个山城里，环境恶劣，斗争激烈，生活困窘，悲愤满怀。亚平、戈茅、高兰、方殷、云远、力扬、徐迟、水拍，我们气味相投，以诗互励。每逢端阳'诗人节'，或其他集会场合，高兰同志从郊外赶来，一次不落。在会上朗诵诗歌，情绪激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高兰同志朗诵他的名作《哭亡女苏菲》，句句真情，催人泪下……"[①]那正是 1942 年以后，高兰的七岁长女苏菲因疟疾无钱医治而不幸逝世之时。此时的高兰，忍住了个人的悲痛，仍然积极从事朗诵诗的写作和朗诵活动，其目的，就是盼着祖国早日光复。然而，光复的日子到了，他回到了北平，可他的希望又变成了失望，他仍然为饭碗衣着而奔波而愁苦。还不时遭受特务的跟踪，毫无安全而言。此时，他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区的共产党身上，他渴望着光明真正到来，渴望新中国的诞生。就是这种渴望，支撑着他熬到了新中国的建立。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飘扬的时候，高兰的兴奋之情是难以言表的。1950 年他到了当时的华东大学，后合并入山东大学，从此，他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不久，除了教学之外，又被任命为系副主任、系主任，还三次当选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山东省政协的常务委员，并被选为山东省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山东省分会的副主席。其间，还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此时他唱出了发自内心的歌声：《我的生活，好！好！好！》。可好景不长，在那"万马齐喑"的 1957 年，高兰被打成"后派分子"，从此被打入了冷宫，撤掉系主任职位，不能再登讲堂，也不能再朗诵诗，而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至于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臧克家先生回忆说："高先生算什么右派啊？他不过就是在山东的一个会议上引用了清人的一句诗'马后桃花马前雪'，来说山东发展不如北京快，山东应该加快步伐。这样，他就成右派了，真是胡闹啊！"[②]又据和高先生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老教授史若平先生回忆："高兰先生被打成右派真是笑话，原因是他在会上说：'民主党派不能只当共产党的仪仗队！'意思是说，应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这有什么错！"[③]当时，高兰非常悲观，曾对学生慨叹："在人生的舞台上，我被喝了倒彩！我已青春不在！"[④]但不久，他调整了情绪，认真去思考自己的"错误"，努力参加到农村的劳动改造。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回济南后，仍积极参加济南卧虎山水库工地的劳动，有时亲自赶着牛车去运石运料。同学们为了照顾他，常替他去干粗活，叫他看看衣服送送水。但他仍不愿闲着，便写了不少快板书，鼓励同学们的劳动热情[⑤]。他认为，只有拼命"改造自己"，才能"脱胎换骨"。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本来有一个秘密的心愿：想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但突然袭来的政治风暴，使他彻底打消了这一念头。

1966 年，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卷地而来，"文革"开始了，许多教师被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对于他这个头上有"辫子"的人，更是首当其冲，于是又被送到农村进行强迫管制劳动。但他"不怨不悔"，除了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还给社员们抽空讲解毛泽东诗词。他不但不厌烦监督他劳动改造的人，还说别人的好话，总认为是自己犯了错，理应受苦受难，去掉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当新时期到来，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忆往事的："实际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们对我都很不错

① 贺立华：《岁月诗情与人格精神》，《山东文艺评论丛书·诗歌评论卷》，第 104 页。
② 贺立华：《岁月诗情与人格精神》，《山东文艺评论丛书·诗歌评论卷》，第 107 页。
③ 据史若平教授回忆，2010 年 10 月与笔者谈话。
④ 据董治安教授回忆，2010 年 10 月与笔者谈话。
⑤ 据张可礼教授回忆，2010 年 10 月与笔者谈话。

的，有位老贫农看我热爱毛主席诗词，劳动又肯卖力，就对我说：'老高，好好干吧，干好了我提拔你当贫下中农！'听了这话我都流泪了……"[①]高兰先生就这样，戴着荆冠，忍辱负重，进行着"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

"文革"结束，古稀之年的高兰先生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他渴望着在教学科研上大干一场。同时，他隐藏在心底的愿望——成为共产党的一员的想法，又不断冒出来。此时，笔者已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有幸成为高先生的同事，时常谈心。他谈了自己前半生和1957年后的悲剧性遭遇，但却毫无怨恨悲伤之情。他说从抗战时候起，看到了共产党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史实，就渴望加入共产党，但未能实现。50年代更不用说，作为当时的一名"罪人"，想都不敢想啊！可现在不同了，许多事情都清楚了，我还能不能在晚年争取入党呢？对高先生的愿望，我如实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想不到校系二级领导都格外重视，正好想树立一个至死不渝要求进步的老教授加入党组织的"典型"呢，我把组织上欢迎他入党的态度转告给他，他欣喜异常，庄重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希望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终于在他七十三岁的时候，他被批准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为此，他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入伍吟》："莫道桑榆晚，发白心愈坚。有幸终入伍，矢志效春蚕。"果然，这只不老的春蚕，很快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对现代诗歌研究生的培养上了。此时，我想起了一位同样被打成过"右派"的诗人梁南的几句诗："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②]，高兰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说来也怪，此时的高先生性格竟像变了一个人。为了团结同教研室的另外的老先生，他可以登门去拜访，为了和青年教师多联系，他也可以去爬高楼。此外，他还养花种草，有一年，春节前夜，为了等着看水仙花开放，竟在花盆前坐到天亮。正月初一早上，水仙花终于开了，他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不停地向给他拜年的客人介绍。还有，在1982年，笔者和其他老师带外国留学生到敦煌参观实习，他为自己不能前往而深感遗憾，一再嘱咐我，给他带回一块石头来，看见石头，也就等于到了大西北了。我从敦煌、阳关回来，给他带回一块紫红色的阳关遗址石头，他非常喜欢，竟哼起王维的《渭城曲》来，并把这块石头当成了看书、写字的"镇纸"。高兰的诗人气质又回来了。

高兰先生的晚年患了糖尿病，他自知时日不多，很盼望把自己的朗诵诗集和20世纪30年代写的《李后主评传》再版，为此，我受系里委托，和出版社联系，终于在他去世的前夕，使他看到了《高兰朗诵诗选》(新版)和《李后主评传》的问世，他可以含笑而去了。

高兰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奋发向上的一生，也是步履坎坷、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不但他的朗诵诗是诗歌史上宝贵的遗产，而且他的悲苦命运和人格力量，也是对后人的启示和警策。

[责任编辑　贺立华]

① 贺立华：《岁月诗情与人格精神》，《山东文艺评论丛书·诗歌评论卷》，第107页。

② 梁南：《我不怨恨》，中国新诗研究所编：《新中国50年诗选：1949－1999》第1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王绍曾先生与目录版本学研究

杜 泽 逊

**摘 要**:王绍曾先生一生从事的学术工作有若干方面,成果丰富,主要成就是目录学,而无论是在目录学,还是在版本学、校勘学领域,先生的成果都主要在史部。王先生 1930 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随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1932 年至无锡国专图书馆后作《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理清了"正史"版本源流,1963 年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1978 年编出《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王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相继出版了《山东文献书目》、《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等专著,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最能代表先生的目录学成果,堪称史志目录编纂史和清代文献目录编纂史上的里程碑。

**关键词**:王绍曾;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

"目录版本"这是王绍曾先生(1910－2007)生前填写各种表格在"研究方向"一栏最常用的措词。为什么这样填,而不是"版本目录"?据先生自己解释,目录学是自己的学术根基,从学术史看,先有目录学,后有版本学。"版本目录"还有歧义,那就是在"版本和目录"之外,还可理解为"讲求版本的目录",那就成为目录学的一个支派了。王绍曾先生一生从事的学术工作有若干方面,成果不可谓不富,但正如先生自己所强调的,其主要成就是目录学。

王绍曾先生,字介人,号介盦,又号霞客乡亲。江苏江阴县人。生于 1910 年 12 月 19 日,卒于 2007 年 4 月 13 日,终年 97 岁。王先生的名字,先生生前告诉笔者,"绍曾"就是远绍宋代的王曾,他是"敬惜字纸"民间习俗中常见的一个典范。"介人"也就是继承人。"霞客"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江阴历史文化名人。先生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母亲以养蚕为生。先生 1927 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此步入学术殿堂。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或"国专",因为全国就这么一所国学专修学校。该校的创始人是国学大师唐文治,王先生生前称为"唐老师"。曾在国专授课的老师有钱基博、陈衍等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任无锡国专教务长,每周到无锡授课一次。国专培养出大量国学人才,知名的有钱仲联、王瓒常、朱星、周振甫、唐兰、冯其庸等等。当时与北京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北大国学门都是培养国学专业人才的重镇。王先生在这样一所专科学校,受到专门培养,打下了一生的基础。先生的毕业论文是《目录学分类论》。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长达 6 万言的大专毕业论文,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目录学优秀论著。该文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讲到民国年间引进的杜威十进制法及其在中国之改进,显示了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深刻认识和对中西目录学的融合之功。先生一生治学,甚至包括个人的医疗保健,从来不排斥新方法,甚至亲自试验,他的这种开拓进取精神,也是那时养成的。这篇论文是钱基博先生指导的,钱先生对这篇论文非常满意,打了 100 分,还建议国专作为《无锡国专学生丛刊》第一期正式出版。当年的这个版本已不易得,王先生藏有一本,近年收入先生的《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才广为流传。钱基博先生当时把论文带到光华大学给师生们看,后来又在另一位弟子俞振楣的论文上作过这样的批语:"我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自讲学大江南北以来，得三人焉。于目录学得王生绍曾，于《文史通义》得陶生存煦，于韩愈文得俞生振楣。”足见钱基博先生确实把王绍曾先生列入得意弟子的行列。在后来的颠沛流离中，王先生一直保持与钱先生的通信，晚年的王先生曾与周振甫先生等共同整理再版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并撰写了《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的文章，王先生在晚年的教学中，也常常提到钱先生。其师生情谊之笃，影响之深，可以想见。钱基博先生没有出版过目录学专著，只出版了一本版本学著作《版本通义》，是早期不可多得的版本学专著之一，也是王绍曾先生经常提到的。基于对钱基博先生的特殊感情，王绍曾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也保持着联系，写信、赠书，还在1991年与周振甫先生到钱钟书先生家访问过，谈叙两小时，所谈多系往事，并合影留念，当时他们都是80岁的老人了。谈话间王先生提到当年在无锡钱钟书和他的弟弟都曾旁听钱基博先生的课。钱钟书先生当面否认，说：“我从来没听过父亲的课。”告别钱家，王绍曾先生对笔者说：“我还没胡涂，他为什么不承认呢？”这件事至今没有答案。

1930年王绍曾先生无锡国专圆满毕业后，经校长唐文治推荐，进入当时亚洲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追随国学大师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这是王先生治学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严复的学术译作，林纾的文学译作，都是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这些名刊，也是商务出版的，当然还有遍及全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几乎霸占了数十年来研究中国旧学领域的图书资料系统的是商务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古逸丛书续编》、《丛书集成初编》、《孤本元明杂剧》等。商务还拥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其中的善本部称为“涵芬楼”，收藏着宋元古本、名家抄校，是藏书史上的著名藏书楼。商务还拥有强大的学者队伍和编辑队伍。这一出版帝国，在后来数十年的出版史上，只是一种梦想，短期内还看不到后来居上的苗子。

商务印书馆为了整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专门在张元济先生家附近设立了“校史处”，日常工作由汪诒年、蒋仲茀两先生负责。参加过校史工作的还有赵荣长、胡文楷等先生。校史工作由张元济先生亲自主持。那么，校史处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要从事这项工作？这是必须要说明的。

中国的古籍数量庞大，但骨干是“正经”、“正史”。正经，即通常说的《十三经》。正史，即《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逐渐累积起来的，其刊刻，元代有“十七史”，明代增加到“二十一史”，清代乾隆间定型为《二十四史》。正史的刊印，从来都是文化出版领域的重中之重。就明清以来的情况看，明代南京国子监有《二十一史》，北京国子监又刊印《二十一史》，形成著名的“南监本”、“北监本”。明末又出现了流传颇广的毛晋汲古阁《十七史》。到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皇家刻书处“武英殿”又刻印了《二十四史》，太平天国平息后，同治年间又由江苏、浙江、湖北的五大官书局合刻了《二十四史》，称为“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间，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就是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可以说，谁抓住《二十四史》，谁就可以在出版行业名利双收。商务也不例外。清末以降，《二十四史》已有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图书集成局、竹简斋、史学斋等多个版本，在市面上容易买到。商务自己也印过一种。这些大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乾隆武英殿版。至于“局本”，当时也较易得。如何使《二十四史》从学术质量上更上一层楼，超过其他通行版本？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张元济想出了影印宋、元、明旧版，汇为《百衲本二十四史》这样一个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出版前，《百衲本》一直是绝对的权威。中华书局本出版之后，《百衲本》依然是老辈学者的插架常备书。

《百衲本二十四史》采用的是影印方法，但经历了艰苦的校勘考证过程。首先要选取各史传世较早的版本，然后要与其他版本，尤其是清代乾隆武英殿本对校，参校的版本则有宋、元、明刻本多种，其中以明南、北监、汲古阁本为主体。这样大规模的通校“全史”，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清代武英殿本各卷附有“考证”（即校勘记），算是此前最系统的“全史”校勘工作。至于私家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大家，他们的突破固然很大，但获见旧本太少，无法与张元济相比。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二十

四史》校勘工作，历时多年，最后形成了173册《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这次校史活动的直接成果是印出了《百衲本二十四史》，这套正史以宋、元、明旧本为底本，同时汲取了殿本以及其他旧本的长处，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形成了独特的“百衲本”版本系统。第二个成果是每一史后都有一篇张元济的跋，可以说是二十四史版本研究的优秀成果。这些跋曾经出过单行本，后来收入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广为流传。这些跋文讨论了各史流传的经过和传世各种版本的关系、优劣，尤其对清代的“官版”武英殿本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在此之前的相关介绍，如孙德谦的《古书读法略例》等，都把殿本作为最好的版本来推荐。可以说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打破了这一局面。第三个成果是张元济采取《校勘记》精华写成的《校史随笔》。这本只有一册的小书，与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最富创见的两部校勘学专著。第四个成果就是多达173册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手稿了，可以说大规模的校勘记是张氏校勘学成就的基础。

王绍曾先生在商务校史处工作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才离开上海，回到母校无锡国专，任图书馆主任。此前的主任是蒋天枢先生，蒋先生考取清华国学院，由王先生接替。王绍曾先生在校史处的工作就是每天与同事一起从事对校，填写已经印好格式的《校勘记》。其间由于工作的需要，也由于王绍曾先生独特的学术头脑，他利用涵芬楼的善本特藏，系统调查了二十四史的版本源流。到了无锡国专图书馆后，就撰写并发表了长篇论文《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从宋元到明清，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目验的材料，理清了“正史”版本源流。这篇论文在这一领域一直受到格外重视，台湾学者王国良先生在《（增订本）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中特别收入了王先生这篇长文，作为《二十四史》版本考证方面的代表成果来对待。同时入选《论集》的有：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胡适《校勘学方法论》、陈垣《校勘法四例》、屈万里《十三经注疏版刻述略》、陈国符《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王伯祥《四库全书述略》、谢国桢《丛书刊刻源流考》、杨殿珣《中国年谱概说》、罗香林《中国谱籍之留传与保存》、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之历史及其整理》等。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王先生这篇论文的学术地位。

由于参加《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王先生一生都把自己看作张元济先生的学生。的确，王先生在“版本学”和“校勘学”上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张元济先生的指导。王先生一直对张元济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即使离开商务之后仍与张元济先生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文革”后王先生还写信给中央领导陈云同志，为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操心。1981年王先生发现癌症，动了切除手术。在手术后不久，即抱病撰写了《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一书，交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成为新时期张元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先生在序言中说：“每当想起三十年代初追随先生校史，谆谆教诲，记忆犹新；近年阅读先生著作，感受尤深，总想写一点东西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先生对张元济先生的深厚情感。

关于王先生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因缘，还表现在王先生在晚年花费了大量精力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这件事上。《校勘记》173册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曾由赵守俨先生经手借去。“文革”后王先生在一些场合呼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引起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赵守俨先生的高度重视。他指示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在各处寻找《校勘记》稿本，分批归还商务印书馆。可惜有7种迄今未得下落。经过动荡的岁月，又有谁能保证这些先贤用心血撰写的高层次成果不遭劫难呢？幸存的《校勘记》稿本133册（16种）被分批交给王绍曾先生。当时由笔者一趟一趟用包背到济南，交给王先生，并与王先生一起逐册清理，分辨出张元济先生亲笔和其他校史处成员汪诒年、蒋仲茀等先生的笔迹，这些结论已在王先生的有关论文中体现出来了。蔡元培、胡适当时都十分关心《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整理出版工作，因形势不稳，直到1992年才有机会进行整理。那时幸存于世的校史处成员只有王绍曾先生一人了。校史处成员赵荣长先生的儿子赵统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担任了繁难的誊录工作，为他客死台湾的父亲尽了最后的孝心。笔者之外，山东大学的刘心明、王承略、李士彪、傅根清、徐超、王培元诸先生以及山东教育学院的程远芬等同志分头承担了

各史的具体整理工作，先后历时八年，才最后完成并由商务印书馆分册出版。可以说，进入商务校史处参加《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对王先生一生的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记得在整理工作开始时，我们发现《校勘记》大都包括原始校记和"定本"。"定本"已删去了《百衲本》根据殿本修改过的文字内容，这些内容在原始校记中还保存着。"定本"是蒋仲茀先生根据张先生的指示办理的，所以王先生主张照"定本"整理。笔者提出吸收原始校记的所有内容、合二为一的方案。王先生不同意。经过反复讨论，王先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菊老已经这么办了，你说怎么办呢？"张元济先生号菊生，周围人称他"菊老"。影印古书而改动文字，这是当代所不允许的。王先生不主张把改字的部分吸收到《校勘记》中，不无回护张元济先生的意思，"为尊者讳"应是内心的根源。但最终王先生还是同意了合二为一的方案。当时部分整理稿已交到商务，笔者又到商务做了一遍增补工作，才印出来。从这件事，可以体会王绍曾先生对张元济先生的特殊感情，这种感情与学术工作交融时，表现形式是相当复杂的，甚至会令旁人觉得不好理解。《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可以说是尘封了五十多年才面世的，这是史学领域和版本校勘学领域屈指可数的成果。傅增湘认为张元济校史的贡献超过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观点是成立的。20世纪的大规模校史工作一共有两次，其成果是《百衲本》和中华书局本。参加中华书局点校工作的学者，如有"南王北唐"之称的王仲荦、唐长孺，在他们的治学经历中，已写下了闪光的一页。王绍曾先生早年参加商务《百衲本》校勘工作，晚年又历时八载主持整理了大部头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也同样是闪光的一页。在认识和评价王绍曾先生的学术贡献时，这一页应当是浓墨重彩的。

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绍曾先生去了母校无锡国专图书馆，1935年又应民族资本家薛福基之邀担任无锡尚仁中学校长。抗战时期先后在成都和西昌从事行政和编辑工作，创办了《新宁远》月刊和《宁远报》。抗战胜利后，先生急于返乡，于是考取了当时国民政府在重庆的县长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上海金山县任县长，18个月后便辞去县长一职闲居上海。建国后，经著名民主人士周士观先生的推荐，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山东济南工作，曾任山东机械工业学院、济南工学院图书馆副主任。1960年考上高亨先生的函授研究生，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写工作在全国铺开。山东大学图书馆在此之前没有善本书目，王先生从普通古籍中清理出善本约1200种，根据有关格式要求，上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同时编出《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交付油印。油印工作因故中辍。后来经过张长华、高传章，尤其是沙嘉孙先生的进一步努力，《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终于编成，经周洪才先生校补，出版行世。如果没有目录版本学基础，这项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工作就无法完成。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以来，山东大学中文系殷孟伦、殷焕先先生，历史系王仲荦先生的研究生都请王绍曾先生开设目录版本课。1983年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王先生调任该所工作。1985年古籍所招收第一届研究生班，王先生为指导小组成员，开设了目录、校勘方面的两门课。研究生班毕业，王先生分工指导连镇标、王君南、杜泽逊的硕士论文。后来又招收了在职研究生王承略，博士生孙荣耒、孙雪萍。笔者的博士论文则是王先生和徐传武先生联合指导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逾古稀的王绍曾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进入了学术生涯中最旺盛的阶段。多个项目同时进行。先生每天早起晚睡，匆匆行走于图书馆、古籍所和寓所之间，风雨无阻，不间寒暑。其间出版的成果有《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山东文献书目》、《山东藏书家史略》（与沙嘉孙合作）、《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30种，主编）、《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与崔国光等合作）、《渔洋读书记》（与杜泽逊合辑）、《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主持整理）、《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等，《山左戏曲集成》（与宫庆山合编，王承略助编）则是去世后才出版行世的。从这些成果，我们可以想象，在70岁以后到90多岁，二十多年间，一位老学者是如何为学术奋斗的。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见。这些成果每一项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成果，但先生花费精力最多、最重视的，并且最能代表

先生目录学成果的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就其性质来说，属于目录学的分支“史志目录”。正史中设有艺文（经籍）志的有《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六种。北洋政府时期修的《清史稿》也设《艺文志》，合前六种共七种。其他各史缺少艺文志的，清代学者大都作了“补志”。有艺文志而著录有遗漏的，从宋代王应麟以来，也不断有人作“补编”。这类成果后来被开明书店编进《二十五史补编》，受到学界广泛欢迎。围绕正史艺文志的订补，形成了清代朴学一个领域，也形成了目录学的一个传统，这项工作至今不衰。北洋政府时期修的《清史稿·艺文志》出于著名学者章钰、吴士鉴、朱师辙之手，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可资采用的书目太少，像样的书目只有《八千卷楼书目》、《愚斋图书馆书目》数种而已，因此，虽然著录清人著述9000余种，仍有大量遗漏。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武作成先生完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清人著述1万余种。二者相加约2万种。这两项成果1982年由中华书局合订出版，书名为《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王绍曾先生看到这部书后，认为仍有大量清人重要著作未有收入，有作再补编之必要，因而规划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得到中华书局大力支持。中华书局还征求了戴逸、来新夏等先生的意见。王绍曾先生也与顾廷龙、程千帆、王伊同等先生交换意见，受到广泛支持。这项工作开始于1983年，1989年列入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1992年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八五规划项目，1993年完成，2000年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参加编纂工作的前后有张长华、沙嘉孙、苗同圃、刘心明、王承略、李艳秋、程远芬及笔者等十多位同志，但始终由王先生亲自主持并亲自动手编纂。工作地点先在山大图书馆古籍部，后期移到古籍所资料室，王先生每天都来和项目组的同志一起工作，遇到问题随时商议解决。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比以往的艺文志及补志有较大的改善。过去的艺文志及补志基本上不著录版本、出处，《拾遗》则注明各书版本、出处。这对使用者提供了较大方便。在著录范围上，《拾遗》努力反映了清代辑佚方面的成果，一部古佚书有多家辑本，分别作不同条目著录。对于晚清的翻译外国著述，也同样努力著录，同一书的不同译本也分别立目。这些外国著述，凡中国传统四部分类系统不能容的，则在子部另立“新学类”容纳之。四部能容的，也在相应类中增设“域外之属”以著录之。这样，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就得到了相应的实事求是的反映。对于史志目录来说，跟上学术文化发展，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拾遗》可以说跟上了时代的发展，取得了成功。《拾遗》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网罗信息的丰富。《清史稿艺文志》和武氏《补编》一共著录清人著述2万多种，《拾遗》则增加了5.4万多种，使清人著述著录在案的达到大约7.5万种。自来史志目录及补史志目录网罗宏富、体例完善，无逾于《拾遗》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拾遗》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在2003年教育部评奖时，《拾遗》获得一等奖，这是一种肯定。对于科研工作来说，你的成果如果不能成为里程碑，也就是今后发展的新起点，那你就失败了。当然再好你也不可能是终结。笔者认为《拾遗》在史志目录编纂史和清代文献目录编纂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因此也是王绍曾先生作为一位目录学家的代表作。当2002年国家新修《清史》工程启动之后，清史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多次讲话中都特别提到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已经说明新修《清史·艺文志》以及《清人著述总目》的纂修，都必须以《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为基础，这就明确了《拾遗》的历史地位。

王绍曾先生从20岁国专毕业后步入学术界，就进入了“正史”研究领域，直到晚年，仍在这个领域耕耘、开花、结果，无论是在目录学，还是在版本学、校勘学领域，王绍曾先生的成果都主要在史部。当我们认识王先生学术特色的时候，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今年4月，先生去世已经整整四年，笔者赶写这篇小文，就作为对先生的纪念吧。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 反切、破读与方言音韵

## ——殷焕先先生在音韵学领域的贡献

张 树 铮

**摘 要**:著名语言学家殷焕先先生受教于众多国学名家,合传统语言文字之学与现代语言学之长,在音韵学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反切释要》一书首次对根据普通话语音来正确释读古代反切的规律进行了系统归纳。先生正面提出破读是取材于客观存在的语言自然现象,论证了破读产生于殷商时期,并指出"离去无破"的声调破读规律,反映出上古去声作为一个类早已存在;先生根据历史语音学的理论、语言历史演变的规律,分析方言语音现象的历史因素,勾勒其演变规律,是我国方言音韵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殷焕先;反切;破读;方言音韵

殷焕先先生(1913－1994),著名语言学家,字孟非,曾用笔名齐中、徐兹,江苏省六合县人。1936 年考入中央大学,受教于马宗霍、赵少咸、胡小石等国学名家;1940 年毕业后考入时在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字莘田)先生读研究生,同时得到语言文字学大家唐兰(副导师)、袁家骅(副导师)、王力(校外导师)等先生指点,由此走上语言学研究之路。研究生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1946 年起在山东大学任教(时任副教授,1953 年晋升为教授),直至去世。1950 年代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文学习》等重要语言学刊物的编委,是《文史哲》杂志创刊初期的编委兼学术秘书,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1980 年代,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全国高校文字改革研究会顾问、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顾问、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语言学会理事长。为九三学社在山东地区最早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生早期接受了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熏陶,后来又受到现代语言学的洗礼,治学"兼综南北雍[①]之长"(罗常培先生语),在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训诂学、文字改革和语言规范化、方言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生前出版有《字调和语调》[②]、《反切释要》(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 年)、《汉字三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 年)、《殷焕先语言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年)、《山东省志·方言志》(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等著作,发表论文近百篇。先生在古体诗词和书法方面也有很深造诣,曾出版《殷焕先诗词墨迹》(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 年)。本文只就殷先生在音韵学领域中的成就略陈一二,或有未当,恳请方家指正。

---

**作者简介**:张树铮,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明朝迁都北京后,在北京和南京都设立了国子监,分别称为"北监"或"北雍"、"南监"或"南雍"。民国时期常用"北雍"指北京大学,以新学著称;"南雍"指南京的中央大学,以旧学见长。

② 1957 年新知识出版社初版时,因为当时殷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所以以他人名字署名。1984 年再版时恢复了先生的署名。

## 一

反切起源于汉末，是给汉字注音的传统方式，在民国初年注音字母产生之前，一直使用了1700多年。它的基本方法是：由两个汉字通过拼合来给一个汉字注音，前一个反切用字（反切上字）表示被注音字（被切字）的声母（即上字与被切字是双声关系），后一个反切用字（反切下字）表示被切字的韵母（即下字与被切字是叠韵关系，包括声调），反切时将上字的韵母去掉，将下字的声母去掉，就能切出被切字的读音。例如：航，胡郎切[①]。用汉语拼音注出来就是：航 háng←胡 h(ú)＋郎(l)áng。由此可见，反切的方法虽然比不上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简明，但也不算太复杂，还是便于掌握的[②]。但是，由于反切用字并无规范，因此字数繁多，种类多样，无形中增加了切出正确读音的难度；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语音的变化，原先能直接切出字音的切语到了后代就不便使用了。例如，免，亡辨切；苦，康杜切；聚，才具切。由此，音韵学家对旧反切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造（或称改良）反切[③]，一是解释反切。改造反切是弃用旧的切语，而改拟新的更符合当代读音的切语。例如，清雍正年间李光地的《音韵阐微》将“免”字改为“米演切”。这从一个字的反切来说，是一种改造，从反切方法来说，是一种改良，总之是为了使反切更易于当前的使用。解释反切是“对前人的反切作一些解释来提出合乎当代语音的反切方法，要求通过这些解释，使前人的反切也能够为后人所利用，也就是，使后人凭借反切上字、下字在自己口里的读音，通过反切方法能够求出被反切字在自己口里的读音来”[④]。比如，通过掌握一些规律就可以把“亡辨切”正确地切读为 miǎn 而不是其他。当更先进的注音方法注音字母特别是汉语拼音产生之后，改造反切也就走到了尽头，因为它们已经将反切这一方法彻底取代；而解释反切则随着反切的退出而更具现实意义：尽管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反切注音也不再熟悉反切，但采用反切注音的古代字书（如《字汇》、《康熙字典》）、韵书（如《广韵》、《集韵》）、古代文献注疏（如《汉书》颜师古注、朱熹《四书集注》）等，却仍然是人们需要查检和阅读的对象，掌握反切的正确规律以读出正确的字音，是人们更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代早就有对反切进行解释的零星资料[⑤]，但不系统。1950年代曾有一本小册子介绍反切，但比较简单，错误也比较多[⑥]。缘此，殷先生开始了对反切今读规律的探讨。1962年，他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了《反切释例》一文；次年，又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反切续释》。1979年，在两文的基础上，先生撰写出版了《反切释要》一书，首次对根据普通话语音来正确释读古代反切（以《广韵》为代表）的规律进行了系统归纳。

《反切释要》共解释了20类反切，除了第一类是“从今音看来，声、韵、调都符合的反切”之外，其余19类都是不能直接拼合的反切。书中“把不能径直反切出正确读音的事例分类提出作例，从语音演变讲明其不能径直反切的所以然，并讲明怎样对待这样的反切”[⑦]。例如第十一类“一些上字在读g、k、h与j、q、x上有问题的反切”[⑧]，书中先举出“绛”等8字今读j、q、x而反切上字今读g、k、h为例（如“绛，古巷切”），然后说明古代读g、k、h等声母的字在现代北京音中分化成了两类声母，一类仍读g、k、h，一类读j、q、x，而分化的规律与韵母有关：“如果其本身韵母读为洪音（开合两呼）的，就仍旧读

---

① “××切”原称“××反”，后因避讳，改称“××切”，或称“××翻”。本文切语除特别注明外，均摘自《反切释要》，一般为《广韵》所用切语。

② 笔者犹记得小时候翻看旧版《词源》，就能弄懂一些比较简单的反切的意思及大致读音。

③ 参见林序达《反切概说》第四章《反切的演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57页。

④ 殷焕先：《反切释要》，第15页。

⑤ 参见殷焕先：《反切释要》，第15页。

⑥ 此点当年闻之于殷先生。

⑦ 殷焕先：《反切释要》，第25页。

⑧ 殷焕先：《反切释要》，第60－62页。

g、k、h声母；如果其本身韵母读为细音（齐撮两呼）的，就转读为j、q、x声母。”上述例子中反切下字都读细音，所以觉得上字定声不准了。最后总结出此类情况正确切出读音的方法是，“根据下字的韵母属于细音这个条件来改反切上字声母g、k、h为相应的j、q、x，……这样就能切出被反切正确的读音”。例如，“歉，口陷切”，上字的声母是k，但因为下字韵母是细音的ian，所以需要将“歉”字的声母定为q，即读qiàn。

归纳古反切的今读规律，其实质是根据古音到今音（普通话音）的演变规律来分析反切用字今音的特点，总结出利用今音正确切出读音的若干条例。本来，如果读者具有一定的音韵学知识、掌握一些音韵学术语，那么，这些规律的表述也就容易得多，但偏偏这里面对的是缺乏音韵学知识、只掌握现代普通话语音系统的读者，这样问题就复杂了。这就需要作者既具有对古今演变规律的娴熟把握和敏锐的观察分析力，还要具有化繁为约、化雅为俗、化古为今的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反切释要》表现了孟非先生作为语言学大家的高超功力，将根据今音拼读古代反切的条例总结得线索分明，而又表述得清楚、透彻。

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刚从“文革”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学习古代文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反切释要》一书首次印刷便达15万册，足见受欢迎的程度。对于中文、历史及其他与古籍相关的专业人员和学生来说，反切仍然是需要掌握的一种知识，殷先生的《反切释要》仍然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参考书。

对反切的释读，体现了殷先生化“绝学”为“通学”的研究目的。1990年，他与学生合著的国内第一部以“实用”命名的《实用音韵学》（殷焕先、董绍克著，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该书除上编古音系统外，下编分别讲述语音的演变规律、反切今读、假借字、声训、《诗经》用韵、诗律、词律、曲律、四六文、韵书的使用等内容。虽然书稿主要是由学生撰写的，但其主要精神和框架都是先生多年思考的结果。

## 二

破读原来是指古人在注释典籍时说明多音多义字在该处读音的做法[①]，后来也用来指一字多音多义的现象。其中，又以声调不同、意义有别为常见，被称为“两声各义”或“四声别义”。不同的声调，往往表示不同的词类或同一词类中的不同次类。例如，“好”读上声是形容词，读去声是动词；“恶”读入声（今读è）是形容词，读去声（今读wù）是动词；“妻”读平声是名词，读去声是动词（以女嫁人）；“借”读入声是借入，读去声是借出。所以，破读“是个有关语法、词汇以及语音声韵调等方面的语言现象”[②]，已有许多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破读的性质、起源与发展变化、分类等问题[③]。1963年，殷先生发表《破读的语言性质及其审音》一文，对破读提出了新的见解，是研究破读问题的一篇重要论文。这篇文章是从审音的角度提出讨论的，但是实际上涉及到了有关破读的多方面问题。

关于破读的性质，前人有“六朝俗师妄生分别，古人固未之有”（钱大昕语[④]）的观点，并且是大家之言。殷先生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他分析了顾炎武和钱大昕的论证，利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明他们的自相矛盾之处。如顾炎武的主要观点是“未有四声反切之前一字原只一声，没有存在着‘破读’的语音的依据”，但实际上顾氏自己也说过，“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

① 说明假借字的本字称为“破字”，即“破其假借字而读以本字”（王引之《经义述闻·序》引王念孙语）。破字有时也称为破读。

② 殷焕先：《破读的语言性质及其审音》，《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1月号。

③ 参看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第一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④ 凡出自殷先生文章的引文本文不注出处。

这就说明，破读是存在“客观物质依据的”。今按：顾炎武关于古无四声的说法已被清代其他古音学家否定[①]，即便是现代有些学者认为上古时代汉语没有声调，但也都认为有别的语音元素相区别。因此，顾氏的破读人为说的理论基础自然也就不存在了。钱氏曾引用《诗经》押韵和汉儒注疏说明破读“古人未之有”，殷先生则引钱氏自己对何休“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的首肯，对“古音失传者多矣”的感叹，说明钱氏的前后矛盾。殷先生进而正面提出：“破读，就其语音方面说，它是取材于客观存在的语言自然现象的。”“破读是反映的语言自然。”先生从上引何休注说起，讨论了“长言”、“短言”的实质所指，指出“长言”、“短言”的对立、四声都非人为造出，再以现代北方方言中“尾”和“脊”的“各音各义”证明这些语言现实非人为规定。

如果说上述讨论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补充说明破读非人为的观点，而在讨论“四声反切”以前的“破读”一节中，先生独辟蹊径，论证了破读产生于先秦，这就是先生的创见了。关于破读的起源年代，以前多循旧说，认为起于六朝。周祖谟先生《四声别义释例》[②]一文通过汉儒读若 20 例，论证了“一字两读，决非起于葛洪徐邈，推其本源，盖远自后汉始”。殷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先秦汉语中就存在着“一字各音各义”的现象。先生依据的主要有两种材料，一类是先秦以本字为训的声训，一类是以同声符为训的声训。前一类如“蒙者，蒙也”（《易·序卦》），“彻者，彻也”（《孟子·滕文公上》），“正之言正也”（《周礼·射人》），这些看起来是“辞费”的同字为训，只有以“各音各义”去读，才会“觉得文理甚顺”。先生认为，这些字的异读，有些可能失传了，有些写成了别的字。后一类以同声符为训的，如“夬者，决也”（《易·序卦》），“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尽心下》），既说明了前一类例子“为一字各音各义为训之可信，而另一方面也应体会到它也是第一类例子的变形”。这两类例子无论从意义看还是从其语音看，都与后代破读的规律符合，“反映一字各音各义盖无可疑”。这样，先生把破读产生的时代从后汉向前推进了数百年。至于文字孳乳，如“子－字”、“宜－义”、“伯－霸”、“借－助”等，其实也是证明破读起源于先秦的证据，所以先生在文中也提示“不能不予以重视而去下一番爬梳工夫”。

先生在文中还提出了对破读字的审音原则，因与本文主题无关，所以这里就不评介了。

1980 年，殷先生又写成《上古去声质疑》一文，在上文基础上对破读和上古声调提出了进一步的意见。

上古声调的有无、多少，一直是汉语上古音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清代段玉裁首先提出了“古无去声”的观点。清末民初的黄侃在段氏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古无上去二声”说。现代学者王力先生反对古无上声的黄说，但同意段氏的古无去声，并对此加以补充证据和申说音理，认为去声和入声只是音长的不同。对此古音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上古去声质疑》一文根据破读，从上古去声入手提出了自己对上古声调的看法。

殷先生指出，从声调范围里的破读来看，平去、上去、入去各组两调都可以互作“本”、“破”，即一个字本读某个调，但可以读成另外一个调构成破读。于此，先生指出了声调破读的规律，就是“离去无破”，即破读都与去声有关系（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其他调为“本”，以去声为“破”）。与之相对的情况是，平、上、入三声之间却不能发生这样的破读。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认为入声和与入声发生破读的去声（去 c）是因为去入本属一大类的话，那么平去、上去也应作如是观，即平去（去 a）、上去（去 b）亦各为一大类。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由平与上不发生破读来看，平与上应分属不同类别；二、由平上入都与去发生破读来看，去声（去 a、去 b、去 c）必定有共同的性质，然后才能发生各调与去声的破读，即去声作为一个类是存在的。“很难解释‘前无所承’地出来一个后代‘去声’（声调），‘前无所承’地来一个后代‘上声’（声调）”。

---

① 参看王力：《清代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② 原载《辅仁学志》十三卷一、二合期，1945 年，后收入周祖谟《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 年。

先生反复申明，所说的各个调类都是一种“虚类”，也就是暂时还不能确定其语音性质（比如音高、音长、音质等），这表明了先生的审慎。不过，这种虚类实际上是以语言事实得出来的，它们的存在是肯定的，它们也构成了研究上古声调者必须要解释的语言事实之一。所以，日后先生看到一篇论文根据古藏语把去声拟成带有-s尾的时候，很是高兴，因为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平、上、入三声发生破读都读去声。我想，尽管对于上古去声是否带有-s尾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但起码在先生看来，这种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破读也作了进一步的阐释。除了在《破读的语言性质及其审音》一文中提到的春秋战国时期材料外，先生又提到了更早的金文和甲骨文中的材料。如金文中的“畏天畏”（《大盂鼎》），上一个“畏”是动词，下一个“畏”是名词（即“威”），先秦的古籍中“畏”、“威”经常构成异文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说明“有破读在”。甲骨文中“受”或表“授予”（所谓施动，即“授”）、或表“接受”（所谓受动），前者中古韵书读去声，后者读上声。除了假设古汉语贫乏到施受不分（“授”、“受”同词）、名词动词不分（“畏”、“威”同词），合理的解释“仍然只能是‘有破读在’”。这里，殷先生把破读产生的年代提前到了殷商时期。上面的例子，都与去声有关，因此，作为一个“虚位”的类，去声“早已存在，其时代也可以推到殷商时代”。

## 三

殷先生的业师罗常培先生不仅是音韵学大家，也是方言学大家，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是继赵元任先生《现代吴语的研究》之后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方言的经典著作；50年代他作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在组织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中也是不遗余力。或许是受罗先生影响，殷先生一直重视方言的调查研究。他读研究生期间曾在罗先生指导下写有《六合南乡方言音系》。1950年，发表《谈方言调查》一文，论述方言调查的重要性。1950年代的汉语方言普查中，他担任山东省方言普查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后因为被打成右派而停职），具体领导山东省方言调查的工作。80年代初期，他受邀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时，身体已经由于胃部手术而非常虚弱，但还是坚持认真负责地组织人员、研究和安排调查与编写的具体工作。尽管由于身体原因他没有具体地参与调查和编写（具体的工作是在钱曾怡先生带领下完成的），但他对这项工作的投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对方言调查工作的热爱和50年代的那次经历有关的。1979年，他写了《方言与音韵》（收入《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1981年，他写了《方言音韵释例之一 ——六合南乡的“雏”与“徐”》，这都表明他把重心放到了方言音韵的研究中来。此外，他还和学生联合撰写了《方言音韵释例之二——寿光方言的知庄章》（1983）等论文。

《方言与音韵》围绕方言和音韵的关系，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首先，引用古代语言学者利用方言来研究音韵的大量例子说明方言与音韵结合研究的历史传统。如《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为了训诂，有时也要到方言里去找证明”；从陈第开始，“方言进入了‘古韵’之学”；顾炎武指出上古押韵中有方言用韵；江永“使方言研究和音韵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并明确了音“类”的概念。其次，以方言在审核古代音类方面的作用为例，说明“音韵与方言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古人关于声母的“全清”“次清”“全浊”“次浊”、韵母的“等”等类别，都可以从现代方言的演变中得到证明。“全浊”“次浊”都属于浊声母，但古代的上声调，全浊声母的字今读去声，而次浊声母的字今读上声，“这说明他们具有某种语音性质之异”，“古人的划分显然是有其坚强的依据的”。“确定了‘音类’是真实的，然后才能谈到各个‘音类’所代表的音值及其音值的性质”。先生还以“锅”字为例说明定本字需要运用音类，以“死”字在今江苏六合方言中的避讳为例说明中古时期“支”、“脂”、“之”三韵一定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方言与音韵》一文是从理论的角度论述方言与音韵结合研究的重要性，那么，先生的两篇《方言音韵释例》则是方言音韵研究的实例。

《六合南乡的"雏"与"徐"》是以同属中古鱼虞两韵而今韵母分读 u 和 i 的字为切入点来分析的。"徐"字代表古鱼虞韵今读 i 韵母的字，古声母是知庄章和非母之外的声母；"雏"字代表古鱼虞韵今读 u 韵母的字，古声母是知庄章母和非母。两字古代声母不同，"徐"为中古邪母，"雏"为中古崇母，但今读都是[$ts^h$]①。殷先生指出，中古知庄章声母不管后代读音为何，但在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着使细音韵母变为洪音韵母的现象（笔者按：如"章"的韵母中古为 iaŋ，而现代为 aŋ），"雏"今读 u 韵母一定是从[y]变过来的）。因此，可以推测，"六合南乡的 y 是曾存在过的。也就是说，六合南乡原是四呼系统的类型，后来它失去了撮口呼"。当"雏"的韵母由 y 在声母的影响下变为 u 之后，方言中 y 类韵母变化为 i，所以"徐"读[$ts^h$i]；而此时的"雏"韵母已经是 u，所以就不再变为 i 了（尽管声母后来也变为[$ts^h$]）。先生据此列出了六合南乡方言中古鱼虞韵母在不同声母后的演变过程及其先后阶段。由上可见，先生所说的方言音韵研究，实际上就是根据历史语音学的理论、语音历史演变的规律，来分析方言语音现象的历史因素，找出演变的规律，勾画其演变过程，并为音韵学的研究提供证明。与《方言与音韵》一样，先生在文中反复强调音类在方言音韵研究中的重要性、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语音演变中时间和空间因素的重要作用以及音韵研究中的内证等等。先生说："本师罗莘田（常培）先生平日教以'考据必须重内证'，本文就是基于这个精神。我另有一篇《方言与音韵》(1979)，其写作精神亦同此。"

《寿光北部的"知、庄、章"》一文虽然由张树铮执笔，但其基本的分析思路和方法都是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形成的，文中的一部分话也是先生口述的，后收入《殷焕先语言论集》。该文根据山东寿光方言中古代知庄章三组声母今读两类的特点，分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鱼虞韵母的字表现与其他开口字相同，这可以作为中古鱼虞两韵读开口字的佐证。二、中古止摄开口字读音与北京音相同，但其他一些北京音读舌尖元音的字寿光读 i，这一特点与《中原音韵》一致，前者在《中原音韵》中属"支思"韵，而其他字属"齐微"韵。根据其后的演变过程来看，只能解释为知庄章三组声母在《中原音韵》时代仍为一类。三、儿化时原本二分的知庄章声母字又归一类，这也可为知庄章曾经的合一提供佐证。

方言语音是历史音韵的发展结果，方言音韵研究是方言研究和音韵研究的有机结合。随着这两个领域研究的深入，汉语方言研究在加强方言调查的同时，逐渐开展了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其中又以语音史研究为主）；而音韵研究的对象也由主要以历史音韵资料为主逐渐扩展到方言中蕴藏着的大量音韵现象。据笔者看来，这种转变主要是从 1990 年代开始的，而殷焕先先生早在 1970 年代末期就呼吁进行方言音韵研究并身体力行，可说是新时期以来这一研究的先觉者和先行者。

行笔至此，笔者不禁记起了当年做学生时第一次听到先生提及"大家"一词的两个含义：著名的专家和一定范围的所有人。最后以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结束本文：唯有大家才能影响大家，唯有泽惠大家者方为真正的大家。

[责任编辑　刘　培]

① 殷先生原文采用王力《诗经韵读》标注音标的方法，国际音标[tsh]标为"ts"。为便阅读，此处统一标为国际音标。

# 孙昌熙先生研治鲁迅和现代文学的成就

张 学 军

**摘 要**:在鲁迅研究领域,孙昌熙教授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和鲁迅"小说史学"的研究。他的《鲁迅文艺思想新探》,论及到鲁迅文艺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创作、风格、欣赏等。而他对鲁迅比较文学观的研究,确立了鲁迅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者的地位。孙昌熙先生首先提出了鲁迅"小说史学"的概念,并从鲁迅研究小说史的资料准备、科学方法、历史分期、发展规律、评价标准等方面,论述了鲁迅"小说史学"的体系。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孙昌熙先生尊重史实,无论是主编现代文学史,还是对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都能实事求是地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孙昌熙;鲁迅;文艺思想;小说史学;现代文学

## 一、从创作到治学

孙昌熙先生(1914－1998)是我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现代文学史家。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涉猎到文学理论、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和现代文学,然而,其学术成就最高的还是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

孙昌熙先生 1936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选了杨振声先生的"小说习作"课,奠定了他的创作基础。在杨振声、沈从文先生的帮助下,他开始在昆明的《中央日报》和《云南日报》上发表小说和散文。毕业后留校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仍然热心于创作,常在杨振声、李广田先生主编的《世界学生》(后改为《世界文艺》)上发表作品,但很少写学术论文。后来,在朱自清先生的督促下,才写了一篇论文《元曲中的水浒故事》,发表在 1944 年的《国学月刊》上。1944 年,孙昌熙先生到云南大理的华中大学(即今天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任讲师,讲授大一国文、文学概论和中国小说史。孙先生最满意的中篇小说《枇杷园》(发表于贵阳《文讯》新四号上)就是在此期间创作的。1946 年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之后,讲授大一国文、现代小说散文作品选讲、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小史、中国小说史等。授课之余,仍热心于文学创作,与友人办《晚风》副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抒情小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十几篇短篇小说和许多散文小品,并把创作当成自己的第二职业。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强调工农兵方向,教书生涯与工农兵生活完全相隔。自己熟悉的生活又不能写,孙先生陷入苦闷之中。但他并未忘怀于创作。1950 年暑假,他参加了山东省农业调查团,深入乡村一个多月,收集了一些材料,回校后写了一篇散文投到《山东文艺》,但不久就退了回来。"旧的不能写,新的又不要,纯粹当一个教书匠,又不甘心,于是我苦闷彷徨了。我得感谢王统照先生,他当时主持中文系,他曾为当时的《胶东日报》(《青岛日报》前身)拉我一篇作品评论稿,我写了一篇《野草·风筝》评析,发表后,我非常高兴。"[①] 这是孙先生第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也坚定了他弃文

**作者简介**:张学军,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孙昌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山东省文联编:《山东文坛纪实》,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 年,第 109 页。

学创作改做研究的信心。王统照先生的一篇约稿，成为孙昌熙先生教学与专业上的一个转机。1951年《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孙先生的《鲁迅与高尔基》，论述了两者的友谊，鲁迅对高尔基的评论，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

1953年，在华岗校长的指导下，孙昌熙先生与刘泮溪、韩长经先生一道开设了“鲁迅研究”课。讲稿经过不断修改，陆续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最后结集成书，定名为《鲁迅研究》，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探讨了鲁迅的哲学、政治、科学和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了鲁迅小说、杂文、散文、诗歌和书信的创作特色，论述了鲁迅整理祖国文学遗产和介绍世界文艺的成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系统地研究鲁迅最早的一部书，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香港波文书局将此书翻印，前苏联、捷克的鲁迅研究专家对此书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孙昌熙先生走上鲁迅研究的道路。在鲁迅研究中，孙昌熙先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对鲁迅文艺思想和“小说史学”的研究。

## 二、鲁迅文艺思想研究

孙昌熙先生有着深厚的文艺理论素养。1944年在云南大理的华中大学教文学概论课程时，得到了李广田先生的帮助。李广田先生当时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学论”，试图以马列文论作为核心建立新型的文学理论。孙先生把李广田先生的讲稿借来，既认真学习，又吸收进课程中。由此接触到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的文学论。1956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组，孙先生转到文艺理论组，担任文学概论、文艺评论、文艺理论专题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此期间，孙昌熙先生主编了一本教材《文艺学新论》，1959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一部教材。1962年在准备教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孙先生在青岛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清人孙联奎著的《诗品臆说》，认为这是解说诗品很有独创见解的一部著作，于是与研究生刘淦合作把它和清代杨廷芝著的《廿四诗品浅解》合起来，作了校订和评价工作，题为《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196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重视，郭绍虞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齐鲁书社1980年再版。从事这些教学工作时，孙先生并未忘怀于鲁迅研究，这些积累为他研究鲁迅的文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孙昌熙先生招收了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基础、以鲁迅研究为方向的研究生，又重新开始了鲁迅文艺思想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范围。当时的鲁迅研究界热心于探索鲁迅小说的特色，或争论《故事新编》是否是历史小说，特别是集中于“油滑”应如何理解时，孙先生发现鲁迅的文艺思想是有待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能在这一领域有所收获，不仅能丰富文学概论的教学，而且对于创作和欣赏也有指导意义，还可进一步探索鲁迅的美学观。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文艺思想新探》，这是孙先生带领四位研究生撰写的一部系统的、新意迭出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论及到鲁迅文艺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创作、风格、欣赏等。当时的同类著作只有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两部书各有千秋。刘再复的著作以真善美为纲，以论述的系统性取胜；孙先生的著作则体察精细，对鲁迅的悲剧观、风格论、欣赏论等问题的探讨更为精确和深入。

孙昌熙先生很注意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学习，比较文学新学科启发了他对鲁迅比较文学观的探究。孙先生《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治古典文学的成就》（《鲁迅研究》丛刊总第6期）的论文，从鲁迅全部著述中钩稽出鲁迅的比较文学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孙先生认为鲁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的目的，是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孙先生指出：鲁迅比较文学观的形成，一是深受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影响，二是受到日本比较文学界的影响，三是中国传统的“校雠学”的影响，从校对正误，发展为有益的文学比较。

孙昌熙先生指出，鲁迅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治中国古典小说时，从印度、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

的关系中，发现了一个东方文学体系。鲁迅认为中国小说受印度佛教思想和故事的影响很大，印度佛教思想和故事传入后，与中国原有的巫风鬼道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六朝志怪小说。鲁迅先生认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① 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显示出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并且中国化了。鲁迅还看到中国小说受印度佛教思想消极影响的一面，由于报应思想的影响，遂产生说报应之书。如《续金瓶梅》就是宣传对于《金瓶梅》的因果报应。鲁迅先生批评说："这样的讲到后世的事情的小说，如果推演开去，三世四世，可以永远做不完工，实在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做法。但这在古代的印度却是曾经有过的，如《鸯堀摩罗经》就是一例。"②印度故事对于中国以输入为主，而中国对于日本则主要是输出，据鲁迅所掌握的材料，就是唐传奇中张文成的《游仙窟》、《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元刊本《全相平话》等传入日本。中国本土反而散失，而日本也尘封已久。1920年代，日本新发现了元刊本全相平话五种，于是又返回故国，鲁迅先生从这一现象中看到了比较文学上的一个"回返影响"规律。

孙昌熙先生指出，鲁迅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学素养，后来又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就使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了雄厚的基础。除了影响研究之外，鲁迅认为，在世界文学中存在着广泛的可比性，没有任何姻缘关系的文学同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因为人类总有些共通的东西。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把爱国诗人屈原同从无联系的诸摩罗诗人进行了比较，开辟了比较文学的新领域——无影响和实证的"平行研究"。在比较中，使我们认识到屈原这位诗人的局限：屈原虽然"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③。中国的刘勰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没有关系，《文心雕龙》也没有论述戏剧问题，鲁迅却把他们及其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人是古代东西两大文艺理论家，世界上的创作，"而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理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④孙先生认为，这种平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深入认识本民族的这份文艺理论遗产的价值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孙先生还指出，在神话研究上，鲁迅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广泛阅读了世界各国的神话，从社会发展共同性的角度，理解到小说起源于神话这一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他说："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⑤并以此结论反驳《汉书·艺文志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的旧说。他说："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从小说起源于神话。"⑥从而纠正了中国小说史上统治了很久的一个错误观点。

在过去对鲁迅的研究中，大都集中于对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中，还没有出现过对鲁迅的比较文学思想研究的成果，孙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研究鲁迅比较文学思想的第一篇论文，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鲁迅比较文学思想的引论，从而也确立了鲁迅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者的地位。

## 三、鲁迅小说史学研究

孙昌熙先生的《鲁迅"小说史学"初探》1989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多年思考积累的结晶，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鲁迅与中国小说史的学术专著。孙昌熙先生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着深厚的学养。幼读私塾时，就喜爱中国古典白话小说。1957年，孙昌熙先生出版了一本《怎样阅读〈三国演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1页。
③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④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记一篇》，《鲁迅全集》第8卷，第370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3页。
⑥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2页。

义〉》。可以说他一直未能忘怀于古典小说。当他将精力转向鲁迅研究之际，鲁迅与古典小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孙昌熙先生说过为什么进行这项研究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人写了这类文章，像郑振铎的《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1949 年 10 月《人民文学》)引起我的注意，但未决心去研究。只是在写《鲁迅研究·鲁迅整理中国文学遗产的成绩》一章时，稍稍翻读了一下，做了一般的介绍。在 70 年代中期，见有人在报上发表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论文，才引起我研究这部书的浓厚兴趣。"①孙昌熙先生曾两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都参考过《中国小说史略》，但未注意研究。从 1973 年开始收集积累鲁迅有关小说史的一切资料，并注意与鲁迅有关的人士关于这方面的回忆材料。从 1976 年开始，孙昌熙先生主持《鲁迅全集》中《故事新编》注释工作，涉及到大量的古典文献，为研究鲁迅的"小说史学"作了资料准备。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孙先生主编的《〈故事新编〉试析》，1982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鲁迅"小说史学"初探》共分八章，孙昌熙先生撰写了五章：我对"中国小说史学"的理解、鲁迅与《山海经》、鲁迅与《世说新语》、鲁迅论《聊斋志异》、鲁迅与《儒林外史》；另外三章是由钱振纲、黄健、高旭东研究生论文中的精华部分组成：分别是鲁迅论唐传奇、鲁迅论《三国志演义》、鲁迅论《水浒》。

孙昌熙先生首先提出了鲁迅"小说史学"的概念，这是对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所取得的成就最好的概括。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的开创者，他科学地整理、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就是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②。孙昌熙先生从鲁迅研究小说史的资料准备、科学方法、历史分期、发展规律、评价标准等方面，论述了鲁迅"小说史学"的体系。

在学术研究中，孙昌熙先生非常敬佩鲁迅考据整理资料的功夫。他说："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当然需要小说史料，可是由于中国历来不把小说当作文学，因而古代的小说史料就异常缺乏，必须从类书或古书的注释里去挖掘。这已经是一种繁重的披沙拣金的工作了，而汉晋以来的小说虽已较多，但中国文人向来是喜欢作伪的，也伪造了许多小说，如果不能识别真伪，就会造成严重的错误。"③鲁迅就指出过许多丛书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中的许多错谬之处：删削内容、别立名目、乱题撰人、时代错误等等④。如果不加以考据，而据此材料来写作，将会有损于中国小说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孙先生认为："考订材料的真伪及其所属的时代，不仅是一种繁难的工作，而且也得有古典文学的修养和科学的卓见的。"⑤鲁迅就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和科学的卓见史识。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之前，鲁迅就已整理出《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在讲小说史时，又整理出《小说旧闻钞》。孙先生认为，这是鲁迅为《中国小说史略》所做的"长编"工作。《古小说钩沉》是中国第一部校辑唐代以前小说的著述，从大量的类书中，辑录了唐以前散佚的三十六种小说，是《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到第七篇的主要史料。《唐宋传奇集》选载了唐宋小说四十五篇，鲁迅不仅校正了文句与作者的一些错误，而且在后面附了两万字的"稗边小缀"，考订了作者，并探究了故事的源流。这是《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到第十一篇的主要史料。《小说旧闻钞》收集了宋以后小说的四十一种史料，从此书引用的书目上，可知鲁迅参考了九十二种书籍，共一千五百七十五卷，并加了三十四条按语，对史料补缺正误。《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第十二篇至第二十八篇的材料，大都出于此书⑥。

孙昌熙先生发现鲁迅在研治中国小说史的时候，就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把作家作

① 《孙昌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46 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311 页。

③ 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鲁迅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第 304 － 305 页。

④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书的还魂与赶造》，《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238 页；《集外集拾遗补编·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132 页。

⑤ 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鲁迅研究》，第 305 页。

⑥ 参见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鲁迅研究》，第 307 － 309 页。

品与时代社会相结合，并将其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进行考察，“由于他是一个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和批评家，很早就注意了文学和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密切关系，从而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于是就以这种新的眼光研究了小说的发展与演变，发生和衰歇，解决了许多小说史上的问题”①。如六朝多产生志怪小说，则主要是受到佛道两教的影响。晋人崇尚清谈，讲标格，因而有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新语》面世。唐传奇的产生则与干谒名公的“敲门砖”很有关系等。再如《水浒传》的发展，由于水浒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荟萃取舍”，就使它有了多种代表着各个时代特点的版本，因而也就表现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性。于是从发展演变上，就可以看出各种版本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而清朝的武侠公案小说，则与当时的特殊的政治情势所影响到社会上产生的一种‘乐为臣仆’的心理有密切关系。”②

在小说史的分期问题上，孙昌熙先生指出，鲁迅并未拘泥于以朝代为小说史的分期方法。小说史主要是科学地、系统地对历代作家作品作“史”的合理安排和精当的论述。作家的文学观念、思想感情和创作固然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影响，但是由于各个作家创作个性的不同，其作品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同一朝代也就会出现不同的品类和流派。小说史上的各种品类和流派存在着继承与革新的成长过程，不会与朝代的更替取同一步伐，而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越是优秀的作品，越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所以小说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然，鲁迅并不忽视朝代与小说发展的关系，如唐代的传奇至宋衰亡，就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较多的篇章进行论述。但鲁迅更尊重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有时甚至以作品为篇题，如第七篇《〈世说新语〉及其前后》。“由于一种小说类型的变迁，一个朝代往往概括不了，因为它有一个成长期，它的发展往往经历两朝以上者甚多，所以鲁迅就以时代为经，以品类为纬，做经纬交叉之篇题，如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③鲁迅以时代为经，作品类型为纬的划分法，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完整的小说史框架，并把他研究中国小说所寻找出来的许多类型间的有机联系的规律充实到这一框架中，从而形成了他的科学体系。

孙昌熙先生深入探讨了鲁迅对古典小说发展规律的认识。鲁迅认为中国文学由于不断吸收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滋养而获得新的生机，不断前进。“这是鲁迅研究中外文学史，特别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的一大发现。”④鲁迅通过对小说性质的研究，发现中国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小说：士大夫创作与民间创作。这两类小说既是对立的，又是相互影响的。民间的话本小说对文人小说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中把这一现象说得很清楚。鲁迅指出：“《大宋宣和遗事》……就是《水浒》之先声。”⑤《聊斋志异》也是由于大量吸收了“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⑥的民间故事，才盛行不衰。虽然鲁迅在1934年才把它作为规律明确提出，他说民间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⑦。但是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就明确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如文人摄取民间话本改造成长篇白话小说等。并从自己的创作的体验中，——如《社戏》、《无常》等就吸取了民间文艺的素材——意识到民间文艺对于文人创作的重要性。

孙昌熙先生认为，鲁迅的“小说史学”充分体现出进步的民主思想与落后的理学思想两种创作倾

① 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鲁迅研究》，第311页。
② 孙昌熙：《鲁迅“小说史学”初探》，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页。
③ 孙昌熙：《鲁迅“小说史学”初探》，第7页。
④ 孙昌熙：《鲁迅“小说史学”初探》，第9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1页。
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16页。
⑦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

向对立、斗争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对立和斗争推动了中国小说历史的发展。孙昌熙先生指出："每当旧思想一度得胜，杂草丛生，文坛便荒芜起来。小说史也就来到黑暗时代。但总有新的作品破壳而出，进步的新生力量有不可战胜性，像宋之白话小说便冲破了宋传奇之旧壳而显示它的无限生命力，而且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代表了市民思想战胜了浸透儒家意识的宋传奇。"① 鲁迅比较研究了唐宋传奇的区别，指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②唐传奇往往写社会悲剧，人物也有反抗性，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即为一例。而宋传奇则以"团圆"剧取代了悲剧，如秦醇的《谭意歌传》，"盖袭蒋防之《霍小玉传》，而结以'团圆'者也。"③《谭意歌传》抄袭了《霍小玉传》的故事，把谭意歌描写成一个封建主义命妇的形象。宋代的理学思想影响了传奇的创作，理学家发明了一个调和社会矛盾、具有很大欺骗性的创作手法：以大团圆作结局，为封建统治粉饰太平。所以鲁迅认为，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宋代的士大夫在创作上实在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为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④宋代白话小说以"主在娱心"的鲜明特色，来对抗并取代了"文以载道"的、主劝惩的宋传奇，显示了市民民主思想的胜利。

孙昌熙先生认为，在宋白话小说之后向理学发起第二次冲击的是《红楼梦》。鲁迅多次高度评价《红楼梦》，充分肯定它的历史价值，说它是伟大的作品，冲出了大团圆的重围，写出了社会悲剧，"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⑤。孙昌熙先生认为民主思想虽然战胜了道学家思想，从而推动了小说史的健康发展，但是旧思想是不甘心灭亡的，"总是千方百计地挣扎和反扑，而且往往是改头换面渗透进新兴小说中来，一旦转化成主导一面时，小说史上便又出现衰落时代。如人情小说之末流，即才子佳人小说的盛行时，新形式的'大团圆'便再度风行：公子落难，佳人爱怜，金榜题名，奉旨成婚"⑥。另外，狗尾续貂也是一种反扑，如《红楼梦》自问世以来，续作极多，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等等，"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⑦，理学重新统治了小说创作。所以鲁迅在谈到中国小说发展的曲折道路时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⑧孙昌熙先生研究了鲁迅对中国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存在着"娱心"和写实的小说与"劝惩"的、粉饰的小说，这两种小说的对立发展，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进化、发展的规律。

孙昌熙先生还深入地论述了鲁迅评价古典小说的标准：反对瞒和骗之作，肯定反映现实人生的小说；批判投降之作，推崇反抗精神之书；在讽刺小说中，反对"私怀怨毒"，肯定"公心讽世"；在人物塑造上，反对主观臆造的失真和完人，推崇"真的人物"。

《鲁迅"小说史学"初探》在论及鲁迅与古典小说的具体作品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使鲁迅小说史学初具规模。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使孙昌熙先生在鲁迅研究中总有发

① 孙昌熙：《鲁迅"小说史学"初探》，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29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09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29－330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348页。
⑥ 孙昌熙：《鲁迅"小说史学"初探》，第15页。
⑦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8页。
⑧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1页。

前人所未发的独到见解。但由于孙先生年事已高，并患有眼疾，未能写出鲁迅论《西游记》和鲁迅与《红楼梦》两篇，这是孙先生的遗憾。

## 四、现代文学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中，由于一体化的文学格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被严格地限制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框架之内。这种政治型的文学史，具有突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强调阶级分析的特点，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特质。从而导致一大批作家或缺席、或被贬低，这就把多元形态的新文学史，局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孙昌熙先生与田仲济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大胆地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写作禁区，为新时期文学史写作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做出了表率。此著实事求是地面对史实，将一批过去受到忽视的作家如徐志摩、沈从文、卢隐、凌叔华、李金发等写入文学史，并重新评价了过去被贬抑的作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如胡适等，从而恢复了新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孙昌熙先生说过："我同大家一块，大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为了把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搞清楚，实事求是地编写这部文学史，还它以历史真面目，我研究了胡适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我同人合作写了《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并把它吸收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来。"[①]这篇发表在《文史哲》1979年第3期上的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胡适的历史作用基本上被否定了，并作为反面教员出现，这是不公正的。"文章从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提出积极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成就《尝试集》、《终身大事》等方面，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文章对胡适"五四"文学观念的本质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与重新评价，是对传统文学史观念的一个颠覆。这部文学史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政治书写的框架，但在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中却是最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专著。

1984年，田仲济和孙昌熙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现代小说史专著。这部著作以独特的视角，以作品中人物形象发展史为中心来研究小说史，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正如孙昌熙先生在此书"后记"中所说："这部书在写法上，也有一点新的尝试：那就是从史的角度，重点分析和评价新文学运动以来，随着时代的进展，不断出现的各类人物形象。……小说史就是不断创造人物的历史。它一方面是人物形象从粗糙到典型的艺术创新史，另方面则是在各种各样人物形象的变化发展中，反映出时代社会发展史。"[②]过去的文学史编写，大都将现代文学三十年分为几个阶段来叙述，这就将作家的作品分为几个阶段来分析，显得支离破碎。而这部小说史则避免了这种弊端。最重要的还在于这部小说史摆脱了政治的框架，突出了"文学是人学"的理念。

1987年孙昌熙先生与朱德发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新编的文学史"表现出将现代文学史书写由政治范式纳入人本范式的理性自觉；尽管这也是尝试性的积极探索，不过它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由政治型向人本型转换的重要标志"。它以人本文学史观为主导，努力写成"人性解放的形象史，人生奋斗的形象史，民族解放的形象史，阶级斗争的形象史，现代国人灵魂的衍化史"。"可以说这本书的编写体例完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政治框架，自觉地把现代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纳入了人学的轨道"[③]，从而显示出文学史写作中人的自觉。

孙昌熙先生除了主编了上述现代文学史著作之外，还写下了许多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论文。他除了写过鲁迅、茅盾、老舍、臧克家等作家的研究论文之外，还写了研究杨振声、闻一多、李广田、沈从文等作家的论文。他说："同时为了弥补现代文学史之缺，或者说为了丰富它的内容，我还注意到五

① 《孙昌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9－50页。

② 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80页。

③ 以上引文均见朱德发：《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四以来，在文学史上有过贡献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我认为这些作家不能因为他们的作品较少，而不写进文学史。如在五四初期即露头角的杨振声的小说创作，就应该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所以我同别人合作写了《论杨振声的小说创作》(1982 年第 4 期《文史哲》)，作为向现代文学史家们的一个积极呼吁。"[①]他还与张华合编了《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选编了杨振声的小说、散文和文艺论文 57 篇，集中地反映出杨振声创作的风貌。前有萧乾写的《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为代序，后附有孙先生与张华合写的《杨振声和他的创作》，对杨振声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论析，对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科学的评价。1989 年，孙先生又写下了《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教授教诲的日子》，高度评价了杨振声为在大学讲授新文学所作的努力，也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受教于杨振声先生的岁月。

晚年，孙昌熙先生有一种浓重的怀旧情绪，愈加怀念当年在北大、西南联大读书时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等老师，非常珍惜所结下的师生情谊。孙先生写研究他们的学术论文，也写怀念追忆的文章，都是纪念先师的一种形式。他不仅为杨振声编选集、写文章，高度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当年李广田先生借给他文学论讲义的帮助更是念念不忘，多次写文章谈到李广田先生的帮助，还先后写下了《铮铮铁汉，锦绣文章——李广田散文特色初探》(《柳泉》1982 年第 4 期)、《论李广田散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文史哲》1984 年第 4 期)、《评李广田散文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山东社会科学》1987 年第 2 期)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是对研究界长期忽略的李广田散文研究的一个补充，也对某些文学史认为李广田早期散文"题材狭窄"等的错误说法进行了辩驳。他指出李广田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其散文具有朴素真诚、沉郁而又清新的风格，在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篇章中，无不表现着作者的抗争之情和希望。他还写了《闻一多与〈山海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6 期)的学术论文，也写了《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山东文学》1985 年第 10 期)的忆怀文章。一缕缕的思念之情，织就了一篇篇难忘师恩的文章。这一篇篇文章，既弥补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之阙，也包含着他为老师生前身后被忽略的处境鸣不平的因素。

[责任编辑　贺立华]

① 《孙昌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50 页。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 (Serial No. 326)

# 文德翰彩　光及北辰

## ——略论蒋维崧先生的学术贡献与书法篆刻艺术

傅 合 远

**摘　要**：蒋维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书法篆刻艺术家。他不仅以深厚的学养在古文字研究、词典编纂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书法、篆刻艺术也在学问的辉映下，达到了耀古抗今的高度，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创作与审美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蒋维崧；学术；篆刻；书法

蒋维崧先生(1915－2006)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曾任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研究和辞书编纂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和影响。蒋维崧教授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篆刻艺术家，他曾任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山东大学艺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先后出版过《蒋维崧印存》、《蒋维崧临商周金文》、《蒋维崧书迹》和《蒋维崧书法集》等艺术作品集，他的篆刻、金文、行书艺术，以精湛的表现技巧、浓厚的学问气息和峻洁清雅、雍容和穆、蕴藉隽永的艺术风格腾声艺林，在当代书法艺术及篆刻界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蒋维崧教授的学术成就、艺术创造和历史影响作些浅探。

### 一

蒋维崧先生，字峻斋，1915 年 11 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曾祖父蒋曰豫，是晚清有名的学者，长于经史及声韵训诂之学，有《韩诗辑》、《问奇室诗文集》等行世，并兼擅书法，《清史列传・文苑传》有传。蒋家古籍书画收藏甚富，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氛，这使得蒋维崧幼年时期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1934 年，蒋维崧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此时，黄侃、汪东、吴梅、汪辟疆、胡小石等著名学者都在此执教，蒋维崧先生深受这些名师的指导和影响，尤对《说文》、《尔雅》、《广韵》诸书下了很大功夫，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 年蒋维崧毕业后，先后在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中央大学、广西大学担任助教、讲师。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中央高教部任职。他于 1955 年调入山东大学，先后在中文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文史哲研究院从事汉语言文字、训诂、音韵学等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过现代汉语、汉字发展史、《说文解字》研究、甲骨文、金文选读、书法篆刻实践等多门课程，培养过多届硕士生和博士生，历任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哲》编委等职。

蒋维崧先生在治学方面尤为勤奋用功，他不杂交游，常常闭门扃户，手不释卷，潜心读书和思考。蒋先生知识广博，学养深厚，其学术领域和成就主要在汉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学研究和词典编纂等

---

**作者简介**：傅合远，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山东书法艺术研究”(批准号：02520608)的阶段性成果。

方面。在文字学研究上，早在1940年，蒋维崧就曾应中央大学历史系金静庵先生之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所藏甲骨文字》作过释文。在研究方法上，他既遵循前辈学者如孙诒让、王国维等“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的途径，又注重根据文字在其应用环境中的具体情况，从文意、语法等方面综合论证，力求通过对古文字的考释，发现汉字结构的原则和规律。1963年，蒋先生在《山东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由隶变问题谈到汉字研究的途径和方法》一文，有针对性地指出汉字的发展由于造字观念和方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形声字的发展，对文字的古今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蒋维崧先生认为殷商时期的形声字，偏旁狭窄，偏旁的意义具体，但大致到春秋中期以至战国时期，形声字大量增加，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偏旁的使用范围较前宽泛，而偏旁的意义概括。当文字系统中还存在着大批象形字和图形式结构的时候，是无法用保持偏旁对应而改变笔画的方法来达到简化的目的的，只有当形声字大量产生，形声原则成为主要的孳生新字的方法时，汉字才有可能调整出一套定型的偏旁，同时简化偏旁的结合方式。汉字只有发展到了以定型的偏旁组合成字，以形声字为主的阶段，才可能完全脱离象形意味，隶书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该文视野开阔，分析细致精到而充分，“提出许多开创性见解，为建立新的汉字学奠定了基础”①，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蒋维崧先生在研究古文字的同时，也特别关注文字的现实问题。1958年，他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了《简化汉字建立汉字字形的规范》，1973年，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关于利用形声原则简化汉字的问题》等文章，不仅指出了汉字规范化的意义和标准，尤其强调利用形声字简化汉字的理论和方法，充分体现了他对汉字简化理论的深刻思考和关注。

1959年，蒋先生出版了《汉字浅论》一书，概括而精辟、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汉字的产生，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及对其使用和改革等重要问题，其卓识高见深受同行专家的称赏，曾被一些高等院校列为语言学教学参考书。

蒋先生深厚宽广的学问，严谨科学的态度与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尤体现在他担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的工作中。这部词典的编纂与撰写自1975年起历时十几年，是当时全国最重要、最重大的科研项目之一，其目的是要对我国语言词语作出历史性的最为系统最为权威的整理与编纂，以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语言词汇内在含义的丰富性，以及词汇使用的规范性。词典的词条数以万计，虽精微琐细，却是一部涉及哲学、历史、法律、文学、语言、艺术、民俗、天文、地理等学科知识，内容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为了完成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蒋先生不惜放弃已启动多年的研究课题，甚至将有待清定的书稿也暂时放进书橱，其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令人感佩。

在《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中，蒋维崧先生敢于认真负责，不仅在组织编纂队伍、培训编纂人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针对编写队伍存在的问题，根据自己多年的词典编写经验，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汉语大词典》编写指导意见：(一)分析词义，要注意词义的变化，既要弄懂一个词在其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确切意义，又要分析其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差别，以及意义变化的源流脉络，发展线索与性质；(二)释义要抓住要害，力求准确；(三)要认真审核资料，不能收破词；(四)要从上下文文意的联系中推求，要与其他书中用例互证，避免臆测②。蒋先生还特别强调说：“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要用尽可能完备的文献资料把问题捆起来，然后一棍子打死它。这样这个问题解决了，就等于把它打死了，永远翻不得案。当资料尚不完备时就先不要忙于下结论。”③蒋先生也正是这样善于将合理的

① 刘聿鑫：《蒋维崧》，《师门琐忆——纪念蒋维崧先生》，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② 刘聿鑫：《蒋维崧》，《师门琐忆——纪念蒋维崧先生》，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74－75页。

③ 刘晓东：《我所了解的蒋峻斋先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44页。

归纳与细致的分析相结合，对大量的词条作了沙里淘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富有建设性的辨析与确认，不仅发掘了一些词义的精确含义，也汰除了旧辞书中的一些“破词”，修正了某些词汇由辗转因袭而产生的缺陷与不足。如“女伴”一词，有的辞书解释为“女性伴侣”，书证是唐代孟浩然的《庭橘》诗“女伴争攀摘，摘窥碍叶深”，明代孟称舜的《桃花人面》第二出“笑将女伴携双手，闲向空庭看海棠”等。蒋先生认为，根据用例，应分析出“女伴”一词所指的变化。古代只称“女子的女性伴侣”，近现代以来才泛称“女性伴侣”，这样就更为准确地把握了“女伴”词义的古今变化。按《汉语大词典》的性质，只简单地释为“女性伴侣”是不合适的。再如，《词源》收了“奴官”一词，并释为“唐时出身低贱的下级军官”。书证是《旧唐书·王毛仲传》：“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蒋先生则旁查《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八年》，发现断句应是“北门奴，官太盛”，并进而认为“奴官”并非一词，是破词，不能录用①。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进一步提高了《汉语大词典》的编写质量。

蒋维崧先生在《汉语大词典》的审稿定稿过程中，极为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视学术为生命。由于长时期的劳累，有一次竟累得晕倒在椅子上。蒋先生从没有大学者、名教授的架子，姿仪高朗，谦光下逮，因而同事和青年学子遇到问题，总是先想起先生，愿意向他请教，而且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解答。有一次，《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开会，外地的一位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有一个词，自己花了很多功夫，至今未找到用例。当这位同志发言结束时，蒋先生已经从书架上取下《文苑英华》，并在此书中找到了该词用例。这位同志非常惊奇，但先生却平和地笑着说：“我的学问都在书架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先生的学问是记在心里边的。

蒋维崧先生谙熟古籍，经常为出版社和学者待要出版的著作审稿，他对发现的问题总是毫无保留地指出来。在翻检审阅《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一书时，蒋先生即曾就多处文字指疑并提出修改意见。如刘禹锡《马嵬行》诗中有“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之句，近人大都认为“杏丹”出自葛洪《神仙传·董奉传》，蒋先生则广搜《云笈七签》、《太平广记》等书证，认为“杏丹”即“杏金丹”②。像这样极有价值的发现，是完全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而蒋先生却都作了无私的奉献，实为难能可贵。先生的学问，不仅宽博，而且精深。《汉语大词典》编写组都认为蒋先生改的稿子，最为“服人”，自己写的卡片，只有经蒋先生审后，心里才踏实。《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先生更说：“蒋先生看了的稿子不用再审。”③这是对蒋先生学问深厚的肯定，更是一种称誉。

蒋维崧先生不仅学问渊博精深，而且品行雅洁，人格高尚。2001年，蒋维崧先生毅然决定将60余幅书法精品捐献给学校。2002年，他被学校聘为特聘教授，每年有10万元的津贴，他表示不要，有人提议用津贴设立“蒋维崧奖学金”或“蒋维崧艺术基金”，他也不肯。最后，他作出决定，将津贴捐献给了“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在当今这种物欲、利欲横流的时代，蒋维崧先生所展示出来的高风亮节和无私奉献的人格精神，实为学人之楷模，令人敬仰。

## 二

蒋维崧先生在书法篆刻艺术上，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鲜明的创新意识，取得了卓然不群、独开胜境的艺术成就，是当代最享盛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金文、行书，片纸只字，人争以为宝，深为国内外艺术收藏家或机构、拍卖行所青睐。但蒋维崧先生从不以著名书法家自居，他说：“我不是‘职

① 刘晓东：《我所了解的蒋峻斋先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43页。

② 刘聿鑫：《蒋维崧》，《师门琐忆——纪念蒋维崧先生》，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③ 刘聿鑫：《在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工作》，《师门琐忆——纪念蒋维崧先生》，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业'书法家，我有我的职业，所以不受人牵制。"[①]他以学问为立身之本，使其艺术创造具有了一种摆脱功利束缚，超然独立，自由表现的精神。但这绝不意味着，书法对于蒋维崧先生仅仅就是"余事"、"雅兴"而已。蒋维崧先生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在青年时期就对多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情。他不仅喜欢书法、篆刻，还学过国画。他的律诗也写得典雅清丽，曾得名家"诗格在唐宋之间"[②]的赏评。但蒋先生不想做一位兴趣广泛多艺兼能的艺术通才，而希望成为在某种艺术形式上有独特创造的艺术大家[③]。为此，蒋先生不仅割舍了对国画的学习，古诗在后来也作得很少，只有书法、篆刻成为伴随他一生的艺术追求。即使在他长期担负着繁重的本科、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期间，也始终没有淡化和中断对书法的兴致和关注，减却对书法艺术探索创造的热情。尤为可贵的是，在完成《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后，已是古稀之年的蒋维崧先生，却焕发出极大的书法热情，以惊人的毅力遍临古代名迹法帖。从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的《蒋维崧临商周金文》来看，他临写金文之多、之勤，所花功夫之深，实属罕见。除此之外，他在这时还临写了大量小篆、古隶、帛书、甲骨、行书法典等。甚至在医院的病房里，对来探望他病情的人还询问："你最近看到我的书风有变化吗？""我最近吸收了楚简的成分。"[④]以此，足可见出他对书法的执著和志在高远的理想与抱负。

也许是一种巧合，翻开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蒋维崧书法集》第一幅作品，蒋维崧先生书写的正是屈原《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语，这似乎也正是他对书法艺术探索的心迹的写照。它表明，当中华书局结集出版能代表其一生书法艺术成就的作品集时，面对那些曾注入心血、情感，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作品，蒋维崧先生并没有表现出不期而遇的快感和收获的喜悦，而是对自己辛勤耕耘、艰辛而漫长的探索之路流露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孤寂与苦闷。艺术贵在创新，创新才有艺术生命和价值。创新是每一位艺术家苦苦追寻的理想。但艺术创新不是空洞的口号，也非抽象的概念，它是以确立新的艺术理念，找到具体的艺术表现和创造的新手段、新方法、新形式为前提的。特别是作为最具民族文化特质的书法艺术，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发展得极为充分和完善。因而作为现代艺术家，若没有可以燃烧的激情、钢铁般的意志与信念，高深的艺术修养和远见卓识，是难以穿透这铁壁铜墙一般的堡垒，走进去，又跳出来的。这一点，也是蒋维崧先生所不能回避的。他要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想在书法艺术史上占有位置，势必也要思考艺术的创新以及创新的方法、途径，寻找艺术创新的突破口和艺术价值的立足点。虽然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专门的著作和论文发表，但从他平时与友人或学生的谈话里透露出了个中消息。他认为："艺术的创新，重要的是要根据现在的眼光和现今的资料，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探索。"[⑤]又说："历史上为书法作出贡献的书法家，无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吸收，增添一些新的成分，以成就自己的面目风格。这些就可以成为创新。所谓增添新的成分，究之也还是来自广泛借鉴，善于吸收变化，至于利用新资料，开拓前人所未能涉足的领域，当然更是一条求新的道路。"[⑥]可见，蒋维崧先生的艺术创新思想就是"借古开新"，即借助只有在现代才能发现的古代的文物和书法资料，用今人的综合学养和审美眼光，加以发掘培育和创造，赋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活力，以弥补历史的局限和不足，体现出当代艺术家的创造精神与境界，从而确立自己的艺术地

---

① 徐超：《学垂典范，艺壮国光》，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26页。

② 周冰：《蒋维崧与潘伯鹰》，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218页。

③ 清如：《回忆峻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210页。

④ 刘聿鑫：《在古籍整理研究所、文史哲研究院工作》，《师门琐忆——纪念蒋维崧先生》，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62－63页。

⑤ 徐超：《学垂典范，艺壮国光》，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23页。

⑥ 蒋维崧：《书法篆刻的借古开新》（1992年9月19日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演讲），转引自俞黎华：《蒋维崧先生篆刻艺术刍议》，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67页。

位和价值。从蒋维崧先生的艺术创新思想与实践来看，他在篆刻、金文、行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而高超的艺术成就，都是这种创新意识与方法的深刻体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把握蒋维崧先生对金文汉字所蕴藏的艺术价值的发现、提升和创造性的融会贯通是了解蒋维崧篆刻、金文、行书艺术创造与表现的一把钥匙。

蒋维崧先生的艺术才能，最早是从其篆刻艺术成就中体现出来的。早在中央大学求学期间，为满足自己的艺术兴趣，他便到艺术系选修著名词人、篆刻家乔大壮先生的篆刻课程。在乔先生的精心指导与点拨下，他的篆刻艺术水平提高很快，22岁时其篆刻作品就参加了全国艺展。乔大壮先生对蒋维崧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华更是器重，不仅将他收为弟子，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陈师曾印蜕》郑重相传，更有"要从此事叩皇坟"、"千秋名氏要烦君"[①]的诗句相赠，字里行间对蒋先生的艺术未来寄予厚望。蒋维崧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其篆刻愈刻愈精、愈奇，新意迭出，一时名动山城重庆，蜚声艺林。大画家徐悲鸿多次请蒋维崧刻章，章士钊在获得蒋维崧的刻章后，还以"作者篆刻擅巴蜀"的诗句相赠，更有不少学者名士，以得到或收藏蒋维崧的印章为幸事。

蒋维崧先生的篆刻，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突破了"印崇秦汉"的历史局限，比其师乔大壮先生更为自觉大胆地将金文等多种文字引入印刻。从其《蒋维崧印存》来看，不仅有金文、小篆，还有甲骨文、战国文字、汉隶等古代文字，甚至将楷、行、草书等今文字体入印。正是入印文字体势的增加，进一步丰富了印刻的表现素材和艺术手段，开拓了篆刻艺术的表现空间和审美元素，使印刻艺术的形式也更丰富多样、清新别致。

蒋先生篆刻的另一特征，是章法布局的精巧雅洁。他的印刻虽文字体式多样，但并非简单地照搬或集字式堆积于印面，而是根据印刻之材料、文字，甚至用途等作出精心的构思与设计。特别是其金文刻印，多使字的部首揖让、向背，顾盼有意；线条的屈伸、长短、参差、穿插，奇正相生；虚实、疏密，既有对比又和谐统一。有的清新简淡，有的雍容华贵，有的疏朗素洁，更有不少字数多的印章，将方寸之中的空间排列变成了一维的连贯运动，跌宕起伏，逸奇多姿，有很强的抒情感。他的刻印刀法精湛，既峭拔洗练，又含蓄婉畅。他奏刀时从不残损印面，全凭巧妙构思，而无刻意雕饰之弊，看似自然无为，其实独具匠心。每方印章，都是一个有品格有意味的表现形式。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蒋维崧印存》"出版说明"中称蒋维崧是乔大壮篆刻艺术的唯一传人，蒋维崧先生在92岁高龄时，被中国篆刻艺术院聘为名誉院长，足见蒋维崧先生篆刻艺术的成就与影响。

蒋维崧先生的金文书法也达到了独步当世、引领风骚的艺术境界。所谓金文，主要是指商周时期铸刻在钟鼎等铜器上的铭文，它是处于甲骨文之后与秦小篆之前的一种古文字。这种古文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亦如同商周青铜礼器一样，被历史封存了。直到清中叶，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商周青铜器陆续出土，金文才得以重见天日。一时虽有不少古文字学家，如吴大徵、罗振玉等都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他们在对金文汉字的研究及揭示金文在汉字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在发掘金文的艺术价值上，或因方法和书写功力等局限，未能摆脱小篆的影响，也未能使金文的艺术特质更充分地凸现出来。吴昌硕等虽在篆书的用笔用墨方面富有创造性，但也主要限于小篆或石鼓文，很少触及到金文，而蒋维崧先生则是在专业从事数十年古文字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以艺术家的敏感，洞见到了金文汉字所蕴藏着的极大的艺术价值。如果说深厚的古文字修养，使他能更准确地把握与理解金文汉字结体造型的法则与规律，保证其书写的规范，那么，从艺术的角度，对金文所作的长期大量临摹实践，则使他领悟并揭示了金文汉字的表现手段和艺术价值。从蒋维崧先生的金文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金文书法的用笔、结体和审美特点方面都有独特的发现与创造。

---

① 刘晓东：《我所了解的蒋峻斋先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45页。

首先，在用笔上，金文书法与其他书体，特别是与甲骨、小篆等古体书法存在着差异。书法艺术的用笔，决定着线条的特质。书法中篆、隶、真、行、草等不同的书体与审美都是由于不同的用笔方法决定的。蒋维崧先生在对金文大量临写和艺术创造过程中，发掘出金文的书写笔画，大都是藏锋逆入，行笔有一个用力提按的动作，顺势出笔。它既不同于甲骨文的直入顺出，起收皆见锋锷，也不同于小篆藏锋逆入，行笔平提，收笔回势。正是用笔的差异，决定了甲骨、金文、小篆线条的不同变化。甲骨文的线条是率直显露的，既不婉转优雅也少变化，而小篆的线条则是瘦劲修长，粗细均衡，藏头护尾，无往不收，但线条的运动指向相对封闭，缺少些开放、张力和动感。只有金文的线条，有藏有露，有收有放，既圆浑厚重又有粗细、轻重疾徐的节奏变化，是最富有运动感和表现力的。

其次，在结体造型上，金文既不像甲骨文那样，短促拙朴，率直寒俭，缺少圆活柔婉之态，也不似小篆那么峻伟修长，端庄谨严，太过理性排布而少从容随机的变化。金文的结体是奇伟宽和，雍容醇厚，既变化多姿，又不乏自然天成之妙，是最富艺术表现潜质的。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蒋维崧先生对金文汉字艺术发掘的意义，更可窥见其金文书法艺术创造的价值与魅力。

把握蒋维崧先生对金文汉字艺术价值的开发与提升，是认识蒋维崧篆刻、金文、行书艺术创造与表现的一把钥匙。蒋维崧先生的金文书法，在用笔上，不仅发掘了金文汉字笔画中的动感，更用行书的笔意和墨色变化强化了这种动感，其线条浑圆挺劲，伴着提按轻重疾徐的运动，纵横延宕，既参差错落，奇正相生，有容纳万物，妙合自然之意趣，又善于提炼升华，笔笔有势，俯仰顾盼，刚柔并济，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长，有似夫忠臣抗直，补过匡主之节也；矩折规转，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顺，慎终思远之心也；耀质含章，或柔或刚，有似夫哲人行藏，知进知退之行也”①，蕴理而意深，又或博雅峻伟，风华高洁，疏旷朴茂，或超然悠游，蕴润谐和，文采斐然，华光射人，达到了“博采众美，合而为字”②，“书则一字已见其心”③，已见其意，已见其情的艺术境界。蒋维崧先生的金文艺术，真正实现了金文的书写规范与艺术创造的自由，古朴典雅的金石气息与现代鲜活的人文风采的和谐统一，从而使金文字体在数千年的沉寂之后大放异彩，成为现代书法体势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开拓与创造。

蒋维崧先生的行书，更有着超逸脱俗，妙造高韵的审美价值。蒋维崧学书，早年由其师乔大壮引荐，师从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沈尹默。沈尹默师曾把其研究书法用笔的理论成果《执笔五字法》手书一册传与蒋维崧，以此可见出老师的厚爱与期待。蒋维崧的行书可以说是从沈尹默师入，而远循“二王”法典的。从其早期的行书来看，虽清新雅洁，舒和柔婉，体完法备，但尚未脱沈尹默先生书法的影响。直到中年以后，蒋维崧先生广开视野、博涉众家，融宋米芾之超逸、唐怀素小草千文之简淡，特别是他创造性地将金文笔意用于行书的表现，使他的行书显示出了独特的创造和个性特征。

蒋维崧先生的行书，最突出的特征是用篆书笔意，“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④。起笔不出虚尖，收笔也不作重按提顿，无偏侧圭角之弊，有浑凝圆通之妙。在结体上，也受到金文的影响，不作平正安稳之态，以倚侧造势，挺然舒秀，峻洁清丽，别有韵致。在章法布局上，行距疏阔，而字距势密，虽字字独立，但笔断意连，如线穿珠，形圆势畅而不可破。他的行书创作真正到了欣然落笔，未有不达于心灵之奥者，胸中所郁，也未有不显于腕下笔端者，不思而为，却尽显神奇，超然法外又了无遗憾，最为充分地表现了其高韵深情。它如山涧溪流，可洗污涤浊，亦如林中朗月，清辉浴人，使人沉静、渊默，又顿生登高远上之心。若不拘于字法形相，而论空灵韵致，蒋维崧先生之行书，可超宋逾唐，直接东晋“二王”一脉，其卓尔孤标、耀古抗今，而毫无愧色。

---

① 张怀瓘：《书断》，潘运告编著：《张怀瓘书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② 张怀瓘：《书断》，潘运告编著：《张怀瓘书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③ 张怀瓘：《书断》，潘运告编著：《张怀瓘书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④ 蔡邕：《九势》，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页。

蒋维崧先生所具有的深厚渊博的人文学养，是他艺术表现与创造的灵魂。正是由于具有渊博的知识、超人的洞见与敏感，蒋先生发现了金文汉字的艺术价值，并使自己的艺术创造显示出巨大张力，从而深化了艺术技能技巧的精神与文化内涵，达到了"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①]的境界。蒋维崧先生篆刻、金文、行书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有其一便可名家、立世，而居其三为一身者，在当代书坛，实少有与其媲美与抗衡者。

## 三

蒋维崧先生不仅学垂嘉誉，艺耀古今，他所表现出来的以学问滋养艺术，以艺术辉映学问，学艺双修，道艺两进的思想和道路，对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当代书法艺术创作与发展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蒋维崧先生坚持文字学研究与书法艺术创造密切结合，在"汉语言文字学（含书法）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生，在"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这对山东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发展，具有创新和开拓性的意义。我国的书法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虽早自汉代，它就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一起，形成了一套素朴的学习方法和制度，但真正将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和学科，而同其他艺术形式与专业分开，并形成一套由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组成的完备的现代教学体系，则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才完成的事情。书法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点在全国的设置和分布极为广泛，大部分设置在有美术学专业的师范和艺术院校，也有的放在综合大学的古典文献学、古典文学和文艺学、历史学等专业，而山东大学则是放在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蒋维崧先生自1984年起，即在"汉语言文字学（含书法）研究"方向设置美学理论课程，招收和培养有书法特长的硕士研究生。这不仅在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中是首创，即使在国内也尚不多见[②]。2002年，蒋维崧先生被山东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时，学校曾有意让其在艺术学院招收博士生，但蒋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形式，高层次艺术人才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高治学能力和综合的人文素养，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至于锤炼艺术的技能技巧和临帖，应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在学校期间所能完成的，因而他还是坚持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学"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蒋维崧先生坚持学问修养的提高与艺术创作并重的思想，既充分体现了山东大学作为重点综合院校在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和传统，也确立了山东大学在这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特点。这种特点，对全国其他院校的书法艺术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从蒋维崧先生在这一学科的人才培养实践来看，他所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是既能做专业学问研究又能进行艺术创作的两栖人才。他们中已有不少人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突出造诣，在艺术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其次，蒋维崧先生的书法艺术，特别是对金文汉字的艺术开发和创造所表现出来的成就和境界，对当代书法的发展和审美取向也具有积极影响。

在对金文书体的艺术开发和创造方面，正是赖蒋维崧先生的苦心冥探和不懈努力，发掘和总结了金文书法的用笔、结体、审美与表现特征，并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对这一铸刻工艺实用性文字作了一次自诞生以来最重要的文人化改造，才使其潜在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表现力获得了充分的提升和显现。不可否认，在蒋先生之前已有一些文字学家和艺术家对金文汉字的艺术价值作了一定的探索与发掘，但都未达到像蒋先生这样将金文汉字书写变成真正的艺术创造，使金文艺术获得极大提升，成为一种与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艺术体式的程度。由此，我们可以说蒋维崧

①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9页。

② 刘聿鑫：《蒋维崧先生对自己书法艺术的看法》，《师门琐忆——纪念蒋维崧先生》，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先生对金文汉字艺术的开发和创造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前无古人的。

康有为在评价清代邓石如在小篆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时曾指出："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①笔者认为这种评价化用于蒋维崧先生在金文艺术发展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似更为适合。大匠给人以规矩，他既为人设置障碍，也为他人更高层次的探索提供了方法和途径。我们已经看到，当今不少写金文者，从运笔到结体，多受到蒋维崧先生的影响和启发。

蒋维崧先生书法艺术的表现境界也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具有启示意义。

宗白华说，中国艺术，唯书法"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特征"②。书法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样式，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美学积淀与传统。所谓"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③，明清重性情等，无不是书法心与物、意与法、情与理、神与形、自由与必然、优雅和谐艺术风尚与审美思想的历史体现。

自进入20世纪，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大量涌入，民族文化和审美传统受到了极大冲击，书法艺术的审美思想也发生了裂变。也许是人们想迫切地展现书法的当代性，急于创新，以新为美，魏碑热、章草热、小楷热、汉简热、象形字热等等，追热成风，但这种创新如果不以深刻的创造为参照，其新也浅，其新也俗，或沦为丑、怪。艺术应该强调个性，追求自由，但这种个性和自由如不以熟练地掌握艺术的技能技巧，遵循艺术的规律为前提，任笔为体，那么这种个性和自由就要走向艺术的反面，不仅因为缺乏超越性而导致平庸低俗，甚至表现美将会沦为展示丑。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创作虽然繁荣，从书者众，但其审美价值和表现境界却令人忧虑，而蒋维崧先生的艺术创造，则表现出了超拔时俗、昂首天外、高标独立的历史价值。蒋维崧先生对书法艺术的创新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曾经说："艺术出新，并不是要把旧的东西推倒重来……以为一定要搞得面目全非才是新，结果只好从丑、怪、僻里找出路，以至于走上邪路。"④蒋先生的金文、行书艺术，不仅深入古典传统，发现古人的优势和薄弱环节，锤炼笔法，技艺精湛，更善于用深厚的人文学养、开阔的胸襟、高尚的人格精神改造传统，创造出更富内在精神和意趣脱俗、境界深远、具有时代审美特点和个性的艺术精品。可以说他格调高雅、意蕴深厚的艺术创造不仅为这一古老而传统的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指出了向上一路，将对现代人的书法创造和审美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曾在蒋维崧行书《东坡诗长卷》题跋中写道："文德翰采，光及北辰。"⑤如果说前一句是对蒋先生艺术精神特质的概括，那么后一句以"北辰"对"群星"的妙喻，实为对蒋先生书法在当代艺术中历史地位的允评。著名书法家陈梗桥先生更认为蒋先生的书法已经达到了艺术典范的境界："典范不是唯一的，典范的意义是永恒的。"⑥典范也只有在历史的重复性解读中产生意义，发挥作用。蒋维崧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创造成就与贡献，必将在现代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①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790页。

② 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3页。

③ 董其昌：《容台集》，崔尔平选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④ 靳鹤亭：《诗文满腹，书艺风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103页。

⑤ 清如：《回忆峻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206页。

⑥ 陈梗桥：《典范》，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9页。

# 俗文学、满学与敦煌学家关德栋先生

叶 涛

**摘 要**:关德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满学和敦煌学研究专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业绩,为我国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等学科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关先生的俗文学研究工作在曲艺方面用力最多,发掘也最深。其俗文学研究的另一大批成果,则表现在资料的搜集和古籍文献资料的编纂方面。他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的《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是我国有计划地直接从满语原文翻译这部重要史料的开始;与此同时,他还先后进行了"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关德栋先生还是 20 世纪 40 年代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著名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学者。

**关键词**:关德栋;民俗学;敦煌学;满学

关德栋先生(1920－2005)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满学和敦煌学研究专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业绩,为我国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等学科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 一、生平述略

关德栋先生,满族(隶属镶黄旗籍),北京人。其父是一位清贫的中学教师,艰苦的生活,严格的家教,培养了他倔犟坚毅的性格,养成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

1939 年,关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学习期间,正是 30 年代中国俗文学学科创建的初期,先生受郑振铎、钱杏邨(阿英)、赵景深等著名学者的影响,开始了对俗文学的研读。他善于继承前人的业绩,又勇于开拓创新,40 年代之后接连发表文章,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大学毕业以后,关先生先后任北平中国佛教学院讲师、沈阳博物院档案编整处满文档案翻译组组长、上海佛学院教授、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副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师。建国后先后担任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副教授、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 年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直至去世。

关先生曾于 1983－1984 年获得美国路斯基金,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邀请,赴美讲学。1993 年又获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基金,应邀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和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学系从事合作研究。

关先生在大学任教的数十年间,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蒙藏佛教史、佛典文学、民俗学、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概论、明清俗曲概论、敦煌文献研究和梵文等课程。从 1955 年起培养研究生,1981 年后又指导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硕士和博士进修生,进行"敦煌学"、"宝卷"、"聊斋说唱"、"明代时调歌曲"、"满族谚语"、"讲唱文学"和"中巴关系史"等课题的研究及论文撰写。

由于关先生德高望重,他还被聘任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名誉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民

**作者简介**: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文联委员、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目录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满族现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国民间文艺辞典》、《民间文学大辞典》等，都设专目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

## 二、俗文学研究

关德栋教授的学术成就涉及多个方面，但其核心则是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学术成果也多集中在这一领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始自"五四"前夕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活动，而其体系的建立，则应从1938年郑振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俗文学史》算起。关先生作为郑振铎的学生与朋友，一踏进学术的领域，便与俗文学、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俗文学领域中，曲艺这种艺术形式历来占有重要地位，关先生的俗文学研究工作也在曲艺方面用力最多，发掘也最深。1958年初版、1960年重版、1983年新1版的《曲艺论集》，是先生曲艺研究的代表作。

《曲艺论集》收录关先生不同时期的论文22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曲艺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校订的文章，其中有的提供了珍贵的曲艺文学资料，有的是对一些曲艺文学作品作了叙录、评价和整理，有的则属于书志学范围，介绍了某类曲艺文学的版本目录；另一类文章则是对曲艺文学中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有的考证曲艺文学作品用字命名的来源，有的探讨了曲艺文学中某种样式的源流和发展，有的阐述了曲艺文学中某种样式的体例。《曲艺论集》因其学术价值的重要，已作为专门条目载入《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民间文学词典》等。

关先生俗文学研究的另一大批成果，则表现在资料的搜集和古籍文献资料的编纂方面。

早在1950年，先生就编辑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此后1959－1962年与赵景深教授共同筹划编校出版了"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关先生出版了校序《挂枝儿》、《山歌》，以及《贾凫西木皮词校注》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整理校订明代作家冯梦龙辑集的《挂枝儿》与《山歌》所作的两篇序言都很长，合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本书。在两篇序言中，先生对这两种民歌形式的起源、流传、历代辑集的情况、冯本的特点、内容分类、作品的艺术特色等作了精到细致的分析，又特别对冯梦龙为民间文学、俗文学的贡献作出了大胆的评价，肯定了冯梦龙在搜集和编辑这类民歌上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关先生指出："冯梦龙(1574－1646)是在明代热爱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人士中，工作较早、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几乎是用尽了毕生的精力从事着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写的工作……他这种以最大热忱不倦工作的精神，是同时代文人、作家难于与之相比的。"(《挂枝儿·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冯梦龙在《童痴一弄·挂枝儿》'刊布成帙，举世传颂'后，虽为当时人们攻讦，但是他并没有怯生生地对着这一大宗民间文学遗产望之却步，反而是以更大的勇气、热忱继续搜集着《山歌》，辑集成《童痴二弄·山歌》。这种精神、魄力，在明代较进步的诗人、作家当中却是仅见的。"(《山歌·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冯梦龙曾根据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感受，归结当代民间歌曲的优点在于：抒写的'是真境'，所以它们'自有真趣'，是'天地间自然之文'。因此在《叙山歌》里，首先认为'山歌'是'民间性情之响'，'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又从创作态度和动机方面分析说：'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这正是针对当时文人诗歌创作当中的缺点来论证，是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的……他认识到民间情歌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和作用，明白宣布要用'挂枝儿'、'山歌'来表现真挚的爱情，与虚伪的封建礼教抗争。这种战斗精神的表现，在明代较进步的诗人、作家当中确乎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可见《叙山歌》在研究冯梦龙思想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上，是篇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文献资料"(《山歌·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关先生对蒲松龄的研究则采取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开辟了一方使人耳目一新的天地。

《聊斋志异》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但因为这部书是用文言写成，文化水平一般的读者

不易领略。俗文学中的"志目"是《聊斋志异》的一种普及形式。它以通俗文艺特有的艺术手段，为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扫除了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满足了广大民众欣赏《聊斋》故事的渴望，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特别值得引人深思的是：将《聊斋志异》改编为通俗文艺形式"志目"的第一个人正是蒲松龄自己。他在《聊斋志异》书稿已经流传并得到了同时代名位极重的诗人王士禛(渔洋)的赏识与推重的时候，忽然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作品翻改成为当时文人所不齿的"俚曲"，他这样做的目的正如他儿子蒲箬撰写的《故显考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所指出的："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媳之梦。"他知道把《聊斋志异》的故事改写成通俗俚曲，可以产生更深入人心的艺术力量，"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由蒲松龄开始的俗文学"志目"，以其动人的艺术活力在民间流传百余年，但是，不幸如其他民间文艺作品一样，一向被士大夫们判为"卑不足道"、"不登大雅之堂"，一般只在下层社会中流传，或在艺人的记忆里保存，较少有刊本传世；即使偶有记录传抄，往往也不为学者们所注意。当这些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它们的抄本已经成了难得的珍品。

关先生为了满足人们艺术欣赏和探讨《聊斋志异》艺术影响的学术研究需要，以他独具的眼光，广为搜集资料，先后编成出版了《聊斋俚曲选》(1980年)、《聊斋志异戏曲集》(1983年)、《聊斋志异说唱集》(1983年)、《聊斋志异话本集》(1991年)，书之卷首，都载有反映研究成果的长篇前言。例如，《聊斋志异说唱集》的前言，在研究了170多个传统说唱"志目"的基础上，对"志目"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形式的俚曲、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宝卷、弹词和评书一一进行分析，分别对这些说唱形式的起源、与《聊斋志异》的关系、著名说书艺人的事迹、"志目"唱本的内容与流传、艺术特色、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作用、前人所编"志目"选本等均作了详尽的介绍与评价。其对于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为当时文人所不齿的俗文学"志目"的倾心与用力，明明白白渗透在文章的字字句句当中。

从蒲松龄自编《聊斋俚曲》，到百余年间聊斋故事说唱的"志目"在民间山花野草般地流行与传播，再到关先生对聊斋的各种说唱形式的苦心搜求、保存资料、精心进行研究的经历，反映了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就存在着的两种天地、两种志趣。也许只有对此作出充分的比较研究之后，才能充分地估计关先生从特殊角度对蒲松龄、对《聊斋志异》、对聊斋故事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作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 三、满学与敦煌学研究

关德栋教授博学多闻、涉猎广泛，并能用满语和多种外文资料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关先生作为满族人，自幼受到满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精通本民族语文，在满族文化研究、满汉文化交流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先生早年搜集校订的满汉语混合子弟书《螃蟹段儿》、《升官图》以及满文俚曲《黄昏卸得残妆罢》等，就是了解和研讨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宝贵资料。1946年至1947年，先生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的《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则是我国有计划地直接从满语原文翻译这部重要史料的开始；与此同时，先生还进行了"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

鉴于满语文献在探讨近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关先生注意了对满语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如对1723年刊刻的图理深出使土尔扈特途经俄罗斯归来上书康熙的黄册所撰写的《异域录》满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校注，并写出了研究论文《略论图理深〈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的订补及其他》，这是首次依据原始资料的满语文献，研究18世纪初中俄关系史的论述，也是对《异域录》满文本的第一次介绍。1979－1980年，关先生参加《满汉辞典》的编纂时，曾前往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进行满语文与锡伯语关系的调查。1984年出版的与他人合作编成的《子弟书丛钞》，在对满族文学在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继承研究上做出了贡献。即使在十年"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他也没有停止对"满学"的研究，他克服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整理编成了一部《满文成语词典稿》。

关先生以对跨民族关系的满汉文化交融问题的研究为基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任何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忽视这一基点。正因为信守着这样的观点，他在学术研究中，时时着意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探讨。先生在西北工作时，注意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1950 年)，对西藏典籍文献作过介绍，对流行于南亚的《大会经》作过翻译。

关先生还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著名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学者。

关先生广泛运用语文资料，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提出个人见解，成一家之言。1942 年于《佛学月刊》发表谈敦煌民间文学的文章之后，陆续发表了《谈变文》、《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略说"变"字的来源》、《"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变文目》等一系列论文。早在 1947 年 3 月，向达先生在《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一文中就曾有"二十年来注意敦煌俗讲文学者，寥寥可数。今日得读周、关两先生的文章，不胜空谷足音之感。个人除去欢喜赞叹而外，并向孙、周、关诸先生表示敬意"的感喟。1982 年周绍良、白化文编选《敦煌变文论文集》，收录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内自王国维以下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论文 50 余篇，仅关先生的论文就收录了 5 篇之多，足见其在敦煌俗文学研究开拓过程中的功绩。

## 四、治学方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就是有成就的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经历，对于重视俗文化及其文学作品的搜集者与研究整理者来说，又几乎是一种必备的条件、必经的历程。

关德栋教授生长在学术气氛浓重、见世面机会很多的古都北京，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私家藏书可供研读，读书期间更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工作以后，足迹遍于大江南北、祖国东西，视野更为开阔，读书所涉猎的面日益宽广，向著名学者们问学的机缘又多，于是完全投身于无边无际的学问的海洋。

关先生研究满族文学，熟悉本族语文，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翻译《满文老档》工作时，注意到其间引及"萨迦格言"、"太公家教"的情况。正因有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知识，他才能对满、汉语混合写成的民间文学作品作圆满的介绍和详尽的注释。他为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作出的注释一共有 234 条之多，《升官图》注释也有几十条。只是在经过了他这样多才而苦心的工作，才使得清代中叶出现的这类所谓"满汉兼"的妙文为中外学人所知见、引录、论述。这在日本著名学者太田辰夫教授、波多野太郎教授等人的著作中均曾论及。

关先生读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注意到郑先生在第十二章《弹词》里讲过的福州"评话"是弹词的论断，记住了郑先生提到的最负盛名的福州长篇评话《榴花梦》。当他有机会到福州工作的时候，耳闻目睹"福州流行的'评话'，正与一般所说的弹词相同，不仅是在故事取材上相类，而且它的体式也与某些弹词作品一样，多是全部以七言韵语组成，没有说白与唱词之分"。他就地访求，终于见到了相当数量的福建评话抄本和当年郑振铎先生"惜未得一读"、阿英先生所见不全的《榴花梦》抄本，就此写成了《李桂玉的〈榴花梦〉》。

关先生在《谈"落花"》的文章中，将《续高僧传》中提到的"落花"与流行在苏北一带和南京等地方民间佛教的经忏活动中唱的"散花"作比较，不仅引经据典，还直接引用僧侣的话："经会不会尚在其次，如多会这种东西('散花')才是好的大师傅"，由此得出结论："从'散花'到'落花'，逐渐形成为僧侣们谋生的一种技艺"，"内容并与佛教没什么关系，实是袭用曲艺"。常见人们或者鄙薄"故纸堆"，或者视典籍之外无学问，惟于关先生的治学方法中，可见这种熔"故纸堆"与俗文化生活于一炉的大手段，庶几可以得到历史的真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先生从事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教学，1954 年和 1955 年作为当时课程的

"生产实习",他两度带领学生深入沂蒙山区进行田野调查,两次实习印有《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和"淄博和洪山卷"三册。这是新中国首次有计划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田野作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关先生对于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到荣幸,并且认为,一个从事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只有在田野作业与室内研究两方面都下大力气,才能够真正有作为,获得有意义的成果。

1983年,关先生应邀去美国讲学,他自己更把此行变成了一个"读书"和"行路"的过程。行前他订的研究计划有:了解美国在东方学、汉学方面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搜集散佚在美国的满学资料和中国俗文学资料。讲学是成功的,他的计划也完成了。他在美国搜集到的满学研究资料如:《聊斋志异》满文译者札克丹的未刊稿、《水浒传》满文译本残卷、《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关系到《再生缘》作者研究而著名的《云贞寄外书》满文本等,以及散佚的明清戏曲俗曲资料。与此同时,他还注意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回顾这段经历时,先生对治学与教学的方法曾作了这样一个小结:"搞学术研究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搞俗文学的,就只搞自己的这一摊,不去想一想国外对我们俗文学的研究状况如何,俗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什么联系,思路比较狭窄。在美国考察期间,我发现美国人很重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美国学者认为研究俗文学要有多学科的知识,俗文学还应该与语言、音乐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既考虑纵向联系,也考虑横向联系。这就关系到学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在教学上他们着重学生智能的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是跨越多种学科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他进而提出:"俗文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之争上,应该和整个民族文化联系起来,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无法全面理解俗文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有所突破,学会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虑问题。"

关先生的文风也常使人耳清目明。如20世纪40年代他作《变文目》,"每目除注明庋藏处、公刊处外,如学者于该目撰有论著,亦为注明",仔细辑出四十六目,给予当时研究者以极大的方便。他作《宝卷漫录》,注意《螳螂做亲宝卷》中有曲艺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以"动物、昆虫为角色敷衍故事"的特色;注意《菱花镜宝卷》不同于一般宝卷多宣传市民落后思想,而能"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注意《梨花宝卷》中前后两用的"曲词嵌药名的写法";又注意了《双金花宝卷》"介绍了一段清末的莲花落曲词"。虽只漫漫写来,却不时点明文中的"眼睛"。所作《关于"十二时"》,连引文在内,不过千字出头,《关于"三仗鼓"》更短,全文不足300字,但都是真正的短小精干、实有见地的文章。他辑集的几本资料性较强的书,序言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千言万语,虽长而绝不空泛,像枝叶繁盛的大树,高大而充满生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为研究问题,不端学者的架子,也不摆学术论文的架子,这种实事求是的文风,很值得提倡和效法。

**附录:关德栋教授主要论著**

**一、著述、整理**

1.《新疆民歌民谭集》,上海北新书局1950年出版。

2.《曲艺论集》,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1960年修订第二版出版;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

3.《挂枝儿》(校序),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

4.《山歌》(校序),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

5.《聊斋俚曲选》,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

6.《贾岛西木皮词校注》,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

7.《聊斋志异说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8.《聊斋志异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9.《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10.《聊斋志异话本集》,齐鲁书社 1991 年出版。
11.《挂枝儿·山歌选》,济南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二、论文**

1.《唐代的民间佛教文学——变文》,《佛学月刊》1942 年。
2.《谈变文》,《觉群》周刊 1946 年。
3.《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文史杂志》1947 年俗文学专号。
4.《巴利文大会经汉译》,《世间解》月刊 1947 年。
5.《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图书周刊》1947 年。
6.《升官图跋》,《俗文学》(北京)1947 年。
7.《现存罗松窗韩小窗子弟书目》,《俗文学》(上海)1947 年。
8.《散花源流及其他》,《俗文学》(上海)1948 年。
9.《变文目》,《俗文学》(上海)1948 年。
10.《略说"变"字的来源》,《通俗文学》(上海)1948 年。
11.《降魔神变押座文与目莲缘起》,《文艺复兴》1948 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12.《论子弟书》,《文史哲》1980 年第 2 期。
13.《略论图理深〈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的订补及其他》,《文物集刊》1980 年第 5 辑。
14.《谈聊斋俚曲》,《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
15.《谈聊斋志异的一支俗曲——读满文书札记》,《曲苑》1982 年。
16.《曲艺丛谈·序》,《曲艺丛谈》(赵景深著),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17.《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序》,《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齐鲁书社 1986 年版。
18.《中国曲艺史·序》,《中国曲艺史》(倪钟之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19.《影印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序》,《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
20.《德国柏林国家国书馆现藏满文书籍简记》,《满学研究》1995 年第 2 期。
21.《海外读曲记(一)》,《曲艺讲坛》第四期,1998 年 3 月。
22.《海外读曲记(二)》,《曲艺讲坛》第五期,1998 年 9 月。
23.《聊斋俚曲札记》,《蒲松龄研究》1999 年第 3-4 期"聊斋俚曲专号"。

【附记】本人曾撰写《关德栋教授与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研究》(《民俗研究》2001 年第 4 期)、《醉心绝学的关德栋》(《光明日报》2003 年 4 月 17 日)、《关德栋学术思想述略》(《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3 期)等介绍关德栋先生的文章,本文仅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略有增删。在本文和此前本人所撰写的介绍关先生的文章中,参考引用了《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2)》、《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近现代中国少数民族英名录》等著作和车锡伦教授《对关德栋先生俗文学研究成就的思考》及关家铮副研究员整理的有关介绍,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 刘 培]

# “龙学”里程碑

## ——牟世金先生与 20 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

戚 良 德

**摘 要**:20 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在近百年的“龙学”史上,牟世金先生以其十余种专著、六十余篇论文,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面精到的系统研究,从而成为“《文心雕龙》的功臣”。他不仅是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文心雕龙》现代注释和翻译的开拓者,更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第一人以及“龙学”史研究第一人,他还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创始人,“对我国‘龙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可以说,牟世金先生是 20 世纪《文心雕龙》研究——“龙学”的一座里程碑。

**关键词**:牟世金;《文心雕龙》;龙学

20 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在近百年的“龙学”史上,“山东大学”的名字无疑是令人瞩目的:陆侃如、牟世金、张可礼、于维璋、冯春田……《文心雕龙》研究在山大的历史上可谓代不乏人、香火赓续,特别是牟世金先生(1928－1989)以其十余种专著、六十余篇论文,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面精到的系统研究,从而成为 20 世纪“龙学”的代表人物,成为“《文心雕龙》的功臣”[①]。他不仅是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文心雕龙》现代注释和翻译的开拓者,更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和“龙学”史研究第一人,他还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创始人,“对我国‘龙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②]。正因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牟世金先生是 20 世纪《文心雕龙》研究——“龙学”的一座里程碑。

## 一、“《文心雕龙》的功臣”

王元化先生曾指出:“世金同志可以说得上是《文心雕龙》的功臣。这一点,有他的大量论著可以为证。”[③]牟先生的“龙学”著作,有与陆侃如先生合著的《文心雕龙选译》(上、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1963 年)、《刘勰论创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1 版,1982 年第 2 版)、《刘勰和〈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文心雕龙译注》(上、下,济南:齐鲁书社,1981、1982 年第 1 版,1995 年第 2 版,2009 年第 3 版),与萧洪林合著的《刘勰和〈文心雕龙〉》(载于《中国古代文论精粹谈》一书,济南:齐鲁书社,1992 年),与曾晓明、戚良德合编的《〈文心雕龙〉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载于《文心雕龙学综览》一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年),独立完成的《雕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 年)、《文心雕龙精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 年)、《刘勰年谱汇考》(成都:巴蜀书社,1988 年,此书被收入《六朝作家年谱辑要》,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雕龙后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戚良德,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序》,《文学报》1988 年 7 月 7 日。

② 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87 页。

③ 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序》,《文学报》1988 年 7 月 7 日。

1993年)、《文心雕龙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等,共计13种;另有关于《文心雕龙》的单篇论文60余篇。除《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为选编他人作品、《〈文心雕龙〉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为资料汇编外,牟先生有关"龙学"的论著超过300万字。仅以此论,说他是"《文心雕龙》的功臣",显然并非虚言。季羡林先生任名誉主编的大型丛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指出:"回首百年《文心雕龙》研究,其杰出成果,有目共睹。……前50年的代表人物是黄侃、范文澜、刘永济,后50年的代表人物是詹锳、牟世金。"而"在研究上,尽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应该说牟氏是新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①。

当然,王元化先生所谓"《文心雕龙》的功臣",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牟先生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创始人。早在1982年,经过牟先生的积极筹备和精心组织,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讨论会在济南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开创《文心雕龙》研究新局面的一次重要会议"②,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酝酿成立《文心雕龙》学会,并组成了以王元化为组长的学会筹备小组,以山东大学为学会基地,进行筹备工作。次年8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青岛成立,牟先生在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并被推举为《文心雕龙学刊》编辑组组长。因此,王先生说:"他也是全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倡议筹建者,学会的繁杂事务几乎都是由他承担起来的,因此学会倘在学术界有所贡献,首先得归功于他。"③

学会成立之后,旋即组成了中国《文心雕龙》考察团访问日本;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牟先生回国后便发表了《日本〈文心雕龙〉研究一瞥》④一文。学会成立的第二年,又在上海举行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1986年,学会在安徽屯溪召开了第二次年会。1988年,学会在广州召开了《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到牟先生去世,学会编辑出版了六本《文心雕龙学刊》,选编一本《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这一系列空前而有组织的学术活动,把《文心雕龙》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可以说,"龙学"真正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显学,是与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工作密不可分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牟先生是"《文心雕龙》的功臣",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

正因如此,张文勋先生高度评价牟先生:"牟世金大半生研究《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主要创始人之一,对我国'龙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⑤张少康等先生也指出:"由王元化先生和他(按,指牟先生——引者)的发起,在他的具体筹划和安排下,经过了1982年济南《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的酝酿和准备,1983年在青岛成立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对团结全国研究《文心雕龙》的力量、交流《文心雕龙》研究的学术信息、推动《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海外研究《文心雕龙》学者的交流,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牟世金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中年学者中成就最高、贡献最大、学风严谨的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⑥。在谈到牟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时,张少康等先生又深有感触地说:"作者生前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心雕龙》选修课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以来,又一直担任学会的秘书长,负责学会日常工作,组织筹备年会、编辑学会刊物等,各种事务十分繁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用这两句古诗来形容作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献身精神,实在并不为过。"⑦

## 二、《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第一人

牟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便强调研究"《文心雕龙》自身的理论体系",认为"有探讨刘勰自己的

① 吴云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699、696页。

② 《开创〈文心雕龙〉研究新局面的一次重要会议》,《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473页。

③ 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序》,《文学报》1988年7月7日。

④ 该文发表于《克山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⑤ 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⑥ 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

⑦ 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第392页。

文学理论体系的必要”，并呼吁“《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们考虑这个问题”[①]，可谓独具慧眼。198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提出：“‘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全书，就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又以此观点用于‘论文叙笔’，更以‘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这就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概貌，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②]并通过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体系的具体考察，进一步指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以‘衔华佩实’为核心，以研究物、情、言的相互关系为纲组成的。”[③]这是牟先生二十年思考《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结晶，也是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所作第一次科学表述。此后，牟先生又为其《雕龙集》专门完成了长达3万字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初探》一文，并在他的《文心雕龙研究》中专列近5万字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一章，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研究和理论表述：

> 《文心雕龙》由“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和批评鉴赏论（包括作家论）四个互有联系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衔华佩实”为轴心，以论述物与情、情与言、言与物三种关系为纲领，把全书五十篇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稀有的，在世界古代文论中也是罕见的。[④]

应该说，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这一系统概括不仅是牟先生数十年思考这一问题的结论，更是20世纪“龙学”的重要收获。

正如滕福海先生所说：“最执著于探索《文心》体系的学者当推牟世金。”[⑤]牟先生何以不遗余力地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呢？他说：“搞清刘勰的这个体系，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准确地认识其成就和不足之处，都可提供重要的依据。”同时，“《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从刘勰的整个理论体系着眼来研究，把这些问题放到刘勰的理论体系中去考察，是很容易辨识清楚的”[⑥]。如《从刘勰的理论体系看风骨论》一文便是牟先生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出发来解决“龙学”中富有争议的具体问题的尝试。该文指出：“要解决长期以来的‘风骨’之争，没有一个正确而统一的角度是不可能的”，“而从刘勰的总的理论体系来考察，我以为正是能够认清‘风骨’的实质的正确角度”。因为“《风骨》篇不仅没有离开这个体系，且正是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⑦]。基于此，牟先生认为，刘勰的“风骨”论属于其“衔华佩实”、“文质相称”的文质论，“风”和“骨”乃是构成“文质”论的两个方面，因而《风骨》篇所谓“风、骨、采”的关系，正相当于儒家“志、言、文”的关系。应该说，这一认识是富有新意的，而这正是从刘勰理论体系出发得出的结论。正如李平、范伟军两位先生所说：“牟先生一方面从《文心》自身实际出发，探讨其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处处联系《文心》的理论体系，分析其具体问题，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辨结合起来，对《文心》的理论体系问题进行了见林又见树、见树又见林的研究，取得了超越前贤的研究成果，也把《文心》理论体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⑧]

除了着眼“龙学”本身的发展，牟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重视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从中窥探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理论体系。牟先生视自己的《文心雕龙》研究为“雕龙”，更以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的综合研究为“雕龙”，且后者是其长远的规划和目标。牟先生非常赞同周

---

① 牟世金：《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雕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

② 牟世金：《〈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甫之、涂光社主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227页。

③ 牟世金：《〈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甫之、涂光社主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第232页。

④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按，“罕见的”原文作“罕见有的”，“有”字系衍文。

⑤ 滕福海：《〈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述评》，《语文导报》1985年第7期。

⑥ 牟世金：《〈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甫之、涂光社主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第232、233页。

⑦ 牟世金：《从刘勰的理论体系看风骨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0、181、187页。

⑧ 李平、范伟军：《试论牟世金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研究》，《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扬先生关于"《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①]的论断，他对这个"典型"的不懈探索，正是为把握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全貌所找到的一个突破口。牟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文心雕龙》所论述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许多传统问题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且后者都是《文心雕龙》已安排的体系的延伸[②]。因此，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和完整把握，确乎就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关键和"枢纽"。牟先生的长文《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③]也清楚地说明，他绝不满足于研究《文心雕龙》一书，而是试图通过对这个"典型"的深入分析，找到一把打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宝库的钥匙。

## 三、《文心雕龙》现代注释和翻译的开拓者

牟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的"自序"中，曾谈到自己与"龙学"的因缘：

> 解放前，我在四川老家的一所中学任教，当时还年少无知，但听到同事中的年长者谈起《文心雕龙》，引起我的兴趣，便从书店买来一本标以"广注"的《文心雕龙》，却根本看不懂。因而萌生一种愿望：能读到一种今译本就好了。当时还绝无自己来译的奢望，只希人家译出，以利自己学习而已。直到1958年，山东大学成仿吾校长亲率中文系师生编写文学史，陆侃如先生和我被任命为汉魏六朝段的负责人，分工时只好任别人先选，最后剩下绪论和《文心雕龙》两个部分，便由陆先生写绪论，我分《文心雕龙》。这就再一次促使我产生读到《文心雕龙》译本的强烈愿望。但那时仍然没有译本可读，历史就为我安排了这样的道路：三年之后，陆先生和我决定，自己来译。[④]

1962年9月，二位先生合作的《文心雕龙选译》上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7月又出版了该书下册。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第一个译注本。全书译注《文心雕龙》二十五篇，每篇写有"题解"，书前有近4万字的"引言"，对《文心雕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963年5月，二位先生合作的《刘勰论创作》也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文心雕龙》的创作论进行专题研究和注译，这在"龙学"史上也是第一次。1981、1982年，牟先生修订并补充的《文心雕龙译注》上、下册相继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是"龙学"史上第一个《文心雕龙》全译注本。它虽然仍可说以60年代的《选译》为基础，但牟先生不仅补译补注了《选译》未收的二十五篇，而且对《选译》的二十五篇也全部仔细推敲，统一修订。因此，《文心雕龙译注》实际上已成面目全新之作了。詹锳先生曾说："牟世金同志新出的《文心雕龙译注》比1963年他和陆侃如先生合写的《文心雕龙选译》提高了一大步。"[⑤]张少康等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则指出："《文心雕龙译注》是牟世金在研究《文心雕龙》文本方面的代表作。《译注》与原来的《选译》相比，不仅是补齐了原来未译注的篇章，而且在学术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补充了作者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成为一部融学术性和普及性于一炉的《文心雕龙》全注本和全译本。"[⑥]

作为范注之后的《文心雕龙》新注本，《文心雕龙译注》的注释不仅条目细致而详尽，而且其具体的注释内容更是焕然一新。如《史传》篇有"宣后乱秦，吕氏危汉"之句，范注引《史记·匈奴列传》之语，以"乱"为淫乱[⑦]，其后注家皆从此说。但牟先生细究原文，认为"宣后乱秦"与"吕氏危汉"性质相同，而与"淫乱"毫不相干，并证以《史记》之《穰侯列传》和《范雎蔡泽列传》的史实，"宣后乱秦"之本义

---

① 周扬：《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② 牟世金：《雕龙集·前言》。

③ 该文发表于《学术研究》1983年第4、5期。

④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⑤ 詹锳：《〈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65页。

⑥ 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第336页。

⑦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96页。

始明[①]。再如《书记》篇有"休琏好事"一语,范注谓:"彦和谓其好事,必有所本,不可考矣。"[②]周振甫先生也说:"所谓好事,未详,或和好作书信有关。"[③]牟先生则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华峤《汉书》以及《后汉书·应劭传》、《后汉书·班彪列传》等记载为据,指出这个"好事"乃是"缀集时事"以编写史书[④],令人豁然开朗。又如《丽辞》篇"气无奇类"一语,各家一般不注,但理解却各有不同。周振甫先生先译为"内容没有创见"[⑤],后改为"意气没有独创"[⑥],郭晋稀先生译为"一篇作品情态很平常"[⑦],赵仲邑先生则译为"才气没有什么突出之处"[⑧],等等。牟先生则引《周易·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则各从其类也"为据,指出"气类"乃"同类,借指对偶"[⑨],这一注释显然是颇为符合《丽辞》之旨的。可以说,《译注》对《文心雕龙》注释的这种首创之功,乃是屡见不鲜的。正如石家宜先生所说:"作者博取众长,尊重权威,但更尊重科学,他对所引的每一条资料包括范注的全部引文都找原文查核,从不用第二手资料,这种尊重历史的基本态度贯穿在整个校注工作中。……正是这种执著的注重论据使牟著充满了首创性。"[⑩]

《译注》对《文心雕龙》的翻译,更是圆润畅达,既忠实于原著,力求搞清本义,又灵活变通,做到以现代的理论语言准确地传达出一千五百年前的文学思想。诚如评者所说,"《文心雕龙译注》……恰到好处地注释、翻译了《文心雕龙》全书"[⑪]。张少康等先生则认为:"虽然《文心雕龙》的译注本在牟世金的《译注》之后,又出版了很多种,尽管各有优点和长处,但从正确、精练、深刻、流畅等方面综合起来看,都没有能超过《译注》所达到的水平。"[⑫]正因如此,《文心雕龙译注》出版后几经再版,已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心雕龙》读本。

## 四、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者

刘勰生平研究之于"龙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此一研究之困难,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亦堪称首屈一指。牟先生说:"而彦和之生平,史料既乏,歧见尤多;证既有矣,而证又待证。"以至于"欲为刘勰之年谱,难矣"。也许正因如此,关于刘勰的年谱、年表虽多,却都只能简要成篇而无一专著,且其中"可取者多,可辨者亦多"。面对如此情形,牟先生深有感慨地说:"而龙学至今,已成中外瞩目之显学。刘勰之生平犹未详,颇以为厕身龙学之愧;欲求龙学之全面深入发展,亦当不避其难,甘犯其误而略尽微力。"[⑬]全面考察刘勰的生平,确乎是"龙学"深入发展之必需和必然,牟先生《刘勰年谱汇考》一书之撰成出版,正是"龙学"步入其全面发展和成熟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勰年谱汇考》之撰,"以深知为刘勰事迹系年之不易,特取汇考方式,一以吸收诸家研究之所成,一以汇诸家之说于一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乃图汇而考之,庶可于比较之中,折中近是"[⑭]。全书汇入中外学者所撰刘勰的年谱、年表达十六种,有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霍衣仙《刘彦和简明年

①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上册,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200页。
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73页。
③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84页。
④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62页。
⑤ 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6页。
⑥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8页。
⑦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6页。
⑧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304页。
⑨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下册,第197页。
⑩ 石家宜:《〈文心雕龙〉研究的勃兴》,《读书》1984年第5期。
⑪ 王树村:《评〈文心雕龙译注〉》,《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⑫ 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第338页。
⑬ 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序例》,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⑭ 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序例》。

谱》和作于60年代的翁达藻《梁书刘勰传大事系年表》,有鲜为人知的陆侃如《刘勰年表》稿本,亦有影响甚大的杨明照作于40年代和70年代的《梁书刘勰传笺注》,以及詹锳、张恩普、李庆甲、穆克宏等各家所撰年表、年谱或生平系年考略,这些代表着大陆研究刘勰生平的主要成果。更有台湾张严、王更生、王金凌、李曰刚、龚菱、华仲麐诸家所作年谱、年表以及刘勰身世考索,这是台湾研究刘勰生平的主要著作①。还有日本学者兴膳宏的《文心雕龙大事年表》等,可略显国外研究刘勰生平的成就。除此之外,众多"龙学"论著中兼及刘勰生平者,如有新说已见,《汇考》亦一并考察。可谓搜罗古今,囊括中外。这种颇富特点的年谱之作,不仅有利于读者全面把握有关刘勰生平研究的主要成果,而且以对中外古今研究成果的全面检视与总结为出发点,就有可能更为准确地考明刘勰的一生。所谓"于比较之中,折中近是",《汇考》成为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汇考》着眼刘勰一生事迹,不仅对刘勰的生卒年、《灭惑论》撰年、《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等"龙学"的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出了新的论证;而且对刘勰生平中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如刘勰入定林寺时间、参与抄经事、任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是否同时、《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文撰年、刘勰与萧统之关系、刘勰之出家等,都作了详实而有力的考证,使刘勰生平中许多幽暗不明的问题得以显露,从而为"龙学"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献史料的欠缺,有关刘勰生平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聚讼纷纭而难有定谳。因此,《汇考》之作,亦不可能没有疏漏之处。张少康先生指出:"牟著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海内外十多种研究刘勰身世的著作,参考了许多有关的研究论文,能够在总结各家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新见解,应该说是一部研究刘勰身世的集大成之作,但因考订有明显失误之处,有些见解就离谱了,故不能尽如人意。"②这一说法一方面肯定了牟先生《汇考》的"集大成"之功,另一方面又似乎让人觉得《汇考》不够扎实严谨,俨然有不少"离谱"之处。其实,细读张先生大作,虽有一些与《汇考》不同之见,但应当说还是赞成、肯定为多;其真正认为牟先生之考具有"明显失误"而至"离谱"之处,盖惟刘勰任步兵校尉之时间问题而已;而《汇考》对此一问题的考证即使有不确之处,却也未必真的十分"离谱"。况且,诚如张先生所说,"由于文献资料的欠缺,我们不可能非常确切地撰写刘勰的年谱",也就不可能没有"推测的因素"③。因此,总起来说,牟先生对刘勰生平的考证,其系统全面而"折中近是",亦可谓刘勰研究的功臣了。

## 五、"龙学"史研究第一人

牟世金先生是系统地开展"龙学"史研究的第一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发表了《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4年第1期)一文,对此前的《文心雕龙》研究进行初步的总结。到了80年代初,他借为《〈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作序的机会,写出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④一文,对几十年来的《文心雕龙》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1987-1988年,牟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分三期连续发表了4万余字的《"龙学"七十年概观》的长文,对近现代"龙学"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论述,可以说是第一部"龙学"简史。这篇长文不仅以在《〈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所提出的"龙学"一名为题,而且在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对《文心雕龙》做过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但除校注之外,大都是猎其艳辞,拾其香草而已。真正的研究,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但这块古璞一经琢磨,很快就光华四溢,并发展成一门举世瞩目的'龙学'了。"牟先生进一步指出:"近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奠基者当推黄侃。……黄氏《札记》虽问世稍

① 其中王金凌、华仲麐两位所作年谱,牟先生当时尚未见到,但其主要观点已从王更生、李曰刚等著作中转引。

② 张少康:《刘勰的家世和生平》,《文心与书画乐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③ 张少康:《刘勰的家世和生平》,《文心与书画乐论》,第28、35页。

④ 该文发表于《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

晚，但它是在1914至1919年讲授《文心雕龙》于北京大学期间撰写的。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说明从黄侃开始，《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龙学。"[①]显然，牟先生是带着明确的学科意识来总结近现代《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他说："《文心雕龙》研究发展成一门有校勘、考证、注释、今译、理论研究，并密切联系着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玄学、文学和美学等复杂的系统学科，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大体上分为'龙学'的诞生、发展和兴盛三个时期……"[②]

牟先生所谓"三个时期"是这样划分的："从1914到1949年的三十六年，可说是龙学的诞生时期"、"1950至1964的十五年为龙学发展时期"、"1977年至今的九年为龙学的兴盛时期"[③]。牟先生不仅对"龙学"发展"三个时期"的主要观点加以介绍和评述，更注意总结每个时期不同的"龙学"风貌，以把握学科发展的规律，从而指导后世的《文心雕龙》研究。如在论述兴盛期的"龙学"论文时，专列"美学研究"一节，指出这是"本期龙学的又一重要发展"，并说："《文心雕龙》不仅丰富了世界美学的宝库，且早就改变了世界美学史的发展进程。把以欧洲为中心的美学史如实地改正过来，还有待艰苦的努力。……由此看来，对《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还是任重而道远的。"[④]应该说，这种总结是富有力度而发人深省的。

通过对"龙学"史的总结，牟先生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三万七千字的《文心雕龙》，迄今研究论著已逾三千万言，龙学的发展是否已到尽头？"对此，牟先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 从先秦到齐梁，古代文学的发展已相当成熟，文学艺术最基本的特征，最一般的规律，最根本的经验，都已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文心雕龙》本身虽不可能有何发展变化，但它所汇集的大量文学艺术经验，反映的文学艺术现象，就使龙学有了难以限度的容量。不仅我们至今已经论及的美学观、鉴赏论等等，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一系列应有的论述，随着当代文艺思想的发展，今后还可能发现种种迄今尚未触及的新问题。[⑤]

这段论述既回答了《文心雕龙》之所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回答了《文心雕龙》之所以伟大而典型的内在根源，从而也就坚定而令人信服地回答了"龙学的发展是否已到尽头"的问题，那就是："龙学具有强大生命力，这是龙学七十年的结论。"[⑥]实际上，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论著，迄今已逾一亿字；二十年间，从三千万言到一亿字，"龙学"的发展事实证明，牟先生当年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龙学"确乎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正如不少"龙学"论著所指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龙学"史上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牟先生有意雕画"全龙"，因而对"龙学"的方方面面均用力至勤，见解精到。因此，笔者对牟先生"龙学"的粗浅勾勒，借用先生的话说，"最多也是绘其半爪，模其片鳞而已"(《文心雕龙研究·自序》)。作为20世纪"龙学"的一座里程碑，牟世金先生将永载学术史册；毫无疑问，这是山东大学的荣光。

[责任编辑 渭 卿]

① 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雕龙后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② 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雕龙后集》，第2页。
③ 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雕龙后集》，第4、11、25页。
④ 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雕龙后集》，第50、52页。
⑤ 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雕龙后集》，第56－57页。
⑥ 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雕龙后集》，第57页。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周来祥和谐美学思想的理论贡献与历史价值

周纪文　戴孝军

**摘　要**:在中国当代美学界,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美学学派"具有独特的理论观点与风格,其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和谐"为元范畴,提出了"美是和谐"的理论观念;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论;三是建立和完善了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但体现于美学理论本身,而且在学科建设、教学培养,乃至社会实践之中,都具有建设性意义。这个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理论发展中的建构意义、学术追求中的启示意义以及思想传播中的实践意义之中。从这些价值可以看出周先生勇于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又不断开拓创新的勤勉精神。

**关键词**:周来祥;和谐美学;理论贡献;历史价值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学家,周来祥先生(1929－2011)一生执著于美学的研究和教育,发表了290 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了 20 多种美学论著,形成了以"美是和谐"为核心观点的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学界称之为和谐美学学派。和谐美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既具有独特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又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和谐"为元范畴,提出了"美是和谐"的理论观念。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论。三是建立和完善了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建构又体现在两个层面:(1)在和谐、崇高、丑、荒诞、辩证和谐等范畴的逻辑演变与不断丰富发展中,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论证;(2)将"美是和谐"的观念贯穿于哲学美学、文艺美学、中西比较美学、中西美学史、审美文化学等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建构成和谐美学的大体系。这个大体系不但体现于美学理论本身,而且在学科建设、教学培养,乃至社会实践之中,都具有建设性意义。周先生的和谐美学思想与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和历史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理论发展中的建构意义、学术追求中的启示意义以及思想传播中的实践意义之中。周先生在六十多年的美学追求中,一直致力于思考和建构,在坚持核心观点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凭着对学术理想的信仰和自身理论意识的敏锐,不断地推进理论思考,完善思想体系,实现理论超越。周先生的学术生涯充分展现了他勇于坚守理想信仰的坚毅精神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勤勉精神,其和谐美学理论与思想体系则是周先生用生命浇灌的美学之花。

## 一、和谐美学思想的理论贡献

1. 独特而鲜明的理论观点——美是和谐

"美是和谐"是和谐论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规定,也是和谐论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周先生是这样界定"和谐"范畴的:"和谐是一个深刻的美学和哲学范畴。它起码包括这样紧密联系的四层含义:(1)形式的和谐。人、物、艺术、外在因素的大小、比例及其组合的均衡、和谐(形式美)。(2)内容的和

**作者简介**:周纪文,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戴孝军,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 250100)。

谐，即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情感与理智的和谐（内容美）。（3）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生活美，特别是艺术美更以此为主要的要求）。从唯物主义说，首先是内容的和谐，内容的和谐要求着形式的和谐，并规定着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和谐统一。（4）而内容的和谐又决定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和谐自由的关系，这种和谐自由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完美的、全面发展的人（在艺术中则体现为理想的典型和意境）。”①

首先，周先生是从审美关系上来界定“美是和谐”，认为“美是和谐”是一种关系范畴，关系各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和谐自由的境界。其次，和谐是一种广义的美，不再是单独的形式美，形式美只是和谐美的一种，和谐不只包括形式美，还包括内容美，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及其理想状态，是一种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第三，和谐作为一个最本质的抽象和最深刻的归纳，处于一个逻辑起点的位置，这个逻辑起点符合辩证逻辑的方法论，它的展开能为一个理论的生长提供空间和动力。因为和谐是一种关系范畴，关系之间的变化也会引起暂时的不和谐状态，比如崇高、丑和荒诞，但是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些不和谐状态只是暂时的，最终还会走向和谐状态。

对于和谐范畴，周先生不但作了抽象的定义和逻辑的论证，而且从美学史的角度，对和谐范畴的发展作了梳理，指出和谐是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理想。尽管这一理想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具体表现并不相同，古代主要认为美是真或善，近代主要认为美是自由，现代认为美与人类的生存实践密切相关。但是不同时代的美的形态有着内在的本质统一性，即美始终与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正面价值的肯定。美和审美的历史发展以及美学理论的发展证明，和谐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自由，美的本质特征就是和谐、自由。

周来祥先生最初对“和谐”范畴的论述主要来自于对西方美学发展史的考察，是一种范畴发展的历史梳理，并进一步论证和总结了“美是和谐”观念。“和谐”范畴的梳理与“美是和谐”观念的论证虽然来自于西方美学史，但“和谐”范畴与观念却又极具中国性。当然，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中，范畴的发展与论证一直不够严谨，周先生后来还是专门写文章论证了“和谐”概念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发展，以及“和谐”观念与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发展与变化。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尽管没有对“和谐”范畴作过严格的论证，但内在精神却是更加符合“和谐”的本质规定，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和实生物”等。因此，周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和主义，儒家讲人与社会之和，道家讲人与自然之和，禅家讲内在的心理之和，都重“和”。“和”的内容已成为中国人传统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这样的文化精神就陶铸了中国古典和谐和美的艺术。正像傅谨在《辩证思维的魅力》一文中所说，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致命缺陷在于缺乏感性体验的基础，而和谐论的逻辑起点则是既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又有生动的感性意蕴，“中国人尤其注重艺术与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体验的悠久的美学传统，使周来祥先生形成了与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滋生的美学家们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而正是这种东方式的思维特点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周来祥先生中国式的辩证思维方法”②。可以看出，美是和谐的观念既具有西方式的理性辩证特征，有高度的概括力和生长力，又具有中国式的感性体验特征，有充分的说服力和亲和力。对此张岱年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周来祥同志提出“美是和谐”，“这是中西两千年美学思想的深刻总结，非常精湛，非常正确”，“是对于当代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③。

---

① 《周来祥美学文选》（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② 傅谨：《周来祥先生和谐美学研究评论文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44页。

③ 张岱年：《谈〈周来祥美学文选〉》，《光明日报》1999年8月13日。

2. 理论思想的坚实基础——辩证思维的方法论

和谐论美学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这是周先生治学的一贯特点，也是和谐论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周先生认为方法是治学的“生命线”，它比研究成果更重要，因此，周先生终其一生都在坚持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周先生既有深入的研究，更有独特的运用。应该说，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学的内在要求。辩证思维是黑格尔创造的，马克思给予了唯物主义改造。周先生认为辩证思维方法不同于形而上学思维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流动概念和流动范畴，在概念和范畴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再现客观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辩证思维方法中，周先生最注重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周先生认为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概念的辩证运动，找逻辑起点是这个运动的关键，找到了逻辑起点就完成了体系的一半。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方法则是将概念范畴的运动置于历史具体之中。周先生认为：“所谓历史的方法是通过事物现象的发展过程，以揭示事物内在联系和规律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在形式上是不同的，但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因为历史的方法包含着逻辑，包含着客观事物的逻辑和规律。逻辑的方法也是历史的方法，因为逻辑的过程，反映着历史的过程和规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方法也就是逻辑的方法，逻辑的方法也就是历史的方法。”[①]因而，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周先生的和谐美学不但找到了正确的逻辑起点，而且这种历史观念也表现出与各家美学理论的差异。

理性主义美学为阐明美的本质定义耗尽了无数美学家的智慧，但是，无论将美定义为何种概念，这个定义都必须面对无限丰富的社会现实和艺术事实的检验。因而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美的定义，质疑和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直到20世纪非理性思潮突起，干脆放弃了这种努力。把逻辑运动中的概念放入历史运动之中，将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不能不说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一种突破。正是基于这种突破，和谐论美学思想试图为美的本质寻找一种新的思路，即将美的定义和审美关系的变化放在人类审美活动的历史发展之中，以宏观的视野和运动的思维来审视丰富而具体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感受，在总结人类审美活动的历史发展和审美经验的时代转化的基础上界定美的本质。

周先生认为美学研究只能从最抽象的美的本质开始，然后从美的本质发展出各种美的形态，社会美的出现是对美的本质的否定和扬弃，自然美又是对社会美的否定和扬弃，社会美又可以看作美的本质和自然美的中间环节，概念的发展一个比一个丰富，一个比一个具体，各种美的形态的展开，使美的本质这一概念得到日益深刻的规定性，再回到美的实践和创造的关系的时候，也就具有了丰富的内容。这就是美的本质概念的逻辑发展。而逻辑的也是历史的，美和审美又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也在不断变化色彩，从静观的优美到激进的崇高，从极端的丑直至裂变的荒诞，人类的审美趣味也会变幻万端。如果不将美的定义放在如此复杂的现象之中来审视，美的本质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正是将美看作是历史的、运动发展的概念，所以和谐论美学从古代的美到近代的美，再到现代的美，从和谐美到崇高美再到丑、荒诞，逻辑的推演和历史的转换才能相吻合。从这一点上看，和谐论美学超越了经典美学试图从美的现象中总结美本质的努力，深刻指出美具有时代性，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也必然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结果。

当然，和谐论美学的历史主义观并不仅仅是注重研究史料而缺乏逻辑，正像经典的理论注重逻辑而忽视历史一样。和谐论美学就是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因而和谐论美学思想将美的定义放在历史的具体观察之中，但又不是去归纳历史，而是提出具有时代性的审美主潮的特征。这种审美历史不是随机性的，不是无规律可寻的，逻辑的发展必然符合历史的自然进程，而历史的具体也在本质上表现出自身的规律性，暗合着逻辑的发展，这就是逻辑和历史的本质统一。这同时也在方法论层面

① 《周来祥美学文选》(上)，第157页。

上表现出一种辩证逻辑的精神和历史主义的观念。

可见，虽然当时各家的美学理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和谐论的特征在于对辩证思维方法始终如一的坚持，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既追求理论研究的严谨、逻辑推理的缜密，以西方的辩证思维纠正传统思维的模糊性，又强调结合历史、结合现实，在理论研究的各个环节强调有的放矢、有据可依、符合历史事实，以纠正纯粹逻辑推演的封闭性，这也是"主潮式"研究方法的设想和依据之所在。

3. 完善而具有建构意义的和谐美学思想体系

和谐美学思想对当代中国美学最大的贡献是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仅是思想的成果，它还是在方法论基础上的必然构建。这个思想体系包括方法论、美的本质论（包括艺术的审美本质）、美的形态论（包括艺术的审美形态）、审美意识论、中西方美学史理论、中西方比较美学理论等。这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是以和谐为核心，展开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和逻辑构架，这是它的根本特点。从范畴的纵向发展看，是从古代素朴的和谐美，经近代的崇高（以及现代和后现代的丑与荒诞），发展到社会主义新型的辩证和谐美，这通常称为"三大美学"，或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三大美的形态。从更加严格的逻辑结构看，美的对立面，不是崇高，而是丑。"美是和谐，丑是不和谐，反和谐"。崇高与荒诞都是过渡性范畴，崇高是由和谐向丑的反和谐的过渡，荒诞则是由反和谐的丑趋向于新的和谐的过渡。在这里，无论是美的范畴发展，还是理论的逻辑架构，都是以和谐为轴心而展开的。这是和谐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和谐美学的独特创造，更是它与实践美学、生存美学、生命美学等的不同之处。因此，闫国忠教授认为，和谐美学是20世纪中国创造的六种"美学模式"之一[①]。季羡林先生称赞道："周来祥教授独树和谐美学的大旗，既能自圆其说，又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巍然挺立于美学之林，为中国美学界增光添彩"[②]。

对于理论体系，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西方现代美学是没有体系的。在黑格尔美学体系之后，西方占主导的是非理性的美学思潮，就是不承认体系，要打垮体系，认为体系是理性的代言，是理性高于一切的结果，是独断论和目的论的表现。但是，我们注意到，西方经过了体系时代，经过了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大体系，发现了体系给思想发展带来的弊端，所以他们要反对体系，纠体系建构之偏。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体系的建立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益处的。体系可以为人们看待世界提供一个视角，为思考问题提供一种方法。当然体系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适用于一切时代。周先生很清楚这一点，当美学发展开始走入反思体系的时候，当理论研究面临新的实践问题的时候，他既没有选择匆忙地抛弃体系，也没有选择盲目地维护体系，而是自觉地回到理论本身，回到体系本身，从理论基础和实践问题出发，完成自我的超越，一次是提出了近代崇高范畴，使得和谐美学体系由封闭走向开放；一次是反思和论证主客体的二元对立问题，回到哲学美学的方法论基础和本质问题，解决理论体系的基础问题。

## 二、和谐美学理论的历史价值

1. 理论发展中的建构价值

和谐美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发展，表现在六十多年来周先生不断将其向纵深和宽广推进，一直致力于理论性的创新发展和体系建构。这种建构一方面体现在"美是和谐"思想观念的丰富与发展之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和谐美学理论大体系的构建之中。在和谐美学思想体系自身发展完善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的推进和对学科建设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

① 闫国忠：《美学百年总序》，《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13日。

② 季羡林：《读周来祥教授〈美学文选〉》，《光明日报》1999年3月12日。

对于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明确研究对象是首要的问题，和谐论美学思想正是从这个基础问题来建构它的思想体系，显示出它的独特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针对美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对象还是审美主体，是客观属性还是主观体验，是美的一般规律还是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周先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提出了美在本原上是源自审美实践活动的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而在本质上，这种关系是一种和谐自由的关系的闪光思想。并把其作为逻辑起点，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充满理性思辨色彩和丰富实践内容的美学理论体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谐论美学思想体系面临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周先生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终于以“崇高”、“丑”和“荒诞”的范畴论证来完成了体系的自新。随着建设和谐社会方针的提出，周先生在和谐美学思想中找到现实基础的支持之后，没有简单地嫁接和解释，而是返回了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从思维方式、创新性，提出“和谐思维”的概念，既发展了和谐美学思想，也将和谐理论的论证从社会实践层面引领至哲学基础层面，拓宽了其理论结构。

在建立和完善“美是和谐”思想观念的同时，周先生一直致力于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美学学科的建设。早在1980年代，周先生就开始了对文艺美学的研究，出版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美学规律——文艺美学原理》，以艺术的审美本质为逻辑起点，从质和量的两个分类原则出发，在质的方面，以三大美的理论和中西比较美学的纵横发展和对比作结构；在量的方面，从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和综合艺术作分类研究，最后又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欣赏与批评进行了分析阐述。在文艺美学理论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这是我国美学界提出的第一个体系性的文艺美学理论。2003年，周先生又出版了《文艺美学》一书，进一步系统研究和论证文艺美学，指出文艺美学是由哲学认识论、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生存实践等各种角度、多个层次、多种方法高度融合所规定的美学的中介学科和分支学科，是客观存在的。“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弘扬、发展了古今中外尤其是康德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既有对美和艺术的总体把握，又有对艺术作品审美构成的具体探索，并且它运用发展着的辩证思维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体系，这是它的特色。对于比较美学，周先生也是较早涉足这一领域并提出独特理论的研究者之一，1992年出版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是中国美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中西比较美学的专著。一改过去比较研究只注重具体研究和局部研究的传统，使得比较美学在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上都有了飞跃性发展。2007年，年近八旬的周先生编纂完成了一套六卷本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从而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了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文化现象中的一切审美因素，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中国审美文化的本质、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嬗变、兴替的美学规律，成为第一部有着贯彻统一的核心观点和理论体系的审美文化通史。

尽管周先生编撰了《中国美学主潮》和《西方美学主潮》，但他一直还有一个心愿，希望撰写一部有思想特色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美学史》，这个心愿如今也成了一个遗憾。但是，他所涉及的哲学美学、文艺美学、比较美学、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在美学教学和培养上的经验，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2. 学术追求中的启示价值

周来祥先生是美学界为数不多的一个贯穿中国美学60多年发展史的美学家，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开始，一直站在美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从未中断过美学的思考、科研和教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创立的和谐美学思想，从提出到完善，从抽象到丰富，再到一次次的超越，为中国当代美学贡献了极具理论价值和学术特色的一个美学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美学思想作为一个文本、一个对象，不仅可以研究它的理论思想，还可以研究它的发展，因为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价值。这个启示价值主要有三点：一是坚持学术创新，保持敏锐的理论意识，合理提出并完善独特的学术观点。二是坚持学术信仰，无论学术环境的热与冷，都不改变研究的热情和思考的努力。三是坚持学术胸怀，既把自己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和深入，也积极吸收和接纳新鲜的、不

同的思想和观念。

和谐美学思想的每一次建构都是在美学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遇到了纠缠不清的问题时提出的。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形成的四家学派，说到底就是在“唯心”、“唯物”之间兜圈子，强调的是从哲学而不是从美学学科角度的划分，更没有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给予足够的重视。周先生经过自己的思考，提出了“美是和谐”的美的本质论，以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就更加准确地捕捉到审美和艺术的独特性，找到了更为合理的理论基础。1980年代末以后，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冲击，青年学人流露出越来越激烈的对体系的反感和否定，周先生在深入研究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崇高”、“丑”和“荒诞”这些范畴，并完成了体系的自新。1980年代初，周先生认为崇高是一个近代范畴，具有过渡性和双重性的特点，但是，正是这种过渡性的特征，使得崇高更像一个处于古典和谐与现代辩证和谐之间的链接，而没有显示出独特的重要位置和理论价值。所以，在《美和崇高纵横谈》一文中，周先生认为崇高是一个有着独立价值和地位的美学范畴，在和谐美学中与和谐一样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不再是一个处于古典和谐与现代辩证和谐之间的过渡性范畴。周先生认为崇高的加入，使得古典和谐美逐渐向分裂、对立转化，但还没有完全分裂、彻底对立，还是和谐的。丑和荒诞的加入彻底打破了古典和谐美的静止状态，使得分裂与对立成为常态、动态，但是在理论的深层又有一种和谐美的回归，但是这个回归的和谐美不是古典的和谐美，而是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辩证的动态的和谐美。进入新世纪，周先生针对众人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争论，发表了一系列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文章，提出“和谐思维”的概念，使辩证思维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周先生认为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是差异和矛盾，这是它的本质属性，但是差异和矛盾并不等于二元对立，也不是必然导向二元对立。因为差异和矛盾可以区分出对立与非对立，也就是“对立”和“杂多”。按照黑格尔的分析，“杂多”是不同事物各自独立；而“对立”是本质的“异”，相异者，就是与自身正相反对的别物。即杂多和对立是有本质区别的，杂多是外在的非本质的“异”，杂多之间性质是并列的，比如酸、甜、苦、辣、咸；而对立则是内在的本质的“异”，对立之间是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是相互规定的关系，比如真和假、美和丑，它们之间相比较而存在。事实上，承认矛盾的对立，可以走到二元对立，也可以不走到二元对立，而走到对立的和谐统一。

中国当代美学经历了从体系时代到反体系时代以及多元发展和转型时期，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时代。和谐美学自身也经历了体系时代阶段，后体系时代阶段（自我超越阶段）和新世纪的本质超越阶段。这种时间阶段性上的一致并不是刻意保持的，而是因为周先生同样在和谐理论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中不断思考着，因此说，和谐美学思想的每一次突破和自我超越，都表现出他作为一位理论家和思想家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表现出他对学术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表现出一种创造性的理论探索精神。周先生从创建和谐美学体系，并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非常不容易的。和谐美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从诞生到发展不断面对质疑和困境，他从不马上反驳和辩解，而是认真地、默默地去思考，经过长时间反复思考和论证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阐释。因此和谐美学理论在发展中一直都在坚持理论体系自身发展的路，思想学派发展的路。所以，周先生在提出思想学派百家争鸣的重要性以后，特别强调了坚持：坚持自己的观点、信仰，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在顺境时保持冷静，在逆境时耐得住寂寞，不左顾右盼，不浅尝辄止，要持之以恒。这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铭记的。

3. 社会发展中的实践价值

一个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它的现实意义，取决于它面对现实问题和发展变化时的应对性和指导性。进入新世纪，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方针之后，周先生在和谐美学思想找到现实基础的支持后，并没有简单地嫁接和解释，而是返回到理论的哲学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思维”的概念。周先生认为和谐思维是相对于矛盾思维提出的，是辩证思维的两大类型，都属于辩证思维的子范畴，是绝对的、普遍存在的，也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和谐思维首先是一种关系范畴，各个方面关系和要素是决定和谐体本质的关键。周先生认为现代辩证思维强调建立在对

立双方(或多方)利益根本一致并不断协调的基础之上,合作发展,互利共赢,这使得和谐思维与矛盾思维在本质内涵和运动特征上,都有了明显的差异。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矛盾思维主张以斗争的方式来处理矛盾,而和谐思维则是以相互协调、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方式来处理。周先生认为,尤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全球共谋发展的今天,和谐思维才是和平建设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周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也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和机遇。和谐美学认为和谐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的,由古代素朴的和谐美,经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向现代更高更新的辩证和谐美发展。当然,也一直有人质疑现代辩证和谐美,认为这只是美好的理想而已,是理论的假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为现代和谐美学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美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任务和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在此基础上必将产生出新的审美关系,创造出新的现代和谐美,形成新的和谐美学。所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和谐美学的源泉和发展动力,同时为彻底消解二元对立,开创辩证和谐的新时代创造物质条件。研究和谐美学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将和谐美学的发展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使理论的发展获得现实意义。和谐美学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对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培育社会主义全面和谐发展的现代人产生积极作用。

和谐美学思想理论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深奥的哲学美学思想,又是与现实相联系的、可以行之有效的观念和方法,周先生就曾说和谐美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既能领起美学研究潮流的又能解决美学实际问题的"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美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超出了美学学科本身,周先生所提出的"美是和谐"的观念,"和谐思维"的方法论,以及他所倡导的"和谐"精神,必将产生更加深远和广阔的影响,这也是周来祥先生作为一位思想家所具有的更大意义的贡献。

[责任编辑 刘 培]

① 《周来祥美学文选》(下),第1944页。

# 狄其骢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学术意识

谭 好 哲

**摘 要**:在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中,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狄其骢先生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一生的学术业绩,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文艺基本理论研究、比较文学元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释读和当代形态建设、文艺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四个方面,在这些不同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成就中,既体现出了他对学术真理的执著追求,同时也凸显出一个真正的理论家由思维心态、价值取向和方法选择等凝聚而成的自觉学术意识,即问题意识、创新意识、主义意识、综合意识。其毕生的学术追求与拓展中所体现出的有所担承有所守持的学者精神,所贯通的各种学术意识,对后学来说,或许更具启示价值。

**关键词**:狄其骢;文艺学研究;理论贡献;学术意识

在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中,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狄其骢先生(1933－1997)占有重要的位置。狄其骢先生是江苏溧阳人,1933 年生,1956 年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 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7 年 6 月因罹患癌症不幸去世。狄其骢先生终其一生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作为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他为人温厚坦诚、淡泊名利,为学则锐意进取、孜孜以求,人品学品皆给学界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和风范。历时性地纵观狄其骢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从大学毕业到"文革"爆发之间的十年,是其在形象思维和艺术性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以强劲的学术冲力赢得学界瞩目从而成为山东大学文艺学团队重要一员的时期,从"文革"结束到他病逝前的二十年,则是其走向文艺学研究的更高起点和更为阔大的境界,并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将山东大学的文艺学研究推向国内学界前列的时期。而共时性地研究其一生的学术业绩,则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文艺基本理论研究、比较文学元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释读和当代形态建设、文艺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四个方面,在这些不同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成就中,既体现出了他对学术真理的执著追求,同时也凸显出狄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家由思维心态、价值取向和方法选择等方面凝聚而成的自觉学术意识。

## 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

作为一门研究文艺现象的理论学科,文艺学首先需要在文艺基本理论上形成问题视域并取得学术突破。一定程度上说,文艺学(其他理论亦复如此)的发展就是基本理论研究中新、旧问题交相更替的历史,而它在现实文艺发展进程中是否有作用有力量,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其是否抓住了问题,对问题的掌握有多么深广。因此,对文艺学研究来说,问题意识必不可少。在 1993 年出版的《文艺学

**作者简介**:谭好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基本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与论争研究"(批准号:10BZW011)的阶段性成果。

问题》一书的后记里，狄其骢先生写道："1979年以来，我为文艺学硕士生开讲文艺理论专题课，取名为'文艺学问题'。课程所讲的专题内容随着实际的发展不断有所更新，开始是对十年动乱后文艺学问题的反思，后来进入对改革文艺学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问题的探讨。课程所讲的专题形式基本是三段结构：'问题的来龙去脉'、'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思索探讨'。讲述较为铺陈，后来提出为论文发表出来的，大都取自'问题的思索探讨'。"[①]由此可见，狄先生的学术研究完全是以问题意识为思维聚点的。

对于真正的文艺学研究来说，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还只是进入理论之思的一个主体条件，更重要的是你抓住的必须是真正的文艺问题，尤其是与文艺的本质特征相关的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成就的大小正与此相关。狄其骢先生的治学之路是从向真而大的文艺问题发起冲击开始的。其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关于形象思维问题》写于1957年，该文针对当时形象思维讨论中的一些成见和问题，明确地肯定了"艺术是形象思维"的定义，并对构成艺术实质的两个因素——思维性与形象性的辩证关系作了十分透彻的阐述，认为思维性是艺术的实质，揭示的是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共同性质，形象性是艺术的特殊性，揭示的是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个性，艺术的思维性借由形象性表现出来；形象思维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概念，它不是形象加思维，也不是思维加形象，而是形象化了的思维，思维化了的形象；形象思维的过程，乃是思维化（对认识对象本质特征的抽象概括）和形象化（给选择和改造的生活内容以个性和生命）辩证统一的复杂过程。在此基础上，论文还对形象思维与日常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作了辩证论析。该文在当时颇具声誉的《新建设》杂志1958年5月号上刊出后，被收入多种形象思维研究资料选编之中，至今仍然是形象思维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循着对于艺术特性问题的研究思路，20世纪60年代初期，狄先生又分别在《文史哲》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艺术性、文学典型以及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其中《试论艺术性的概念》一文特别值得关注。该文针对当时苏联和国内学界一些理论家首先从艺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思想内容方面来论定艺术性的见解，明确提出艺术性是文艺的特性，是文艺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总的标志，艺术性的特征是反映生活的形象性。由此，他进一步指出："从文艺创作本身来讲，艺术性的概念，是个有关艺术形式的概念。文艺创作中的艺术性问题，是个如何创造高度形象性的艺术形式的问题。"[②]基于艺术性关乎艺术形式的见解，该文强调不能混淆内容与形式的区别，只看到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而看不到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并着重论述了艺术技巧和艺术感染力在达成艺术性上的重要性。可以想见，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谈论形式即有可能被扣上"形式主义"帽子的语境里，该文阐论形式和技巧是需要几分理论勇气的，而文章对艺术性问题的层层论析，尤其是将艺术感染力引入艺术性的界定之中，以及对技巧与技术关系的辨证，确实显示了独立的识见。

"文革"动乱结束后，狄先生将自己多年来于孤独、沉寂中的思考变成了一篇篇具有深度和力度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是对"文革"前理论思考的继续。如在他与吴富恒先生合撰的《形象思维散论》一文中，在反驳否定形象思维论的观点时，不再一般地谈论艺术思维的形象性，而是进一步从人类思维的起源、特点以及创作的过程各个方面阐发了想象在形象思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出"形象的诞生，是思维的结果，也是想象的结果"，形象思维"是思维与想象的结合，抽象力与想象力的结合"的认识结论[③]。该文还指出，由于思维和形象结合的特点，也就派生出形象思维的另外两个特点：一是伴随着情感活动，二是允许虚构。稍后一点发表的《艺术创作中的情感问题》一文，紧承上文进一步探讨了艺术创作中的情感问题。该文从艺术占有对象的方式进而由艺术对象的性质论证了艺

① 狄其骢：《文艺学问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6页。

② 狄其骢：《试论艺术性的概念》，《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③ 吴富恒、狄其骢：《形象思维散论》，《文史哲》1978年第2期。

术创作为什么需要情感的问题，认为艺术的对象是活生生的整体，是以人为中心的充满生机的社会和自然界，艺术对象的整体性和艺术方式的形象性，决定了作家需要有敏锐的知觉和充沛的情感，因为艺术对象的感性特点，只有通过作家的知觉感受和情感体验才能占有。在艺术创作中，情感不仅是创作的动力，而且是创作的内容和能力。论文还从动力作用、提炼作用、结构作用和移入作用四个方面分析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①。

当然，狄先生此期的论文，更多的则是基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和理论深化的需要所作出的新的思考。"写真实"曾经是一个被极左文艺思潮所否定的命题，新时期之初，文艺界普遍要求恢复"写真实"在文艺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地位，然而在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生活事实等等的关系上却存在着各种混乱、不同的认识。基于此种状况，狄先生先后撰写了《略论文艺真实性的特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真实性问题上的区别》等文，阐明文艺的真实不是刻板地消极地反映生活的真实，而是作家创造性认识生活的结晶，文艺真实性的生命在于它反映生活的现实性、新颖性和独创性。在此基础上，他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生活事实，以及对人的真实和人的本质认识上的分歧诸方面，论证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文艺真实性问题上的分野。随后，狄先生的思考自然而然地由艺术真实性问题转向了现实主义文艺问题，先是于80年代初期，依据对恩格斯给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两封著名文艺书信的解读，写下了《倾向·真实·典型——读恩格斯的两封信》一文②，对以真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艺的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阐发。80年代后期，面对现实主义文艺在大量传入的西方现代派文艺和新兴起的通俗文艺浪潮的双重冲击下轰动效应风光不再的境况，狄先生又以敏锐的时代感知和学术理性写下了《冲击和命运：察看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这篇在当时极具重量和影响的文章。该文从宏观上分析了来自浪漫主义运动、来自现代主义和来自前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及其错误被揭发后所形成的"解冻"浪潮对现实主义的三次强烈冲击，同时也阐发了现实主义在不断的冲击和危机中通过不断的自我调适和变化以存活和再生的活力和流向，认为现实主义是人类审美创造的基本方式，"从历史发展来看，现实主义总是在冲击中更新和发展的。它有解决问题和排除危机的内在机制，它能调整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更新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发展着的社会需要。这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质所在"③。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既是对艺术真实问题的深化与拓展，也是在文坛面临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和文艺观念的引进而变得六神无主的境遇下，对一种艺术精神的坚守。古人有"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优良传统，狄先生这些基于艺术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时代性问题的回应文章，正是这种优良传统的当代传承。

## 二、学科拓展的创新意识

随着西方各种理论观念、研究方法和文艺思潮的引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学界不仅迎来了观念解放、方法更新、术语爆炸的一波波浪潮，于文艺理论研究的学科形态方面也在改变着过去那种由社会政治取向甚至是由庸俗社会学主导的封闭、单调的格局，开始了学科结构破局的萌动和研究领域拓展的尝试，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文化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等新兴学科应时而生。这种新的学科形态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是文艺学研究学术自觉的结果，也是学术创新的体现。在这个学科拓展、学术创新的新潮涌动中，狄其骢先生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蜂拥而至的西方新学，吸取和融会其中各种有价值的观念和方法，对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作出了丰富、充实、调整、改进，并相应

① 狄其骢：《艺术创作中的情感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3期。

② 文载《文史哲》1982年第2期。

③ 狄其骢：《冲击和命运——察看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文史哲》1988年第3期。

地调整了自己的学科方向，在文艺学研究上又进入到了一个新天地、新境界。

此一时期，狄先生在学科方向上的自觉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二是对于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在前一方面，狄先生承担了一项原国家教委的重点科研项目“创作心理学研究”，并已完成书稿写作，且列入了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只是由于当时狄先生正忙于《文艺学新论》教材的写作和出版，再加之他惯有的学术审慎，认为其中有的部分尚需再加修改，这部书稿的出版很遗憾地搁置下来了。这部书稿的内容，狄先生曾为其研究生系统讲述过，从内容设置和研究取向上看，是其之前对文艺创作心理如艺术思维、艺术情感等问题思考的深化和系统化，从其所借鉴的心理学知识来看，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有的知名学者仅以国内学者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教科书为理论指导的文艺心理学研究，而是广泛汲取和融会了各种当代心理学与生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同时，他也不赞成孤立绝缘地以纯心理学的知识解决复杂的文艺心理问题，尤其不同意当时有些学者仅仅以当代西方心理学尤其是欧美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研究心理问题之圭臬的做法，认为文艺心理是艺术活动主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互动互融的结晶，主张充分注意和借鉴原苏联社会文化学派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这些看法和理论资源的选择，使其文艺心理学研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面貌。

在学科拓展方面，狄先生更为人知的是其对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80年代中期，狄先生连续推出了《比较文学特性初探》、《开放性和可比性——比较文学略论》、《比较文学的活力》和《中西诗学比较探源》等颇具学术含量的专论，集中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中西基本艺术观念的差异等具有“元理论”性质的问题作了论说，文心独具，颇多创建，赢得了海内外学界的称赏。这些文章的主要理论价值，一是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两方面论证了比较文学的两大特性：开放性和可比性。关于开放性，狄先生指出：“比较文学本身，可以说是一门开放型的学科，这不仅表现为它的诞生是适应了世界文学发展的开放潮流，而且表现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开放过程。”[①]关于比较性，他强调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于它有比较性的对象和比较性的方法。从文学史的研究中发现、寻找到比较性的对象、材料，形成和确定具有可比性的课题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它要求从材料的异同中，发现和揭示出内在的联系，并把它提高到总体上来认识，这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②]。二是提出并探讨了比较文学的比较价值和自由度问题。关于比较价值，他主要从比较对象角度论证了价值何来与价值所指两个问题。他指出，并不是把不同的材料罗列一通就会产生价值，只有客体具有可比性并且能够实现比较目的的研究才有价值。而文学研究的关联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美学价值、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实用价值等等，“比较价值，应该是美学价值”[③]。脱离开美学价值，算不得比较文学。关于比较文学的自由度，他主要从比较方法的角度，从具有客观性质的比较性结构对象的自由性质，以及研究主体参与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现实化的能动性和自由两个方面作出了论证，认为“方法的比较性，使比较文学能适应世界的可比性，自由结构比较性对象，充分发挥比较能动性，从比较中探索文学现象的深层内蕴”[④]。

《中西诗学比较探源》是狄其骢先生又一篇引人瞩目的研究论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西诗学和美学比较中，论者大多套用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关于西方的古典艺术理论是模仿即再现，东方的古典艺术理论是写意即表现，艺术概念的历史，西方是从再现到表现，东方是从表现到再现，这是在同时展开的一种逆现象的观点[⑤]。狄先生通过对作为中西诗学的比较源头、比较基因的“言志”说和“模仿”说的严谨考证、分析和比较，彻底颠覆了这种人云亦云的流行成见。他指出，“言

① 狄其骢：《开放性与可比性——比较文学略论》，《文学评论家》（创刊号）1985年第1期。
② 狄其骢：《开放性与可比性——比较文学略论》，《文学评论家》（创刊号）1985年第1期。
③ 狄其骢：《开放性与可比性——比较文学略论》，《文学评论家》（创刊号）1985年第1期。
④ 狄其骢：《比较文学特性初探》，《文史哲》1985年第2期。
⑤ [日]今道友信：《关于美》，鲍显阳、王永丽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75页。

志”说所言之志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个人之志，即所谓情，二是社会之志，即所谓理，三是宇宙之志，即所谓道，完全不具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表现说“自我表现”的内涵，“言志说和表现说是有实质性的差异的。表现说是在个人与社会对立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表现自我，自我表现的无限自由，是创作追求的理想；而言志说是在个人与社会统一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理想”①。基于此种认识，狄先生概括比较了“言志”说与“表现”说六个方面的不同。进而，他又分析指出，“言志”说和“模仿”说都生成于古代奴隶制社会，历史因素相同，尽管“模仿说与言志说相比，一个是面向自然，是外向的，一个是面向自身，是内向的，但异途同归，都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②。由于这种一致，两种理论都主张艺术创造中物与我、理与情要和谐统一。所以，“言志”说与“模仿”说倒是具有内涵方面的一致性。在中国诗学史上，“只是到了晚明，李贽、汤显祖、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情真’说一派，才与言志说相对立，而开始具有类似西方近代诗学中的表现性质”③。该文不囿于流行的权威之见，洋溢着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为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并确立了一个诗学比较的范本。

## 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主义意识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是狄其骢先生学术生涯中又一个用力甚深、成就骄人的领域。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努力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科学释读，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建构。无论释读还是建构，都体现着一种鲜明突出的主义意识，即所释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所建构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所运用的方法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而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释读首先体现在为开展马列文论教学而由他领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选读》教材的编著上。在该教材的“绪论”里，狄先生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不像文学概论那样具有完整的理论系统，只是一篇篇具有针对性的、与一定具体对象相关联的理论文本的特点，提出了对经典文论的三种科学释读方法：即历史地读而不教条抽象地读、整体地读而不断章取义地读、实践地读而不脱离现状地读。所谓历史地读，“就是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读，不要脱离产生文论的历史基础，要掌握文论的历史特点”；所谓整体地读，“就是要把经典作家的文论放在一定的理论背景中去读，不脱离产生文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要掌握文论的理论特点”；所谓实践地读，“是把经典文论放到我们的现状中来理解和把握，判断它的当代意义，它在实践发展中的意义”④。狄先生在这里对经典文论特点的概括以及释读方法的阐发是对教学来讲的，并且在选读教材的编写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同时这些概括和阐发也作为基本方法论原则贯彻于其经典释读文章之中。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意义》一文甚为典型，该文分析论证了《讲话》将文艺的根本问题由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转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巨大意义，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实质是个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问题，但毛泽东不是从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思考中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而是从意识形态的建设实践中提出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学。这一转变的意义还在于从文艺与政治的外在关系进入到文艺（作家和作品）与读者的内在关系，从读者的主体性来审视文艺，开拓了文艺理论的对象范围和视野，加深了对文艺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比较而言，“在文艺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着重的是文艺的社会功能，读者只是

① 狄其骢：《中西诗学比较探源》，《文史哲》1986年第3期。
② 狄其骢：《中西诗学比较探源》，《文史哲》1986年第3期。
③ 狄其骢：《中西诗学比较探源》，《文史哲》1986年第3期。
④ 狄其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选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6－7页。
⑤ 狄其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意义》，《文史哲》1992年第3期。

意识形态审美教育的对象，而当文艺的根本问题重点转向为什么人为读者时，着重的是社会对文艺的社会功能，读者成了服务对象，是对文艺施加影响的主体。这一转变，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①。该文是国内较早阐发《讲话》马克思主义读者理论思想的论文之一，体现了对经典文论的卓识新见。

狄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体系的探索和整合，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建设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体系的架构，狄先生不同意国内有些学者仅仅从结构形式的完整性与否看待一种理论的体系性，从而用“断简残篇”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性。他指出：“一种艺术哲学理论是否形成体系，其根本条件并不在结构形式的完整，而决定于其艺术理论的内在的统一，正是这种理论的内在统一性构成理论的体系，标志出理论的深度和创见。”②据此，他指出，马恩的艺术理论虽分散为对各个文艺问题的格言式的论述，但有自己的体系精神，并因之使各个观点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体系精神，狄先生一是着重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贯通，认为经典文论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审美和艺术中的具体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在分散的各个艺术观点中，使其有内在的统一性，组成特定的艺术理论体系”③；一是着重于其核心观念即审美理想的内在凝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理想是社会理想、人的理想和美的理想的三重组合，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将三者最终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包含着多方面的理论内容和观点，“贯穿这众多方面内容和观点的主线，就是马恩的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是马恩艺术哲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或灵魂，它构成和显示出理论的整体统一性和逻辑连贯性”④。从世界观的理论整体性和审美理想的内在贯通性的双重视角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体系性，在国内学界属于首创。狄先生主编的专著《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⑤就是以此为思想指导而写成的。该书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首届优秀论著成果奖，被学界誉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当属实至名归。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建设，狄先生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思考。当代形态建设的提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当时的论者大多将思考中心放在如何吸取当代西方人文社科和文学艺术的理论与方法来丰富、补充、拓展经典文论方面，强调的是当代形态对经典形态的突破和超越。对此，狄先生则认为，理论体系既是个整体，也是个过程。从其作为一个过程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建设确有其必然与必要，在一定意义上说，“不能满足时代对文艺理论的需求，在当代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就会被击败”⑥。但是，当代形态建设不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趋同，不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化，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设，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和原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建设不能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反经典传统的发展模式，而要把经典形态与当代形态视为同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在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经典形态和当代形态的关系。这种当代形态的建设思路是“主义”的坚守，也是与时俱进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正道。

---

① 狄其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意义》，《文史哲》1992年第3期。

② 狄其骢、谭好哲：《艺术哲学的革命——论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的体系特征和审美理想》，《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③ 狄其骢：《文艺学问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④ 狄其骢、谭好哲：《艺术哲学的革命——论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的体系特征和审美理想》，《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⑤ 狄其骢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

⑥ 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6期。

## 四、文艺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的综合意识

在经历了西方新思潮新理论的大规模引进以及观念的变革、方法的更新和学科的膨胀与分化之后，文艺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到了一个多样而又繁杂、博采而又混乱的多元化学术格局。如何看待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多元化之后中国文艺理论又该如何走，走往何处？这些问题，在80年代与90年代转换之际，成为一些有担当意识的学人不得不面对与思考的课题，文艺学的改革问题继80年代初期的改革呼声之后再度成为一个话题。

就此境况与话题，狄其骢先生于1989年接连发表了两篇文义相续、颇具影响的重头文章。一篇为《文艺理论的多元化境况》，该文首先从中西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出发分析了文化学术多元繁荣与一元化发展的关系，而后分析了文艺理论的多元化境况对于打破旧有的纯一的理论秩序和思维方式的时代必然与价值意义，最后对多元化将如何发展作了展望，指出在多元化境况中，各种文艺理论都有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但其中又必有自由竞赛、生存斗争，各种文艺理论都应该在这种竞赛和斗争中求得自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亦复如此[①]。接下来的另一篇文章《面向新的综合——探讨文艺理论发展的趋向和问题》承接上文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分析指出，多元化后的文艺理论出现各种理论相互疏远和隔阂的趋向，这是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文艺理论的多元发展的关键不在量而在质，不在分化而在综合，综合是分化的深入。正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中的文艺理论，主要的发展模式将是从综合中创建。而文艺理论的综合创建，也是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文艺理论重心的转移不是理论建构原则向主体论转移，而是理论对象的研究侧重点向主体能动性的转移，这是理论综合的现代化也就是文艺学的改革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②]。由此可见，走综合创建之路，就是狄先生对多元化境况中文艺理论该如何走下去的一个回答。

狄先生对文艺学改革问题的上述思考和认识，在其文艺学教材编写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再阐发。1959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曾出版过一部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文艺学新论》，当时甚为年轻的狄先生是三位编著者之一。1990年起，以狄先生为主，带着两位年轻学者，又编著了一部书名依旧而结构内容全新的《文艺学新论》，1994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新的教材由狄先生提出编著“意图”和全书四编的章节大纲，并撰写了“前言”和“后记”。“前言”对教材的编著原则、架构方式、建设目标作了清晰明瞭、新意迭出的阐述。编著原则被确定为“出新不出格”。出新，重点在新事实的探索，就是要拓宽旧有教材的事实视野，冲破旧有教材的事实禁区，这就要求对一切有价值的事实材料和理论采取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但是，开放和宽容绝不是对一切事实的兼容并蓄，理论是有自己的倾向和主体性的，这就要求对事实具有自己的选择和综合，在主体视野和事实视野的融合中，在主体对事实的同化和顺应中建构新的主体视野。因此，具体到教材编写来说，“所谓出新，就是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新，也就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视野”[③]。出新的目的应该是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之从前更为充实丰富、焕然一新。但是，如果取得了兼容并蓄的增值，却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面目，甚至容蓄了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这就不是出新，而是出格了。这里的“格”，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色”，亦即前面所言的体系精神。可见，这个“出新不出格”的编著原则与狄先生所坚持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主义意识是一致的。

由于教材是对事实的认识和概括，所以在架构方式上，教材的结构体系（理论结构）就应以对象结构为依据，教材的理论结构要能够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作出认识、理解和解释。文艺学的理论

① 狄其骢：《文艺理论的多元化境况》，《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② 狄其骢：《面向新的综合——探讨文艺理论发展的趋向和问题》，《文史哲》1989年第2期。

③ 狄其骢：《文艺学新论·前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页。

结构是由概念组成的体系，但是，“概念体系的组建，并非单纯的逻辑整理工作，而是一项以对象结构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出新为目的的认识建构活动”①。具体到教材整体构架的设计，这部教材采取对对象的动态理解来替代过去的静态理解，系统性理解替代整体性理解。依据对文学活动的动态理解，教材的结构以文学活动的三大环节——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交流为主要构件。而为了理解和解释文学活动是什么，在三大活动构成的三编之前又加了一编总论，三编是微观而总论是宏观，三编是文学经验总结而总论是艺术哲学概论，三编是总论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而总论则是三编的理论升华和灵魂，这就使教材的理论结构的系统性大为加强。

“前言”的最后部分以“走向综合一体化”作为建设目标，也就是理论追求的思路和方向。这是对前述《面向新的综合——探讨文艺理论发展的趋向和问题》一文基本观点的再阐述，但在思想的表达上更为明确。在这里，狄先生把新的综合称为“综合一体化”，并对其内涵与外延作了明确表述。从内涵上讲，一体化是指汲取、批判、改造各种理论价值的综合活动，“这种综合一体化，从内在性质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化，从外在形式看，就是体系化、科学化”②，从外延上讲，“综合一体化，大体上说有三种类型，即结构性一体化、层次性一体化、材料性一体化”③。结构性一体化，是全局性的综合一体化，是全书四大编即总论编与三大分论编的总体结构的一体化，总论自身要有理论的综合一体化，还要把总论的观点贯穿到三大分论编即文学活动三大环节的分论中；层次性一体化就是把一些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概念，在统一命题下一体化，成为解释这一命题的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的概念；而材料性一体化则是把那些不能作结构性一体化综合而又觉得有综合的理论价值和需要的材料，作为一种参照和借用材料，在分析提炼的基础上最后作出自己的综合判断。三种类型的一体化就将性质上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科学化落到了实处。

《文艺学新论》在使用中颇受学生欢迎，也得到学界好评，多次再版，荣获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2009 年，经修改之后，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以《文艺学通论》之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的成功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讲是源于狄先生精深的学术造诣和思考。狄先生所作的上述三个方面的阐述，是其长期文艺学教学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其学术思想学术意识的体现和阐发，因而不仅对新的文艺学教材编写有其具体的借鉴价值，对文艺学理论研究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就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文艺学研究而言，“出新不出格”的学术创新原则依然有其指导意义，“综合一体化”的理论建设目标仍是诱人的追求方向。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本文出于论文结构的方便，从狄先生不同方面的理论活动和成果来彰显其学术意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术意识只是与不同方面的研究和努力相关联，事实上，本文所阐发的这四种学术意识是有机综合地渗透于其各个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之中的。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狄先生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理论建树，他所提出的观点、解决的问题、作出的论断，至今仍有着相当的真理性内容，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而他在毕生的学术追求与拓展中所体现出的有所担承有所守持的学者精神，所贯通的上述各种学术意识，或许更具有启示价值，学术的进步，学术薪火的传承，有赖于这种学者精神和学术意识所提供的内在支撑！

[责任编辑 渭 卿]

① 狄其骢：《文艺学新论·前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6 页。
② 狄其骢：《文艺学新论·前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1 页。
③ 狄其骢：《文艺学新论·前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1 页。

# 自学成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

潘 群

**摘 要**:黄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浙东经世之学,融汇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以史学为中心,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其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治学特点,从而经世致用。二百余万言的巨著《明史考证》,积先生四十年之功,既是超越乾嘉的考据名作,又是一部明史研究的专门论著,更蕴含着先生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经世追求,必将成为永传后世的不朽经典。黄云眉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程千帆、冯其庸、卞孝萱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皆为先生之高足。

**关键词**:黄云眉;浙东学派;《明史考证》;教育家

## 一、生平简历

我国著名学者、享誉海内外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1898－1977),字子亭,号半坡,浙江省余姚市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员。1898 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1977 年 2 月 20 日 12 时病逝于山东省济南市,终年八十岁。黄先生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学术研究工作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对于古籍整理和官修《明史》的考证,贡献尤为显著。黄先生从十七岁开始,从事小学教育,任教于余姚县立高等小学(现余姚市府前路小学前身)。后又从事于中学教育及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历任余姚实获中学、浙江宁波市中学、南京金陵中学以及宁波市甲种商业学校等校教师。自 20 世纪 30 年代肇始,先生专门从事于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工作,历任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教授以及上海沪江大学、上海临时大学、上海新中国法商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教授,并曾任世界书局编辑所主任。1949 年 5 月,黄先生时年五十一岁,在上海迎来了解放,一度回乡小住,被推选为余姚县人民代表,后为求进步又毅然参加华东政治研究院研修。1951 年 1 月,时年五十三岁,始由华东教育部分配至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不久转入历史系任教授,凡二十六年,除上课教学并带研究生及进修教师研习外,曾专职从事研究及著作工作,直至尽瘁而终。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黄先生曾任历史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校教育工会副主席、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并曾任山东省民盟副主任、济南市民盟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青岛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主席等社会兼职。因教学和科研工作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并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山东省文教群英会、参加山东省国庆十周年赴京观礼代表团。1961 年 8 月 22 日出席六个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云眉先生是一位德才兼备与融道德、文章、事功为一的古代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堪称为人师表的教育家。他一生为人、为学、为业三方面均可为楷模,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值得后人学习。他为人外慈而内刚,正直中和而不乡原,虚心谦逊但不迷信权威偶像,

**作者简介**:潘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江苏南京 210093)。

继承传统而勇于创新，紧跟时代步伐，仁爱学生晚辈但绝不迁就，立大志知难而进但为而不争，淡泊名利但严谨求实，真诚尽己忠厚但推己及人而宽恕，善于团结众人共同进步。为学具有宗旨，广博精深，经史子集无所不涉，由经而史，发而为文，兼取诸子百家，擅长考辨，精于明史，著作蕴哲理、史实、文情为一体，堪称“文章九鼎重，神骏万里超”。并具经世学风特征。此外，对于音韵训诂、版本目录，以及书画艺术、文物考古等也有较深入的研究。先生于书法，以魏碑与二王为基础，以唐字求法而更爱宋字意放，兼收各家所长融成自己特色，尤显古雅而带有秦汉所具的浓厚金石韵味。对于诗词，先生自幼即喜抱膝吟哦，1919 年以来所作数百首之多，以言其志(《史学杂稿续存》附录其中一勺)。平生爱慕苏轼之诗，因以“半坡”为号。所作文言文，情至文美而富神韵，易于琅琅上口，令人余味无穷。程千帆先生晚年尚能全文背诵眉师《邵二云先生年谱》，夏征农先生任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时，即能背诵云眉先生 1959 年为《史学杂稿订存》所作的《叙言》。眉师不但学有建树，且“传道、授业、解惑”，以扬雄所言“师者，人之模范”为目标，谆谆教化诸学子，是培养中国文史人才的辛勤园丁。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鲁迅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与李希凡先生，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清史专家金成基学长，文物专家徐启宪学长，前黄梨洲文献馆负责人符伯望先生等，皆是云眉先生的高足。著名文史专家卞孝萱先生年轻时亦曾受到眉师教益，保存有云眉先生于解放前为其亲笔书写的题辞。明史专家李晋华先生，日本著名明史专家阪仓笃秀教授，皆为眉师在明史学业上的传承者。云眉先生勤学善著，数十年来读书札记与发表的论著积百余篇之多，自 1929 年著成《邵二云先生年谱》以来，陆续出版《古今伪书考补证》、《史学杂稿订存》、《史学杂稿续存》、《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鲒崎亭文集选注》等学术著作凡一百一十余万言，而在史学领域中以明史研究最为突出，1971 年完成了二百万字的《明史考证》巨著，为后人遗留了珍贵的传世著作。我们当永远纪念他一生为党为人民所作的杰出贡献，学习他如何做人、如何为学、如何继往开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业绩，更要学习他不断探索新知、既继承传统而又创新的学术精神，学习他严谨求实、经世致用的学风。

## 二、自学成才

黄云眉先生的远祖，可以上溯到余姚黄宗羲，世称梨洲先生者，这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也是官修《明史》的实际奠基人。眉师在其著作中尝称梨洲、黄稚圭、黄蔚亭等先生为“吾先辈”(黄稚圭为梨洲玄孙，于乾隆时撰《黄梨洲年谱》稿，黄蔚亭为梨洲七世孙，所撰《黄梨洲先生年谱》即同治年间刊行之通行本)。同时，也曾与笔者语及此事，以明其血缘渊源与学统传承。所以，云眉先生自幼立志继承并发扬梨洲家学的优秀传统和浙东史学精神，并付诸终生实践而终有大成。然而“蘁华鱼长研”，传至眉师父亲黄延龄先生时，却是一名手工业工人(银匠)，家境不裕，又有子女四人，生活更显困难。云眉先生在子女中居长，为家庭亦为己早寻生计，不得不以学徒为业。但云眉先生渴求上进之心不止，艰辛劳动之余，不顾疲困，经常偷偷看书，亲友们为之感动，予以资助。到十二岁那一年才进了私塾就读，十五岁插班余姚县立小学，十七岁毕业留校任教。自此之后，没有进过任何学校受过正规文化教育，所以他自己说：“一生只受过两年学校教育。”自己填表“文化程度”这一栏目时只写“小学毕业”。为此，闹过一桩笑话：华东政治研究院人事干部，见此所填学历并未核审真才实学，即拟将黄云眉教授分配至南京中山陵任工友，一时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才由华东教育部分配至山东大学任教授。不然，云眉先生后半生的学术生命历程，又不知该如何书写了。事情虽过去了数十年，但这种仅看表面学历、头衔用人的倾向仍然“阴魂不散”，至今不乏常见，所以，我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当深思为训，痛戒而杜绝之，真正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

云眉先生从一位只进过两年学校的青年，到晚年竟成为很有贡献的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其途径完全是靠自学。他总结自己这方面经验时说：“我的成就虽然是那么微不足道，毕竟是从自学得来，不是除了学校就会和‘知’绝缘。”又说：“求知的主要途径应该是自学，而不是学校。学校的教育是有

限的，而且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受全部学校教育的机会，即使在学校受教育，主要还是要靠自学。”并且进一步指出：“结合实际的求知时间，是在离开学校后的工作实践阶段。不论做什么工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都不能满足于旧知，必须通过自己刻苦的学习，不断地求新知，长新知，用新知。”他说：能否受到完全的学校教育，“可以争取，但不能勉强。而自学则占着我们一生求知的时间，其权则操之在己，我们非努力不可”。云眉先生在这里阐明了四点：首先就人生宇宙时空视野的发展观点，讲述了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认识求知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则是有限的，学校求知并非唯一的途径。其次，就学校求知的途径看，书本与老师的传授也要靠自己独立思考与融会贯通才能接受。再次，就人生道路看，社会工作实践是主要的阶段，而在工作实践中“求新知、长新知、用新知”归根结底是人生求知最主要的道路，这完全要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运用、提高，综合上升而出新。最后结论是：“自学则占着我们一生求知的时间，其权则操之在己，我们非努力不可。”黄宗羲说：“学莫先于立志”，而且“学有宗旨”，但归根结底贵在坚持到底。张维华西山先生1981年6月3日在笔者藏书《明通鉴》扉页上有一段亲笔题辞就是说的这一点：“读书求学，要有路数，路数即入门之径。有了路数，还要持之以恒，以坚忍不拔之志，贯彻始终。”所谓“宗旨”即“宗致”，“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换言之，即学者的用意所在，是学习者进入这门学问的入口处，也就是张西山先生所言的“路数，即入门之径”。而学贵持恒，要“锲而不舍”，决不“一曝十寒”，做到顾炎武所言：“君子之学，死而后已。”云眉先师数十年如一日的学习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他不论任何困难，包括晚年一目失明后直至八十高龄临终前，还认为“求知是苦事，也是乐事”，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活到老而学到老，从未间断过自学和研究。真可谓：“君子之为学也，没身而已矣。”这种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自学毅力和乐观精神，是他终于成为起程很晚而获得成果较早的一位集大成的学者。

在自学过程中，云眉先生和其他人一样走过弯路。青年时期“只是贪婪地把大堆的故纸，尽往自己脑筋里挤、积，再挤、再积”。他说：“当时以为这样，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博闻之士。欲速则不达，结果，东碰西撞，走了弯路。”患了一般青年人急于求成的通病。因而他经常以此为训，告诫诸生引以为鉴，教育我们，一不求名利，二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在私人谈话中，时以“水滴石穿”和荀子“积跬步、积小流”的道理，说明“百川学海”以及“圣可积而至”的精神，勖勉大家勤学。他总结自学经验的第一条，就是“循序而进”。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本诸朱熹《读书之要》中“循序而渐进”之义，要按顺序一步一步深入；二是云眉先生自己独特的体会，他略去一“渐”字，突出一“而”字，就将“序”字引申为阶段。他认为：“我们要不断求知，但不能跨过学问应有的序。”这就是说，学问一方面要不断地积累，这是“渐进”过程；另方面有一定的阶段，必须综合学、思、问、辨、行，从而突破和超越，这就是“而进”过程。渐进与而进的整个认知过程，就是不断地平时积累并按阶段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创新的过程，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突破创新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是目标。因之，做学问是一知难而进的过程，是一“自强不息”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归根到底，是突破自己，战胜自我，不断走上新阶段的过程。云眉先生说：“学问的加广加深，是一个和困难作斗争的过程，奇峰乍越，险壑又临，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地挡住了前路。但实际上这些奇峰险壑，无非是学问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可以突破，不能绕过。”实际上，云眉先生正是顽强不断地学而经过了无数的“序”，突破了不少奇峰险壑，才登上学问高峰境界的。

为学犹如金字塔，既广且尖。如何处理博精之间的关系，即基础知识与专门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是任何自学求知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博而约知要，广博精深，是每位学者皆要企求的目标。杨向奎拱辰先生曾在50年代有一极致的目标语我：“广博到世界上所有学问我都知道，而专门精深的学问只有我一人知道。”这当然不易做到。1955年，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当面请教过云眉师。先生当即爽朗而明确地回答：“博是精的基础。”并且要笔者看黄宗羲的著作，后来笔者研究黄梨洲，在《万充宗墓志铭》一文中才见到：“学不患不博，患不能精。”“由博以致精。信矣，其何传也。”求学当然要

博通而不杂，精深而不粗疏，求学的目的是创新，从而将学术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关键是基础，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广博基础，没有这个如金字塔式的广博基础，也就没有金字塔式的高尖创见。梨洲所说：由博而精的学问，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才可以传世后人。云眉先生就是这样教诲我学《明史》的，他让笔者至少先读完《资治通鉴》、《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左传》等书，打好通史基础再攻读《明史》。为此，在笔者大学二年级时，云眉先生批准笔者休学并专门写信给他的好友、前中央图书馆馆长缪镇藩先生，请他介绍笔者到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专家阅览室看书，从此笔者每天风雨无阻在馆中坚持自学了整整两年，攻读《明实录》旁及明代文献，在实践中稍涉版本目录之学，并在馆中拜识了在此阅书的胡小石先生、陈中凡先生、陈鹤琴先生、邹树文先生等老一辈专家，得到教益匪浅。尤其是徐复先生当时正值年富力强，交谈最多。云眉先生让笔者在图书馆里泡了两年的生活，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编外研究生的实践”，为笔者大学毕业后的自学生涯和“泡图书馆”的习惯以及治学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云眉先生早年的自学生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先生所走过的治学历程，所经历的“序”，更广博、更精尖了。他大体上经历了三大阶段，一是“博”，二是“辨”，三是’精”。他曾说：“余三十以前，泛滥群籍”，“三十以后，稍涉考证之学”，如是者又十年，不幸寇氛东来，山川变色，深感“南冠低压”，因而“欲借一代之史，殚精其中”，着手著作《明史考证》。他博览群籍“广及四部”，由经而史发而为文，将经、史、文融贯在一起，经过自己的分解与化合，究心于另一种特色的深湛之思、贯串之学即独创性的见解。他承继学统而尊重师道，又能轶出学统藩篱，善于对待各家学说的异同，敢蹈前人之未越，将汉代经学训诂求真的方法致力于贵创见的目的。他以经学为本，必证明于史、突出史学为中心，学用一致，为实践服务。因之，他的任何一种著作都显示出哲理、史实、文情三者的高度统一。同时，应指出云眉先生在打基础上所注意的音韵训诂学及版本目录学。解放前，他为世界书局编辑《辞林》一书，曾对《康熙字典》的引书进行了通校，在前人检出所误者 2588 条的基础上，又增检所误者五六百条，而属于形义音切之误者尚不在内，因撰《康熙字典引书正误》一文，刊行在《金陵学报》第六卷第二期上。此外，还写过《齐楚吴三大地区方言考》一类文章。对于外国语言文字，因未受过中、高等学校正规教育，最初并不识 A、B、C，直到四十岁之后才自学了英文并能检阅字典读外文书刊。至于目录版本学，可以说是读书的门径。前人读书从张之洞《书目答问》开始，童书业先生让笔者从背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始，无非要我们读书必须知书，而知书又必须择书，就好像今天带研究生，首先要开个书单一样，必读哪些，精读哪些，先阅哪些，后阅哪些，旁涉哪些，参考哪些，凡此等等，对于浩如瀚海的古籍，不懂目录版本是难以在治学大道上前进一步的。云眉先生早年读书，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1930 年他亲登天一阁观书目录。在山东大学任图书馆馆长时对编目工作十分重视，在历史系任系主任时对图书室资料建设甚为关切。笔者到南京图书馆看书，临行前，他向我简介了柳诒徵翼谋先生及金陵大学李小缘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江苏国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并叮嘱说：“南京图书馆藏明人文集极多，必须注意与《明史·艺文志》相校而考证。”他为著《明史考证》，先作了《书目索引》、《明实录人名索引》、《明史人名索引》等工具书。先生和图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写过《解放前公私图籍之聚散概况》等文章。

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精尖的专门学问的获得，需要解决学习方法问题。云眉先生曾把“多思多问”列入自学经验的第二要旨。他指出，要读书得“间”。所谓“间”者，首先是指读书时经过自己认真思索所发现的问题。读书发现不了问题，原因即在于读而不思，没有从广度与深度领会著书人用意所在，并联系自己所学与他书所述相互联系，找出异同。这里，以此书与彼书“对着看”是“得间”的重要学习方法。其次是指经过融化众说而独立思考悟出自己富有新意的“心得”，按先生的说法就是“读书要有所得”。为此，将此所得及所余疑问请教他人和相互交流，这就要“多问”。古人治学，历来按照《中庸》所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认为应顺循的序，是学、问、思、辨、行。而先生则根据《论语》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自身自学的体验，认为应该是“学、思、问、辨、行”，将“思”字重点突出。“思”即古人所说之“心”，《说文》释为“囟”为“虑”，也可理解为“智”

或“知”。如果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考虑，思想是人区分于动物的一大特征。思与行的关系，换言之亦即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人类认识论中的核心，思想指导行动，在行为实践中又检验思想和提高思想，社会实践与学术实践，经过综合升华反映客观规律成科学法则，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总结时空智慧，即总结传统与现实的成就，昭示未来。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产与消费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及其表达方式，也包括遗存在内。就广义来说，传统与现实的衔接点，就在于总结继承与扬弃，在于总结宇宙空间变异与创新，在于如何“思”，在于集众智成圣和学与思的关系。章学诚所言“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焦循所言“学贵善用思”，就是指集思广益并经自身独立思考出新论的重要。包括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思想、意念、理论在人生宇宙中继往开来的焦点作用。因之，无论就学知、长知、用知的过程与效果看，应当特别突出发扬“思”的关键作用。云眉先生在实践中，就是这样力行的。他在1929年所著第一部著作《邵二云先生年谱》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特点，重点阐述了邵晋涵其人的学术思想。东南派史学大师柳诒徵翼谋先生为是谱所作的《跋》文中，即阐明了云眉先生这一特色。其文云：

> 采舂群书，编次一先生之年谱不难，难在若人之学术思想独到之处，辨章扬榷，有以推见至隐，史公所诏好深思，心知其意，亦浙东史学所独擅。胝沫是篇，南江精神为不死矣！

学、思、问、辨、行，单靠记忆力是不够的。云眉先生说：“不能迷信记忆力，应当强调发愤和勤勉。而坚持作札记就是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写札记，不仅可以帮助记忆和养成勤勉的习惯，同时能把所学的庞杂、分散、无条理、无联系的东西，经过审慎别择，成为后来解决问题的重要资料。先生写下的无数札记，可以说是他大量著述的基地和泉源，有的经整理后即成为学术专著，如《史学杂稿续存》、《鲒埼亭文集选注》等，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札记手迹，字字端正，笔笔不乱，也可见他对札记的认真程度。无怪乎他把“勤于札记”作为他自学成功经验的第三要旨了。当然，正确的学习方法，说到底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他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指导我们把知识结合实际，把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运用到业务工作上去，又通过实践不断检验来充实它，提高它”。他把学知与用知作为一个整体，将实践作为检验知识的尺度并作为“长知”的必经过程，将实践作为进一步充实知识、提高知识、创新知识的新起点。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就是我们在认识论中应得的结论。

云眉先生在自学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是在艰难曲折中摸索前进的。中国旧学传统，荀子齐学重师承，鲁学则重经本。而云眉先生青少年时，既要克服“学无师承”的困难，又要克服无钱购书和到图书馆借阅书籍的苦恼。他为了借一本书，往往跑到几十里之外，书主人不在时还要空跑。借了回来，与其说是借书，毋宁说是抄书，不仅是摘录有关资料，而且是整部整部地抄，和每位学者一样，手指间的老茧是抄书岁月的标记。1929年在宁波，他为借书访藏书家冯孟颛先生时的心情，有诗一首可证：“荒乱饥驱但自哀，逢君不觉倦眸开。旧家庭宇燕双至，处士生涯书四堆，故简似留秦世火，残碑多带汉时苔。酸咸我亦殊人好，竟许幽扉数数推。”能得到借书的许可，云眉先生是何等的喜悦，并由此结识成为莫逆之交。其次，在自学过程中要同“病”作斗争。他十七岁患肺病，大口大口地吐血，一直到二十三岁才治愈。1961年《明史考证》初稿完成，正想进一步扩充提高时，左眼患“白内障”失明，他仍不改其乐观的态度，反而更加孜孜不倦地进一步进行撰著工作，如是者十年，终于在1971年七十三岁时定稿完成了《明史考证》这部二百万言的巨著。再次，是同“老”作斗争。他五十三岁到山东大学工作，在历史系各位先生中，年龄居长，后来头发渐白，但精神和劲头仍如青年一样。他常说：“我不怕头上的白发，但必须和思想上的白发作斗争。”“白发不是年老的标志。只有停留，才算真年老！只有前进，才配称年青！”他在山东大学工作二十六年，也是同衰老作斗争的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却是他出成果最重要的岁月。他的夫人徐飞卿先生于1971年庆贺他《明史考证》完稿时，有诗云“二百万言衰后笔”，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是在晚年同衰老不断斗争中，完成这一宏帙巨著的。

## 三、《明史考证》

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合义理、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的浙东经世之学。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使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融合为一体，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特色，从而经世致用。因之，云眉先生的任何著作皆富有这种特色，经学、史学、文学之作无不如此，考证亦不例外。他的考证，既不同于汉代经学单纯以训诂字义释经的墨守教条之习，又不同于宋学流弊主观任意臆测义理的虚浮作风，更非囿于清代乾嘉汉学考据校雠文献、辨伪文献的局限，而是将考证求真的方法致力于贵创见的治学目的。用云眉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求真而已，非求胜也。……亦所以为来者辟一读书之坦途也”，“盖古籍真伪之辨，犹为今日董理大量文献工作中之首要课题也”，“盖举所有古籍，一一探其源流，穷其所以真伪之故”，“古籍真伪之辨，尚需继续……使丰富之古籍能正确效其用于今日云尔”。并云：“是非之公，具在人心。”这是从云眉先生《古今伪书考补证》中的《序》及《重印引言》中所摘引，可见云眉先生求新求真求公之情集中在文献辨伪对于读书与董理文献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上，并非为考据而考据，是为经世致用考辨。但更深层次的考证目的，就不单纯局限于文献范围，而扩至于史实辨正以及书籍蕴含用意的发微了。最明显的诸如《李卓吾事实辨正》、《读广论语骈枝微子篇质章太炎先生》、《辨宋祁汉书校语》等文，更集中表现在《明史考证》这部云眉先生的代表性巨著上。他在此书“代序”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明确指出：

> 《明史考证》致力之中心，在提取《明史》范围内所包含之若干问题，根据《明史》已采用或未采用之可靠资料，作较深入之探讨，俾将进而揭发明代封建统治之真实面貌及其本质，此与累朝旧史考证专为旧史要求服务之目的，截然不同，故首槩之。

云眉先生《考证》的宗旨用意，与其著《邵二云先生年谱》的浙东史学精神一样，在于“辨章扬榷，推见至隐”，借考证是书体例，阐发云眉先生对《明史》是书与有明一代历史的看法与评论。因之，笔者以为《明史考证》绝非是一部单纯的考证之作，而是一部明史专门的学术论著。独到之处在于借用不同于一般论著的考证体例，融义理、考据、辞章为一体而已。无疑，我们从中可显然看出云眉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云眉先生解放后以学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服务的学问宗旨。

《明史考证》的著作过程，历时凡四十年之久，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肇始于1931年著《明史编纂考略》。第二阶段，日寇侵略，故乡沦陷。于1941年在上海开始动手撰著《明史考证》。第三阶段，解放后在山东大学任教，于1961年完成《明史考证》初稿，1971年完成定稿交中华书局，因“文化大革命”未能出版，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1979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第一册，至1986年8月出版完第八册，是书终告全部问世。

1931年，云眉先生有感于《明史》一书，清代学者以其钦定之故，率有褒无贬，或箝口不道，以远疑忌。而赵翼以为近代诸史“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不免回护《明史》，评论不公。故云：“余拟博览明代官私记载，将《明史》所用材料一一加以勘核，成《明史考证》一书，以确定《明史》价值。”因作《明史编纂考略》，“兹先揭其编纂始末于此，就正宏达，亦以见赵氏所言之非为实录，而《明史》之不可不重加估计云”。全文首叙《明史》纂修过程，创修于顺治二年五月至康熙四年为初期；而后至康熙十八年开局明史馆于东华门内，迄康熙末年为《明史》纂修中期，是大规模修史时期，同时又是成绩最大的时期，为今本《明史》奠定了基础。而后，从雍正元年始下迄乾隆五十年止，为《明史》纂修后期。其中第一期从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张廷玉进呈修改王鸿绪之三百十卷稿即今之三百三十六卷本；第二期从乾隆四年今本刊行后，又有修改、考证之议，复于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年纂修《明史列传考证》本二百十六卷以及三百六十卷新定本，故复有故宫博物院景印之重刻殿本《本纪》，以及王颂蔚于光绪年间据《明史列传考证》而成之《明史考证捃逸》之刊行。其次，眉师在此文中就“总裁之攘窃”与“时

主之箝制”两节事迹中指出，《明史》第二期编纂过程中的两大特点，其一是总裁名为王鸿绪实盗誉于万斯同。其二是清帝控驭史臣，因之“《明史》乃无信史之价值可言矣”。该文刊载于1931年《金陵学报》第一卷第二期，在史坛上产生了较大影响。顾颉刚先生阅后，极为重视，叮嘱并指导其弟子李晋华先生认真研读，并在眉师此文基础上扩而成为《明史纂修考》，晋华先生由此起点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而顾颉刚先生与云眉先生之间友谊更深入一步，解放后顾先生到青岛度假，住在云眉先生家中，仍然关切《明史考证》撰著进展情况。1980年9月，颉刚先生已在病中，笔者与眉师公子黄汉充先生专程赴北京南沙沟顾府，谒见了颉刚先生与顾师母，进呈了刚出版的《明史考证》第一册，以竟顾、黄两位老先生共同的夙愿。

1937年，日寇侵略中国，年底南京沦陷，云眉先生避至和州，赋诗中有“百里烟尘暗，千家骨肉枯，衣冠迁赵宋，草木走秦符”之句。岁末在友人刘君之村度除夕，降雪又作一绝：“如此江山如此身，可怜四十作逋民。不知今夜他乡雪，飞著愁颠定几人？”1938年旅次安徽他乡书恨云：“东风无赖柳花妍，故国艰难又一年。马上幽并羞妇女，舟中李郭泣神仙。颓城血肉碧春草，窜客须眉黄暮烟。只有忙忙南去燕，犹思寻觅旧堂前。”归乡途中过茅山，又叹曰：“胡马从东来，衣冠飒以替。山水俱蒙垢，何心敦宿契。”返乡对月，感梨洲等先辈率世忠营子弟兵抗清，从亡鲁王于海上于深山的民族气节，联系当时国土破损之恨，又吟道：“海气黄俱尽，清光下树端。不堪秋破碎，还对月团圆。壮士随鹰隼，高楼谢绮纨。越王风烈在，肝胆好相剜。”字里行间，可以想见当时云眉先生对因日本侵略所遭“山河变色”民族仇恨无处泄愤的情状。当1941年故乡沦陷避居上海之时，他深感“寇氛东来，山川变色，余避地寄食，南冠低压，俯仰无赖，始欲借一代之史，殚精其中，束制念虑，强图安帖”，于是正式动手撰著《明史考证》一书，“藉减南冠之恨”。由此可见，云眉先生于第二阶段着手撰著《明史考证》，用意是为了民族之恨，是鉴于清之修《明史》，因史臣受满清贵族统治者箝制，忌讳、曲笔民族矛盾上升实质，又鉴于当时日本侵略中华，民族矛盾上升，是“发愤”之作。总之，体现出著者寓意于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可是，这样一部寄寓着作者无限爱国热情的著作，在“文革”时期，竟被别有用心者“立案”审查，我们只能赘引当时云眉先生的《诗》与是书所写的“原文”以明辨之。

1951年云眉先生至山东大学，一方面任教，一方面著作《明史考证》并培养人才。至1961年，又历时十年之久，完成《明史考证》初稿。之后，经反复修改补充，又历时十年，于1971年终成定稿，于1972年交稿中华书局，整整五年，音信杳无，到1977年2月上旬始接书局函知：打倒“四人帮”，决定出版是书。而先生已卧榻多日，病重昏沉。师母徐飞卿先生附耳告之数遍，竟不知先生是否领悟。先生于同月20日溘然长逝而终未见是书出版。

《明史考证》的体例，云眉先生说：“亦无申述之必要。”但从先生所云：《明史》体例，“以徐元文兄弟之《修史条议》、王鸿绪之《史例议》为两大骨干，兼酌取诸家意见而成。其议订之过程，及体例之善否，可参阅近人所辑《明史例案》一书。余一九三一年撰《明史编纂考略》，又尝榷论之。今撰《明史考证》，不复申述体例，以免重复”。综合上述，所言的《明史例案》当为1915年刘承幹先生所著《明史例案》九卷，刘氏嘉业堂刊本。徐元文兄弟条议，凡六十一条，其《序》见徐乾学《憺园文集》。而王鸿绪《例议》以及汤斌之《明史凡例议》等，诸如此类，均可见眉师的《明史编纂考略》所录的精华。但钦定《明史》实肇基于康熙时期，实际总裁并非王鸿绪之流，而是黄宗羲所遣入馆弟子万斯同季野其人。云眉先生说：“斯同以一生所学，历二十余年，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南雷诗历》中载梨洲《送万季野北上诗》云：‘三叠湖头入帝畿，十年乌背日光飞。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良夜剧谈红烛跋，名园晓色牡丹旂。不知后会期何日？老泪纵横未有归。’”

黄宗羲晚年不应清廷累召，全力著述，总结历史兴亡得失，注重整理明朝故国的历史，以古鉴今，启昭未来。除对万斯同入京寄以厚望外，对《明史》供给史料，推荐史才，商榷体例，审核史稿，应是官修《明史》最初奠基者之一。而源于梨洲史学渊源并得其传承的万季野修史主张，实为明史馆诸史臣的《明史》体例的源本。云眉先生说得好：“当发凡起例时，其大部分必为斯同所主张，而馆臣意见之

贡献，亦可想其泰半取决于斯同。”因之，应以徐氏兄弟《条议》所本的万季野之修史法为《明史》的体例。这一点，在研究《明史考证》体例时，必须首先明确之。

《明史》第一难事，厥为史料之搜集，而后为史料的选择与辨别。众所周知，修史取材凡计有三，钱牧斋有云：“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然而，正如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所言：“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必须以国史、家史、野史互相参证。明代大史家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有一段精辟之论，云：

> 国史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取国史的典章制度，参野史的是非之论，征家史的人物，并考以年月综核以史实，这是修史取材必须具备的标准。而《明史》取材众途，但基本史料在《实录》与邸报，而其修史体例本诸万季野修史之方法：“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方苞《方望溪文集》所载《万季野墓表》中更有一重要之言为：“要以《实录》为指归。”徐元文兄弟《条议》据此而云：“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诸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

由此可见，《明史》纂修的体例及基本方法已如上述。而《明史考证》的体例及其取材考辨的基本方法，亦同上述并考史源。然而，其不同之处与注重之处，在于参之《古今伪书考补证》之法云：“列他文于前，缀己说于后。”实际足按照本义、他义、我意三序排列并融为一体，先列原文，次列他人、近人之文，然后以按语形式表达著者己见。而《明史考证》的体例，是先列《明史》原文，再列官私记载材料原文并注明出处，最后则以万斯同修史方法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著者的《按语》为己见。这部《考证》，根据《明史》的次序，首为《纪》，次为《志》，再次为《表》，最后为《传》。根据眉师 50 年代初与笔者私人的谈话，《序》应是全书的纲，而《明史考证》无《序》，以《本书内容挈要》代序，则应是此书总纲。又眉师 1955 年教笔者读《明史》，所本乃是“以纪为纲，以传为目”的原则，核以《考证》，当以《本纪》尤以《太祖本纪》与《成祖本纪》为注重之处。

总之，《明史考证》的《按语》特色，不仅据国史、野史、家史等官私记载原文注明出处，加以考辨，提出自己的史断，也不仅限于史料、史实的辨伪和评断，而且在于通过《按语》，明显地表达了云眉先生对此处所引历史的见解，因而融史料、史实的辨伪与著书人的“史断”即“史识”于一体，使义理、考证、辞章三种学问高度统一，继承发扬了黄宗羲的“一贯之学”与经世学风，使哲理、史实、文情合而为一，古为今用而昭示未来。

《明史考证》巨著，初始于 1931 年，定稿于 1971 年，凡历时四十年岁月，迄止 1986 年 8 月方由中华书局出齐而终告全面问世。由始迄终凡五十五载矣！著书人自三十三岁始，迄 1977 年 2 月 20 日长逝，历时近四十七载岁月，耗尽毕生心血，终未见自己劳动成果问世而抱恨作古，不竟悲愤之至。1978 年夏，笔者赴母校整理先师遗著，曾赋诗一首怀念吾师教诲之恩云：

慷慨辞家载笔行，欲将心力事长征。
重游黉舍几窗净，珍视青缃手泽存。
一代文章推祭酒，两京学术重师承。
百家此日争鸣盛，遥想精勤乐业成。

恩师离我们而去，已三十四年，而笔者愧对老师谆谆教诲恩泽，学无所成。但想到《明史考证》已成为全球学者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必读著作，而且必将永传后世，若云眉先师有灵，当含笑于九泉！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陈同燮先生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

解 玉 军

**摘 要**: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 20 世纪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陈同燮教授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重要建设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陈先生在山大、北大、厦大和北师大等多所名校共讲授过 10 门以上的世界史课程,这些课大多为国内首开。他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史学专门人才,同时做了许多资料建设工作。陈同燮先生还是我国最早独立开展希腊罗马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和若干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

**关键词**:陈同燮;世界史;希腊罗马史

陈同燮(1898-1970),河北省武清县(今天津市武清区)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创建人之一。

陈同燮先生 1923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31 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自 1923 年起,先后执教于南开中学、东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广州学海书院、广东勷勤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1951 年来山东大学任教,直至去世,是 20 世纪 50 年代山东大学著名的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陈先生的教学与科研涉及世界通史各段,尤精于古代希腊罗马史领域,遗著有《希腊罗马简史》,在《文史哲》上发表过《古代罗马奴隶社会概述》等 3 篇论文,另校对了阿庇安著《罗马史》、叶菲莫夫著《近代世界史》和迦尔金等著《近代世界史》等多种中文译著,其工作在当时大多具有开拓性质,为我国的希腊罗马史研究、世界史教学和资料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一、生平:"精英中的精英"

陈同燮先生在学生时代是南开校史上标志性的人物,也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作为教师,他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为我国培养出了很多有用人才和杰出学者,"是一位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的辛勤园丁"(王仲荦语)。作为学者,陈先生博学笃志,虽不重发表,却非平庸之辈,在民国时代,即属史学界"精英中的精英"之列;其在山大时期所现道德文章之风范,使得他的名字出现在每一种山大校史之中。

陈先生一生在山大所呆时间最长,近 20 年;其次是南开,作为学生和老师,共有 17 年。在南开,他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和周恩来是中学与大学同学;大学时代,他成为南开学生学习的楷模;执教南开中学,是英语教学名师。

1913 年陈先生考入南开中学童子部,1916 年 5 月又考入成人部。周恩来记录了这次招生情况:"今将成人部录取名次及各班所得分数挨次列下:三年二组周恩来,……一年二组陈同燮……。"[①] 在这次入学考试中,周恩来列第 1 名,陈同燮列第 11 名。1919 年,他参加了新成立的私立南开大学的

**作者简介**:解玉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周恩来:《〈校风〉第三十期〈纪事〉十则(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55 页。

招生考试，被录取为首批96名学生之一，再度与周恩来同窗（周两个月之后赴法）。

在南开中学和大学，陈先生积极参加了多种学生社团工作和勤工俭学活动，还热心公益事业，担任后勤工人夜校的教师。在大学时期，他课业成绩优异，一度成为南开号召全校学生学习的唯一典范。1921年9月28日出版的《南开周刊》登出一则校方消息，名为《勤学的奖金》，云："三年级同学陈同燮君颇素好学，朝夕不辍，上学年各科成绩均列甲等（90－100）。学校为奖励同学勤奋起见，特免陈君学费、宿费一学年，藉昭激励。"[①]种种事迹足见陈先生品学兼优的特点。

1923年6月，南开大学首批21名学生毕业，张伯苓和梁启超出席典礼，陈同燮获授文科学士学位。他因成绩优异，被张伯苓校长聘为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师。其学生齐思和后来也治世界史，因专业相同，他和陈先生的联系一直贯彻始终。晚年，陈先生收到齐思和的来信，其抬头称谓是"燮翁吾师"，陈自言感受是"比吃扒肘子还舒坦"[②]。

1930年，陈先生以自己的积蓄自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读书。1931年夏天，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受聘东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返回关内，不久被厦门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傅衣凌是陈先生此时的学生。

1932年，陈受颐出掌北大历史系。陈受颐是西洋史专家，履新后即增加西洋史课程的设置，师资需求亦多，陈同燮先生受邀由厦大北上就教职，1932－1935年短短三年，在北京大学"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③]。

1935年，陈先生被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解聘了教职。胡适在考虑来年人事聘用时，于1934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不续聘者：梁宗岱、Hewvi Frei、林损、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④]这次解聘所涉及的胡适与梁宗岱、林损的个人恩怨，学界虽多有钩沉，却莫衷一是，成了一桩公案。陈同燮被解职是出于何种原因？因陈先生性格内敛、低调，从未向人言说，亦未见与之相关材料的蛛丝马迹，故未得索隐。

1934年，陈济棠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次年，院长张东荪延揽陈先生和张君劢、缪钺、谭其骧等至此担任教授[⑤]。1936年，陈济棠下台，学海书院停办，陈先生转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执教。勷勤大学是广东省政府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字勷勤）于1934年创办的一所地方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广州受空袭，勷勤大学停办。此时西洋史专家何炳松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陈先生受邀于1937到1939年在此任教授。1939－1945年，他在沦陷区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这期间，张君劢1940年在大理成立民族文化学院，欲聘陈先生为西洋史教授，被婉拒[⑥]。

1945年，北平光复，此后至1951年，陈先生离开学术界，先后担任北京市自来水管理处副处长、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市自来水公司经理等职[⑦]。这是陈先生事业的低谷时期，他一度考虑远走他方。据齐思和先生长女齐文颖回忆，解放前夕，"陈同燮教授先后三次力邀齐先生同他一起到台湾，共同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系"，未能成行[⑧]。

据尚小明研究，在民国时期，大学普遍实行教授每年一聘的制度，虽然一名本科生一般需要4年

---

① 王文俊、梁吉生等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1页。

② 朱懋铎：《陈同燮》，孙长俊主编：《山大逸事》，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③ 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④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8页。

⑤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

⑥ 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一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年，第155页。

⑦ 北京市档案馆等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269页；王华棠主编：《天津——一个城市的崛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3、185页。

⑧ 齐文颖：《勤奋·创新·爱国——纪念先父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燕京学报》新26期，2009年5月。齐文颖先生原文说"清华大学历史系陈同燮教授先后三次力邀齐先生同他一起到台湾"，时陈不在清华教书，疑其记忆有误。

完成大学学业，但只有143名史学教授能够连续服务1所大学5年以上，不足史学教授人数的1/4。尚小明指出，“这些人的学识和在学术界的影响，是他们能够连续不断获得续聘合同的重要原因”，这部分人是“精英中的精英”①。这其中，陈同燮的名字赫然在列。

1951年，陈先生结束了自来水公司经理的职业生涯，受聘山东大学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初的山大历史系，世界史师资极端匮乏，真正的世界史专家仅黄绍湘一人，著名的中国史专家童书业和王仲荦分别讲授“古代东方史”和“世界中世纪史”课程，讲授“朝鲜史”的也是中国史专家卢振华。1951年7月，黄绍湘调任人民出版社编审，世界史缺少领军人物。在这个背景下，陈先生北大时期的门生、时任历史系主任的杨向奎知陈先生正在天津自来水公司谋生，遂诚邀他加盟山大历史系。陈先生9月来青岛履新，后来终老于山大。

陈先生前半生任职于中国南北多所大学，短则不足一年，多则六年，大抵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如此阅历，貌似风光，背后又包含着多少辛酸与无奈！这一切都随着他来到山大而发生了改变，他的学术地位在山东大学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陈先生成为世界史专业的带头人和绝对权威，1956年被评为三级教授；与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并称历史系“八大教授”，又称“八马同槽”。这些教授中，陈与黄年龄最大，同为1898年出生，赵俪生比他俩小19岁，已经不是同一代人了。另，陈于1931年即获教授职衔，远早于其他先生；况且杨向奎是受过陈先生亲炙的弟子。所以，在一些资料中，常见陈先生的排序位列八大教授之首。在山东大学20世纪50年代的辉煌中，文、史两系的诸位先生共同缔造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陈先生的名字由此得以载入史册。

对陈先生来山大之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与他共事二十年的王仲荦教授这样记述：“一九五一年，陈教授被调来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条件改善，工作安定，他精神焕发，工作的劲头更大了。”②由此可见，新的工作岗位为陈先生施展个人才能提供了用武之地，他的态度是非常满意的，工作也很积极。推而广之，其实这又何尝不是王仲荦先生自身心理的写照呢？40年代，王仲荦先生任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夏天，胡小石任中文系主任之后，解聘了王仲荦、朱东润、吴组缃和蒋礼鸿等多位教师，山大校长赵太侔闻讯，礼聘王先生来山大任教。近四十年后，王先生回忆说：“除组缃外，朱东润、蒋礼鸿和我，在当时水平来看，也不是坏教师，可是我们被解聘了，我到今天还是百思不得其解。”③也因为王先生对于山大怀有的这份知遇之恩，后来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任教，都被谢绝，他自己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黄云眉先生来山大之前，一度寄居上海亲戚的屋檐之下。童书业先生在1949年来山大历史系任教，对这一职位倍加看重，称“是为余任大学专职教授之始”；在山大声誉鹊起之后，1962年童先生自述：“国内知道童书业的名字，是党的栽培，万分感激，欠党的东西太多了。”④笔者没有详尽考察其时的山大文人的思想状态，但由这几位先生的想法可大致窥见一斑。

这里不由得引起“大学与大师”这个老话题。大学“乃有大师之谓”，当下流行的做法就是把其他地方的知名学者拉来，遂符合“有大师乃成大学”的定律。若以山大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来看，一方面，是大师造就大学；另一方面，大师不是天生的，是好的大学在包容和成就着大师。故，能够培养和造就大师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顶级大学如果是一个工厂，其使命就是“制造大师”。以上述几位先生的经历为例，山大在他们并不如意的时候接纳了他们，基于这份礼遇和恩德，几位教授自然也就对所供职的这所大学萌生出欲“涌泉相报”的感情。同时，民国时代的战乱和聘任制度，使得大部

① 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王仲荦：《序言》，陈同燮编著：《希腊罗马简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③ 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蜡华山馆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4页。

④ 王学典、李梅、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1、205页。

分大学教授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教席；而1949年大陆鼎革之后，战乱消弭，人事制度变化，让教师能够工作生活稳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一份读书人的从容和优雅，童先生感谢“党的栽培”之语应该是对执政党感激之情的自发流露。作为学者的陈同燮先生亦然。目前仅见的陈先生的三篇论文，都刊登在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上；陈先生唯一的一篇传记，也是由山大朱懋铎教授完成并发表在《文史哲》上；陈先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是在他去世12年之后，由当时的系主任王仲荦先生牵头整理出版的；朱懋铎另撰有一篇《陈同燮》的文章，也载于山大组织出版的《山大逸事》一书。对于陈先生晚年而言，是山东大学成就了他，所以他也以自己勤奋的工作回报着山东大学的知遇之恩。

王仲荦先生这样评价陈同燮先生的业务工作和道德风范：

> 对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他热心授业，循循善诱，现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治世界史的中年教师，大都是在他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陈教授在教学中，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业务，治学态度严谨、认真；他审阅青年教师讲稿，曾反复强调不准说一句缺乏史实根据的话。他领导我们系世界史教研室的工作，为教学、科研、教材和资料的建设，作出了一系列贡献。……
>
> 陈同燮教授作风正派，待人亲切、诚恳，生活朴素。它既能团结同志，又不见风使舵，能够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深受尊敬的长者。①

60年代，陈先生曾提出退休要求，由于他无可替代的作用，被系主任蒋捷夫回绝了。陈先生在山大世界史的廿载奠基，泽被后人，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与北大、南开和武汉大学成为第一批四所招收世界史本科生的高校。

像陈先生这样一位有留洋背景的学者，在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自然难逃“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的命运。在1958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贴出的题为“资产阶级教学害苦了我们”的大字报中，矛头主要对准的就是陈先生，罪名是“宣扬资产阶级观点”、“对教学严重不负责任”云云②。“文革”开始后，陈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仍然以“牛鬼蛇神”的身份被强制劳动改造，烈日之下，与冯沅君、张维华等先生一起从事拔草的体力劳动③。然而厄运还未结束。1968年，陈先生被关进“牛棚”，还患上了冠心病。1970年9月，山东大学迁至曲阜，陈先生以带病之身，被勒令一起前往。10月25日，陈先生心脏病发作，未及抢救，卒于曲阜。

陈先生生活极为简朴。在准备给他举行追悼会时，竟然找不到一张先生的照片。一直在陈同燮身边做助教的朱懋铎，以前曾经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具有绘画功底，他凭记忆绘了一张陈先生的遗像，这样才使追悼会得以顺利召开。张志宏教授回忆说，80年代他去北京看望陈师母时，发现其家中所挂仍是这张手绘遗像。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出版物和网络资料对陈先生的生平记述存在讹误。例如，一篇文章提到任继愈30年代在北大读书情况时，称“钱穆先生和陈香梅女士的父亲陈同燮也曾为他的老师”。陈先生的学生邹逸麟教授推测：“估计他原在北师大，调到山大心里是很不愿意的。”陈先生的另一位学生、历史学家唐致卿先生称：“我的老师陈同燮先生，在欧洲前后生活了十五年，精通四五种外语。”④其实，陈先生的女儿不是陈香梅；他来山大之前已离开北师大了，也很乐意来山大；陈先生只在美国生活过1年，精通英语和俄语，粗通法语。

---

① 王仲荦：《序言》，陈同燮编著：《希腊罗马简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② 史一：《资产阶级教学害苦了我们》，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历史科学两条路线的斗争（续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0－22页。

③ 赵捷：《回忆张维华先生》，《文史哲》1997年第3期。

④ 张亮：《北图新任馆长任继愈》，中国新闻社编：《社会名流见访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166页；邹逸麟：《“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司马玄德（唐致卿）：《谈读书》，发布于“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5875&cid=16

## 二、名师:世界史教学的先驱,门生满天下

陈先生是我国世界史教学的先驱,所授课程多为国内首开,他培养了遍布各地的大批人才。在世界史的教学资料建设方面,他校对了几部史学名著的中文译本,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是山东大学唯一一位精通英语而家里没有一本外语辞典的教授。

陈先生的教学工作具有个性鲜明、认真严格、内容广泛和注重外语的特点。这些特点见诸陈先生不同时期的学生的回忆录中,给学生们留下了诸多美好的印象,被传为佳话。他热爱教学事业,诲人不倦,把教书育人作为天职。朱懋铎记录了陈先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作为教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看到学生成才,学有所成。当每一位成为专家、学者的学生回来喊你一声'老师'时,那真是最高兴的事。"[①]陈先生教过的学生名单中有这样一些名字:南开时期的吴大猷和齐思和;厦大时期的傅衣凌;北大时期的王树民、全汉升、何兹全、杨向奎、邓广铭、孙思白和张政烺等;山大时期指导过的仅世界史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就有刘明翰、施治生、宋家珩、李永采、张志宏、朱懋铎、张左系、张建平……。所以,陈先生有理由为他的教书生涯感到自豪。

陈先生授课范围很广,除英语外,涉及自世界上古史到世界现代史的各时期,是中国顶级大学里为数不多的世界通史专家。在北大,至少开了"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百年史"、"英国史"、"欧洲殖民事业发展史"和"1815年以后的英帝国"等6门课程[②]。这些课程多为国内首设,同时也成为北大其他相关院系的必修课程。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改学苏联教育体系,世界史课程设置也随之一变,陈先生在国内属于最早讲授这一新课程体系的教授之一。山东大学档案馆所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课表显示,陈先生在山大至少开过"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英语"等5门本科生课程,有的课是合开的,有的是几门课同时上。如1959－1960学年第2学期,他为一年级学生上"世界上古史",每周授课3课时、辅导自习5课时;同时为二年级学生上"世界近代史",每周授课4课时、辅导自习6课时[③]。要知道这时他已年逾六旬,尚如此一心扑在平凡的教学工作上,"春蚕到死丝方尽",陈先生无愧于"是用毕生精力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这一评价[④]。

陈先生对待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认真编写讲义(50年代国内尚无世界通史教科书),业务娴熟,对讲义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都烂熟于心。在当时的山大历史系,他是童书业先生之外另一位上课不看讲义的老师。邹逸麟回忆道:"陈同燮先生操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声音浑厚,讲课一句连一句,没有一句废话,一字不漏记下来,就是一份很好的讲义。"[⑤]从30年代北大的学生何兹全,到五六十年代山大的龚继武和朱懋铎等人,都津津乐道陈先生上课的一个特点,即为方便学生记笔记,每讲完一段,他都会说:"另起一行。"[⑥]

陈先生不但授课认真,而且对学生要求严格。张建平是陈先生1961年招收的研究生,他回忆说,陈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从不轻易嘉许学生。南开中学毕业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杨肖彭回忆自己读书时的情况:

> 高中有两位英文教师最严、铁面无情……有一次陈老师发现不少同学对"compound"这个词读音时重音读错。当堂纠正多次,有的人习惯成自然,就是粗心不改,陈老师万般无奈,及时宣布实行:以后谁再读错这个字,罚站一课时,不准坐下。真有效!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错读

① 朱懋铎:《陈同燮》,孙长俊主编:《山大逸事》,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② 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③ 《山东大学上课时间表》(1959－1960学年第2学期),山东大学档案馆藏。

④ 朱懋铎:《陈同燮教授与世界古代史研究》,《文史哲》1986年第5期,封二。

⑤ 邹逸麟:《"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

⑥ 龚继武:《我的大学老师》,《宣城日报》2009年7月14日第3版;朱懋铎:《陈同燮》,孙长俊主编:《山大逸事》,第68页。

compound 了。[①]

一般印象中，陈先生授课给人以呆板的印象。其实不然，陈先生另有风趣、活泼的一面，而且有学生多年之后还去回忆或模仿，引为快事。齐思和先生的次女齐文心这样回忆："记得父亲曾经绘声绘色地讲述英语会话课上如何边背诵边表演，在严格又活泼的训练中打下坚实的外语基础。"[②]50 年代的学生张知寒，在三十多年之后仍然在维妙维肖地模仿陈先生的腔调："现在的世界和历史上的世界不同了。同学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放开眼界。过去的历史，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重大事件，没有一件是离开世界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了。"[③]这其中，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传输，更是眼界的开阔和境界的熏陶。陈先生是真正能够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教授，在青岛时期，他周末常约学生郊游，寓教于乐，出智力题目考学生，然后自己掏钱奖励优胜者。对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除业务指导外，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每发工资，就邀请青年人改善伙食，可谓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除课堂上课外，陈先生还热心在业余时间对学生的辅导和对社会各界人士讲解专业知识。傅衣凌先生回忆在厦大读书时，课余时间"请陈同燮等老师给我们作报告"[④]。1956 年，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陈先生向青岛市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及各界群众四百多人，作了题为《关于埃及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介绍了埃及自古以来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和埃及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历史[⑤]，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陈先生对青年人持积极扶持的态度，热情为青年学者的成长创造条件。学习世界史，必要的外语修养是基本条件。他一直狠抓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外语学习，直到晚年，还每周拿出固定时间辅导外语。1960 年，施治生成为陈先生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方向为世界上古史。陈先生因自己拉丁语不精，就派施治生去东北师范大学随郭守田教授学习拉丁文。施治生也不负所望，成长为我国著名的西方古典学家，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法定代表人。

1964 年，商务印书馆致函陈先生，就"世界史知识丛书"的选题和作者人选事宜征求意见。陈先生回函：

> 选题可以陆续增加，有些已选定的题目，我建议可以修改一下。……
>
> 我推荐张建平同志写第十八选题"早期基督教的产生及其发展"。张建平是我们山大历史系毕业生，后考入研究生班……写这个题目自有轻车熟路之便，不会费太多的时间。张建平同志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都不错，文笔也通畅。我认为他有资格担任这项写作。[⑥]

今年 4 月，笔者给张建平先生展示了这份手迹，他看到其师对他这样高度的评价，实感意外，也大为伤感，此时距陈先生去世已四十余年了。

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是翻译外国史学著作，这种资料建设工作是国外学术资源中国本土化的一种积累。对译著的校译工作对校译者往往在外语、汉语、专业知识和综合知识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很能体现译校者的业务水准。而校译者常常默默无闻，被淹没在学术史之中，有些学者视之为"丈夫不为"之事。陈先生英语造诣很高，熟悉外国学术观点和资料，他在 50 年代校对了

---

① 杨肖彭：《创、省、严、恒》，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学习和教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196 页。

② 齐文心：《先父齐思和生平和著述简述》，《农业考古》2000 年第 3 期。

③ 焦世瑜：《历史·墨子·张知寒》，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年，第 241 页。

④ 傅衣凌：《傅衣凌自传》，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年，第 280 页。

⑤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政协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年，第 95 - 96 页。

⑥ 陈同燮：《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函》(1964 年 3 月 25 日)，手稿。

苏联人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和迦尔金等著《近代世界史》、60年代校对了阿庇安著《罗马史》等多种中文译著，更多的资料建设成果没有发表，而是体现在日常教学之中了。

1954年，陈先生在《文史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对三种近代世界史译本的校误与意见》和《对〈近代世界史〉下册和〈现代世界史〉的校误与意见》两篇文章[①]。当时大学世界近代史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是苏联人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国内有开明书店出版的王易今译本、中华书局田光译本和人民出版社陈山译本三个版本，陈先生把这三个版本和原文对照之后，比较优劣，写出第一篇文章，指出不同译本的优缺点。第二篇文章是针对苏联人迦尔金等著《近代世界史》两个译本校对而成，一是中华书局的石溟译本，二是海燕书店的朱庆永译本。陈先生艺高人胆大，直言这些译本都有若干"不妥当"、"混乱"的地方，可以说，陈先生的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广博的学识素养在这两篇文章中得到了恰当的体现，作过世界史研究的读者一看便知。

这两篇校译文章内容包括近代英、法、德、俄、意、美、日、奥、荷诸多国家，在领域上涉及历史、地理、经济、社会、自然科学和马恩著作等方面的知识，陈先生还从技术上校对了习惯用语、数字、标点符号、近义词、俄文大小写、日语汉字的翻译，精妙之至，只有点出这些细微的区别，读者才能领悟。兹举一些例子说明（硬伤、标点和数字方面不列），知识方面的有：手工作坊与工场手工业、保守党与托利党、工厂与行会、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荷兰与尼德兰、委托书与陈情书、启蒙与开明、里昂与里尔、电话线与电报线、奴隶与雇农、大公与王位、德奥与奥匈、执政官与总裁、名誉书记与通讯书记等；语言方面的有：增加与增加到、出席与列席、牵制与吸引、漩涡与循环、前两天与两天之后、十五世纪与一千五百年前、承认与考虑、顺利与良好、没落与崩溃、日语的萨摩与萨阀、下关与马关、大名与大明等。今天具备一定世界史基础的读者能体会到这其中的差别。

在第一篇文章中，陈先生直言，王译本不宜再用作学生学习的参考书，陈山译本最好。陈先生还提出了几条直到今天有关人员和部门仍然应该遵守的翻译原则：一是"既已通用且正确的译名，不必再代之以新的字样，以免造成混乱印象"；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者最好查一下好的中译本，注上中译本的书页，而无需另译；三，主管部门要及时注意主要译名的统一工作，以免混乱。1954年第6期《文史哲》杂志"编者的话"指出，陈先生的校误工作"对于教授世界近代史的先生们会有帮助"。

60年代初，陈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校对了谢德风所译《罗马史》一书的草稿，他对书稿字斟句酌，不厌其烦地修改，历时一年有余。据他的研究生张建平、本科生唐致卿回忆，几乎每日要帮助先生誊抄稿子、跑图书馆借阅资料核对。后来，谢德风教授在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的《罗马史》中译本《译者序》中特别致谢："山东大学陈同燮教授为我校阅全部译文，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意见。均此表示衷心的感激。"1988年商务印书馆决定重印200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该书被选入。

## 三、研究：若干史学领域的开拓者

陈同燮先生留下的著述不多，给人一种"述而不作"的印象。1949年之前他没有著述发表，目前所见陈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只有50年代的《古代罗马奴隶社会概述》和前面所述两篇译校文章，都刊登在《文史哲》杂志上；其唯一的一部著作《希腊罗马简史》，是在他逝世之后，王仲荦先生派人由陈先生50年代的讲义编纂而成的。然而，笔者检索山东大学档案馆所存陈先生的资料后认为，更准确地说，他算是一位"作而不发"的学者。陈先生在五六十年代笔耕不辍，研究范围广泛，除主攻希腊罗马史之外，研究内容还涉及世界通史各段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围绕陈先生的研究工作谈三个问题：一是他作过什么研究；二是作而不发的原因；三是其科研工作的学术水平和地位。

---

① 陈同燮等：《对三种近代世界史译本的校误与意见》，《文史哲》1954年第5期；《对〈近代世界史〉下册和〈现代世界史〉的校误与意见》，《文史哲》1954年第6期。这两篇文章都注明是由李威周执笔，李其时随陈先生做助教。

由于山东大学由青岛搬至济南、由济南迁曲阜及再次返济的周折，其科研档案所存不全，这里仅以所存留部分来考察陈先生科研工作片断。1956 年，陈先生的研究一是“古代罗马史”，目的是“研究古代典型的奴隶社会具体状况并说明罗马奴隶制盛衰兴亡的经过和原因”。二是“世界现代史大事记”，目的是“大学教学参考”①。1957 年，工作有三项，一是撰写《古代希腊史纲要》，目的是“供中学教师和大学学生参考”，备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约”。二是“世界现代史讲义”，目的为“结合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三是“论 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与“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问题”，目的是“研究当前国际问题”②。这里，我们注意到，他的科研不仅仅是停留在计划层面上的，而是付诸行动，甚至已与出版社签约。

1961 年，陈先生的工作是写纪念巴黎公社 90 周年的文章——“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研究目的是“结合纪念活动，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且“提交科学讨论会”。该年的另一工作是撰写“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内容是“研究近代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研究根据是：“目前国内尚无完整系统的教材，应教材建设的需要；为研究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读者编写历史教科书。”陈先生在 1962－1963 年的科研项目是“总结历史教训、破除和平长入幻想”、“古代罗马奴隶法”和“古罗马史”③。据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1960 年第 1 期的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带动各项工作全面大跃进》一文称，陈先生还写过《毛泽东思想对研究世界史的指导意义》这样的应景文章。

概括起来，陈先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希腊罗马史方面的基础研究；二是具有时效性的国际问题研究，如巴黎公社纪念文章、苏伊士运河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三是世界通史的教材编纂与资料积累工作，例如世界现代史讲义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研究。今天这些方面的著述与编纂积累固然已经蔚为可观，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陈先生的这些工作在选题方面都具有前沿性和开拓性。

至于陈先生发表著作不多的原因，要置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去看待。又据尚小明的研究，近代中国大学外国史的知名教授，大多一生没有留下论著；有论著的一般是兼治中国史的教授④。他把陈先生列入少数纯治外国史的教授之列。可以说陈先生是他那个时代世界史专家常态性的代表人物，像周谷城具有“教书就要著书、不著书就不要教书”想法的西洋史学者是另类人物。1949 年之前，国内西洋史学者的著作较罕见，且基本为编译而成。20 年代，何炳松编译的《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被称为“研究西洋史的唯一善本”，陈衡哲在给《中古欧洲史》写的序言里说：“国中为历史而研究西洋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加上这一类少数的学者又大都执教鞭于国内各大学，甚少闭门著书的机会，而西洋历史的材料在国内更不易得，此犹足增加著书的困难和失望。”⑤这种编译西洋史的状况到三四十年代也无根本的改变。1936 年，雷海宗说：“我们决无能力对西洋史有研究的贡献，所以各种繁琐的课程可以一概不开，只求叫学生对西洋史能得一个整个儿比较充分的了解，已非容易，也就很够我们努力的了。”⑥1941 年，齐思和就国人的西洋史研究水平感慨道：“实际则微论伟大创获发现足使西人推挹咏叹，如伯希和、高本汉、白鸟库吉、新城新藏等外儒之如汉学，尚未出现，即求一不厘不陋，足供国人参考之著亦渺不可得。”⑦自此七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世界史学无疑取

① 《山东大学 1956 年科学研究计划》，山东大学档案馆藏，编号 1－KYZH01－1。

② 《山东大学 1957 年科学研究计划》，山东大学档案馆藏，编号 1－KYZH01－1。

③ 《山东大学 1961 年科学研究计划》，山东大学档案馆藏，编号 KYZH016。

④ 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⑤ 陈衡哲：《序》，第 1－2 页，何炳松编译：《中古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年；转引自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第 138 页。

⑥ 雷海宗：《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独立评论》第 224 号，1936 年 10 月 25 日。

⑦ 齐思和：《西洋史教学之基本问题》，北京：函雅堂书店，1941 年，转引自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73 页。

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否出现了像伯希和之于汉学那样的"创获发现足使西人推挹咏叹"的大儒,笔者陋钝,不敢妄言。

陈先生发表的论著达到了什么水平呢?这个问题需要置于当时的学术背景和整个学术史两个方面来看待。《古代罗马奴隶社会概述》是一篇3万余字的长文,连载于《文史哲》1956年第11期和第12期,应是我国学者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罗马奴隶制的专题性论文,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篇高水平的研究文章。《希腊罗马简史》一书本是50年代初的讲义,当时被国家教育部指定为交流教材,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期我国学者在希腊罗马史领域所达到的水准,其见解和资料今天大都不过时,另具有方法论和史学史的价值。

《古代罗马奴隶社会概述》是在50年代古史分期讨论的学术背景之下完成和发表的,刊登的杂志也是古史分期论战的主要阵地——《文史哲》。陈先生以治外国史学者的身份,没有正面参加古史分期的论争,但其发表的时间暗合古史分期讨论走入死胡同的时机。《文史哲》1956年第8期"发刊词"云:"书上的简单记载加上我们一些教条主义倾向,越发把简单的记载简单化了。于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变成干巴巴的公式与结论。这样打算解决古史问题,岂不是缘木求鱼!"[①]如果说古史分期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有真伪命题之争的话,那么,罗马奴隶社会则是一确定无疑的事实存在。

陈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罗马奴隶制的形成、发展、瓦解和封建制的萌芽问题作了全面的考察,系统地论述了罗马奴隶制的兴衰过程及原因,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堪称一篇雄文。该文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小农制和商品经济、阶级矛盾与调和等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为指导,论述了奴隶制内在矛盾的发展是古典社会灭亡的内因,蛮族入侵是外因,文章的最后部分指出隶农制是罗马社会封建制发展的因素。在文章各组成部分的处理上,陈先生对罗马奴隶的来源、奴隶的用途、奴隶制发展的影响和奴隶制的瓦解等具体问题,都分几个方面进一步论述,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文章的一个特色是语言简练,风格独特,打上了陈氏语言风格的烙印。

由于语言和材料的限制,该文使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来自著作,而非一手材料。但对于一些重要的史实,作者也作了考辨、比较或存疑处理。例如,在全盛时期罗马奴隶人数问题上,给出了德国史学家贝洛克、加斯特和法国学者马加特的三种不同说法[②]。

在国内论述罗马奴隶制这一问题的学术史上,该文仍然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陈先生关于罗马奴隶的来源、奴隶的用途、奴隶制发展的影响和奴隶制的瓦解这样一个逻辑体系的处理方法,被后来的大多数世界史教科书和罗马史著作所沿袭。陈先生的研究生张左系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古代罗马的奴隶制度》一书,商务印书馆作为"外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种于1965年出版,1979年再版。在目前流行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教科书中,古代罗马部分的作者正是陈先生的入室弟子施治生,他发扬光大了其师的学问。

陈先生的《希腊罗马简史》成书时间不确切,据王仲荦先生和朱懋铎回忆,是在50年代初;书稿整理者之一李道铭是53级的学生,一般历史系在大一开世界上古史课程,也应为53年使用该讲义;再者,如果把此书罗马奴隶制部分的内容与上面所说陈先生1956年发表的文章作一比较,也会发现书的内容不算成熟。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上判断该书成书于50年代前期。王仲荦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还指出,该书"没有补充新资料和作内容的修订",所以保持了原貌。

首先看这部讲义写成的学术背景。1962年,我国才有了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教科书;此前,约与陈同燮先生同时,吴于廑先生也从1954年起着手撰写《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一书。陈、吴二位先生的工作应为我国学者独立撰写希腊罗马史著作的开始。

这本书的优点大致有这样几点:一是在写作方法上,系统性强,语言简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① 《文史哲》编辑部:《开展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文史哲》1956年第8期。

② 陈同燮:《古代罗马奴隶社会概述》,《文史哲》1956年第11期。

不足18万字的作品概述了希腊罗马两大古典文明的全貌，同时对于希腊的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雅典的民主制和奴隶制、希波战争、罗马的扩张和罗马奴隶制这样一些重要内容着墨较多。二是在史识方面，作者以世界史的眼光看待地区国别史，以通史的视角对待断代史。如作者结合古代埃及历史的变化考察爱琴文化的盛衰，以与中国、西亚、印度对照的方式编排罗马的编年史，以对后世影响的立场看待古典文化等等。三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见解和结论上，陈先生的一些匠心独具的观点至今还在闪耀着智者的光辉，例如他对希波战争波斯失败原因的分析、对罗马共和制灭亡的阐释，再如他的这个观点之精妙："希腊各城邦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希腊人亦没有政治统一的观念，但在宗教上希腊人是统一的，宗教思想维系着他们的精神。"[①]短短数语，是对希腊政治和文化异同的高度概括。

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时代造成的资料的局限以及由此引起的观点偏差。例如，关于克里特文化，陈先生提到，克里特岛发现的线性文字A和B，"至今还未释读成功"[②]；克里特文化初期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其实，线文B已经在1953年成功释读，只是当时信息闭塞，相关的资料和成果还没有传入我国。

在高水平学术研究中，这部著作今天仍然被作为参考资料的来源和学术对话的前提。例如，《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发表的顾銮斋教授《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发表的宴绍祥教授《雅典首席将军考辨》等文章都引用了陈先生《希腊罗马简史》的资料或观点。至于一般论文和其他学科的著述，对此书的引用就更多了。

如何看待陈同燮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理事长王敦书先生在定位林志纯（日知）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奠基人之前，还指出："老一代知名的世界史学者，如周谷城、雷海宗、齐思和、陈同燮、吴于廑、郭圣铭、胡钟达、李雅舒等，都为在中国创建世界古代史学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③]结合本文所列陈先生的教学、校译和研究成就，我们可以说，陈同燮先生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属于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先驱之列。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路遥先生、王敦书先生、李廷朝先生、张建平先生、张志宏教授、关绍纪教授、顾銮斋教授和陈德正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刘京希]**

① 陈同燮：《希腊罗马简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② 陈同燮：《希腊罗马简史》，第6页。

③ 王敦书：《林志纯和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 全球化与民族性:郑鹤声史学精神探析

陈 尚 胜

**摘 要**:郑鹤声先生的史学论著向以史料充分而见长,同时还表现出超前的全球化视野和浓郁的民族情怀。以 16 世纪为近代史开端的《中国近世史》,从国际贸易、外币流入与金融安全、外来宗教传播与内政安全、西学传入与科学民主思想传播等层面阐述了全球化对于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之影响;他坚信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所肩负的重要责任,故明清时期对外关系史、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以及清朝边疆民族史,也构成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关键词**:史料派;《中国近世史》;《中国文献学概要》;郑和;洪秀全

在 20 世纪 50－80 年代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先师郑鹤声(1901－1989)曾被学人视为史料派的代表[①]。这或许是由于在他的史学论著中,皆以史料充分而见长。他不仅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曾编集过《黄河志文献编》(与王维屏合编)、《东华录类编》(郑先生为主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与郑一钧合编,上中下三册,济南:齐鲁书社,1980 年,1983 年,1989 年)等资料书,而且,他还著有《中国史部目录学》和《中国文献学概要》[②],强调资料文献搜集的方法。甚至,他本人也曾公开声称:"不要怕当史料派。"[③]不过,如果仔细地考察他的史学研究,尤其是考察他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研究论著,我们还会发现,他的史学研究不仅极其重视史料,而且具有超前的全球化视野和浓郁的民族情怀。

## 一、郑鹤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全球化视野

1944 年南方印书馆刊印的先师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一时洛阳纸贵,也奠定了此后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所谓"中国近世史",根据他在"自序"中所言,即为英文 Modern Times,是指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间的历史[④]。由英文可见,他所著的《中国近世史》,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近代史"[⑤]。先师为何要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为明后期的欧洲人东来?在他看来,"我国坊间出版之中国近世史,率以鸦片战争为开始,则为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不探其源,则其源不明"[⑥]。

---

**作者简介**:陈尚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参见蒋海升:《从主流到边缘: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史料考订派》,《山东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

② 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初版;《中国文献学概要》则是先师与其兄郑鹤春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初版。

③ 参见郑一钧:《郑鹤声》,载于梁自洁主编:《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13 页。

④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册)"序言","民国丛书"第四编 75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年,第 1－2 页。

⑤ 先师将中国历史的较近时段称之为"近世",可能受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1870－1931)之影响。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就曾把东洋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期为汉族增势时代,中古期为汉族盛势时代,近古期为蒙古族最盛时代,近世期为欧人东渐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东洋史要》由樊炳清翻译成中文,并由王国维作序于 1899 年在东文学社出版,是我国近代翻译日本史学家的第一种史书,在 20 世纪初影响甚大。

⑥ 《郑鹤声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 2 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10 页。

就是说，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虽然看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造成了极大影响，但这只不过是16世纪西势东侵历史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他认为，“自汉以前，吾国史迹，尚在河域，其活动范围，不出国内，故可谓之纯粹的中国史。两汉以后，民族发展，普及亚洲，印度文化，因之输入，西亚文化，亦兼有之，仍然不出亚洲之范围，故可谓之亚洲的中国史。明季以还，海航大通，欧风美雨，骤然东渐，国际问题，因而丛生，所有活动，几无不与世界潮流发生影响者。故可谓之世界的中国史”，“故中国近世史之开端，当自新航路之发现始”①。

何谓“世界的中国史”？笔者以为先师实指受“全球化”(globalization)所影响的中国历史。尽管“全球化”理论只是出现于20世纪后期(60年代以后)②，先师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中国近世史》时尚未有这种理论，但作为“全球化”的意识或视野却存在于早先学者的思想和论著中，譬如在马克思的一些论著中，就阐述了新航路开辟后，各国家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世界性关联③。先师在此书中所强调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世界的中国史”，已经从时空维度上感悟到“全球化”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之影响。

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先师特别强调“新航路开通”后给中国历史带来重大变化的起始标杆。他在1934年初编就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就已把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人剌匪尔别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附帆来华，视为近世史之肇端，并将正德十一年作为所编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首个年份④。在他看来，“史日之应用，以近代为宏，中外各国，莫不皆然。我国自明季以还，海航大通，欧美文明，骤然东来，国际问题，因之丛生，所有活动，几无不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者。中西史日之对照，较之上古中古，其用更繁。此本书之所以以近世为限断者也”⑤。在《中国近世史》的“自序”中，他认为学界有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是“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不探其源，则其源不明”⑥。在他看来，只有把明清之际西势东渐的历史与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统合起来，才能完整地观察中国近代史之“大变象”。

其次，从空间维度上看，先师在《中国近世史》书中已初步勾勒出“全球化”浪潮对于近世中西贸易和华人移民海外谋生问题的作用。他的《中国近世史》首章题为“中西殖民通商事业之发轫”，章内分设“世界新航路之发现”、“近世中西国际贸易之开始”、“明清间华侨之海外殖民事业”三节。除第一节叙述新航路发现这一“全球化”的缘起外，在第二节中，先师分别叙述了葡萄牙人于明朝正德年间来广东沿海贸易以及对市舶司税制的影响，嘉靖中期在漳州月港、浯屿的活动对于闽南沿海走私贸易的刺激作用；而清朝前期广东的行商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亦系应对西人来华贸易所致⑦。在第三节中，他在书中叙述，“当明清两朝五六百年间，欧人之势力，日益东侵，而我华人与之竞争，在南洋开辟土地，经营商业者，前起后继，指不胜屈，其时华侨移殖，遍于南洋”⑧。在他看来，华人大规模移

---

①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序言”，“民国丛书”第四编第75册，第4－5页。

② 全球化理论始于20世纪后期，其主要理论流派有：六七十年代有P·索罗金的全球趋同论，R·阿隆的国际社会论，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I·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七八十年代又出现了A·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论，J·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论；90年代又有A·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R·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和L·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

③ 譬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

④ 按：“剌匪尔别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现在通常译为“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实为服务于葡萄牙国王的意大利人。可参见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第41页。

⑤ 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重印本，第3－4页。

⑥ 《郑鹤声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2卷，第10页。

⑦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民国丛书”第四编第75册，第27－32页。

⑧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民国丛书”第四编第75册，第35页。

殖东南亚地区，是与东来的西方人相竞争。应当说，这种与西方人竞争之说，并非正确[①]。明代后期及清代华人大量下南洋，实为西方人主导的东南亚殖民体系吸引之结果。一方面，西方人在东南亚殖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西方人所主导的东南亚港埠商业体系，也需要深入乡野村间的小商小贩支撑。而闽粤沿海地区地狭人多以及与南洋的隔海为邻，也是华人大量下南洋的重要推力。当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西商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竞争。因此，先师所持的"与西方人竞争说"也反映出"全球化"浪潮之影响。

再次，他在《中国近世史》"自序"中讨论中国近世史之特有现象时，专门提到了16世纪以后中国所出现的外币流入与金融、外来宗教传播与内政安全、西学传入与科学民主思想之孕育等问题。今天看来，这恰恰是"全球化"过程给中国所带来的新问题、新变化。

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和世界市场的作用，以丝绸、陶瓷、茶叶为主的中国产品，由于物美价廉，在海外具有广泛的需求，从而使16世纪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由于明朝钞法不行，白银开始取代宝钞成为大额交易媒介，但国内银产不足不敷所需。于是，拉丁美洲所产白银通过西班牙人大帆船和华商出入马尼拉的世界贸易体系，大量流入中国，也使得明朝货币经济越来越依赖美洲白银。在一些西方史学家看来，明朝的灭亡与1639－1644年间美洲白银的供给突然减少也有一定的关联[②]。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尚待实证，但外币流入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却是明显的。先师早已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近世史》"自序"中写道："足以操纵吾国之金融界而使社会经济无形中受困苦者，一曰外币之流入，二曰币制之差异，三曰在华外国银行之垄断是也。清代海通以后，国际贸易，甚为发达，于是西班牙之银元（本洋），逐渐输入，吾国人以其形式一律，重量一定，乐于使用，流入极多，几遍东南各省，且多有以生银七八钱换此七钱二分之钱元者。而其后鹰洋（即墨西哥洋）流通之力尤巨，通商各埠，无不通行。我国货币，因此受一重大打击。道光初年，银元蔓延各地，为法禁止，漏巵甚大。粤督林则徐张之洞并先后奏请自行鼓铸银元，以资抵制。"晚清"外商银行，实为各国对华利权竞争及经济侵略之辅助机关，有各国政府之背景，凡对华关于经济上之事实，多由是种银行承受包办，在吾国财政上、金融上、商业上，无不具有特殊势力。自清末以来，外商银行相继在吾国设立者甚多，其势力之大，虽其时金融主脑之钱庄，亦难与之抗衡"[③]。在他看来，我国开始面临外币流入与金融安全问题，始自16世纪海航大通以后。

近世欧洲基督教在华之传播及其影响，亦被先师视为中国近世史上之"大变象"。他在该书中写道："自利玛窦来华传教，既以其学见重士林，又得明帝之优遇，从其教者渐众。迄明季世，基督教徒达数千人。清初沿明之旧，西教士多以历算见重于朝，而传教之业，缘此渐盛，迄康熙初年奉教者已达数万人。"但随着基督教在明清社会的传播，清朝统治者对宗教的管理，不仅仅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且开始演变为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中西关系问题。这是近世基督教与中古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重大差异。先师指出："开港（按：此指五口通商——引者）以后，以细故而酿成大衅，致国家损失威严权利者，不可胜数；而洪杨太平之役，以基督教为号召，复发生庚子之役，于国内治安与国际交涉，俱视为重大问题焉。"[④]

与此相联系者，则是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入，"明季自利玛窦来华传教，颇以科学上之知识与方

---

① 清朝人徐继畬在《瀛环志略》卷二《南洋各岛》中记载："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迨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于是诸岛之物产，充溢中华。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来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则南洋者亦七闽、珠崖之余壤，而欧罗巴之东道主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8页）由此可见，由于西方人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吸引了大量中国沿海民众前往东南亚谋生。显然，明清时期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并不是为了与西方人展开竞争，而是依附于这一新的经济体系。先师在此所持华人在东南亚殖民之说，可能受其大学同窗之影响，其同学束世澂与刘继宣合著之《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美］牟复礼、［英］夏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82－683页。

③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民国丛书"第四编第75册，第14页。

④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民国丛书"第四编第75册，第17页。

法,釐正中国天文历象财数地理之旧说,风气所召,廷臣如徐光启李之藻辈,皆从之学天文数学测绘之术,并及火器之制造",而"清季变法,推究西人富强之本,始知科学之重要",科学因此而兴,"及其季世,国势陵夷,世患日亟,专制淫威,因以大戢,言论思想,稍以自由,适其时西洋倡导民治之著作,如卢梭《民约论》等,趁译渐多,传诵浸广,于是故国之思,与民治之思想相会合,革命潮流,自兹萌芽"①。

从上述数端可见,先师之所以强调新航路开通后葡萄牙人来华作为中国近世史开端,他认为西方列强对于晚清社会的影响只是延续和强化明清之际西势东侵的历史进程而已。也就是说,他对于中国近代史起点问题的思考,更关注于"航海大通"后西势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完整进程。而这个进程,恰恰是"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先师的《中国近世史》体系,表现了一定的甚至在当时是超前的"全球化"视野。

1947 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就坊间十余种中国近代史著作作出如下评论:"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的变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历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在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之下,所产生的近代史著述很多,如陈怀、高博彦、吴贯因、魏野畴、邢鹏举、罗元焜、梁园东、沈味之诸先生的著述,各有长处。其最完善的为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顾颉刚先生之所以断定先师所著《中国近世史》为最完善之著作,是他认为该书"体大思精,甚为赅备"②。或许,《中国近世史》书中所表现出的"全球化"视野与明末至清代历史的整体观也是顾颉刚先生所说的"体大思精"之因素。

## 二、郑鹤声的史学研究与民族情怀

先师在《中国近世史》的"序论"中,还把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视为近世中国与远古、中古中国的的重大区别之一。先师在书中指出,中国民族最为繁杂,历经千年满蒙回藏诸族皆受汉族之影响,并在清代融合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得如今日,固融合于此二百年中"③。也就是说,他认为作为现代"中华"标记的民族国家,实乃真正形成于有清一代。

正是带着这种中华民族的一体观,先师于历史研究中一直倡导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并认为历史教学也应肩负起国家兴亡之责任。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国家危败,也由于"国人民族意识消失殆尽。其消失原因虽多,而历史教学之未能尽其功用,实为根本上之原因。所以历史教育应"为发扬民族精神之宣传,而不为颓丧民族精神之刺激"④。1935 年,他发表《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一文,不久就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在这本册子中,他开门见山地论及历史教学之功用:历史教学对于"民族国家之兴亡,盖非浅鲜";"故以复兴民族为目的者,每以历史教学为利器"⑤,"历史教学之目的虽有多

①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民国丛书"第四编第 75 册,第 19 - 21 页。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第 83 页。除了顾先生在文中所说的著述中国近代史的十位学者外,尚有徐澄《中国近百年史》(1930)、陈训慈《中国近世史》(1931)、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1931)、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32)、李鼎声《中国近代史》(1933)、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5)等。

③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民国丛书"第四编第 75 册,第 7 - 9 页。

④ 郑鹤声:《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挥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 1 卷第 4 期,1935 年。

⑤ 郑鹤声:《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上海:正中书局,1935 年,第 1、2 页。

端，而发扬其民族之精神，以激励其团结之情绪，坚定其自信之能力，藉以引起其爱国爱种之观念，以为复兴民族之基础，则诚我国目下国难期间应有之努力"①。

在历史教学中讲究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就必然涉及到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与民族之间战争。1935年，先师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与民族之间战争，应视为中华民族内部的纠纷，如同当时的直皖之战、奉直之争。所以，他在1935－1943年间，非常重视对中华民族之间融合问题的研究，相继发表了《中华民族精神之检讨》②、《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势》等论文③。在前文中，他认为忠义勇敢卫国御侮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而后文则针对当时一些人所持的狭隘民族立场，具体地阐述了有清三百年来汉满蒙回藏等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学术主张。

先师认为，要确立中华民族意识，还必须重视边疆历史研究和边疆历史教育。否则，边疆观念不能养成，也不足以抵御外侮。他担心当时人还受古代"蛮夷戎狄"等狭隘汉民族意识的影响，以影响民族团结大局。一旦外敌挑拨离间，民族之间即生裂痕，而边防渐失。有鉴于此，先师认为，"在今日非常时期的教育之下，历史教育的使命，既深且重，而对于边疆的教材，更其不可忽略；而这种边疆的教材，在历史中最主要的，应注意下列三点：(一)边疆的形势与领土的损失和经过；(二)边疆人民生活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的情形；(三)边疆之应如何开殖与发展"④。他本人还写过《前清康乾时代之理藩政策》和《清代对西南种族的扶绥》两篇论文⑤，讨论清朝盛时的民族政策及其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具体措施，强调民族政策对边疆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先师在前文中所说的"非常时期"，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并继续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中华民族危亡之时。其先，先师因1928年发生"五三惨案"，即于当年发表《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的文章⑥，将明朝围绕倭寇侵扰中国的对日交涉经过公示于社会大众，以其远见卓识提醒人们重视日本对华动向问题。1929年，他又发表《江心坡与国防》一文⑦，就1926－1927年间英国入侵并占领的江心坡(指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以西的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合流处之间以北的地带，明清王朝时期属于云南土司管辖，后遭占领缅甸的英国殖民者不断入侵，今已划属缅甸)问题，提出领土依据和西南国防建设事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发表有《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一文⑧，指出历史教学对于培育国民国防观念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先师又开始投入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此前，先师有感于《明实录》中对于郑和下西洋之记载的一些遗漏和外国学者已有诸多研究但仍有诸多疑点的状况⑨，遂开始调查和搜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终在明朝嘉靖年间人钱谷所编的《吴都文粹续集》中发现收录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接着又在南京静海寺找到记有郑和下西洋的残碑，并从友人处得到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碑文和郑和家世等资料。于是，他开始将文献资料与碑刻等资料结合起来进行郑和下西洋研究，并于1945年初出版《郑和》专著。该书共分六章，分别阐述郑和之生

① 郑鹤声：《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上海：正中书局，1935年，第22页。

② 郑鹤声：《中华民族精神之检讨》，《中国新论》第1卷第3期，1935年。

③ 郑鹤声：《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势》，《边政公论》第3卷第3期，1943年。

④ 郑鹤声：《中学历史教学法》第四章第二节《历史教材的选择问题》，上海：正中书局，1936年。何成刚与李杰对于先师有关历史教学的思想，已有研究。可参看何、李两人合著：《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第7期。

⑤ 郑鹤声：《前清康乾时代之理藩政策》、《清代对西南种族的抚绥》，分别载于《边政公论》第2卷第3、4期，1943年；《边政公论》第2卷第6、7、8期，1943年。

⑥ 郑鹤声：《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东方杂志》第25卷第13号，1928年。

⑦ 郑鹤声：《江心坡与国防》，《史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29年。

⑧ 郑鹤声：《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教与学》第1卷第7期，1938年。

⑨ 可参见拙文：《郑鹤声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文史哲》1996年第3期。

平、下西洋之因果、使团之组织、航行之概况、出使之经过、诸国之风俗。书中对众说纷纭的郑和下西洋之具体时间和次数,进行了翔实的考证,此后遂成为学界之定论。而该书写作之目的,除了学术因素外,现实因素则是"为激励国民,抗日救亡,以历史上伟人之功业,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从中得到力量"①。

先师在1926－1929年任教于云南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并入东陆大学)和东陆大学(1934年改称云南大学)时,讲授"亚洲史"和"中国史学史"两门课程②,目睹印度早期历史典籍之缺乏,亦深感中国优秀文化赖以传承,而史学家功不可没,遂继续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其先,他的大学(先师于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南高并入东南大学,1924年从东南大学毕业)毕业论文,就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洋洋十余万言探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并从史官、史家、史学成立与史学发展诸方面阐释了从汉代到隋代中国历史学具体发展状况。该文初由《学衡》杂志发表③,不久就由中华书局以单行本出版④。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专门为他安排"郑氏史学丛书",以便系统地推出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在1929年至1932年间,他所撰著的《班固年谱》、《袁枢年谱》、《司马迁年谱》、《杜佑年谱》依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尚著有《荀悦年谱》、《刘知几年谱》、《司马光年谱》、《徐光启年谱》四种,商务印书馆也已付排,但在1932年1月29日凌晨俱毁于日寇战机所投炸弹。他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⑤,认为"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史记》出而"史学因之转变方向";而在中国史书的诸种体例中,"正史"因其最为重要也最值研究,遂撰著《史汉研究》⑥。此书为对两部经典史籍《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内分体例组织、源流、制作与增删、叙事等项,对两书详加比较和分析。现有学者认为,先师的这些论述,都给后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很大启发⑦。

先师与其长兄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亦被后人视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⑧。该书分章阐述了结集(古籍分类和目录)、审订(古籍整理)、讲习(古籍传授)、翻译(外籍翻译)、编纂(大型类书和丛书编纂)、刻印(印刷与版本)等中国文献学的内在架构,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且,鉴于清末民初社会上因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而出现的自贬本国文化的风习,先师深为忧虑。尤其是国人对本国文献之要略"不知所对"的情况,先师明确提出"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享,此为中国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也"⑨。另一位当代研究者认为,郑氏兄弟二人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不仅构建了中国文献学的新体系,而且深刻地阐述了研究中国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他认为,先师之所以重视中国文献,"就是要发掘文献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更为可贵的是,郑氏还提出'中国文献之世界化'的命题。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文化灿烂,对人类文明贡献巨大,舍弃中国文化而言世界文化,是极不全面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整理与研究不予注意,那么要西方文化界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自然

① 郑鹤声:《郑和·序》,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第1页。

② 郑鹤声:《中国史学史》,云南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他虽未写出《亚洲史》的教材,但也编写过《亚洲诸国史汇目》(云南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

③ 该文连载于《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第34期(1924年10月)、第35期(1924年11月)、第36期(1924年12月)。按:《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由东南大学教授吴宓等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33年停刊。据《学衡杂志简章》称,该刊"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于国学则立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

④ 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

⑤ 郑鹤声:《中国史学史》,云南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

⑥ 郑鹤声:《史汉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9、21页。

⑦ 可参见胡逢祥:《历史学的自省:从经验到理性的转折——略评20世纪上半叶我国史学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⑧ 马林:《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读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⑨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页。

是困难的。其编纂《中国文献学概要》，就是要达到'考文献而爱旧邦'的目的"[①]。

先师对中国文献学的高度重视，对著名史学家的敬慕和研究，亦缘于他自身对于职业历史学家的角色认知；而他深厚的民族情怀，则使他的文献学研究、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主张又带有浓郁的民族性；而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危亡，无疑加深了他的民族情怀；因而史学研究、文献学研究和历史教育观，都成了他的民族救亡和中华复兴之利器。

## 三、"状貌考"风波与"不怕当史料派"

先师于1951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并担任中国近代史研室主任。然而，此时的"中国近代史"课程与他在三四十年代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所主讲的"中国近世史"课程在内容和体系上已有很大不同。先师自己说："解放后担任中国近代史课程。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指示我们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以前讲授的中国近世史，迥然不同。"[②]先师在当年发表的《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文中，也感到"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③]。然而，对于一位已构建起自己学术体系的五十岁学者来说，这个结合的课程必然是十分艰难的。

就在1951年，先师于新创刊的《文史哲》杂志上发表《天王洪秀全状貌考》[④]。大约到了1955年以后风波渐起，史学界开始有人非议，后来校内也有人公开发文指责他搞繁琐考证，是反科学的，居然去考证洪秀全长没长胡子[⑤]。先师后来回忆说，自己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首先引来'理论棒子'关锋在报上的公开批判指责，歪曲我的意愿，说我搞繁琐考证，如何如何。我看了心中很不服气，但又有顾虑，不敢加以申辩"[⑥]。先师之所以"不服气"，一是因为这篇文章是应南京博物院筹备"太平天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展"之约而写的。当时南京大学艺术系教师根据一些文献绘了一幅洪秀全画像，但是否逼真他们又不敢决定，乃求助于以谙熟史料而著称的郑鹤声；二是他的这篇文章关涉农民起义领袖形象，也是为了纠正日本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所用洪秀全图像之舛误。而最终他"又有顾虑，不敢申辩"，是因为他看到对他进行批判指责的，除了当时党中央的笔杆子关锋以外，还包括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高权威学者。而自1954年末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开始，以政治方式介入学术讨论已成为学术常态，更何况他自己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与这位学术权威甚至最高领袖之不同。因此，先师唯有沉默！

据笔者了解，先师在写出《天王洪秀全状貌考》后不久，便开始学习马克思理论并试图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1954年，先师在研究孙中山的思想时，感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还没有把握，就去找以理论见长的华岗校长，在得到华岗的具体帮助后，先师对论文作了认真修改后发表出来[⑦]。其实，先师在1943年写成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一书中[⑧]，就是从1884年孙中山立志革命开始写起，书中也是以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为主体。而50年代写孙中山思想论文时专门寻求华岗给予理论指导，可见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重视。由于这篇论文是新中国后最早论及孙中山

---

① 吴怀祺主编、王记录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49页。

② 郑鹤声：《郑鹤声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2卷，第18页。

③ 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史哲》1951年第2期。

④ 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文史哲》1951年5月创刊号。

⑤ 参见蒋捷夫、朱作云：《厚古薄今是历史教学与研究中的资本主义道路》，《文史哲》1958年第8期。

⑥ 郑鹤声：《我对华岗校长的回忆》，原载《山东大学校报》1980年6月10日；又载郑友成主编：《华岗纪念文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年。

⑦ 郑鹤声：《我对华岗校长的回忆》，《山东大学校报》1980年6月10日。先师的论文题为《试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文史哲》1954年第4期。

⑧ 郑鹤声：《中华民国建国史》，上海：正中书局，1943年。

思想的学术文章，揭示了孙中山思想经历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在知识界较有反响，民革中央还将此文印成单行本发给党员作为学习材料。先师不仅向华岗校长学习理论，而且还与青年教师一起切磋理论与学术，以避免自己学术论文中的理论有不周之处。

1958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举国上下开展“大跃进”运动。而在史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厚今薄古”问题的讨论和运动。这场讨论和运动一方面是批判厚古代而薄现代的学术研究倾向，另一方面则是批判厚资料而薄理论的学术风气，其本质则是历史研究必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①。然而就在这一年，先师却不顾当时的高等教育氛围而为历史系学生开设“史料学”课程。他是要以自己谙熟史料学和目录学的学养，教育学生治史必须通晓搜集史料的方法。他这种不合“时宜”的教学举动，很快就遭到历史系主政者的批判②。然而，他却坚称自己“不怕当史料派”。在当时那种政治狂躁的岁月，“史学革命”的狂飙并没有冲去他的学术理性。作为一名历史学教授，他对历史教育的敬业之心和对年轻学子的责任之感可见一斑。

先师一直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在从事某项问题的学术研究时，应尽可能多地占有与之相关的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同时，要尊重史料的本来面目，切忌以个人需要而片面摘引史料。另外，还要善于鉴别史料，以确定具体史料的可信度。历史论著只有坚实的史料基础，才可能有说服力。而研究者一旦谙熟史料，也可能从中悟出新的研究问题。他并不认为“史料即是史学”，而是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他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从1932年起开始广搜史料，足迹遍及南京、北京、天津、武昌、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扬州等地的古旧书店，广搜晚清、民国初年的原始文献、公报杂志，并搜罗到不少海内外孤本，如《清史稿》的部分手稿，邓廷桢家散出的与林则徐办理鸦片事宜的文件，清季以来《政府官报》、《政府公报》等。中国史学会在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时，特请他参加《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的史料编辑工作，书中还收入了他提供的多种珍贵史料。此外，他还编辑过《黄河志文献编》、《东华录类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等资料书。笔者于1982－1984年师从先师攻读中西交通史专业研究生时，他还以八十余岁高龄，搜集编缉了《14至17世纪中国与海外国家关系资料汇编》，冀望为学界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史提供基础资料。先师踏踏实实的学术精神和大局意识，也使笔者受益至今。

**【附记】**今年是先师110周年诞辰，特撰此文，以示纪念。先师哲嗣一钧师兄和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国瑞在本文写作中，都曾在资料上提供帮助，谨此申谢！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① 参见王学典：《1958年：当代史学方向转换的一大枢纽》，《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201页。

② 参见蒋捷夫、朱作云：《厚古薄今是历史教学与研究中的资本主义道路》，《文史哲》1958年第8期。

# 重视学问 更重人品

## ——记业师张维华先生

晁中辰

**摘 要**:张维华先生出生于贫寒的农民家庭,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完成了高等教育,并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中唯一一位有硕士学位者。他深受导师陈垣、洪业的影响,重视考据,其硕士论文《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成为其成名作。他从事学术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求通,二是求实。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他一生历尽风雨坎坷,重视名节,即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笔耕不辍,不仅著述宏富,而且立论高远,在史学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关键词**:张维华;人品;学问;文化交流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可谓盛极一时,其标志就是学术界所常说的"八大教授"(习称"八大金刚"),张维华先生(1902-1987)是其中唯一一位具有硕士学位者。张先生有两方印章,一方刻"宗法龙门",另一方刻"追忆昆山"。"龙门"指司马迁,"昆山"指顾炎武。从史识和献身史学的精神来看,张先生和这两位古代大师都有相似之处。张先生从接受高等教育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是和山东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先生培养学生的特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重视学问,更重人品。张先生常常对我们几个研究生说:"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道德文章"的一种通俗说法。张先生的一生实践了他的这种主张,使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世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以他的高风亮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

## 一、艰苦求学,终成大器

张维华,字西山,原籍山东省寿光县。他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寒的小农家庭。他的曾祖父原本姓董,为其姨母张家所抱养,所以就改姓张。过去中国农村宗法观念很重,抱养的孩子被称作养子或义子,社会地位很低。后来几经周折,总算分给了他曾祖父一些田宅,但田产既少又瘠薄。张先生常说,自己出生在一个既贫且"贱"的农家,即指此事。

张先生的曾祖父虽不识字,但很有志气。他省吃俭用、勤劳操作,在艰难的条件下供给自己的儿孙读书。张先生的祖父读书未成,长大后一直在老家务农。其叔祖父读书尚有成就,成了乡里的一个教书先生,但在科举上却没能取得功名。伯父颇有毅力,考中己酉(宣统元年,1909)科的拔贡,在老家一带颇有声誉。张先生的父亲读书无成,但却辛勤劳作,决心要使自己的孩子成为有知识的读书人。

张先生从五六岁时就在本村私塾读书识字,年龄稍长,农忙时在家干活,农闲时在私塾读书。清末开始办学堂,张先生便到学堂去就读。为了能省点读书的费用,张先生就被送到距家几里路的一个教会小学去读书。两年后毕业,他又报考了潍县东关外由外国教会办的广文中学。当时,张先生

作者简介:晁中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在二三百人中考了第二名，祖父和一家人颇以为荣。张先生家境艰难，祖父种菜园，父亲贩卖粮食，东拼西凑，勉强供他上学。先生假期回家，也努力干各种农活。这样的经历，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

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了济南的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之一）。上大学的费用很高，第一年开学家里把麦子全卖了，才缴纳齐学费。家乡有一个姓李的小学教师，后来学了医，当了大夫，同情张先生，每年拿出二三十元支持张先生读书。学校虽然也给点微薄的资助，但仅凭这些生活还是很困难。张先生在上课之余，就辅导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翻译书稿，每月可挣得十几元。他自己平时也尽可能地节衣缩食，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坚持。张先生曾对我们说，有一次生了病，竟连几角钱的药费都拿不出，还要去求亲告友。他说到这些，颇为动情。

张先生好不容易读完了五年大学，1928年夏季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随后到济南济美中学任教。他工作勤勉，教课效果甚好，颇受学生欢迎。一年后，齐鲁大学就把他聘回当助教。

两年后，也就是1931年，张先生离开齐鲁大学，到燕京大学读研究院。当时燕京大学研究院集中了许多名流，陈垣是辅仁大学校长，兼任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也都执教于此。张先生选修他们的课，颇得益于他们治学的方法。这促使张先生下决心走上了史学研究的路子。北京图书馆和燕大图书馆都藏书甚丰，对做学问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那时张先生已过而立之年，不免有为时过晚之叹，这促使他更加抓紧时间，刻苦攻读。每星期六下午张先生从燕大步行到沙滩，在老乡家借宿一夜，第二天到北京图书馆读书，傍晚再步行回燕大。两年后，张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明正德间葡萄牙使臣来华考》。出乎他意料的是，这篇文章竟受到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重视，并撰文予以介绍。这使张先生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从事史学研究的决心。

张先生于1933年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完成了硕士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此文受到洪业先生的重视，第二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正式出版。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将书名改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何满子是著名的特立独行的文学家，他就是张先生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在《忆张维华》（《瞭望周刊》1993年第35期）一文中说："在我所尊敬的年岁大于我的一辈学人中，张维华是常常思念不去心的一位。"文中洋溢着惺惺相惜的深情厚谊。这本书字数不多，才17万字，但分量却极重。在过去的正史中，虽大都有外国传，但从来没有欧洲国家的传。《明史》中出现几个欧洲国家的传，显然是中国直接与西方国家发生交往的反映，表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张先生广泛参照中外文有关典籍，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着手为《明史》中欧洲四国传作注释。在注释过程中，他采用了溯源、辑补、比勘三种方法。

所谓溯源，就是将《明史》中四传所用史料的来源详加排列，对其失误错讹之处，参照其他文献一一偃出。例如，《和兰传》记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商船经吕宋至澳门，税使为李道。张先生据《广东通志》等史书考证出，当时李凤在广东任税使，而李道当时为湖口税使。可见，"李道"乃"李凤"之误。

所谓辑补，即在《明史》欧洲四国传所用资料之外，将涉猎所及的中外资料一一录出，缀于本传有关记事之下。经如此排比，就发现了许多问题。例如佛郎机铳传入中国事，"传"记在嘉靖二年（1523），但《殊域周咨录》谓正德年间（1506－1521）事。据王守仁《书佛郎机铳造事》所记，则可断定为正德五年。

所谓比勘，即利用西方文献与此有关的大量记载，与中文史料相互对照。当时，西方的探险家、旅行家、商人、传教士纷纷来华，将其所见所闻以日记、书信、著作等形式保存下来。这都是研究当时中西交往的珍贵资料，可以弥补中文记载的不足，订正其中的讹误。当然，也不能不加甄别地盲从西人记载。因为西人记载的内容有故意歪曲史实的地方，因而要辨析诬辞，加以取舍。例如荷兰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西文多谓中国默许，且缔有条约。但证以《两朝从信录》所载南居益渡海捣巢之文，则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可知西人所言纯系矫饰。

张先生的这篇硕士论文就是一本专著，是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奠基作之一。它为中西交通史研究扫清了许多障碍，至今为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所推重。赵令扬先生是著名的明史专家，长期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在1975年由香港史学研究会为他出版的《明史论集》前言中，他举大陆几十年来在明史研究领域"用力尤勤"、成就较大的学者，只举出朱希祖和张维华等四人。由此可见张先生在解放初的学术地位。

## 二、生逢乱世，笔耕不辍

张先生于1933年研究院毕业后，仍回齐鲁大学任教，被聘为讲师。当时的教师很少，一个系只有五六个人。他教的课比较多，中国史、世界史都要讲。在教课之余，就尽可能地从事研究。在读《日知录》时，他读到顾炎武关于齐长城的记载，颇受启发，于是参阅大量方志和其他史书，写成了《齐长城考》一文，受到顾颉刚先生的赞许。他接着钩深致远，陆续写成了《魏长城》、《赵长城》、《燕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楚方城》和《汉边塞》等论文。这是我国学术界研究长城的一组最早的系列论文。后来结集成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名为《中国长城建置考》。

1936年夏天，他应顾颉刚先生之邀，离开齐鲁大学，到北京禹贡学会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顾颉刚先生还给了他一个主任的头衔，要他负责对内、对外的联络之事。他便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到外地考察。例如在关于长城的一组论文中，他就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有不少来自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他曾去河套的五原、临河两县，察看了赵长城的终点高阙，还在张家口一带考察过明代的边墙。这种实地考察对他写好这组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张先生在地广人稀的河套考察对，深感这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好地方。自清季以来，不少人注意及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同春(1852－1925)。他曾集中许多人在此兴修水利，使当地面貌大为改观。张先生访问了王同春的家人，回京后写成了《王同春访问记》一文，刊于《禹贡》，并编辑了"河套水利调查专号"。这种调查既开阔了眼界，又可以发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课题，还可以印证书本上的一些记载。张先生每每说到这段经历时就感叹道，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做学问的真谛。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张先生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离开北平后，首先到达开封。肖一山先生安排他在河南大学教书，聘他为副教授。当时肖一山先生任河南大学文字院院长，两人往来甚密。张先生一边教书，一边在肖一山创办的"经世学社"主编《经世》杂志。不久，随着日寇的南侵，开封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张先生便随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继而又迁至武汉。河南大学解散后，他和几位同仁便一起到了重庆。因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工作，竟过了一段流浪生活。1938年秋天，他和徐炳旭一起到了昆明。当时，顾颉刚和徐炳旭出任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负责人，张先生也就在那里落了脚。抗战中的昆明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人心惶惶，可读的书也很少。他将中国文献和少量的西方文献对照阅读，写了一些札记，为以后中西关系的研究准备了条件。1939年秋，他和顾颉刚一起回到已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当时迁往成都的大学很多，仅华西坝一带就有华西、燕京、金陵女大和齐鲁四所教会学校。他除了教课之外，还和顾颉刚先生一起主持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一时集中了国内二十余名著名学者，如杨向奎、胡厚宣诸位先生，都曾在研究所工作。他们还招了二十余名研究生，并制订了一套整理二十四史的计划。研究所的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差不多成了西南的一个学术中心。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责善》半月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这些刊物成了大家发表文章的重要园地。

张先生在成都齐鲁大学史社系连续工作了五年，还曾担任系主任。他先后开设了秦汉史、中国通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在研究方面，他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秦汉和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在秦汉史领域里，他先后写成了《西域都护通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等论文。这些文章后来大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都收在《汉史论集》中，198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关于明清时期的历史，他除了撰写一些文章以外，还编成了《中俄关系史》和《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各石印数十本，以作为学生的教材。笔者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协助张先生对后者加以整理，并补写了清前期中西交通一章，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书名改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这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写交通，叙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与中国的早期交往；中编写宗教，叙述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经过；下编写文化，叙述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过程及其影响。其中，下编是全书的重心。

在张先生看来，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殖民主义和宗教因素掺杂其间，对其性质和作用难以辨识和判定，对此历来多有争议。尤其是在极左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这个领域更成了禁区。但历史工作者应正视现实，应该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直接接触并相互激荡，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直接接触，又是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初次交锋。它带来了生机，也蕴藏着危机。从主观上来看，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从精神上奴化中华民族。张先生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并曾一度信奉耶稣会，对此体会甚深。耶稣会士的足迹遍及我国各地，从京师直至穷乡僻壤，建教堂、学校以至医院，帮助进行宗教活动。这种宗教活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的耶稣会士还搜集中国的情报。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注视和强烈反对。康熙年间的教仪之争及此后的禁教活动，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士大夫与传教士之间的激烈斗争。但从客观上来看，除了消极因素之外，还存在着一些积极因素。

传教士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如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以及机械制造等知识，对于仍然沉溺于四书五经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股清风。它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以传教士为中介，中国文化也陆续传入欧洲，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积极作用。这种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经过几千年时间，各个民族的文化无日不起着相互融合的作用。时至今日，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彼此间的隔阂消除了许多，已经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家庭。由此可见，文化的交流对社会的进步是何等重要。

张先生于1944年离开成都，到重庆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数。这个学校建在荒山野坡上，图书资料极少，不具备搞科研的条件。他就利用自己有限的藏书，尽可能地在教课之余搞点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女子师院于1946年迁至重庆。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因时局混乱，且资料缺乏，只利用已积累的一些材料写了几篇文章。1948年，张先生离开重庆，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杭州云栖寺的齐鲁大学。第二年全国解放，张先生随校返回济南。

## 三、一要求通，二要求实

张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求通，二是求实。这也是他经常要求我们几个研究生要做到的。所谓求通，即一个历史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阶段的历史知识，而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和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高屋建瓴，立论得当。例如，郑佩欣教授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著名学者，在1997年“纪念张维华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就特别强调“张先生的史学修养”，认为张先生“尤以史识见长”。张先生虽不主攻魏晋南北朝史，但也发表过一篇《试论曹魏屯田和两晋占田的某些问题》（见《晚学斋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学术界对“占田”和“课田”的关系长期争论不休，不得要领。据《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占田70亩，丁女占田30亩。另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课田20亩。张先生指出，课田就包括在占田之中，即夫妇二人共占田100亩，其中包括“课田”70亩。张先生指出，当时行240步为一亩的大亩制，如夫妇二人有田170亩，按当时生产力水平无力耕种，而且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分给他们。自战国、秦汉以来，农夫五口之家能耕地“不过百亩”，后世越发细耕，则更不应超过百亩。张先生此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遂为史学界"普遍接受"(见《纪念张维华教授逝世1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98年第2期)。同时,还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历史,也要懂世界历史,把中国历史当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去看待。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具有所谓世界眼光。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往往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但实际上却与外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没有一定的世界历史知识,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就会失之偏颇,难以做到全面客观。张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不仅在秦汉史和明清史领域成果丰硕,而且还写过有关魏晋和宋元方面的文章,都颇有见地。在由中华书局主持的校点整理二十四史的工作中,张先生负责点校《陈书》,受到同仁的赞赏。他不仅给学生讲授中国历史,而且还讲过世界历史。正因如此,所以他研究起中西交通史来就更加得心应手。这也正是他在史学界能享有崇高声誉的重要原因。

二是求实。在张先生看来,研究历史如果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求实不仅是历史学的生命,而且是史学家所必备的品德。正是出于这种主张,他一生写了不少考据文章,就是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实的真相。他常常对我说,不可走乾嘉考据的老路,但应该有乾嘉考据学家那种求实的精神。考据文章读起来很枯燥,但对一些相关的考据文章要硬着头皮去读。读懂了就是很大的收获,而且可以从中了解做学问的艰辛,学习做学问的方法。他还要求笔者试着写几篇考据文章。笔者研究生毕业后还真的写了十来篇考据论文,有长的,也有两三千字的短篇,自感收获甚丰。时至今日,自己也写了几本书,也发了近百篇文章,但自己最得意的还是那十几篇考据论文。另外,张先生之所以特别强调求实,还与他对"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深恶痛绝密切相关。在他看来,越是求实,就越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就越能为现实服务。这种服务才是真正有益的服务。否则,通过故意歪曲历史来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这种服务只能是暂时的、虚假的,归根结底是有害的。

张先生的著述正是因为有求通、求实的特点,所以人们在读他的著述时,就自然感到气魄大,立论高,学术价值历久不衰。这也正是他一生到老所孜孜追求的境界。

齐鲁大学搬回在济南的原校址(即合校前山东医科大学校址,今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后,张先生除教课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文科被并入到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无论山东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由济南迁曲阜,由曲阜再迁回济南,他都一直是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这期间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大,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需要采用新的方法,需要用马列主义来指导。对于他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来说,一时感到很是跟不上。于是,他除了阅读史学典籍以外,还看了不少马列主义方面的著作,以尽可能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合于马列主义的基本要求。在此期间,他编过讲义,也写过一些文章,大都是属于通史和典章制度方面的。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和《论汉武帝》两本书,就是努力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写成的。

《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一书篇幅不长,全书不足十万字,但却对明代海外贸易的性质、阶段、类型和贸易内容等作了全面的论述,对一些疑难问题作了深入考辨,扫清了研究道路上的许多障碍,为后人对这个问题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是这个领域填补空白的一本著作。正因如此,它成了中外关系史领域研究生的必读书。张先生指出,明代的海外贸易可分为两类:朝贡贸易和私人海外贸易。朝贡贸易盛于明初,尤以永乐和宣德年间为盛。由于永乐年间的海禁有所放松,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盛举,朝贡贸易的范围、规模和次数都远远超过了明代的任何时期。由于自永乐三年(1405)以后明成祖再也未发布过厉行海禁的诏令,而且对违犯诏令的外国商人也尽量优容,所以私人海外贸易也在暗中发展起来。只是因为这时的朝贡贸易特别发达,故私人海外贸易"相形见绌而居于次要地位"。近些年来,学术界关于明成祖的对外政策争论很多。有的人认为他实行了开放政策,有的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他不仅未开放,反而使海禁政策更加严厉。这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偏颇之论,不足为训。而张先生的上述看法则是在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张先生还指出,朝贡贸易在正统(1436－1449)时开始衰落,由于嘉靖(1522－1566)时海禁颇严,朝贡贸易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几乎完全停止。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遂取代朝贡贸易而居于主导地位。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促进了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交流。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群众开始大量移居南洋，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同时，私人海外贸易还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

《论汉武帝》一书是第一部关于汉武帝的历史人物传记。书中不仅详细叙述了汉武帝一生的事功和得失，而且写出了汉武帝所处时代的风貌。在张先生看来，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积极经营边疆，解除外患，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长期为后世所沿用。张先生还陆续写成了一些有关秦汉史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入《汉史论集》一书中，由齐鲁书社出版。这些论文受到秦汉史学界的重视和赞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立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张先生被聘为顾问。

张先生于1973年退休，虽不教课了，但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学校又请他复职，主要从事带研究生的工作。笔者就是“文革”后由他挂名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这时张先生已进入垂老之年，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但工作很勤奋。他除了为研究生上课外，还积极进行科研活动。他在1957年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此相关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磨难。改革开放后，他在1957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得到了平反，又恢复了工作，所以他的精神显得特别好。当他为我们研究生上课时，系里的一些中青年教师也来听，他都一律表示欢迎。他除了整理一些旧稿外，还陆续撰写了十多篇学术论文，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论文大都收在《晚学斋论文集》中，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他使用“晚学斋”三字，显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心境，令人感动。

“文革”后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出成果最多的时期。除了前述的一些成果外，他还主编了四百余万言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主编了《郑和下西洋》和《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两部专著和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代中外关系史著作，现已被许多高校用作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

这些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张先生奠定了崇高的学术地位。200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为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出版了《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书中在谈到明代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交往时，首先就举出“张维华的著名专著《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并还提到张先生的其他著述。台湾明史学会会长徐泓在《六十年来明史之研究》(载《六十年来之国学》，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一文中说，在三四十年代，“明史研究方面，一时大师辈出，如朱希祖先生、孟森先生、谢国桢先生……张维华先生”，他们“皆对明史有独特见解”。对一个学者来说，能得到如此众口一辞的崇高评价是很难得的。

## 四、道德学问，重在人品

张先生常常说到他培养研究生的原则：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按照通常情况，研究生是来学习知识的，怎么把人品摆在第一位呢？他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也做不出好学问来。人品和学问，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实际上关系很密切。比如，一个人平时不论干什么事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无论在哪个领域做学问，如不下苦功夫，总想投机取巧，是绝对做不出有价值的学问来的。这种人只能干点浮光掠影的事，深入不下去，坐不住冷板凳。而做学问是件艰苦的事业，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张先生在其他方面也经常说到人品的重要。例如，他常对我们说，研究生毕业后不少人要去当教师。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不只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以自己的品格去影响学生。这种影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是客观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的人格力量的影响，对决定学生一生的道路比知识传授还要重要。学生毕业后如何立身处世，往往就以自己心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中的优秀教师为楷模。如果教师都能在品格方面为学生树立起良好的榜样，就能使我们的教育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里，人品的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范畴，而是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意义，即要有社会责任感，有社会担当。

认识张先生的人都知道，张先生风度翩翩，极有学者气度。尤可称道的是，他重视名节，正直敢言。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和赵俪生先生是"八大教授"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两个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纠正。两人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受尽了屈辱和磨难。赵先生每次从兰州来济南都去看望张先生，这种共同的遭遇自然成为不时谈及的话题。张先生对此的态度是三个字：忘掉它。赵先生虽然同意，但也表示很难忘记。1987年张先生逝世后，学界耆宿纷纷来电致哀，其中赵先生的来电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惊闻西山逝世，先生在五十年代历史系教师中，为具有真正水平之一员，言之痛惜。赵俪生谨电，聊代一哭。"赵先生才华横溢，心高气傲，能被他看上眼的人不多。张先生是少数几个受到赵先生敬重的同仁之一。

大概是因为张先生人品教育的熏陶，我们几个前后师从张先生读研究生的同窗别的不说，单就团结这一点来讲，还是稍可自诩的。1997年，为纪念张先生逝世10周年，我们几个师兄弟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通力合作，虽工作单位天南地北，但还是为张先生成功地出版了纪念文集，并在山东大学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张先生的学术研讨会。这在"八大教授"中是第一家，至今也是唯一的一家。

在做学问方面，张先生深受他的老师陈垣、洪业等人的影响，并常常用他们的事例来教导自己的研究生。他常常说到陈垣读《廿二史札记》的事。清代大考据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考证精审，长期受史学界推崇。陈垣对这本书逐篇"复按"，即将书中的每条材料、每件史实都查考出它的来龙去脉，从而纠正了书中的不少错误。这种读书的方法似乎效率很低，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陈垣奠定了作为一个史学大师的深厚根基。张先生本人就深受这种学风的影响，他的硕士论文广征博引，功力深厚，当即就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他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就常说到这件事，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认认真真地精读几本书，打好根基，然后再广泛涉猎，这样就可以触类旁通，收获也就会格外丰富。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宽，但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秦汉史和历史地理。

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是张先生最先涉足的课题。他从《明史》中看到，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国传就记载着这方面的内容，于是就留心研读。当他进入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看到更多有关的记述，他的研究工作也就从这个地方着手。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这个领域的。他的硕士论文《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是他刊印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他的成名作，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注目。例如，洪业先生在1935年所撰《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写道："两年前张维华君著《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国传注释》，既将尤侗、万斯同、王鸿绪三家传文与明史传校勘，又复远征博引，细加注证。这是可喜的贡献。"后来方豪在著《中西交通史》和日人和田清著《中国史》等书中，都多次征引此书，成为后人研究中西交通的必读著作。此后，张先生又陆续撰写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和《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书，并发表了数十篇有关的学术论文。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正因如此，他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西交通史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在秦汉史领域，张先生的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汉史论集》和《论汉武帝》两部书中，另外还有十余篇学术论文。他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始于抗战时期。当时他颠沛流离，可资参考的资料十分缺乏，而手头的《史记》、《汉书》就成了他的常读书。他在读《汉书·匈奴传》时注意到，汉武帝时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比较紧张，而汉元帝时就缓和得多，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昭君出塞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他于是就写成了《王昭君下嫁匈奴考》一文，认为通婚不失为民族间走向和睦之一途。

在汉代中西交通方面，张先生也先后发表了一组极有分量的论文。例如，在《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他对《汉书·地理志》和《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歧异细加考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纠正了《汉书》中记载的错讹。河西四郡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为汉通西域的要冲，其建置时间与汉通西域的关系甚密。张先生经多方考证，四郡建置的顺序应为酒泉、张掖、敦煌、武威。从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建置年代看，酒泉不建于元狩二年（前121），而应在元鼎（前116－前111）初年；关于张掖和武威的建置时间，他认为《汉书·武帝纪》中所记“元鼎六年之说可据”，武威不是从酒泉分出，而是从张掖分出，建郡年代当在元凤六年（前75）与神爵元年（前61）之间。后来，《居延汉简考释文》一书面世，基本上肯定了张先生的结论。关于武威郡的考证更正了建于武帝时之说，实为“发二千年之复”，显示了张先生做学问的深厚功力。

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张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是《中国长城建置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一书，另外还有十几篇学术论文。关于战国时各国纷纷修筑长城的背景，张先生在该书“序”中指出：“至于战国，车战之制渐息，徒骑之用渐广，战争范围益为扩大，于是有长城之筑矣……长城之设，既可以为界，亦可以为防，对于当时各国疆域分合之形势，甚有关系。”这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高远之论。

张先生经常强调，研究历史应有“世界眼光”。他本人也时刻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故特别重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他在《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的“出版新序”中说：“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一个必要途径。”在因“文明的冲突”话题而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今天，重温张先生的这段话，更使人感到张先生心胸之开阔，立论之高远。

1987年6月，张先生走完了他艰苦曲折的人生历程。为悼念先生，学校在济南千佛山灵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人们不只是景仰他巨大的学术成就，更景仰他的节操和品格。安作璋教授是张先生解放前培养的学生，他撰写的挽联对张先生一生的成就概括得十分精辟：“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逮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1997年，我们师兄弟邀请张先生的生前友好和学生分别撰文，在齐鲁书社出版了《张维华纪念文集》。大家从不同角度对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节操进行了阐发和回忆，其中也深深地寄托着大家对张先生的景仰和怀念。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

王学典 黄广友

**摘 要**:华岗既是中共开国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又是集著名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先驱。华岗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一道,共同缔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社会发展史"、"反映论"、"规律"是这一范式的三大基本概念。华岗的贡献在于他为锻造和诠释这三大概念付出了独特而又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华岗;社会发展史;反映论;规律

在开国一代的"党内学者"中,能把"严肃的学者"与"热情的老布尔什维克"两种素质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并不算少,而华岗(1903-1972)则可能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既是中共创业时期的职业革命家,又位列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同其他开国一代的许多著名"党内学者"均是学跨文史哲的通人型学者一样,华岗的研究也同时覆盖史学、文学和哲学[①],在许多领域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有些具体贡献,因时代语境变迁而光环褪尽或已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回忆,但从学术史上看,都不能不承认这些贡献所具有的不容轻忽的创始意义。

## 一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华岗的史学研究与郭沫若、范文澜和翦伯赞等主要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耕耘不同,他的史学研究的重点始终集中在"中国革命史"范围内。

华岗在史学界初露锋芒,并一举奠定自己在史学领域地位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是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以下简称《大革命史》),这是由历史的直接创造者所撰写的一部当代史名著。

在"自序"中,华岗说自己起意编著《大革命史》,一是觉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二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有人"不但不愿正确地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训,而且还想一手推翻历史的事实"。这让华痛感"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②]。三是华岗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和新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之时,"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

---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黄广友,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研究"(批准号:10YJA770051)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学典:《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光明日报》2003 年 6 月 3 日。

② 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自序",北京: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

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①]。1930年3月，华岗完成初稿，次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公开出版。此书出版后，深受中共重视，也广受普通读者欢迎，多次重印。赵俪生回忆说，《大革命史》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入党参考的必读著作[②]。龚育之也认为《大革命史》“是解放战争期间在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③]。《大革命史》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作者亲自参加大革命实践活动又为撰写此著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据说毛泽东后来称赞此书“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④]。

《大革命史》的写作，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革命家写革命史的典范，在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创制先例。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初步确立了大革命研究的体系。桂遵义说：“这是一部规模大、体系比较完整的大革命史研究专著，也是一部很好的中国革命史教材。……这部史著完全改变了资产阶级学者只叙述大革命经过的作法，而注意了大革命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准备阶段、经验教训等各个纵横方面的研究，对大革命史从历史现象的真相到历史本质的真相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⑤]“这部火与剑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版时，仍被廖盖隆誉为“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⑥]。此著出版后，被当时卷入社会史论战的人们视为“对中国史研究极有价值的书”，直接推动了这场论战[⑦]，并很快被翻译到了日本。

与《大革命史》几乎齐名并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华岗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抗日战争时期，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延安和重庆等地广泛而系统地开展了中国革命运动史研究，陆续出版过多种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史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华岗撰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时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两部著作。它们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广泛流行，同样成为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撰写于1939年，次年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发行。正如华岗在增订本“自序”中说，初稿是在抗日战争紧张期间，为了适应读者急切需要而产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借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⑧]。比较《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如果说前者还只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项专题研究，后者则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通史性著作了。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确定了一条中国革命史叙事的基本线索，即以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为主线。全书以此为线索叙述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工人运动的发动——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这条中国革命史的基本线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它确定的上限看，它比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更具完整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首次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不仅如此，华著还确定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作者虽然明确指出：“本书的范围只是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解放的史实以忠实的记载和扼要的分析，指出这些运动的根源、特征和教训，以便对于当前抗战建国大业有所借镜和帮助。”但

① 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北京：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② 赵俪生说：“1937年初清华共产党支部审查当时‘社联’、‘左联’、‘民先’的成员认为够了入党水平的人，每人发给两本小书，都是留声机钢针精心在蜡纸版上小字刻写印出的小册子，一曰《清算李立三路线》，一曰《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这后一本的著者就是华岗。”《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③ 龚育之：《此心不与年俱老》，《光明日报》1999年1月11日。

④ 谈滨若：《征途漫漫忆明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青岛日报》1983年11月29日。

⑤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6页。

⑥ 廖盖隆：《华岗著〈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哲》1981年第5期。

⑦ 参见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⑧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增订本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第1页。

是，作者又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能分离的，“如果没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固然谈不上社会解放，可是归根到底说起来，如果没有社会解放的实现，也就不能最后消灭民族的压迫”。事实上，“这种民族革命斗争与社会解放运动互相影响与互相推动的事实，差不多充满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因此，作者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名义下，同时也记载了中国社会解放的斗争史迹，应该是不足为怪的。”[①]过去一些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局限，研究中国革命史往往只限于资产阶级革命，而不研究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华岗的这一努力，无疑使中国革命的历史得到更全面的反映。

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此前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此后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构成自抗战开始到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建国初期，华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都是大学里最为流行的教材，有学者认为，“至今有一些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基本框架仍未超出华、范二书多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不愧是中国近现代史“奠基之作”[②]。

如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一部近代中国革命史通史性著作，那么，华岗在40年代末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则是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另外两部专史著作。对于后两部著作的撰写，《华岗传》的作者向阳认为，可能是由于华岗认为太平天国的反清战争与当时的解放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更高阶段的农民战争，因而特别值得研究[③]。其实，华岗在1955年“订正本题记”中已经明确说明他扩充修改的目的是“当时只因看到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歪曲和诬蔑太平天国的许多著作大量流行，为了企图澄清一下读者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视听，才把这本不成熟的初稿，交海燕书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④]。另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华岗认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始自“太平天国革命”[⑤]，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华岗对五四运动的研究，特别注重揭示这一事件本身所包含的意蕴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在华岗看来，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个民主运动。它上承了自从太平天国与戊戌政变以来的由下到上和由上到下的民主运动的两股潮流，而给以总结；同时它又下启了五卅运动以及‘五卅’以后的一切民主运动的潮流”[⑥]，“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启蒙运动”[⑦]。同时，华岗还指出，从反封建以启蒙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正是新兴市民层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思想学术文化的一个大批判，正是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一个大决斗。这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科学与反科学的对立”。五四运动请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使它在思想文化上不仅做了一些破坏工作，而且也有了建树[⑧]。

此外，还可能与华岗当时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预想有关。1948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在华岗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回顾反思这两段历史的开始和所以开始，对于即将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国，求得一些活的历史经验教训，华岗可能认为更具有意义。况且，对于五四运动，正如华岗所说：“五四运动到现在，业已经历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出现一本完整的五四运动史”，而且他还认为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更远远没有深入拓展，彻底反

---

① 以上引文参见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自序”，胶东新华书店，1945年，第1－4页。

② 路遥：《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评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二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04年第3期。

③ 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

④ 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订正本题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⑤ 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页。

⑥ 华岗：《论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为纪念五四运动23周年而作》，原载《群众》第7卷第8期，1942年5月1日，参见《华岗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

⑦ 华岗：《五四运动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6页。

⑧ 华岗：《论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原载《群众》第7卷第8期，1942年5月1日，转引自《华岗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封建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①]。所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出版后，受到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前苏联把前者译成俄文出版；后者也很快脱销，尔后又连续翻印。华著《五四运动史》对五四运动爆发原因的分析比较客观、准确，至今许多教材仍大体沿用华岗的分析思路和框架。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的出版，连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华岗贡献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史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在广大青年中，华岗以自己的历史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赢得了一批又一批读者，相当多的青年人正是读着他的书，在他的影响下选择了革命道路。不仅如此，这些著作还在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以及中国近代革命史通史编纂上都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华岗不仅重视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更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1949年前，华岗先后出版和发表《社会发展史纲》、《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中国近代史的特征和研究门径》、《中国历史的翻案问题》、《谈谈历史方法》等著作和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华岗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等人一样，其治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强调立足现实，为着变革现在和再造未来，这是他们这一代革命史家的最突出特点。华岗始终认为革命的史学家“为着改造现在和争取将来，必须熟悉过去。对于过去知道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加多懂得现在，也越有把握改造现在和预测将来”[②]。

自马克思主义创建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一直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研究的作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们才有了全面的思考[③]。这时，他们开始意识到，为了寻到历史为革命服务的真理，必须对历史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华岗说：“我们在叙述或记载的过程中，都要如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再现出来，还它一个本来面目。”[④]同时，对过去被歪曲过的历史，还要进行“翻案”。“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过去，即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伪造和歪曲的历史。”“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反动统治者往往通过捏造历史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想法和做法，顶多只能暂时收到蒙蔽一部分人使之盲从法西斯的效果”。华岗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为此辩护，即使是为了发挥历史推动人民进行革命事业的斗争，也不能“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因为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经很少可能，哪里还谈得到鼓舞和推动解放斗争呢”[⑤]？

如何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从而建设“信史”呢？在华岗看来，除了要有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外，还要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和辨伪。华岗一方面肯定前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同时，又指出中国过去的考据之学“缺少活的神经”，失实太多，以致成了“一种跛行学问”。这个“活的神经”，在华岗看来，就是“科学历史观”，因此，华岗提出，要想建设“信史”，“必须重新搜索史料，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厘革，对于伪造的历史和被曲解的历史，要重新给以评定，被歪曲的要加以矫正，被粉饰过的要把粉饰去掉”，“还原出对象的本来面目”。华岗还强调，考证辨伪是发掘历史真髓的“不可缺少的一环”，“考证学在整个历史科学中，乃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该让它局限于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上”。他反对那种对史料不下功夫，而仅仅依据抽象的理论和公式，“拿它当作邮局的

① 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

②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③ 参见王学典：《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④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2页。

⑤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图章，乱刻在史料上，结果只能搬演公式的八股文章，并不能具现真实的历史”[①]。华岗是一个非常懂得严谨的考据对于建设“信史”十分重要的人，强调考据是华岗史学一个突出特点。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后华岗在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他为什么能够广纳并重用考据派学人，在旧派学人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文招致关锋的“棍子”打来之时，华岗为何又能够挺身而出，支持郑进行申辩，从而解除了郑的思想包袱，使他能够大胆地进行学术研究。华岗之所以非常懂得旧学和了解旧学的价值，或许是因为他具有浓厚的旧学修养，也许是他本人具有“旧知识分子”的典型习性使然，赵俪生先生说华岗“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士”[②]。

华岗这种强调考据、重视建设信史的追求，使他在贯穿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之历史主义思潮的演进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1948年，华岗化名“少峰”，在翦伯赞担任主编的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第二期发表了《谈谈历史方法》一文，有论者认为，明确提出“历史主义”范畴虽远在抗战初期和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但作为一股当代史学思潮，历史主义却可能发源于华岗的这篇文章[③]。

应当说，华岗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是富有深度的，这当然是他长期坚持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后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已臻于成熟。

## 二

以1949年为界，华岗的学术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此前华岗侧重于历史研究，此后，他则转向对文学和哲学的研究。在文学研究方面，华岗主要集中于对鲁迅和文艺美学的探讨上。

新中国建立之初，华岗转向研究鲁迅绝不是偶然兴趣所致，其原因，一是试图通过诠释和塑造过的鲁迅来取代胡适在学界的地位；二是由于鲁迅早被毛泽东塑造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环境中，鲁迅已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因而，当时学界对鲁迅的研究迅速成为一门“显学”。1949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13周年纪念大会上，华岗作了题为“我们应该从鲁迅思想中学习什么”的讲话，同日，华岗又在《胶东日报·鲁迅纪念专刊》发表《鲁迅所理想的新中国》一文。这两篇文章虽是应急之作，但华岗对鲁迅思想的分析却较时人深刻得多。1951年5月《文史哲》创刊，华岗在第1至5期连续发表系列鲁迅研究论文，直接切入当时鲁迅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具有很强的导向性。这批文章后收录编成《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一书，1953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此书中，华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鲁迅的认识，特别是对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以及对鲁迅关于中国历史、科学、文艺、妇女诸问题的思考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全面而系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的少之又少，从而也就显示出这本专著是不可埋没的珍珠。”[④]现在看来，华岗所开辟的鲁迅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对后来“鲁迅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在50年代初期，华岗是对鲁迅真正有“研究”的为数很少的学者之一。

在对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研究中，华岗重点回答了“鲁迅是谁？”这一焦点问题，他认为鲁迅是20世纪的鲁迅，具有现代特色，反对把鲁迅作各种比拟，认为这些比拟都是反历史主义的。在这个方向上，华岗详细探讨了“鲁迅怎样从进化论者发展成为阶级论者？”这一命题。与一些学者观点相同，华

①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13页。

② 《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③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42页。

④ 高旭东：《华岗与鲁迅研究》，《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

岗也认为鲁迅在早年是进化论的笃信者，曾用进化论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但是，华岗强调，鲁迅所理解和笃信的进化论，并没有使鲁迅思想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庸俗的渐进改良主义，也没有使鲁迅一开始就走上发展的观点和新陈代谢的观点。华岗进一步指出，鲁迅是一个具有发展观点的进化论者，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鲜明的变革精神。“鲁迅的进化论宇宙观和他底战斗现实主义相结合，就作了他后来发展到无产阶级宇宙观的桥梁。”在华岗看来，由于鲁迅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现实、人民和进步，考虑问题始终不离开现实，始终为人民利益和推动进步着想，这就在基本上把鲁迅导向了唯物论，而最后促使鲁迅由进化论跃向阶级论、由直感的唯物论跃向历史唯物论、由个性主义跃向集体主义、由人道主义跃向社会主义，则是由于他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对现实政治斗争的独特感受[①]。

华岗对鲁迅的历史观、科学观、文艺观以及妇女观都作了若干探讨，尽管深浅不一，但从华岗论鲁迅所涉及的几个方面看，他事实上为后来的“鲁迅学”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学术框架。

首先，华岗详细阐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是“中国史学界最早注意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先进”，早在1907年就写了《人之历史》，研究了从猿到人的大略进化过程。鲁迅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中国的具体历史来证明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同时就在批判旧历史中找出新时代”。“历史一到鲁迅手上，就不仅是一面镜子，而且成为一把锋利的匕首，把国民党政府反革命、反人民、反民族的真面目一下子就刺穿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阻滞状态和守旧性，鲁迅曾经把它比作北京老房子的“活埋庵”，这比喻真正说中了旧中国社会的病根，即因循守旧而陷于落后，由于落后更阻塞了自己的生机。对于中国的旧史籍，华岗认为，鲁迅虽然主张中国历史应该重新写过，但并不是认为旧史籍没有任何可取的东西，那些多少能够反映民族灵魂与指示将来命运的史籍，应加珍视。另外，华岗还指出，鲁迅所认为的旧时中国的野史比正史可靠，是有充分根据的。从总体上看，华岗认为，鲁迅在中国历史学上的建树是伟大的[②]。

其次，华岗论述了鲁迅对于科学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还是诚挚的科学工作者，“是热爱科学和最早以通俗方式把科学知识介绍进来的先进”。鲁迅对“科学的起源”、“科学的功能”都作了认真探讨，并提出“科学必须和封建主义及宗教迷信作斗争”思想。华岗还探讨了鲁迅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运动和文艺运动必须互助合作，各自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③]。

再次，华岗分析了鲁迅对文艺的认识。华岗认为，鲁迅所以弃医从文是由于他看出“当时中国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是，他那时以为要首推文艺。……文艺是改变国民精神的有利武器”。关于鲁迅对文艺的认识，华岗分别从“文艺的源泉和作用”、“文艺的起源和发展”、“文艺在旧中国的社会地位”、“论创作方法”、“论文艺批评”、“文艺工作者应如何改造自己”等方面作了详细分析。鲁迅肯定“文艺的源泉是人民群众在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发出的火光，同时又是引导人民群众前进的灯火；文艺本身就充满战斗性，因此必须具有战斗精神和态度，才有资格从事文艺，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的新文艺”。关于文艺创作的方法，华岗认为，鲁迅强调搜集充分的材料；撰写时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而且要有相当的思想准备和艺术修养；文艺作品不仅要选择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加以提炼，而且需要反复推敲和深入研究，发现本质，才能恰当地反映客观事物，此外，创作还必须对读者负责，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读者看得下去和得益。关于文艺批评，鲁迅主张要进行正确的文艺批评，认为“那种反对批评与抹杀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批评，文艺作品的质量就不能提高，文艺运动就不能向前推进”[④]。有学者认为，在50年代，比较全面论述鲁迅文艺思想

① 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3－46页。

② 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73－120页。

③ 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120－150页。

④ 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153－193页。

的文章，除陈涌的《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就是华岗的《鲁迅论文艺》，比较这二者，华岗的文章更多地照顾了鲁迅文艺思想本身的特点和层次①。

最后，华岗还专章论述鲁迅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对"妇女在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即"男尊女卑"向来抱有深恶痛绝的态度；鲁迅提出封建社会"'表彰节烈'是杀害女性的陷阱"；鲁迅主张"批判寡妇主义和坚壁清野主义"；鲁迅还认为自由恋爱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和适当的位置之上，"批判超现实的恋爱观"；最后，华岗还探讨了鲁迅所理解的"妇女解放的前提和关键"等几个方面的问题②。

确如有学者所说，华岗对鲁迅的研究并非十分深入，但是，华岗的贡献不在于他对鲁迅研究的深浅，更重要的是他开拓并提炼出了许多鲁迅研究的新领域，而上述几个研究侧面的提出本身即具有别开生面的创始意义。不仅如此，华岗还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将"鲁迅研究"搬上课堂。1952年，华岗提出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开设"鲁迅研究"课，并成立备课小组。1953年，"鲁迅研究"在山东大学正式开课，华岗亲临讲坛授课。在短短几年内，华岗使山东大学成为全国鲁迅研究的重镇③。而韩长经、刘泮溪、孙昌熙诸教授在华岗之后又把山东大学的鲁迅研究事业发扬光大。

在文学研究领域，华岗除开拓了对鲁迅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他对文艺美学问题的深入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学问题引起国内文艺界、美学界、学术界广泛重视，掀起了一场美学大讨论。华岗此时身陷狱中，但还能有机会读书看报，他密切关注铁窗之外的这场美学问题讨论，尤其注意这场讨论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下自己的思考，撰成《美学论要》一书。在书中，华岗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首先综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美学问题上历来的斗争，然后从"美的客观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现实美与艺术美"、"艺术的特征"、"艺术中的典型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宇宙观和艺术创作"、"文艺批评"以及"美学基础和理想"等方面，深入而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美学诸问题的看法。

华岗首先对美的本质以及如何把握美的客观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就审美活动的特征和实质作了明确概括：第一，美是感性具体的，为人们的感官所能直接感受的；第二，美是富有表现力、富有内容和具有本质意义的；第三，美是始终表现由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人的内容。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就其单个本身来说，都不足以说明审美的实质，只有上述所有特征的总和才能说明④。华岗对美的这一概括和总结，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对反映论的坚定信念。

华岗认为，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反映，在人的生活和自然界中，自然美无处不在，艺术作品对于美的描写和塑造，是客观自然美的再现和加工，如果客观上不存在自然美，那么这种反映和加工就根本不可能进行⑤。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和源泉，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如果离开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源泉，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实美经过艺术家反映、再现和塑造，就成为艺术作品和艺术美⑥。不仅如此，华岗还注意到，现实美和艺术美虽然都能引起人们的美感，但它们所引起人的美感的精神反应是有差别的。"艺术并不局限于美，它还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既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这就形成艺术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也就是艺术作品中悲剧、喜剧、崇高和滑稽的现实基础。"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加以典型化和审美化之后，使之成为美的事物的对立面，形成批判丑和否定丑的强大力量，而这样做正是为了表现美

① 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② 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195－228页。

③ 参见高旭东：《华岗与鲁迅研究》，《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

④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页。

⑤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⑥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和肯定美,这就是艺术作品的美学意义[①]。

在坚持文艺反映论的基础上,华岗对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悲剧"和"喜剧"等文艺样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华岗看来,坚持认识的内容决定认识的形式,这是解决艺术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出发点[②]。在坚持这一前提的同时,华岗还指出,人们应当把反映同现实、同所反映的对象区别开来。艺术对于现实现象的再现,不是镜子般的死板反映,而是复杂曲折和矛盾发展的创造过程,其中包含着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评价[③]。

悲剧和喜剧是美学的特性和范畴,也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两种重要样式。华岗认为,文艺作品中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悲剧直接肯定美,喜剧间接肯定美[④]。人们所以爱好艺术中的悲剧,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中悲剧事件的反映和再现,而且更概括、更集中、更典型。而"真正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悲剧艺术,不是以死亡和毁灭来威胁大家,不是叫人退却,不是叫人放弃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而是叫人把悲痛化为力量,为争取实现美好事物而奋斗[⑤]。

值得注意的是,《美学论要》设专题讨论文艺批评问题。在华岗看来,文艺批评是文化批评的一部分,首先必须服从整个文化批评的规律和原则,正确的文艺批评能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否则,只会阻碍其发展。华岗认为,正确的文艺批评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许他已觉察出,"胡风事件"冤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华岗痛感正确对待二者关系的重要。他说,文艺批评有自己特殊的批评和教育方法,"思想只能说服,不能强加。文化批评,按其本质来说,应该是真理的说服工作,可是现实常常阻碍这种神圣的说服。这种阻碍当然会使真理及其坚持者遭受种种迫害,但是,想用野蛮暴力来消灭真理或歪曲真理,终究是一种徒然的努力"[⑥]。华岗明确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是什么主观臆造的标尺,更不是什么统治者的'圣旨'。利用政治权力强迫别人接受某种思想,或取缔和消灭异己思想,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也是毫无效果的蠢事。"[⑦]很明显,华岗对高层处理胡风文艺思想简单粗暴的方法是坚决反对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在他看来,应该是"文艺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地构成艺术的统一体,抽去了其中的任何一方,他方即不能存在"。不过华岗也承认,"在政治和艺术的辩证关系中,政治内容和政治方向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文艺的本质"。但他同时又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作品,无论政治性怎样强烈,也是没有力量的。"[⑧]

不仅如此,华岗还指出,科学的文艺批评,除"必须掌握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以及最基本的美学原理"外,还"必须具有伟大的胸怀,不仅要对作者负责,而且要对读者和社会负责"。文艺批评家"必须比艺术家和作家具备更多方面的社会知识、更有系统地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更深刻地对于美学价值的判断能力,以便能够完成艺术家和作家为要实践自己的创作任务所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华岗强调:"文艺批评是严肃的论争和真理的说服工作,只能以论据和真理取胜,而辱骂、恐吓、造谣、诬陷等等则是荒谬和卑劣的行为。"[⑨]

华岗没有因自己在政治上被诬陷而影响独立思考,这在"文革"之前学术越来越迁就政治,最后沦为政治婢女的语境中,表现出了可贵的学术品格。从著述内容看,华岗提出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

①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77页。
②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
③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1－132页。
④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6页。
⑤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225页。
⑥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9页。
⑦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⑧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7页。
⑨ 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3－264页。

较高的理论价值，华岗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应该有他的一页”[①]。时至今日，山东大学仍是全国文艺学研究的重镇，良有以也。

## 三

华岗在史学和文学上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这也是他那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共同特点。而华岗所以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这是由于他本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不仅如此，华岗还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华岗最先探讨的是历史哲学，其次则是一般哲学。

在抗战初期，为批判日本秋泽修二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错误观点，华岗撰成《社会发展史纲》一书，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历史科学的诸多问题；第二章“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从第三章至第七章，华岗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几个社会形态分别阐述。华岗以人类社会发展史观代替社会进化史观，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看法。华著《社会发展史纲》是继蔡和森《社会进化史》(1924)、李达《现代社会学》(1926)、马哲民《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1931)等著作之后，第一部用“社会发展史”概念取代“社会进化史”概念的著作[②]。《社会发展史纲》表现了华岗对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思考，它既是一部社会史著作，更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与此前不久出版的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一起成为当时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社会发展史纲》出版于1940年，是当时的“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生活书店在出版这本书时，对其特点作了如下概括：“一、它肃清了过去国内所有社会发展史读本中的各种错误观点；二、它完整地叙述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生产关系的基本形态，并且不是平面地一一叙述，而是从发展的一般叙述中，更论及中国历史发展具体形态，再加上作者的广博的知识与优美的文体，实为研习社会科学的读者的入门书。”[③]此书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在《社会发展史纲》“自序”中，作者认为：“历史科学是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有力工具。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各国人民大众被奴役和解放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对于鼓舞当时的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过去我们关于社会史一类的书籍太少，而且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一是过去社会史都持进化史观；二是关于五种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形态的叙述，“到现在为止，国内所出的社会进化史或社会发展史，差不多都只讲到资本主义为止”，“把资本主义制以后的历史，完全抹煞了”；三是历史的一般法则是从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事实中，即从世界史之综合的现实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一般编译的社会史，大抵都很少谈到中国，有些虽然提到一下，但都不能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史范围来观察，给以正当的评价。华岗撰此著作就是“想用正确的观点，对人类历史作一全面的分析，以图补救上述三种缺点”[④]。当然，由于战事紧张，缺乏撰写一部完整详细的社会发展史的必要条件，所以只能是一个“史纲”，但是《社会发展史纲》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都是非常可贵的。

其中，最值得珍视的，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强调。华岗一方面申述历史发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另一方面，他更突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这与以往片面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有了明显变化。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论证中国历史的“合法则性”，片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普遍规律，很少留意甚至根本抹煞中

① 参见周来祥、马龙潜：《华岗的美学思想》，《文史哲》1989年第4期。

② 参见叶桂生、刘茂林：《华岗在历史学上的贡献》，《文史哲》1988年第5期。

③ 转引自叶桂生、刘茂林：《华岗在历史学上的贡献》，《文史哲》1988年第5期。

④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武汉：生活书店，1940年，第1－3页。

国历史、社会、国情的特殊性，在运用历史规律解释中国历史时，完全否认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的差别和不同[①]。华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尽管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上一般发展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特别是封建制时期比较长。我们的研究，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②]。“我们应该从中国历史的本身，从中国历史与其周围邻近的民族的相互关系，乃至从它与世界历史的统一过程中，从正面反面和侧面去究明中国历史自己运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发现出构成其发展动力之主导的及从属的诸契机，藉以窥探其现实的动向。”[③]华岗的这一努力，对扭转学术界长期以来片面强调“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的观念和做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华岗重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问题，1949 年后，他则开始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即辩证唯物主义问题。

新中国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为了适应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倾力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1949 年 9 月《学习》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艾思奇发表了《从头学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1950 年，毛泽东又明确指示，知识分子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50 年代初，全国上下很快就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潮。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是当时学习的主要教材之一。在宣传学习中，艾思奇在北京，华岗在青岛同时上政治大课[④]，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大风景、两面旗帜。

华岗的政治大课虽然开在青岛山东大学，但却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这些大课上，华岗从新的历史时代出发，结合新中国建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用简明的语言阐释出来。他的这些哲学演讲由韩长经、王启新等人记录下来，发表在《新山大》和《文史哲》杂志上，其反响之大，可以说轰动一时。后来华岗又将这些演讲汇集成《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

现在看来，《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基本上是一部政治性宣传读物，但它的价值在于记录了华岗在这一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真正能够代表华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的著作则是他在狱中撰写的《规律论》。

《规律论》是华岗的遗著，1982 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著撰写于 1962 年。这是一部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哲学著作。50 年代后期，思想理论界刮起唯心主义旋风，无限放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客观规律可有可无，甚至可以创造条件消灭[⑤]。主观主义思潮已经无法控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已被置诸脑后，结果导致严重社会灾难[⑥]。痛定思痛，60 年代初，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教训，批评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错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报告，从哲学上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认为是由于人们缺乏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号召全党，今后要下大力气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华岗虽然身陷狱中，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十分关注，他响应号召，从哲学和方法论的高度思考“大跃进”以来，中共在制定方针、路线和政策时出现问题的原因。在《规律论》“导言”中，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人把法则（规律）同法律相混淆，有人把规律同原理、原则或规则相混淆，有人把定律同定理相混淆，也有人把仅仅属于自己主观愿望而在客观实际上未曾存在的东西当作规律，有人甚至认为可以随心所欲

① 王学典：《从强调“一般”到侧重特殊——40 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学的动向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4 期。

② 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第 2 卷第 2 号，1940 年。

③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6 页。

④ 参见赵俪生：《我和华岗校长的接触以及我对他的理解》，《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03 页。

⑤ 《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理论战线》1958 年第 9 期。

⑥ 参见杨春贵：《中国哲学四十年（1949 - 198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86 - 87 页。

地创造规律和废除规律，如此等等。为了澄清这些分歧和克服这些不合理现象，有必要对规律问题进行一番较有系统的科学研究”①。从哲学上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救时补弊的意图非常明显。

全书以规律问题为中心，从不同方面详细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系列相关问题，如规律的“本质”、“基本特征”、“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和作用”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规律等。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华岗还设专题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特征和创造性”。有学者说，华岗著“《规律论》是建国以来对规律的哲学思考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20世纪6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规律的研究一个总结”②。

从总体上来看，作为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规律论》在以下几个方面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第一，紧跟时代步伐，反思并力求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规律论》密切关注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关注执政党在这一建设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力求从思想路线上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为政策调整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会出现“大跃进”，从根本上分析，是人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所致。华岗指出，如何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制定纲领政策和正确指导实践活动的科学基础，“一切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想法和做法，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而也就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只有严格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想法和做法，才符合于客观真理，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华岗进而指出：“衡量任何一个改造社会和创造历史的纲领、政策和计划究竟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现实所固有的社会发展规律。”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例外，“社会主义计划化也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其他经济规律，特别是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以及和它们相联系的经济范畴的利用上”④。

华岗的这些论断，对已经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单凭主观意志片面提高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冒险主义做法，无疑是一针清醒剂，但遗憾的是，华岗身处狱中，其观点不能为人所知。熊复在读华著《规律论》后深有感触地说：“华岗身处含冤莫伸的幽禁环境，但他的思想并没有离开我们党的事业，没有落后于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始终在为党取得的每一个成功而高兴，为党遭到的每一个挫折而忧心。”《规律论》体现的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品格，此一品格“不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减弱它的意义”⑤。

第二，将哲学理论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大量材料基础之上，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优秀哲学著作可贵的理论品质。在华岗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具体科学的不断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即在于此。在《规律论》中，他引用大量自然科学相关知识，广泛涉及科学史、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资料。“华岗同志这样做不是简单地为了丰富这部著作的内容，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知识，而是出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的自觉。”⑥华岗深信：“当代的自然科学正经历着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愈加深入地揭示和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自然科学中对于各种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及其进一步深化，乃是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规律的表现。”⑦将哲学研究扎根于自然科学基础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

① 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② 刘仲宇：《马克思主义规律论的重要成果——华岗〈规律论〉初探》，《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③ 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6页。

④ 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6页。

⑤ 熊复：《时代的哲学思索——读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人民日报》1982年6月4日。

⑥ 参见邢贲思：《规律论》“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 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争取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对20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新成果难以潜心研究；解放后，又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教条主义盛行，使得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无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华岗为改变这一现象，在《规律论》一书中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第三，捍卫真理，敢于冲破个人迷信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左"的思想泛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严重时期。执政党虽曾进行过纠"左"活动，但是，由于最高领导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左"的路线上纠正过来，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问题。这样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潮迅速膨胀，以至于把党内不同意见都被看作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华岗对这种人为制造矛盾的错误做法极为不满，但由于失去了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他只能把自己的不满与抗争完全寓于《规律论》的具体行文之中。于是从哲学上关于"差别"与"矛盾"的关系入手，华岗逐层展开他的思想抗争。他说，为了推动事物或现象的进步发展，我们当然不应该掩饰矛盾，而应该揭露矛盾，并从客观矛盾运动本身去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与途径。但是，"如果客观事物或现象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或只有差别而这个差别并未发展成为矛盾，那就不应该无中生有地或捕风捉影地臆造矛盾"①。"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因为差别固然可能包含着矛盾或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导到矛盾即转化成为矛盾，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②华岗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光荣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客观所存在的矛盾，并且按照矛盾本身的性质，采取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去解决矛盾，而不是无中生有地臆造矛盾和随心所欲地去夸大矛盾。一切以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为业绩的思想和行为，都有可能甚至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恶果。"③更为可贵的是，华岗还指出："宇宙间有许多对立面的矛盾，并不是采取一方打倒另一方和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而是长期甚至永远处于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中，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自动调整，就是该事物或现象的生命之所在，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一经停止，该事物或现象的生命也就结束。"④这是当时含冤莫伸的华岗在狱中为捍卫真理，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做法所能作的最有力的抗争。在真理面前，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左"潮肆虐面前，华岗选择了真理，他像当年同王明"左"的思想作斗争一样，敢于冲破个人迷信的束缚，考虑的永远不是个人的安危。

诚如有学者所说，如果仅仅从纯粹哲学研究角度看，《规律论》"在今天是不难被我们的后起之秀超过的"⑤，但华岗的《规律论》是着眼于回答现实社会问题的，作为一部从哲学或方法论高度思考现实问题的著作，其价值却是当代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其他一些纯粹哲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华岗既是中共开国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又是集著名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先驱，在上述各个领域的开拓中，华岗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从更长远的学术史看，华岗的不朽可以说不在于他在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具体成果，而在于他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一道，共同缔造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

这一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左翼范式笼罩文史哲各个领域。在历史研究领域，这一范式摒弃了过去人类社会是停滞的、循环的观念，在进化史观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是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念，相信"有生命的历史，……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

① 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4页。
② 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1－222页。
③ 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4页。
④ 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2页。
⑤ 熊复：《时代的哲学思索——读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人民日报》1982年6月4日。

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①]。从此以后，“社会发展”的观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最基本的预设。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既是这一预设的产物，又为此后社会发展史研究掘开先河。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一范式坚信“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认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②]。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文艺反映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最基本的信念。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深入生活，反映生活，把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经过反映、加工和塑造，形成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此后，“革命文艺”、“大众文学”等无不是这种反映论的产物。在哲学研究领域，这一范式坚信客观规律普遍存在，注重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为规律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中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坚信历史是合规律发展，历史规律是历史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制约人们的历史活动、决定历史基本进程的客观必然性，是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人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但可以发现和利用规律，违背规律必然要遭到规律的惩罚。

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主义学术话语笼罩下，上述观念和思想，自然而然成为文学、史学、哲学三大领域的核心关注，而“社会发展史”、“反映论”、“规律”甚至成为各自学科的符号和象征。从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看，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正是由这三大中心概念所构成。华岗的不朽，正在于他为锻造和诠释这三大概念付出了独特而又不懈的努力！

【附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孙宜山拟以《华岗史学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他给本文写作提供了资料支持，并参与了初稿的讨论工作。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扬 眉]

① 李守常：《史学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1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童书业先生与先秦史研究

## ——任教山东大学期间历史观的转变和学术创新

胡 新 生

**摘 要**:童书业先生从疑古辨伪学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他早年已有的经济史观的思想萌芽不断发展的结果。历史观的转变使童先生的先秦史研究进入新的境界,他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和一些疑古论断作了反思和纠正,对典籍文字、社会历史的感觉变得更加敏锐和准确。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童先生的观点屡有变化,但在这种多变的背后有一种相当执著的不变,即他始终坚持尊重史实的原则和对先秦秦汉社会状况的基本认识。他在考察先秦秦汉社会形态时注重对古代东方史作综合研究,注重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东方"特色,显示出非常开阔的学术视野。童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等著作,将史实考据与历史规律的探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周代宗法、分封、贵族大家庭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创见,为先秦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童书业;古史辨;马克思主义史学

童书业先生(1908－1968)早年是"古史辨"派的重要成员,这时他的先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清理古史传说和破除旧的古史体系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 年 8 月),童先生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开始全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先秦史及相关问题,学术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在此后将近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童先生的先秦史研究始终以探讨先秦时期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等重大历史问题为重点。他在古史分期问题上虽然多次改变意见,但从未放弃和动摇尊重历史事实的基本原则。他还注重把先秦历史问题放到古代东方史的整体背景上加以考察,自觉地运用了中外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童先生善于把史实考据和历史规律的探求结合起来,往往从常见史料和历史细节中发现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他在先秦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提出过深刻独到的见解,其中有关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贵族组织的论述尤为精辟。童先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精神在他生前已享有盛誉,今后仍将对史学工作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一、从疑古辨伪之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童书业追随顾颉刚先生从事古史传说的考辨工作,信奉的是顾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学说,所作古史论文带有浓厚的疑古辨伪色彩。包括他在历史地理、绘画史、瓷器史领域所作的研究,也都明显地受到"古史辨派"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也就是童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之后,他开始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忠实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对中国先秦历史的关注点已从探讨上古神话传说如何分化和层累,转移到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等问题的探讨上面。这种思想变化从外部环境来说当然与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极大的关系,但原因并不仅限于此。从他个人思想的演变脉络来看,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他此前就

**作者简介**:胡新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有的社会经济史观的萌芽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一种自然顺畅的思想转变，而不是突然发生的违背其自我意愿的变化。

据童先生五十岁后自编的年谱《知非简谱》，他在1937年已"开始用经济史观解释历史（表现于《春秋史讲义》中）"①。这里说的"经济史观"指比较简单粗浅的唯物史观。《春秋史讲义》是童先生1936－1937年做顾颉刚的私人研究助理期间为顾先生代写的。1941年他将这部讲义修订为《春秋史》一书，书中的基本思想应是讲义稿中原有的内容。该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开宗明义的小标题为"经济是历史的重心"。文中指出："无论哪种社会组织，都逃不了被经济状况所决定。'经济是历史的重心'这个原则，是近代东西史家已经证明了的，所以我们要讲社会的情形便不得不先讲经济的情形。"②以下分述当时的农业生产、土地分配、农民生活、商业状况、手工业状况、"封建"组织、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奴隶制度、武士制度、世族与世官制度、姓氏制度、婚姻制度和其他礼制风俗。这些论述特别是"经济是历史重心"的观点，与唯物史观者的论述已非常接近。

由《春秋史讲义》向上追溯，可以发现童先生在更早的年代已经受到经济史观的影响。据《知非简谱》自述，1929年童先生"始读五四运动时新书及其以后所谓'国故学'书，心仪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思想为之大变。后又读顾颉刚先生《古史辨》，受其影响最深，复读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受其影响"③。这时童书业刚过二十岁。如果说这段阅读经历直接促成了他接受"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那么后来他用经济史观解释历史也可以从这时找到最早的思想根源。1936年8月，童先生在《唯物史观者古史观的批判》一文中对某些"唯物史观者"曲解史料、滥用概念的做法提出批评，同时指出："用社会分析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方法本不算错，因为他们运用最新颖的知识，把一切死气沉沉的材料都化作活泼泼的，叫人们勘破事实的表面而进一步探求一切历史的核心，这确是很有史学革命的精神的。"又说："我们对于唯物史观是相当承认的，对于唯物史观者研究历史的成绩也是相当钦佩的。"④文章承认唯物史观一派自有"对古史认识比较清楚"的著作，提到的例子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由此可见，1937年童先生用经济史观解释历史并非一时兴到之举，他的这种变化是以此前形成的有保留地肯定唯物史观的思想倾向为基础的。

到20世纪40代后期，童先生一方面仍保持"古史辨"派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肯定经济史观的科学性质和解释价值。他在1946年发表的《"疑古"、"考古"与"释古"》一文中肯定了"释古"一派史学家（指用社会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者）的作用："例如郭沫若的研究古代社会，张荫麟、齐思和等的研究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也都很有贡献，他们所用也多是科学方法，所以能有相当的成绩。"⑤他在运用经济史观解释具体史实方面也更趋成熟。例如他在1948年发表的《春秋战国间种田工具的演进及其影响》一文，从铁器、牛耕技术和水利兴修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讲到赋税制度、土地制度的变化和人口的增长，四千多字的短文已涉及春秋战国间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只是尚未明确使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类的概念而已。与《春秋史》的相关章节对比来看，短文对生产工具进步的论述更为详细，其中有关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变化的观点可以说呼之欲出。将该文与现今流行的某些大学历史教材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相对照，可以发现除了后者更多地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外，两者的叙述结构几乎完全一样。

总之，建国以前童先生的古史研究虽以疑古辨伪为主，但已经开始所谓"释古"性的研究，他的历

① 童书业：《集外集》，童教英校订：《童书业著作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83页。下引童著均用该版《著作集》，只注卷次和页码。

② 童书业：《春秋史》，《童书业著作集》第1卷，第80页。

③ 童书业：《集外集》，《童书业著作集》第7卷，第679页。

④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3卷，第662－663、669页。

⑤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3卷，第767页。

史观已经向经济史观靠拢并处于一个更深刻的转变过程之中。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发生在童先生身上，当时其他一些“古史辨派”学者也在经历着或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变。他们逐渐感到仅仅用疑古辨伪的眼光看待上古历史是不够的，要对古代历史作出正面的描述和解释，就必须吸收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正是由于有前期思想的铺垫，童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后在学术研究上顺利地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他前期思想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其中没有任何勉强俯就或刻意迎合的痕迹。与前期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这时是以自觉、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深刻，运用也更为娴熟。从建国初期童先生写给老师顾颉刚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和对唯物史观的心悦诚服。如 1950 年 7 月 5 日的信谈道：“业近日对于古代生产力、生产关系之研究颇有新见，对于秦、汉社会之研究亦有所获。”1951 年 2 月 5 日致信说：“生一年来所教课半属马列主义，对于马列主义史学之钻研稍具端绪。”同年 7 月 22 日致信说：“惟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始能解决中国历史上诸问题。生深信此言。”[①]又有写于 60 年代的一封信谈道：“此类婚姻制度（笔者按，指春秋时期的烝、报制度）实与财产继承制度有关。……唯物史观所以为真理，此等处皆是最明显之证据。”[②]这些话都是非常诚挚的由衷之言。

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后，童先生对自己早年提出的一些疑古论断作了反思和纠正。例如，“古史辨派”对《左传》和《周礼》两书的评判基本上沿袭了清末今文经学派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刘歆伪造或被刘歆窜乱过的伪书。建国后童先生对这两部书的认识已大不相同。1951 年 5 月 21 日他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对早年信奉的说法作出重要的修订：“最近颇觉《左传》非西汉末人伪造（其纪事部分，战国中年人所为；《春秋》传部分，则似秦、汉间人为之）。”又列举六证说明“《左传》之可信”：(1)所记经济力之幼稚，如未见铁器牛耕史料、人口寡少、土地荒芜、交通不便、商业幼稚、物资缺乏等；(2)疆域范围狭小及戎夷部落杂居；(3)政治之氏族性；(4)战争规模狭小；(5)记载春秋初年与末年的历史形势有明显变化；(6)某些用字与金文相合。此外还从《左传》反映的生产关系方面证明该书的可信：“生产关系，无田连阡陌之富人，亦无贫无立锥之地之贫人，无属庶人之奴隶，无佃农，无雇农，无买卖土地事，只是单纯的贵族与奴隶农民之对立，此皆其保存春秋色彩处。若出后人杜造，必渗入战国以后之色彩。”[③]这一论证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根据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特点来证明《左传》记载的可信性，其说服力要远高于过去那些疑古辨伪的论文。1954 年童书业致顾颉刚的信中，有一封提到对《周礼》的新看法：“生过去崇信今文家说，以为《周官》及《左传》解经语等皆刘歆等所为。近细读《周官》，觉此书颇保存原始史料；即经刘歆等改窜，分量亦必极少。例如《周官》中无铁器、牛耕，甚可异；……王莽反对奴隶买卖，而《周官》中则奴隶可买卖。此皆可证《周官》为战国之书，非刘歆等所创。《周官》中若干制度，至刘歆时已不能解。此书必非汉代之书也。”[④]童先生这时对《左传》、《周礼》的史料价值的肯定，显然比今文经学家过度贬低两书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和真理，而这种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

对于“古史辨”派有关上古神话传说的某些不恰当的推测，童先生也陆续有所订正。他早年很相信“禅让制”是墨家编造而非历史实有的说法，又认为夏朝少康中兴的传说是东汉初年人伪造出来为东汉政权服务的。这些论断特别是后一说法，猜测的成分太多，很难令人心服。1965 年童书业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已不再坚持旧说，他的新看法是：“孟、墨等‘托古改制’也有限度，如果没有古代氏族社会的酋长选举制的传说和古代劳动人民治水的实绩，他们也决造不出禅让故事和鲧、禹治水等某些

①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 3 卷，第 492 页，第 499 页。

②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 3 卷，第 513 － 514 页。此信具体年代不详。

③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 3 卷，第 488 － 489 页。

④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 3 卷，第 501 页。

故事来。即使是少康中兴故事，其中伯明后寒弃寒浞，'家众'杀后羿而烹之，少康为仍牧正，为有虞庖正，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等情节，亦符合古代社会情况，决非汉人所能伪造。"又强调说："《左传》中此两段文字(指记述少康中兴的两段文字——笔者)绝不类东汉人手笔。"①经过唯物史观的磨砺，童先生对典籍文字、对社会历史的感觉变得更加敏锐和准确。这种感觉在深受"古史辨"学说影响的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

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童先生还改变了对先秦社会制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1941年他与卞达人合写的《中国上古的婚姻与恋爱》一文，曾将春秋贵族阶层的"烝"制(即收继婚)表述为"非礼"的通奸乱伦一类行为②。童著《春秋史》也倾向于将其此类关系定性为"非礼"。这一理解显然失准。到建国后，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明显变化，已将收继婚视为一种制度并深入分析了它与父家长制家庭及财产继承制度的关系。

上引童书业1954年致顾颉刚一信，曾对今文家的治学方法实际上也是"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作过一番总体反思："过去轻信今文家之说，而对《周官》及左氏解《经》语实未细加研究；今年龄稍长，成见消除，细读古文《经》、《传》，觉刘歆伪造之说多不可通。但坚信古文者又以为古书不可能窜乱，此亦偏见。……吾人只有平心静气研究，方不致诬古及迷信古人。"此信最后还附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生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史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③对于自己赖以成名、影响广泛的古史辨伪论著，竟不认为是个人"著述上最大之成绩"，而只视为对某种"学说"之补订，这种自我评价不能说完全客观和允当，却反映出一种真实的心迹。它要表达的意思也许是，自己以前的"古史著述"包含很多的"轻信"和"成见"，受今文经学和师说影响太深，在科学性和原创性上都有欠缺，故不能成为自身学术成就中最好的和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后，童先生站在新的高度看待"古史辨派"和自己以前的古史研究④，告别旧说、开辟新境的愿望特别强烈，因此会对早年的古史研究作出这种过于严厉的自我批评。这种心态和认识，在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中间可能带有某种普遍性。包括童先生在内的许多"古史辨派"学者，后来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转变虽是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外部因素所促成，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经过不断反思，自动脱离了原来过于偏激的疑古立场。这是疑古学者们自觉而有理性的自我蜕变。

## 二、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中的求实精神与东方史视野

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这场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区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具体来说是如何认识先秦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作为先秦史专家，童先生踊跃参与古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先后发表多篇长文阐述自己的分期见解，对推动山东大学开展本次讨论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山大历史系名师荟萃，有关古史分期问题的三派主要观点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在教师中都有代表人物和支持者，各派学者时有交锋而不失相互尊重，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凭借超强的学术实力和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山东大学的历史学科确立了在全国高校历史学科中的领先地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无疑包含着童先生个人的一份功劳。

童先生对古史分期的看法有过多次变化。他在《知非简谱》中曾特意记录了这一变化历程。该年谱于1949年下记道："是时主张春秋以上为原始社会，战国秦汉为古代社会(奴隶社会)，魏晋至唐中年为封建社会前期，唐中年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后期(此中国史分期看法萌芽于一九四七年)。"

①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3卷，第507－508页。

②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3卷，第366－367页。

③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3卷，第501－502页。

④ 童书业晚年写有《古史辨派的功过》短文，总结了七条成绩、六条错误。该文收入《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3卷，第843－844页。

1951 年下记道:“改变中国古史分期看法,主张中国封建社会从西周开始,但氏族制残余严重。”1952 年下记道:“改变中国古史分期看法,主张夏殷至春秋为原始奴隶制社会,战国秦汉为发展奴隶制社会,魏晋至唐中年为封建社会前期,唐中年至明中年为封建社会中期,明中年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后期。”到 1956 年,他的分期观点又有变化:“改变中国古史及古代东方史分期看法,主张西周春秋为宗法封建制社会。”①概言之,他的分期观点凡经三变:先从魏晋封建说改为西周封建说,再从西周封建说改为魏晋封建说,最后又回归于西周封建说。

童先生的古史分期观点变化如此频繁,往往使人觉得他立说轻率,如当时就有学者对其观点“善变”一事提出批评。其实他的观点多变不过是一种表象,在这种多变的背后另有一种相当执著的不变。多变主要来自他在理论运用方面的困惑(观点变化的具体契机如前苏联学者观点的影响等等是次要的),不变的则是他对先秦秦汉社会状况的基本认识和尊重历史事实的研究原则。在如何使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概念来为先秦社会定性的问题上,童先生似乎长期处于犹疑当中。他在 1952 年改从西周封建说以后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不敢坚持我目前对于中国上古社会性质的看法,我还有所怀疑。”又说:“我们现在只能证明西周至东汉时代的主要生产劳动者是农民,不是奴隶,至于那时究竟是什么社会,还待展开热烈的讨论。”②这种犹豫和困惑其实主要是由“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本身带来的。限于历史环境,童先生不可能对这一理论有所怀疑,但他已经意识到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人们对指导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很大的问题。他在《“山大”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发言稿》(1957 年)中说道:“山东大学历史系同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史史料的认识,以及史料所显示的历史现象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和所争论的,主要是对于史料所显示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这完全是个理论问题。”又说:“由于山大历史系同人们所争论的只是理论问题,因此魏晋封建论者认为西周封建论者主观上是封建社会,而客观上是奴隶社会。西周封建论者也认为魏晋封建论者主观上是奴隶社会,而客观上是封建社会。这两派对于战国封建论者也有同样的感觉,即西周封建论者认为战国封建论者所说的西周春秋的社会,主观上是奴隶制,而客观上是封建制;魏晋封建论者也认为战国封建论者所说的战国秦汉的社会,主观上是封建制,而客观上是奴隶制。由于他们各执自己的理论去衡量别人的说法,而各人所说的历史现象又都大同小异,所以各人都认为别人在客观上是替自己的主张张目。”③这段在非专业人员看来近乎绕口令的文字,颇能反映当时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所处的理论困境。现在来看,童先生在古史分期说上屡有变化不但无可指责,甚至比执著于某种分期说的做法显得更为慎重和清醒。多变意味着疑惑,疑惑则往往意味着不那么笃信教条。

我们注意到,童先生的古史分期观点虽然多变,但始终未出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的范围。1956 年以前,他一直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徘徊着。他始终不赞同影响很大的战国封建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先秦秦汉社会的基本状况有自己一贯的见解。在上举《问题》和《发言稿》两文中,他对这些基本事实作过总结。他对先秦秦汉时期生产者的身份和主导生产关系的认识大致如下:

(1)从西周到东汉,基本的生产劳动者都是农民而不是奴隶。这类农民在西周春秋时代层层隶属于大小宗法贵族,战国秦汉时代则隶属于专制主义国家或依附于新兴的土地所有者。西周春秋时代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和罪犯,大多在大贵族和官府中服役,只有小部分奴隶从事真正的生产;战国秦汉时代奴隶来源扩大,奴隶买卖盛行且有奴隶市场,私奴隶和官奴隶并存,奴隶总数及从事生产的人数增多,但主要用于工、商、畜牧业,用于农业的不很多。

(2)西周春秋时代,土地名义上属于王有,事实上由各级贵族的宗长和家长所占有。贵族按原来公社的形式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剥削其劳力或实物作为赋税。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土地不

① 童书业:《集外集》,《童书业著作集》第 7 卷,第 685、686、687 页。

② 童书业:《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 4 卷,第 212、220 页。

③ 童书业:《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 4 卷,第 345 - 346、348 - 349 页。

能自由买卖、抵押或转让。战国秦汉时代，农民逐渐占有土地成为自耕农，只向专制国家纳税服役，但自耕农不断分化，沦为佃农、雇农或债务奴隶。农民的土地已可以自由买卖，土地逐渐集中，租佃制发展，大部分农民被逐渐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依附性很强的农奴。

从以上第一点很容易推导出曾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结论，即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社会。这正是"史料所显示的历史现象"，是很难否认的历史事实。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要尊重这个事实而又不至于背离"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只有魏晋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可供考虑，因为这两说至少都不承认先秦社会有发达的奴隶制，就此而言它们都比战国封建说更接近真实。童先生长期在两说之间徘徊而未改从别的说法，原因或在于此。他最终将西周春秋时代定性为早熟的宗法封建社会，放弃了把汉代视为"发展的奴隶制社会"的说法，恐怕也是因为此说仍不符合"从西周到东汉，基本的生产劳动者都是农民，而不是奴隶"的历史事实。此外，春秋战国之际原始的公社组织还处于逐渐解体的过程中，农民对土地尚不能自由处置，租佃关系十分微弱。战国封建论者说这时有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又认定西周是发达的奴隶制社会，都未免与历史事实相差较远。这应当就是童先生始终不赞同战国封建说的根本原因。

童先生1954年所作《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一文提到："解放以后，我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看法屡有改变，然而所依据的史料仍旧是过去所搜集的那些，因此往往不能证明我的新看法。我所以迟迟不肯发表我的新看法，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现在所写的这篇文字，只能看作是一个世界古代史教师对于中国古史的一种见解，离开真正的结论自然很远。"[①]从史料及"史料显示的历史现象"出发探讨先秦秦汉社会的性质，这是童先生始终坚持的研究原则。他的观点频繁变化其实只是在反复选择反复调整社会分期的概念，并未因此改变他对基本史实的认识（虽然后期对史实的研究不断深化）。海外某些学者谈到大陆史学界的古史分期讨论常贬之为"削足适履"，这个批评不能说全属偏见，但用在童先生身上实不恰当。如果非用比喻不可，毋宁说童先生的研究更像是在为人挑选礼帽——他认为魏晋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两顶帽子尺寸较合，为此来回掂量，反复尝试，故而表现得举棋不定，但他从来没有为了适合概念的冠冕而去损伤史实本身。在概念化的史学观念特别流行的时代，这种犹疑和多变对于一个早就具有怀疑精神并接受过辨伪训练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它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个人感觉的忠实，以一种非常个性化的形式体现了纯朴的学者本色。

童先生的古史分期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始终将先秦秦汉社会性质问题置于古代东方史的广阔背景上来考虑。从1952年到1959年，童先生连续担任世界古代史课程，编写出版过《古代东方史纲要》一书，所以他有时称自己的分期观点"是一个世界古代史教师对于中国古史的一种见解"[②]。他对古巴比伦的社会形态作过深入研究，写有多篇论文讨论古巴比伦的租佃制度、隶属农民身份、奴隶地位、家族形态等问题。在参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众多学者中，像童先生这样具有东方史视野的学者并不多见。

童先生曾说："我们讨论巴比伦社会的性质，是想帮助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尤其是想帮助解决战国秦汉社会性质的问题。"[③]从事巴比伦社会的研究对他认识先秦秦汉社会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方面：(1)特别重视先秦秦汉社会的"东方"特色。他在《从古代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东方社会"的特性》一文中将古巴比伦社会的特征总结为六点，即：公社制残余的遗留；自由人受剥削严重；奴隶形态比较缓和；专制主义政权形成；官僚机构庞大；存在类似"封建"式的生产关系。他认为这六点也可以视为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殊形态。依照这种认识考察先秦秦汉社会，则必然对其不同于西方古典式"古代社会"的特殊性给予高度的重视，由此也必然导向否定西周为发达奴隶

① 童书业：《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4卷，第249页。
② 童书业：《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4卷，第249页。
③ 童书业：《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4卷，第435页。

制社会的魏晋封建说或西周封建说。(2)特别重视西周春秋时期的“封建”关系。他最后确认西周春秋为宗法封建制社会,与研究巴比伦的社会形态有直接关系。1956 年他发表《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一文,将一般认为是奴隶社会的古巴比伦定为初期封建社会。这篇论文从题目看似乎与中国史关系不大,但文章的前言部分为“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谈起”,后言部分为“归结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是一篇借石攻玉的论文——重新考虑巴比伦的社会性质是为了连带论证西周春秋是早期封建社会。他认为:“中国和巴比伦的古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如果巴比伦还是奴隶社会的话,不但中国的汉代是否封建社会成问题,甚至连唐代是否封建社会都成问题了”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单纯就中国史论中国史的学者明显不同,它强调横向比较和通盘考虑。巴比伦和中国先秦秦汉时期是不是“封建”社会可以讨论,但童先生提出的两者的社会状况多有相似,确定其中一个社会的性质时不能孤立分析的见解,确有独到之处。

有关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一场现代史学意义上的讨论,它虽然存在历史局限,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讨论所达到的总体水平,包括学者们对先秦秦汉社会的认识程度,对经济发展、公社残余、土地制度、奴隶制度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深度,都远非旧史学旧史家所能企及。只就童先生对照巴比伦研究先秦秦汉社会这一点来说,现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学者也未必都能有这样的高度和深度。今后的同类研究只有充分吸收这场讨论的既有成果,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和超越。

## 三、史实考据与历史规律的探求相结合

建国以后,童先生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积极参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他的先秦史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形态研究和社会制度研究方面。他对先秦史实的分析都是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仍然常作历史考据,但这已是社会史眼光透视下的新式考据。童先生这一时期的先秦史研究成果集中在他晚年写成的《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该书的主要部分《春秋左传考证》二卷,以札记的形式探讨了先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分为古史传说之部、西周史之部、春秋史之部、西周春秋制度文化之部、春秋地理之部,同时讨论了《左传》文献学和春秋时期农业、阶级及伦理观念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童先生对自己一生研究先秦史的心得所作的总结。“这部著作的卓越成就,在于它突破了旧式考据的樊篱,将西周春秋典章制度的考据建立在对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在联系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②顾颉刚 1973 年审阅这部书稿后说过,童书业“以他最强的记忆力和最高的理解力,结合清代的考据资料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能自创新格成此伟著,超轶前人,为二十世纪的一部名著”。该书 1980 出版后被不断引用,影响广泛,至今仍是先秦史专业教师和研究生的必读书之一。

《春秋左传研究》和相关论文对西周春秋时期社会组织和典章制度的论述最为精深。诸如有关西周春秋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论述,有关西周春秋贵族基层组织的论述等等,都极富原创性和概括性,对于先秦史研究者将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制,童先生认为它实质上是父系氏族家长制,是氏族公社制的一种演变形式。周代宗法制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小宗的划分维护族长统治特权,以长子继承的规定维护长子继承特权。嫡庶之制是父系家长制的特征,它是随宗法而来的,并非宗法随嫡庶之制而产生。周人的嫡庶之制并不如王国维所说是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相反,周代天子诸侯继统法是按嫡庶之制来规定的。在宗法制形成以前,随着人口增多,氏族不断分化出若干支族,从氏族、胞族、部落到部落联盟的的制度已经完成;宗法制度兴起后,社会组织的重点或基层移到家长制大家庭,此后即按大宗、小宗的系统分化下去。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扩大成政治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周等于一个部落

① 童书业:《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童书业著作集》第 4 卷,第 308、366 页。

② 徐鸿修:《童书业》,《先秦史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347 页。下引顾颉刚信即转引自该文。

或部落联盟，它的本支和它分封的国家都等于胞族，例如鲁国的姬族就是一个胞族；鲁国姬族所分出的支庶如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就是氏族的组织。这些氏族的本支称为“大宗”，分支称为“小宗”。就每一大宗或小宗而言，就是一个家长制大家庭，如晋国的赵盾、赵穿两家就是两个家长制大家庭。这些大家庭中又包含若干个体家长制小家庭。所谓宗法制，就其基层的大宗、小宗说是家长制大家庭，就其整个家族和整个宗法系统说，又是氏族及其上层的胞族、部落等组织。童先生指出，单纯从宗法制或等级制来讲，不能说明社会性质，关键应看它们与哪种生产关系相结合①。

他还对西周春秋和魏晋南北朝宗法制度的异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将两者的相异点归纳为：(1)前一时代的宗法制比较偏重血缘，后一时代的宗法制比较偏重地域；前者的氏族性较强，后者的封建化更深。(2)前一时代的宗法制和原始公社制的残余相结合，公有制的色彩比较浓重；后一时代的宗法制和早期庄园制相结合，所有制的色彩比较浓重。(3)前一时代的宗法制和封建领主制相结合，层次系统比较清楚；后一时代的宗法制和封建地主制相结合，层次系统比较混乱。(4)前一时代的宗法制扩大成为政治系统，后一时代的宗法制扩大成为社会等级。(5)前一时代的宗法制的婚姻形态比较原始，后一时代的宗法制的婚姻形态比较接近一夫一妻制②。这个概括全面、准确，已成为学者公认的经典性论述。

关于周代的分封制，童先生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指出：‘天子建国’，盖主要为周初事，即普通所谓‘封建’。其后天子之亲族愈众，无甚多之土地封之，则以为‘内诸侯’、王室大夫，或甚至下降为士矣。‘诸侯立家’，周初自亦有之，然大家之立，当在西周晚期诸侯国渐大以后。在此以前，诸侯之亲属或有分为附庸者矣，如鲁有沈子(见金文)。……自西周晚期以来，诸国出现卿大夫之大族，大致迄春秋中叶，是‘诸侯立家’之时矣。……春秋初，卿大夫尚罕闻置‘侧室’、‘贰宗’；至春秋中叶，卿大夫之族强大，乃多置‘侧室’与‘贰宗’焉。”③一般对西周春秋分封制的认识，往往以为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士是同时代进行的同一平面的活动，童先生则把《左传》所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和序列。也就是说，周代并非一开始就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层层分封，诸侯以下的分封是随着下级宗族势力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扩大的。

童先生列举了大量史实来说明分封制逐次发展的历史层次，他的观点确能开人心智而又有很强的说服力。此说的提出，与他接受过“古史辨”的训练，擅长分析史实的演变脉络也是分不开的。

关于西周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宗族组织结构，童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世族制”条等论著中有详尽的分析。他对春秋时期“室”的特定内涵的揭示，充分显现出过人的识力，最称精彩。他指出，春秋时期贵族组织可分为族、宗、家、室等不同的级别或层次，“室”是其中的基本单位。这个“室”与一般士庶人阶层的“室”大不相同，有其特殊意义。“室”是当时宗法贵族的奴隶制大家庭，是构成“族”的基层性的组织。有些贵族逃亡异国时“尽室以行”，但他所属的“族”仍在原国，政敌消灭他的“族”之后会瓜分该“族”中另外的“室”。这种父家长制大家庭，如果家长去世后继承人幼弱，可由同宗贵族和本“室”中的家宰代行治理之权。“室”的主要财产是土地，还包括“妻孥”、大家庭成员、臣僚、“仆庸”、奴隶等。各“室”中的土地，除来自上级贵族的封赐外，还有本“室”臣隶等人开垦的新土地。“室”所掌握的土地等财产为奴隶制大家庭私有性的财产，所以有些贵族在将上级贵族封赐的邑交还后，仍能维持生活并保持贵族身份。“室”的范围虽然较小，但它是当时宗法贵族能比较自由地支配的财产和人力，所以“室”的富裕可以作为其上层的“家”或“宗”的基础。大贵族的“室”设有管理者“室老”，又称“家宰”，是“室”中地位最高的家臣，其下还有各种臣属、隶仆。春秋中叶以来，大贵族的

① 以上关于宗法制的论述主要见于童著《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两文，又见《春秋左传研究》“宗法制与分封制”条、“世族制”条，分别收入《童书业著作集》第4卷、第1卷。

② 童书业：《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童书业著作集》第4卷，第461页。

③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宗法制与分封制”条，《童书业著作集》第1卷，第430－431页。

家宰有的也有封邑、有私属甲兵，是低级的世袭贵族，个别权势强大的家宰甚至可以干预国家政事和其他贵族的家政。在考证“室”的内涵时，童先生能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又能与古代东方史上的同类历史现象相参照，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式考证的范例。他在论证“室之主要财产为田”时列举了《国语》中“室”、“田”通称的例子。《国语·晋语六》记载时人批评晋厉公：“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后句反问意为，那些被夺田的大夫、诸臣，能有几人甘心弃“室”退避而不作乱？下文又说到晋厉公最终“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由此可见“室”的主要财产就是“田”。

童先生为说明宗、家、室的关系，曾举《国语·晋语八》所记韩宣子“忧贫”、叔向“贺之”一事为例。韩宣子自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言中透露忧贫之意，叔向列举“栾武子无一卒之田”（百顷）而德名远扬，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但身戮宗灭的事实，劝解说：“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韩宣子时为晋国正卿，《左传》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每县可出百乘兵车，韩宣子至少拥有一县而为“百乘之家”，他怎么会为没有“一卒之田”而忧贫呢？童先生认为，由此正可看出贵族宗、家、室的不同。“韩赋七邑，皆成县也”是指韩氏全“宗”的土地，韩宣子之“家”为“百乘之家”，“无一卒之田”则是指宣子之“室”而言，这是他本人能比较自由支配的基层大家庭的财产。按当时的规定，“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五百顷），上大夫一卒之田（百顷）”，韩宣子之“室”尚未达到“一卒之田”的标准，所以他说自己“有卿之名而无其实”，因此而有忧贫之意。同以贫俭著称的栾武子也曾是晋国正卿，栾氏世为晋国大族，栾武子之宗、家绝不可能仅有几百顷土地，所谓“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同样应是特指栾武子本人的禄入和一“室”财产而已。与此同理，所谓郤昭子“其富半公室”，是指其“室”之财富；“其家半三军”是指其“家”而言；整个郤氏之“宗”则包括拥有“五大夫、三卿”的“八郤”在内。童先生据此论断：“是皆足证左氏及《国语》之文不误，而‘宗’、‘家’与‘室’有不同也。”①

基层的父家长制大家庭“室”包括土地、家属、奴隶和各类“器用财贿”在内。为说明这一点，童先生对古代文献中“奴”（奴隶等）、“孥”（家庭成员等）、“帑”（财产）三位一体、可以互称的现象作了详尽的分析。他的论证使用的是清代训诂家常用的论证方法，但论证的目的却是揭示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因而明显表现出现代史学家更高的学术境界。在另一篇论文中，童先生还对西周春秋时期的父家长制大家庭与古罗马的大家族作了对比：“这种‘宗法’的大家族，实际上是和罗马的大家族完全相同的。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归纳起来：罗马的‘家族’一个名词应当含有三种意义，就是：（一）家族，（二）财产，（三）奴隶。家族、财产和奴隶三位一体地构成罗马的‘家族’。……中国古代的‘孥’（家族）、‘帑’（财产）、‘奴’（奴隶）三个字，也只是一个名词的分化，这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宗法’大家族是一种和罗马家族一样的奴隶制大家族。”②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童先生对具体史实的考据已经完全超越了单纯解析历史语言文字的层面，他的考据因为有了唯物史观和世界史眼光的烛照而能洞彻幽微，直抵本质。

同《春秋左传研究》一样，童先生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七子思想研究》等著作无不体现了他“在学业上的深厚功力和创造精神”③。童先生以他“对先秦史料的丰厚基础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新意纷陈，今天看来，仍旧是具有生命力的”④。作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山东大学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童先生的研究成果和他的治学精神将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永远给后学以启迪。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①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世族制”条，《童书业著作集》第1卷，第464页。

② 童书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童书业著作集》第4卷，第257－258页。

③ 王仲荦：童书业著《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初版序言，《童书业著作集》第4卷，第492页。

④ 方诗铭：《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序，《童书业著作集》第4卷，第484页。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韩连琪先生与先秦秦汉史研究

胡 新 生

**摘 要**:韩连琪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先秦秦汉史专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韩先生一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教书育人、奖掖后学,为山东大学历史学科特别是先秦秦汉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永不磨灭的杰出贡献。韩先生治学,注重宏观把握历史和贯通的理解,注重构建学说系统,不赞成搞支离破碎的繁琐论证,更不赞成在学术研究中刻意追求新巧。他的论文侧重于对历史发展大势作纲领式的描述,特别强调历史解释的系统性,犹如正面作战的大军而无游击之气。《先秦两汉史论丛》收入的文章,分开来看是对某一时期某一专题的论述,综合来看则都有他对先秦秦汉社会形态的看法贯彻其中,深为研究者所推崇。

**关键词**: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基金

韩连琪先生(1909－1990),字东生,山东省安丘县(今安丘市)人。1931 年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师从闻一多、梁实秋、游国恩、王统照、丁山等著名学者,学习成绩优异。大学时代后期,在古文字学家和史学家丁山先生的指导下系统整理周代金文,为后来从事古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5 年毕业后,任安丘县县立中学校长。1937 年曾短期转任山东省中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初期,韩先生积极投身抗日,担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部所办《阵中日报》总编辑,撰写和编发过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1940 年 9 月至 1947 年 1 月,先后任中学教员、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47 年 8 月至 1951 年夏,历任山东师范学院、华东大学教育学院、齐鲁大学历史系等校讲师。1952 年国务院实行高校院系调整后,韩先生转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山东地方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地方志》和《管子学刊》编委会顾问等职。

韩先生的先秦秦汉史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研究成果均以论文形式发表。1986 年,他将建国后撰写的主要论文结集为《先秦两汉史论丛》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这部论文集可以代表他在先秦秦汉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韩先生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赋税徭役制度和社会形态最为关注,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这些重大问题而展开。他对先秦时期的农村公社制度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对两汉时期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对汉代租赋徭役制度的研究,对睡虎地秦简《编年纪》的考证,都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趋势的大家风范和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精熟,对先秦秦汉史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一、关于先秦时期农村公社制度的论述

《先秦两汉史论丛》收入的《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和《春秋战国时代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和农村公社的解体》两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古代东方社会的理论,分析周代农村公社制度逐步演变直至解体的历史过程,立论宏大,自成体系。

**作者简介**:胡新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韩先生认为，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属于马克思所说古代的亚细亚形态，先秦文献所说的井田制度就是古代的农村公社。井田中的生产者“庶人”，身份是农村公社成员，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公社的统一体人格化的那个人的奴隶”①。这时的公社土地，虽名为公社所有，实际已全归王有或国有，公社农民虽然通过自己所属的公社分配得一块“私田”，但是他们对土地不仅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而且还存在着“换土易居”的定期分配制度。与这种土地所有制适应的剥削方式是“同养公田”的助法，亦即籍法。西周末年周宣王“不籍千亩”，标志着周王畿内籍田制的废止，意味着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发生了变化——公社土地由定期重新分配变为个体农民永久占有，“同养公田”的助法变为“履亩而税”的彻法。

到春秋时期，列国相继发生类似的变化，如齐国有“相地而衰征”，晋国有“作爰田”，鲁国有“初税亩”等。这时各国公社的土地才陆续由定期分配发展到农民永久占有，税收制度也由助法变为彻法。由于剥削单位由公社变为公社的每一个成员，所以在各国都普遍地建立了户籍和“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的书社组织。对于东周时代“书社”的性质，韩先生作了重点考察。他认为书社是西周末期以来随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变化和户籍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晚期农村公社组织。他列举了与籍田制的废止和户籍建立相伴出现的历史事实，如周宣王“不籍千亩”之后即“料民于太原”，齐国“相地而衰征”后有“正户籍”之举，晋国“作爰田”后官府常掌握“户数”，秦国“初租禾”之后又“初为户籍”等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上，春秋中叶以后齐、越、楚、秦等国普遍建立了书社组织，此后各国诸侯封赐土地，也普遍由井田改为以书社为单位。由于战国中期以前各国仍存在授田制度，土地还不能买卖，所以书社的性质应定为晚期农村公社。战国中叶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农村公社组织趋于解体。到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第二次变法，便“为田开阡陌”，在战国时代的各国中首先彻底摧毁了井田也就是农村公社制度。战国末年，土地已由私有而逐渐买卖，土地兼并开始出现。丧失土地的农民有些沦为雇农和佃农，有些沦为债务奴隶。韩先生强调指出，战国中叶以后，随着债务奴隶的出现和官府奴隶的增加，中国的奴隶制度不但没有萎缩而是向前发展了。大量的奴隶被投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领域，奴隶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比以前更为广泛和普遍。

韩先生还指出，战国中叶以后土地虽已开始私有并可自由买卖，但土地兼并直到战国末年还不剧烈。各国政府这时还掌握有大量公田，授田制度还未尽废。土地的私有和可以自由买卖的法典化，要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使黔首自实田”以后才告完成。

关于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问题，史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学者对先秦存在农村公社的说法相当抵触，认为如此强调商周时期社会组织和土地关系中的“公有”成分，有将商周社会“原始社会化”之虞。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战国以前，原始的共同体组织普遍存在，社会基本经济单位不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家庭，而是包含了很多小家庭的公社组织。个体家庭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尚未形成，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和在份地上的劳动有明确区分。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至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公社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家长制家庭公社，还是失去血缘联系的地域性的农村公社，则不能一概而论。很多被征服者的社会组织因“坠命亡氏”而变成比较松散的地域性共同体即农村公社，而贵族阶层则更多地保留了血缘共同体的外壳，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并不矛盾。无论是哪一种性质的共同体，只要它们还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社会的基本构架，只要个体家庭还不能冲破这些共同体的束缚而获得独立，这种社会就必然带有很强的原始性，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奴隶制和地主制。从这种意义上说，韩先生以及其他很多学者对先秦农村公社的论述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在“先秦农村公社说”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判断，即战国以前个体私有的发展程度很低，因而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也不能估价太高。战国以前的很多制度直接从原始社会承续、蜕变而来，新

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页。

的文明因素与旧的社会制度杂糅在一起，这正是所谓中国特色。先秦社会大量夹杂原始成分，这不是应该不应该、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历史事实。从某一特殊角度拔高先秦社会的发展水平，殊无意义，犹如硬说中国现代某一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超越同时期的发达国家或者和这些国家同样发达一样。有人认为：战国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发达的宗族奴隶制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全部处在宗族体系之中，又否认井田是一种土地分配制度，而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土地面积的计算方法。此说对统治集团的宗族性和宗族国家形态的描述比较可信，但完全否认农村公社的存在，则未免流露出一种"中国发达情结"，对史实的认识不无偏差。两相比较，笔者认为韩连琪先生的论述更接近先秦社会的真实面貌。

## 二、对汉代租赋徭役制度和户籍、上计制度的研究

1956年，韩先生在《文史哲》本年第7期发表《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一文，全文近4万字，对汉代租赋徭役制度作了细密的考证和全面系统的说明。有关这一课题，虽经历代学者反复研究，但仍然存在很多疑问。如汉代田租征收的数量、标准，是实物还是货币或布帛的问题；算赋、口钱的用途，献赋、军赋是否算赋、口钱以外的赋收问题，户赋在汉代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徭役方面的更卒、践卒、过更、更赋的问题，正卒是轻车、骑士、材官、楼船，或是卫士，或是包括在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和在京师的卫士、边境的戍卒的问题；以及征收算赋、口钱的年龄，更卒、正卒服役的年龄和期限等问题。韩先生的长文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深入的分析。论文的主要结论为：

(1)自汉景帝二年(前155)后三十税一，迄东汉之世未有很大改变(个别阶段有些小的变化)。所谓三十税一，并非按每亩收获物的实际产量为标准，而是按田亩"较数岁之中以为常"的产量，由政府按三十税一折合的统一赋额——每亩约为三升——来征收。田租的征收以谷物为主，间或有货币或布帛；与田税同时征收的刍稿开始也是征收现物，后来则改为征收货币。

(2)算赋用于军事，"人百二十钱为一算"的定额可能始于汉武帝时。所谓军赋、献费，系汉武帝以前算赋制度尚未统一时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算赋，郑樵、徐天麟、沈钦韩、劳干等认为献费是算赋口赋之外另一种税收的说法难以成立。算赋是计口征收的成丁的人头税，口钱是未成丁的儿童税，此外并未通行所谓户赋，马端临等以为口赋之外另有户赋是一种误解。算赋、口钱一般都是缴纳货币，个别情况下也征收谷物、布帛或铁。

(3)汉代人民每年要服一个月的徭役，是为更卒，一般在地方服杂役。亲自担任更卒的为践更，出钱雇人代替为过更。过更钱的多少视当时物价等情况而定，一般为三百钱。此外，汉代人民一生要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一年在郡国担任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地方兵；一年作为京师卫士或屯戍边境。难以亲任正卒者须出钱雇人代替，交纳更赋，更赋即正卒的免役钱，后来成为汉政府的一项正式的税收。

对汉代租赋徭役制度的认识之所以存在分歧，主要是由于历史记载比较简单模糊。如何从这些有限的记载中得出恰当的结论，是对史学家学术识力的一种考验。例如，论及汉代徭役兵役的资料中，以《汉书·食货志》所载董仲舒语"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一条最为重要，但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和标点大不相同。

日本史家滨口重国将此条断句为："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照此理解，"屯戍"即不包括在正卒之内。不少史家据此说解来谈汉代的徭役，认为正卒仅为材官、骑士之称，而卫士、屯戍则均非正卒。可是问题在于，东汉卫宏的《汉旧仪》中也有一段与董仲舒语相似的说法："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无"而以"二字)，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韩先生指出：古人文辞简质，我们如果单就董仲舒的话来说，像滨口重国这样读法，自然也无不可。但这样一来对于《汉旧仪》的话便无法讲通。

劳干曾把《汉旧仪》的话断句为"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

战阵”，这在文理上就难说通。况且《汉旧仪》所说的“习射御骑驰战阵”，分明是上承卫士和材官骑士两项而言，而京师的南北军即卫士，同地方上的材官骑士一样都要“岁时讲肄修武备”。若如劳干氏的断句，则是习射御骑驰战阵的只有材官骑士，卫士即不必岁时讲肄修武备，这显然不合事实。因此，我们便不能不以钱子文《补汉兵制》所说“正卒，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一岁”为正确的论断。董仲舒所说的“屯戍”应即《汉旧仪》所说的“卫士”，“力役”即《汉旧仪》所说的“材官骑士”的泛称。在这里，韩先生强调的是，理解董仲舒的话同时要照顾到卫宏的叙述，而对汉代人的记载不可作生硬的解释。他的思考更为全面，论证也更有说服力。

《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一文，至今仍是研究汉代租赋徭役制度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该文局面之宏阔、研究之深入、考证之精确以及立论之平正通达，深为汉史研究者所推重，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汉代制度史领域最好的论文之一。

韩先生对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也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一文中，对汉代户籍制度的建立和户籍登记内容，上计的时间、程序、相关官员和机构，汉代户籍制度的兴废与土地兼并、农民流亡和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中不乏对具体问题的考辨，如对两汉上计官员变化的分析就特别细致。论文指出，西汉时代郡国的上计都是由守丞、长史来担任，这有《汉旧仪》、《汉书·黄霸传》等书的记载为证。那时的上计吏只是随同守丞、长史到京师上计，《汉书·朱买臣传》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汉旧郡国丞、长吏(史)与计吏俱送计也”，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到东汉时代，上计吏包括上计掾、上计史、上计佐等才成为郡国上计的专吏。《汉书·严助传》颜师古注引如淳说：“旧法，当使丞岁奉计。”所谓“旧法”，即指西汉制度，盖以有别于东汉的制度。据此可知杜佑《通典》所说“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只是东汉的制度，不足以反映西汉时代的情况。

## 三、有关睡虎地秦简《编年纪》的考证

韩先生十分重视考古学资料在先秦秦汉史研究中的意义，他在论及汉代户籍制度、土地价格、奴隶价格和官府奴隶时就多此使用过出土简牍资料。20 世纪 70 年代，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一批竹简，内容多为法律文书。其中 11 号墓出土一种《编年纪》，共简 53 支；记秦昭襄王元年至始皇三十年统一前后的一代大事，其体例略同于晋代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1976 年 4 月，《编年纪》释文在《文物特刊》和《光明日报》刊出后，韩先生当月即根据释文撰写了考证文章，但考虑到未见原简，初稿写成后未即发表。1979 年《睡虎地秦墓竹简》出版，韩先生根据该书图版和释文，对初稿作了修改。这篇文章到 1981 年才由《中华文史论丛》发表，题名为《睡虎地秦简〈编年纪〉考证》。

《考证》一文，以《编年记》中的简略记事与《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相对照，补正旧史旧说的缺漏与讹误，显示出对战国史事的纯熟和深厚的考辨功力。文中所作推测多具特识，一些观点已为秦汉史学者广泛接受。例如，《编年纪》于秦始皇十九年列有“南郡备敬(警)”，二十年列有“韩王居某山”(原文“某”字处文缺)，二十一年提到“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二十三年提到“昌文君死”(原文“昌”字缺)。这些简短的记载隐伏当时秦楚战争中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秦对楚国的统一过程充满艰难曲折。昌平君是秦楚战争中相当重要的人物，但传世文献对他的记载多有讹误。韩先生对昌平君的身份作了详细的辨析，以充分理据纠正误说，考证十分精彩。兹将其主要文字移录于下：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一年，“新郑反”。韩王安之死，当即由于新郑之反秦。昌平君，史佚其名。《春申君传》《索隐》以为系楚考烈王之子幽王之庶兄：“按，楚悍(即楚幽王——笔者)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是楚君完(即楚考烈王——笔者)非无子。”(昌平君)可能在考烈王死，幽王立后奔秦。秦王政九年，曾受秦王政命定嫪毐之乱。《始皇本纪》秦王政九年，“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按，《索隐》说误。秦自武王以来，置左右丞相，其为王特见信任者，则特置一相国，故《历代职官表》以“始皇尊吕不韦，为

特置相国，则相国在丞相之上”。秦王政立后，吕不韦以立庄襄王功以丞相尊为相国，固无别置相国之事。昌文君之立为相国，既不见于史，其后徙居于郢，亦无免相之记载。《索隐》谓昌平君曾“立以为相”，盖误读《始皇本纪》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为“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梁玉绳谓“《始皇本纪》书昌平君先为秦相”，盖又沿《索隐》之误。嫪毐叛乱时，吕不韦与嫪毐关系事尚未发，故秦王政令相国吕不韦与昌平君、昌文君共定嫪毐之乱。昌平君固无立为相国之事。其在秦，他事亦俱不详，其被徙于郢，亦不详其原因。《始皇本纪》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编年纪》谓秦王政“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即指“昌平君徙于郢”而言。韩王安于韩亡被掳后，史不详其以后事。据此，知韩王安于国亡身虏后，被置于郢之某山。其后韩贵族复以新郑反，事败后韩王安亦死。所谓“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即指韩王安死后，昌平君即被徙于韩王安所居郢之某山。郢，即鄢郢，非郢陈。《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是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徙于郢时，陈尚为楚地，可证昌平君之徙于韩王所据之郢，决为鄢郢，而非郢陈（韩先生认为鄢郢为南郡郡治，在今湖北宜城——笔者）。

以上考证所说鄢郢地点一事，学者尚有不同看法，但关于昌平君未曾担任秦之相国一说则可视为定论。笔者注意到，1989年有史学家撰文探讨“张楚”的历史地位问题，对战国末年秦楚战争的复杂局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其中论及昌平君的作用和身份时，援引过1988年《文物》所刊一文关于昌平君未曾担任秦之相国、《史记索隐》对《秦始皇本纪》原文理解有误的说法。其实韩连琪先生1981年已发表此说，考证之详密使问题已无余义可求，至于韩先生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1976年）就更早了。

## 四、注重宏观把握历史，注重构建学说系统

韩先生的著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特别注重对历史作宏观的把握和贯通的理解，特别强调历史解释的系统性。他的论文侧重于对历史发展大势作纲领式的描述，犹如正面作战的大军而无游击之气。除了《睡虎地秦简〈编年纪〉考证》一文外，他没有专门写过对具体问题的考证文章，他更愿意把史实考辨融入到对重大历史课题的探讨当中。韩先生治学的这一特点，在他对先秦秦汉历史作纵向考察和横向考察时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韩先生对先秦到秦汉时期社会形态的演变有通贯、系统的见解。上文提到的《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和《春秋战国时代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和农村公社的解体》两文，观点一脉相承，前后呼应，实际上是论述先秦农村公社制度发展演变的姊妹篇。另外两篇长文《西汉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和《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庄园制的兴起》，则是论述汉代社会变迁的姊妹篇。这四篇文章对先秦到秦汉时期社会演变的线索作了清晰的勾画，构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古史体系。韩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都有自己的意见。他本人比较倾向于魏晋封建说，他对先秦秦汉社会制度演变的描述也贯穿了这种见解，虽然在论文当中并未对这种分期主张作明确的表述。在《先秦两汉史论丛》一书的“后记”中，他对此作过说明：

> 我认为我国从夏代少康和杼以后，一直到商、西周、春秋时代，是低级的奴隶社会。对战国，我虽然没有明确说到它的社会性质，但我强调了这一时期作为农村公社的井田的破坏，奴隶制的发展，并认为在战国时代，封建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形成。这实际已等于说战国时代的社会性质，是属于具有我国特点的发展奴隶社会。对两汉时期，由于我只是单纯的论述它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具体史实，西汉时，我只强调了这一时期奴隶的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东汉时，我强调了庄园制的形成，客的身份的低落，徒附与部曲的出现，乃是一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并说到庄园的这种封建组织，客与部曲和庄园主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到魏晋南北朝时，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难看出，我是倾向到魏晋南北朝时，我国才进入封建社会的。对两汉时代，我之所以没有明确说到它的社会性质，这是因为我觉得两汉的情况较复杂，它既广泛地存在着奴隶制，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已存在。因此我在写两汉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时，实际也只是企图把这一时

期的历史实际能如实地描写出来。至于它究竟属于什么社会性质，还有待我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作进一步细致深入的研究。自然也希望有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

古史分期讨论对当时学者的正面影响之一，在笔者看来是培养了一种良好的风气或习惯，即追求古史见解的系统性。要讲通夏、商、西周、春秋，必须连带讲通战国、秦汉乃至魏晋。必须形成所谓"一套"看法而不能单单着眼于某一时段。在这方面，韩先生的研究即为佳例。他的论述真正做到了自成体系，特别是他对先秦社会发展线索的梳理——土地定期重分变为农民永久占有、"同养公田"的助法变为"履亩而税"的彻法，可以说自具特点，与其他魏晋封建论者的表述并不完全相同。

韩先生的古史见解的系统性还表现在，他把对先秦秦汉社会形态的理解贯穿到对当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的认识上面。《先秦两汉史论丛》中的文章，分开来看是对某一时期某一专题的论述，综合来看则都有他对先秦秦汉社会形态的看法贯彻其中。例如《论春秋时代法律制度的演变》一文（原刊《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开篇指出："在春秋时代，随着农村公社的井田土地之由定期分配到永久占有，田税之由'同养公田'的助法变为'履亩而税'的彻法，宗法分封制与世族世官制的衰落，郡县制的陆续形成，为适应这种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在《孔子的仁与礼学及其经济政治思想》一文的开头，他重申自己对西周春秋社会制度的理解以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在西周时代，除奴隶已用于生产外，还更广泛地存在着作为农村公社的井田制度，以及建筑在奴隶制和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在分封制下的等级制度。到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末期的孔子时代，这种井田的制度和宗法制度以及分封制下的等级制度虽然还存在，但已逐渐动摇。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以及与仁相表里的礼和其经济、政治思想，正是从西周以来的这种宗法制、分封制下的等级制和作为农村公社的井田制的反映。"这里使用的评价方式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追求思想贯通和学术见解系统性的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

注重宏观把握历史，注重构建学说系统，不赞成搞支离破碎的繁琐论证，不赞成在学术研究中刻意追求新巧，这是韩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所倡导的正确的治学观念。这种观念将给后辈学人以长久的警示和启发。

韩连琪先生热爱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书育人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育管理经验，为国家的人才培养事业特别是为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善于通过表扬鼓励提高学生的研究兴趣。每当看到学生有点滴进步，他的欣喜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他在传授知识和指导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人品和情操，经常教导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要扎扎实实地治学和做人。"文革"结束后，韩先生指导过四届硕士生和两届博士生。现在这些学生有的已担任高等院校或省级出版社的主要领导职务，有的继续从事先秦秦汉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韩先生继承了我国历代知识分子既献身学术又勇于担负社会责任的优良传统，一生不断追求光明和进步。抗日战争初期，他以地方名流的身份赋闲在家，有些日伪教育界要员威逼利诱他出任伪职，都被他断然拒绝。新中国诞生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他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工作勤奋，恪尽职责。"十年动乱"结束后，他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到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作为毕业于旧山东大学而后又长期在山大执教的学者，韩先生对山东大学有深厚的感情，对山东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充满期待。1990 年辞世前，他提出遗嘱将自己半个多世纪节衣缩食收藏的珍贵字画全部捐献给山东大学历史系，设立"韩连琪基金"以为奖励中青年教师和学子之用。韩先生关心学术关心教育的高尚情怀，和无私奉献奖掖后学的高洁品格，将同他的先秦秦汉史研究成果一样，永远为山东大学的师生所铭记、所传颂。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 杨向奎先生在山大十年的科研成就

李 尚 英

**摘 要**:杨向奎先生在山大十年的科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理论、西周社会性质、阶级社会起源、神守与社稷守、炎黄文明、公羊学派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对"古史辨派"的评价也引人注目。这期间,杨向老对创建《文史哲》所作的贡献令人怀念。这些成果,为其历史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杨向奎;唯物史观;西周社会性质;封建社会历史分期

我国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杨向奎先生(我们都尊称为杨向老或向老),字拱辰,河北丰润人,生于 1910 年 1 月 10 日,逝世于 2000 年 7 月 23 日,终年 91 岁。先生 1931 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受业。1935 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和山东大学,任甘肃学院文史系讲师、教授(时年 28 岁,成为青年教授),西北联大副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作育人才,桃李满园。1956 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1958 年与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文革"后改任清史研究室主任),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后任该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墨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杨向老孜孜不倦地勤奋为学 70 年,广泛涉猎于经学、史学、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数学,博古通今,著述宏富,并几乎在每个领域中均有引领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著作,为学术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早在 1943 年,先生即已发表名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不同意顾颉刚先生提出的"五行相生是刘歆一派的伪造"的观点,受到学术大师顾颉刚、傅斯年、董作宾等人的称赞。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下两册先后问世,成为学界的畅销书,先生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大师地位。60 年代中叶,杨向老决定,要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改一改。原来,早在四五十年代,先生即感到,时间与空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既是自然科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哲学问题,需要予以认真研究,但囿于当时教学任务繁忙,无暇顾及。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先生又认识到,研究哲学而不懂宇宙、时空等问题,不可能具有科学的宇宙观;没有伟大的哲学思想,很难有杰出的科学成就,因此决定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由社会科学转到哲学及自然科学。此后,先生在科学研究中,哲学与科学齐上,治史与缵经并举。这样,杨向老就以一业已取得卓越成就的社会科学家,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高峰。"文革"结束后,先生以耄耋之年,精进不已,奋笔疾书,结撰专著《缵经室学术文集》、《中国古代史论》、《绎史斋学术文集》、《清儒学案新编》、《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杨向奎学术文选》,主持编纂《中国屯垦史》、《百年学案》等 15 部,论文 200 余篇,以及《熵和引力》、《论时间、空间》

**作者简介**:李尚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中华文史网"主编、教授(北京 100080)。

等多篇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论文。环顾四海，古往今来，皆属罕见。这些论著的出版，进一步确立了杨向老学界大师的不朽地位。

杨向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多次强调、并语重心长地教导他的学生说："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必须懂得自然辩证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再学习有关物理学的基础知识，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进行提高，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当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学者不相信这种哲学、这种方法，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科学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可克服的难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成就的取得是运用了自然辩证法，但他们成就的获得，往往是、或者是他们的方法符合自然辩证法，如果完全违背自然辩证法，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①]实际上，这些话语一直在杨向老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着。除了以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外，先生还形成了研究方法中的四重证，即将文献资料、金文和甲骨文、民俗调查和历史档案有机、完整地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在其著作中不断有新观点、新资料出现。

本文仅对杨向老在山大十年（1946－1956）的科研成就作一概述，希望能达到一隅窥全豹之目的。

杨向老自 1946 年来到山东大学后，先在该校中文系教书，并任系主任，以后又改任历史系主任，直至 1956 年奉调离开山大。十年间，始终在教学第一线上奔波，教学之余，主要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思想，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为其历史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 一、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历史

杨向老与旧型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早在解放前就已接触了唯物史观，解放后又十分自觉而认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成为中国史学界中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学术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史学界中获得学术成果最大、最多的学者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史学界掀起了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辩论，并由此出现了一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由于对唯物史观认识程度的不同，得出的看法大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有鉴于此，杨向老先后发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历史学说》、《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学习笔记》、《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若干问题》、《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商榷》、《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理论文章，力图运用唯物史观解决历史分期问题。

1. 杨向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理论

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其内部如何分期？对于这场大讨论中这一关键问题，杨向老一再强调，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时，必须关注和深入了解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的特点。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注意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先生认为，中国没有发展为成熟的奴隶所有制社会，周族的兴起，缩短了奴隶所有制社会，过早地摧毁了这不成熟的奴隶统治期，然而奴隶制残余还顽强地保留下来。因此，中国封建制是早熟的，封建关系在长期内一直和奴隶制相结合，"这种和奴隶制结合的生产关系，可以肯定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②]。先生还强调说，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一个主要发展的形态，同时也有着萌芽的形态、残余的形态。"然而残余的形态和主要发展的

① 《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前言"第 2 页。

② 《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36 页。

形态不同，更和萌芽的形态不同，许多史学工作者混淆了这正在发展着与日趋死亡的形态”，因而也混淆了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又因为有些史学工作者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前进的制度和落后的现象混为一谈，以致历史阶段划分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西周社会性质问题之所以在史学界长期不能取得共识，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①。

其次，要研究古史分期，就必然要牵涉到农村公社问题。杨向老认为，作为古代亚细亚基本生产形态的古老的氏族制度和农业公社制度的长期存在，“不仅表现在初期的奴隶社会内，也表现在封建社会内，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前期，显著地保留有很多的自由的农业公社成员；氏族制度，农业公社制度的残余，顽强地保留下来”，同时家庭奴隶制也残存下来。以往史学界有一种机械的看法，认为奴隶和农奴是互相排斥的，“有奴隶是奴隶制社会，有农奴是封建社会；如果有奴隶又有农奴，那就变成一种使古史学家迷惘的社会了”，而马克思的“现代家庭”论既包含着奴隶制，也包含着农奴制，“正好解释古史学家迷惘”了②。由此看来，西周和两汉时期有大量奴隶存在，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是一种残余的形态，在当时的社会中并不具有主流地位。

再次，要重视对中国古代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的研究。杨向老指出，《周礼》一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它提供了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有用材料。例如，该书叙述的春秋时代的齐国社会，与西部各国就有所不同。齐国至少在齐桓公时期已是一个封建国家，但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制度；从统治者内部来说，也还保存着奴隶制度。但是，这些奴隶不从事农业生产，不是农业奴隶；当时有私人奴隶，但不从事农耕。因此，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而往往是以部分代全体，甚或以后来的发展情况说明古代。为此，先生建议，我们史学界要加强对于中国古代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行研究，不能以某一地区某一种材料，来笼统地说明各国的社会性质；而是应该划分开来研究，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解决问题，认清了齐国，认清了三晋，认清了宋、郑，认清了秦、楚，认清了吴、越，然后再说明哪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样，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才易于获得圆满解决③。

2. 关于西周社会性质问题

西周社会性质是当时学界中一个热点问题，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西周奴隶制说”，一派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杨向老赞成后一种说法，认为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先生指出，要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首先应当解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地位变化问题，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的问题；其次，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曾发生不间断的阶级斗争，这就要求我们找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然后再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研究。先生认为，西周初年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统治者和“殷民”的矛盾上，这大批“殷民”是剥削者主要的剥削对象。而《周礼》一书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些“民”的问题，而不是“士”的问题。先生特别强调说，《周礼》所反映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自西周至春秋，凡是记载中的“民”、“甿”、“庶人”、“众人”或者是“农人”，全是指当时被剥削的广大农民阶级而言，他们或者领有一小块土地，并且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或者由领主授田，成为农奴。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商末的奴隶暴动和外边部族的入侵，摧毁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奴隶制瓦解了。因此，周人已不可能在奴隶制的废墟上恢复奴隶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商末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周初统治者对压迫奴隶和管理农民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同郭老所说，西周出现了一个新字——“德”。由此，先生指出，“德”字的产生，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也是新基础的反映。“德”是用以“和民”的，这

① 《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② 《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3、12页。

③ 《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109页。

“民”也是一种“新民”,“以德和民”是西周以至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口号[①]。

此后,杨向老还很看重民俗调查的资料,并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先生在看了云南傣族田制的资料后,于1980年11月写的《绎史斋学术文集·前言》中说:“现在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我仍然主张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始,除了古文献的材料外,近年来云南的史学工作者在作了傣族田制与农奴制和周秦社会的比较研究后,同样得出了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结论。”[②]

3.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

杨向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1)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先生通过对战国至西汉时期土地经营状况和奴隶来源的考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是领主经济居主导地位的时期,领主通过公社对农民取得超经济剥削。战国时期以后,地主阶级已经抬头,不过领主的势力并未全肃清。秦与西汉还是领主与地主交哄的时代。但地主经济并未完全摧毁领主经济,宗法制度的残余还顽强地保留下来。先生还认为,“两汉是封建社会。从战国开始到西汉末是一个从宗法封建社会过渡到地主封建社会的时期”,“两汉存在着奴隶是事实,……但这时的奴隶已经变质,……是结合在封建社会内的家内的奴隶”[③]。

(2)封建社会成熟期,后汉至晚唐(公元1世纪至9世纪)。杨向老认为,王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摧毁了领主阶级,社会向前发展了。中国在东汉到北魏时期走上了成熟的封建社会。

(3)封建社会后期,北宋到鸦片战争以前(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杨向老认为,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顽强地结合,并长时期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农村封建经济与商人资本虽存在着结合,但这种结合还是封建主义的表现而绝对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加上其他因素,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迟滞性。

(4)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即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1840至1949年)。杨向老认为,这个时期虽然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但原始氏族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着,宗族共财制度在南方随处可见,而北方却并不普遍存在,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杨向老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和西周社会性质的论述,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即从唯物史观上提出问题并加以分析、论述。先生的论证,逻辑严密,史料依据充分,史论有机结合,这就在范老、吕老、翦老论证的基础上,使“西周封建说”的体系更为系统、完整,也更为科学,因而长时期以来,得到许多史学专家和学者的赞同,成为古史分期中岿然自立的一个学派。近年来,“魏晋封建说”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恐怕也难以撼动“西周封建说”。

杨向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并不仅仅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上,而在他的研究中随处可见。于此仅举两例。一是对“古史辨派”的批评。先生认为,科学研究一旦“离开了历史唯物论的武器,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历史问题的”。又说:“我曾经相信过《古史辨》的理论,但我也相信历史的真相,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宇宙的奥秘是可以探求的,我不相信‘上帝的柜子’永远打不开,而宇宙是可知的。”[④]先生的这种观点和“古史辨派”是截然对立的。

“古史辨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如杨向老所说:“《古史辨》的功劳主要是对于传说中的古史的‘破’,这一破对于后来建立科学的真实的古代史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冲击某些封建权威”、“某些封建道统的权威”,继承“‘五四’精神的传统,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但先生也指出,“古史辨派”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无端地把西周以前的古史,都说成是后人的

① 《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125页。

② 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页。

③ 《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④ 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文史哲》1952年第3期;《论“古史辨派”》,《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85页。

伪造。他们掀起的"疑古运动",在古史问题上多"重复过去的老路,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指责汉代刘歆等人伪造《左传》和《周礼》,伪造虞夏商周的古史系统①。这种观点"是今文学派的偏见。儒家托古改制的说法,只是把他们的理想放在古代,并没有伪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至少虞、夏、商、周的时代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体系"②。

杨向老以唯物史观批评古史辨派关于尧舜禹在古史上不存在的论断,颇为精彩。他说:

> 存在于一切书上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记载,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加以分析批判,我们可以找得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尧舜的禅让传说,我们可以很好的说明那是氏族社会酋长选举制,而不能说那是儒家的伪造。相反,是酋长选举制的传说留下来儒家以禅让制度去解释他,"古史辨派"的说法是本末倒置。由于大禹是水虫的记载,可以说明那是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整个夏族是以龙蛇作图腾的,黄帝之名轩辕是元黿,鲧之化为黄熊,是三足鳖,相柳是九头蛇。由于这些图腾的崇拜,可以了解夏代的水患,可以推测夏代的农业、水患和龙蛇崇拜是有关联的。仅仅说大禹是一条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把禹的天神地位打倒,把古史推翻,这造成古史的混乱,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先生还批评"古史辨派"说,他们"怀疑虞,怀疑夏,对商、周的许多历史也持怀疑态度。这就未免太过火了,玉石俱焚,这样一来,硬把中国的四五千年的历史变成两三千年历史,这种看法是武断的、没有根据的。无论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这种理论都是难以成立的"③。50年代,杨向老和他的好友、顾先生的得意弟子、著名的疑古健将童书业写文章辩论时,童署名"童疑","疑"是疑传统的古史系统;而先生则署名"杨守","守"是守虞、夏、商、周以来的古史系统。从署名看,也反映了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二是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杨向老于60年代后,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理论物理学和数学,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其中之一是将熵引入物理学中,这在当时国内外学界中尚未有先例。先生认为宇宙中充满了熵。熵是引力作用,但它不起"引力"的作用,而起"重力"的作用。熵重是构成大块物质的基础,天体或者星球的构成,应当从熵重讲起,而不必在"大爆炸"中去索取什么!这一理论是很重要的,符合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原理。这里的"内因"即指"熵重";"外因"即指"大爆炸",如果"大爆炸"能起作用,那只能是在"熵重"的基础上起作用。

## 二、杨向老对上古史的重新塑造

著名先秦史学家吴锐先生说,杨向老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贡献最大的"还是对上古史的重建","杨派上古史是有成立的基础的,它的两大支柱即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实际上,先生重建的上古史还应包括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中国古史分期等内容。这两点,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言。

杨向老在山大十年间,对上古史的重建主要做了下面一些工作:

1. 对虞、夏两代历史的研究

我国的阶级社会源于何时?有的史家认为自夏代开始,还有的认为自殷代开始。杨向老在《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对虞、夏两代进行了认真研究,梳理出有虞氏的世系,指出虞舜是颛顼之后;颛顼之后有幕,有瞽瞍,有舜,有遂,有胡公。幕和瞽瞍也是传说中有名的人物。有虞氏应当是处于以父系家长制为主导的阶级社会的萌芽时代。当时的生产工具是"击石拊石",依然还是石器时代,不过已有牛羊,有仓廪,在生产上是畜牧业与农业生产的结合,这时已有关于私有产

① 《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72、389页。

② 《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③ 以上分见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文史哲》1952年第3期;《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业的传说。种种迹象表明，有虞氏时代已有了奴隶制的萌芽，因此，可视为我国阶级社会的开始期。

杨向老在《大禹和夏后氏》、《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等文中，对夏代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幕和瞽瞍的时代便是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的时代，那么大禹的时代便是中国真正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夏代的奴隶制更向前进了一步。杨向老还不同意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即夏代起于西方、夷族在东方的主张，而明确指出夏代起于东方；夏代中世以前，政治中心在今山东省，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期则移居河东及伊、洛流域，然而东方仍有其孑遗。《史记·夏本纪》所记，禹后为启，启后为太康、中康、相、少康四君，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少康即王位后，有夏中兴之事业于是完成。

2. 关于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的研究

杨向老在山大十年间，不见有神守与社稷守、炎黄文明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先生从40年代起，即开始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其成果汇集在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中。因此，这里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一些简要叙述还是必要的。

先谈神守、社稷守的研究。神守、社稷守是有关中国上古社会实体统治形式的关键问题，反映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历程。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杨向老继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后，研究了神守、社稷守问题，5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建立了神守、社稷守问题的理论框架。先生以大禹杀防风氏为例，指出，"防风国"名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在4000年前，曾经存在着神守国与社稷守国。神守国（防风氏）时代，即神的时代。社稷守即后来的阶级社会国家，夏即社稷守国。以后属于炎帝系统的姜姓国申、吕，代表着我国当时的南方文化，都是曾经称王的国家。它们都是重黎后：重司天属神，后来为申；黎司地属民，后来为吕。于是申为神守国，吕为社稷守国（后来的齐国即出于吕）。这样，杨向老就在这种神话的迷雾中揭开了其中隐藏着的真实的历史。

再谈炎黄文明的研究。杨向老继承和发展了顾先生关于炎、黄不同族，炎是炎，黄是黄的观点，同时又进一步对姬、姜两个部落的氏族来源、族姓、图腾崇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指出华夏族尽管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构成。而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夏、商、周三代，或者是虞、夏、商、周四代，共同融合成华夏族。在四代中，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而夏、周代表了华夏集团。华夏族的形成当先夏而后周，姜羌之与华夏结合也当先夏而后周。先生的论断，析源解流，使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各得其解。

80年代后，杨向老出版了《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以及《论"以社以方"》等重要论著，在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问题上继续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3. 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杨向老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上。

先谈杨向老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杨向老自迈入学术领域就开始对中国儒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1955年发表了《论西汉新儒家的产生》一文，先生在论述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时，指出，董仲舒的"新儒家"是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不满足于"黄老学说"和法家的基础上，应运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儒家，"就是说这是发展了的儒家，不同于孟子，也不同于荀子，正好是这两派的混合"。"新儒家"的思想就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其具体措施则是"改正朔，易服色，行封禅，礼百神"，从而为汉家统治、也为儒家"找到了宗教上的依据"。此后，杨向老对儒家的研究不断深入，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该书乙编着重阐述了儒家产生的历史条件、该学派的主要思想内容、儒家的发展阶段、作用及其地位，同时对墨家和道家，对宋学和清代汉学，也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颇具新颖的观点，受到学界的重视。80年代以后，先生又陆续出版了八卷本的《清儒学案新编》。该书与30年代出版的、由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清儒学案》相比，后者的编写者不是学者，既不懂哲学，也不懂训诂、历史、文化，该书充其量只是一部较为简陋的学术史资料长编；而《清儒学案新编》是从哲学、历史、文化和训诂的角度，阐述了清代学术思想

的发展演变过程，起到了清代学术思想史和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双重作用。先生自己对本书的评价是："我的书虽无统一计划，体例也不完整，但典型训诂、考据那部分和今文经学那部分源流分明，解释清楚，可无愧于前人。"先生晚年，又多次谈及现实的新儒家。他说，清初，儒学哲学趋于凋敝，民国初年以来，新儒学兴。此后，不断有新儒家产生，其中，熊十力、冯友兰被誉为新儒家首要人物的两位大师。但杨向老认为，这些新儒家的思想都不够新，"我们希望具有更新思想、现代科学思想的大师产生，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异文化的挑战"①。正是基于这一新思想，先生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写出了上引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专著，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开辟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运用和相互借鉴之路，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先生有关儒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良好愿望。如今，杨向老已经作古，忆及先生在儒学领域研究成果及其所开辟的新路，称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我想恐怕一点儿也不为过。

再谈杨向老的经学研究。杨向老进入山东大学工作后，继续在经学领域中耕耘，于1955年发表了《五行说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对五行说作了具体的发挥和论述。

杨向老在山大时期经学研究的重点是《周礼》。先生在《〈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中指出，自从《周礼》得到王莽的表彰以后，这部书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就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存在问题"，今文学家视其为王莽、刘歆的"伪造"。杨向老在阐释了《周礼》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体系、成书的时间与地点以后，指出"《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经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而且王莽为达到篡夺西汉政权的目的而引用、效仿过"周礼"，同时他本人对《周礼》"还有许多误解"②。

在今文经学研究方面，杨向老撰写了《〈公羊传〉中的历史学说》，指出，《公羊传》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义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中国"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国，是"中国不能主中国"。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此后直至80年代，先生又陆续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专著，着重论述和强调公羊学派在历史上的作用。先生认为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思想，对于维护中国大一统，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民族团结都起了无比的好作用。这体现了杨向老"以史为鉴"的中华传统的史家治史思想。

4. 金文与甲骨文研究

在杨向老史学研究方法的四重证中，先生在山大的十年间，主要重视和运用文献资料、金文和甲骨文两重证。下面以两例叙述先生在金文和甲骨文研究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郭沫若先生曾对《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黿"一句解释说："天黿即轩辕也。"轩辕即黄帝，也就是姬氏出自黄帝。杨向老同意这种解释，并从青铜铭文中认出了"玄黿"这两个字。先生说，天黿即玄黿，"天"、"玄"古音相同，再从图腾来看，炎帝一系是熊，而黄帝一系是龙，炎黄融合后，出现了《天问》中"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的有趣场面③，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郭沫若的正确看法，对探索炎黄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商朝武丁时的卜辞习惯用语中有三个字，这是自甲骨文字出现以来，聚讼数十年而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三字应是"不玄冥"，即指兆璺之不昏暗、不模糊。这一解释，得到了著名文史专家郭沫若的赞同："其言至确"④。

---

① 《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95页。如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运用和相互借鉴，儒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已成为学界发展的趋势，因此，杨向老提出的新儒学应当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思想是正确的，有先知的，值得学界重视。

② 《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8、190页。

③ 《杨向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④ 《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 三、杨向老与《文史哲》

杨向老受其师顾颉刚先生的影响，一生喜欢办学术刊物。他始终认为，社会科学的刊物就如同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支持和检验，就会枯萎了。可以说，刊物是培育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学术刊物的多少及其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学术水平的高低。

1951年，杨向老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同仁创办了哲学社会科学刊物《文史哲》，其办刊宗旨是：(1)办好刊物，繁荣学术；(2)培养学术人才；(3)发现学术人才。《文史哲》最初只是一个同仁刊物，创办时困难重重，既无经费，又无经验。他们为此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和精力，当时并无专职编辑，全由中文、历史两系的教师兼任。为了办好这个刊物，杨向老和同事们承担了所有的收稿、约稿、定稿、编辑和校对等工作。印刷厂离校园很远，为了处理有关出版事宜，他们经常步行去印刷厂，有时还要到车间去校对。刊物出版后，由于与外界无联系，无法发行，于是就各自找了一些朋友往各个大学寄，再托各大学的朋友将刊物放在各自学校的传达室卖，卖不出去时，这些朋友便自己掏钱买下，然后将钱寄回编辑部。后来，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教务长罗竹风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他们又与邮局取得了联系，《文史哲》改由邮局发行，并由此走上了轨道。但这时发行量依然很少，困难万端，杨向老就直接给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写了一封信，请求给予援助。后者很慷慨地拨给他们2000万元(合现在的2000元)，山东省委统战部也拨了2000万元，共4000万元，这就从经费上救活了《文史哲》。然而此时发行量还是不大，影响也小。后来，杨向老和同事们开动脑筋，寻找学术热点，在刊物上先后开辟了有关农民战争、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开展《红楼梦》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发行量迅速上升到几万份。从此，《文史哲》不仅在经费和销量上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而且在学界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渐扩大和深远；与此相应的是，《文史哲》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学问家，为繁荣和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文史哲》现已成为学术界的重镇之一。这已为社会上所公认。但杨向老对此总是说，这不能归功于某个人，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荣誉应归功于大家。不过，这里应说明一点，杨向老和他的同事们所设计的有关《红楼梦》的讨论，最初本来只是一种百家争鸣，但后来被上升为政治问题，俞平伯先生受到错误批判，有违他们的初衷。最近，《文史哲》成为全国各高校文科学报唯一获得中国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的刊物，我们对此十分欣喜，并向《文史哲》的同仁表示热烈、衷心的祝贺。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这其中所凝聚着的杨向老和他的同事们的心血和汗水。

岁月如梭，时节如流。杨向老离开我们已十有一年了。认真学习杨向老和老一辈学者为学术界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财富和学术风范，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是我们学界晚辈和后来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　扬　眉]

#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 ——王仲荦先生的学术与学问

齐 涛

**摘 要**:王仲荦先生承章太炎先生之学统,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做到了学统与新知的相融、作史与考史的兼领,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古史分期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在敦煌文书研究、古典文学与古代文化研究、二十四史校点、中国古代物价史研究等多个领域,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之作,是淹通文史的一代学者;他所留下的高贵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更是让学界景仰。

**关键词**: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西昆酬唱集注》;敦煌文献

学界论及王仲荦先生(1913－1986)之学术,每言及古史分期之魏晋封建说以及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对于先生的其他著述,论之者不多,而对于现有著述之外的胸中学问更是知之甚少。王先生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入于章太炎先生门下,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实现了学统与新知的融合、考史与著史的兼领,是淹通文史的一代方家。

## 一、学统与新知

王仲荦先生祖籍浙江余姚,1913 年出生于上海,早年也一直在上海学习和生活。读大学时,便属意于文史,在任堇叔先生指导下,开始了《西昆酬唱集注》的工作。王先生自己曾不无感慨地说:之所以选择《西昆酬唱集》,主要是因为它使用典故多而卷数又较少,便于初学。笺注工作"单靠《佩文韵府》是不行的,我就得一部一部书翻检诗句的出处,如《毛诗》、《左传》、《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麟台故事》、《初学记》、《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穆天子传》、《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庄子》、《列子》、《楚辞》王逸注、《玉台新咏》、《樊南诗文集》冯浩注、《文选》李善注、《全唐诗》等,一天一天地翻检,翻检得很详细,不但解决了注释问题,也充实了自己,打好了基础"①。

王先生的岳丈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时期的学生,且岳丈家又与章夫人汤国梨先生有姻亲之好,两家过从甚密。王先生婚后不久,就被汤国梨先生介绍到章太炎先生门下。王先生回忆道:"她知道我很喜欢古典文学,就把我的诗文介绍给太炎先生看,先生看了,认为孺子可教。汤国梨先生就推荐我做他老人家的小学生了。我本来是他学生的女婿——小门生一辈,现在成了他的学生了。"②

到章太炎先生门下后,王先生一方面陪侍他在苏州和无锡等地讲学,同时潜心攻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文始》等;另一方面,则在章太炎先生指导下,初步完成了《北周职官志》与《北周地理志》两部书稿。这两部书稿奠定了王先生在魏晋南北

**作者简介**:齐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嵴华山馆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590－591 页。

② 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嵴华山馆丛稿》,第 591 页。

朝史研究中的学术基础。王先生曾深情回忆他向章太炎先生请教《北周职官志》的有关问题时的情景：

> 他点点头，指示了两点，一、必须对孙诒让氏的《周礼正义》，缀细地研读，我照他的话做了。二、他说必须广泛参考金石墓志，我听了他的话，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到北京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翻阅所藏的金石拓片，后来又翻阅了赵万里氏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都是根据他生前指示来做的。这部书凡四易稿，后来改名为《北周六典》，到一九六七年才重新写定，一九七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初稿都是在二十多岁时起草的。①

《北周地理志》与《西昆酬唱集注》也经历了同样的磨砺。

章太炎先生去世后，汤国梨先生携几位弟子共同创办了太炎文学院，王先生被聘为院长室秘书兼教授，担任中国通史一课的讲授。但为时不久，因形势恶化，太炎文学院停办，王先生投奔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印泉先生，效力于抗战第一线，曾参与保山保卫战。1942 年，应中央大学之聘，赴重庆执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席。1945 年秋，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中央大学迁返南京后，进行院系调整，王先生任中大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47 年夏，因同情进步学生运动，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吴组缃先生、蒋礼鸿先生以及王先生等多名教员被解聘。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先生闻讯后赶至南京，延揽诸贤。王先生遂应聘至青岛山东大学。次年，被聘为教授。此后直至 1986 年去世，一直任教于山东大学。

自章太炎先生去世至解放前夕的十三年间，王先生虽颠沛流离，辗转于多处，但秉承学统，弦歌不辍，一直致力于《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与《西昆酬唱集注》的修订增补。在云南期间，庶务繁杂，又无书可读，王先生便将随身携带的《资治通鉴》反复翻阅，并摘记有关云南的史料。方国瑜先生见此，把《云南丛书》中专门汇编《资治通鉴》中有关云南史料的一部书稿借给王先生，请他遇到《资治通鉴》有而此书未收者，用毛笔写在天地头，王先生居云南二年，集腋成裘，密密麻麻地汇集了一厚册，临行前还给了方国瑜先生。王先生对于《资治通鉴》的功底也在此时造就。

十三年间，虽恩师不在，但在学问与阅历的砥砺中，王先生愈加领会到章太炎先生学问之精髓。多年后，他曾这样总结道：

> 第一，章先生继承了浙东学派“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讲经学就是提倡史学；第二，认为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鉴，“保国性”，也就是发扬爱国主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严夷夏之防，劝人不要当汉奸。他的早年学生钱玄同当时复旧名钱复，他非常称赞改得好，显示了爱国主义精神。章先生的学问是双轨并进的，他有纯学术的著作，也有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从这一点看，就也懂得章先生为什么这样向往顾亭林，亭林既有《音学五书》这样纯学术性著作，但也有供国家民族可以借鉴的像《日知录》这样的著作，双轨并进，是并行不悖的。②

这种体认，既是对自己学统的总结，又成为前往新的历史时期探求新知的津梁。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先生改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万象更新，马克思主义全面进入史学领域，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在这方新的天地中，有的学者固守学统，仍旧在原有的天地中默默耕耘；有的学者幡然求新，在新天地的风云变幻中得心应手；还有的学者在继承与求新上上下求索，实现着学统与新知的融汇。王先生属于后者。这些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加之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史学研究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既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又要精通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王先生在这种结合上走在了史学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

① 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皓华山馆丛稿》，第 594 页。

② 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皓华山馆丛稿》，第 592 页。

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

对于王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结合上的贡献，吴大琨先生曾专门论及。他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一文中写道：

> 我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研究工作者，是第一次从他那里才认识到应当怎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重要性的。那时候，仲荦教授和我都是《文史哲》的积极撰稿者，我们讨论过的一些问题，或者在讨论中想到的一些问题，事后把它写下来，就成了《文史哲》上的文章。在当时王仲荦教授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我认为发表在1954年4月号《文史哲》上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仲荦教授在文章中说："许多世纪中，村公社的继续存在，成为古代专制国家停滞性的坚强基础。所有村公社的成员，只能成为土地的使用者——他的占有，也是经由劳动实践过程为前提之下发生的——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公社社员既不是公社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本身就会变成公社的财产，也就会变成专制君主变相的奴隶。他们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了起来，完成着自给自足的生产，他们要经常地向他们的统治者贡献力役，也贡献物品。这些公社成员们，在身份上虽是'自由'的，在经济生产上也是独立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公社成员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就比较奴隶或以后的隶农们来的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也许还重得特别厉害。在这种特殊生产形态里，自由人生产还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隶的劳动不能尽量代替自由人的劳动，这样，不但阻碍了奴隶形态的发展，也会阻碍了以后农奴形态的充分发展。"我认为仲荦教授这段话是十分精辟的，他所说的"特殊生产形态"，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我认为，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他的这一贡献，在学术上的意义是很大的，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①

吴大琨先生所称道的这篇文章也是王先生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众所周知，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史学领域的运用，作为唯物史观基本框架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必然运用于中国历史与社会，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又使得中国历史之足一时难以适应五种社会形态之履。因而，古史分期以及与其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问题等，也就必然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就开启了古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封建说、范文澜先生的西周封建说、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的提出，知名史学家们纷纷进行论述，各抒己见，形成了建国后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的高潮。在这场大讨论中，王先生除《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外，还先后完成了《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连载于《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篇长文。《〈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评论道：

> （1956年）3月1日，王仲荦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长篇论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详细系统地论证了"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之一。
>
> 该文的发表，标志着作者成为中国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全文从古代中国原始奴隶制结构，以及生产力的持续增长与封建主义因素逐渐获得发展等方面来阐述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过程。主要观点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从殷商一直

① 吴大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文史哲》1986年第5期。

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可分为两个段落：从商到春秋是第一个段落，这时期社会上有农村公社和未获得发展的早期奴隶制两种基本结构；从战国到东汉是第二个段落，这时期农村公社已经瓦解，较为发展的奴隶制开始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商品生产的可能性。自汉武帝开始，流民大量出现，奴隶制面临总危机，汉末黄巾大起义等，才摧毁奴隶制，引起封建关系急剧发展。到魏晋时期，封建制终于代替奴隶制而上升到主导的地位，中国就进入封建社会了。①

在积极参与古史分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讨论的同时，王先生还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多次发表论述，先后发表了《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丝织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棉纺织业》等论文，是建国后较早进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王先生发表于《文史哲》1953 年第 2 期上的《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一文，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作。文章"从茶叶经济发展这一特殊角度来论证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得比较久。文章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封建经济政治体制的强固结合，由于这种结合，更加强了封建阶级对于茶农与制茶手工工人的残酷剥削，阻碍了手工业向工场工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后来更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保持了封建统治"②。这篇文章被严中平先生誉为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创新之作，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王先生则谦虚地认为："中平教授是《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我受到他的启发和帮助，于是也热情地参加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尤其茶叶经济这篇文章，基本观点受到中平教授的影响很大，他真是我的良师益友。"③两位先生的学者风范足垂后世。

数十年前风起云涌的这场大论战似乎已尘埃落定，不论史学史将如何评价，我们坚信，这场大论战所蕴含的学术内核弥足珍贵，所带来的学术繁荣与学术进步同样不容忽视。王学典先生曾从两个方面深刻分析这一问题。他提出：

如果把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中国唯物史观派置入整个 20 世纪的世界史学的主要潮流中来观察，那末，我们会进一步感受到它的学术价值。老实说，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它们同属一种指导范型，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等。④

他还认为，在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的各派学说中，"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各派都去挖掘各自时期的史料，客观上刺激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通过考察农村公社、流民暴动、世家豪族、农民部曲和佃客等历史事实而分析得出魏晋封建说的结论，等等。这样，本来资料最为贫乏和寡缺的先秦、秦汉史，却率先得到最为清晰、精细、深入的清理，这一功劳不能不归于'古史分期问题'论战"⑤。

我们十分同意这一见解。从第一方面看，中国的相关史学家们除了与年鉴学派不谋而合外，还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责任驱动，在新中国的召唤下，要写出"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在王先生的学术活动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在大量的讨论中蕴含着这一责任外，他还专门著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⑥一文，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与

① 郭震旦编撰：《〈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71 － 72 页。
② 郭震旦编撰：《〈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第 30 页。
③ 王仲荦：《蜡华山馆丛稿·前言》，第 2 页。
④ 王学典：《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71 页。
⑤ 王学典：《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第 169 － 170 页。
⑥ 文载《历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西欧古代中世纪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试图阐明中国式道路的由来与走向，这也是建国后比较史学的代表作，惜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从第二方面看，王先生在这场大讨论中所积累的学术贡献，可以是最好的证明，他在这一时期对村公社制度的研究、对东汉与魏晋土地经营方式与社会阶层的研究、对均田制度的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为弥补50年代之缺憾而完成的《井田制度考》、《圭田考》、《奴婢上户籍始于北魏》等论文，共同构筑起了他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基础。因而，王学典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这场大论战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对王先生在这场大论战中学术活动的评价。

## 二、作史与考史

章太炎先生曾将清代史学分为“考史”与“作史”两种类型，后人又将清之后的史学延伸为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或者是考史派与著史派，其划分大同小异，故而我们仍以考史与作史区分之。就清代史学而言，考史派占绝对优势；进入民国以后，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乾嘉范式和西方实证主义结合下形成的新考史派仍占据优势地位。王学典先生曾分析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议院士。在‘人文组’计8类28名院士中，绝大部分都具有考据学背景，如胡适、柳诒徵、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余嘉锡、杨树达、赵元任、李方桂、萧公权、陶孟和等。唯一一名史观派史家郭沫若也列名其中，但他所以入选，也是因为其在甲骨金文考释上的考据性贡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史料考订派的势力之大。”[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史派除钱穆等人外，多数都是以唯物史观治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就使史学流派的划分带上了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作史派自然成为主流流派，而考史派在经历了批判胡适与古史辨的学术运动后一蹶不振，考据之学似乎也难以再登大雅之堂。

在这样一种学术变迁中，王仲荦先生之治史，实现了作史与考史的兼领，进则作史，退则考史，作史中不乏考据实证，考史中仍见理性思辨，进退自如，在两大领域都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王先生作史的代表作当为《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两书的前身则是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中写道：

> 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同时开始编写一部讲义，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写成《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一部断代史。它的上册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下册也已经定稿，一九六六年将要付排，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暂时停止排印。

由此看来，魏晋南北朝部分在“文革”前已全部完稿，所以在“文革”后不久，王先生便修订完毕，1979年正式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部分在“文革”前仅完成了隋与初唐部分，故而基本上是从头写起。因此，至1983年方基本完稿，1988年正式出版。这样，介绍王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史贡献，当本《魏晋南北朝史》一书。

《魏晋南北朝史》一书的影响力自不待言，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中更是如此，是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首选入门著作。该书在学术史上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建国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断代史著作，在断代史的研究范式、基本架构以及史论模式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成为断代史著作的经典之作。

建国以后以作史闻名的史家多专注于通史性著作的撰写，追求《史记》以来通古今之变的成就，建国后虽也有三二种以“史纲”、“史略”名之的断代性著作，但篇幅太小，结构与内容尚无法承《汉书》之余绪。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则填补了这一重大空白。全书实际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

①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第30页。

综论，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融为一体，以时代为序，分别论述；第二部分则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周边民族状况、中外关系、思想文化、科学发展等内容进行专题论述，史论结合，构建了一个全新而科学的断代史研究体系。

其次，它大面积地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提出了相当数量的"新论"，是一部创新之作。比如，这一历史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史、军事与战争史、少数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在世家大族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屯田制、占田制以及思想文化领域中都提出了新的见解与结论。特别是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地位的把握，更是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王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曾概括道：

> 在解放前，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是中国史上的黑暗时代，认为它一团漆黑，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是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而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就裹足不前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就不再向前发展了。相反，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史学著作、地理学著作、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杂伎等，以及科学技术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上的成就，为以后唐宋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本书文化部分占了全书十二章中的三章之多，几乎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

这种史识令人击节。尤其让我们感叹的是，始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这部著作的社会史视角，已足以回应西方史学界方兴未艾的年鉴派史学。

再次，这部断代史是一部史作，在这部著作中，王先生清新的文采、缜密的分析称誉学界。但它同时又是一部实证性史作，王先生继承了考史的传统，注释与考证的分量是此后许多断代史著作所不及的。这部著作所引史料都是随文而注，除此之外的专项注释部分仍占到全书总文字的20%以上。这些注释或补充史料，或考订史实，许多注释的文字已大大超出了相关正文的文字。如书中《曹魏的屯田制度》一节，正文只有3000字左右，而文后的注释却有4500多字；又如，书中讲到东晋世家大族在浙东广置庄园一事时，正文仅200多字，而文后的注释却引用了30多种史料加以说明佐证，注释文字有2500字以上。若将这些注释单独成册，就是一部颇具分量的《魏晋南北朝史实考证》，是十足的史料考订之作。

王先生考史的代表性工作有四个方面：一是对敦煌文书的考释；二是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专题考证；三是参与二十四史的校点；四是综合性考证之作，如《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这些工作除了第四项外，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行的。

对敦煌文书的考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谱牒残卷的考释，包括《〈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等。二是对地志残卷的考释，包括《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考释》、《〈贞元十道录〉剑南道残卷考释》、《〈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残卷校释》、《〈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考释》、《〈沙州志〉残片三种考释》、《〈敦煌录〉残卷考释》、《〈寿昌系地镜〉考释》、《〈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释》、《〈西州图经〉残卷考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考释》、《〈西天路竟〉释》等多种。前一部分收录在《皕华山馆丛稿》中；后一部分则汇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经夫人郑宜秀先生整理后，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先生的敦煌文书考释主要是还原式考释。考释以雄厚的文献与史学功底为基础，广征博引，补白祛疑，为敦煌学研究作出了艰巨而有效的基础性贡献。王先生对于自己在敦煌文书方面的有关考释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曾对收入《皕华山馆丛稿》中的几则考释评价道："有关敦煌石室发现的氏族志文章，一共写了三篇……这几篇文章，也有扎实的，如果顾步自怜的话，我是较为满意的。"[①] 这是王先生唯一一次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评价。

---

① 王仲荦：《皕华山馆丛稿·前言》，第2页。

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考证属专题性考证，有《鲜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两文，意在条理北魏、西魏时代，在鲜卑先改单姓又转用复姓的大变动中，各姓氏及相关集团的沿革、变化状况。如王先生所言："自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复姓为单姓，西魏相宇文泰又改鲜卑单姓为复姓，当西魏、北周之世，庾信有诗云'梅林可止渴，复姓可防兵'，则改复姓之影响之大，固有关鲜卑化汉化势力之消长，非独一姓一氏之单语复语之变换而已也。荦既写定《北周六典》，于西魏北周复用鲜卑复姓事，虽不得不略一提及，但言之不详，故今复为《鲜卑姓氏考》，别成一篇云。"[①]在《代北姓氏考》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篇考证文章合计10余万字，均作于王先生的晚年，无论是对史料的网罗式搜寻，还是考辨中抉疑探隐的功力，都属考证文字中的上乘之作。王先生本人对其也很看重，有几家杂志多次索稿，均未果。他多次说，这两篇文章要收到《皕华山馆丛稿》的续编中，一部论文集应当有相当数量的未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不能只炒冷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对二十四史的校点为建国以来最为宏大的学术工程，王先生是主要参加者与组织者之一。他曾回忆道：

> 一九六三年，国务院调我去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第一次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六年六月，第二次从一九六七年进行，我没有参加，第三次从一九七一年七月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大概共有九年时间。我的任务是主持南朝五史点校工作，我负责的是《宋书》和《南齐书》，卢振华教授负责的是《梁书》，张维华教授负责的是《陈书》，此外准备请张维华、卢振华两教授合作点校《南史》，这是最初的计划，后来由于人员变动，改由我和卢振华教授合作点校《南史》了。[②]

对这一工作的学术与文化意义，学界早有定论，兹不赘述。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王先生在点校《宋书》的同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积十数年之功，完成了洋洋百余万字的《宋书校勘记长编》[③]，全书共出校9100余条，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人，成为《宋书》整理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是两部重要的综合考据之作，其缘起是补《周书》无志之缺失，但经过王先生近四十年的反复考订，其意义已远过于此。《北周六典》凡六十余万言，即是一部北周"通典"，又是北周一朝制度史料的汇编与考订；《北周地理志》凡七十余万言，既是一部"北周郡县志"，又是北周地志史料的汇编与考订。两书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在作史与考史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工作。王先生晚年多次谈到，章太炎先生认为清代学术缺食货之学是一大缺陷，要求王先生在学识许可时可致力于此。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作史"，实际上也是在践行着太炎先生的教诲。但王先生本人还确定了一个研究目标，就是要写出一部《中国古代物价史》，从物价的视角把握中国古代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研究方向。更让我们关注的是，王先生设定的研究中国古代物价史的第一步是先完成《中国古代物价考》。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进行着若干考史工作的同时，王先生也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物价史料的收集与考订。至先生仙逝前，先后完成了《〈管子〉物价考》、《〈韩非子〉物价考》、《〈战国策〉物价考》、《〈越绝书·计倪内经〉物价考》、《〈史记·货殖列传〉物价考》、《汉代物价考》、《汉晋河西物价考》、《魏晋南北朝物价考》、《唐五代物价考》、《唐西陲物价考》、《于阗物价考》，宋代与辽金夏的有关物价资料也大致收集完毕。上述考证或资料已由郑宜秀先生汇编为《金泥玉屑丛考》一书，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这一未竟工作的方法论意义，丝毫不亚于它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贡献，如天假时日，王先生能够如

---

① 王仲荦：《鲜卑姓氏考》，《皕华山馆丛稿续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② 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皕华山馆丛稿》，第606页。

③ 此书2009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愿完成《中国古代物价考》与《中国古代物价史》两部著作，定是作史与考史的完美结合。

## 三、文史淹通与学者风范

王先生自小学入门，又偏爱诗词，建国之前一直任教于国文系，因此，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其本人也工于声律，咏唱酬答，清隽自然。但是，由于到山东大学后一直从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除了反复修订于1980年出版的《西昆酬唱集注》外，再无其他有关古典文学的著作。不过，王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却大量引入了古典文学的元素，把文学史与文化史作为断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以诗证史、以史论诗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以《隋唐五代史》为例，全书洋洋百万余言，文化史部分占了1/3强，其中，诗史词史又占了文化部分的2/5，达15万字左右，仅完整引述的唐五代诗词就有千首以上，若单独成册，是一部完整的唐五代诗史。即便如此，王先生仍然意犹未尽，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 唐代的诗歌文学，是唐代文化的精华。在拙著中，初唐诗只略作介绍，盛唐几位大家，叙述较详。我是喜欢中晚唐诗的，所以叙述中晚唐诗特详。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绍了，对于作品的分析，却只能俟诸异日，另成一书了。

在《隋唐五代史》一书中，讨论史实之时，王先生能以诗为证，引诗入史，解决了若干疑难，在讨论诗人诗作时，则以史证诗，大大加深了对诗作的认识，甚至厘正了诗人与诗作中不少传统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韦庄其诗其人的研究，限于篇幅，此不具论。

以上所述，仅是作为学生对先生的一知半解，王先生本人从未讲过什么文史兼通，也未曾讲起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造诣，只是说自己是一个爱好者。对先生的"爱好"笔者深有感触，自1982年，笔者有幸忝列先生门下，先生给笔者确定的学位论文是他所喜欢的韦庄诗词笺注。笔者每周一都去先生的书房听先生讲评，先生对所讲之诗篇篇吟诵，常常啧啧称道："好诗！好诗！"这种境界其实就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正是由于对学问的热爱，王先生真正做到了视学术为第一生命，终毕生之力贡献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王先生在《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一文中曾经写道：

>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把一百二十万字的《隋唐五代史》写完，有朋友问："你以后还准备写哪些书？"我告诉他我准备把这些年论文，编成一个集子，集名《皓华山馆丛稿》，计划一年之内编成。此后视我的健康好坏，还预备写几部书。生命不息，写作不止。①

自1983年8月到1986年6月，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王先生编定了《皓华山馆丛稿》，完成了中国古代物价考的大部分工作，还撰写了《鲜卑姓氏考》与《代北姓氏考》两大考据长文，基本编写了《皓华山馆丛稿续编》，等等。须知，此时王先生已年过七旬，且一直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身体较为虚弱。这些成果就是生命的投入。

多年来，王先生除了研究、教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爱好，终日在小小的书房孜孜研读，极少下楼，常常每日能完成三千言。而且，王先生的所有研究都不找人代劳，从翻检史料、摘录卡片，到以繁体竖排誊录文稿，全部都是亲历亲为。最让人景仰的是王先生终日乐在其中，流连忘返。其故交朱季海先生曾寄诗云：

> 闻道年来懒下楼，书城高筑又埋头。
> 古城艇子浑忘却，不及卢家有莫愁。

王先生答诗曰：

> 神仙自是爱楼居，惭愧捧心未著书。

---

① 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皓华山馆丛稿》，第607页。

风雪连天冰百丈，木兰双桨正愁予。

正是有如此高贵的学术品格，王先生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不伐名，不自矜，固守学术良知，从不以良璞示人。

王先生在生前从不申报任何奖项，也未申报过什么项目，更不彰扬自己的学术与学问；相反，在一些情况下，宁肯学术成果不能出版，也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不随波逐流。郑宜秀先生曾回忆王先生《曹操》一书修订版的过程：

> ……《曹操》，1956年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建国后国内第一部有关曹操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在嗣后进行的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拟再版此书，请仲荦先生加以修订。先生抱病对此书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吸取了客观的内容与评价，但没有应景的成分。在再版后记中，先生认为："替曹操翻案，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使历史真面目还原。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拥护这一新说法，而把曹操那种残酷的性格完全抹掉。如果把曹操所属的那个生活烙痕抹掉，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再版。①

王先生固守学术良知方面最为集中的体现还是不以良璞示人。前已述及，王先生的两部断代史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历时三十年才全部完成；其《西昆酬唱集注》与《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更是历时四十余载，反复修订，方正式出版。以这三种著作为例，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达到了较高水平。1945年秋，王先生申请副教授之职，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叔傥在审读了王先生送审的《西昆酬唱集注》和《北周六典》后认为，只需将前者送教育部即可，而后者升教授也可以了。只是因为王先生执教国文系，不能用此书送审。当时的教育部在请专家审查后，即聘王先生为中央大学副教授。尽管如此，王先生仍将这些书稿反复修改了三十多年。

王先生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我是章先生的学生，以我来写太炎先生，当然有偏护的地方，所以是不适宜的。"②在追忆王先生的文章最后，笔者只能惭愧地说："我是王先生的学生，以我来写仲荦先生，以学养之浅薄，一定不乏难以备述之处，所以是不适宜的。"好在对王先生之等身著作，学界自有公论，笔者在这里，只是对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品格略述一二而已，先生庙堂之美，尚待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① 王仲荦：《皕华山馆丛稿续编·前言》，第2页。

② 王仲荦：《太炎先生二三事》，《皕华山馆丛稿续编》，第588－589页。

# 孙思白先生与民国史研究

韩 凌 轩

**摘 要**:作为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和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人,孙思白先生在推动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就民国史研究诸专题取得了丰富的拓荒性成果。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三篇重要论文,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他的民国时代是"大转变"时代的思想,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捍卫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的学术著作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孙思白;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

孙思白先生(1913－2002)是追随华岗校长参与创办《文史哲》的著名学者之一,也是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与中华民国史学科奠基人之一。缅怀与梳理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继承其学术遗产,以推动新时期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是我们后来者应尽的学术责任。

## 一、推动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的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民国史学科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认识逐步深入到具体筹备、建立的发展过程。中华民国史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领导、夺取辛亥革命的胜利,到后来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全国政权,推动社会变迁,最后走向灭亡的历史,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建立地方政权,推动社会变迁,到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发展到民国史学科建立,势所必然。孙思白先生在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到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史学界把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的 30 年称为中国现代史[①]。1956 年 7 月,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召开,此时全国大学历史系"课程表上的'中国现代史'还只是空有其名",全国 14 所综合大学,参加"中国现代史"大纲审订的只有 5 所。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大纲审订会的孙思白教授,在 1956 年 10 月 17 日《光明日报》第 1 版发表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为什么至今这般寥落》一文,提出阻碍"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展的原因,一是负责文教工作的各级领导对这方面的重视和推动不够,二是资料的饥荒。他呼吁加强领导与成立专门机构,每年整理、编印两三百万字的资料,认为这是顺利开展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当务之急[②]。当年秋,高教部指定中国人民大学李新、彭明和山东大学孙思白组成编写小组,依据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审订的中国现代史大纲开始编写讲义,其后又有北京师范大学王真等参加。至 1958 年冬,讲义草稿大部完成,经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后,又指定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复旦大学)、

**作者简介**:韩凌轩,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1956 年 7 月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上,有一些学者主张把 1840 年到 1949 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统称为中国近代史,可是长期以来,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上,仍习惯于把 1919 年到 1949 年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

②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0 页。

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等进行补充和修改。因为"本书是中国通史的1919－1949年部分",所以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共四卷,孙思白先生担任第二卷主要撰稿人,并参加其他三卷的写作讨论与修改工作。这套通史既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共力量的消长与新中国建立的发展过程,已经具备中华民国史的实质内容②。这就为《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民国史学科的建立也被提上日程。孙思白先生谈到民国史学科建立的过程时说:

> 1956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这个项目第一次被提出来,并被确定为"全国科学十二年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份"规划"的多数项目,包括《中华民国史》在内,没能实行。到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董必武同志又向史学工作者提出,重修清史和编民国史的倡议,周总理也一再提到这件事。1971年秋,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制定出版计划时,周总理亲自审阅了拟定的出版计划项目,《中华民国史》就在这时再一次列入了出版计划。③

鉴于孙思白先生在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科方面的高度学术责任心和广泛影响力,1973年,他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正式调入)民国史研究组(民国史研究室前身),1980年被任命为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主持民国史编写工作。

《中华民国史》刚列入出版计划,孙思白先生已开始思考如何编写《中华民国史》了。他说:

> 当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把编写《中华民国史》这项任务列入计划的信息传出时,我脑海中回旋着的是"兹事体大",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阐述这段历史。它不同于旧的修史;在体例上应兼收"篇章体"与"纪传"、"编年"、"会要"等各种体例的长处。④

当他借调到近代史研究所时,所里已于1972年建立了民国史研究组,制定了编写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要编写一部共分三编、六卷的《中华民国史》和作为这部书附录的三套资料。《中华民国史》的三编是:(一)创立时期(一卷),(二)北京政府时期(二卷),(三)国民政府时期(三卷);三套资料是:(一)《中华民国大事纪》,(二)《中华民国人物志》,(三)《民国史专题资料》。

孙思白先生认为,《中华民国史》的框架定了,但开展研究工作,还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中华民国史》的合理性问题,二是《中华民国史》的主体问题,三是资料收集与研究的全国大协作问题。在《中华民国史》的合理性问题上,孙思白认为大陆与台湾都存在思想障碍。就大陆说,民国史包括一部分旧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与全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孙思白先生说:

> 已经习惯于用"近代史"和"现代史"划分的人,会感到有些别扭。我们说,这是出于不同角度的考虑。从社会性质划阶段或以革命性质划阶段是一种划分法,从另外的角度写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划分法。"断代"写史的体例,更多的是从政治上或政权上着眼的。这固然是旧史书体例中习见的一种,从政治上推究一代兴亡之故,从整理与保存一代文献上考虑,也有它的合理之处。⑤

从通史的角度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只有掌握政权的阶级能够代表它,而政治(政权)的影响力是涵盖全社会的,其影响力之广、之大,非其他任何因素可比,因此,写一代通史,只能从政治或政权上着眼。从台湾方面说,学界与舆论界认为大陆编写《中华民国史》,是"诡计"、"阴谋",其中,"台湾历史学者对我们所定的民国史下限止于1949年,最生反感,认为我们意图暗示'结

---

① 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前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

② 1980年代初,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为蓝本,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现代史》(上下册)、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上下册)等相继出版。

③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④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⑤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47页。

束'台湾境内的'中华民国'的历史"①。孙思白先生就此分析说：

这应当尊重历史的实际情况。历史的实际分为两个方面：国民党政权1949年从大陆撤退，继续在台湾一省执行它的统治权以至于今，这诚然是事实；但在全国大陆范围内建立了自辛亥以来从未有过的统一的政权，这也是铁的事实。……绝不可能把1949年以后以迄今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抹去，而仍然当成"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民国历史去写；这从我们看，是理所当然，否则便成荒谬。……从尊重历史实际出发，我们的《中华民国史》一书下限止于1949年……是无可非议的。②

关于《中华民国史》的主体问题。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长期以来成为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对此，孙思白先生说：

《中华民国史》是不是应以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主体来综合地叙述这段时期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呢？……《中华民国史》着眼于政权的兴灭，它是"断代史"。与中国旧史书比较，旧史书以统治阶级为主体，《民国史》也比较地偏重写统治阶级的历史，在记述的对象上或许没有太多不同处；但在编著者分析问题的方法上则大有区别。……既然民国史以写统治阶级的活动为主，那么是不是都加上"反动的"的限制词呢？显然不行。这段时期内的统治者和当权者，除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属于反动的以外，还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广州国民政府时期都不是反动的统治。就是护法政府时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中的国民政府时期，也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反动的统治时期"……总之，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统治阶级活动的历史，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在这个统一的认识下，不但要敢于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而且要给历史的反面人物树碑立传。③

关于搜集、整理资料与专题研究的全国大协作问题，孙思白先生指出：

民国史的资料的特点是浩繁而分散。……不说"回忆录"之类的"活资料"，单就纸上的材料而言，公私机关档案、期刊、报纸、年谱、日记、函电、家谱、行述、纪念册、诗文、手稿、图片等等，不是患少而患太多。……"专题研究"是编写民国史……另一必须度越的关。不广泛开展专题研究的工作，不可能有较高水平的《民国史》著作出现。但是以往民国史的专题论文实在寥若晨星。……总起来说，从"资料"到"问题"，从"问题"到"民国史"，是三层台阶，后者必须以前者作基础。由于"民国史"还是一块待垦的荒地，非有相当多的力量投入不可。因此，需要建立起许多据点，组织成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系统，把力量首先集中到整编资料和开展专题研究两项工作上来。④

由于孙思白先生不遗余力地组织、推动与奔走呼号，民国史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相应成果。正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同志所说：

在民国史研究刚刚起步、各方面尚有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孙思白同志积极工作，在民国史研究的体例、范围、写作等各方面均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意见，为民国史研究的顺利开展与定位以及民国史学科的创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民国史研究早期重要的开拓者之一。⑤

## 二、推动民国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孙思白先生指出，中华民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着鲜明特点的时期。其特点：一"是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最集中的时代，是民族危机最深刻的时期"；二"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发

①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②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56页。
③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50页。
④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52页。
⑤ 《孙思白纪念文集》编辑组编：《孙思白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

生根本变化的时期";三"是一个我国社会剧烈动荡和转变的时代,它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荡来荡去,才统一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四是"民国史还是一个空白"①。中华民国史,这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几乎每一节、每一目都是亟待研究的专题。正因如此,孙思白先生自解放初期,就从革命史角度介入民国史研究,调入民国史研究室以后,在组织推动民国史研究之余,就民国史研究诸专题潜心研究,取得颇多拓荒性成果。

(一)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研究

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民国史学科,在时间上是距现实最近的学科,与现实的关系最为密切。孙思白先生认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民国史距现实最近,区别历史与现实有一定困难,孙思白先生提出了区分二者的原则:"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历史的研究工作,应以过去稳定了的现实为范围。当一历史事件还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时,它应不属于历史的范围,只属于现实的范围。……一事件的过程还未终结,本质还没有暴露清楚,就不要忙于作为历史问题来考虑。"②那么,区分(民国)历史与现实的"界标"是什么呢?孙思白先生认为:"一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出现了阶段性,即'告一段落';二是事物的本质到一个段落已暴露到十分之七八,人们大致对它各有了一些片断的却又是共同的认识;三是具备了足够说明问题的材料。到这时,这些问题大体上就可以作为历史问题来探讨和总结了。"③所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并不是指昨天或前天,而是指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已经冷却了的现实。

其次,历史与现实又是密切关系的,现实是历史诸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延伸……在区别基础上找出两者间内在的、全面自然的联系才是真联系。"④当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与现实相联系时,总是以现实为参照,进行逆向思考。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⑤。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彰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的知识性、历史的借鉴性以及历史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巨大威力。

(二)关于军阀史研究

军阀史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块待开垦的园地。为了推进研究,孙思白先生在1980年代初发表了《北洋军阀统治史提纲(1912-1928)》(《齐鲁学刊》1983年第5、6期)与《试论军阀史的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两文。关于军阀的含义,孙先生指出:

> 我们把民国史上那些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称之为"军阀"、"军阀集团",就是意在贬斥他们;他们把自己叫做"督军"、"巡阅使"、"大总统",不叫军阀。总的说来,他们是统治者,是站在与人民对立的一边,是反面人物。⑥

军阀所以产生,并在民国史上出现"军阀割据与长期混战状态",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内缺乏统一市场的小农经济造成的"。其次,"各帝国主义大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要求支配中国政治;各派军阀在争权夺利中都希望获得外国的支持"⑦,也是军阀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两个原因,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都曾经分析过。孙思白特别指出,所以在袁世凯当政时还能维持一个

①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58、63页。
②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
③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
④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
⑥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⑦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0-71页。

形式上的统一，而在袁世凯死后才出现军阀混战，“这可能和长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有关。长期的封建‘大一统’需要有一个‘一尊’权力的象征重心，并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纵然腐朽如晚清朝廷，机诈如袁世凯政府，但由于历史的积累，它仍然在占相当多数落后的人们头脑中起着一种维系力的作用。清亡与袁死之后，这样一种权力象征不复存在，于是离心倾向加大，据地自雄的割裂局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①。这一分析确是卓见。军阀的产生，固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没有形成左右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中心势力的结果，而袁世凯能维持形式上的统一并登上皇帝宝座，的确与广大国民头脑中浓厚的臣民意识有关。这一点，陈独秀、李大钊与梁漱溟都有过类似的分析。陈独秀1917年5月在反思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演讲中说：

> 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②

李大钊在1915年5月15日所写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篇《民彝与政治》中说：

> 民贼之巢穴，不在民军北指之幽燕，乃在吾人自己之神脑。是则犁庭扫穴之计，与其张皇六师，永事戒备，毋[毋]宁名将盘营结寨伏于其脑之“神武”人物，一一僇尽，绝其根株而肃清之。③

梁漱溟在反思自己从文化上认识辛亥革命失败、军阀割据的原因时说：

> 安分守己是中国人的标准态度，盖从其依重家庭家族的社会生活训练出来，而习惯于斗争竞争的西洋人则为其依重集团生活的社会形势实使之然。募仿西洋的中国宪政制度太缺乏社会基础和历史文化背景，固宜其建立不起。④

孙思白先生所说的“大一统”观念当然就是建立在陈独秀、李大钊与梁漱溟所分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崇圣”、“尊君”、“安分守己”等心理基础上的。

孙思白先生还指出，军阀混战“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窒息了农工商业的正常生机，阻碍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发展”⑤。但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最终战胜了分裂，实现了民国历史上的统一。

（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

1960年代初，是孙思白先生学术研究的盛年期。这个时期他陆续发表了《试论五四文化革命的分期及其前后期的转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研究五四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五四时期”范围的广义和狭义的理解》（《文汇报》1963年5月16日）、《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等三篇民国研究的有代表性且影响广泛的学术论文，奠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在前两篇文章中，他主要提出与分析了两个问题。

1. 提出“五四时期”的概念与起止时间，并得到学术界公认。

“五四运动”这个称谓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已经出现。1919年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致其他社会团体的《总罢课宣言》的电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提法。但是，“五四时期”的提法则出现得比较晚。孙中山先生1920年1月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已经从宏观上论述五四运动，即包括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1935年5月5日，张奚若先生（1889－1973）在《大公报》发表《国民人格之修养》一文，也认为五四运动应包括“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对此表示“大致赞同”⑥。何干之先生在193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说：

> 五四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始于《新青年》的初刊，而终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新青年》是

①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②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③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④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7页。
⑤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⑥ 胡适：《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5页。

民国4年(1915年)发刊的,人生观的论战,是结束于民国12年底。①

这里已提出五四启蒙运动的起止时间,但没有提出"五四时期"的称谓,也没有进行论证。华裔美国学者周策纵先生在其1960年用英文出版的名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说:

"五四时期"这个概念实际上被许多中国作者非常不严格地使用着。……对这个运动主流的考察表明,运动中的主要事件大多发生于1917年初到1921年底这五年时间内。由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使新思想和新文学改革运动壮大了力量,而1920年后,运动更多地是在直接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来,有一个时期思想和社会改革或多或少被忽视了。因而,有理由把"五四"时期限定在1917到1921年这段时期内,而这个时期又可以"五四事件"本身分为前后两个阶段。②

周先生虽然赞同"五四时期"的提法,但是当时大陆读者对这部著作并不了解,一直到1990年代,此书的中文译本才在大陆问世。彭明先生研究五四运动着手较早,但他是从微观研究入手,对"五四时期"的概念并没有特别提出。可以说,孙思白先生是中国第一位从宏观入手提出、论述"五四时期"这个概念并得到学术界普遍赞同的学者。他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以"五四"为界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分为两个时期的启示中提出了"五四时期"的起止点:"从1915年9月到1921年6月是五四运动的全部过程。"这个时期的具体分期是:

(一)前期:1915年9月至1919年5月。第一阶段: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至1918年11月《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发表。第二阶段:1918年11月至1919年5月五四运动。

(二)后期:1919年5月五四运动至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前。③

这样划分的理由是:第一,《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辛亥革命失败以来革命意志跃起的新开端,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告一段落,因此以《新青年》创立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作为五四时期的起止点。第二,以五四运动为界标把五四时期分为前后期,显示出新文化运动性质的重要转变。第三,上述前期第一阶段的特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向封建复古的旧文化作斗争。前期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新文化的主流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但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已开始孕育。五四时期后期的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主主义文化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在《研究五四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一文中,孙思白又提出"五四时期"的广义、狭义问题:

狭义的,是从1919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到6月28日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着眼于运动的发生到斗争的直接目标获得初步胜利。广义的,我认为应从1915年9月《新青年》(第1卷名《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也可以称为"五四文化革命时期"。④

至此,完整的"五四时期"的概念形成了:一方面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文化向封建主义旧文化作斗争的前期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后期,反映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思想逻辑发展的全过程;一方面是包括涵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广义的"五四"与专指五四爱国运动的狭义的"五四",反映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互动关系。

2."五四"前期向"五四"后期的转化问题。

孙思白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向后期转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既然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群众必然要求一条革命的

① 何干之:《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0页。

②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③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④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

新路。其次，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五四”以前与“五四”以后的共同任务，也是前期与后期之间内在的联系纽带。同时，又是前期向后期转化的内在可能性。第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五四后期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向后期转化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先后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找到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之路。后期新文化运动，在以下三方面达到了前期所不可能达到的成就：(1)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社会主义制度；(2)抛弃个人英雄主义的革命，肯定发动阶级斗争，依靠工农群众进行革命；(3)一定程度地克服了形式主义，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到事物本质，从而对各种社会问题要求有一个根本解决①。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

(四)关于陈独秀研究

毛泽东在解放前说，将来修中国历史时，要讲一讲陈独秀的功劳。解放后，他对陈独秀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1955 年在一个批示中说陈是著名的大叛徒，“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②。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后陈独秀是被作为反面人物进行批判的。1958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过一本《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对陈独秀的研究，开始于 1960 年代初。孙思白先生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是开山之作。他把陈独秀一生思想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0 年 10 月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占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1927 年以前)是马克思主义为其行动作主导的阶段；第三阶段(1942 年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阶段。《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是论述第一阶段的思想。在对陈独秀的一片批判声中，孙思白先生以其学者的良心，大胆肯定陈独秀前期的进步作用。他认为陈独秀前期思想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主导，“认定中国必须继续要求实现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但要民主政治成功，更为首要的与根本的问题是在于革新伦理道德和文学思想”。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抨击专制政治，主张国民政治，鞭挞封建道德，讴歌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的旧文学，倡导抒情写实的新文学。“他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颇为勇猛激烈。尽管他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但进步作用的功绩，在本时期内是其主要的方面。正由于此，他在‘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博得很高的声誉。”③但不可否认的另一面是，他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与不正确的世界观由于在后来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成为他后期一系列错误的根源。这篇正确评价陈独秀前期思想的开山之作，在极左思潮统治学术界的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中受到急风暴雨式的批判。

《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作为冲击学术禁区的开山之作，是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其失误之处。他认为陈独秀“在文化战线上是勇敢的斗士，到了政治战线上便成了软弱的懦夫；……一勇一怯的两重人格集中于他一人之身，构成显明突出的特点”④。其实，陈独秀在政治上的消级态度是与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根本主张相一致的，并非一勇一怯。“九·一八”事变前，他同刘仁静曾谈起办《新青年》的起因。刘仁静回忆说：

> 1915 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对他刺激很大，他认为中国还是军阀当权，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因此他就写文章批判孔子，批判旧礼教。这一点陈独秀是有贡献的。⑤

改革开放以后，陈独秀研究已经解禁，并先后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与《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但也不无遗憾：陈独

---

①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13 页。

② 毛泽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3 页。

③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61 页。

④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51 页。

⑤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选编：《“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14 页。

秀去世已近70年,《陈独秀全集》至今未见出版,也没有恢复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

(五)宋庆龄思想研究

宋庆龄先生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勇敢捍卫者,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之一。她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应该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内容。孙思白先生发表于《文史哲》1953年第2期的《宋庆龄先生的思想毅力与伟大成就》一文,概述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历程。

(六)"五四"以来反对封建文化的研究

从文化角度说,中华民国史是民主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民主主义文化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反对封建文化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内容。孙思白先生与笔者合写的《"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一文粗线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①。

(七)妇女运动研究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1981年9月,孙思白先生在全国妇运史工作会议上作了《试谈〈中国妇女运动史〉的编写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妇女运动问题②。

(八)学生运动研究

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五四时期,数十万学生走在运动前头,并且与工农结合,把中国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学生运动依然是重要组成部分与推进革命走向高潮的重要动力。孙思白先生很重视学生运动研究,因为它是中国革命史,从而也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九·一八"与"一二·九"这两次学生运动高潮的比较中总结学生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他指出,学生是革命先锋,但不是革命主力,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一二·九"运动在学生运动史上突出的标志③。

## 三、对孙思白先生学术成就的几点认识

无论作为民国史学科建立的推动者,还是作为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孙思白先生都当之无愧。正如朱信泉、严如平二位先生在《缅怀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孙思白同志》一文中所说:

> 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在近代史研究所设立民国史研究室,思白同志继李新之后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领导组织全室的研究工作,更是不辞劳苦。他对民国史研究的范围和著作的体例及编撰的要求等诸多方面,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为民国史学科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④

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比较全面、完整、翔实地记叙了这30年间的历史真实,"因而成为几代人研读的传世之作"⑤,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他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篇论文,是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框架之作,得到学术界好评,开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新局面与陈独秀研究的新起点,是后来的五四爱国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者绕不过去的学术成果。

他的民国时代是"大转变"时代的思想,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孙思白先生说,民国时代"是一个我国社会剧烈动荡和转变的时代,它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荡来荡去,才统一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⑥,道出了民国这段历史的最本质的特征。这个时代,无论是政治、

① 文载《文史哲》1979年第2期。

②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4－81页。

③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187页。

④ 《孙思白纪念文集》编辑组编:《孙思白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⑤ 《孙思白纪念文集》编辑组编:《孙思白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⑥ 孙思白:《孙思白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经济、文化、学术，还是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都是我国自古以来变化最迅速、动荡最激烈、转型最全面的时代。可是这一重要看法却没有在《中华民国史》第一、二编中体现出来。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序言"说：

> 《中华民国史》主要地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长兴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构成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①

从上述关于中华民国史主要内容的说明，可以明显看出并未摆脱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史框架的严重影响。在《中华民国史》第一、二编所包含的历史时期内(1905－1920)，正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极其重要的时期，但从该书第一、二编的章、节内容来看，民国史应该涵盖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教育与学术的变迁，宗教、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妇女生活状况的变迁，都被排除在作者的视野之外，孙思白先生关于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剧烈动荡和转变的时代"这一重要思想没能在《中华民国史》第一、二编中体现出来，应该说是不无遗憾。个中缘由，笔者在《孙思白史论集》"序言"中似乎看到一些影子：大概他的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一职，在任命后没有多久，就名存实亡了。

不能独立的学术不是真学术，孙思白先生对此是勇敢坚守、矢志不渝的。民国史与现代关系极为密切，是一门标准的"险学"。民国史研究刚开始的时候，"四人帮"还没有被粉碎，极左思潮盛行，编写人员顾虑重重。孙思白先生引导大家说：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写真实、信史，用事实说话，客观公正，就不怕什么帽子、棍子。但棍子还是不期然而至。

> 在《人物传记》第二辑出版后不久，一员"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搞斗批改"的领导人批评说："传稿有客观主义倾向，应向'梁效'、'罗思鼎'的有关文章学习。"……思白同志……坚定地认为，各篇传稿虽是习作，亦并非没有缺点，但都是注意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尽可能地占有史料，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实事求是之作；如果说有不足之处，倒是某些篇中仍有评断过苛、用词不当等不够客观公正的毛病。②

孙思白顶住了极左思潮的干扰，保证了《人物传记》的客观公正性。如前所述，《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也是坚持学术独立、坚持求真精神的产物。文章发表后，即使遭到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孙思白先生也不改初衷，坚持学术观点不动摇。

孙思白先生的学术成果所以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由于他的治学态度严谨。他认为，一篇学术论文，或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一定要反复切磋琢磨，不断修正错误，才能达到完美。不论研究一个历史事件，还是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当然要尽量掌握全部资料；但是，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文章写成之后，不要急于发表，文字出门要谨慎，不妨压一段时间之后再拿出来看，一定还会发现学术观点与文字表达方面的不甚妥当、完美，甚至错误之处。只有经过反复修改，才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1960 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教师，以孙思白先生为主成立了一个思想史讨论班，每两周一次聚会，或就某一专题进行讨论，或交流心得体会，或报告新写就的论文。从这个思想史讨论班不仅走出了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路遥，走出了著名宋史专家华山，孙思白先生自己在学术高峰期的学术论文，也都是在这个思想史讨论班上不断讨论、修改后写成的。正是孙思白先生捍卫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使他的学术著作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保持历久不衰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① 《中华民国史·序言》，《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 页。

② 《孙思白纪念文集》编辑组编：《孙思白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第 185 页。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而今诸神皆粪土,犹有深山问道人

## ——赵俪生先生的思想与学问

秦 晖

**摘 要**:赵俪生先生是一位信仰执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赵先生平生之学涉猎极广,在所谓"五朵金花"的讨论中,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土地制度史方面,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是持"魏晋封建论"的重要学者。晚年他又转向思想文化史研究。而赵先生对晚辈和学生的治学倾向持十分开明的态度,这一点对后学的影响,也将垂于久远。

**关键词**:赵俪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古史分期;思想文化史

### 一、"新学"与"官学"

赵俪生先生(1917－2007)是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人。景芝是明清山东四大名镇之一,工商业曾繁荣一时,附近一带人文士风也颇为醇厚。先生父母均出自旧时书香门第,但在 1917 年先生出生时家道已衰,幼年失怙,随母迁居青岛,靠两个姐姐打工为生,生活贫困。而青岛又是个开放的商埠,得新文化风气之先。可以说,先生自幼既深受国学熏染,又痛感社会不公,兼沐欧风美雨之新,这三点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学问,都有明显的影响。

赵先生在青岛胶济铁路读中学时受新文化人物宋还吾校长等人影响,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业之外开始翻译国外进步文学作品。到 1936 年"一二·九"运动时,先生作为热血青年积极投入学生运动,曾在游行中与王瑶、郑天翔、姚依林四人抬棺先行,被传为美谈。此时先生参与北平左联、学联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工作,开始与中共革命事业发生长久的关系,并终身保持着这时形成的信仰。他不仅在敌后战场上与国统区文教工作中不忘救国与革命,治学后也一直自认为左派学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据同仁回忆,当年他与学界朋友发起创办《文史哲》,他执笔写发刊词,讨论时说宗旨是要办成党的、人民的杂志,"要是给人一个同人杂志的印象就不好了"[①]。赵先生自己是搞中国古代史的,但他推荐发表学生的处女作多是《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之类与当时的革命有关的文章[②]。更不用说先生学术生涯中一生用力最勤的领域——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兴起的新史学方向。直到晚年访美时,先生还对"资本主义社会"很是看不惯,并与留美的老同学就当年的"左右"发生争论。可以说,先生一生都是个信仰非常执著的人。

按今天流行的说法,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有所谓"五四一代"和"一二九一代"之别。论资历,先生

---

**作者简介**: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① 殷焕先:《祝〈文史哲〉精神发扬光大》,《文史哲》1986 年第 5 期。

② 葛懋春:《回忆早期〈文史哲〉杂志社社长华岗同志》,《文史哲》1981 年第 4 期。

与后来的一大批高官都同样属于“一二九一代”。但先生从来没有加入“组织”，据他晚年自述，当年别人劝他入党，他考虑后说：“我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众所周知，为此他在人生道路上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直到晚年，先生还深有感慨地说：“我几十年来从来不是哪一级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位好事之徒到省委书记那里去质问，回答说，每次增选名单都提上他去了，可每次党委审查会上都通不过，大家的理由是‘这个人谁也掌握不住’。这个话的逆定理是，只有党能掌握住的才能当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那么，我宁愿一辈子不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仍能愉快地生活，丝毫没有吃亏感。”[①]对此，一位书评作者说：“‘这个人谁也掌握不住’，这句话今日看来，实在是‘光辉写照’。”

先生早年的一位高足曾经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经历过一个从“新学”到“官学”的过程，也就是从生机勃勃到僵化教条的过程。笔者觉得这个概括很准。马克思主义史学当年传入中国时并没有政治权力作为背景，也不是什么“主旋律”，但它很快便成为一种生机盎然的“新学”，在当时人们痛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梁启超语）的时代，这一新锐的史学思想以其重视经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视野，关注社会进步的进化论视角，同情下层与芸芸众生的人文关怀色彩，注重逻辑与实证的科学精神，和经世致用、与现实社会改造事业密切相关的特点，吸引了大批思想开放、学养深厚而且忧国忧民的学人。尽管这种史学远不是所有观点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际上其内部也是百家争鸣，很难说有什么标准的观点，但它给传统史学带来的变化，总的来说符合近代文化的人文与科学两大方向，即便是在国际上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派等非马克思主义主流学派那里，也是得到肯定的。

“一二·九”运动后不久，抗战烽火燃起。赵俪生先生和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到山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曾任营指导员。两年后因病离开部队，病愈后在大后方从事文教工作。1946 年底，他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这时他业余从事文史研究已经崭露头角，1947 年夏经傅斯年推荐到河南大学任教，受聘为文史系副教授。

1948 年开封第一次解放后，赵先生进入解放区，先后任职于华北大学、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和东北师范大学，1950 年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授。此时的赵先生作为一个新锐的左派学者，学术兴趣与革命热情同样高涨。他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通史”等课程，作为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使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这些著名大学站住了脚，而他开设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课程，在新史学中更具有开创之功。但也就在这时，“新学”与“官学”的矛盾开始发生，血气方刚、为人耿直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赵先生看不惯一些“官学”人物的颐指气使，与华北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两次发生冲突而出走，直到到了山东大学，在爱才的老革命家同时也是“新学”大家的华岗校长支持下，赵先生的才华始能得到充分发挥，学术事业出现一个高峰。

然而好景不长，首先是华岗校长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中箭落马，接着“反右”来临，本来很左的赵先生初期还积极批判过其他“右派”（先生后来跟我们说，他原来认为这只是思想斗争，没想到后来变成“性命攸关”了），最后自己却被“补划”成右派，而且还被定为“极右”！

何以如此？有人说是因为他秉性耿直得罪了领导，又发表过一篇《放的关键在于领导》的文章。这些当然都是直接的原因。但笔者认为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赵先生的史学思想虽然比当时的主流更接近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却很难为这一主流所容。尤其是赵先生一直最为强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一直为主流所排斥。而实际上，主张过这一理论的人，大概除情况比较特殊的侯外庐先生外

①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81 页。

(侯先生在"文革"时也未能"除外"),无论个人性格如何,在那个时代几乎都吃够了苦头。如果我们看到甚至在改革后的1990年代,官方还专门组织过对这类主张的"大批判"[①],就会理解赵先生如果不曲学阿世放弃这类观点,事实上是很难逃过打击的。

此后在漫长的二十年间,赵先生不仅被剥夺了学术权利,而且经历了丧女、失业乃至几乎饿死的人生苦难。但是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对生活、对学问的热爱,熬过了漫长的逆境,在改革时代又焕发了学术的青春。这个时期他思如泉涌,厚积厚发,不但对多年来一直从事的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且发挥了他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特长,在文化史、西北史地等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对他初入史林时就涉及的明清之际学术史、尤其是顾炎武的研究也进行了新的推进。

然而直到晚年,先生史学思想中自成体系、对学界影响最大的部分,仍然是当年作为"新史学"的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等。晚年的先生(以及先生的夫人高昭一先生)通过回忆、自传等文字对"极左"的专制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但同时仍然坚持信仰。因此可以说,尽管先生的"新学"几十年来并不为"官学"的正统所欣赏,有二十年间还几乎为意识形态体制所吞噬,但如果要对既往的"主义史学"遗产进行精华与糟粕的分析,那么赵先生的学术历程应该是这一遗产中"新学"与"官学"冲突的标本了。2007年先生遽归道山时,笔者曾有悼诗云:"投笔从戎乃血性,卸甲读书为率真。平生不务趋时举,我行我素一凡人。""学宗马列为求真,岂料违时竟渎神。而今诸神皆粪土,犹有深山问道人。"如今我们从先生几十年来的深山问道中,仍能受益无穷。

##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谛

赵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土地制度史方面,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那时"魏晋封建论"的论述途径实际上也分为两支:一是从秦汉时代大量的奴婢存在论证当时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因此只能是魏晋以后的事。由于"三代"人们皆归族群,个体家庭经济似有似无,除非把族群之间的征服与从属(如所谓"野人"对"国人"的关系)都牵强附会为"奴隶制",如果就私人拥有奴婢而言,秦汉确实比西周发达得多。但是要说那就是"主要生产方式"因而构成"奴隶社会",还是很难成立。二是并不强调奴隶制,而是主要从秦汉国家的中央集权专制和经济垄断、经济统制来论证它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马克思所说的"封建"如欧洲中世纪那样,是与中央集权完全不同的。赵先生就是如此。当时赵先生认为重要的不在于划一条线来区分"奴隶制"与"封建制",而在于用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来理解中国古代。

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学家"不同,赵先生其实并没有怎么写过专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部头文章,但在他的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重要的新史学著作中几乎都贯穿着这一理论主线。1978年,早在笔者尚未正式成为先生弟子的研究生复试期间,他就赠给笔者一本日知译的早期繁体字版《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这篇关于"亚细亚方式"最详尽的叙述是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的一节,而日知译本是流传很少的非正式译本。后来该手稿有刘潇然译本和中央编译局的《全集》第46卷本,但在1978年,这两个版本都尚未面世。老实说,刚刚从大山中走出的笔者当时读得是一头

① 参见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雾水，这不仅因为该文作为手稿本身就写得艰涩，日知又只译出其中一节，没有上下文实难理解，而且这种早年译文与后来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也有不小差异。当时笔者不明白研究中国史何以要必读这样一本书，后来才渐渐理解了其中的深意：

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理论与“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古代或“传统”社会以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为特征，而近（现）代化意味着个性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自由人的契约联合，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各种“进步”思想的共同观点。举凡卢梭、黑格尔、梅恩、密尔、滕尼斯、迪尔凯姆乃至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么看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的演变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①。

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马克思当时说的“亚细亚”有如下基本特征：它是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时没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酷的专制主义和“普遍奴隶制”。

但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吗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吗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于是后来的苏联就出现了“两种类型”说和“两个阶段”说的长期论战。前者认为“亚细亚”只是东方“水利灌溉”地区的特殊社会类型，不适合于欧洲与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区。后者承认“亚细亚方式”不仅亚洲有，但说它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无私有”是原始特征，“专制国家”是奴隶社会特征，因此它似乎应该是“早期奴隶制”或曰“不发达奴隶制”，与后来的“典型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但是，这两种说法在实证上与逻辑上都有大量的破绽。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说法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事实上，当普列汉诺夫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进行反专制斗争时的确运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当时的沙皇专制“公社国家”，他们斥责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共耕’”，指出“俄国农民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疾呼“农村公社对农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了”，还把支持独立农民、实现退社自由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土地纲领的“唯一内容”。他们同样抨击当时的民粹派美化农村公社、抵制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为“亚细亚专制”张目，是反动的“警察民粹主义”，是追求“古代中国或秘鲁式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②。那时“亚细亚专制”之说在现实中既有如此作用，学术上又还没有与当时并不存在的“五形态”官定模式发生冲突，所以它曾经是反专制的马克思

① 以上均见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7、40、242、258页。

主义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从普列汉诺夫、早期列宁直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波克罗夫斯基，都娴于此道。

然而到苏联时代形势大变，布尔什维克自己搞起了更严厉的“公社国家”，同时确立了“五形态”的官方史学，“私有制”被判定为“剥削压迫”的唯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过也从维护“专制公社”变成了鼓吹“小农自由”。于是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险。苏联时期为此曾屡兴大狱，很多人为此掉了脑袋。在我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正如赵先生直言的：“当代现实是把阶级斗争强调到近乎绝对化的程度，地主是万恶之源，怎么不强调（谴责）地主所有制，反而强调（谴责）国家所有制呢？”①

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于是在我国，“亚细亚方式”理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

偏偏赵先生这个“不识时务”的天真左派很执著于这个理论，在1949年后的几次讨论中他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最热情的弘扬者。根据赵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接触这一理论是在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有中译版之前，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懂得了所有制衍变发展的全史”，“国家所有制在前，而私人所有制在后，这是我明白的第一点”。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私有制因素一直在努力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因此“对照我们中国的历史，那种纯粹的私有财产，……在鸦片战争甚至土地改革以前，怕是一直不曾出现过吧”②。

现在我们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被介绍到中国是在抗战时期。那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的旗帜下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国家”的时代。那时不仅政治上自由、民主都是反独裁的革命口号，经济上国民党的国有制（共产党称之为“官僚资本”）也被视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而私营工商业则被褒称为“民族资本”，国民党搞的国家垄断、国进民退，则被谴责为“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可想而知，那时争取自由民主的左派青年在反对国民党专制时读到这种“亚细亚方式”理论时的心态，与沙俄专制的反对派普列汉诺夫们应当说是非常相似的。与其说他们是在对古史实证资料（1940年代人们知道的古史资料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充分掌握后觉得与马克思的叙述恰好契合，不如说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使其在价值判断上倾向于这种解释。

但是到了后来，“官僚资本”易主后换块牌子，就从万恶之源变成了百善之首的“国营企业”，国进民退也从“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变成“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了。而赵先生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变得“不合时宜”起来。例如在当时的“古史分期”讨论中，赵先生他们主张的“魏晋封建说”之所以一直不是主流并屡被压制，也并非因为此说在实证上不如正统的“战国封建论”，而是由于此说在“古史分期”诸说中受“亚细亚方式”理论影响最大，言必称“共同体”，不如把“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当作头号“封建”标志的郭沫若一派更合乎“时宜”罢了。

今天我们论史，早已不必纠缠于“古史分期”的意识形态外壳。从思想史上看，走下神坛的马克思对早期社会的看法演变也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当年把“共同体”看作“人的依附性”之源，这本属从启蒙时代继承来的自由思想所致，很难说是纯粹的史学论断。后来马克思的变化，主要是晚年受摩尔根的影响，明确区分了“部落”与“氏族”，并放弃了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或部落的观点，转而认为“氏族解体”产生家庭。

但是这一点究竟能引申出什么，看来直到最后也并不清晰，我们只知道马克思晚年大量阅读人

① 《赵俪生学术自传》，《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② 《赵俪生学术自传》，《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46页。

类学著作，试图有所总结。他死后，恩格斯根据自己对摩尔根的理解（马克思是否同意这种理解，人们已无从判断）写成《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这才完成了对人类原初状态的描述从“亚细亚专制”到“原始平等”的变化：原来由家庭（当时人们理解的父权制家庭）—氏族（族长制宗族）—国家（专制帝国）同构的共同体观念使马克思这时设想的最早共同体虽无“私产”，但极端专制。而后来摩尔根的“氏族瓦解为家庭”观点则引申出“父权（专制）源于私产”、“原始公社”却对应于“原始民主”、“原始平等”的说法。后人不察此变，以大加宣传的“原始公社”为马克思的终身主张，于是遂有“亚细亚”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的无谓争论。

而更重要的是，正如赵先生所指出的：原来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有一种“公（初民共同体）——私（个人自由财产）——公（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三段论宏观历史假设。但是，不仅第一个“公”在马克思那里是“亚细亚专制”，比在恩格斯那里的“原始平等”更具负面色彩，而且中间那个“私”的定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马克思那里它只指“市民社会”（即今天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此前的全部历程（包括后来被划为所谓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等的“前资本主义”时期）都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其“进步”的方向（包括“民主革命”的经济内涵）是从“共同体的躯壳”中解放私产，实现财产自由。只有到“市民社会”发达后才谈得上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而到恩格斯那里，“私”却成了“原始社会”之后所有“阶级社会”（包括“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等）的共同特征，于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似乎反而具有了摧毁财产自由的性质。

当然，即便在恩格斯那里，“家庭、私有制与国家”本也是一丘之貉，恩格斯并没有保留“国家”与“家庭”而单单取消“私有制”的主张，他理想中取代“私有制”的也应当是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是什么“国有制”。然而到了俄国人那里，崇尚不受制约的强大国家、把“私有制”变成“国有制”就成了新的教条，无怪乎那种贬斥“土地国有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要遭厄运了。

今天看来，我们不必把马克思当年推论的“亚细亚”当作实证的历史学命题。但摩尔根的“原始平等”也受到后来的人类学实证的挑战。至于说“亚细亚方式”作为“原始社会”之后的下一阶段，则不但历史上无法证明，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这种想法。然而更重要的是：并非实证史学概念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为一种批判专制、倾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资源，今天并非没有它的价值。

在这方面，后来的魏特夫把它曲解成一种以“治水”为起因的地理决定论概念，并用来专指“东方大河流域灌溉农业区”，这是不能成立的。尽管马克思也有关于水利灌溉的片言只语，但在逻辑上他明确地把“交换不发达”导致共同体对个人的控制这一点作为“亚细亚方式”的基本形成机制，并把它视为普遍存在的人类早期现象。俄国这个并无灌溉农业传统的地方经常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亚细亚式国家”就是旁证。而赵先生也明确指出，他认为“亚细亚”特征最浓的先秦三代并不是什么“水利社会”[①]。即便在接受摩尔根影响后，前后期马克思、甚至到恩格斯，关于从共同体的人到个性化的人的基本历史哲学理念仍然是一以贯之。直到“前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分界，普列汉诺夫关于“剥削者的公社与被剥削者的个人”的名言即为明证。应当说，追求作为普世价值的自由，这种精神遗产的确不仅仅来自“右”边。至少，经赵先生传承于我们的“亚细亚方式”批判理念，对笔者的确有很大影响。

## 三、土地制度史：“私有制深化”与“共同体障碍”问题

土地制度史是赵先生学术成就的更重要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耕耘了约 20 年。在笔者看来，这既是先生“社会形态”研究的实证化，也是他农民问题研究的深化。“古史分期”脱开意识形态外衣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史问题，赵先生在 1950 年代讨论时主要是讲理论，但从那时起他就关心“食货”之

①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赵俪生文集》第 2 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1 － 22 页。

学。被打成“右派”前，赵先生致力于研究农民战争史。遭厄运后发表文章困难了，反而使先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按赵先生用他那个时代话语的说法：“从研究爆发时期的阶级斗争深入到研究一般时期阶级关系的演变”。

我国传统食货之学从朝廷财政偏好出发注意田制（朝廷的土地管理）、赋役问题，而现代的“阶级斗争史观”喜欢强调民间的租佃、雇佣、奴隶等关系。从大范畴讲，赵先生无疑属于后者，但前面提到的那种现实感与理论爱好，使他实际上更重视“超经济”关系而非民间的经济往来。因此他谈租佃、雇佣较少，而谈“田制”更多，在时间上则偏重于“田制”作用更大的宋以前，而略于宋以后。然而赵先生谈“田制”自然不同于传统的食货之学。他自谓：“我从事这个项目（按即土地制度史），也有我自己的特点。我是从中国古代土地公有和集体所有解体的不利落，土地私有制中夹杂着公社残余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来展开研究的。一句话，就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研究问题。”[①]可见马克思的“亚细亚方式”理论对先生的土地制度史研究影响之大。

在另一场合，赵先生又把他的土地制度史体系归纳为“私有制深化”要克服的三个“障碍”问题，即：一、古老共同体的障碍；二、专制国家权力的障碍；三、少数民族征服带来的落后因素的障碍。他认为，私有制的发展规律是先“深化”，后被“扬弃”。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进步就表现为“冲破这些障碍”，“促使私有制早日深化，促使私有制的被扬弃早日接近实现”[②]。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应该知道，这其实是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未必是列宁主义）观点。但是在如今，这却是非常的思想解放了。且不说以此来考察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就是对于当前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不是也可以从“促使私有制早日深化，促使私有制的被扬弃早日接近实现”得到启示呢？

但赵先生的观点也不是照搬马克思的。实际上他的主张与本来的“亚细亚方式”理论已有不小差别。本来马克思讲的“亚细亚”是把“土地国有”和“农村公社”看作一回事的，一种说法认为，“农村公社”就是“亚细亚专制国家”的基层组织。而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亚细亚方式”理论抨击沙俄体制时也认为，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米尔”是专制国家的工具。这样的判断甚至影响到现实：苏俄早期与我国都曾把国家编制起来的农民组织叫做“公社”或“人民公社”。另外，马克思早先讲“亚细亚”时通常是含糊地谈论“公社”、“氏族”和“部落”等“共同体”，其间并无严格区分。但是后来受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影响，后期马克思乃至恩格斯开始区分“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而恩格斯尤其强调血缘组织“氏族公社”与地缘组织“农村公社”的区分，并认为由血缘到地缘是一大进步。当年苏联讨论“基辅罗斯社会形态”时，就为古罗斯的公社是血缘的还是地缘的（即氏族公社还是农村公社）激烈争论十多年。

而中国三代社会有明显的血缘族群色彩，按上述定义很难说是“农村公社”，但如果说那是血缘性的氏族公社，三代似乎就成了“原始社会”，又与论者想强调的“阶级斗争”无法契合。当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主流学派为此干脆就不谈“公社”，只谈“国家”，通常都说三代是“奴隶主国家所有制”（有时又说“实质上是奴隶主私有制”），商鞅变法后则变成“地主私有制”。赵先生因此批评道：“公社（Commune）这件事物，在先秦史和井田制中，是躲闪不开的，但郭老却说不能讲公社，讲公社就没有了奴隶社会；在北魏史和均田制中，公社已经不是躲闪不开的问题了，但唐长孺先生却说公社是均田农民之父，等等。这时，郭、唐是上古史、中古史的最高权威，我抖起胆来跟他们争辩。”[③]这里，先生所说的“公社”已经回避了“血缘”还是“地缘”的问题。而他认为井田制是“公社”而非“国有制”，则已经不同于把“土地国有”和“农村公社”视为二位一体的“亚细亚”理论。

显然，赵先生重视理论但并不拘泥于理论。而我们由先生的研究可以引申出一些极重要的道

①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后记》，《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②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赵俪生文集》第2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③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后记》，《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理：无论中外，在古人聚落中血缘地缘关系通常兼而有之，强分轩轾可能不切实际。血缘认同基于人性，古今中外都存在，近代只不过是人们的认同形式随社会交往的发达而日益多样化，血缘地缘而外，教缘（同信仰形成教会等）、业缘（同职业形成行业公会等）、利缘（利益联系而形成企业等）、政缘（同政见形成政党等）等各种认同也发展起来，血缘认同因而自然淡化。但不能说血缘认同就比地缘认同"落后"，地缘认同又比其他认同"落后"。那种以政治强权打击血缘认同、提倡"爹亲娘亲不如权势亲"的行为不是什么现代化，而是"暴秦"法家古已有之的倒行逆施。旧式父权族权今天应该否定，那是因为它以强权剥夺了人的自由，而不是因为它保留了血缘亲情。自由的宗亲同姓联谊与结社在任何现代社会都是正常的。这正如旧时的神权与异端审判应该否定，但信仰自由的现代社会仍会有教会；欺行霸市的中世纪行会应该否定，但公平竞争的现代仍会有同业公会；束缚人身的村社和采邑应该否定，但迁徙自由的现代仍会有社区；"贼船好上不好下"的帮派会党应该否定，但宪政民主的现代仍会有政党；奴隶庄园应该否定，但市场经济的现代仍会有企业一样。总之，旧式"共同体"的"落后"性不在于它认同于什么"缘"，而在于它的强权性即对人们自由的剥夺。

19世纪以来，国际上许多学者用于分析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概念通常不分什么"缘"，但都强调它的整体性（对个性的约束）和依附性（不可摆脱），即马克思说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公民的各种自由社团与联合，不管是政缘的党派、利缘的企业、业缘的公会、教缘的教会，还是地缘的社区、血缘的宗亲团体都不是"共同体"。例如，滕尼斯的gemeinschaft（共同体）一词主要是与近代"社会"相对而言的。尽管该词作为一般语词并无"小"的意思，像德语中大西洋联盟（atlantische Gemeinschaft）、欧洲共同体（europaische Gemeinschaft）、基督教世界（Gemeinschaft der Glaubigen）等词组中该词都表示一种庞大联合。但滕尼斯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该词时，是把它定义为一种类似于"熟人圈子"那样的小群体（相对于"民族[nation]"范围的"社会"而言）的。但是，滕尼斯在区别"共同体"与"社会"时主要强调的并不是群体的规模大小，而是两者的性质即群体的建构机制不同。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区别于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小型组织（社区、企业、学会等等）的本质之处，在于共同体的整体性即其成员的依附性和人格不独立——相对于近代公民"社会"以其成员的独立人格为基础而言[①]。

比滕尼斯更早，马克思青年时代在哲学著述中频繁使用的"共同体"（主要是gemeinwesen，有时也用gemeinschaft）概念也是比较泛化的（他提到古代的共同体，也提到"市民社会是共同体"，家庭、村社、等级是共同体，国家也是"政治共同体"，以及"人的实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等等），并没有特定的社会史含义。但后来（尤其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著作中）则赋予了这个词以类似于滕尼斯的社会学意义，即指人类在古代或不发达状态下形成的人身依附性群体。他所谓由"共同体"到"市民社会"的提法也具有与滕尼斯由"共同体"到"社会"之说类似的历史进步论含义。

不同的是，马克思除了对这种进步给出一种唯物主义的和决定论的解释外，他对"共同体"的定义也远比滕尼斯的为广。在1857年手稿中他列举的"较大的整体"中就包括了从"家庭"、"氏族"、"部落"、"部落的联合"直到"亚细亚国家"。可以说马克思与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在揭示共同体的人身依附性质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滕尼斯讲的是小的（以直接的人际交往与口耳相传的地方性知识为半径的）、"自然形成的"（一般主要是血缘、地缘性的）共同体。而马克思讲的则是"自然形成的和政治性的"共同体乃至"总合统一体"：从家族直到"亚细亚式的国家"，从原始的家长制直到中世纪封建制。

但今天看来，同样是束缚性的、不同于近代自由社团的那些传统"共同体"，其功能还是差别很大。而最明显的差别还不是在血缘、地缘等诸"缘"之间，而是在那种其内部有直接的人际交往的"熟人共同体"与更大范围的"陌生人共同体"之间。滕尼斯讲的共同体基本上就是前者，而马克思讲的

①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部落的联合"、"亚细亚国家"则属于后者。我们也可以更简单地把两者分别叫做"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小共同体虽然也不是近代自由社团,也有人身依附与个性压抑问题,但作为稳定的熟人、乃至亲族群体,它有温情纽带,有"信息对称"与"多次博弈"基础上的信任机制,因此可以更多地依靠伦理维系。国外农民学中斯科特等人所谓的"农民道德经济"就是这样产生的。而大共同体的陌生人间没有这种纽带,它的维系就要更多地依赖理性化的强制机制。必须指出:大共同体为了管理方便常形成科层结构,如郡、县、乡、里等,其中的末梢组织也是小单位,成员常常也互相认识。但这些大共同体的基层末梢与"小共同体"仍有性质的不同,因为前者的运作主要靠上层指令,而不是靠伦理。甚至于有时为了防止小共同体认同导致对大共同体的离心,还人为地破坏伦理。我国古代法家之鼓励"告亲",刘邦这种乡里不齿的痞子(司马迁说是"无赖")被任用为基层干部(亭长),乃至后来的回避制和以科举取代"乡举里选",就是这样来的。在大共同体强大的条件下,"道德经济"很难发达,但这未必就会造就"理性小农"。国外农民学围绕后两者的讨论,对于中国的实际显然很隔膜。

显然,传统小共同体不同于近代自由社团,正如大共同体有别于近代公民国家。而生活中的种种小单位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小共同体("道德经济")、大共同体的科层末梢("编户齐民")和近代社团-社区("理性小农")。笔者认为这样的区分比血缘、地缘更重要。形成这样的认识,也是得益于先生谈论共同体的启发。

近代以来国际学界谈论小共同体比较多,除马里奥特、列菲尔德等人写过关于"小共同体"的书外,各国乡村史提到的各种传统公社,如日耳曼的马克、俄罗斯的米尔、南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乃至日本的町,也都是这种伦理型的熟人共同体,滕尼斯的共同体和斯科特的道德经济实际上也讲的是这种东西。只有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涵盖了"部落的联合"、"亚细亚国家"之类的"总合统一体",这种说法强调了大小共同体的共性(传统性或前近代性,即对个性的压抑),突出了近代化过程的本质(摆脱共同体束缚的个性解放,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即自由结社取代小共同体,公民国家取代大共同体),是很有意义的。

但马克思对大小共同体的差异不加分辨,尤其是对伦理型小共同体与行政型大共同体科层末梢不加区别,把"农村公社"看成"亚细亚专制国家"的基层组织,这就是明显的局限。事实上,无论马克、扎德鲁加还是町都不可能成为"亚细亚专制"的基础,因为对小共同体的伦理认同如果很发达,其实是不利于专制的"大一统"的。甚至俄罗斯的米尔虽然行政性较强(有学者称之为"政社合一"),对沙俄帝国有支撑作用,但这样的帝国极权程度也有限。以至于后来斯大林以国家强制力量推行"全盘集体化"时,就受到村社凝聚力较强的俄国农民的强烈抵抗,反而是"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很容易就被"一大二公"了。

因此,极权帝国通常都喜欢发展科层组织,而不喜欢小共同体——如同政治上喜欢官僚制,不喜欢贵族制。赵先生批评唐长儒先生把北魏隋唐均田制说成是农村公社,的确极有见地。隋唐农村如果是像日耳曼马克那样的村社共同体,大帝国恐怕就崩解成中世纪日耳曼那种状态了。而"封建"时代的西周,"天子"行政不出"千亩"王畿,怎会有"国有制";"帅其宗氏辑其分族"的状态下又怎会有"私有制"。所以"井田"的实质的确是"公社"——宗族共同体,后来法家正是一方面强化国家垄断,一方面推行反宗法的"伪个人主义"政策,才实现了"周秦之变"而建成极权帝国的。这以后"国有"和"私有"才在小共同体的废墟上并行不悖地(也就是说,并非"私有"取代"国有")发展起来。一方面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比西周时大大强化,另一方面原来的宗族公社瓦解成"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啐语"的状态,当然,这种"私有"尽管可以发展到几乎六亲不认的地步,在官府面前却软弱无比,实际是"伪私有"而已。从这样的视野不仅可以重新认识农民史,对"农民中国"的宏观历史走向与现代化道路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 四、农民战争史：从筚路蓝缕到“雹碎春红，霜凋夏绿”

中国传统史学也有对某次“民变”的研究，如李文治的《晚明民变》及罗尔纲等人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但系统性的农民战争史，应以1933年托派学者薛农山与蔡雪村的两部农民战争史专著为最早①。说来有趣，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曾被说成是“托派理论”，但事实上，这种反对“专制主义国家”的理论主要流行于沙俄时代争取民主的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等）中，极左的托派其实并不喜欢它。在抗战前中国的社会史大论战中，中国托派从来没有说我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反，把秦以后的中国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才是他们的主要观点。正如前引赵先生所指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逻辑上引出的是谴责“国家所有制”，而不是“地主所有制”。而“商业资本主义”之说，尽管不讲什么“反封建”，但抨击“土地私有”（他们认为这是商业资本造成的）并认为农民战争是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则与后来的主流观点近似，这就是薛、蔡二书虽然因托派立场指责当时的红军，却赞赏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的原因。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反封建”说承认把土地分给农民是“民主革命”，而且古代农民似乎做不到、至少难以彻底做到这一点；而“反商业资本主义”则以土地国有化来消灭土地私有制，这是无产阶级领导农运要干的，而打土豪分田地只是传统农民战争干的事，并且恰恰体现了其“局限”所在，难成正果。

但是托派的研究以后竟成绝响②。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正统派主要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尚钺、侯外庐等先生都奇怪地对中国农民战争史不怎么感兴趣。在“反封建”这个话语体系下，人们公认赵先生是新中国史学中农民战争史这个领域的“拓荒者”。1950年代初，赵先生在山东大学最早开出“农民战争史”课程，1954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著），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文与小册子。这一时期由赵先生的著述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19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而后来农民战争史论争中有代表性的几位大家，如孙达人、孙祚民等，虽为论战对手，却同出自先生门下。直到先生在“反右”中蒙难，农战史研究被迫中断。后来他一直深以为憾，晚年还说：“农民战争史这个课题大有可为，……但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也像敦煌卷子《寡妇赋》中的两个名句，‘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场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展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了。”③

与先生早年在国统区研究明清之际学术，打成“右派”后潜心于土地制度史，晚年热心于文化史都是自己的选择不同，赵先生说1950年代初他搞农民战争史本是接受分配的任务，他自己“既无特别热烈的迎接感情，也无丝毫的抵触情绪”。当然，事业心很强的赵先生一旦干了就很投入，但既然是接受任务，基调也是先有了的。这就是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传统农民起义的那些观点。事实上，即便后来赵先生在逆境中被反复批判的那些最著名的主张，例如“让步政策论”等等，其实也是这个基调的产物。对此先生晚年也反思说那时是“带着一股幼稚和盲从”④。改革时代“拨乱反正”后，先生当年被批判的主张普遍被接受而且得到高度评价。但有趣的是，先生自己晚年对那些主张提的很少，编自选集时作为自己农民战争史代表作选入的也不是这类文章。

今天看来，赵先生在这个领域贡献最大的，第一是对自秦汉以来历次农民战争史实的系统梳理，

---

①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按：薛农山曾任中共淮盐特委农委书记，1927年前后在苏北搞过农运，后为中国托派“无产者社”的骨干。蔡雪村即蔡振德，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江苏省委书记，后为中国托派主要成员之一。

② 从种种迹象看，赵先生以及1950年代的其他学者几乎都没有读过托派的这两本书，直到改革后的1990年代才有人加以介绍，但对作者以及写作背景仍然不了解。参见侯云灏：《从三十年代的两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著看早期中国农战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9页。

④ 《赵俪生学术自传》，《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37页。

尤其是一些前人不注意的小规模民变(如唐赛儿、于七等)史实的发掘,以及对一些大规模民变中关键史料的发现。例如赵先生的桑梓先贤、明清之际的丁耀亢所著《出劫纪略》一书,当初海内仅有数本,极为罕见,连晚明文献专家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在1964年增订前也未著录。1950年代赵先生根据其家藏抄本公布了其中记载李自成政权在当地处理财产的关键记载("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云云),赵先生称为"金刚钻级史料",后来成为言明末农战者必引的首要文献。但在1980年代该书铅印出版前其实没什么人见过原书,大家都是辗转相沿自赵先生,但当时却都不注转引。

第二,在笔者看来也是更重要的,则是他那时形成的一些与上述基调不同的认识,尽管当时先生并未、来不及或者也不好系统地论述这些认识。但是实际上,既然先生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由此导致的对传统社会冲突的理解,在逻辑上是必然不同于以"封建地主制"为基点的主流,也不同于以"商业资本主义"为基点的托派的。如果说,以"封建地主制(即大土地私有制)"为基点,民变的意义就是"(农民)小私有反对(地主)大私有";以"商业资本主义"为基点,民变的意义就在于以"土地国有"反对"土地私有"。那么,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专制国家所有制)"为基点,民变的意义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推动"私有制的深化"并克服共同体与专制国家的"阻力"。赵先生晚年指出:"劳动者阶级斗争的冲击,和统治者阶层中明智的人们所进行的某些调整……是两个相反相成的因素,它们在客观上配合起来,促使私有制早日深化,促使私有制的被扬弃早日接近实现。"①

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相反相成"与当年的"让步政策论"已经有本质的不同。它强调的不是"大私有"向"小私有"让步,而是不分"大小"的私有者分别从各自方向对"专制国家的阻力"进行克服。赵先生在另一处明确指出,民间共同体(按即笔者所说的"小共同体")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权力",是阻碍"私有制深化"的两大"阻力",且"后者比前者,作为阻力,更为严重"。而这个"阻力"不仅指阻碍农民土地私有制的"深化",也指它阻碍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深化"。赵先生举例说:"试观以宋代干预财产力量相对最弱的年代,尚有太监杨戬的接替人李彦在临汝、鲁山一带把反映地主不动产私有制的券契横行烧毁,使地主在一瞬间变为国家佃农的事情。"②

显然,从这个角度考察"农民战争",必然会得出一系列不同于过去主流的重要结论。例如平均地权,主流认为过去是做不到的(托派认为做到也是不管用的),如果做到那就是"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了。赵先生却指出,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这种传统共同体的"平均主义遗存","好处是叫剥削者、专制者的'毒性'始终达不到最高度,但其缺点是叫社会渐近于'停滞'"③。

赵先生晚年也并未对此详加讨论,只是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启迪。而当年他更不可能论述这些。赵先生当年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使用了当时的话语,他本人也真诚地相信当时的理论。但今天应该指出:这套话语并不始于赵先生。如前所述,实际上1930年代托派(托派并非"托匪",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后学的一支,而且距离马克思的原意并不比斯大林更远——这在今天应该已是常识)史学的两本农民战争史专著已经奠定了这套话语。而今天我们说赵先生是"农民战争史领域的拓荒者",自然含有托派沉寂多年后赵先生们重新开始这项研究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赵先生当时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农民—地主阶级斗争"这个话题。他提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四个专题"是:"其一,是农民的身份,即不同时代中农民身份的差异;其二是起义和国家机器的关系;其三是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间的关系;其四是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④

显然,这是过去的人们(包括托派史学)未曾提出的。而这四个专题都超出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的范围。赵先生之所以重视这些关系,除了它们的确在史籍中有大量反映,尊重事实的学者

①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赵俪生文集》第2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② 《赵俪生学术自传》,《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46页。

③ 《赵俪生学术自传》,《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52页。

④ 《赵俪生文集》第1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序"第3页。

不能视而不见外，笔者认为也与赵先生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矛盾与危机的认识受“亚细亚国家”理论的影响有关。事实上，赵先生重视上述这些问题甚于重视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就笔者所知，赵先生没有就历史上的“佃变”写过什么。后来曾有人认为缺少对主佃冲突的研究而只注意反抗朝廷的大规模民变，是1950至1960年代（即赵先生活跃的那个时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大局限。的确，那时的研究存在着严重局限，但研究民变没有把佃变扯进来却不是什么局限，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两回事。

赵先生蒙难后，研究被迫中断，上述专题未能深入下去。但此后几十年间这些话题又不断地引起讨论。1980年代先生复出史坛后，其研究方向主要转向土地制度史等。但他一直关注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动态，不满这个领域的萧条，希望看到新的突破。1990年代笔者关于关中土改的一些研究发表后，先生曾来信极表鼓励。继承新史学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继续推进对“民变”现象这个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仍是我们作为后学的责任。

认识中国历史，甚至认识中国现实，“农民战争”史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例如，今天一提到农民地权问题，许多人还是翻出过去的说法，什么“土地私有和买卖”是大乱之源，只有官府控制土地才是正道。因此，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过去的“新史学”注意这个问题并不错。“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之说诚然太尖刻，但旧史的确有太浓的帝王气应该是无疑的。现代史学提倡“总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这并非哪个意识形态专有的特点。至于“普通人的历史”在现代左派史学中又被特别强调成了“造反者的历史”，这就当然有先入为主的问题。但是在左派并未大权在握唯我独尊的情况下，这种视角作为一种批判学派也有其重要的价值。而赵先生在农民战争这个新史学领域是有开创之功的。后来新史学变成“官史学”，只讲“金花”不讲其他，讲“金花”又只用意识形态来图解。甚至“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也体现于史学，新史学的功臣赵先生到1957年竟被官史学用以燔祭，良可浩叹。

## 五、“具有汉学功底的宋学家”

赵先生属于“五四”以后的新史学家，但与那个时代许多人文底蕴深厚的学者一样有着扎实的国学功底。他以重视理论著称，但对于史料也非常认真。他在1940年代开始治史学时是从做《王山史年谱》起步的，初期以明清之际诸学者的事迹与学术思想考证为主，曾经得到过胡适、傅斯年的好评。当初他作为一个自学者（先生在清华读的是外语系，而且未毕业就投身革命与抗战，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被河南大学聘为副教授，就是胡、傅二先生推荐的。赵先生晚年又回到了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只看赵先生书的人或许不会想到，赵先生当年给我们开的头一节课，讲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与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后来他还给我们讲过《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在许多领域赵先生不仅有整理史实、解释因由、归纳演绎的功夫，而且还是不少关键性史料（如前面提到的《出劫纪略》）的首次发掘者。

赵先生对“旧学”有看法，他常说他既不喜欢汉学的琐屑，也不喜欢宋学的空疏。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我们把“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作广义的引申的话，笔者觉得先生的风格可以说是个“具有汉学功底的宋学家”。“重义理”无疑是赵先生治学的一大特色，但该用考据时，他的功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赵先生平生之学涉猎极广，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人则认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在笔者看来，赵先生平生治学一出于“爱智求真”的纯粹兴趣，二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热情与责任感，至于要在某特定领域成为“名家”的目标，他是不在乎的。这样治学当然是有得有失。不过笔者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没人能成为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以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信息处理量治同样严谨的学问，还是可以有不同做法。事实上，不要说“百科”，今天一个学科内的上百分支、乃至“二级”、“三级”分支也不是那个学科的某专家所能全面掌握的。

仅以中国史的断代分支论，明清史专家未必懂魏晋，甚至明清政治史专家未必懂明清经济，就是搞明清经济史，研究农业的未必懂工商业，研究江南经济的未必懂辽东。一个学者其实一生不过能够研究若干"问题"而已。但是如果永远只在一个"问题"上钻牛角尖，虽然也能出成果，毕竟眼界狭窄，难成大器。所以事实上，成大家者往往都关注过许多"问题"，区别只在于有些人研究的这许多"问题"集中在一个学科乃至一个分支，有些人的"问题"则分散在各处。但不管是聚是散，就单个问题而言都有严谨与否之分，甚至很难讲怎样做更有信息集中的优势。一个研究明清政治问题的人可能对明清美术无甚兴趣，但却对其他朝代、乃至其他国家的政治问题有兴趣，而这样做的局限也并不见得就比在明清范围内既注意政治也注意美术更大，——只是从功利的角度讲，人们会说后者是"明清史专家"，而前者就说不清是什么"家"，于是有人或许就会妄自褒贬而已。

其实赵先生并非不知道这些。他就曾说过："兴趣不可过多，多所骛则少有成。一个主兴趣，配几个副兴趣，一辈子也就够了。例如，主兴趣油画，副兴趣国画和漫画。……总要求其互相邻近，以免浪费精力，且可配套成龙，一艺多技。'主兴趣'是最最要害的。人一辈子成就大小，关键在此。除非万不得已，不可轻易'跳槽'。"[①]但他自己却不是这样。众所周知，赵先生一生多次大幅度改变学问方向。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青年时代热心文学创作与外国作品翻译。后来治史，也是先以考据法治明清学术史，后转农民战争史（基本是通史），再转土地制度史（侧重晚唐以前）以及思想文化史（又侧重明清），其间还研究过西北史地之学与先秦子学等等。赵先生的天分、精力与信息处理能力都是出众的。但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他的认真。生当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具有丰富的社会关怀和求知欲，赵先生关注的"问题"就很分散。但这不难理解：他既然当年能够投笔从戎，又能卸甲读书，如此大的人生转折他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又何怪他一旦认为某个新"问题"对于时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而自己又有条件研究时，会打破畛域，迸发新的研究兴趣。虽然这些"问题"所在的各大学科他未必都被看成一流专家。但重要的是，他对这些"问题"本身都有研究的激情，而且很认真，投入的精力也很大。因此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是一流的。赵先生未必是整个思想史领域的权威，但他无疑是顾炎武研究的权威；他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但无疑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权威。加上他对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这些重点领域的较全面的把握，为学而能如此，成就应该说是很大了。

赵先生对晚辈和学生的治学倾向持十分开明的态度，从不要求他们在风格上、领域上，更不用说观点上追随自己。即便同样治史的先生一子一女一孙，其学与先生也完全不同。笔者在1990年后也关注过不同领域的许多"问题"，有人因此说这是受赵先生的影响。但其实自笔者1978年师从赵先生直到1989年，做的基本上是"钻牛角尖"的学问。后来的变化是时代风云与个人选择的结果，与先生并无直接关系。但先生的求知欲、责任感和认真态度，是笔者愿终身师法的。当年笔者"钻牛角尖"于明清鼎革之际，赵先生对此是鼓励的，但他也曾担心笔者的眼界太窄。他曾对笔者说：每个人的兴趣不同，研究的"问题"有大有小，但有志的研究者"大问题要越做越小，小问题要越做越大"。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他对我们这些后学的影响，也将垂于久远。

[责任编辑　扬　眉]

① 《赵俪生文集》第1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创建考古专业　引导学术发展

## ——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奠基人刘敦愿先生

栾丰实

**摘　要**:刘敦愿先生 1947 年进入山东大学执教,1972 年创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1997 年逝世于济南,毕生精力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山东大学。先生生前长期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曾兼任第一、二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史学会理事、山东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古国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史学会顾问、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先生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四处奔波,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爱事业胜过一切,勤奋严谨、精诚执著的治学态度,至今令后学感动。

**关键词**:刘敦愿;考古;田野考古;美术考古

明年就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四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包括专业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被列为山东省的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是教育部的实践教学示范中心和引智基地,从而使考古学科逐渐发展成为山东大学的优势学科之一。在此之际,我们特别怀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奠基人刘敦愿先生。

刘先生 1918 年生于湖北汉阳,1947 年进入山东大学执教,1972 年创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1997 年逝世于济南,毕生精力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山东大学。先生生前长期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曾兼任第一、二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史学会理事、山东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古国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史学会顾问、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先生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四处奔波,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爱事业胜过一切,勤奋严谨、精诚执著的治学态度,至今令后学感动。

## 一、创建考古专业,推动学科发展

2000 年,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和山东工业大学三校合并。如果要追溯山东大学各个学科的渊源,则要延伸到三个学校的发展历史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山东大学的考古学科,可以追溯到山东医科大学的前身——齐鲁大学时期。在 1920－1940 年代,齐鲁大学聚集了一批考古或与考古关系十分密切的学者,如加拿大学者明义士、英国学者林仰山、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胡厚宣等。最初就读于齐鲁大学、后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吴金鼎先生,就是从齐鲁大学前往平陵城调查的途中发现了著名的城子崖遗址,并促成了后来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和龙山文化的确立。

大体同时或略晚,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董作宾先生主持发掘的山东滕州安上村遗址,就有山东大学师生参与其中。田野发掘结束之后,参加工作的山东大学毕业生许星圃、马维新整理写成的《滕县安上遗址发掘纪要》一文,洋洋万言,发表于山东大学《励学》1934 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创建于1972年、延续至今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是在刘敦愿先生的直接主导下诞生的。1947年，经著名学者丁山教授推荐，刘先生来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年夏，参加了洛阳烧沟汉墓的发掘工作。此后，先生开始走上了考古研究的道路。

考古专业成立之初，正值"文革"后期，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当时山东大学的文科还在曲阜，考古专业只有两名专业教师，刘先生出任考古教研室主任。为了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先生到处奔走，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应对教学工作的需求。

一是从校内和校外引进专业教师。后来成为考古专业骨干的宋百川先生、马良民先生就是从校内其他单位调转过来的。而李发林先生和徐基先生，则是从山东单县和辽宁朝阳引进的。此外，还有一些虽然做了大量工作，甚至有的都发出了调令或调来了档案，但最终未能如愿调入的人选。如后来担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的初师宾先生、后来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先生、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吉发习先生等。这其中大量的联系和协调工作无不浸透着先生的心血。

二是临时借调或聘请外校教师来校讲课，以解考古教学燃眉之急。如北京大学的李伯谦先生，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徐自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邵望平先生，徐州师范学院的严孝慈先生，郑州大学的王兵翔先生，南京博物院的蔡书传先生，山东省博物馆的朱活先生、郑笑梅先生和韩树鸣先生等，都曾为考古专业担任过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

在考古专业的发展过程中，先生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提高专业教师的整体业务水平。如不断地充实经过系统训练的新生力量，其中既有来自山东大学本校的毕业生，也积极从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争取分配名额。另一方面把专业教师派往国内开办考古专业最早的北京大学进修学习。如蔡凤书、宋百川、马良民、徐基、于海广、李淮生、王之厚、崔大庸等，都曾到外校进修学习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经过这样的专业培训，从整体上大大提高了考古专业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

为了适应考古专业长期发展的需要，刘先生十分重视专业资料室的建设。郭宝钧先生去世后，刘先生几经努力，使郭老家属将其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考古专业，从而成为我们今天考古资料室藏书的基础。先生晚年留下遗言，将家藏图书全部捐献给山东大学考古资料室，泽惠后学。

## 二、重视田野考古，身体力行实践

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换言之，离开田野考古也就谈不上近代考古学。1953年夏，刘先生第一次到洛阳参加烧沟汉墓的发掘时，就对考古事业和未来充满了信心。发掘期间，每天的日记往往有十几页之多。先生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时，为其取名"陶"，可见对考古事业的执著与热爱。

先生虽然个人研究的重心在古代史和美术考古等领域，但在对考古专业发展方向的把握上，一直把田野考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对自己的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的培养过程中，念念不忘田野考古发掘的实践。先生曾经把考古从业者从事田野工作的时间和经历，形象地比喻为飞行员的飞行小时，认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时间和田野考古工作水平之高低密切相关。先生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安排的。考古专业的学生，都要进行三次田野实习：第一次是见习，时间一周；第二次是教学实习，时间两个月左右；第三次是毕业实习，时间一个学期。凡是新进来的青年教师，都要多次安排到田野第一线锻炼和实践。这一举措，我们当年这些青年教师都是直接的受惠者，也是山东大学田野考古水平上升较快并得到国内考古界认可的直接原因。后来山东大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获得过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质量奖，"田野考古实践"课程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这些成果的取得，都与先生特别重视田野考古实践的发展导向密切相关。

先生格外重视田野考古工作也与自己的经历有关。他认为自己非考古科班出身，田野考古发掘非其所长，但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补己之短。其实，先生从1953年洛阳发掘回来之后，不仅为历史系的学生开设了考古学通论的课程，并使之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基础课的一个传统，而且一直身体力行，尽其所能地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1954年以来，先生经常在教课之余，或独自一人，或带领

三五名学生，奔波于田野之中。先后调查了章丘城子崖，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滕县岗上、宫庄和后堰堆，青岛霸王台、古镇和古城顶，即墨北阁，临沂土城子、毛官庄、援驾墩、重沟、护台和石埠，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胶州三里河，济南大辛庄、甸柳庄，章丘平陵城等数十处史前和历史时期的遗址，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根据韩连琪教授提供的线索，在青岛市文物店看到清代画家高凤翰一幅陶鬻画作的摹本，后来便亲自前往高凤瀚的故乡——胶州三里河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获取考古资料和将其整理发表，是田野考古工作完整过程的两个阶段，不可偏废。先生在这一方面总是身体力行，把自己的调查所得尽快整理出来公布于众。如两城镇、丹土、岗上、甸柳庄等遗址的调查资料，都是在做田野调查的第二年就发表出来。这些资料的整理，包括从陶片的洗刷、拼对、修复到绘图、照相，基本上都是由先生一手完成。这些遗址的调查资料，虽然已经发表了半个世纪，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三、考古与文献结合，开展古史研究

刘先生在国立艺专学习期间，因为到中央大学旁听丁山教授的《商周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两门课程而开始了对古代史的学习。依照丁山教授的教导，先生从先秦文献读起，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丁山教授还要求除了读书与资料之外，要选择几种传统与现代的科学一一专攻。后来先生在成都齐鲁大学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旁听吴金鼎先生的《田野考古学》，大约与此有关。

先生早期的论著，除了一部分考古调查报告之外，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先生深厚的文献功底发挥了绝好的作用，特别是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探讨古史问题，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研究特色。《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一文，系统地考证了古史传说中的有关东夷族资料，结合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提出典型龙山文化就是风姓东夷族所创造的文化。这种将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顾颉刚、夏鼐、高亨等先生的赞同和肯定。《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一文，从发生在云梦泽中的“虎孩”和“随兕”故事入手，深入探讨了周公践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的历史记载，认为这里的“虎、豹、犀、象”都是部落方国的名称或族名，上述文献记载了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迁徙，从而也证明商周之际存在着一条贯通黄淮下游与江汉地区的交通大道，这一交通路线在后来的文献中也有迹可寻。如果说上文是从宏观角度探讨民族迁徙和交通路线的变迁，那么《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一文，则针对一个古代城市的布局和复原而展开。文章以临淄齐国故城的钻探资料为基础，结合《左传》、《齐乘》等文献的相关记载，从城门的考辨和比对入手，分析齐国故城的布局。这一研究不仅对齐国故城的田野工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同类考古工作也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以上所举先生的三篇论文，采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有机结合的方法，分别对史前、商周和春秋等不同时期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独特的研究，可谓经典之作。中国历史悠久，保存了丰富的传世文献资料，加上历年出土的文献资料，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这些文献资料对于古代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的外国学者不理解这一点，往往从人类学的视野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考古学家偏好文献。其实对于历史考古学来说，与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考古相比，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积极而妥当地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而探讨和解决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十分现实的实践意义。先生早年的这些探索和研究，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 四、美术考古研究，探索新的领域

先生自小喜爱绘画，曾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1939 年，先生如愿进入搬迁到昆明的国立艺

专西画科学习，成绩优秀。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后来志趣转到了中国美术史方面，这可能是先生到中央大学旁听历史系课程的动因。迫于战局，1940年，国立艺专又迁重庆。抗战期间，重庆的条件极端恶化，各高校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而疏散在乡间，来往极其不便，更谈不上相互学习、交流和请教，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好怀着无限的怅惘，在黑暗中独自摸索了”。

1944年先生从国立艺专毕业之后，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1947年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2年转到历史系。1972年考古专业成立，创业初期的艰难已如前述，先生把大部精力用在了考古专业的筹划、建设和发展上。直到1980年代，新生力量逐渐补充和完善，考古专业的队伍建设也初具规模，先生步入60岁之后，才真正把主要精力转到了美术考古的研究，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这一阶段写就和发表的。

先生先后发表的40余篇美术考古研究的文章，按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六个专题，即理论问题探索、山东史前陶器艺术、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纹样母题、古代雕刻艺术、战国青铜器风俗画题材和汉代绘画艺术。先生反对那种大而化之、泛泛而谈、空洞赞美式的研究，经常教导我们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做小题目，从小题目中发现和探讨问题。所以从总体上看，先生所从事的多为个案研究，就是从具体材料出发，旁征博引，反复论证，总是能发前人之未发，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创性和经典性的结论。

就美术考古而言，先生用力最多、成果最为卓著的当属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约有半数文章属于这一研究领域。内容涉及饕餮、鸱鸮、鹰、虎、牛、豕、鹿、貘、蝉、鸡、鸟以及勾连纹、涡纹等几乎所有青铜器纹样。如《饕餮(兽面)纹样的起源与含义问题》一文，由《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谈起，从艺术的角度再现商周青铜器变化多端的各种兽面纹样，主要是虎、牛、羊、鹿等动物的正面头像，并深刻地阐述其避祸求福、恭敬严肃的“一般的含义”。而在关于兽面纹的起源问题上，先生较早地提出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时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龙山文化玉圭和良渚文化的各种玉器之上的同类纹样。

先生早年亲自调查的山东地区史前遗址，多属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故对这一地区的史前陶器艺术也情有独钟。如《大汶口文化陶器与竹编艺术》、《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岳石文化的陶器艺术》等文，就凝聚着先生的独特见解。特别是《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一文，写于1950年代后期，是学界第一篇系统论述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和艺术的文章。为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先生还专程去即墨西城汇现代制陶作坊现场考察，开展比较研究，以期得出正确的结论。

汉代绘画艺术是先生美术考古研究中的又一个重点。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中国国家制度的最终成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定型，中国古代文化由多元走向统一，都是在这一时期。同时，汉代创造的文化也空前繁荣。仅是保存下来的各种绘画艺术品，如分布于各地的画像石(砖)、壁画和帛画、岩画以及各种器物上的画作等，其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汉画像石中的针灸图》、《汉画像石未详历史故事考》、《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分析》等文，就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

先生的贡献和研究并不限于以上所述。先生来山东大学之初，曾作为丁山教授的助手，为《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的写作做过许多辅助工作，并深受其影响。后来也有许多涉及到古代神话方面的研究，如《舜与弟象的关系以及舜迹的南移》、《干将莫邪铸剑神话故事试析》、《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若干神话问题》等文，就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先生曾担任中国农史学会的顾问，十分重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结合上研究古代生业经济、环境和资源等问题。如《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畜牧业的作用》、《我国舍饲养猪的起源问题》等文，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先生退休之后，还主动承担了山东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齐乘》校注的任务，前后达八年之久，为其付出了最后的心血。上述研究成果，将分别由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 刘京希]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究历史规律 通古今之变

## ——田昌五先生学述

臧 知 非

**摘 要**:田昌五先生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以探讨中国历史特点与规律为己任,治学领域宽广,在华夏文明起源、古代社会形态、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古代农民战争和农民问题、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均有重大建树,成一家之言。其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则有着普遍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田昌五;文明起源;宗族城邦;古史分期;农民问题;循环发展;历史与逻辑

田昌五先生(1925－2001)1925 年 7 月 13 日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幼入私塾,先后入本县召陵中学、安阳高中、开封高中读书。1945 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度、缅甸抗击日寇。1947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第四党支部书记,1951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 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8 年任研究员,1986 年评聘为博士生导师。1987 年调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同时任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等。2001 年 10 月 6 日病逝。

田先生治史终身,成就卓著,出版《王充及其论衡》、《中国农民革命史》第 1 册《秦汉卷》、《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断代新论》、《史学概论》(与居建文合著)、《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周秦社会结构研究》(与臧知非合著)、《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起源志》、《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等专著 10 余种,发表论文 90 余篇;主编《秦汉史》(与安作璋教授合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卷本,与漆侠教授合编)、《华夏文明》系列专集和《中国原始文化论丛》(与石兴邦合编)等大型学术著作与文集,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二卷的主要撰稿人和组织者以及第三卷撰稿人之一,主持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编辑和出版。围绕着中国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这一主轴,在华夏文明起源、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古史分期、农民战争与农民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均有丰硕建树,自成体系,巍然成家。本文撮其要者,简述如下。

## 一、中国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即文明社会产生的时间和途径问题。这个问题开始于 20 世纪初殷墟的发掘,至 20 世纪 50 年代河南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以及中原龙山文化的确认,文明起源问题成为考古学界和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田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研究文明起源的。

**作者简介**:臧知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苏州 215123)。

田先生的华夏文明起源研究始于对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探索[①]，是在把握了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本质特点的基础上，先在理论上把握阶级社会形成的一般道路，而后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以考古资料为主，探索文明起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第一，文明社会标准的认定。学术界对文明的认定有两种途径和标准：史学界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论述的社会分工和家庭、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阶级和国家的出现为标准，考古学界则主要以文字、铜器、城市的出现为标准。田先生认为，这两种看法各有道理，但都存在问题。因为世界上许多民族在文明开始时并没有文字，而有的民族虽然有了城市和文字符号，但其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时代；考古资料则表明有些民族虽然进入文明社会但却却很长时段都没有城市的发生；至于铜器的有无更有着复杂的客观条件。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要客观地根据各种文明起源的特点，对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进行分析，城市、文字、铜器只能是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而不是文明社会的标准。

第二，对氏族瓦解和阶级产生路径的探讨。文明社会以氏族制的瓦解为前提。关于氏族瓦解的途径，恩格斯的《起源》认为氏族制经过对偶婚发展出个体家庭，又因贫富差距而产生阶级，最后导致氏族制的瓦解。田先生认为，氏族制的瓦解不是由于对偶婚，而是经济原因决定的，是经济进步导致氏族壮大分蘖成为母系大家族，又由于家族中男性的经济地位超过了女性，父系家长逐步取代母系家长，母系大家族转变为父系大家族，奴隶制度就孕育于父系大家族内部，从而揭开了文明社会的序幕。他指出："中国远古的氏族制不是由家庭瓦解的，而是由家族瓦解的。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家庭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氏族瓦解后，就出现了家庭——家族——宗族——姓族等多层次社会结构，并由此进入了文明社会。在这里，家庭是包含在家族之中的，家族是包含在宗族之中的，而姓族则是宗族的联合体。"[②]

至于阶级产生的途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阶级通过两条道路产生：一是因为生产进步、产品有剩余而将战俘变为奴隶而形成奴隶制。二是由于社会职能的发展，担任社会职能的人成为统治阶级，而将其下辖的各个公社成员变为被统治阶级。田先生认为，恩格斯的分析是有问题的，因为阶级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而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公职人员虽然是统治阶级，但统治阶级绝不是从上层建筑中产生的，而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新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均孕育于旧社会的母体之中，无论是从民族学资料的事实分析还是从人类发展的逻辑判断上，阶级的产生都是在父系大家族内完成的，是经济地位决定的[③]。

第三，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田先生将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中的历史传说相印证，论证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性的观点，指出中国文明是各种区域文化的冲突与联合、聚合与分散相伴而行的结果，在五千年以前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这主要体现在物质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古史传说三个方面。

龙山文化所反映的生产技术的变化体现在：一、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耒耜农业并逐步普及，发明了凿井技术，奠定了国家建立的物质基础。二、在农业基础上，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三、手工业门类增多，品种齐全，质量和数量都有大幅提高，特别是出现了铜器。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礼制用品，被赋予宗教意义。四、社会分工发展，不仅分出了各手工业，而且出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工，

---

① 中国的奴隶社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欧洲的古代社会，田先生出于学理上的考虑，使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古代社会概念指称中国的奴隶社会。但是，中国史学界所说的"中国古代"是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为了避免混淆，本文除了转述田先生观点之外，依然按照习惯将中国的"古代社会"称为奴隶社会。

② 田昌五：《中华文化起源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③ 以上参见田昌五：《关于奴隶制国家形成的一些问题》，收入氏著《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一篇《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马克思主义与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收入氏著《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中华文化起源志》第一章《导论》、第四章《万邦并存陶唐兴》。

发现的卜骨及巫术用具等遗存，说明当时已有专职或半专职的文化人。五、文字正在走向成熟。

社会结构的变化表现在：一、私有制的发展。房屋的质量好坏有别，陶窑建在房子附近或房中，窖穴也挖在房中或附近，墓葬中随葬有各种手工业品，个别还有粮食和奴隶，最重要的是墓葬中还大量随葬有代表私人财富的猪。二、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明显，说明当时已出现阶级对立。三、普遍出现非正常埋葬现象，说明当时发生了频繁的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四、出现了城堡，所发现的几十处龙山时代的城址为此提供了铁证。五、出现了刑罚，在一些非正常埋葬的人骨上，发现有"腰斩"的迹象。六、有了礼制的雏形。

证之以传世文献；上述变化和传说中的以炎黄大战为代表的部族大混战时期大致同时，所谓部族大混战正是文明时代到来的体现。田先生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首先论证了传说中的氏族、部落的区域分布与族属，将中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大致上分为古夷人各部、古羌人大部、古戎狄一部、古蛮人一部四个部落集团，另外还有巴蜀和一部分古越人等，指出华夏族就是由他们融合而成的，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许多"人名"，大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或者说他们代表着某个氏族或部落，不能视为具体的人名。这些神话和传说中人物的各种创造发明正反映了文明社会的到来①。

如所周知，有关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文献非常丰富，但如何应用这些资料，限于学科分野，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各有不同：史学界以文献为主，不使用或很少使用考古资料；考古学界则偏重实物资料，很少与文献相结合。这种局面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所改观，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各有偏重。田先生则不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印证、系统分析，揭示了神话传说的合理内容，又使得考古资料获得系统的理论说明。在当代史家中，田先生是走在最前列的。

## 二、古代社会形态

中国的古代社会形态是田先生用力最多、成果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末撰写的《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一文首先提出宗族奴隶社会说，至《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一书的问世，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学术体系②。

田先生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度论述的解读入手，厘定概念。中国大陆史学界使用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均源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其概念把握不清或者误用，则是诸多争论的主要根源。就奴隶制度的理解来说，在50年代就存在着五种理解，最主要的有两种看法：一是劳动奴隶制，又称为古典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二是家庭奴隶制或者家长奴隶制。就人类历史而言，欧洲古代是劳动奴隶制为主，是奴隶社会的发达形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亚洲则是家庭奴隶制为主，是奴隶社会的欠发达形态，是古代东方社会特有的本质属性。

田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古典劳动奴隶制和东方家庭奴隶制是并列的两种基本的奴隶制形态，都有着不发达和发达的历史阶段，不存在前者发达、后者不发达的问题。欧洲古代以古典的劳动奴隶制为主，亚洲古代则以家庭奴隶制为主。不过，这种家庭奴隶制的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家庭奴隶制是以村社关系为基础，而中国奴隶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是宗族奴隶制，是家庭奴隶制的发达形态，是和欧洲并行的另一形

---

① 参见田昌五：《中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收入氏著《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二篇第一章《中国奴隶制形成的道路》；《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收入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中华文化起源志》第四章《万邦并存陶唐兴》。

② 《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写成于1959年，发表于《新建设》1962年第6期，首次提出宗族奴隶社会说。其后发表的《中国奴隶制形态之再探索》，《中国奴隶制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中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关于中国奴隶制国家形成的一些问题》、《我国是怎样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等文详细论证了宗族奴隶社会形态，收入《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夏文化探索》、《先商文化探索》、《商代社会结构探析》、《对周灭商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周原出土甲骨中反应的商周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问题》、《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等文，收入《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

态的发达奴隶制，而这种中国式的奴隶制才更能体现人类历史的常态[①]。

所谓宗族奴隶制，就是阶级关系以宗族关系为条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以宗族为特征，宗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宗族是血缘单位，同时也是财产单位——文献中的"室"即以宗族为单位。宗族有不同的等级，就统治宗族而言，从低到高依次为家族、宗族（若干近亲家族联合而成）、公族（诸侯国国君之族的总和）、王族（周王之族的总和）；被统治阶级继续保留其原来的宗族等级，如周初大分封时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将其类丑"等等，都保留其原来的宗族组织和等级体系而整体臣服于周王朝，被授予诸侯。这是中国所独有的发达的奴隶制形态[②]。而这种宗族奴隶制的形成，源自于中国特有的部族战争，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不是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由在村社的冲突与联合中形成日益庞大的管理层转变而来，"而是在各个发生了阶级分化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与联盟中形成的"[③]，传说时代的混战各部族都是最早的部族国家，部族大混战就是部族国家之间的混战。在混战中失败了，自己的部族就沦为战胜者的奴隶；胜利了，就把失败者整族地变成自己的奴隶，这是中国宗族奴隶制产生的历史道路。

田先生重点从宗族形态、国家形态、土地关系几个方面论述我国奴隶制社会形态。

第一，宗族形态。宗族是若干近亲家庭的血缘共同体，其中每个家庭既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又是联合一致的。这种联合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有着亲疏远近之别、等级高低之分，有宗法制度维持其秩序。其形态，概括说来，分为统治宗族和被统治宗族两大阵营。从制度层面来看，统治宗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宗庙，有共同的姓氏，有特定的祭祀；上级宗族的祖庙同时就是下级宗族的远祖庙；祖庙所在地称为"宗邑"，又名为"都"，是宗族统治中心；宗族各有其族长，是为"宗主"，宗主由嫡长子继承，宗主的妻子称为"宗妇"；宗邑有宗主控制，宗主既能以本族宗庙社稷的代表自居，又能获得宗邑的大批收入，在政治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

宗族有复合性特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因宗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而不同，有着等级之别。周朝境内所有同姓宗族同时是一个大宗族，以周王为大宗主，故名宗周；各诸侯国的同姓贵族为该国的大宗族，故名宗国，以诸侯为大宗主；卿大夫的宗族相应地有其嫡系和支系，其下属有其家族；作为统治阶级最低一级的士也有其宗族。周王之族、诸侯之族、卿大夫之族、士之族都称为宗族，实际上王族、公族、卿族、家族等级相去甚远。所有这些宗族成员，概称"百姓"，按照地位高低分掌国家各级权力，官与族一致，官职出于相应的宗族，叫做"宗职"。从经济意义上看，宗族则是个财产单位，包括奴隶在内，称为"室"或"家"，和宗族层次相适应，有"家室"、"宗室"、"公室"、"王室"，所以灭其族则分其室，反之亦然。宗族都程度不同地保留原始共产制的遗风，父子兄弟可以分别生活，但是有公共族产，同宗共财。除非在另立新宗的情况下，公共族产不得瓜分，财产族有和个体家庭生活相结合。不过，这种共产本质已经变化，族产为宗主控制，普通族人享有甚少，所以，从本质上看，宗族有着血缘帷幕下的阶级属性[④]。

第二，国家形态。从外部形式上说，中国奴隶社会的国家和希腊城邦相同，都是城市国家。但是，在内部结构上，中国则是以宗族为内涵，是宗族城市国家，即宗族城邦。每一个国都由一个或几个宗族构成，宗族与国家合一、宗主与国君合一、宗族武装和国家武装合一、宗庙社稷和国家政权合一，天帝神祇和祖宗神灵合一，故名"邦族"。其政体是宗主政体即有中国特色的贵族政体，官僚制度始终不发达。宗族城邦之下，所有统治宗族成员都是自由公民，称为国人，享有占有土地权利、当甲

① 此说在《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一文中提出，在其后的论著中不断地系统化。

② 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中国奴隶制形态之再探索》，收入氏著《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中国奴隶制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收入氏著《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

③ 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析论》，第253页。

④ 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中国奴隶制形态之再探索》，《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奴隶制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商代社会结构探析》，《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

士权利、受教育权利、参与国家祭祀权利、享受国家救济权利、受国家保护免于沦为奴隶权利等，更主要的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利，这些都决定于宗族体系，受制于宗族制度，是宗族民主制。

族邦体系之下，用国野制区分国人和非国人的居住空间。国人是国家主人，国人居于城中及近郊，又称乡人或郊人。那些为主人从事各种劳作的奴隶居住于国中并不成其为国人，而属于野人。野人是没有权利者，因居住在郊区以外的四野而得名。野人的成分很复杂。国、野之别，是国家公民和非公民之别在居住空间上的体现，国人和野人是政治概念。

从本质上说，族邦是独立的，但不是平等的，有大小高低之别，有王国之邦和诸侯之邦的差别。因而，所谓的三代统一王朝都是王室之邦和诸侯之邦的联合体，二者仅仅等级差距有别而已。西周时代，王国之邦和诸侯之邦构成了中央邦和地方邦的关系，但本质上还是国与国的关系[①]。

第三，土地关系。土地关系的核心是井田制。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井田制的历史真相，二是土地所有权。这是学界争论最大分歧最多的千古之谜。田先生认为，井田起源于沟洫制和耒耜耕作，是古代社会的客观存在，但并非孟子和汉儒所说的整齐划一的豆腐块式的方块田。他们说的井田在设计上破绽百出，实践中无法实行，彼此间更难以兼容。人们之所以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或者各执一端，就在于在理论上把井田和农村公社混为一谈，又把井田看作土地王有或国有的体现。事实上，井田和农村公社形似而实非：农村公社是个体小农的村落土地公有制，成员有土地占有权，而井田耕种者则没有；农村公社以个体劳动为前提，井田则是共耕制；农村公社是个体为单位的地域组织，井田制则以家族或宗族组织为基础。

田先生从战国时代提封田制入手，综合分析出土和文献资料之后认为，所谓井田制源自于当时民户生活的共同使用水井的传统，而作为制度，则是土地计量单位、户籍编制单位、赋役和藉法剥削的计算单位，三位一体。作为土地计量单位，即方里而井，以平方里为基本单位，计算封国面积和耕地数量，尔后按照每夫百亩良田标准分配耕种，质量差的土地则增加分配数量，或者加倍、再倍以至于十倍，等等不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作为户籍编制单位，即以井为单位编制人户，根据身份不同，有九夫为井和十夫为沟两种编制。作为军赋征收和藉法剥削的计算单位，则以九夫为井为基本单位征军赋于国人，以十夫为沟为基本单位计算劳动量用之于野人。

田先生指出，土地所有制决定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不在于土地的分配形式。中国古代社会是从家族奴隶制发展为宗族奴隶制的，其土地所有制是家族和宗族土地所有制，其最明显标志就是宗族土地各有封疆，各有宗庙和社稷。而宗族以宗主为代表，宗族土地所有制也由宗主来体现。宗族具有等级性，土地所有权也具有等级性，家族分得的土地包涵在其宗族土地所有制之中，下一级宗族所有的土地也包涵在上一级宗族所有制之中。这种多层级的宗族土地所有制，整体上也可以表述为以周王为大宗主的所有宗族的土地公有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称为土地王有。那些被征服的宗族因为宗庙社稷的丧失而丧失土地所有权，只能归统治宗族的宗主支配，他们虽然可以分田而耕，但是耕作的土地是宗主的土地。这些构成了王室、公室、宗室和家室为名的奴隶主贵族的财产，是宗主控制自己宗族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宗族土地所有制实际上是宗主土地所有制，这是宗族奴隶制之成为另外一种发达奴隶制的经济基础[②]。

## 三、古史分期问题

古史分期即中国奴隶社会何时以何种方式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问题。田先生初从魏晋封建说，后

---

① 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中国奴隶制形态之再探索》，《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二编第二章第三、四节；《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

② 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再探索》，《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二编第二章第五节；《解井田之谜》，《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

改战国封建说，并成为战国封建说的中坚。

战国封建说由郭沫若提出，其主要观点为：一是认为商周是“典型的奴隶制”；二是以封建土地制度的形成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三是春秋时期“私门”和“公室”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权的斗争，是春秋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从而在理论和方法上摆脱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中国属于亚细亚社会以及苏联官方史学所划定的理论模式的束缚，揭示了中国历史的自身特点。然而，限于条件，存在着以下的不足：一是对西周的“典型的奴隶制”缺乏必要的深入系统的论证，在理论上对什么是封建社会缺少必要的说明；二是谓春秋时代以“初税亩”为代表的土地关系的变革之后即形成了封建的土地私有制有违史实；三是把封建社会的开端定在公元前475年缺乏相应的依据。

田先生认为，历史分期以社会结构的本质变化为基础。中国历史上出现多次大裂变，但是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构成社会结构的本质变迁。这个就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田先生在其西周宗族奴隶社会说的基础上，从理论到事实，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战国封建论进行了新的论证：

首先，田先生从理论上探讨奴隶制、农奴制的内涵及其与社会形态的联系与区别，确定封建生产方式的标准。长期以来，人们按照斯大林的奴隶制度定义对照西周的史实，认为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农奴，认为西周不是奴隶社会或者说是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田先生比勘分析相关理论的历史依据和民族学资料以后指出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区别在于：奴隶制是人身占有关系，农奴制是人身隶属关系；前者源于征服，后者源于生产资料的垄断。西周时代的野人、庶人虽然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但是他们是被征服者，是非自由人，是奴隶，而不是农奴。至于奴隶制、农奴制与社会形态的性质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奴隶社会可以有农奴制，封建社会也存在着奴隶制，决定社会形态性质的是社会结构的本质属性，而不是决定于某种制度的存废，“是不是奴隶制社会形态并不取决于奴隶制度及其发展程度，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不是一个由政治上的自由人统治的社会，存在不存在自由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相互制约关系。孤立起来考察奴隶制度，片面地用奴隶制的发展程度判断奴隶制社会形态，形似有理，其实是错误的”①。最后，田先生把封建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四点：“一、个体小农经济；二、封建土地所有制；三、超经济强制；四、封建地租剥削。四者结合起来，就构成封建生产方式。”②

其次，对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性质问题的分析。田先生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在古代社会，奴隶和奴隶主固然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阶级斗争主要是在自由人内部进行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奴隶的反抗斗争只不过是为平民和贵族的斗争提供了消极的舞台台柱而已。中国的春秋时代正是这样的阶级斗争充分展开的时期，平民与贵族之间、新贵族与旧贵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拼斗，而奴隶的逃亡、暴动自始至终充当了这一斗争的舞台台柱。在这场争斗中新兴贵族在不知不觉中领导并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历史转变，其阶级属性也悄悄地、不自觉地成为宗法地主的代表。

其三，土地关系是社会结构变动的基础。春秋时代，土地所有制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各国土地改革改变的是土地分配、税收和耕作方式，即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个体耕作取代集体耕作，原来共耕的“野人”逐步成为个体耕作者，是宗族奴隶制经济基础瓦解的体现。降至战国，随着各国化家为国历史进程的完成，宗族城市国家蜕变为专制集权的领土国家，原来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也就历史地发展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从而实行授田制。这种土地国有制是不稳定的：土地授予个人即不再收回，时间既久，授田民就成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人们常说的完整意义上的个体小农因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战争，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军功地主和事功地主，还有那些由贵族们转化来的宗法地主，国有土地就逐步地转化为私有土地。这种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并存，就成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

① 田昌五：《古代社会发展史论》，第57页。

② 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175页。

制的本质特征[①]。

其四，确定商鞅变法为封建社会的开端。郭沫若几经选择，把封建社会开始的确切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也就是太史公所采用的战国纪年的开始。作出这种划分的依据，大约就是在春秋末期各国都形成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句话的兼顾，有其历史的理论的合理性。但是，这个年代缺乏必要的学理和事实支持。田先生则认为，战国时代的七国变法才是这一社会结构转变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体现，应以七国变法运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因为"这种变法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的集中表现和全面完成。它表明中国了历史上从此不仅有了封建的经济基础，而且有了相应的上层建筑。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是从这时建立并发展起来的"[②]。其绝对年代则以商鞅的第二次变法比较科学，即公元前350年。因为商鞅变法集各国变法内容之大成，是封建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社会结构的基础。

## 四、农民战争与农民问题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新中国史学研究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影响深远。田先生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持续思考农民战争与农民问题，发表一系列论著[③]，除了对秦汉农民战争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历史的论述之外，对农民战争研究的诸多理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平均主义、皇权主义等，均观点鲜明，一以贯之，对农民的历史命运以深切的同情，给农民战争以严肃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

第一，农民战争具有不自觉的反封建性质。农民战争是否反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学界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只反对具体的官僚、地主、官府，而不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因而不具有反封建性质。二是认为农民战争所起的作用是封建制度"修理工"的作用，农民战争越频繁，封建制度越发达。三是认为，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上行阶段——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的时期不反封建，而在下行阶段——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具有着反封建性质。四是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反封建。

田先生认为农民战争具有不自觉的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性质。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有意识到自己苦难的根源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代表地主利益的封建制度，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反封建的理论纲领，而是在反对具体的衙门、官僚、地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从事着反对封建制度、地主阶级的斗争。判断农民战争是否具有反封建的属性，不能根据农民主观上是否提出反封建的纲领，"不能用一个时代的思想或思想家们的思想作为分析判断该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标准"，农民战争是不是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认识，而是取决于客观实践，"用农民的认识判断农民战争的性质，即使是对这种认识的分析是正确的，也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因为，这样就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④]。

---

① 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134－166页；《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地主阶级剖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第7－160页；《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3－216页；第158－260页(2009年版)。

② 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227页。

③ 主要有《怎样分析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新建设》1964年第4期；《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后果》，《历史研究》1965年第8期；《论"皇权主义"的一些问题》，《中国农民战争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坚持社会发展动力一元论》，《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三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汉社会中的农民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四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兼评让步政策论》，《文史哲》1979年第1期；《论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中国农民战争阶段性及相关诸问题》，《文史哲》1994年第5期；《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动力——重谈农民战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第一册秦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④ 田昌五：《怎样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新建设》1964年第4期；《关于农民战争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论丛》第二辑。

第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文革”以前的普遍观点，其表现形式就是“让步政策”（另有“反攻倒算论”，看上去和“让步政策论”针锋相对，但二者都是以阶级斗争动力论为立论基础的，是对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方式的不同表达）。“文革”以后，否定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观点占据主流，因为农民愚昧落后，农民战争破坏性大、中断了社会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

田先生认为，分析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首先要从农民战争的发生原因入手，看农民战争对这些原因的改变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从战后社会矛盾的变动和推移过程中寻找其原因和作用。农民战争爆发前夕，往往是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势力恶性膨胀，政府赋敛无度，农民无以为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封建政府无法通过调整政策缓解社会矛盾，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农民被迫举起义旗，是农民战争改变了社会结构，引起了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至于民族关系的变化，使得统治阶级能够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及其关系调整统治政策，使得社会生产能够继续进行并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发展。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任何战争都有破坏性，不能因为战争的破坏性而否定一切战争，更不能把战争的破坏性全部算在农民起义头上①。

第三，农民平均主义是“农民民主主义”。“文革”以前，学界一方面指出农民平均主义有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则充分肯定农民平均主义在农民起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文革”以后，全面否定农民平均主义观点流行，认为农民平均主义在理论上是落后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也无法实现。

田先生认为，说农民平均主义是落后反动的思想，是非历史主义的价值判断。农民平均主义的本质是“农民民主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以政治上平等和财产上的平均，在农民战争中是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将历史上的农民平均主义和现代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相提并论，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历史地分析农民平均主义，在理论上、形式上，农民平均主义是错的，但在实践上，它是正确的；它的合理内涵，为中国民主革命所继承和发展②。

第四，农民不是天生的“皇权主义者”。田先生认为，说起义农民是天生的皇权主义者是对马克思的误解，更不符合事实，皇权主义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思想，而不是起义农民的思想。起义领袖来源复杂，多半是各式各样的游民，还有从敌对阶级分化出来的失意分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有些在参加起义前就抱有帝王观念或野心，把他们的皇权主义思想带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来。这就决定了：一方面他们能够代表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和贵族的封建统治，并用革命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被镇压或者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又成为农民战争的宿命③。

## 五、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新体系

新中国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理解的不同，导致对中国历史过程与发展规律认识的种种分歧。田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应用到分析突破的过程。他在60年代发表长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

① 田昌五：《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后果》，《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秦汉社会中的农民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四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后记》，第298－299页；《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兼评“让步政策”论》，《文史哲》1979年第1期；《关于农民战争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论丛》第二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坚持社会发展动力的一元论》，《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三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动力重谈农民战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后记》；《论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③ 田昌五：《论“皇权主义”的一些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关于农民战争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二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社会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基本观点，“文革”后发表系列论文，进一步阐述其观点，以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为核心，重点对亚细亚社会形态、五种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历史新体系①。

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影响现代中国史学最为核心的理论问题，中国古代不发达奴隶制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说，都源于此。田先生首先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按照历史的顺序，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古代社会——欧洲的和东方的古代社会形态的论述及其事实依据予以历史的叙述和逻辑的分析，厘清马克思、恩格斯古代东方社会理论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依据，而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考察中国的历史事实，得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古代东方社会理论不具有科学的普遍意义。马克思的史学研究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起点和终点，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也是从阶级社会开始，上溯到原始社会，并以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在阶级社会的遗存作为依据的，因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理论上指的是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在阶级社会的遗存，“是原始公社的一种特殊的次生形态”，“在东方某些国家和地区曾经长期存在”，“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是马克思在当时的社会科学水平下提出来的，具有历史的相对性②。

田先生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三位一体，这是原始社会留存于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这只存在于由原始社会直接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地方，在出现过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和民族中是不存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不发达的奴隶社会根本不符合马克思原意。就历史存在来说，无论在中国的古代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找不到这样三位一体的生产方式。商周时代不存在农村公社，也不存在专制主义，至于把井田制作为农村公社的证据，更是对井田制的误解。至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着发达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更不存在以农村公社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中国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毫不相干。人们之所以把中国硬塞进亚细亚社会形态，除了对学术理解因素之外，主要的在于意识形态因素：说中国是亚细亚形态，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揭示中国历史实际，而是为了批判所谓的“封建专制主义”③。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这有两层含义：一是长期性，二是停滞性。田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虽然长于欧洲，但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长期停滞。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指的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所谓‘停滞’，就是长期停留在农村公社的小天地里。由于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的余续，所以他是一种半野蛮半文明的状态”。其基本特点是：国家主权和土地所有权合而为一；封建依附关系和臣属关系合而为一；地租和赋税合而为一，赋税即地租；阶级关系和臣民关系合而为一，不存在官民以外的地主和农民。这和中国历史相去甚远，就以土地所有制而论，中国的土地制度呈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所有制共存，而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相互转化状态；不存在国家主权和土地所有权合一、地租和赋税合一问题。至于工商业的发达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机器和上层建筑的完善更是无与伦比，根本不属于马克思说的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

第三，五种生产方式与唯物史观问题。田先生开始是“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坚定信奉者，后来则

---

①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历史体系的代表论文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历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此文曾被国外学者翻译为英、俄、日、法多种文本发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评近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谈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光明日报》1982年4月26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质疑》，《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从西方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兼评超稳定社会结构说》，《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破除中国历史东方类型说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文史哲》1995年第2期；《破除长期封建社会说，建立中华帝国史发展新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田昌五：《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历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③ 田昌五：《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评近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中国历史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以上均收入《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

从历史和逻辑的不同层面说明五种生产方式只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非历史发展顺序。这个逻辑顺序是马克思以西欧为主、以英国为典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后得出的逻辑结论。田先生指出，“历史不同于社会发展史，对于社会发展史可以作一般规律性的论述，而历史则必须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叙述”，必须揭示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马克思不是职业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没有研究，结论是否科学，必须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而不能生搬硬套。至于斯大林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既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方法，必须予以改正①。

所谓唯物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田先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哲学而不是理论模式。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就是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田先生认为，强调物质生产是对的，但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区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属于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对立统一构成社会矛盾的统一体及其运动过程，而有社会发展史。所以，正确把握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才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公式，而是历史哲学，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这三者相互贯通，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要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②。

第四，中国历史新体系。田先生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根据中国历史实际，把中国历史发展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帝制时代三大阶段，提出了中国历史新体系。

洪荒时代是由生物人衍化为社会人的漫长过程，以往名之为“原始社会”，但是原始社会是指氏族社会，最早追溯到早期智人，距今也不过20万年左右，这就把漫长的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进化过程排除在了人类历史之外。田先生认为，生物人到社会人也是人类历史的构成部分，氏族社会或者蒙昧时代都不足以涵盖这一阶段的历史，遂使用中国古已有之的洪荒时代取代原始社会概念③。

族邦时代指中国古代社会，从公元前3000年起至战国时代变法运动止，共2700年，分为四个阶段：万邦时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族邦联盟时期，约当于夏代（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族邦体系建立和发展时期，约当于商代和西周（前17世纪至前8世纪），即有中央邦和地方邦、地方大邦和地方小邦构成的体系；族邦体系瓦解和衰亡阶段，即春秋时期。田先生认为，世界历史上的古代社会都是城邦社会，而中国古代社会则由族邦构成，从家族到宗族，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条脊梁。既然以宗族为基本特征，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也就应该以氏族到宗族为主线，古代社会的结束也应以宗族国家的消亡为标志。过去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奴隶制社会是“不确切”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无此说，他们用的是古典古代或亚细亚古代。这个时代虽有奴隶，但整个社会并非由奴隶和奴隶主构成。所以，中国族邦时代虽有奴隶制，但不能称为奴隶制社会，古典古代社会亦然。田先生8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有关专著，都以“古代社会”名之，如《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等，都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命名的。

帝制时代，也就是人们习用的封建社会，从公元前4世纪各国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止，约2300年左右④。之所以把这一段历史称为帝制时代而非封建时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

---

① 田昌五：《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

② 田昌五：《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历史唯物主义论纲》，《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1－362页。

③ 田昌五：《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

④ 田先生开始将战国至清末称为帝制时代，后来又称为封建帝制时代，二者没有意义上的差异，故仍使用帝制时代。帝制时代的下限，田先生早年划定在辛亥革命，后来把北洋军阀时期也并入其中。但就其对帝制时代的社会发展来说，田先生还是以辛亥革命、帝制废除作为帝制时代下限的。参见《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文史哲》1995年第2期；《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

斯大林所说的封建社会只适用于欧洲中世纪和斯拉夫人，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中国帝制时代的发展特点是以土地关系为基础的循环往复跳跃式前进，简称循环发展。循环发展观不同于简单循环观：简单循环观是形而上学的、停滞型的，循环发展观则是辩证法的发展观。中国帝制时代共经历了三次大循环：从战国经秦汉至魏晋为第一次大循环，从南北朝经隋唐至宋代为第二次大循环，从宋辽金对峙到明清为第三次大循环。每次大循环都是一次大反复，也是一次大发展。这种循环往复的基础则在于土地关系的变化。中国帝制时代的土地总体上分为两部分，山川林泽和非耕地为国有，是商品经济的重要来源，历代官府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控制都是以此为基础。其余为农耕地，这一部分土地处于不断向私有转化过程中。这种国有和私有的相互转化，总趋势则是私有土地逐步增多，但是始终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土地私有制，没有把比较固定的国有土地卷入循环之中，虽有发达的土地私有制，而资本主义仍处于萌芽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治一乱、赋役关系的重大变迁、人口消长、人口流动、民族关系均是以这种土地关系的循环为基础而呈现循环往复式的发展。

田先生分析中国没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除了民族大纷争这一因素之外，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首先是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国家通过重重组织把农民束缚起来，作为国家赋税徭役的来源。农民经济能够正常生产，就社会繁荣、国家富强；当农民经济萎缩破坏时，就社会衰乱、国家危亡。而农民经济是否正常，取决于是否发生自然灾害和国家的相应措施，取决于是否有战乱和赋税徭役的轻重。其次是以城乡关系为基础的工商业形态。由于城乡一体化的结构，统治的经济基础在农村，统治中心在城市，城市又是工商业中心，就产生了独特的工商业形态：官府垄断重要的工商部门，其产品直接供应皇家、贵族、官僚消费之外，出售视官府需要而定，收入则作为财政一部分，其生产根本无视经济规律，是纯粹的垄断性、掠夺型经济。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或者是官僚经营、或者与官僚勾结，小商贩则属于游民阶层。而工商业者政治地位低下，政治上没有出路，赚钱以后或者挥霍或者购买土地，出现了工商业发展与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并举的结果，对农业发展带来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破坏；就经济结构的功能而言，工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是对立状态，加速农民的贫困和破产。掠夺型、奢华型、腐败型，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工商业基本特点。所以，中国社会有发达的城市和工商业，却始终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和市民阶级；没有商业资本的积累，至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更是微乎其微[①]。

## 六、思想与方法

田先生是一位思想鲜明的史学家，以其强烈的时代意识、马克思主义信念，与时俱进、自我突破，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是田先生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

时代意识也就是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或者说历史研究的功能问题。史学研究服务于现实，似乎是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是中国史学传统，“资治通鉴”就是其最经典最集中的概括。新中国史学尽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所走的也是这条传统之路，仅仅是立场理论方法改变而已。田先生认为，以“资治通鉴”为特征的史学研究服务于现实固然有其学术价值，但这只是史学功能的细枝末叶，并不能因此把历史借鉴作为史学研究的任务，更不是主要任务，那样做容易把历史学降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变成政治史学、御用史学。在此基础上，田先生提出历史学的任务“一是探索规律，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探明我国的国情，以此二者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②]。田先生虽然沿用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说法，但并非人们所理解的借鉴史学，而是指站在时代高度、把握历史流变、探寻历

① 田昌五：《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质疑》，《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从西方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兼评超稳定社会结构说》，《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文史哲》1995年第2期；《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总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② 田昌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收入《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答尹湘豪同志》，《光明日报》1985年4月17日。

史规律、放眼历史未来，为人类历史由自在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提供历史依据，在当代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就是要找到中国历史发展之路，公诸世人，作为人们前进中的路灯[①]。田先生反复论述，探讨中国历史规律的前提是实事求是，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对任何一种理论都要考察这种理论的事实依据，考察其得出理论的方法是否科学。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下，达到"求真"和"致用"的辩证统一："求真"是基础，"致用"——探索中国历史规律作为建设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点——是目的。

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原则思想指导下，田先生先后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张。前者指"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具体历史中引出它的具体规律"；后者系指根据新时代的使命、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问题，作为建设新时代的基础。田先生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站在历史的高度，实事求是，就一定会不断地获得新知，以新我换旧我，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永葆科学的青春[②]。如果说上述思想在田先生的学术生涯前期也就是"文革"前还处于萌芽期的话，那么在后期也就是"文革"结束之后则迅速成熟，成为田先生不断开拓新领域、以新我换旧我的动力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华夏文明起源、古代社会的学术体系就是田先生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集中体现，而中国历史新体系则是田先生建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典型实践，而对农民战争和农民问题的持续关注则是田先生唯物史观的一贯观照。

学术研究既要有科学的思想，还要有科学的方法。田先生的学术思想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其学术成就的获得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田先生的研究方法来说，最基本的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统一。

所谓历史的方法，也就是人们熟悉的叙述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即分析的方法。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是先用逻辑的方法，后用历史的方法，最终是二者的统一。而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剥除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揭示其本质，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真谛。

在运用逻辑的方法分析研究历史问题时，田先生特别指出要做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结合与统一。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材料的收集整理、排比分类、辨物定名"，必须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但要辨物析理，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抽绎出来，进行判断和推理，就得用辩证逻辑了。不用辩证逻辑，就不可能得出鞭辟入里之论"[③]。这个方法在理论上说说并不难，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放眼新中国史学界，田先生是第一人，其成名作《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田先生曾自信地说："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不是第一人，但用马、恩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的，我是第一人。"[④]其实，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田先生运用的是这个方法，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个方法。古代社会形态、井田制、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和农民问题、封建社会结构等等，概莫能外。职是之故，才能真正地实事求是，穿透历史表象，抓住历史本质，成就一家之言，贯通古今之变！

诚如田先生所言，任何认识都是相对的，都有着个体的、时代的、历史的相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必然改变，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田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如此，其学术体系必然随着时代变迁和研究主体的不同而有变化。但是，田先生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学术思想和方法，则有着普遍价值，值得后人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责任编辑 扬 眉]

① 田昌五：《史家与史观——史学新论之三》，《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② 田昌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收入《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建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③ 田昌五：《从自我批判中走来》，《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④ 田昌五：《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四十年治史的总结》，《史林》1997年第2期，收入《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文 史 哲
2011 年第 5 期(总第 326 期)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5, 2011(Serial No. 326)

# 葛懋春先生的学术向路与领域

李 红 岩

**摘 要**:葛懋春先生 1951 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大力促进学术繁荣。"文革"后,葛先生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所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一书以思想性见胜。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还非常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 世纪 80 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此外,葛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关键词**:葛懋春;史学理论;历史科学;思想史

葛懋春先生(1926－1996)是我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坚定信仰唯物史观,虔诚学习马列主义,爱党爱国,赓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配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在史学理论、中国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历史科研组织、历史教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理论修养深厚,思维细密,下笔严谨,作品大气;为人率真,尊师重教,不苟言笑,气质高贵,深受史学界尊重,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 一、学术向路

葛懋春,又名方晓虹,曾与庞朴共同使用笔名鲁春龙。生于 1926 年 2 月,安徽省肥西县刘河乡葛大郢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1946 年 8 月毕业于舒城晓天安徽第七临时中学。同年 9 月,由于仰慕青岛风光,放弃家乡的安徽大学,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开学后不久,即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与进步同学组织历史研究会,研读马列著作,师从中国哲学史家赵纪彬。1948 年夏,受国民党迫害,流亡南京、上海、台湾。1949 年春节后,由台湾返上海转青岛,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继续学习[①]。1950 年冬,参加山东昌潍专区土改工作组。1951 年,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编委会常务编委兼秘书,达六年之久。同时讲授哲学、马列主义名著选、联共(布)党史、中国思想史、史学概论等课程。其间,师从华岗、杨向奎、赵纪彬,发表毕业论文《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文章运用农村经济理论,分析作者在土改调查中搜集的山东农村资料,论证土地改革的必然性。其后,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探讨上,在《历史教学》、《文史哲》、《大公报》上推出了几篇颇为醒目的文章,同时与赵俪生、赵宗复进行了学术讨论。1953 年,应华东人民出版社之约,在先前论文的基础上,编写了《基础和上层建筑》(1954 年 9 月出版)一书。三年之内,七次印刷,印数超十万册,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最高理论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是青年葛懋春激情澎湃、展露才华、奋发有为的时期。当时,山东大学名

**作者简介**: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北京 100026)。

① 参见耿前:《葛懋春教授和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哲》1987 年第 3 期。

师云集，气氛激昂，思想活跃。他置身于浓烈的马列主义学风中，全身心投入到对马列主义的教学与宣传，力求用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旧中国的学风与文风，塑造全新的学术样态。他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在自觉顺应并推进新政权总体政治格局的思想指导下，大力促进学术繁荣。他在总结华岗的学术贡献时曾说，华岗这一时期论著的根本特点，"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历史实际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①。华岗的这一特点，也正是青年葛懋春的特点。华岗、赵纪彬是葛懋春先生终生尊仰的学术导师②。

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的工作情形时，葛先生说："华岗同志是山大兼任教授，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师，我因为听他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鲁迅研究等课，经常向他提问，同他比较熟悉。毕业后，我留校当助教，兼任《文史哲》杂志常务编委和秘书，彼此接触机会更多。""我那几年习作的稿子，没有一篇不是经过他审阅修改的。我的毕业论文《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是我的处女作，记得就是由赵俪生教授推荐，经过华岗同志审定，在《文史哲》第一卷第三期上刊登出来的。"如果说华岗在解放后有学术传人，葛懋春先生当名列前茅；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有华岗一系，葛懋春先生应是重要成员。

华岗是《文史哲》杂志社社长。每次召开常务编委会前，葛先生都会向华岗汇报对稿件的初审意见。耳提面命间，他的理论水平迅速提升。《文史哲》的编委大多数是山东大学文科各系教授，皆为饱学之士。葛先生与之共事，可谓出道之初，即置身于第一流学林。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密切地与著名教授如童书业、陆侃如、冯沅君、杨向奎、赵俪生、吴富恒、萧涤非、黄云眉、丁山、高亨、王仲荦、高兰、殷焕光等人交往，学识大进。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文史哲》是衡量我国学术状况的重要窗口。杂志所刊登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重要文章，主要是由于华岗的积极策划、推动和领导，但也凝聚了葛先生的心血。《文史哲》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批判胡适学术思想的学术期刊。据葛先生说，从1952年到1954年，《文史哲》涉及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有六篇之多，1954年第5期还特别发表了童书业《批判胡适"实验主义"学术思想》的文章。批胡适、树马列，是华岗一以贯之的学术宗仰。所以，葛先生后来指出，从《文史哲》很早就批判胡适可以看出，该刊1954年发表李希凡、蓝翎轰动全国的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绝非偶然，而是华岗办刊思想的必然。它既不是"作者奉命写作"，也不是"编者奉命刊登"，而是"解放初期山东大学的师生，联系学术界实际，批判唯心史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产物"。

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葛先生平生的"精彩"一笔。由于毛泽东的关注和介入，这一事件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但是，葛先生很少对人提起这一事情，从未利用它来捞取政治资本。他说："《文史哲》常务编委会发表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接到任何上级的指示，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到它后来在思想界产生多大的影响。文章发表后，连《人民日报》编辑部都不知道作者的通信地址，《文史哲》编辑在接到该报长途电话询问作者通讯处时，还不知什么原因。这说明《文史哲》发表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什么精巧安排。但是应该承认它和华岗同志领导下的《文史哲》，比较重视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比较重视刊登不知名的年轻人的文章是有关系的。"③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

李希凡后来也回忆说："学兄、老友、《文史哲》当时的责任编辑葛懋春先生在通信中，劝我仍可业余写作，鼓励我继续给《文史哲》写稿。寒假期间，我就整理了关于《水浒》问题的几篇文章，并把其中与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讨论如何评价《水浒》的一篇寄给了懋春"，"可以看出，不拘于权威之见，鼓励

① 葛懋春：《回忆早期〈文史哲〉杂志社社长华岗同志》，《文史哲》1981年第4期。

② 葛先生性情孤傲，自视甚高，但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执礼甚恭。1988年，吴泽先生来山东大学讲学，笔者亲睹葛先生难得一见的谦恭。

③ 葛懋春：《回忆早期〈文史哲〉杂志社社长华岗同志》，《文史哲》1981年第4期。

争鸣，在华岗校长和我的老师们的学术思想和办刊思想里，是非常自然的事”，“随后，我与蓝翎合作，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文章，也曾想向北京文艺刊物投稿，探询了一下，没有回音，我只得又把它寄给懋春，恳求母校的支持。这就是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于《文史哲》1954 年第 9 期。……据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后来讲，发表这些文章，是经过《文史哲》编委会讨论通过的”①。他还说：“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编辑部还有谁，只记得始终和我有联系的是葛懋春同志。我到北京后，一直还和葛懋春同志通信，很可惜，他给我的信，都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我在 1953、54 年和他通信中，曾诉说过自己失掉专业的苦闷和彷徨，也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和支持。他鼓励我课余写作，不要放下笔，还主动来信问起在写什么，在考虑什么问题，有文章可寄给《文史哲》。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载《文史哲》1954 年第 4 期）；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园地发表的我们合写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载《文史哲》1954 年第 9 期），寄给他寻求《文史哲》的支持。葛懋春同志还经常把编委会或师长、读者的意见转达给我们。”②

1957 年夏，葛先生下放青岛郊区农村劳动。一年半后，被派往枣庄煤矿，主持编写《枣庄煤矿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年）。1959 年秋，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进修，随冯友兰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大约每周在冯先生家开会，边讨论，边请教”。1960 年秋后返回山东大学，致力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单独或与庞朴联合发表论文，积极参加文化遗产问题讨论，对胡适、张东荪、梁启超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评析，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文革”中，被定为山东“小三家村”、山大历史系思想史讨论班黑店的主要成员，在恶劣环境中编辑《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79 年）。此外，还参与编写了《商君书选注》、《商君书新注》、《商君书评注》等论著。

“文革”后，葛先生迎来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高峰。他接受教育部委托，主编出版了解放后第一部史学理论专业大学教材《历史科学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年），另与项观奇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与姜义华主编《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后出版项观奇所编《历史比较研究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年；《历史计量研究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年），主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与蒋俊、李兴芝合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等。还先后担任了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主任、系务委员会主任，华东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是葛先生这一时期治学的基本特征。他的基本史学思想，反映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年）一书中。

葛先生父母弟妹均侨居美国，生活富裕③。改革开放后，三个子女亦赴美学习，事业有成。先生与老伴郑莹先生独守“空巢”，许多人劝他们赴美定居。后赴美探亲，许多人料想他不会回来了。谁想，1990 年夏，已经严重患病、讲话困难的葛先生，竟然插着导尿管飞回国内。当时笔者在北京迎接，先生竟老泪纵横，猛然喊到：“我想家！”1996 年 7 月 19 日在济南去世，享年 70 岁④。

## 二、史学理论研究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葛先生就曾与庞朴先生编纂《历史科学概论大纲》。粉碎“四人帮”后，他

① 李希凡：《华岗校长与“百家争鸣”》，《文史哲》2003 年第 3 期。

② 李希凡：《〈文史哲〉培养了我》，《文史哲》1981 年第 4 期。

③ 某次，陈鼓应先生在山大历史系演讲，曾当众说自己曾得到葛先生胞弟资助。

④ 关于葛先生之爱国情怀故事颇多，可参见孟嘉（吕家乡）：《悼念葛懋春》，《一朵喇叭花》，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年。

是最早倡导史学理论研究并付诸实践、最早推出相关成果的历史学家。他在国内最早招收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最早组织学界力量出版《历史科学概论》教材。他很早就敏锐地看到，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他是我国史学理论界有代表性的知名学者。

葛先生之所以重视史学理论研究，与他敏锐地看到了时代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密切相关。他观察到，1978年以来，围绕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发展规律性、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历史理论问题，以及史论关系、历史和现实政治、批判和继承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亟须通过史学理论建设来推动和规范。他还注意到，随着国外史学方法、流派、理论研究的进展，史学理论的视野已经大大拓展，再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他大声呼吁，要加强大学的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尽快扭转史学理论的边缘学科地位。

什么是史学理论？葛先生认为，"它应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各国史学理论的实践、史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概括，特别应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它同历史唯物主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理论的基础。因此，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加强，首先必须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史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特别要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史学原著的研究，以便从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分析历史的；同时，还要研究近百年来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对于五四运动以后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也应加以总结。其次，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还必须加强研究中外史学史、深入研究地主、资产阶级史学，总结中外史学遗产中的积极成果，汲取其中合理成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需要结合三十多年来，史学界在实际教学和研究中已经提出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实事求是的同志式的探讨"①。

上述思想，表达了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史学家的基本共识。据葛先生的助手项观奇回忆，20世纪80年初，葛先生专程到北京拜访尹达、刘大年等人，听取他们对史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应该说，这一基本思想，既反映了葛先生等人既有的知识结构、学术宗仰，也反映了历史变迁对其固有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依旧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另一方面，也力求适应形势的发展，有所拓展和前进。因此，在原有的宗旨下加入开放的特质，成为葛先生等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学术取向。

上述宗旨和思想，集中体现在1983年首版的《历史科学概论》中。这本书是1978年受教育部委托，由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合作编写的。葛先生任主编，谢本书任副主编。初稿写成后，曾于1980年12月召开讨论会，同时印出试用本，在部分高等院校试用②。全书的特点，一是宗旨明确，体现为对唯物史观的坚守，以及对唯物史观框架内若干历史理论问题的阐述。二是理论性强，至今依然不失其思想的深刻与绵密。三是重视对中外史学理论史的总结，表现出很大的开放性。

在一些人心目中，葛先生思想偏"左"。是否如此，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纯粹真诚，勤奋攻读，是将其作为真学问来做的，思想并不保守。在1983年4月举行的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呼吁，就是"编辑史学理论研究丛书和史学理论译丛"。"尤其要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以及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的系统介绍，以便进一步评论其得失，汲取其中合理成分。"他的呼吁，得到周谷城、白寿彝等著名学者的支持。其后，他与姜义华会同茅家琦等人，领导项观奇编译出版了《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计量研究法》，可谓开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风气之先。同时，他非常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史资料搜

① 葛懋春：《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建议》，《文史哲》1983年第4期。

② 《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红旗》1984年第13期、《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7期均曾对该书予以介绍。

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领导出版了《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中国现代史论选》[①]等资料集。他说，人口增长和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历史教学中如何贯彻爱国主义等问题，都应该参考中外史学思想来加以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起，山东大学历史系即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演了一出令人称道的“三国”大戏。山东大学的史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受学界重视，饮水思源，应归功于葛先生。那时，学界流传的史学概论教材，除葛先生主编的一种外，后来又有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田昌五、居建文的《历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这些教材各有偏重，风格不同。为此，葛先生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其他时代、其他阶级的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论”。“它既有别于解放前出版的那类仅侧重讲史料考证和历史编纂的史学概论，又不是中国封建史学概论、中国近代史学概论或其他具体的某一时代的中外史学的概论”，“是历史科学学”。因为有这样的界定，葛先生主编的教材以思想性见胜，而不以历史文献学与编纂方法的阐述为特质。书中对历史科学认识特点、研究方法、怎样对客观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等等的阐述，达到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事实证明，注重思想训练，对于培养学术独立分析研究历史的能力，可谓至要。缺乏这种训练，学生就更容易成为“历史匠”，而非“史学家”。

葛先生说：“比起其他学科，我们对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的研究显得太差了，也许是因为，一方面可能有满足于某些简单化思维方法的倾向，认为熟记某些公式就足够应付一切，把某些理论看成是一成不变、不必联系实际加以发展的绝对完善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轻视认识论、方法论的经验主义的倾向，认为史料就是一切，把理论探讨一律看作是虚的、空的、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不如探讨具体的历史问题，哪怕微小而又微小，但却是实的、真的、学术价值高的东西，因而有不少人面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这一难题望而却步。”[②]在形式主义、碎片化盛行的今天，回顾葛先生的告诫，不能不佩服其先觉。

粉碎“四人帮”后，在深入揭批江青集团的背景下，史学界对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新的审视，总的趋势是不赞成过分夸大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现象、反对将阶级分析方法夸大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葛先生较早地介入了讨论。他显然不赞成废弃阶级分析方法，而主张坚守。但是，他认为在历史发展动力论上，应该将“生产方式的改变”与“阶级斗争”统一起来。因为，“把生产的发展同阶级关系变化的本质联系加以论证”，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本质特征。他说：“根据生产力的不同水平，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来考察阶级的产生、阶级结构的变化和阶级的最后消灭，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学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史学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首先必须重视研究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揭露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而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把经济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他认为，解放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原本“比较重视运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来探讨社会经济史中的有关问题”。但1958年以后，“由于理论界片面夸大政治等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于是史学论坛上出现了离开阶级斗争据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大讲特讲历史上政治、思想因素的决定作用的现象”。这一结论，也代表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基本共识。

同时，葛先生还提出，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对待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估计到阶级斗争现象的复杂性，防止公式化，简单化”。为此，他严厉批评了用阶级成份代替阶级分析的简单化倾向，尖锐指出：“如果有人认为考订出孔子成份，就算是解决了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

① 该书用力甚勤，可惜只出版了上册，其他两册竟因经费原因而夭折。

② 葛懋春、项观奇：《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文史哲》1985年第2期。

题，那不是出于丑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便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瞎说。”[①]对于深受斯大林思想影响的葛先生来说，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不能不说体现了其思想的进步。

在史学理论领域，葛先生着重论述的另一论题，是史论关系。他不赞成“以论代史”或“带史”的提法，也不赞成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主张的“论从史出”，但也不否定上述提法的合理因素，而是主张“史论结合”。他说：“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科学的历史理论，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就历史研究的一般程序而言，自然应该“详细地占有历史资料并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所谓具体分析，就是“对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的区分，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的真相”。他特别强调：“忠实、准确是使用资料的起码原则，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但是，他并不认可“史学就是史料学”以及“回到乾嘉去”的提法。因为，“掌握大量史料只是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从而是达到历史研究目的一个必要步骤”。同时，他也强调，“要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分析史实的脱离实际的倾向”。从对上述两种倾向的批评出发，他提出“理论和史料的统一”，并把这一命题提升到认识论与党性的高度予以论述。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史论关系，是葛先生的高明之处，但将其置于党性原则之内，容可商榷。因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未可皆用党性原则来要求。但是，葛先生提出史论结合是科学的态度，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是克服历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必须强调的；“理论和历史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与“寓论于史”有原则区别，等等，无疑是正确的。他大声疾呼“轻视史料工作的学风，必须扭转过来。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要准备长期坐冷板凳，在积累资料中下硬功夫、苦功夫，讲空话显然是无济于事的”[②]，无疑是历史学健康发展的针石良药。

史论关系问题在史学界曾长期争论，以致国外有汉学家以此为题做博士论文。笔者认为，就基本面说，葛先生的论述是允当的。至于说怎样结合，当然不必拘泥于葛先生的观点。从今天史学界的状况看，这一结论对于克服历史特殊论或单向普遍论的倾向，依然不失其药石般的积极作用。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葛先生有至为精彩的阐释，堪称20世纪50年代初的代表人物。他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的改变有迟有速。其原因，不在于上层建筑本身的“顽固性”和统治阶级的有意保留，“而主要是在于上层建筑所据以产生的、存在于它外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及上层建筑某些特点”[③]。新中国成立之初，赵俪生先生曾就此议题发表论文，苏州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的祁龙威读到后，认为赵的观点“错误”，请其“再做深入探讨”。赵因忙且多病，“即委托同事葛懋春先生代为处理”。于是，葛先生写了一篇与赵俪生先生商榷的文章，赵先生随即把葛文推荐给天津《历史教学》发表，并于1951年12月5日在葛文末尾写了一段话：“兹经葛先生研究，撰为此文，并经华岗先生审阅，认为足以纠正错误，补充读者的理解。”[④]此后，葛先生继续丰富自己的论文，愈加详细地论述了形式与内容、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行为、上层建筑与革命斗争、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不同关系与作用、意识形态的发展特点等问题。这一研究，理论水平甚高，也留下一段学术佳话[⑤]。葛先生认为，生产力和技术，都不应该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他说，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有区别。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不属于基础，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是基础。“既然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每一时代的生产关系、基础是要消亡或消灭的，那么把生产力、技术列入基础，也就等于说生产力、技术亦要随某一时代的基础的消亡或消灭而消亡或消灭的。”事实是，“旧基础被新基础更替，但是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生产力、技术，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被继承下来加以

① 葛懋春：《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阶级和阶级分析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

② 葛懋春：《论史论结合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2期。

③ 葛懋春：《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④ 葛懋春：《关于上层建筑变革规律的探讨》，《历史教学》1952年第1期。

⑤ 赵俪生所著《文史学的新探索》（上海：海燕书店，1952年），特意收入葛先生扩充后的长文。

充分运用”。同时，自然科学和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①]。这一结论，今天看来，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领域，葛先生认为，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确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根据”，“有关五种生产方式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很多”。他认为，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演进思想应该表述为：原始东方共有制（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奴隶制未切实支配生产的时期（以小农民经济和独立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时期）→再过渡到农奴制已切实支配生产的生产方式[②]。这一总结是在大批判的语境下得出的，但看得出，葛先生是努力从学术学理出发的。

葛先生的史学理论研究，与现实状况的关系非常密切，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许多人可能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或结论，但学者们都承认，他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缜密的分析能力、真诚的学术态度，为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

葛懋春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一）主张批判继承创新，反对“抽象继承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如何继承哲学遗产、文学遗产，如何古为今用，展开了一场方法论的讨论。葛懋春与庞朴先生一起参加了讨论。当时，冯友兰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的著名命题，葛懋春、庞朴先生则提出“批判继承创新”说来相克。回顾“鲁春龙”当年的文章，虽不免有以马克思主义大帽子压人的意味，但总体看，学理性还是第一位的。而且，就学理本身的真理性而言，我们不能不说，“鲁春龙”的观点更加圆融，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他们提出：“对文化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方法，是为了创立新的文化体系。”“批判地审查和批判地吸收，都是为了创新。有了对历史遗产的批判地审查，就便于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而批判地吸收了一切有益的东西，就便于创立新的文化。”“不继承就不能创新；同样的，不创新也完不成继承。”他们的结论是：批判、继承、创新，是文化发展中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也是把人类文化推向前进的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批判态度，则是继承、创新的前提、基础和核心”[③]。这一观点，与当今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完全一致，可以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其中对“创新”的突出与强调，极其鲜活。

葛懋春与庞朴先生还采用与冯友兰先生商榷的形式，非常深入细腻地讨论了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通观他们的文章，核心论点在于论定，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比如资产阶级人权思想，是一种具有全人类形式的思想，但在内容上，却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无不具有“人类性”的外貌，内囊却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总之，将思想、制度或组织，赋予所谓“普遍性形式”，无非是用假象掩盖真相[④]。这一时期，葛懋春与庞朴先生连续向冯友兰出击[⑤]，虽有特定的现实背景，但确实表现了非常优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才华，结论也是站得住脚的。笔者以为，前两年理论界讨论所谓“普世价值”，其界域依然未出当年鲁春龙的命题。可以说，对于“普遍形式思想”的辨析，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葛先生的思想风采。

196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史研讨班，曾就历史文化思想遗产批判继承问题至少进行了两次专门讨论。讨论的问题包括：对毛泽东主席关于古代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方针应如何理解？怎样区分古人思想遗产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和阶级社会中思想体系的阶级性

---

① 葛懋春：《学习斯大林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笔记》，《文史哲》1953年第3期。

② 葛懋春：《批判李鸿哲反对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谬论》，《文史哲》1957年第12期。

③ 鲁春龙：《试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文史哲》1964年第3期。

④ 鲁春龙：《怎样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新建设》1963年第10期。此文连同上一文，均收入庞朴的论文集《沉思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庞先生说：二文由他执笔，“文中精邃思想，则由懋春兄提供”。

⑤ 又如鲁春龙：《评冯友兰“普遍性形式”理论的一个新说法》，《文史哲》1964年第1期。

的关系，等等。葛先生是讨论中的要角。他的相关思想，对深化讨论有促进，也在讨论中深化[①]。

（二）反对将孔子思想现代化，细微辨析墨家的非儒、反孔思想。必须反对把古人的思想现代化，这是葛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具体运用历史主义原则的一个生动体现。他认为，在孔子研究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将孔子思想现代化的问题。例如有人说，孔子的“仁的思想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还有人说，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是主张“取消私有制”。有人说孔子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张走群众路线。有人把孔子描绘为高举“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大旗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葛先生指出，上述做法，“是一种名义上把孔子奉为教主而实际上把孔子当做玩偶的‘托古改制’”。他说：“历史上的孔子是悲剧里的英雄，而这些思想家们手里再现的孔子，则成了笑剧里的丑角。”[②]笔者认为，目前孔子、儒学乃至整个国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将古人现代化。

早在1959年北京大学进修期间，葛先生为参加山东孔子讨论会就撰写了《试论孔子天道观》一文，对郭沫若关于孔子天道观的评价提出异议，分析了孔子天道观尊天和疑天的思想矛盾与根源。“文革”结束后，葛先生进一步提出，孔子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上持有先验论的观点，但孔子的教学实践以“学而知之”为指导，以多见、多闻等感性活动为知识的源泉，注重力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在先秦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③]。这一论断，是对“四人帮”“评法批儒”运动的拨乱反正，是最早以科学态度重新评价孔子的重要论文之一。

葛先生还运用深厚的文献学考证功夫证明，非儒、反孔口号是墨子后学明确提出的。非儒反孔作为墨家的新纲领，大体是在墨子死后，儒、墨两家思想对立激化的时候，墨子后学为突出反儒需要而提出的。非儒反孔在墨子时代根本没有成为思想辩论的主题，也没有被墨子单独列为治国政纲。因为儒学、孔子思想在墨子时代的影响还没有后来那样大，它既没有成为战国各国统治者奉行的统治思想，更没有占据独尊的统治地位。墨子没有必要把非儒反孔口号单独列为主要政纲[④]。葛先生这一结论，完全得之于文本辨析，不仅具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而且表现出娴熟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特征。

（三）肯定秦惠王，重评商鞅。“文革”期间，江青等人抱着影射史学的阴暗政治目的，大赞商鞅，大批秦惠王，将秦惠王杀害商鞅说成是奴隶主贵族的反攻倒算。葛先生则撰文提出，秦惠王是维护商鞅变法的，是地主阶级政治代表，不是奴隶主贵族复辟派。惠王虽然排斥过法家商鞅，但并没有破坏商鞅制定的法制，也没有起用反对商鞅变法的旧贵族代表人物。他杀商鞅，既不是反对法制，也不是为了扶植旧贵族，而是为了防止商鞅夺取王权。他说：“惠王杀害商鞅，虽然使秦国失去一个有才干的政治家，但在客观上却加强了以惠王为首的封建专制。”因此，这是地主阶级内部君主和重臣之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根本不是什么地主与奴隶主、法家与儒家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由于杀商鞅为后来继续推行法制、扩大秦国势力创造了政治条件，所以不能抹杀秦惠王的历史作用[⑤]。

葛先生深刻揭露商鞅对农民的残暴性，以细腻的文本梳理证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不是什么农民的乐园，而是地主压榨农民的地狱。新兴封建制所带来的生产发展的成果，完全被地主阶级窃夺了[⑥]。所以，杀商鞅其实符合当时农民的心愿，大快人心。他更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商鞅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一直能为两千多年的剥削阶级所奉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主张镇压劳动人民，保护私有

① 详细情况见葛懋春：《关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63年第3期。

② 春龙：《必须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文史哲》1963年第4期。

③ 葛懋春：《孔子认识论评价中的一个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5期。

④ 葛懋春：《“非儒”篇为墨子遗教说质疑》，中国哲学史学会编：《论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葛懋春：《秦惠王历史作用再评价：兼论商鞅被害事件的实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

⑥ 葛懋春：《商鞅变法是怎样强化地主对农民统治的》，《历史论丛》第2辑，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

制，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①]这一结论，可谓振聋发聩，令人油然而生通透之感。

（四）揭批胡适，评析五四时期思想与思潮。20世纪50年代，葛先生不仅是揭批胡适的重要推手，而且还亲自撰写揭批文章。他与庞朴认为，胡适思想的特点，在于以庸俗进化论来冒充科学进化论，利用科学进化论关于普遍联系的观念，用非本质联系代替本质联系，认为发展只是量的增减，抹杀矛盾斗争的发展动力[②]。60年代，葛先生进一步对“问题与主义论战”进行研究，认为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问题要不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革命道路来解决，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是不是应该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③]。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其实，这一根本问题，由于立场不同，至今也存在严重的观点对立。葛先生完全站在李大钊的立场，对胡适的相关论点逐一予以批驳。

与揭批胡适的文章相比，他与人合作批判张东荪的文章，文本分析性更强、哲学思辨意味更重。他们认为，张东荪哲学是中外古今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杂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麻醉、欺骗中国人民的工具”[④]，可谓特定时代的烙印非常强烈。

“五四”前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葛先生另一着力颇多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后用取消一切政府、反对建立革命政权等空谈来代替当时反对袁世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一直到建立革命政权的具体革命任务，实际上对当时革命运动起了阻碍作用。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空想的政治经济纲领，是在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幻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还未引起人们注视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纲领虽然是空想的，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但是他们在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还迷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政客们企图用玩弄代议制来装扮其反动政权的时候，提出了反对剥削制度等等，在思想上多少还能启发人们抛开资产阶级共和国幻想而探索新的救国救民方案。葛先生还认为，1919年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其后，则有意识地把主要攻击矛头转向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争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双方的论战自1920年延续到1922年，主要意义是基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间的思想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论战的缺点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还不够，因而对无政府主义的人性论没有能加以深刻批判，甚至肯定有一般的人性存在”[⑤]。

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以逻辑严整、思维细密、框架圆满、思想性强见长。在他笔下，所有材料都是鲜活的，都紧扣论证的主题，不枝不蔓，在“应有尽有”中做到了“应无尽无”。这种颇具哲学思辨意味的研究特点，得益于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也验证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水平。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系统，包含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全部阶段与样式，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占据重要位置。他立足于原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与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体性与一贯性，以之观察思想事实，得出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任务的结论，很多著述由此而带上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著述饱含对真理孜孜以求的强烈愿望、认真执著的钻研精神，时常闪耀出思想的光华。毋庸讳言，他的许多观点已经只是具有思想史的价值，但其中所深蓄的思辨精神与思想光华，还值得后人去发掘和弘扬。我们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深入发掘其精神遗产中积极和闪光的内容，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思想史研究当中一种正当的、负责任的立场。

[责任编辑　扬　眉]

① 葛懋春：《商鞅法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评梁效〈论商鞅〉》，《文史哲》1977年第3期。

② 葛懋春、庞朴：《批判胡适的庸俗进化论》，《文史哲》1955年第5期。

③ 葛懋春：《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论“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2年第1期。

④ 蒋捷夫、葛懋春：《批判张东荪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山东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⑤ 葛懋春：《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 立基于史 不囿于史

## ——乔伟先生法史研究的学术底蕴与现实关怀

徐显明 马建红

**摘 要**:乔伟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法史学者。在古代法研究领域,乔伟教授以其对法制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厘定、对中华法系礼法合流特点的精到总结、对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研究的开创之功及对唐律的条分缕析,为新时期法律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在现代法研究领域,乔伟教授则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及理论勇气,屡涉学术禁区,表现了学者作为社会良心所应有的现实关怀。作为乔伟教授学术研究中"立基于史,不囿于史"的表征,对古代以法治史法律文化遗产的梳理与借鉴,则是其史学研究中鉴古以明今的经典范例。

**关键词**:乔伟;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唐律研究》

乔伟先生(1932－1997)是一位博古通今的法史学者,在几十年的法学研究中,他既立足于史,又不囿于史,以顽强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断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在法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他的身上,折射出一位法史学者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乔伟,又名乔木青,1932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林甸县,1951 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学习。四年后,他以各科全部优良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55 年,在"反胡风运动"中,乔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继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帽子,被送往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1 年 10 月,乔伟虽作为摘帽右派回到"人民"行列,然而,政治上的污点却使他无法重返讲台,并且"几乎被剥夺了一切公民的权利"①,在吉大图书馆,他成为线装古籍书库的一名工作人员。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乔伟根据"就地取材"原则,转向了对中国法律制度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而《七略》、《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也成为他必修的日课,这些被他称为"读了一个硕士学位再加上一个博士学位的课程"②,为其日后丰硕的学术成果的产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9 年 10 月,乔伟被赶出吉大图书馆,携家带口迁往农村插队落户,1974 年返城后,仍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 1978 年 8 月,才又回到吉大法律系,继续从事他所钟情的法学事业。1983 年,乔伟应聘到山东大学法律系后任系主任,1985 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山东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及《文史哲》编委等重要职务。1997 年 9 月 12 日,乔伟教授因病辞世,留下诸多未及完成的宏大而详尽的写作计划,无论对逝者还是生者,这都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乔伟教授著述颇丰,出版专著 4 部,发表文章 50 余篇,主编工具书、教科书 21 部。其中特色鲜明的《中国法律制度史》、《唐律研究》分别获得山东省 1984 年度和 1986 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作者简介**:徐显明,山东大学教授;马建红,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乔伟自述》,《乔伟文集》卷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② 《乔伟自述》,《乔伟文集》卷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页。

奖；他任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全国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获司法部优秀教材奖；他任总主编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及十余所高等法律院系学者编写的大型《法学丛书》、任主编组织编写的《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卷等影响广泛；他主编的《新编法学词典》，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近四十年来，乔伟教授自著文字200余万，编写文字800余万，总计逾千万。2000年9月，由《乔伟文集》编委会编辑出版了乔伟教授改革开放以来近二十年的部分学术成果，即五卷本的《乔伟文集》，计210余万字。该文集第一卷为《先秦法制史》和《中国刑法史稿》，第二卷是《中国法律制度史》，第三卷为《唐律研究》，第四、五卷为文论部分，分别为《古代法研究》和《现代法研究》。嗣后，乔伟教授的部分遗稿被发现，2007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是为《乔伟文集》补卷，即《三国时期法制史稿》。该文集凝聚着乔伟教授毕生的心血，是一位法学家留给法学界及全社会的一份宝贵的法律文化遗产。

## 一、立基于史：新时期法史学界的奠基者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时期，刚刚回到吉大法律系任教的乔伟教授，立即投身于法学学科和法学研究工作的恢复中。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与几位同道先贤，共同发挥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承先启后的作用。作为中国法律史学形成的标志、代表了中国法律史学者多年科研水平和重大成果的《中国法制史》(本科教材)、《中国法制史教程》(全国自考通用教材)、《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卷本的出版和问世，都凝聚着乔伟教授的心血。他参与课题和项目的重大决策，提出大纲和思想观点，并做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与他的同龄人一道，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法史学研究的辉煌，是新时期法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

(一)中国法制史应是法学专史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中国法史学科的发展，也始于对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厘定和廓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在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和各政法学院设置了中国法律制度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课程。但由于受前苏联“国家与法权的历史”模式的影响，在50年代初期，我国采用《苏联国家与法权通史》作为教本，内容以俄国历史为主，根本不涉及中国的法律制度。在研究对象上，则将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放在一起讲授，并以政治制度为主，法律制度只是其辅助和陪衬。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间，虽然由于其内容与中国的实际脱节、课程体系的庞杂而进行过改革，从《苏联国家与法权通史》到《中国国家与法权的历史》，再到《中国国家与法律制度史》，但用国家制度史来代替法律制度史的研究教学模式却一仍其旧。“国家制度”有其丰富的内涵，举凡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财政、税收等各项制度，都包含于其中，而法律制度只不过是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把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并列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另外，在把法制作为国家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的时候，法律史往往处于政治史的从属地位，致使法律自身发展的规律难以被认识。这种观点还隐含着政治理论中忽视法律因素的因子，使法律完全沦为实现某一政治任务的手段和工具。基于这一认识，乔伟教授从自己的学科着手，率先提出了应把政治制度史与法律制度史分开加以研究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法律制度史必须突出“法”，要着重在“法律”二字上狠下功夫，其研究对象只能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具体而言，它包括“研究我国古代法律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如何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研究各朝代法律制度的内容、特点和发展规律；研究古代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适用”。一句话，就是要突出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专史的特点[①]。

乔伟教授的观点甫经提出，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大讨

① 乔伟：《中国法律制度史·导论》，《乔伟文集》卷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论，先后有五种观点登场立论，而讨论的结果是多数法律史学者赞同他的观点。以这场讨论为标志，中国法制史学科终于完成了对照搬外国模式的变革。后来通用的国家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即是以这场讨论后的统一认识为根据来设置其体系和内容的。

（二）"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立法，自夏迄清，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而且以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影响深广、特点突出而被公认为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①。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史学界曾就中华法系的特点展开过讨论。著名学者陈顾远、程树德等都著文发表过看法。他们认为"中华法系精神的表现，亦即中华民族精神之表现"。可惜这场讨论因时局的动荡而未能进行到底。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法史学家，重新认识这一法制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把对中华法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乔伟教授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他强调法系的民族属性，立足于中华法系与世界其他法系的比较研究，反对把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特点等同于中华法系特点的传统说法。他认为，"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中华法系的特点与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特点有相通之处但又不是同质的东西，后者着眼于其阶级性，而前者则着眼于其民族性。中华法系特点的形成既有政治经济的原因，它首先是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法治经验的总结，也有民族的原因，它其次也反映了华夏民族既重视礼义道德规范又讲求法治公道的历史传统。礼法结合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西周奴隶制国家礼法并用；春秋战国至秦由礼法并用改为弃礼任法；汉代以后至清礼法合流三个发展阶段。礼法结合的途径有两条，其一是立法者以儒家经典为立法根据或以儒家的经典来阐释司法的理由，其二是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法律，把礼的规定改为法律条文，使之上升为法律制度"②。由于把法律思想的研究引入到制度史的研究中，乔伟教授的观点被法史学界公认为是卓有新意的一家之言，其独到之见也被称为与陈朝璧的"三点论"、张晋藩的"六点论"鼎足三分的"基本点论"。

（三）《唐律研究》领一时之盛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法制典籍中，能够提挈上下的法典是极二千年之盛的唐律。《唐律疏议序》中说，"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明人则谓"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明史·刑法志》）。现代法史学者也认为，唐律是我国古代立法的最大成果，它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的完备与发达，正因为它有着承上启下、宗流后世的历史地位，所以研究唐律既被认为是打开封建法史大门的钥匙，也被认为是采撷中国法律文化皇冠上的明珠。乔伟教授是建国后对唐律研究起步较早的学者之一。当众多的淘金者认识到唐律的价值纷纷涌向盛唐宝库的时候，他已经满载而归了。早在80年代初期，乔伟教授就为研究生开设唐律研究的专题讲座，之后，其讲稿曾以《唐律概论》结集刊印传播。1985年，他将对唐律研究的心得集为数十万言的《唐律研究》，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乔伟教授对唐律产生的历史条件、指导思想、制定过程以及作为唐律支柱的五刑、十恶、八议等的起源、沿革、成制与发展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作者运用现代刑法原理，以犯罪客体为分类标准，将唐律中400余个罪名归为八类，对其每类的构成要件作了对比，首倡了古代法与现代法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唐律研究》出版后，曾受到法学界的高度评价，"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新中国40年来研究唐朝刑法最为系统、全面的著作"，"为研究唐代刑法的最大成果"③。著名唐律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大群认为，乔伟教授对唐律研究的贡献，"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者中系统完整地研究唐律并写出著作出版的最早的一位学者；二是贯彻了典籍研究重于渊源探求的民族传统；三是把作为'刑律'的唐律置于唐代整个法律制度产生的大环境中去研究其性质特点；四是在《唐律

① 张晋藩总主编、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夏商周》卷"总序"，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② 乔伟：《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乔伟文集》卷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4－107页。

③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4－235页。

研究》一书中，研究内容的实际结构上基本以现代法学的体系来深入地解析及研究唐律”，“为与他同时及在他之后的唐律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例”①。《唐律研究》因其全面总结唐代法制的经验与教训，并为我国当代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借鉴而荣获山东省 1986 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四）魏晋南北朝法制研究的开创之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经济大变动和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时期，具有时间跨度大、涉及朝代多、民族成分复杂的特点，与此相适应，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也在此时发生了巨大变化，为隋唐以后的封建法律制度走向成熟打下了基础。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中国古代法律发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权更迭频繁，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法律资源既不完整也不系统，而一些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专门著作对这一时期的叙述又十分简略，语焉不详，所以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史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②。乔伟教授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承担了国家“七五”至“八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中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卷的主编任务。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他却认为正可以在此领域做开拓性的工作。在与上海大学的陈汉生教授编写该卷书稿时，乔伟教授从基础工作开始，在古书堆中“大海捞针”，一点一滴地搜集整理，然后经过考证、梳理、分析、编纂，历时五年，修改数次，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可以说，该卷代表了当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而乔伟教授自己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以《乔伟文集》补卷“三国时期法制史稿”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为我们今天认识这段历史中法制的原生态奠定了基础。

上述几个方面，远远不能涵盖乔伟教授在中国法史学科方面的贡献，事实上，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这也是他成为中国法史学界代表之一的实力所在。他对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国法产生的分析；先秦诸子法律思想的探源发微；秦汉刑制的考察；汉文帝废肉刑得失的评价；魏晋律学的探讨；唐初法制经验的总结；宋明理学与法制关系的阐述；清时以例代律成因的说明；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相互作用的论证；对古今法律的比较研究等都有精辟独到之处。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治学的勤勉和严谨分不开。搞法史研究，必须立足于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证，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正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胡适语），急功近利者往往贪图时功，转述别人的第二、第三手资料，作为论文的根据，这样的文章难有较强的说服力。乔伟教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逐步养成了治学严谨的学风。在吉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他面对线装古籍书库的 20 多万册图书，围绕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学科的主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他先从通典、通志、通考、各朝会典以及图书集成等类书入手，再进一步扩大到原著。他认为要“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最好应用第一手材料，即从原本著作中去取证。这样写起文章来言之凿凿，一般是经得起检验的”③。与乔伟先生一起编著过教材的法史学界同行对此都记忆犹新。在 1991 年 9 月给《中国法制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的副主编、上海大学陈汉生教授的一封信中，乔伟先生谈到写作要“首先从搜集资料开始，能搞到的书尽量看看，正史、通鉴、通典、通志、通考则是必读之书。我当前正在进行此项工作，苦不胜苦也”。这种扎实严谨的治学精神，正是如今浮躁的学界所应以自警的。

## 二、不囿于史：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关怀

借鉴与扬弃是学者治史的两个基本功，它要求史学家既能钻进去又能钻出来。治史者往往容易成为一个玩文字游戏的食古不化的书呆子；而治史者也只有不囿于史，才能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

① 引自钱大群教授在“纪念乔伟教授逝世三周年暨《乔伟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② 张晋藩总主编、乔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卷“绪言”，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2 页。

③ 《乔伟自述》，《乔伟文集》卷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页。

成为社会的良心。乔伟教授对现实的深切关怀，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研究生涯。

（一）不做简单的“文字工匠”

乔伟教授认为学者不能只作简单的“文字工匠”。在为研究生开设“唐律研究”专题讲座时，他曾对此进行阐释，“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过去。如果研究历史不能从古人成与败的经验教训中找出今人应走的道路，那么历史学家不过是个文字工匠。我研究唐律的目的，不仅在于证明唐律如何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注疏确切和举例适当，而且在于探讨贞观之治与完备的法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离不开健全的法制保障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借鉴和扬弃的思想，贯穿于乔伟教授史学研究的始终。在《论法制建设中借鉴历史经验的问题》一文中，他将古代成功的法制建设经验提炼为五个方面：“缘法而治，健全制度”；“礼刑并用，罪刑相称”；“以法治吏，刑无等级”；“有法必依，取信于民”；“审时度势，厉行改革”。他认为这些代表中国法律文化精髓的东西，在今天仍是值得褒扬的成功经验。同时他也认为，像“以言代法”、“等级特权”、“同罪异罚”、“重刑伤民”、“刑罚残酷”、“拷讯逼供”、“株连无辜”、“冤狱丛生”等这些古代立法、司法实践中最野蛮、落后的一面，则是我们必须贬斥肃清的。他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古代的法是为了建立现代的法”，这在他的《论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三次重大改革及其历史教训》（《法学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中也有所体现。文章说：“秦国商鞅对法制的改革——封建法制形成时期的改革；汉初文景二帝对法制的改革——封建法制确立时期的改革；唐初李世民对法制的改革——封建法制完备时期的改革，它们共同的成功经验是：首先，三次改革都把政治制度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法制改革结合起来同步进行；其次是三次改革都在实行之前寻找到了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使改革的意向成为普遍接受的变革社会的动力；再次是三次改革都证明了‘用法更难于立法’的规律，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使倡言改革的立法者与贯彻改革方针的执法者的上下和谐；最后是三次改革都抓住了民心起应的时机，这证明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才是能够取得成功的改革。”该文成笔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大潮勃起的背景下，文中所论，处处洋溢着作者为改革推波助澜的热情之心。乔伟教授把对中国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方面的一个个专题研究，与当代的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鉴古以明今，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位法学家关心国运昌祚的时代责任感。

（二）万马齐喑中的学术坚守

在学术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学者坚持理性客观的研究似乎并不难，只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洞察力，即可在自己钟情的学术领域纵横驰骋，然而，如果身处政治环境险恶、动辄因言获罪的年代，学者超常的胆识和非凡的理论勇气，则变得必不可少。建国后屡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不仅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更使学者斯文扫地，学术界一片荒芜。在众生苟且的时代，乔伟教授却仍能坚守一贯的学术情怀，堪称时代的良心。在极其荒诞的“批儒评法”的1973年，乔伟教授就开始着手研究儒法两家的对立及相互联系。他先后撰写了《商鞅法治思想探源》、《商鞅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初步研究》，忆写了被抄没的《族刑连坐法的初步探讨》等有关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在初步弄清法家思想特色的基础上，又撰写了对比鲜明的阐述儒家法律思想特色的《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的初步研究》、《荀况“法后王”考辩》、《荀况王霸思想初探》、《荀韩政治法律思想比较研究》等文章，理清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儒法合流的基本脉络。这些征引有据的学术论文，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一部分人为附会极左政治而对秦始皇所作的美化，也廓清了人们强加给荀子的种种臆造。撰写这些文章的当时，他并不企望即时面世，只想把自得之识传给后世，意在让后人知道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里，也曾有过一股被压抑的真理之声。1979年之后，他的上述论文相继在《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篇篇掷地有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世纪90年代，“顾准热”之所以能够兴起，其原因就在于在那样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思想、而使大众失语的时代，顾准仍然能以摒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格而给当代人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事实上，正因为有顾准先生、乔伟教授等这样在“文革”中不惧

因言获罪的威胁，仍然孜孜矻矻、为真理上下求索的学者的存在，才不致使改革开放后的学术思想界成为蛮荒之地。

（三）屡破“禁区”，引领学术研究新风潮

乔伟教授以其非凡的学术才华，奠定了他在中国法史学界的地位，而在现代法的研究领域，他也能常领风骚。在所有学科中，政治与法律有一种无法割裂的亲缘关系，而治法学之人也往往因对“敏感”问题的关注而遭受整肃，因此，在法学研究中，也会形成一些有形无形的“禁区”，而突破“禁区”的能力与胆识又决定着学者在学界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科学发展的春天虽已来临，却仍处于乍暖还寒的季节，饱受反右之苦及“文革”之害的乔伟教授，却并未三缄其口。早在1978年，当人权问题还是一个禁区而乏人问津的时候，他就撰写了《论人权、“恐资病”及医治的药方》一文，驳斥了把人权作为资产阶级专利品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从法律上强调保障劳动人民的基本人权，使人权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该文的成稿时间比我国1991年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早了13年！这对一位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来说，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略！1979年1月5日，他的《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迅即引起了巨大轰动。曾几何时，多少人因坚持独立审判而被斥之为“向党闹独立”，引咎受罚，而乔伟教授竟然敢犯这样的大忌，确实体现了作者的明达识度与执著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在文章中辩证地分析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是党的政策的定型化，服从法律即是服从党的政策，因而即是服从党的领导的观点。文章澄清了人们长期形成的把服从党的领导与服从法律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好评。此外，每当法理学界在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发生较大争论时，他都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洞察到争论的实质及突破的方法，并以一家之言注入力量，如他的《“权利本位说”质疑——论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一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论述了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性质，提出了权利义务相统一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的观点；而《自由、必然与法律》、《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新时期法制建设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法制思想论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等文章，也都能另辟蹊径，以其独到的见解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服务社会，推动地方法制建设

乔伟教授不仅是一位与时代节奏合拍的法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个积极参与司法实践和法制建设的法律工作者。他的特殊经历，使他懂得冤屈与不平，往往与钳制当事人的言论自由与遏制当事人的辩护权利联系在一起，因而他常把自己的学识形诸文字，为民鼓与呼。作为著名律师，他出庭辩护、代理的案件不计其数，其中成功的经验多被他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他的《要正确对待辩护》、《律师制度的初步研究》、《划清诬告与错告的界限》等文，在律师界影响广泛。由他在律师制度恢复后不久编写出版的《律师手册》，是当时律师以至法官、检察官手头必备的办案工具书。就在发表《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同一年，他还发表了《健全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独立行使职权、维护国家法制》等文，完成了他构思已久的由关于辩护的论文、到关于审判的论文、再到关于检察的论文的一组文章，实现了他重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夙愿。

乔伟教授社会兼职甚多，在应聘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首席法律顾问期间，他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建议，并围绕依法行政问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关于依法行政和行政复议的问题》、《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论政府法制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关于政府依法决策和依法行政的几个问题》等，使1986年成为山东省的“依法行政”年，被党中央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治国，饱含着包括乔伟教授在内的众多法学家的努力和心血。

## 三、以法治史研究：鉴古明今的经典范例

吏治制度与吏治思想，是盛开在古史法苑中的一朵奇葩。作为一名成绩斐然的法史学者，乔伟

教授曾对中国古代的吏治思想与制度给予热切关注，他在对吏治传统进行梳理批判的同时，着力于为解决当代人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这种借鉴也绝不只停留在宏观的空泛的层面，而是更着眼于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制度领域。可以说，乔伟教授对古代吏治的研究，是其"立足于史，不囿于史"风格的具体体现，是法史研究中鉴古明今的经典范例。

（一）以法治吏是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曾盛行一种对传统文化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做法，乔伟教授对此提出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一无是处，甚至把中国过去与现在的一切丑恶现象都归罪于传统文化思想的看法，更是不公正的"①。他认为，今天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而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质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抛开历史和国情，不仅"中国特色"无从谈起，而且这样的法律也会因为脱离实际而在现实中碰壁，成为一纸具文。因此，对自己民族历史上的法学文化遗产，我们所面临的不是能不能或可不可以继承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发掘这些遗产和如何继承的问题。我们对古人应予以同情的了解，"不应看他哪些没有做到，而应看他做了些什么"②。不苛责古人，系统地整理我们所承继的一切，以期对当代的生活有所借鉴，是当代学人应有的态度。

在诸多优秀法学文化遗产中，乔伟教授既有对法律文化遗产全景式的综合概述，也有对其中某一方面个案的具体剖析，而对古代吏治经验的发掘和继承即是其中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总结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浩劫"在法制建设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改革制度、健全法制着手，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总方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有了完备的法制，还需要人们的执行和遵守，而严格依法办事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建立一支刚直不阿、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干部队伍。乔伟教授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特权思想蔓延、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等专横、腐败现象，提出"必须建立有效的监察制度，使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而无法逃脱惩罚。在这方面，我国古代以纠举违法为宗旨的监察制度和西方国家以察举贪污为目的的法律设施，有许多东西可资借鉴。"③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治国的关键，不仅在于选贤任能，起用人才，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国家官吏都能够正确无误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为此，历代王朝不仅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吏治思想，而且还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吏治制度。这些思想和制度，有的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参考，有些甚至可以直接"拿来"加以运用。乔伟教授认为，古代的吏治思想和吏治制度，就是这些优秀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古代以法治吏思想及其制度体现

乔伟教授根据《说文解字》中"吏，治人者也"的解释，认为"吏是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统治和管理民众的工具。在封建专制时代，吏高于民，是民之'父母'。管治民众的官吏，就和牧人放牧牛羊一样称之为'牧民官'"④。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实权在握的最高统治者，都积极主张建立一支奉公守法、清正廉明的官吏队伍，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以法律手段整顿吏治的思想，同时注意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实践这些主张，二者互相印证，相得益彰。乔伟教授在其研究中，对此均有系统的整理和阐释。

1. 古代以法治吏的思想渊源

乔伟教授曾对儒法两家的以法治吏思想进行过系统的梳理。他认为，无论是儒家的礼治倡导者者，还是法家的法治推行者，都强调以法治吏的重要性。

---

① 乔伟：《传统文化与法制建设》，《乔伟文集》卷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26－527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

③ 乔伟：《法学简论十则——我的法律观》，《乔伟文集》卷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④ 乔伟：《中国古代以法治吏的经验教训》，《乔伟文集》卷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7页。

先秦儒家学者是礼治论者，主张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但他们并不反对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孔子就主张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宽猛相济”、“一张一弛”，实际上就是要礼刑并用、礼法结合。只是在推行礼法时，先秦儒家都很重视人的作用，特别是当权者的表率作用。乔伟教授认为，孔子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都表明孔子强调统治者个人在实施礼义法度中，必须以身作则，成为民众的表率。只要当权者自己认真地遵守礼义法度，则民众无不响应，国家也一定能治理得好。依据政治上上行下效的定律，那些占据高位的政府官员洁身自好，清正廉明，则是国家形成良好吏治的关键。

如果说，儒家还只是停留在用规范性较弱的礼来约束官吏，可以名之为“以礼治吏”的话，法家则从可操作的层面，明确地提出了以法治吏的主张。商鞅认为，“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勉于罪，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他主张用法律来约束官吏，甚至对官吏也实行族刑连坐之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官吏虽受命于千里之外，也都能尽忠于封建君主。乔伟教授认为，在法家中，继承和发展了商鞅“以法治吏”思想，并提出了一整套“以法治吏”理论的是韩非。韩非主张君主要驾驭他的官吏，就必须采用“施赏不迁，行诛无赦”的法律手段，才能保证他们效忠于君主并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韩非还进一步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主张，认为这种方法好比“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摇木之本，则枝叶必动；引网之纲，则万目必张。只有首先实现吏治，而后方能做到“民治”。“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乔伟教授对此分析道：“封建统治阶级强调治吏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把‘操鞭使人’的官吏整治好，然后再让他们去‘役使万夫’。所以归根到底，封建统治者治吏的目的，还是为了治民。”[①]而治吏的方法无他，乃是法律，而且是严刑峻法。

无论是儒家柔性的的“以礼治吏”，还是法家刚性的“以法治吏”，他们都认为重点在于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高级官吏，甚至包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带头遵守礼法制度，“因为在封建时代对法制的最大破坏，主要不是来自于社会下层，而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②]。孔子的“身正令行”观、商鞅的“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都说明立法者带头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是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根源。对此，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应努力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尚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即一言一行都不能出于法之外。历史上的一些有道明君就时刻以此自诫，如唐太宗李世民曾总结君主守法的重要性，“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

2. 古代以法治吏的制度设施

乔伟教授总结古代的以法治吏，“就是把官吏的选拔、任用、职责、考核、升降、奖惩等一系列环节，都纳入法制化轨道，使之规范化、制度化，而且使这种法律与制度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得按照个人意志去改变它。简单说，历史上的以法治吏，就是以法律手段去整顿吏治”[③]。纵观整个古代史，在一些吏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统治者都注意把以法治吏放到为政的首位，采用各种办法来防止官吏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在防范的环节上，侧重于“两头”，一是选拔任用，一是监督检查。而在选拔官吏方面，“不让那些平庸无能、贪得无厌或品质恶劣之辈混入官吏队伍，保持官吏队伍的纯洁性”与“想尽一切办法（包括高薪）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吸收到国家机关中来，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才政府’”[④]具有同等的

① 乔伟：《论我国古代以法治吏的若干问题》，《乔伟文集》卷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8－249页。

② 乔伟：《论我国古代以法治吏的若干问题》，《乔伟文集》卷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

③ 乔伟：《中国古代以法治吏的经验教训》，《乔伟文集》卷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9页。

④ 乔伟：《中国古代以法治吏的经验教训》，《乔伟文集》卷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0页。

重要性。盛行久远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就为选贤任能、去贪汰劣、堵塞品行恶劣者从政的门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在对官吏队伍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防止他们掌权后违法乱纪、巧取豪夺，即时纠举并清除那些腐败变质及贪赃枉法的官吏，惩恶扬善，赏勤罚懒，不断激励官吏的进取心，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能方面，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上计制度等，也都是比较成功的经验。从秦朝开始发其端，由后继的各个王朝不断发展，至明清时期臻于完善的御史监察制度，以其发展脉络的清晰、制度设施的完善、结构体系的完备，吸引了政治学、历史学及法史学界的极大关注，也成为自民国以降各种性质的政府所必资借鉴的珍贵传统。而考试选官与行政监察，还被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纳入他著名的"五权宪法"体系，足见其作为优秀的吏治传统的组成部分，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共识。

乔伟教授认为，中国古代除了在官吏的选拔和监督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具特色的是历代统治者运用法律手段以整顿吏治所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主要体现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官吏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官吏失职的法律责任、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责任及官吏职务上的连带责任等。这些有关官吏法律责任的规定的施行，为促使封建官吏忠于职守、勤于尽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唐律中的吏治

乔伟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对唐律研究起步较早的学者之一，在其成果《唐律研究》中，他将有关以法治吏的部分，归纳为职官"职务上的犯罪"和执法官吏在"审判上的犯罪"，并对每一类犯罪的构成、特征及处罚方法作了详尽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是古代以法治吏制度化的集中体现。

乔伟教授把官吏职务上的犯罪分为：(1)贪污行为，主要是指封建官吏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诸如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封建国家的财物，收受他人贿赂以及其他违法取利的行为均属于贪污行为。为便于官吏准确地定罪量刑，唐律又把这类犯罪细分为受财请求、受所监临财物及其他贪赃受贿行为等，这些惩贪规定的施行，为唐初"官吏多自清谨"局面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擅权行为，即指官吏在执行职务时滥用与超越职权的行为，包括置署过限、非法兴造、擅自兴造、非法赋敛、擅奏改律令式、出使辄干他事、代署代判等，保证了各级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和各种政策的正确实施，决不容许官吏滥用或超越法律所赋予他的职权。(3)失职行为，即要求封建官员没有克尽职责应当受到刑事处分的行为，都是失职行为。如贡举非其人、稽误制书及官文书、上书奏事有误、事应奏不奏、贻误公事、主司脱漏户口、部内田畴荒芜、不言及妄言灾害、违法授田课农桑、应受复除而不给、输课税物违期、不修堤防桥梁等，这对增强各级官吏的责任心，强化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保证官吏尽职尽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即使是对官吏的违纪行为，唐律也作了严格的规定。违纪行为主要是指贪污、擅权、失职以外的其他一些违反官规官法的行为，如泄密、旷职、出界等，使官吏在为皇权服务的过程中不得有丝毫懈怠。为保证封建法律的实施，李唐王朝还建立了一整套执行法律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审判制度，明确规定法官在审判上的法律责任，用法律手段来杜绝徇私枉法的行为和不负责任的审判作风。乔伟教授的这些归纳总结，向我们展示了唐朝吏治制度的精细度与全面性，这不能不让人惊叹于唐朝人在制度建设上的智慧。

(三)从以法治吏到依法行政

如前所述，乔伟教授不仅是一个与时代合拍的法学家，同时还积极投身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司法实践中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服务于社会。他曾长期应聘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首席法律顾问、淄博市人民政府特邀法律顾问等。在任职期间，乔伟教授多次以著文和演讲的形式，对政府施行法治、依法行政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宣传。他总结我国建国以来行政管理上的失误和教训，认为一个社会政治及风气的好坏，在于是否有一支清正廉洁、勤于政事的官吏队伍，而这支队伍的锻造和管理则必须依法进行。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中央虽三令五申制止乱涨价、乱摊派，而乱涨价、乱摊派的歪风却愈演愈烈；国家虽制定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法律，但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等行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严重。乔伟教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法制。为此，他提出要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借鉴古代以法治吏的经验，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即应该由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执法情况负完全责任，并把执法情况的好坏作为考核干部的主要内容之一，凡是在本地区、本部门发生了违法的事情，首先必须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失察者以渎职论，知情者以故纵论，同谋者以枉法论”①。在施行法治、依法行政过程中，只有依法加强对官吏的管理，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是古代封建王朝留给我们的一条宝贵经验。

不仅如此，乔伟教授还从具体问题入手，提出借鉴古法以解决现实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上制造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大有向各行业全方位蔓延的态势。乔伟教授对此深恶痛绝，认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人民对制售者恨之入骨，可谓“人人皆曰可杀”。我国刑事立法上的不足和地方政府的监管不力甚至包庇纵容，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他建议应借鉴唐代的立法经验，除了对制售者处以重刑，没收其非法所得，还应该明确规定主管机关的刑事责任。他对唐律中“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的规定非常赞赏，认为这对于我们今天制止制售伪劣产品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试问，为什么一些国营与集体的工商企业居然打着‘合法’的招牌大量制造和销售伪劣产品，其背后不是都有‘州县官司’的批准、支持或默许吗？而这种制售伪劣产品的事情之所以得不到有力的制止，其原因也在于此。如果我们也能制定这样一条法律，那么‘州县官员’就不会与伪劣产品的制售者同流合污，共同谋划来坑害人民了，则制售伪劣产品的不法行为即使不能完全杜绝，也肯定会日益减少”②。直至今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仍很猖獗，究其原因，“涉及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监管及地方司法机构执法缺位的问题”。“大规模的恶性食品或药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往往是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在某个环节的监管出了问题。”解决的关键还是应落实到“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做法进行追究和制裁的问题”上③。其实，“以法治吏”、“依法行政”依然是我们走出社会管理困境的制胜法宝。

## 四、结　语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法学家的乔伟教授，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对史料的占有和运用，还是对制度、思想源流及其沿革的清晰梳理，都展示着其深厚的学术底蕴；而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则仍为当下的社会提供着滋养。这不是简单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究式的研究，而是既立足于史，又不囿于史，从人类的经验中汲取英华，使那些死的知识能“活过来”，古为今用，可以为人类提供知识增量的研究。从做学问的角度而言，要做到如乔伟教授那样在浩瀚无涯的史料中纵横捭阖，随意采撷，并以其清新的文笔、深邃的思想、充分的立论和痛快酣畅的风格，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没有对学术的热情，没有对学问的敬畏，没有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没有甘坐冷板凳、能下笨工夫的精神，则绝不可能达到如斯境界。在当今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这也是广大后学所当谨记的。

[责任编辑　刘京希]

① 乔伟：《关于政府依法决策和依法行政的几个问题》，《乔伟文集》卷五，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05 页。

② 乔伟：《法学简论四则·严惩制售伪劣产品的不法行为——从唐律规定引起的思考》，《乔伟文集》卷五，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815 - 816 页。

③ 邓正来：《中国法学研究中“中国”的缺位》，《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22 - 123 页。

# 在东西互参中体认中国文化真谛

## ——许思园先生有关学术思想述评

何 中 华

**摘 要**:许思园先生通过文化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诗歌的特质,并在此基础上贞定其优劣长短,从全球化视野出发,给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许先生的文化比较研究方法颇具特色,其体认式的而非旁观式的姿态、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中国情结、摆脱文化反思的情绪化干扰,对于今天的文化研究无疑有其深刻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许思园;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诗论

许思园先生(1907－1974),原名寿康,号思玄,后改名思园,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受到深厚文化氛围的浸染和熏陶。许先生作为学贯中西、思接古今、识逾文理的思想大家,其运思的高超在于视野的宏阔和思辨的缜密。本文不拟全面系统地总结并评价许先生的思想成就和学术贡献,仅就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思想成果作一初步梳理,以纪念这位不应被遗忘然而却被时代遗忘了的思想家。

许思园先生早慧,16 岁考入上海大同大学,读大学期间即用英文撰写专著《人性及其使命》,对人格的成就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创造性地诠释并发挥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1933 年,许先生开始游学欧洲,在伦敦作短暂逗留后至巴黎,1938 年秋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44 年到里斯本,一年余后抵美,曾晤爱因斯坦,与之讨论战争、宗教和中国哲学,并就相对论提出质疑。1945 年回国,次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47 年受聘无锡江南大学,任哲学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年,尔后任教于山东大学历史系。1974 年 3 月因病在孤独和寂寞中不幸辞世。许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曾撰写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更是情有独钟,其成果获得过西方的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好评,甚至得到了爱因斯坦的首肯。1956 年 10 月至 1957 年 11 月间,许先生在教学之余,曾撰写有关中国的哲学、文化和诗歌等三束文稿共计 12 篇,其中"中国哲学论"3 篇、"中国文化论"4 篇、"中国诗论"5 篇。这些篇章集中总结并体现了许思园先生的文化观,特别是他对本土文化的体认和检讨。本文主要依据这项成果,试就许先生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加以述评。

## 一、许思园先生在中西文化及其比较上的真知卓识

文化问题最容易谈,又最不容易谈好。关于文化,似乎谁都可以扯上几句。但是,若要提出真知灼见,就非得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不可。而许先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他的见解迥然异乎所有那些轻浮之论,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重新思考文化问题以深刻启示。在中西文化比较领域,自

**作者简介**: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晚清以来，俗见陋见太多，获得洞见极为不易。所以，许先生的见解就显得尤为珍贵。许思园先生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论著，篇幅虽短，然而却言简意赅，充满洞见，极耐咀嚼回味。

许先生的出发点和归宿无疑在于文化，然而哲学同文化之间又具有无法剥离的内在联系。一般地说，哲学是文化的内核和基因，文化则是哲学的载体和表征。但对于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而言，必须以文化作为基本的反思单位。文学艺术不过是文化精神在审美创造和表达层面上的投射罢了。因此，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精神，就不能不从哲学层面着手。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精神特质的把握和体认，若不能深入至哲学层面，就不可能得出深邃的洞见。所以，中国文化的自我体认，就需要从文化的内核——哲学——开始。

许先生强调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偏好及其古老传统，认为“西方哲学与科学同源，初期二者混然不分”，可谓“哲学与科学在西方实一脉相承，其血缘极为密切”[①]。这一判断的确抓住了西方哲学传统的特质。“希腊盛期哲学重心在本体论，但亦不乏认识问题之深刻讨论。迨近代西欧哲学兴起，哲学重心移至认识论。”（第 7 页）许先生进而比较中西印哲学之分野，指出：“希腊哲学与科学同源，印度哲学迄今不离宗教，而中国哲学则源于道德政治。”（第 4 页）与西方哲学的“目的为求真”异趣，中国哲学“不离实用”（第 5 页），从而“认识论在中国始终不获开展”（第 7 页）。“一言以蔽之，中国哲学三大派（即指儒、道、释——引者注）皆不二天人，努力现世，绝不认为人生与人性有根本缺陷，虽程度有所不同，其世界观皆可谓属于乐观主义。”（第 13 页）由于缺乏天人相分关系的预设，主客观对象性关系的阙如，不仅使知识论无以确立，而且也造成了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分野和对峙的不可能。诚如许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哲学则根本不能以唯心、唯物区分学派”（第 9 页）。中国宇宙观的归宿不外为道德政治学说提供合法性而已。即使涉及宇宙论和本体论，也绝不离人生、人事而谈宇宙和本体问题。与西方知识论发达相映成趣，“中国哲学家所探究者以道德政治为主，而皆归本于天（在道家天即自然）。在中国哲学宇宙观盖属后起，为道德政治问题所引发，转而成道德政治理论之根基”（第 7 页）。

许先生认为“认识论在中国始终不获开展”（第 7 页），这无疑是一种清醒而真确的判断。认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之所以不发达，乃是由中国文化的根本旨趣决定的。因为认识论作为人的科学认知活动的辩护方案，它的成长乃是同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的，两者互生共长、相辅相成。中国文化既缺乏科学兴趣，认识论自然也就不可能成熟并发展起来。中国文化的旨趣在成就人的道德人格，而非认识外部世界。所以，“中国哲学家对本体论与宇宙论似缺乏强烈兴趣，至少不离开人生人群而谈宇宙”（第 7 页）。

许先生对于中国意义上的“自由”亦充满深刻的洞见，他写道：“真正的自由惟有从自主中获得。儒家肯定有此自由。”（第 20 页）此种自由，亦即“自诚中求自得，于自主中求自由”（第 31 页）。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才是自由的原初含义，它同自由主义的那种为人的任性争取合法性的自由观不可同日而语。其实，道家所追求的自适其性与儒家的自由观实有相通之处。许先生认为，这种自由观实乃“我国先哲对人生观之主要贡献”（第 31 页）。此判断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对于中国文化无深刻体会者，是不可能有此判断的。“我先民独能‘依自不依它’，于自诚中求自得，于自主中求自由。惟有能反求诸己可以担当任何患难，应付任何变局。重在内心，则至善真乐，不待外求。……此自诚、自得、自主、自由之人生观与人伦中心为历来中国社会之基石，其为立国之本不容置疑。”（第 74 页）这个意义上的自由，赋予中华民族以一种内在的力量。然而，许先生对于道家的评价却多持贬抑态度。他写道：“两千年来，道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实已为害不浅，幸而未能排儒家而成为主流。”（第 21 页）

许先生认为，相比较而言，先儒刚健，后儒萎缩，端在后儒遏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

① 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 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

的刚健进取精神,“此类思想盖出自儒家中之恢宏一派,秦汉以来几成绝响”(第22页)。在他看来,儒家逐渐趋向衰弱以至堕落。之所以发生这一情况,与道家的影响有关。因为“道家流弊极大,对中国民族功不抵过”(第22页)。其实,儒家与道家之间恰恰形成一张力结构,成为平衡中国文化从而避免偏至的要枢。倘若仅仅有刚健进取,离开了阴柔和收敛的必要补充,同样会出现因偏颇而导致的畸形。事实上,无论是道家的空灵,还是儒家的笃实,对于成就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来说,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许思园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讨论,体现了他的可贵的自我检讨精神。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哲学的弱点主要在于:第一,“中国学人始终不重视纯理论,此乃一极大弱点,不容讳言”(第33页)。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缺乏严密的体系,不注重逻辑的运演,而且缺乏对学问的目的性追求,往往把学问当作实用目的的手段。由此决定了“中国哲学始终不离人事而期于实效”(第5页)。第二,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中国学者偏好“安于现实,不知开拓理想境界,对客观真理、美、善、光明作无穷之探求。遂致精骛八极、神游六合之表之壮阔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寥寥可数”(第35页)。倘若以西方哲学为衡准,中国哲学的确带有既早熟、又永远长不大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哲学的自我展开。第三,缺乏深刻的悲剧意识。“中国毕竟少卓绝之宗教家,可与印度、希伯莱、中世纪欧洲相比者,大悲智慧卒不克发扬。”(第37页)中国乐感文化所孕育的哲学,往往对历史悲剧和历史灾难少有正视的勇气和反省的态度。由此可以理解,“我先民之受祸烈矣,然而我国学人对罪恶与灾难之感悟认识终不若希伯莱人与中古欧洲人所感之深切”(第36页)。第四,在政治哲学方面,民本、民主未能导致共和精神和共和制度安排。在中国,“民本主张从未有人敢公开否定,两千年间之实际政治亦未尝缺乏民主因素,然而始终未能发扬共和精神与建立共和制度”(第38页)。第五,中国哲学缺乏进步和进化之观念。“中国两千年来传统之压力极大,进步、进化一类概念在中国哲学中似未曾见。”(第40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起源就是目标。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观念,在中国哲学中占居主导地位。许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自身缺陷无法通过自身来克服,需要借鉴西方哲学和文化资源,以收补偏救弊之效。他指出:“求来日中国文化之发皇,必须力矫上述诸弊,更进而培养好奇爱智之热忱,激发悲情及与民同患之感,拓展理想境界,树立共和精神,而其必不可少之条件则为思想信仰之充分自由。”(第41页)

许思园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观察,视角独特,常发他人未发之议论,而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且每每给人以意外的启发。

许先生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之分野的本根处:“柏拉图将人之心理分为理性、意志、情欲三方面,而以智慧为理性之德,勇为意志之德,节制为情欲之德,并主张以理统率意、欲二者。孔子则并举智、仁、勇,然以仁为诸德之本。”(第72页)以理性为内核的科学主义传统和以德性为内核的伦理主义传统,恰恰最集中地体现着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

在比较中西文化性格时,许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偶像是“英雄”(征服者)。他指出“西方人历来崇拜勇猛善战之大征服者”(第29页)。例如,“早期希腊悲剧大都以奇伟人物为主角。盖希腊人征服爱琴世界以武士建立城邦,贵族出自武士,故崇尚勇力智谋,以此为教”(第72页)。这同中国文化的性格和旨趣迥异。中国文化呈现为一派和平气象。许先生写道:“在中国则秦皇汉武之功业反被目为穷兵黩武。孟子‘善战者服上刑’一语实透露整个民族之良心自觉。叶公问政,孔子答以‘近者悦,远者来’。又告冉有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庸》引孔子言以‘柔远人,怀诸侯’为平治天下之要道(……)。孟子则径主张以大事小。言虽出自孔孟之口,但所表达者乃先民之共同智慧。”(第29页)老子亦曰:“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

许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历史意识的发达,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中国传统教化之又一主要特点,为注重历史。”(第30页)中国史官和史学的传统悠久而显赫。中国有祖先

崇拜的传统，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其归宿乃是道德的淳化。这一特点归根到底不过是道德之自然基础的必然要求。因为从道德的原初基础上强化道德的土壤，是中国伦理本位主义传统的需要。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以历史感代宗教意识，虽然没有发达的宗教传统，但这种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意识，同样可以“令人向上滋长德慧”(第 30 页)。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大流崇仰之诚笃、情感之深厚，仿佛中世纪欧洲人之于基督教”(第 30 页)。

许先生总结道，“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自由本于融和)，我先民之宇宙观、人生观、政治、教化、文学、艺术殆无一不为此根本精神所贯注”(第 75 页)。关于“融和”，许先生解释说：“先秦儒家之人生智慧，最根本原则为融和，从内心融和(……)，以达于天人融和，物我融和。”(第 67 页)这种智慧无需外在的他律之强迫，而是通过自律和慎独而达成自由，从而“使人解脱对鬼神之恐怖与祈求，超越传统礼俗与集团利益，自诚自肯，得大自在。道家虽不解尽性成能，然学道有得者类能洒脱，故中国智慧特色可云以自由为主”(第 67 页)。

许思园先生立足于人的存在方式去解释文化性格的发生学基础，符合唯物史观的逻辑。在归纳中国文化的特点时，他首先给出了对于中国文化的一般刻画，指出：“世界各大文化系统中色彩最鲜明者，无疑为中国文化，宗教势力不盛而僧权从未形成。”(第 49 页)因此，“在文明古国中唯独我国不以宗教影响其近邻”(第 45 页)。儒学在中国社会居主导地位，“从两汉以来，儒家教化已深入人心，其影响周遍各阶层”(第 46 页)。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道佛两教的繁荣，使“佛道两教兴盛时亦未能形成独立之政治力量”(第 45 页)。这一特点归根到底有赖于这一事实：“古代世界各大民族唯有中国不以征服异族开国。”(第 49 页)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倘若是以征服开国，统治者就不得不“软硬兼施”，以武士阶级统治人身，以僧侣阶级控制人心，故“在古代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每由武士与僧侣实施双重统治”(第 47 页)，肉体与心灵分而治之。宗教之发达，实乃统治之需要。许先生比较了两河文明与黄河文明之不同，认为前者在历史上无不以征服为立国前提，其结果总是“凡外族入侵，征服者队伍中祭司(僧侣)与武士并尊”，而“被征服者之生命财产悬于武士之手，而其思想、信仰、言论之自由则每为外来之僧侣阶级所剥夺”(第 47 页)。职是之故，“近东宗教最盛，僧权亦最发达”(第 47 页)。近东地区历史上之所以偏好征服，是由其严苛的生存环境决定的。“近东地狭人稠，数十种族挤于一隅，知识技能得互相传授承袭，故进于文明也速，然而战祸惨烈，屠杀奴役习以为常。”(第 48 页)与之不同，“黄河流域则沃野无际，种族之差别不大，人口不多(春秋中期犹如此)，未尝见不同族间有纯赖征服以建国者。故我国古代文化面貌，与近东诸民族迥然不同”(第 48 页)。与近东相比，古代中国生存机会优越得多，并不表现为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从而不需要通过武力征服以扩大疆域。在这一境遇下，中国的宗教不仅在其早期即已式微(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而且它们也不像在近东或西方那样担当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中国自古就有士人政治传统，“士大夫深于儒学，则能于自诚中求自得，于自主中求自由，于历史文化之大流中求不朽，于宗教家言则扞格不相投”。“故宗教势力在士人政治之下极难发展，建立僧权实不可能。”(第 46 页)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和平的民族，它的大一统在历史上的形成，惟赖“和平同化”，而非“武力经营”(第 49 页)。

许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但无僧侣阶级，且从未有武士阶级。”(第 50 页)这两个事实“颇足助长我先民爱和平、反对侵略之传统，然而不能视作主因”(第 50 页)。为此，许先生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社会基础。他认为，“民本思想在我国渊源甚古，以远在春秋以前”(第 50 页)。原因在于“我先民不以征服立国，故国君与庶民之关系不同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而近于家长与家人”(第 50 页)。敬民而不敬神，这是民本思想之原。“盖不以征服立国与宗教势力不发达皆足以促成民为邦本一信念之流行”(第 51 页)。中国社会既无专制传统，亦无宗教传统，而是走的道德教化之路径。所以“东方古国几无不专制，唯中国例外。东方古国僧权俱发达，亦唯中国为例外”(第 51 页)。同西方相比，中国社会组织呈现出特殊性。中国社会在总体上不如西方那样具有内在的张力，相反，缺乏内部的分化和紧张。“西方社会则以分权为常，集权为变”(第 51 页)。“而在中国则贵族僧众损耗不大，民

本思想植根甚深，抑兼并，均贫富，历代士大夫有倡导者，君德基于恭俭。……故二千余年来中国社会比之西方，较为平等，事实俱在，不容置疑。"(第54页)例如"两汉以来之中国以士农为骨干，……耕读传家，习以为常"(第52页)。"在大一统士大夫秉政之国家，商人势力必受摧抑。"(第52页)重农抑商的国策，既是德治仁政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可靠保障。

许思园先生并没有满足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社会根源的揭示，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发生学基础的刻画。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不过是人类应付环境的一种对策，是人同他所处的特定环境之间博弈的一种应对方案，由此决定了环境(自然环境是其原初形式)在发生学意义上对于文化性格之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点，许先生写道："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文化之兴起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第54页)具体地说，这种影响的历史文化后果是"我先民僻居远来，文化上孤立，知识技能甚迟缓，而德慧之累积则甚宏富，在远古已知滔事鬼神之徒无益，而能发展理性，就人之德慧树立政治教化之基础"(第51页)。因为"黄河流域与埃及、巴比伦、犹太、希腊远隔两万里，我先民文化上孤立，悉赖自创，知识技能演进迟缓而德慧之熏发则极早。故我国上古典籍已充溢深湛之人生智慧，不屑记载怪力乱神"(第54页)。

中国文化在总体上是一种诗意化的文化。作为诗化文化，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奥秘，不能不深藏于它的艺术创造之中。在此意义上，许思园先生的诗论无疑也构成他对中国文化省思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

许先生指出："中国诗之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为空灵、蕴藉、清逸、淡远之风格意境，以陶(渊明)、韦(应物)、王(维)、孟(浩然)、晏(殊)、欧(阳修)诸家所造最高；一为人间忧患、族类同情之呼声，于杜少陵诗最为宏大。"(第96页)"大凡高隐之士既屏迹山林，便只求清静，自云于人间兴替不复措意。"(第79页)陶、韦、王、孟、晏、欧诸家，当首推渊明。"中国诗人中深厚、高玄、神仪、妩媚洵无有出渊明之右者。"(第82页)此一路数，构成中国艺术之主流，并波及其他各种艺术创造形式。"空灵、蕴藉、清逸、淡远之风格不仅为中国诗之特殊成就，且形成中国之艺术。心灵表现于绘画、音乐、书法，而宁静、洒脱、光风、霁月之人格、风度亦复同此源流。"(第85页)

许先生认为，李白的作品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一个异数。李白诗的异质性表现，在它类似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在李白诗中，"浮士德精神非常鲜明而强烈，在中国诗坛无第二人，谓为'独步千载'实至当"(第106页)。由此判定，"一言蔽之，李太白诗之根本精神乃西方精神，即所谓浮士德精神"。这就使"太白内心之祈向不同于儒家，不同于道家，不同于佛家，但此祈向不但特鲜明而炽热"(第105页)。把"太初有道"诠解为"太初有为"，乃是浮士德精神的要枢所在。因此，生命力的自我张扬，实为这种所谓浮士德精神之实质。李白诗风看似近乎道家，实则不然。"我国先哲心目中实最为近道，然此种意境与所谓浮士德精神乃如冰炭之不相容。太白诗篇所以能辘轳古今，惊动无数人之心魂而百代常新，即由于其表达出与中国人心灵十分悬绝之浮士德精神。"(第106页)究其原因，除了大唐盛世的时代气象使然之外，许先生还暗示了李白诗之特异性的异域来源。

在许先生看来，"中国诗鲜世外之音，此诚极大弱点"(第94页)。因为"中国古人过于偏重现实世界，值衰乱时诗人不免萌生'行乐须及时'、'不如饮美酒'一类感慨，虽出于愤激者多，然此类颓废思想在西方诗中实罕见"(第94页)。因此，"欲复兴中国诗，必先开拓理想境界，超脱凡近，虚心向希腊、西欧求益，而诗歌固有之风格亦有待于重新发扬"(第95页)。中国诗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

关于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许思园先生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反求诸己之人生智慧；二是民为邦本之政治传统；三是空灵淡雅之艺术境界(第65页)。许先生对中国文化虽然持同情与敬意的了解之态度，但丝毫未曾妨碍他冷静地对中国文化的局限性加以客观的评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缺陷主要在于：第一，"纯知识活动之独立价值在中国迄未被肯定"(第56页)。中国文化因此"不重视纯知识活动，未能领略好奇、耽思、探索、创造之乐，因而于剖析论理、探讨客观世界之形体结构与万汇变化之规律方面成就远不及西方人"(第63页)。第二，"两千年来中国哲人大都着重心之静态，儒家

主张克制，道家倡自损，西哲则着重其动态，主张发挥智能，不断奋进于美、善、发明"(第 59 页)。中国人的感情不走极端，而是讲究"发乎情而止乎礼仪"，因而"内心激动之振幅不大，少深哀极乐，悲情劲气俱不足"(第 63 页)。中国人强调内心和谐而缺乏紧张和张力关系，其负面作用在于"中国文学往往不能激动人心最深处而奏净化振奋之效，此为一大缺陷无可讳言"(第 61 页)。"往时民性不易激动，能极度宁静，传统压力甚大，故明清以来文化偏静，不免停滞。"(第 55 页)第三，"中国社会重家族，独缺少个性自觉，孤往独到之精神不获发扬，从未有以全民政治为理想者"(第 64 页)。

许先生强调中国文化在同西方文化乃至印度文化的比较中所显示出来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优长之处，同时也表现为缺憾和不足。所以，他认为应该以开放的胸怀寻求外来文化的借鉴和补充。"今后复兴国族，重振学艺，除恢复艺术心灵、发扬民本传统与反求诸己之人生观外，最切要者莫过于培养好奇、爱智之热忱，拓展理想境界，激发悲情及与民同患之感，尊重个性，树立共和精神。此皆西方之所长而我之所短。"(第 75 页)他进一步认为，"西方文化重开拓，中国文化重融和。然融和必须于不断开拓中求之"(第 75 页)。许先生以其全球化视野，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作了预期："中国文化之孤立时期已属过去。将来如何能成为世界文化之一部分，而同时保持其独立性，不仅为我国文化史上最大之课题，且为我民族兴衰之关键焉。"(第 75 页)

## 二、许思园先生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其启示

许思园先生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是一位寂寞的学者。这种寂寞是时代对他的埋没，也是他自身的深沉和孤独所致。但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寂寞反而成就了许思园的思想与洞识之深邃。从这个角度讲，这无疑又是一件幸事。应该承认，他的学术思想的真实价值远远大于他的实际学术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许思园先生是一位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遗忘和埋没的学者。所以，挖掘他的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价值，就显得尤其必要。

许思园先生的文化比较研究所体现的方法，有其独到之处。我们从中获得的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许先生注重细节却没有迷失于细节，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总是充满洞见，从而体现出一种大器，一种宏大而深邃的眼界。除此之外，归结起来，大致主要有以下几点对于今天的同类研究有启示价值：

首先，许思园先生研究中西文化各自特质及其比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体认式的而非旁观式的姿态。

从许先生所进行的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才可以真确地领会什么叫做"体认"。这才是思想家运思的本真态度。"体认"与"会通"，此乃真正无隔之状态，是独自体贴出来的。它是文化的亲在方式，是对文化持生命态度所内在地要求的。许先生的洞见皆为独自体贴出来的东西，是真正反刍并"消化"了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体认的方式，既是"同情与敬意的了解"之条件，亦是这种了解的结果。对西方和西学的深切理解与把握，反而增进了对本土文化的尊重。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化比较不是消极地拿两个已完成之物加以外在地对比，而是对话，是意义的建构和生成本身。这才是"会通"的真实含义。文化比较的过程本身就是当下建构性的，而非事后观照性的。这是一种积极的比较观和比较方法论原则。这无疑对比较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许先生恰恰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难能可贵的是，许思园先生对于"自然科学"有一种亲在式的把握，这对于体认西方文化的真谛无疑是一种特别的优势。因为研究西方文化，并对中西文化比较的中国本土学者面临一个特殊的困难，就是旁观者式观察西方文化，这样得到的结果固然有其客观性的优点，但致命的问题在于文化的隔膜往往妨碍了身临其境般的了解，从而难以登堂入室，往往局限于皮毛，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得到的结论，不可能真确而深入。即使到西方留学多年的学者，倘若不能"进入"科学，仍然会"隔着一层"。由于懂得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作为文化现象予以了解，就有了一种文化上的关切，一方面比纯粹的

自然科学家多了一层用心，即反省的态度和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比纯粹的人文学者多了一层特长，即可以从自然科学角度观照文化问题和现象。这种优势使他能够左右逢源，同时超越两方面学者在视野和知识准备上的不足，从而避免那种“禅外说禅”式的隔膜。

其次，许思园先生立足于本位文化传统，西方文化说到底不过是他的自我认知的参照和自我弥补的资源，这种中国情结其实是中国学者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

在许先生的比较研究中，中国文化始终构成他的出发点和归宿。文化上的“他者”的存在，无疑是文化的自我理解的一面“镜子”，因为任何自我意识的发生都离不开中介环节。许先生在体认中国文化和哲学时，同样离不开一个西方的参照。所不同者，在于他所说的实乃知己知彼者言，而绝非那种道听途说之辈的虚妄之言。晚清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的相遇，给中国文化的自我发现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带来风险，即文化自我的客体化命运。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自我发现的过程中避免自我丢失？我们知道，对于一种文化的任何观察都是有先在的背景和非中立的期待视野的；文化的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不可能摆脱自己所属的那个文化传统的干扰，因为它恰恰构成这种观察之所以可能的先在的文化负荷。这就使得文化比较面临着一个吊诡：文化“偏见”既是文化认知的条件，同时又是文化认知的障碍。就像在女性主义研究中，性别意识的觉醒不得不通过有性别的人的观察一样。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研究者总是有性别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无法摆脱各自性别视角所带来的偏见的干扰。没有一种中性的视角供人们选择。所以，如何克服特定性别形成的偏见，是达成女性解放问题之共识的关键所在。类似的尴尬其实同样出现在文化的比较研究当中。

许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比较性的研究，其中始终隐含着一个西方的参照系，这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自我体认的一个必要的参照系。但是，同一般的比较研究不同，许先生并未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及同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等地位。因此，他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实有其特殊背景，决不能强纳于西方格式之中而求齐划一，此则不可不知者。”（第55页）在展望中国文化的未来可能性和命运时，许先生亦坚决拒绝文化虚无主义态度，坚持本土文化的自我复兴之取向，例如他说：“文物制度之创新，必本于传统，无从凭空突起。”（第55页）尽管必须正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弱点和局限，但许先生仍然坚信“中国民族之潜力却不可限量，虽为数千年之古老民族而体格未衰，神经尤坚韧”（第55页）。这无不充分显示出许思园先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深邃文化眼光。

许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未来的出路，就内部言仅在重兴先儒之道统。他写道：“故中国哲学之进展，除取资于西方与印度外，当赓续发扬先秦儒家主张刚健、创进、自诚、自得、自主、自由之思想传统。此乃无可置疑者。”（第23页）这种内生性的拯救之道，是一种本体论式的解决，即向出发点的复归，而非那种外科手术式的知识论处理。这种对待本土文化的态度，无疑是生命的态度。它对于中国文化的自我拯救，是具有前提意义的。

再次，许思园先生的文化研究，一个可贵之处在于能够摆脱晚清以来文化反思的情绪化弊端，超越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两种极端化的情结，达到一种平和而同情的了解。

综观许先生的文化比较研究，不难体会其中的意蕴：在平和客观中不乏温情与敬意，在体认与亲在中不缺冷静与中立。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说，这对于我们在今天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再反思，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冷静的判断和客观的贞定，是许思园先生文化反思的一大特点，亦是其优点。

晚清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命运，使得国人对于本土文化总是缺乏必要的冷静和清醒的态度，无论是描述，还是解释，抑或是评价，都往往容易流于感情用事。主张保存国粹者自不待言，鼓吹全盘西化者同样难得公允。这种情绪化的干扰遮蔽了文化研究的本真结论，使我们的研究长期以来未得要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前进了多少，值得怀疑。诚如周辅成先生在为许先生《中西文化回眸》所作“序”中评论的那样：“许先生推崇中国文化，欣赏中国文化，但

并未夸大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长处，但不是没有短处。他讲中国文化的短处或缺陷，也是非常深刻的。”（第 7 页）许先生的本土文化情结与国际文化视野的融合与会通，体现了一种张力。如何在这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无疑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比较研究者的考验。

当然，毋庸讳言，许思园先生的文化比较研究也有某些可进一步斟酌处。我们应该像许先生并不讳言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之局限一样，客观地看待许先生文化比较研究本身存在的可商榷之处。这种正视也许是对许先生的真正尊重。首先，按照许先生的解释，中国哲学之所以缺少玄思，是与思想家未解决生活困难有关。“中国哲学之创始者似皆为士人出身，家鲜恒产，学以干禄，原其恒情。……中国先哲之道术重在用世，不重玄思，其故或基于此。”（第 7 页）这的确应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出智慧”的说法。然而，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在庶民那里，无恒产便无恒心；但在士人那里则不然，他能够做到“无恒产”却“有恒心”。诚然，这个恒心亦非玄思之心，而是尽心知性罢了。它导致的依然是反身性的道德人格的成就，而非对外部世界的探究。诚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里其实同样显示出中西哲学之差异。其次，东西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长补短？有些性质是互斥和互盲的关系，不能成为互补的关系，若一味地强调它们的相互弥补，就不能不给人以一厢情愿之感。再次，对于道家的评价过于负面，其实儒道互补恰恰成为中国文化的结构特征，正因此才使中国文化有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也是文化的动力。最后，对中国诗之总体特征的刻画亦似乎有某种不相侔处，如一方面强调中国诗的人间性和社会性特征之强烈（参见第 92 页），强调“中国诗鲜世外之音”（第 94 页），另一方面又说中国诗风格之高在于“屏迹山林”、“只求清净”，而“于人间兴替不复措意”（第 79 页）。事实上，出世与入世不可能同时成为中国诗的总体特征。尽管存在着些许可商榷之处，但是这些本身也都构成进一步“接着讲”的契机。就此而言，它仍然是建设性的。它绝不足以遮蔽许先生文化比较研究的成就之光辉于万一。

[责任编辑　刘京希]

# 黄嘉德先生与萧伯纳研究

李乃坤

**摘 要**:黄嘉德先生是著名翻译家和萧伯纳研究专家。早年与林语堂先生一起创办"西风社",任主编。他的译作代表应是《萧伯纳传》、《二十世纪欧洲史》等,翻译风格是形神并重,形与神合;他对萧伯纳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集大成著作是他的《萧伯纳研究》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研究萧伯纳的学术著作,以其背景的宏阔,史料的扎实,评论的精到著称于世。他治学的严谨、为人的谦和、处事的超然境界,同样为后辈所景慕。

**关键词**:黄嘉德;萧伯纳研究

黄嘉德(1908－1992),福建晋江人。1931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47－1948 年留学美国,获文学硕士学位;1949 年回国后,仍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自 1936 年开始,他与林语堂先生一起创办"西风社",任主编,编辑出版《西风月刊》和《西风精华》杂志。1952 年,黄先生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曾任英美文学教研室主任,外文系代理主任,1992 年在济南逝世。黄先生在山东大学四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不少人早已成了著名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术上黄先生硕果累累,是全国著名的萧伯纳研究专家。他对山大外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尤其对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至今。

## 一

迁校来济南后的山东大学 1959 年开始招生,笔者就是 59 级外文系英语专业的学生。当时的山大本科学制五年。我们四、五年级的"英语精读"课由黄嘉德教授担任。大家感到很荣幸,因为早有所闻,黄先生是国家三级教授,颇有声望。果然名不虚传,黄先生一上课便展现了名教授的风范。

课堂上黄先生全部用英语讲授,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思之所至,言达意明,内容充实,条理井然。我们听啊、记啊、讨论、回答,不觉一会儿便到了下课的时候。黄先生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法,语法领先。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对成年人教学,有利于发挥理解记忆力。我们班多数同学年龄偏大,很适应这种方法,教学效果很好。当时用的教材是徐燕谋的《英语》,课文都是英美原著的节选。对复杂难懂的长句子,黄先生一般从分析其语法结构入手,例如:This is a compound complex sentence. The main clause is ..., the subordinate clause is ...(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主句是……,从句是……);主语,谓语,宾语,状语……把句子有的成分都分析到。懂得了句中各成分间的语法关系,也就理解了整个句子,学生便记住了这个句子。所以接着大都能背讲或默写下来。到毕业时,我们都学会了黄先生的这种方法,分配到大学当教师的人多数能熟练地运用之。

黄先生在教学上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严守上课时间,上课时总是提前到教室等学生,风雨无阻,年年如此。黄先生严格守时的习惯是一种美德,对我们学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黄先

**作者简介**:李乃坤,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生课堂教学严肃负责，自有风格。他从不开玩笑，不讲多余的话，总是板板正正地讲解应该讲的东西。这是黄先生课堂教学一贯的指导思想。对有错误或成绩较差的学生，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教育和帮助。我们班有个同学，生活比较拖拉、懒散。一天他上课迟到了，但黄先生没有批评他。课后，那同学却说：黄先生不批评却是最严厉的批评。身教胜于言教。显然，这位同学非常自责，直到毕业再没迟到过。

对成绩一时较差的学生，黄先生的做法是：耐心帮助，严格要求，逐步提高。他讲课的难易取决于班上占多数的中等程度的学生，优等者可外加学习材料，后进生可开“小灶”，即课外多加辅导。黄先生辅导，不厌其烦，循循善诱。但评定成绩却严格标准，决不拔苗助长。黄先生划成绩有理有据，毕业时，同学们成绩普遍提高，没有不及格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黄先生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带研究生很有特点：教学紧密结合科研，两者相辅相成。他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带入课堂，课讲得深刻而精彩。课堂上，他一般不用看讲稿，东西都在脑子里，必要时用中文词搭个桥，语言转换自如，学生听得明白、痛快、入神。学生议论说，把黄先生讲课内容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篇篇完好的学术论文。

山大的硕士生学制三年，前一年半上课，而后是撰写学位论文。黄先生指导学生写论文，给我们树立了样板。在选题上，他思想很明确：学生要选自己感兴趣的、熟悉的课题去写，不要勉强自己去迎合老师的趣味。他的学生认为，导师是萧伯纳专家，写有关萧伯纳的论文会大有益处。黄先生反对这样做。他强调，研究生应正确理解“研究”二字，从论文选题开始，就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选题、收集资料、列写提纲、写出初稿、定稿，整个过程，老师只能指导，完成则是学生的事。

黄先生在教学上的贡献，还在于他及时开设、讲授文学课程方面。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和张健教授一起先后开设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读”课，为后来英语专业深化和拓展课程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二

黄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斐然。这主要表现在翻译、论文和专著三个方面。

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从事译介西方文化了，曾出版了《萧伯纳传》、《公民教育》、《新女性》、《流浪者自传》、《翻译论集》等十几部译著。1981 年黄先生出版了新的译作《乌有乡消息》。1984 年长篇译著《二十世纪欧洲史》问世，该书获得山东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此书为黄先生主译，外文系英语教师集体参译，封面上仅书“黄嘉德（翻译家）校”。就在翻译此书的长达一年的过程中，我们才真实地理解了黄教授的翻译原则、方法和风格。他奉行传统的严复倡导的“信、达、雅”翻译原则。关于“形似”、“神似”问题，他主张形神并重，形与神合。这是他在翻译中持之以恒的风格。

虽是知名的翻译家，黄先生平时却很少跟人谈论翻译之事，更见不到他指手画脚地教训译学新手。倒是这次翻译《二十世纪欧洲史》时，我们才有幸不时听到黄先生关于翻译这门学问的教诲。在动手翻译之前，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这是人民出版社交给我们的任务，尽管是一份义务性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保证质量按时完成；总的原则是要做到信、达、雅，艺术地再现原作。黄先生的话，对我们译好这本大部头的作品起到了动员、鞭策和保证作用。大家译得异常认真，一丝不苟。记得有一次，为确定介词短语“on the river”的译文，“在河上”还是“在河里”，大家联系上下文意思，讨论了很长时间。

通过翻译这本书，我们向黄先生学到许多东西，也深深感到他对青年教师的爱护、帮助、培养、鼓励和期望。他对我们的译稿也比较满意，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总结这次翻译时，结合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对英译汉归纳出五条要领：“熟悉运用汉语的能力；真正理解英语原文的涵义；把汉英两种语言

进行对比，用汉语的词法和句法正确、通顺地表达英语原文的涵义；懂得所译的专业；具有专业以外的广博知识。”[①]我们都很赞成这些原则，在自己后来的翻译实践中一直贯彻执行。

英译汉，译介外国文化，黄先生早在他青年时期就开始了。他做译介的目的很明确，即“洋为中用”，对西方文化“扬长避短”，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为高超，更为完美”（见黄嘉德《翻译论集》编者序，上海：西风社，1941年）。提到译者的条件，他当时的观点和现在的理论是一致的，那时他强调说：译者要“能够理解，并能够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要有冷静的头脑，苦干的毅力，忠实的态度，负责的心机”（《翻译论集》编者序）。黄先生是翻译工作者的榜样，他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翻译作得完好，一是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二是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以论文的形式广泛评论欧美文学名家，是黄先生研究外国文学的主要方式之一。他的几十篇颇有见地的评论文章，为他赢得了声誉，读者称他为欧美文学评论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连续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主要有：《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法国启蒙运动奠基人孟德斯鸠》、《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席勒的创作道路》、《德国民主诗人海涅》、《司汤达和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吉诃德先生传〉简论》等。这些论文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大开眼界，有读者说，他们带着极大的兴趣读了这些评论，是这些论文及其所涉作品带他们走上了外国文学研究之路。

综观黄先生关于外国文学的论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特征：(1)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南，以原著文本为依据；(2)客观地评价作家和作品，赞扬优点恰到是处，批评缺陷亦不惜言辞；(3)洋为中用，适当选择研究对象；(4)论文题目本身往往表明作者的立论、思想倾向或审美观点；(5)论文表达思想确切、明了，毫无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之嫌。

在广泛研究欧美名家的基础上，黄先生选择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进行重点研究。他对萧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诸多研究者中是起步较早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为显著的，因而获得著名萧伯纳研究专家之称。

作为黄先生的弟子，笔者曾问过他为何选定萧伯纳作为长期研究对象。黄先生说得很坦诚：洋为中用，萧伯纳很值得评介。他是当代世界文坛极有影响的作家，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家，而现实主义是所有文学流派中生命力最强、最贴近生活的；萧的特质又是极能敏锐地观察现实，诚实、直率地表现人生与社会；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听了黄先生的解释，我深感他选定研究目标所持的严肃态度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几位研究英美文学的同事，在决定主要研究对象时，都借鉴了黄先生的高见。

黄先生研究萧伯纳，其成就集中体现于他的专著《萧伯纳研究》一书。这部著作是黄先生长期研究的结晶，是他学术思想和研究风格的集成，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比较完整地评述萧伯纳的学术著作。

这部专著很有特色。第一，它的论述全面、系统、完整，而又重点突出。详尽考察萧伯纳的生平与创作，以分析萧的优秀代表作品为主导。广泛讨论萧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戏剧理论、剧本、散文作品，并带有大事年谱和附录。研究的重点有二：一是阐明萧伯纳的戏剧理论，二是深入评析萧的代表作品。关于萧伯纳的戏剧理论，黄先生用五章的篇幅展开论述，最后结论为三大要点：(1)提倡并创作现实主义新戏剧；(2)认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同时强调人物对话和理论的重要性；(3)坚持戏剧是宣传的工具，反对“为艺术而艺术”[②]。

第二，评论萧伯纳，纵横欧洲剧坛。书中论及近20位欧洲戏剧家。首先纵串英国戏剧史，引进从莎士比亚到奥斯本几乎所有英国戏剧名家，让读者看到萧伯纳在戏剧艺术上继承、发展、创造和影响的全过程，看到萧如何把英国戏剧革新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萧伯纳研究》中，有关萧伯纳与莎士

① 巴金等著、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50页。

② 黄嘉德：《萧伯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比亚的关系的论述，是备受读者关注的问题。黄先生结论说，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主要受四个方面的影响：(1)不是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看待莎士比亚；(2)认为莎士比亚对人生和人类社会没有一贯的、正确的哲学观点；(3)从其费边主义思想出发，认为莎士比亚不是一位社会改革家；(4)以易卜生的标准去判断莎士比亚的思想和戏剧。黄先生还说，萧伯纳对莎翁的评说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但观察深刻，有独创性和启发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英国文坛这两位最伟大的戏剧家①。

第三，作者观点明确，论述有力。黄先生用自成一家的朴素语言和平铺直叙的方式，把思想讲得清清楚楚。开卷第一页，醒目的标题就明白地表示着作者的思想观点，如“政治狂想剧《苹果车》”、“军火商与救世军《巴巴拉少校》”等等。书中对萧伯纳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刻探讨，赞扬他的“社会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在戏剧上的具体表现”②，批评萧的“生命力”理论是企图在生物学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③。

全书渗透着一种观点，那就是对萧伯纳批判现实主义的认识。作者指出：萧伯纳戏剧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罪恶，同情苦难的劳动群众，但拿不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其主要原因是萧伯纳受了费边主义改良思想的影响；他毕竟卷入了这种代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这正是萧伯纳的局限性。大概西方人士说萧伯纳“和蔼地厌恶资本主义社会”，原因就在这里。

近来，笔者重读了《萧伯纳研究》和《萧伯纳传》，越发感到黄先生毕生研究萧伯纳的价值。萧伯纳作为作家，不仅文学成就惊人，而且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人格的魅力也有许多令人钦佩之处。在他九十四岁高龄时，病逝前一个月他还在写剧本。他逝世的当天晚上，全世界剧院停止营业，舞台灯光熄灭，以示哀悼。这表明他的声望和伟大，人们对他的热爱和敬仰。他的遗产 367000 英磅全部捐赠公益事业。萧伯纳一生关心人类前途，渴望社会和平。他七十五岁时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晤，在对苏联人民致辞中说：“如果列宁的实验获得成功，这个实验将是人类新时代的开始。”④1933 年，萧伯纳七十七岁环球旅行时来到中国，宋庆龄、鲁迅等接见了他。鲁迅先生曾称赞他“有说真话的勇气”，“有撕掉绅士们假面的勇气”。路过香港，萧伯纳发表一篇“告中国人民书”，讲道：“中国人民如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⑤每读一遍黄先生的《萧伯纳研究》，就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来自萧伯纳的这种伟大力量以及黄先生尽其毕生之力研究萧伯纳的价值。

## 三

在做人方面，黄先生也是我们的楷模。他的《萧伯纳情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后来有人“加工”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因市场缘由更名为《萧伯纳情书 100 例》，仍署名“黄嘉德译”。有个读者感到书名与内容不符，在《博览群书》上撰文“由一本书说起”，予以批评，并影印一份寄给黄先生。黄先生很快作复，对批评表示欢迎。该读者非常感动，后来发文说：

“不久黄先生寄赠我一本山东大学出版的《萧伯纳情书》，书上有先生客气的签名。对我的冒昧的批评，他不以为忤，除细致解释外，还题赠书以为纪念，使得我们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这样开通的胸怀，是值得我长久学习和记忆的。”⑥说到黄先生的谦虚和蔼，题名赠书，笔者更有实感，他送给笔者的几本书上，都有他老人家工笔正体的签名。笔者每每看到他的名字，就好像看到他的身影，无限的怀念和敬仰便涌上心头。

1970 年山大文科各系与曲阜师院合并，称山东大学。年过六旬的黄先生也随着山大人去了曲

① 黄嘉德：《萧伯纳研究》，第 206 - 208 页。
② 黄嘉德：《萧伯纳研究》，第 229 页。
③ 黄嘉德：《萧伯纳研究》，第 84 页。
④ 黄嘉德：《萧伯纳研究》，第 183 页。
⑤ 黄嘉德：《萧伯纳研究》，第 185 页。
⑥ 杨建民：《批评引来签名本》，《中华读书报》2001 年 12 月 5 日。

阜。在教材组一次讨论会上，青年教师小杨宣读所写的教材，里面用了“ok”一词。黄先生说：正规教材使用这词要慎重。小杨提到英国某家教材已用了这词，黄先生立刻表示说：“那我们也可以用。”教材组同志都诚服地感到，黄先生是语言文字的权威，但他对书面文字严肃谨慎的原则，对晚辈谦虚平等的态度，对问题实事求是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黄先生去世后，根据他的嘱托，夫人罗道爱女士将全部510本图书赠给山大外文系资料室。黄先生这宗遗产是极为宝贵的文化财富，其中大部分藏书是山大所没有的，是外语教学和研究极为难得的资料。

谈到黄先生的为人处世，许多同事有个共识，说他“与世无争”。笔者理解，这一评价有几层意思。首先，不是说黄先生不问是非，一味地老好人。他政治态度很明确，热爱祖国，心向和平正义，拥护社会主义理想。1948年，当不少知识分子争相外走之际，他却毅然从美国回来迎接祖国的解放。1984年他同夫人赴香港探亲，有人猜想，十年动乱，他受了委屈，这一走不会回来了，当时外文系已有此类先例。然而，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他同其他教师一样，按时出现在课堂上。黄先生有不少社会兼职，他都能尽职尽责。他的一生表现了一位热爱祖国、献身教育事业、长期与党合作共事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崇高品格。其次，说他“与世无争”，是赞扬他珍惜荣誉但不争名逐利。他教授三级停步30年，从未为此争找。他在外文系教授级别最高，学术水平最高，但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申报博士点，他没争做学科带头人。后来有人不无惋惜地说：“若报黄先生为学科带头人，或许博士授权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能批下来，用不着排队挨号到21世纪了。”第三，“与世无争”意为，他执教六十余年，一生做学问，潜心求真知，孜孜不倦，春蚕到老。第四，在人际关系上，黄先生不善交际，但有修养，有哲学；与人没什么恩怨纠葛，总是严以律已，宽以待人，行善事，不管闲事，似有一种宗教的虔诚；交友不少，但都是君子之交，情感和行为上自然与酒桌饭局之类格格不入。最后，他的“与世无争”有自己的操守，生活有规律，注重生活质量，小康温馨，保护自已，无损他人。显然，黄先生的“与世无争”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生存哲学。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赞赏黄先生这种品格，而且不知不觉地在效仿，如果真能做到的话，那该是多么清心愉悦的境界啊！

黄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早年就在大学里讲过《史记》和《汉书》，古文功底极其深厚；黄先生是专家，国内著名的萧伯纳研究专家。无疑，黄先生是山东大学的骄傲。笔者知道，要全面书写黄教授的卓越贡献，非个人所能及，在这里只是叙点旧事，以纪念敬爱的黄先生。

[责任编辑　贺立华]

# 中国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吴富恒先生

郭 继 德

**摘 要**:山东大学已故老校长吴富恒先生,出身教育世家,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是最早在中国高校开展美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他在山东大学首创了美国文学研究的机构、团体、研究所、资料室、学术期刊,培养了一大批美国文学研究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同时以山大为基地,他团结了国内外众多著名的美国文学专家,创建组织了全国的美国文学研究会。教育部有关专家评价山大外文学科说:"山东大学的美国文学研究在国内高校中有明显的优势。"吴富恒早年留学美国的母校哈佛大学在她的学子吴富恒毕业四十年后又将他请回美国,在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的证词中这样说:"在危险的年代里,这个爱国教育家(吴富恒)坚持标榜教育和学术,把它作为建设一个极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基础。"也许,这正是对吴富恒先生最中肯的评价。

**关键词**:吴富恒;山东大学;哈佛;美国文学

山东大学已故老校长吴富恒先生(1911－2001)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是国内外闻名遐迩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是我国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为推动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卓尔不群的贡献,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德莱克·勃布(Derek Bob,1930－)在 1982 年哈佛大学 346 周年校庆讲话中提到的:"1978 年以来,中国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为复兴'文革'后的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吴一直促进和国外大学教育交流,特别是和美国文学文化界学者的交流。"他还借一位学者之口说,吴富恒是"一位德高望重,在中国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的人"。

## 一、成功之路

吴富恒先生于 1911 年 3 月 18 日出生于河北省滦县一个书香门第、教育世家。他的祖父吴会隆是清末副贡,父亲吴凤苞是廪生秀才。他们没有地产,世代以教书为生。吴富恒从小受到父辈的影响,受到儒家教义的薰沐。他自幼熟读诗书,热爱中国古典哲学,深受孙中山的"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等思想影响,使他从童年时代起,心中就有了朦胧的国家忧患意识和爱国求新的思想。1919 年,他只有 8 岁,就在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中,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的口号。

吴富恒 6 岁时,祖父逝世,父亲病魔缠身,家庭经济拮据,他在逆境中进入了洋学堂,开始了学习生活。他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秀,得到了舅父的器重和经济资助,考入了天津扶教中学,初中毕业后,又到北京读高中。北京是文化古都,也是一个充满新思想的天地,使这位从小县城来的少年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接受了新思想,涉猎了新时代的文学作品,熟识了鲁迅、茅盾、冰心、郭沫若、成仿吾等一大批"五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使他的思想不断地得到升华。

吴富恒先生深受家庭传统影响,感到教育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立志继承父业,走教育救国之路,于 1929 年毅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他在两年预科和四年本科的学习过程中,不仅阅读了乔

**作者简介**:郭继德,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叟、莎士比亚等所撰的西方名著，也阅读了《铁流》等有"革命"思想的作品，使他的学术思想得到了丰富。他于1935年毕业留校，在师大附中任英语教师，使他多年的愿望得到实现，也从此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吴富恒潜心于英语教学工作，并进行学术探讨，参加了英语教学组织"正字学会"活动，有幸结识了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瑞恰慈(I. A. Richards，1893－1979)教授，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北京被日本占领后，吴富恒先生经天津到达了昆明，跟几位教授共同创建了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兼任英语教师。1940年夏天，吴富恒受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瑞恰慈教授的推荐，获得了美国"洛式基金会"奖学金。他漂洋过海，负笈远游，抵达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活。他在教育学院注册，导师瑞恰慈教授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代表作《文学批评原理》(*The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5)和《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等在英美文学界颇有影响，他对吴富恒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熏陶是不言而喻的。

1941年下半年，吴富恒先生获得了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正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之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富恒的心始终和祖国相连，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继续读博士的机会，决定回国。1942年他乘外轮辗转印尼、缅甸等国回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创办了英文系，任系主任，讲授英国文学和文艺批评等课程。吴富恒与楚图南、吴晗等进步人士过从甚密，跟昆明高校19位教授联名写信，要求国民党顺从民意，真诚跟共产党联合抗日。1946年4月，他经吴晗和周新民介绍，加入了民盟，积极参加反蒋进步活动，对国民党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的罪行极端愤慨。因此他也遭受了国民党专制政府对其逮捕杀害的恐吓威胁。

1947年1月，吴富恒先生离开了昆明，到达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工委书记的华岗介绍他到山东解放区工作。他于当年3月搭乘联合国救济总署运货船到达了烟台解放区，在外事办工作，担任英文报纸《芝罘新闻》副总编。在此期间，吴富恒跟陆凡女士喜结良缘，成为终身伴侣。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吴富恒夫妇随"外事办"转移到乳山县一个海边小村，穿农民衣，吃农家饭，干庄稼活，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崭新的人生历程。

1948年9月，吴富恒跟随李澄之先生来到济南，成为济南军管会文教组成员，任高教组副组长，随后到华东大学工作，任文学院教授、文艺系和文学系主任，兼任校文工团团长。1950年冬，华大迁往青岛，并入山东大学。吴富恒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给中文系学生讲文艺学，给外文系学生讲英国文学名著选读。1952年后，吴富恒任山东大学教务长。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经受了考验，于1955年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8年，山东大学迁至济南，翌年，吴富恒担任了副校长，协助成仿吾校长在完善山东大学的教学科研体制方面做了大量具体有效的工作，使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科重建了政治系，恢复了1957年被停办的外文系，创办了美国文学研究室和俄苏文学研究室；理科建立了晶体、磁学、计算机等多门新学科，使文理学科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吴富恒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但他依然矢志不渝，忠诚于教育事业，在"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报效国家的历史机遇。1977年8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翌年3月又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6月，吴富恒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校党委副书记，这为他提供了一个全面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使遭受"文革"严重摧残的山东大学有了全面复苏的新契机。学校规模在不断扩大，有16个系，38个专业，学生人数已近万人。教师队伍在扩大，科研机构在增加。吴富恒校长兼任文史哲研究所所长和《文史哲》杂志编委会主任，使山东大学在学术界的威望与日俱增。

吴富恒先生任校长期间，特别重视中外校级学术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多次率团出国考察西方大学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也邀请了不同国家的多个高校代表团访问山大，跟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印第安那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里贾纳大学、山口大学等多所国外大学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促进了相互学术交流，提升了山东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提高了山东大学在国际上的声誉，同时吴富恒校长在国际教育界的影响和威望越来越高。1982年6月10日，吴富恒由于在长期教育

工作中做出的杰出成就，被他的母校、美国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从1942年吴富恒离开哈佛大学回国参加抗战，到1982年回到哈佛大学接受这一荣誉学位，整整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在哈佛大学授予吴富恒法学博士证书的证词中所提到的：“在危险的年代里，这个爱国教育家（吴富恒）坚持标榜教育和学术，把它作为建设一个极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基础。”充分肯定了吴富恒先生为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著贡献。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做大学校长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也是第一个荣膺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的中国学者。身着中山装的吴富恒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为山东大学，为中国学者赢得了无上的荣誉和尊严，这也是他奋斗一生获得极大成功的佐证。

## 二、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的拓荒者

在1949年之前，山东大学的美国文学研究非常薄弱，曾在山大执教的剧作家洪深于1934年在《文学》第2卷第3号上发表过《奥尼尔年谱》，也只是一般介绍性文章。山东大学全面启动美国文学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是由吴富恒在其夫人陆凡教授的协助下展开的。1963年，由吴富恒先生发起，经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创建了“美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吴富恒兼任研究室主任，陆凡、张健任副主任。这是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学术机构。它的创立，对山东大学，乃至对中国学术界打开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道路，无疑有着筚路蓝缕之功，在开拓美国文学研究的路上迈出了扎实的一步。1978年，经教育部批准，研究室扩展成“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由陆凡教授任所长。

吴富恒先生深知资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首先抓资料建设，创建了美国文学资料室。他向教育部申请，获得了每年1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直接从国外购买美国文学图书资料。资料室兼办公室设在洪楼山大老校七号楼二楼的两个房间里，后来搬到第一宿舍三号楼。吴富恒先生曾有建一个独立的美研所办公楼的设想，派基建处负责人刘岩同志和美研所郭继德进京，向教育部请示汇报，但后来一直没有批文。山东大学校方对美研所给予了充分的经济支持，用于购买图书等。吴富恒、陆凡等经常出国随时购买一些新书，美国朋友（如印第安那大学的罗玉正教授等）赠送了一批图书，来山大任教的富布赖特教授每次都带些图书来，从而使资料室的藏书丰富起来，成为国内著名的美国文学资料查阅中心，对美国文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吴富恒先生作为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的拓荒者，最重要的贡献是带起了一个学术团队。夫人陆凡是他最得力的工作助手和主要研究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颇有名气的英美文学专家黄嘉德加入了这个梯队。翻译《格列弗游记》成名的英语文学教授张健遂开始了海明威研究。欧阳基从事犹太小说和美国戏剧研究。还从山东师范大学请来了王文彬先生，做美国小说研究。从外文系调来了年轻教师王誉公和郭继德，使学术梯队有了年龄层次感。吴富恒视野开阔，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美国所聘了董衡巽、朱虹、李文俊、梅绍武和施咸荣，从华东师大聘了万培德等为兼职教授。校内校外专家组成了一个很有实力的团队，成为全面开展美国文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吴富恒先生对所内人员研究领域有一个合理的统筹安排。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熟读了恩师瑞恰慈的多部文学理论著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他带头强调从文学理论视角入手，解读美国作家和作品，除了发表一些颇有见解的理论性文章外，还跟陆凡联袂精心翻译了瑞尼·韦莱克和奥斯汀·沃论合写的名作《文学理论》一书，派郭继德去上海送到了译文出版社副总编汤永宽那里。他还主编了《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等著作。陆凡在云南大学上学时就是吴富恒的学生，对文学理论也颇有研究。她在介绍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伊哈布·哈桑的文学理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还请他来山大讲过学。陆凡给研究生开过“西方文论”课。她重点研究的是美国小说，特别对犹太作家的研究颇有见地，对索尔·贝娄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当时是填补空白的研究。她在美国访问过索尔·贝娄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使她的研究文章更有学术含量，在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界影响更大。

犹太文学是山大美国文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之一。陆凡教授带头研究，她指导的一批研究生，学位论文写的也多是犹太作家。欧阳基教授对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小说研究学术造诣很深，还跟郭继德等人合作翻译了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集《银冠》等。王文彬重点研究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就此在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学术"论战"，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黑色幽默小说流派中为首的作家约瑟夫·海勒也是犹太人。黄嘉德教授是国内顶尖的萧伯纳专家，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拜访过萧伯纳，80年代出版过学术专著《萧伯纳研究》。他重点研究19世纪美国文学，发表过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张健对海明威等20世纪的美国小说家研究颇多。王誉公也加入了对犹太作家的研究队伍，还翻译了贝娄的中篇小说《勿失良臣》等。孙筱珍除了发表了有关贝娄等人的多篇文章，还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郭继德就约瑟夫·海勒、索尔·贝娄等多位小说家写过学术论文，发表在重要刊物上。山大美研所对美国小说的研究是全面的。撰写的文章多汇集在吴富恒等编著的《美国作家论》和《美国小说述评》等著作中。

美国诗歌也是美研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黄嘉德教授对惠特曼诗歌的研究很有深度，发表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安增才对弗罗斯特等现代诗人研究颇多，在《现代美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王誉公在美国诗歌研究方面有不凡的成绩，特别是对埃米莉·狄金森的研究很有特色，曾获得了国家社科项目赞助，撰写了《埃米莉·狄金森诗歌的分类和声韵研究》(2000)一书，是国内第一部狄金森诗歌研究学术专著，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在所刊上还发表了魏礼庆等人关于20世纪美国诗人的文章多篇。

吴富恒先生对美国戏剧研究非常重视。1981年，他已任山东大学校长，公务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依然抽空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做访问学者的郭继德写信，建议他写一部《美国戏剧史》，填补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郭继德的《美国戏剧史》是他于1991年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撰写完成的，于1993年出版，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这是国内第一部美国戏剧通史，是开拓性著作，跟吴富恒先生的有先见之明的指点颇有关系。郭继德把美国戏剧作为研究重点，先后出版了《阿瑟·密勒论戏剧》(1988)、《美国戏剧选读》(1994，2006)、《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2004)、6卷本《奥尼尔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当代美国戏剧发展趋势》(2009)等，在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界颇有影响。欧阳基教授在奥尼尔戏剧研究有突出贡献，写过多篇评论文章，翻译过多部剧本，还给研究生开过"奥尼尔戏剧课"。黄嘉德译过奥尼尔的剧本《黄金》等，也写过评论文章。孙筱珍编写了《美国戏剧》教材，给研究生上过戏剧课。研究生的"美国戏剧"课，自1982年起就由郭继德开设，一直延续了下来，还编写了教材。在吴富恒先生的指导下，美国戏剧研究成了一个亮点，还主办了三次、协办了二次全国尤金·奥尼尔戏剧研讨会。

吴富恒先生重视研究成果的出版和交流，1964年就创办了《现代美国文学研究》杂志，陆凡教授任主编，不定期出版，1978年改为半年刊，后改名《美国文学》，1986年9月4日，经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批准，有了"报刊印发特许证"([1986]第018号)。每期出版后除报送外交部等国家外事机关，赠送有关学术机构和高校外文院系资料室，还借郭继德1983年受美国新闻署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邀请访问美国的机会，跟美国国会图书馆交流部主任彼得·布里奇(Peter H. Briage)建立了交流关系，不时地把所刊和《美国文学丛刊》寄去，有一次是吴富恒先生访美时"捎"去的。该刊不仅刊登校内的研究成果，也刊登校外的优秀文章。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赵萝蕤先生就不止一次地在该刊上发表过她的研究成果。该刊当时是国内唯一的美国文学研究刊物，一共出刊了30余期，推动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后因经费拮据而停刊。2000年，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决定支持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资助出版研究会年会论文集《美国文学研究》。吴富恒先生听了非常高兴，于2001年3月17日对郭继德说："一定要办好！"这成了他的遗言。次日他在家中不幸摔倒，患了脑溢血，于当年6月

25日与世长辞。2002年美研所合并到外国语学院，郭继德任所长，已主持编辑了五集《美国文学研究》。实际上，现在的《美国文学研究》是早年的《现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延续。2011年3月18日是吴富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也算是对老校长的纪念吧！

在吴富恒先生的率领下，在陆凡先生等众人的鼎力支持下，山东大学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强有力地支持了外国语学院的学科建设。外院的“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外国语语言文学博士后留动站”等的申请报告都是以美国文学打头的，正像2006年10月中旬国家教育部英语专业专家评估组最后的结论中所说的：“山东大学的美国文学研究在国内高校中有明显的优势。”

## 三、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

吴富恒先生心胸开阔，人在山东大学，心系全国的美国文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他就开始考虑在全国如何开展美国文学研究的问题了。他和陆凡先后赴北京联络，得到了北京大学的杨周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王佐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等一批著名学者的支持。他们回到济南后就着手筹办“全国美国文学研究座谈会”，于1978年1月5日在洪家楼山东大学招待所开幕。武汉大学的张禹九教授幽默地称之为“洪（红）楼会议”。有北大、北外、山大、南京大学、外文所等17个单位的38名代表参加。会议开得很简朴，与会代表在食堂买饭票就餐。时置隆冬季节，天气寒冷，招待所房间里没有暖气，但会议开得很热烈。这次座谈会温暖了一批在“文革”中心灵受到摧残、受到冷落的学者的心。这一批与会者成了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会上还制定了“全国的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工作五年远景和两年协作规划”，决定成立两个美国文学资料中心（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并酝酿了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事宜。这次座谈会对启动国内新时期的美国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8年11月，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成立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吴富恒校长在会上提出了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和支持，商定由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九个单位作为发起单位，开始做筹备工作。1979年5月，在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以吴富恒先生为首的部分筹备单位代表商定当年八九月间在海滨城市烟台召开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由山东大学承办。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1979年8月22日至9月2日在烟台举行，经费由山东大学承担。吴校长率山大校办主任吴关生同志和美研所的全体人员来操办会议。有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41个单位的60多位代表出席。周扬、夏衍等北京的领导和山东省的有关领导以不同的方式对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祝贺。大会除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CASAL）章程”（草案），选出了35名理事，又从中选出了17名常务理事。在学会领导分工时，吴富恒先生被一致推举为会长，陆凡先生为秘书长，秘书处设在山东大学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

吴富恒会长主持美国文学研究会期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我国美国文学研究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展开。

吴富恒先生很重视学会的政治方向，经常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汇报请示，使学会的各项活动符合党的要求和基本方针。1983年全国清查“精神污染”期间，吴富恒先生一方面布置下属认真检查出版的刊物和发表的文章有没有政治问题，一方面依然坚持学术研究方向，顶住各种压力，把美国文学研究继续认真做下去。

吴富恒先生积极组织学术活动。在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抽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安排学术活动，有大会发言，也有分组讨论，学术气氛浓厚，开了个好头。他还邀请了在山东大学执教的密执安大学人

类学系戴孟德教授与会，并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家庭制度的变迁和连续性”的专题报告，为当代美国文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背景，活跃了学术气氛。1981年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复旦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年会；1985年春，由南京大学和《译林》联手，在南京举办了第三届年会；后来还举行了第四届(1989)和第五届(1991)年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秋天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海明威学术讨论会”开了学会进行“专题讨论会”的先河。

吴富恒先生重视提拔年轻人。1982年秋天，在由山东大学承办的全国美国文学常务理事会上，吴富恒先生提出增补年轻理事，经讨论后增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钱青，北京大学的陶洁，中国社科院的钱满素，山东大学的郭继德，南京大学的张子清、杨仁敬等为年轻理事。吴富恒先生在会上还宣布郭继德为他的“业务助手”。后来还增补了译文出版社的汤永宽为副会长、《译林》的李景端为副秘书长、南开大学的常耀信为常务理事，从而为学会补充了新生力量。

吴富恒先生克服多种困难，积极筹划学会会刊《美国文学丛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亲自任主编，指定郭继德负责编辑部工作。正式出版和经费是一大难题，吴富恒先生亲自跟山东出版总社联系，经过几度交涉，总算解决了以书代刊出版的问题。由山大、北大、北外、外文所、南大、复旦等单位学者轮流组稿，最后交到编辑部，经主编终审批准后交出版社。《丛刊》一共出了12期，“寿命”虽短(1981－1984)，但学术含量很高，发表了杨岂深、赵萝蕤、黄嘉德、王佐良、冯亦代，梅绍武、张健、陆凡等众多知名学者的文章和译作，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称之为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

1991年5月在山东大学举行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吴富恒会长也许是感觉自己年纪大了(80周岁)，感到力不从心了，决定把“研究会”交出去。山东大学创建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就从济南移到南京，挂靠南京大学。这即是被学界称之为“孔雀东南飞”的轶事。令人欣慰的是，2001年12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全国第十届尤金·奥尼尔学术研讨会上，郭继德被选为全国美国戏剧研究会的会长，迄今主持着全国的美国戏剧学术活动，即是说，山东大学的美国戏剧研究在国内的美国戏剧研究界依然位于前列。这也许对吴富恒先生在天之灵是一个告慰吧。

[责任编辑　贺立华]